当代社会问题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第4版

文森特·帕里罗
〔美〕约　翰·史汀森　著
阿黛思·史汀森

華夏出版社

当代社会问题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第4版

策　划·刘　力/陈小兰
责任编辑·陈小兰
封面设计·阿　东/韬　杰

- 《当代社会问题》以美国为例，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功能主义、冲突论、相互作用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社会问题、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其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剖析。
- 这些社会问题主要包括犯罪、毒品、教育体制中的缺陷、环境、无家可归者、人口增长、贫穷、种族歧视、单亲家庭、城市基础设施和暴力、大规模兼并、裁员等，本书还强调了对问题起因的认识并提出了对策。
- 前几个版本在欧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被许多高校选为教材。
- 风格简洁连贯，生动易读，始终令人兴趣盎然。
- 《当代社会问题》不仅是一本大学教材，适合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阅读，还适合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工作的人士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阅读。

ISBN 7-5080-2660-8

9 787508 026602 >

ISBN 7-5080-2660-8/C·045 定价：59.00元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

当代社会问题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美〕 Vincent N. Parrillo
John Stimson
Ardyth Stimson 著

周兵 单弘 蔡翔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社会问题：第4版/(美)帕里罗等著；周兵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系列)

ISBN 7-5080-2660-8

Ⅰ．当… Ⅱ．①帕… ②周… Ⅲ．社会问题－研究－美国 Ⅳ．D7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0404号

Vincent N. Parrillo/John Stimson/Ardyth Stimson: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Fourth Edition*)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1999－1956

当代社会问题(第四版)

〔美〕文森特·帕里罗　等著

周　兵　　　等译

策　　划：刘　力　陈小兰

责任编辑：陈小兰

出 版 者：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电话：64663331转)

印 刷 者：北京先锋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开　　本：730×988　16开

印　　张：36.75

版　　次：2002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中央决定予以恢复以来，已经20年过去了。当时中央决定恢复和重建中国的社会学学科，我想不仅仅是对于历史上“左”的东西“拨乱反正”，也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事业对于这个学科的实际需要。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的现状与发展有一个系统和科学的认识。社会学是一门注重调查研究，强调从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学科，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社会迅速变化发展的改革时代，社会学是大有用武之地的，社会学在中国应当有一个大发展。历史前进的步伐要求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在理论、方法、具体专题上的研究能够跟得上我国实际社会的发展，而且应当在理论上、研究方法上、研究专题上都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12亿人参与的伟大社会变革是社会学生长、发展的最肥沃的土壤，也应当结出社会学灿烂丰硕的果实。但是，坦率地说，我们所做的距离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

我曾经多次说过，一个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可能招之即来。80年代初我说，在大学里办社会学系，一要教师，二要教材，即需要一批对课程内容十分熟悉的教师和一批高质量的教材。但是这个学科中断了近30年，解放前的教材许多都不适用了，过去从事过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一是年纪已大，二是多年改行，等于是要完全重建一个学科。在这样的形势和条件下，作为起步阶段，我们1980年在北京开办了暑期社会学讲习班，请了一些国外的学者来讲课，后来又在南开大学举办了社会学培训班。这些培训活动为后来各地建系、建研究所打了一个基础。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

有一批在国外学习社会学的留学生取得学位回国,加强了国内社会学的力量,也为中国社会学与国外学术界同行的交流与联系拓展了渠道。今天虽然在一些大学和社会科学院成立和发展了一批社会学系和研究所,培养了不少学生,也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社会学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们今天可以说仍然处在这个学科的重建过程之中,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头脑必须清醒,仍然需要坚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一步一个脚印地踏稳了前进。

在培养教师和编写教材方面,应当说这些年来大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些成绩是应当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交流,还很不充分;国外社会学界的最新动态,他们在理论思考方面的新探索,在社会调查中开拓的新课题和在研究中做出的新成果,还不能够及时地反映到我们的教材中来。我们绝大多数教社会学课程的教师和学生,还做不到流畅地阅读外文原著。所以精心地选择一些在国外一流大学通用的、学术水平和思想深度公认比较优秀的教材,把它们翻译过来,洋为中用,提供给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做参考,以补充国内教材的不足,是目前阶段学科建设需要认真去做的一件事。

我去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提出了“补课”的问题,我自己带头重新阅读了一些经典的社会学教科书,写了一些读书札记一类的文章,也要求研究所的年轻教员和学生更认真地读书。我感觉,有些人的学术基础原来并没有打好,毕业后忙于做课题、写文章,但是写的东西读起来让人感到功底不够。我由此想到,今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帮助年轻人打好学术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建设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和一批优秀的课程。

最近一个时期,高等学校正在积极推动和深化体制改革。为了在21世纪建设成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在体制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学系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相互打通,这样可以使教学与科研结合得更好,得以把两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这对于学科建设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我希望今后北京大学在社会学教材与课程建设方面能够多发挥些作用,与其他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同志们一起,为教学质量

的提高和学科的长远发展共同努力。

华夏出版社积极于出版社会学的翻译教材，对于高校课程与教材建设应当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如何结合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教材和自己编著教材的现状，根据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专题领域教学工作的实际需求，大家共同商议，制定出一个计划，从国外社会学公认的优秀教材中仔细选择一些书，同时认真选择译者和校者，保证翻译质量，逐步分批推出，我相信这将对于我国社会学的教学工作和课程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这也是北京大学应当积极参与并努力做好的一项服务工作。

同时，社会学恢复有20年了，我希望我国学者自己在积累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能够陆续出版一批我们自己编写的、更加结合中国国情的优秀教材。逐步做到以我们自己的教材为主、翻译教材为辅，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学就会真正逐步成熟起来。21世纪不会是一个平静的世纪，全球化增进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同时在相互碰撞中也隐藏着矛盾和冲突。我们需要了解其他社会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行为规则，也需要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精髓，逐步在比较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与他人，真正做到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我想这应当是中国社会学者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可固步自封，也不可妄自菲薄。翻译国外的优秀社会学教材，是我们努力认识其他社会的制度与文化，并在认识他人的过程中达到认识自身的途径之一。

費孝通

前　言

从本书上一版出版3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公众对我们社会中的某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例如，由于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华盛顿特区所采取的措施，鼓励雇用妇女及少数民族成员的赞助性行动业已失去了其大部分的效力。社会福利也差不多已成为一项州政府的计划，而不再为国家所控制。联邦政府对非美国公民的资助大幅度削减。许多一度认为保健组织（HMO）可以解决医疗支出不断激增之难题的观察家，现在仅仅将它们看作是惟利是图的商业团体。这些团体常常为了减少开支而拒绝给病人进行一些重要的化验和治疗。

其他的一些趋势也加重了社会的忧虑。大规模兼并及科技与电讯领域的进步使得一些机构开始缩小规模、解雇熟练工人，并制造出一些显然收入较低和升迁机会有限的新岗位。各级政府尽力在不加重纳税人负担的情况下平衡预算。与此同时，犯罪、毒品、教育体制中的缺陷、环境问题、无家可归者、人口增长、贫穷、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单亲家庭、城市基础设施陈旧和暴力等，都造成了美国理想和美国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

如此普遍的问题要求我们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学研究。的确，许多著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虽然其他教材的资料非常丰富，但我和我以前的合作者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别的教材都不能激发学生用社会学的视野来研究社会问题的兴趣。我们的目的正是要为学生们提供一本生动的、易读的教材，而不是罗列枯燥的统计数据和进行复杂的社会政策分析。尽管之前的几个版本产生了令人满意的强烈反响，我还是试图在第四版中——这也是在编写本书过程中第一次由我单独进行工作——努力使这本书显得更加清晰和全面，在所有章节中采用一种更为连贯简洁的风格以使读者能够始终兴趣盎然。我知道许多学习这门课的学生并非来自社会学专业，所以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分析社会问题所必需的社会学基本知识介绍。在日常生活中，学生们就已亲身经历过这里所要讨论的许多问题，也形成或接受了许多虚构的或传统的解释。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这些似是而非的解释，代之以科学的概念。

为了建立这一实用的解释体系，在每一章中我都用社会学的理论对事实内容进行分析。一些其他的教材往往只用冲突论观点，但我的方法是多方位的。我提供了功能主义、冲突论和相互作用论等各种观点的分析。因

为我认为，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应该知道所有这些观点。此外，两种新的理论视角，即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也出现在有关章节中。第14章讨论了最新的环境主义的观点，它从根本上抛弃了两种相辅相成的观念(人类是环境的侵入者和不要破坏自然的目标)，转而支持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积极介入。

偏向于某一特定理论观点的教师，在课堂上对它便会特别强调，并把本书作为用来支持或对照其观点的材料。确实，以前许多评论家和使用者常常根据他们自己的偏好，将本书的观点贴上功能主义的、冲突论的或是相互作用论的标签。没人能说这本书同某种理论观点相对立，但本书也没有过分拘泥于那些未定形的社会学分析。同其他教材相比，读者在这里可以发现更多的理论评述和理论的运用。

本书的结构比一般论述社会问题的图书更为统一，在章节的安排上依序讨论从微观到宏观的问题。依据主题的不同，全书一共分为5部分，每一部分先是一个一页篇幅的导言，使读者了解本部分各章的主要内容、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以及在阅读中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

每一章先提出一些具有争议的“事实”材料，以引起读者的兴趣，然后用一节来交待每个社会问题的简要的社会历史背景，之后再用一节交待其国际背景，以说明其他一些社会是如何处理特定的社会问题的。不过，重点还是聚焦于当代美国的社会问题、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其持续存在的原因。本书还强调了对问题的社会界定如何影响到人们对事情起因的认识和寻求对策的努力。通过整合社会学理论和目前的知识，学生能更全面地理解这些社会问题。出于这个目的，本书还插入了一些加方框的专栏，以说明或补充所讨论的问题。

我非常想要刺激每个学生的“社会学想像力”。这个词是赖特·米尔斯在40多年前首先提出的。它指的是人们认识自身经历与社会变化如何相互联系的能力。本书的两个独特之处，即第2章和每1章的“未来前景”部分，它们都采用了米尔斯所谓的“个人与社会、传记与历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2章考察的是处在社会中的个人，研究现代世界所造成的失范和异化问题。因为个人往往容易从责任和个人缺陷出发，而不是根据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来界定他们所遇到的麻烦，所以应该让他们明白，个人对生活质量的期待是受到社会影响的。本章帮助学生对构成人们自我形象和自我评价、制造机遇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状况获得社会学的认识。它还讨论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这是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迷失”概念的一个自然延伸。

每章的最后一节是对定位于2030年的“未来前景”的描述。这可以

帮助学生形成一种认识，即根据我们今天实行的政策，可能会产生几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和结果。我希望这一部分能激励学生的热情，去研究社会学的视角和认识变化的可能性。

为了保持一种流畅易读的风格,我特意把注释放在全书的末尾,以免打断全书的行文。除了前面提到的插入正文的专栏外，用于帮助教学的还有各章的小结、书目、关键词和书末的专用词汇表。另外还有一本教师参考手册，包括有各章的概论、要点、关键词、课题和活动安排的建议、上网练习和一个有关媒体材料的书目。教学手册中还提供了测试教学效果的试题及用于各章论文写作和讨论的题目。其他可以获得的教学资源还有一个电脑测试题库、一盒互动的社会问题录像带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幻灯片软件。

在社会问题这样一个广泛和快速变化的领域修订一本书是个严峻的挑战，但是，由于有许多人的帮助，这个挑战变得并不那么艰难可怕。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我要感谢威廉·帕特森大学的约翰·史汀森和基恩大学的阿黛思·史汀森的贡献，他们是本书前一个版本的合作者。虽然我对旧版的许多方面做了明显的修改，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在其中依然清晰可见。同样，玛丽·罗·玛约原来所写的家庭一章，在这个新的版本中仍然非常醒目。我还要为米歇尔·德安吉洛对这一版所做的协助研究向她表示感谢。

我还要感谢本书过去的一些使用者，他们提出了非常有帮助的意见和建议。特别要感谢的评论者有埃尔·卡米诺学院的A. 勒维恩、麦克尼思州立大学的凯斯·德尔金、哥伦布州立社区学院的厄尔·谢佛、新奥尔良罗耀拉大学的马克·鲁本菲尔德及纽约州立大学科波斯基尔分校农业和技术学院的安吉莉卡·霍尔。我也要感谢本书以前几个版本的评论者：朗伍德学院的李·米拉·比得维尔、哥伦布州立社区学院的安妮·彼得森、戴顿大学的玛丽·约·琼斯、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劳伦斯·所罗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罗伯特·韦勒、拉玛大学的斯图尔特·赖特。

最后，我想要感谢本书的编辑小组，特别是艾林与培根出版公司的凯伦·汉森和玛丽·贝斯·芬奇，感谢他们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还要特别感谢的是丛书的编辑萨拉·凯尔鲍赫，是她签署了这项计划并使一切工作开始起步的。达斯汀·戴维森在使本书按时印刷和出版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史蒂夫·格雷出色地完成了原稿的编辑，并提出了若干有益的建议。我还要感谢以下两位的出色工作：图片研究苏西·霍华德和版式设计迈克·金。

文森特·帕里罗



内容简介

《当代社会问题》以美国为例，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功能主义、冲突论、相互作用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社会问题、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其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剖析。

全书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介绍有关社会问题的不同社会学理论和视角，其余各部分分述当代社会在个人安康、社会平等、社会机制和社会质量方面存在的普遍问题。其涵盖面异常全面，从酗酒、吸毒、性行为、犯罪、暴力、医疗保健、教育体制中的缺陷、环境、无家可归者、人口增长、贫穷、种族歧视、单亲家庭、城市基础设施和暴力、大规模兼并、裁员等，无所不包。

各章分别讨论一种问题，先交待这一问题的背景和相关统计资料，然后介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看法，以此启发学生对当代社会问题进行社会学的思考。

本书虽然以美国为例，但其讨论的社会问题是各国普遍存在的。

风格简洁连贯，生动易读，始终令人兴趣盎然。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

目录

第1部分 社会问题的社会学

第1章　定义与视角

第2章　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异化、失范与后现代主义

社会问题影响着每一个人。我们中的许多人，事实上每天都会因为种族、信仰、性别或收入微薄等原因而遇到不平等的对待和机会。也有人在一生中会经历诸如吸食毒品、家庭破裂、技术更新或邻里不和的问题。犯罪和暴力直接影响到许多人，同时又使他人生活在其可怕的阴影之下，有时甚至还有可能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

因为有太多实际的和潜在的问题，所以很难确定究竟哪一种问题的影响最大。是受到罪犯攻击直接受伤的威胁，还是有毒或破坏自然环境的工业污染造成的间接威胁?抑或是性别、年龄、阶级、人种或种族歧视这些看似平和破坏力却很强的问题具有最为深远的影响？如果我们居住在郊区，城市的问题是否会有影响？贫穷国家人口过剩的问题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

哪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呢？关于它们的起因，我们有科学的证据吗？或者我们只是受到了虚构的信念和传统的但却是毫无根据之解释的困扰？我们在行动之时，是否能有充分的了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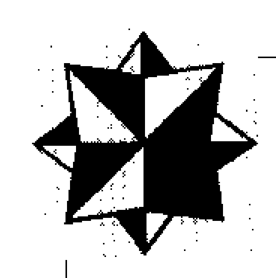
光知道某一个问题的具体数据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超出对原因和结果的臆断而进行深入的调查，从而科学地确定其根本原因，以及如果不能补救将要付出的社会代价。对社会问题加以报道的是新闻；思考如何面对它们的是哲学；但是，对它们进行科学的调查和分析的则是社会学——也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这一部分旨在为客观地研究以后各章中讨论的社会问题提供一个概念性的框架。

第一章提供对社会问题本质之认识，并分析我们的主观性是怎样常常将我们引入歧途、得出错误结论以及怎样误导我们寻求解决办法的努力的。为了拓宽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本部分将介绍5种主要的社会学视角，以考查我们的社会秩序。可以把它们设想为不同焦距的透镜，它们对同样的现实显现出各自独特的影像。例如，广角镜比普通照相机镜头视野更广，远摄镜则将细部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它们都聚焦于同一主题，并且准确地描绘它。同样，宏观和微观社会学的视角为分析相词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有效手段。

生活本身是不是一个社会问题？现代社会是否会导致异化、社区的丧失和无意义感？我们可曾因为世俗世界的复杂性而感到失落、幻灭或是压抑？在能够有效地考察特定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和其对生活质量之期待的影响。第2章将着眼于此，尤其要强调社会在塑造角色、关系和期待时的力量。我们对现代生活感到幻灭，但同时却又背弃了过去。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个矛盾，那么对于有关社会问题之生活条件的现实认识，我们就已经获得了宝贵的洞察力。

第1章 定义与视角



关于社会问题研究的几点事实

- 人们总是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和认知对社会问题下定义。
- 答案经常来自于“什么是对的”这样的想法而非科学的分析。
- 事物之间的关联性使问题更难解决；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同时缓解其他问题。
- 认为社会问题是自然的或必然的，这种错误想法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巨大障碍。
- 有的时候，我们完全会轻视社会问题，忽视现实的社会冲突及其破坏性。
- 科学的分析帮助分解和解释那些有可能被忽视的社会生活事实。

在研究社会问题和设法消除它们的过程中，一个难点是理解有关它们的相互矛盾的定义和解决方法。有时社会会在较短时期内改变什么是问题、什么不是问题的界定，从而要求人们克服自身的适应问题和调整其行为。而有时，对一个问题的“解决”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在以下各章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讨论时，让我们注意一下上述观点的几个例子，以便更加全面地理解它们。

不断变化的定义 以往关于性表达和性关系的规则早已不再适用。随着美国社会在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里日益趋于两性平等，男女间相互作用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只是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性骚扰”、“婚内强奸”及“约会强奸”等行为才被看作是社会问题。男性为女性开门曾被视作是男性绅士风度的体现，现在却受到许多妇女的嘲讽。她们认为这是男性支配地位的表现。男人过去一直热衷于浪漫追求的求爱方式，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固执，正像俗话所说的，“软弱的男人不能博取芳心”。然而在现在，这种行为有可能被认为是“非礼之举”，甚至有性骚扰之嫌。过去男人主动而执着的表现受到敬佩，现在更能赢得女性好感的则是表现出对妇女的敏感和尊重。现在男人努力在其行为上达到均衡，强壮但不过分，敏感关怀却又要有所作为。妇女也试图在独立性与做一个称心的伴侣之间实现平衡。

也仅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同性恋权利活动者终于成功地改变了

社会对同性恋的看法。美国各州和联邦的法律现在保护个人，使之不因其性倾向而受到歧视。同性伴侣可以公开地生活在一起，不会因为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而对就业机会、权利或权益造成不利的结果。如果他们乐意，他们也可以收养子女。尽管仍有许多宗教组织将同性恋看成是不道德的，但有些宗教的神职人员和信徒已经接受了它。包括同性恋在内的所有少数团体，都有权采取行动反对所谓“敌意环境”。例如，在过去可以不负法律责任的贬义的言辞或评论，现在都可以依法得到纠正。

相互冲突的定义 可能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比堕胎更具争议。以天主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为有力后盾的反堕胎团体，基于道德原因反对堕胎。他们抵制所有支持堕胎的法律。这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类生命本质的根本性问题：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受孕时就已开始了，还是当胎儿可以在子宫外存活之时才开始？堕胎是一种谋杀，还是妇女控制自己身体权利的一桩私事？一个未出生的婴儿是否拥有权利呢？堕胎是否构成谋杀的问题，要看你如何来定义生命。很明显，当意外受孕迫使某个妇女做出困难决定时，整个的事件就完全成了一桩个人事务。当你必须亲自面对这一问题时，所有那些在课堂和法庭里进行的关于堕胎的遥远而抽象、本来没有多大意义的争论，一下子变得迫在眉睫了。

同样，如果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是错的，那安乐死又当如何呢？1977年6月，最高法院确认各州有权取缔这一行为，但各州是否有权允许安乐死的问题仍悬而未决。人工流产和安乐死是否有道德上的区别呢？可能当你有一位家人病入膏肓而寻求这一死亡方式时，你才会感觉到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矛盾的解决方法 即使我们同意，除了自卫的情况以外，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是错的，那么应该如何对罪犯加以惩罚呢？杀人者是否要被处死？死刑是一种公平的惩罚，还是一项有悖于文明社会的野蛮行径？杀人在残忍性上是否也有轻重之别？在枪杀警察的盗匪、用车将两个孩子溺死湖中的母亲以及闷死亲生婴儿又回去参加高中舞会的女生之间，有没有根本的区别？可以这么说，那个母亲和高中生都是有预谋的，而盗匪杀人只是对一次意外遭遇的本能反应。当然，谋杀天真无助的儿童是极其可怕的。但在这3个真实事件中，溺死孩子的母亲和闷死婴儿的女生都未被处以极刑，而抢劫犯则被处死了。因为该州法律规定，杀死警察者要被处死。

“问题”的解决方法 有时由于过度执法，对一个问题的解决又会导致新的问题的产生，反性骚扰的法律便是一例。1996年，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位小学校长做出决定，一个6岁的男孩因吻一个女孩而犯了性骚扰，令他一天不得进入教室。在同一年，纽约市的一位小学校长勒令一个7岁

男孩暂时停学，因为他吻了一个女孩并扯掉了她裙子上的一粒纽扣。虽然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男孩的行为有点“坏”，并且同意校方应该警告他们，这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还可以通知家长以示惩戒。然而对于将描述成人不端行为的术语套用到小学生身上，大多数人可能只是对此报之一笑，或是嗤之以鼻。

为消除校园中的敌意环境而设定的有关言论的校规，有时包含了一些过头的条文，如禁止“不合时宜的笑”。更严重的是，它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言论自由的权利。其实，直到这些基本原则作为《权利法案》（前十个修正案）写入宪法之后，该文件才获得足够的赞成票而被批准。1992年，高等法院裁决政府所有基于敌意或支持而控制言论的规章均属违宪，此后大多数大学才取消了有关言论的特殊规定，改用一般的学生守则。

另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导致新问题的例子是1996年的《正当通讯法案》。为了防止青少年通过国际互联网接触到色情内容，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在网上向青少年散发或展示下流的内容属于犯罪行为。但是根据1997年高等法院的裁决，这条法律也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实际上，法院认为，政府不能通过违反美国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去解决色情问题。

以上这些例子表明，界定社会问题和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都是极为困难的任务。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我们的价值标准，对选择怎样的社会条件以及是否或如何将之界定为社会问题具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解释产生不同的（甚至经常是矛盾的）解决办法，有时解决问题的尝试又产生另外的问题。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关于其概念、现实和满意的解决方法——要求负责解决它们的人不仅要有良好的意愿，还要有更多的东西。

社会问题的四要素

如果要你说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你会选择什么？你脑中可能很快会闪过几个选择，包括犯罪、毒品、贫困和种族主义，然而要想确认其中哪一个最突出则非常困难。谁能排除其他问题而轻松地挑出一项作为全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呢？在做出决定之前，先要搞清楚什么才是社会问题。我们还必须知道，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以下4个要素：

1. 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
2. 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
3. 它们持续很长时间。

4. 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做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

下面让我们详细探讨一下这些要素。

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

城市居民在谈到市政当局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时，总显得尖酸刻薄。经常可以听到人们这样说，“要使某个繁忙的十字路口安上红绿灯，惟一的办法就是有个小孩被车撞了”。不幸的是，这并非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说法，政府通常的确要在造成重大的损失之后才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在衡量一个问题对个人造成的损害时，必须考虑到当前所受的痛苦和将来机会的丧失。例如，种族或性别歧视会造成眼前的窘困、挫折感和收入的丧失，但最终的损害更为巨大。在教育和早期就业机会中被排斥，会改变人的整个一生。在排列最有破坏性的问题时，必须仔细地考虑这些潜在代价。

社会学的分析已成为判定社会损失的一个重要手段。有些看似严重的问题相对并不重要，而另一些不明显的问题却有更广泛的影响。例如，在一个漫不经心的旁观者眼中，城市中犯罪活动造成的主要问题是老年人遭行凶抢劫。但当我们退一步，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整体的影响，就可以看到更严重的问题——对袭击的恐惧。老年人不敢离开自己的住宅，变得孤苦无助，他们的存在被社区所遗忘，因而缺少必要的帮助和保护，他们的问题有增无减。

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

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在有些地区，如伊朗这样的原教旨主义穆斯林国家，宗教是威望和特权的基础，神职人员手握重权。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等级，统治阶级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积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

无论一种社会状况严重与否，只要当权力集团的成员认为它会对他们产生某种影响——或许对其地位带来威胁时，它就成为社会问题。因此，道德愤慨中的主观成分触发了社会问题的定义。

一个社会阶层的成员倾向于从他们自己的阶级观点来看待现实，并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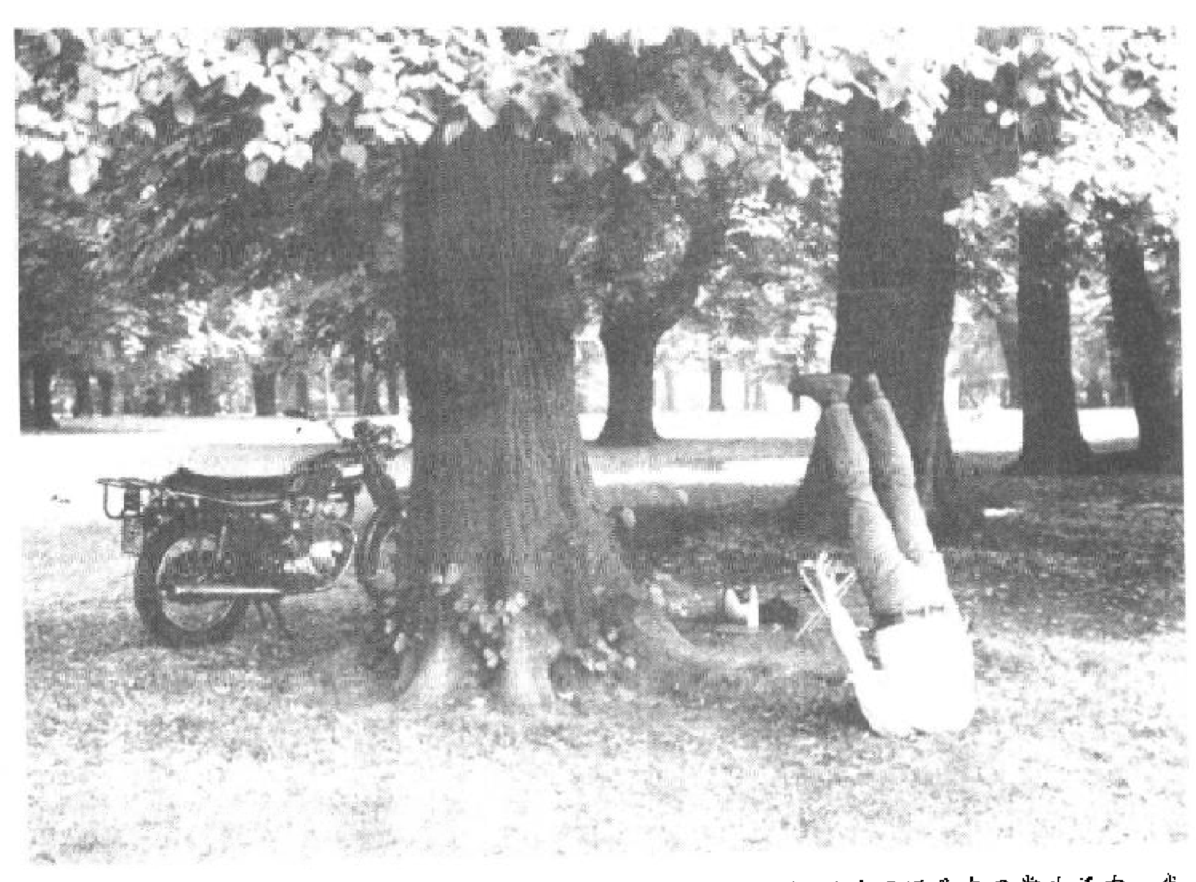
成一整套本阶层独特的对自身和他人的道德和生活方式的认识。因而，在一个群体看来是重要的问题（如福利、社会保障或税收漏洞），在其他群体眼中可能没有什么社会价值。位高权重的人较为重视稳定、社会秩序及保持现有的特权体系。与此相反，希望获取权力的人则对新的思想、变革的政策和挑战现状更感兴趣。有时年龄也会影响到观点的不同。握有权力的人普遍较老并努力维持对其有利的社会结构，而要设法改进这种制度的往往是些初生的牛犊。

持 续 性

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似乎在不断产生：新的犯罪形式或污染，或是对生活的道德秩序的某种新威胁。虽然的确有一些新的问题在产生（如计算机犯罪便是一种新的盗窃形式），但是大多数问题只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而已。在晚间新闻中经常可以看到的纽约或洛杉矶令人触目惊心的青少年男女卖淫的情景，只是这一最古老职业的新的变种，对它的态度常常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为什么有些社会问题会持续如此之久？我们能找出3个方面的原因。

由于相互关联造成的持续性 如果一个社会问题持续了像卖淫那么长的时间，它肯定已经深植于社会，几乎成了日常生活中极其自然的一个部分。排除道德问题，有的社会学家认为，卖淫确实具有正面的社会功能。例如，用于发泄可能会导致更具破坏性行为的性欲。这种从男性出发的观点还认为，某些婚姻之所以能够保持完整，正是因为男人可以通过嫖娼来满足夫妻间所缺少的性欲；而且，只要男人可以用这种方法继续满足他们的生理要求，性攻击犯罪就不会上升。这些理论家于是发现，在互相支持的社会机制间有着高度的关联。要成功地改变其中一个因素，需要探索和改变其他许多因素。

另一些社会学家虽然承认相互关联的存在，但却反对所谓“正面功能”的说法，坚持认为卖淫只是对妇女的一种剥削形式，将之与其他制度中的社会不平等联系起来。因此，消除卖淫，首先需要对社会的约会和婚姻形式、性别角色、对妇女的态度、把人仅仅看作性对象的性别歧视以及关于道德和人格尊严的普遍态度进行彻底地审视。



事物并非总是如它们表面所显示的那样，无论是在上面这幅照片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总是经过文化的过滤，但这常常会将事实曲解。上图中我们看到的并非一起事故也不是一个玩笑，而只是一个在伦敦海德公园练习瑜珈的摩托车手。

因为一些人从中获利造成的持续性 一个社会集团的损失，可能会让另一个社会集团从中获利。例如，对反污染立法的抵制，常常是因为生产者或工人担心会减少利润或失去工作。不过，反对新政策获得的利益并不总是金钱上的。许多有关解决方法的动议遇到阻力，是因为它们威胁到社会中传统的权力结构。对妇女进入管理决策层的阻挠就是一个近例。对传统的权力结构的威胁并不一定要是直接的或有力的，甚至无须是现实的，才会引起反应。如果变革扰乱了人们所想像的事物应有的秩序，人们就会阻挠它。所有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都会利用一种意识形态来维护自身，以解释为什么某些人应该得到更多的权力或特权。它会对任何有悖于这种意识形态结构的解决方案作出反应，将之斥为荒谬的或是太过激进的，除非这个解决方案获得足够的支持，能够战胜这种意识形态的阻碍。

由于欲速则不达造成的持续性 约翰·洛克菲勒在决定向慈善事业投入巨款的时候，明显地带有一种执着地期待迅速产生效果的愿望。洛克菲勒召集了一批一流的医生，许诺说如果他们能迅速完全地消灭一种疾病，他就出钱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健康运动。经过多年的研究，由于一个偶然的

机会，研究人员碰巧发现了曾经横行美国南部的糙皮病的治疗方法。但这只是因为有多年的前期研究所提供的科学基础，医生们才得以实现洛克菲勒速效的要求。洛克菲勒的要求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观念，即期望对问题的迅速解决。[1] 如果解决方法没有产生很快的效力，人们就会放弃努力。

过多的解决方案

社会问题持续一久，就会有许多讨论和思考应运而生。有时候找出的原因和提出的对策是基于偏见、文化取向或是推理，而不是事实。就像我们就要讨论的，这些情况经常导致人们找出错误的原因，提出误导性的措施。

运用错误的因果解释就会造成许多疏漏和损害。在对我们造成最大威胁或扰乱的领域，我们最强烈地坚持错误的信念。由于过分强烈的求知欲，人们总是满足于似是而非、冠冕堂皇的因袭旧说，而不是通过长期深入的调查取得更加客观的了解。

因此，在着手研究社会问题前，应该对这些错误的文化传统和肤浅的理论有充分的了解。这和了解来自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的人们的过程极为相似。首先必须审视和抛弃那些可能有碍于对事物作出判断、妨碍未来之学习的东西。

因文化而起的过多对策 一个能否被理解或解释的社会观念是其文化的一部分。像文化一样，这一观念也不是确定的或静止的；它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如同是非准则经常发生变化一样。而且有的时候，事物为何发生和怎样加以改正这些观念，同社会的道德准则一样不那么合理或科学。〔**道德**（Mores）准则是对社会生存而言至关重要的生活规范；任何人对此稍有触犯就会遭受严厉的制裁。〕要说明日常文化中关于行为的一些矛盾的和不合理的说法，最方便快捷的办法是引用几条美国常用的成语：

"三思而后行"相对于"犹豫必失"。

"眼不见，心不烦"相对于"求之不得，其心更甚"。

应该遵循其中的哪一条建议呢？都不行。我们必须针对具体的情况仔细考查，得出独立的见解和结论。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很少有人这样做。人们仅仅是根据并不充分的材料和盛行的对事物起因的假设做出猜测和决定。

似是而非的理论 每个社会都有其迅速掩饰错误、文过饰非的方式，它使人们的生活得以继续。这些解释有时是完全错误的，但在大多数情况

下，它们的正确与否其实无关紧要。其功能并不在于帮助我们理解真实发生的事情，而只是通过消除社会问题所造成的恐惧、不安或冲突，来稳定社会局势。这在较小的社会团体中特别明显。如果有人对另一人提出严厉的批评，就会有第三者跳出来解释说，“她总是这样的”，或者“他正好情绪不佳”。无论说些什么，所要表达的意思无非就是：“我知道这些不满言论的来由，但这并不重要，或者很快便会烟消云散，所以无需在意，继续谈话吧。”这种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政治生活中也很明显。[2]

我们往往利用缺乏交流这个**似是而非论**（quasi-theory），来掩饰群体间的真实区别（和时而公开的冲突）。“如果人们可以平静地坐下来讨论他们的区别，就会发现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声称，问题并非真实存在，它只是缺乏沟通的一个表现。有的时候，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更多的时候，将对立的群体分开的是根本性的利益冲突或权利争夺。

“甜蜜而神秘的生活”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认为，爱情、出生、死亡都是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生命领域，它们被不可理解的神秘力量所控制。因此，这一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家设法理解这些社会现象的努力只是在浪费时间。然而在美国，许多婚姻以离婚而告终，婴儿死亡率也高于其他许多国家，有色男青年较之白人青年更容易死于暴力。这些和爱情、出生和死亡的其他方面使成千上万的生命深受其害。但正是由于那些不甘于这种似是而非理论的人们的努力，才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断取得进步。

另一个例子是基于所谓“时间治愈一切创伤”这一观念的似是而非论。[3]其论点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而不断变革的社会中，它是最理想的现实社会，但它的问题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其言外之意就是说，不要阻碍全球化、城市化、移民、同化或经济的衰退。对它们的后果，我们只应“逆来顺受”。

似是而非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因为它们掩饰和中和了那些有可能彻底解决而不只是临时修补的矛盾。

必然性的谬误 对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相对较新，因为直到最近才有了这种需求。过去人们往往借助于传统的或宗教的解释来解决周围的问题。例如，“君权神授”的观念曾经解决了谁应该在社会中享有权力和特权的问题。一个带有“王室血统”的小集团对社会其他成员拥有天赋的、神授的生杀大权。同样，在医疗方面，人们很自然地接受了医疗过程中的高死亡率，认为医生业已“尽力而为”了。但事实上，第一个建议外科大夫在手术前先要洗手的医生，却因为他的“奇谈怪论”而遭到迫害和流放（参见专栏 1.1）。

专栏1.1 一个真正的现代英雄

信息似乎一直在制造某种障碍。在过去1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不得不对所有的事情进行猜测。那些最吸引人但有时又是最可怕的猜想家往往是历史书上的主角……

在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经验中，有说服力的猜测都是领导才能的一个核心因素。所以毫不奇怪，尽管我们一下子能占有大量可靠的信息，我们这颗星球上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希望继续猜测的游戏。现在该轮到他们来猜测了，人们该听他们的。

你们可知道为什么这个国家的研究经费被如此严重地削减？（现在我们在研究方面的投入比任何工业化国家都少。）这并不是为了平衡愚蠢的预算，而是为了不发现更多的真实情况来妨碍那些政客们。他们觉得他们的猜测悦耳动听。而如果普通公民通过研究能够以绝对权威性的语气说“你是错的”，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法容忍的。

教育有什么好处？怀恨信息的人们——那些喧嚷的猜想家们仍然高居权位，他们仇恨信息。而且这些猜想家几乎都受过高等教育！好好想想这一点吧。

如果你充分利用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获得的丰富知识，你就会变得极为孤立。因为猜想家们的人数远远超过你我，现在让我也来猜一猜，大概是十比一吧。

我能给你作为依靠的只是件可怜的东西，其实只是聊胜于无，也许未必尽然。这件东西就是一个真正的现代英雄的形象，他就是伊格纳兹·塞梅尔维斯。

伊格纳兹·塞梅尔维斯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于1818年生于布达佩斯，终年只有47岁。他是一名产科医生，这点也足以使他成为现代英雄，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提高婴儿和产妇的健康上。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英雄，就算在当今时代，对于产妇、婴儿、老人、病人或穷人都缺少必要的关心。

前面已经提到，我们拥有信息是多么晚近的事。仅仅是在120年前，路易·巴斯特才刚刚发现很多疾病是由细菌引起的。

伊格纳兹·塞梅尔维斯也相信细菌会导致疾病。在他到维也纳的一家妇产科医院里工作后，他震惊地发现有十分之一的产妇死于产褥热。他们都是些穷人，因为富人还是在家里生产。

塞梅尔维斯仔细观察了医院的日常工作，开始怀疑是医生造成了病人的感染。他注意到，医生们常常解剖完尸体，就从停尸房直接回到产房对产妇进行检查。因此他建议，作为一项实验，让医生在接触产妇之前先洗一下手。还有什么比这更无礼的要求？他居然胆敢向其上司提出这样的建议？要知道，他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但是死亡还在继续，而塞梅尔维斯较之你我更不懂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与人相处，他还在要求同事们去洗手。怀着种种的讽刺、挖苦和嘲笑，他们最后终于同意了。不知他们是怎样用肥皂不停地擦洗自己的双手。

死亡停止了。

设想一下：死亡停止了，他拯救了那些可怜的生命。而且可以说，他的举动后来拯救了成千上万条生命，其中很有可能就包括了你和我。

塞梅尔维斯从医学界的权威和维也纳社会得到了什么样的感谢呢？他被迫离开了医院，离开了奥地利，虽然他对那里的人们尽心尽责。最后他在匈牙利的一所地方医院结束了自己的行医生涯。在那里，他彻底放弃了人性、知识和他自己。一天在解剖室里，他将一把刚刚解剖过尸体的刀片，故意刺进了自己的手掌。就像他早已知道的，塞梅尔维斯不久便死于血液感染。

猜想家们拥有全部的权力，他们又一次赢了。其实是细菌赢了！

猜想家们也展现了他们的另一个方面，对此应该特别加以注意：他们并不真的在乎拯

救生命，他们关心的只是人们服从他们，而他们的情爽，无论显得多么无知，仍能继续下去。

资料来源：Copyright © 1981, Kurt Vonnegut, Jr.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Donald C. Farber, attorney for Kurt Vonnegut, Jr.

社会科学家的作用

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常常与个人的偏见、政治观和价值观交织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化的动物，被灌输了特定的价值标准和想法，生活在一个价值观无所不在的社会当中。因而，形成对社会问题进行客观研究的方法是个艰巨的任务。



为了研究人类相互交往的形式，社会学家依靠各种搜集资料的方法，其中包括直接的访问。确定了被访问者的种族、性别和社会阶层等特定的背景变量后，研究者可以在提出他们的分析结果之前，就掌握不同的人们在观点态度中的差异。

价值判断是现实的。也就是说，它们真正影响到个人和社会如何作出决定，决不是空穴来风似的单纯的情感反应或非理性的传统。人们的道德判断左右了社会的一些判断，如什么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哪些问题应该予以优先解决等。像高犯罪率是否比高离婚率更“坏”或抢劫是否比酗酒更“坏”这类问题，科学方法是无法解决的。

但对这些问题的政策决定却要基于客观的证据：基于对问题真实程度的准确统计，以及合理地估计消除某一特定问题会导致的结果。像解决特定政策会导致什么结果这类问题，正是社会科学家的职责所在。按照传统的观点，科学家的作用在于选择解决问题之方法，而不在于选择应解决哪些问题。

研究思路

即使偏见能够被消除，对社会问题的日常思考仍是随意的和缺乏组织的。它要一下子面对太多不同的事物，而且通常很少或根本不依靠确凿的证据。与之恰恰相反，研究者运用**假说**（hypothesis）来组织他们的探索。假说是一种可以与事实相对照的表述或预测。比如说，“假如福利支出连续3年翻番，较之通常的情况，3年后仍需依赖社会福利维持生活的家庭就会大大减少”。请注意，这个假说只是涉及了社会福利问题中的一个小的方面。这也是进行研究所要付出的代价：它必须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假说能帮助我们集中思考一些社会问题，以下一些想法和原则有助于形成有效假说。

1. 假说可以得自**归纳**（inductive）或**演绎**（deductive）。研究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构建理论或更好地补充和加强理论。例如，如果我们对教育社会学感兴趣，就可以通过演绎的方法，首先选择现有的同这一问题最为相关的原理；然后，对该理论进行研究，找出它尚未解决的某个问题，并说明这个问题，使之能在特定的教室环境中得到检验。如果现有的证据无法支持原来的理论，那就要对理论进行必要的修正。

如其不然，还可以进行归纳总结，从一个我们所遇到的特定问题出发，例如，校园暴力。研究这类事实就会引向对为何出现这些问题的猜测或预感；这种预感就会转变成为一条能够加以检验的假说，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然而，它不应该成为定论。猜测是一个有益的开始，但在被检验之前，它只不过是事后的一种解释罢了。

2. 假说必须以**经验主义参照系**（empirical referents），而不是道德判断或模糊的感觉。例如，你可以假设，“坏男孩很受女孩子喜欢”。然而，提

出这样的假说颇有危险，因为虽然我们都认为自己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每个人的解释都是不同的。“坏”意味着什么？粗暴，好斗，反叛，还是别的？

3. 在假说中，必须将概念表述清楚，应尽量使用**可操作的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s)。如，“在男女同校的环境中，学生得到更多的教育”。“更多”是什么意思，怎么对它进行测量呢？是接受专家的判断？还是用考试分数评估学习的情况？抑或是在后来的访谈中收集学生们的印象？学习态度的变化能不能就称作是教育，或是把教育限定为正式的知识传授？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所研究的是“教育”的哪个部分。

4. 对检验假说的条件必须予以明确说明，它还必须是能够重复的。科学只接纳被许多研究者共同证实的事物。首先，要尽量将研究条件公之于众，使他人能重复此项研究，以防止伪造和个人隐瞒其偏见。其次，科学的进步需要积累。后人的重复研究是希望用新的思想充实和拓展旧的理论。第三，假说通常是在一定的背景条件下提出的。例如，“在美国典型的州立大学的社会学课堂里……若是男女生同课，则所受的教育更多”。[4]换言之，应该特别指明要验证的观点所处的环境条件，包括地点和涉及的人物类型。

研究观察

比较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手段。埃米尔·涂尔干的《自杀论》一书，是利用现有材料通过比较发现内在联系的经典例证。他将自杀率高低不等的地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剔除无法说明地区差异的解释。宗教因素在比较的过程中得到了验证：无论其中还有什么别的特点，在新教地区自杀率一般较高。这个事实使他得出假说，认为新教徒由于缺乏教会密切的引导，导致社会紊乱、自杀增多。

教科书、其他出版物和另外的媒体（如电视、电影等）也提供了许多无法直接得自个人的材料。比如说，研究者通过计算早期和近期商业广告上出现的带偏见性的性别形象的数目，来测量社会中陈规旧俗的减少。通过对现有材料的观察，可避免打扰他人生活而产生的问题，特别避免破坏日常的情况，进而避免扰乱研究对象的日常行为。它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者无法控制如何获得原始资料。

实验是一种受到控制的情形。研究者在其中放入新的因素以判断其改变原有情形的力量。通过与另一个几乎完全相同、但没有接受新因素的情形相比较，来衡量变化的程度。这第二种情形继续按原样发展，就宛如第一种情形没有获得新因素一样。如果第一种情形有不同的进展，就可以得

出结论说，新的因素确实具有力量。要使实验有效，就必须控制其他所有的变量：研究者要确保两个研究情形在开始时等同，在研究过程中也不会有其他新的因素介入，使情形受到改变。尽管这种控制在实验室里司空见惯，但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社会学的实验中几乎不太可能。将一切控制于实验室中的做法的不足之处在于，人为建构、受到控制的情形通常极不真实自然，根本无法同正常的社会生活相比。

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对任何在美国生活过几年的人来说都不会陌生。但是你还是会吃惊地发现，专业的调查并不只是问卷调查或迅速收集事实和多项选择题。研究者经常进行采访以便充分地说明问题，并对环境和被调查者对每个项目的反应做出全面的评价。只有当精心地对不记名问卷调查加以先期的测试并保证每个问题都清楚明晰，不同的人都可以充分理解的前提下，问卷调查的结论才是可靠的。加以引导的交谈是一种松散的采访形式，它试图消除研究中的操纵气氛，以利于新思想、新观点在日常的谈话中产生。

专栏1.2 研究观察的主要形式

现有的材料	历史/比较研究 文件和日记 媒体和出版物（内容分析） 其他器物和仪式 数据系列和统计报告	
有组织的观察（实验）	实验室（情形控制） 野外（介入以衡量效果） 自然（比较发现的情形）	
调查	问卷调查	邮件调查 电话调查 直接散发问卷
	采访	有组织的采访 焦点采访 加以引导的“交谈”
自由自在的观察	个案研究（深入研究一个群体） 超然观察（注重客观性，常常结合准确的描述） 参与观察（通过介入进行理解）	

资料来源：Inspired by G. H. Lewis (ed.), *Fistfights in the Kitchen: Manners and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Santa Monica, Goodyear, 1975, p. 124.

问卷调查的一个基本缺点在于，研究者只能问一些他们早已了解的东西。加以引导的交谈经常作为在问题层面被弄清以前进行探索性研究的一种方法。对问题准确的描述——即发现问题的范围和产生的条件——要求对情况进行初步的调查，从而对现实情况有个明确的概念，帮助研究者提出相关的问题。

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可使研究者单单记录事先已严格分类的行为。在现场的研究者只要将事件套进不同的分类中，并加以计算就行了。这对检验假说非常有效。研究者更多的是通过观察来探索新的情形。人类学家探访一种新的文化便是一个常见的例子。进行亲身观察的研究者所必须确定的关键一点是，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卷入被研究者的活动。参与程度高的研究者最终会分享被研究群体的感受，这可能有助于他们更充分地理解现实情形。然而这种参与和介入又会破坏一个研究者所必需的公正与独立，而无法透过当事人的感情和信仰分析其中潜在的社会意义（参见专栏1.2）。

理论的重要性

我们被形形色色的事件所包围。那些被认为是突出的问题，只是因为我们对其重要性较为敏感。在深夜里你身后的脚步声嗵嗵作响，但在白天，同样的声音几乎听不出来。你不喜欢的种族成员的吵闹行为，“证实”了人们带偏见的观念，但同样的举止，若是你自己的种族成员所为，则只是“取乐”而已。因此，只有当我们选择和解释了部分的现实以后，“事实”才得以确立。

同样的情况也可见于科学当中。关于社会的理论不是现实世界的直接写照。科学家必须先认定一个事件是重要的，然后再按照一定的意义——对现实的某种适应——对它加以分类，它才能够成为科学知识的一部分。

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主要有3种方法。每一种方法都包含了对社会运作的一般性假定，而且会带着某种取向探讨社会问题之起因。在每一章中，我们都会提到这些取向。它们有时会对社会问题中存在的哪些因素比较重要这类问题提出矛盾的观点，因为它们各自注重于社会的不同侧面。这些不一致应被视为争议性的，即刺激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在研究任一特定社会问题时，哪种取向是最有用的？缺少占主导地位的取向并未

使其他取向变得次要，它们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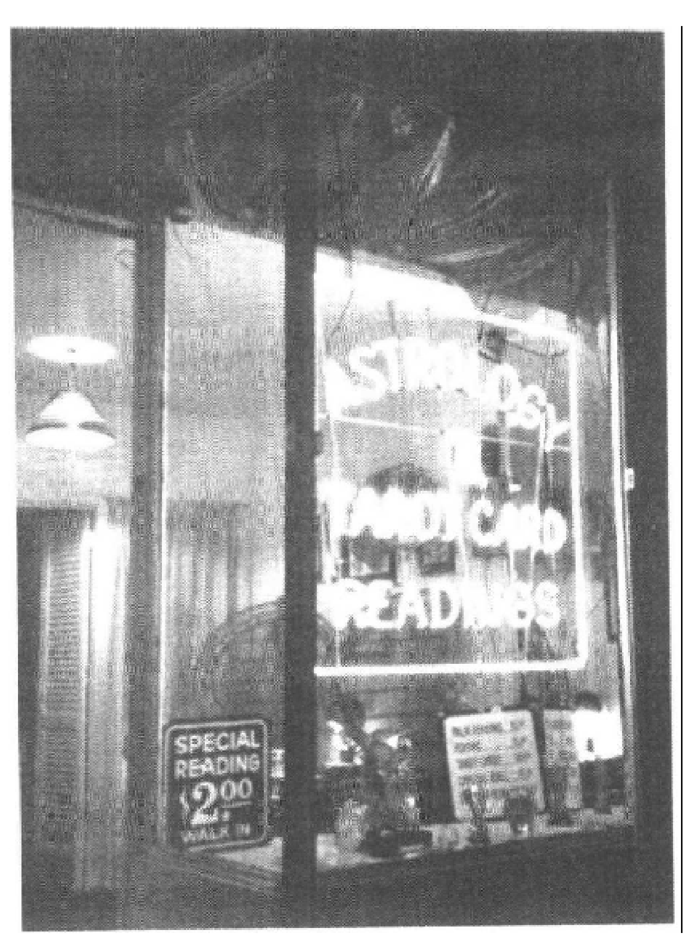
功能主义取向

功能主义曾被看作是社会学的核心传统。[5]它将社会学看作是关于社会秩序的科学，关注于长期支撑社会聚合的社会结构。社会就是信仰和传统行为方式的结构，它包括**价值观**（values）（竞争、诚实、成功）、**身份地位**（status positions）（职业、阶级结构、性别角色）和**制度**（institutions）（家庭、教育、宗教、经济和统治方式）。每个部分都对维持整个社会的运作起着积极的作用。如果其中某一部分变化过快，就会破坏到相关的其他部分。早在19世纪，赫伯特·斯宾塞就首先提出社会是一个整合的系统的想法。他把社会比作生物有机体，其中每个阶级或制度都对维持整体起着直接作用。如果系统能够保持动态的平衡，不受扰乱地逐渐演进，所有成员都能从中获益。斯宾塞将个人直接放在“适者生存”的竞争环境之中，正是这种竞争促进了社会逐渐的演进。对这种竞争的限制是人们用来防止扰乱和扩大收益的社会契约。因此，社会秩序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社会越趋理性化，其进步也就越大。

许多社会学家把埃米尔·涂尔干尊为**功能主义取向**（Functionalist orientation）以及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认为斯宾塞对秩序问题的解释过于简单。如果社会的基础是纯粹理性，就会导致不受人类相互关系或共同责任等情感限制的竞争。正相反，涂尔干认为，人们之间存在着丰富的共同情感，而斯宾塞的观点并没有说明它们的重要性。涂尔干认为，人们必须先具有一定的团结性，才会互相信任，从而订立契约，并有理由期望它得到维护。必须有一种共同认可的信仰和感情的集体意识，作为维持社会秩序之契约或其他机制的基础。

有的批评家指出，涂尔干关于信仰的一致和近似构成了人类团结和社会秩序的决定性基础的观点太过保守。在他们看来，涂尔干的立场很容易导致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新的观念或生活方式不同的次群体会带来偏离和扰乱，而不是中性的或积极的创新。

功能主义方法 罗伯特·默登在其对**越轨**（deviance）来源的著名分析中，使用了普通美国人对物质成功价值标准的假设。为什么有些法律更多地被触犯？为什么有些类型的人更多地违反规则？最为重要的是，社会中的什么因素造就了不遵守规则的人和异常的人呢？默登的结论是，人们在使用取得成就的方法这一点上存在着不同。这个理论是关于社会缺陷导致个人异常的一个最有影响的例子。[6]默登假设，所有美国人都极为重视一



通过扑克牌、水晶球、掌纹、摸骨或拆字等来预测一个人的未来的算命行当古已有之，今天甚至更甚。其他文化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保留至今。我们接受现代解决问题的方法，常常要落后于我们的科学知识。

点，那就是成就导向成功，大部分人采取被广泛认可的受教育和就业的奋斗历程。然而，有一些美国人却由于他们的种族或阶级背景而受歧视，无法通过这条途径取得成功。合法的成功之路一旦走不通，就得寻找和采取不合法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阶层低的人们——无论他们是谁——总是不成比例地充斥于监狱之中。这无关人的“品质性格”，而是不公平的环境和强大的追求成功动力的社会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成功的动力则是主导文化强加于他们的。

默登使得功能主义认识社会制度的方法得以定型，这种方法就是确定社会制度对维持社会秩序所起的作用。[7] 他认为，可以通过分离其对维持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来理解一切社会安排。如果某一种社会安排具有破坏性，就说明其机能失调。这些标识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不合适的行为方式（最经常被引用的就是卖淫）能持续很久：因为它们满足了某种社会需要。

默登最大的贡献是将**可见功能**（manifest functions）与**潜在功能**（latent functions）区分开来。社会变化通常带有预期的目的，然而因为变化通常还有不可预料的副作用，所以这些可见功能并未起作用。例如，直到不久以前，许多城市都规定，警察只能使用38毫米口径的武器，因为它对旁观群众危害较小。这确实起到了很好的安全效果，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更多的警察和旁观群众被枪杀，因为罪犯使用的自动武器压倒了警察。这种潜在功能的概念在我们对社会问题研究的全过程中都极为重要。它引导我们透过被社会接受了的对事件或安排的解释，确认或预测其他意想不到的后果。

功能主义思想的基本缺陷是，一致性并不是整个社会范围的，它是局部的。如果我们追随默登的意见，去寻找各个组织或社会群体所表现出的功能，就会发现每个独立的社会单位所维护的并非整个社会，而是它们各自特殊的需要。政府机关、家庭、友好团体、工会和职业团体都必须维持其特殊的利益，而这些特殊的利益通常却是矛盾的。

冲突论取向

结构的专业化和区分削弱了社会的秩序和规则。几百年前，当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一些狭小的农耕社会之时，一共只有5种主要职业：农奴、地主、工匠、士兵和牧师。他们各自拥有牢固确立的权利和特权。虽然很少有人会承认这是个理想的世界，但其优点在于简单有序。人们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身份和权利。工业化、科学的和社会的创造发明、政治革命使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以至于已经无法统计现代社会中究竟有多少种职业，也无法识别所有独立的亚群体。有些人与其他的亚群体成员联合，一起实现共同的价值理想和目标；但更多的人则为了获取社会或经济机会而与他人激烈竞争。例如，在下面两种人中，谁面临着更加迫切的社会问题：一是仍留在土地上但又面临着失去自己农场危险的农民；二是早已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但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失业农民？他们有着相似的背景，但各自不同的状况使其为了获得社会的帮助和支持而处于直接的竞争之中。

除了经济上的或利益集团间的相互竞争，亚群体还可以按照相互冲突的传统价值标准加以划分。冲突论的观点认为，大部分社会问题是因群体差别而引起的混乱所产生的。区分使得专门化加剧，这又加剧了分歧。当一个群体感到自身的价值或期望被触犯的时候，就会产生社会问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要么是通过妥协重新取得一致，要么就是一个群体单方面利用权利强行改变社会机制以适应其需要。在美国这样一个充满差异的社

会里，当然存在大量的价值分歧。关于堕胎、在学校祷告、赞助性行动的争论，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社会的一个中心事实是，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中，一些个人比他人拥有更多的权力和特权。这些人控制着对有限的经济资源及其收益的不平等分配，从而行使与这种控制相联系的权力。富有者试图维持或增加自己的优势，并传给下一代；贫穷者则试图平均化或扭转这种结构的不平等。冲突论者认为，如果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不改变，诸如犯罪、贫困、污染、不良的医疗状况和经济剥削就不会被根除。

虚假价值观 冲突论者——从卡尔·马克思至今——都认为其他的理论方法只是在为现行的体制辩护，他们使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和批评，从指向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群体，转向受害者或“官僚阶层”。例如，冲突论者认为，价值的矛盾和不充分的社会化并不造成社会问题，体系中的竞争和判断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产生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其他社会学理论称之为社会一致性的共同价值，被冲突论者视为**虚假价值观**(false values)，是根本的破坏性力量。他们认为，正是“财产欲望”这个主要的美国价值观，刺激了犯罪的大量产生。当人们目睹统治阶层的精英们利用暴力和赤裸裸的权力为工具来控制社会以维持其特权结构时，暴力犯罪也变得合理了。

由于占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与人们对美德和尊严的固有看法极不相容，人们便被异化了。于是异化成为不健全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只有向一个拥有真正平等维护个人尊严的新社会进步，才能克服异化问题。由于他们内心对实现社会的完美充满信心，冲突论者一般都对社会变革或新兴的生活方式抱乐观态度。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是离经叛道，需要加强社会控制，也不认为是不合作，需要重新社会化。在他们眼里，这些只是为了抗议或重组有缺陷的体系。于是，根据这一原理，许多犯罪行为都是被压迫者的“自然”行为。

谁的问题？谁会获益？ 即使你不接受冲突论有些激进的看法，但它确实为分析社会问题提供了实用的指导。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谁的问题？”也就是谁受到伤害或损失？每种社会问题都与一些特定群体或社会阶层相联系。了解问题承受者相对的权力或社会地位，有助于我们理解应采取何种社会行动。下一个问题是：“是否有某个群体从社会问题中获益？”比如说，如果工厂主可以雇用廉价的非法外来劳动力，他们当然不会反对非法移民。最后，假如我们帮助某个受问题困扰的群体，我们是否会剥夺其他群体在获取有限的资源或权力竞争中的某些权利呢？

相互作用论取向

侧重于社会心理的**相互作用论取向**（Interactionist orientation）集中研究人们是如何理解和界定影响他们生活的事件的。象征性的相互作用——为该方法提供理论背景——弱化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社会是一个规则和价值标准的压倒性和一致性结构，转而强调社会的形象是日常生活中个人相互关系的总和。它认为社会的运作规则不是一套固定的戒律，而是个人在面对问题时做出的数以万计的解释的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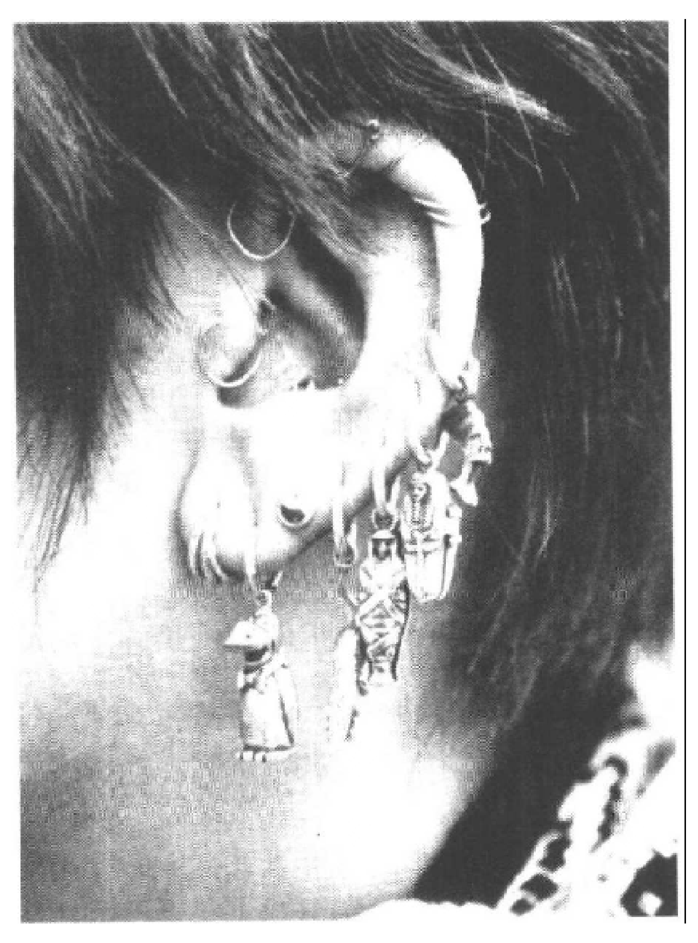
象征性相互作用论者把社会生产看成是社会成员间不断进行的协商过程，其中发生了无数个人与个人之间短暂而惊险的相互碰撞。在社会之中，人们必须不断地协调自己的行为以达到共同的谅解，但这不可能仅由一对一的相互作用中得来。意义的倡导者们负责建构现实：媒体强调一些事件，影响我们对它们的反应；有的机构利用广告创造出吸引人的形象；有的则创造出令人反感的形象（例如在禁烟行动和其他社会抗议活动中）；有时亚文化群体会提出起反作用的主张（如在学校里成绩突出的少数民族学生会被看成“假白人”）。这些全能的含义来自于一些特殊的出发点。在日常的相互作用中就会运用到这些含义，个人必须学会在每个特定的环境中对其做出解释。

对现实的生产　相互作用论者不是从“官方”的角度，而是从知情人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生活。在对待越轨出格的态度上，被触犯的规则并不是自然的或固定的，而是从社会上和政治上商定的——通常还是暂时性的并取决于地方上的解释。某人正常与否是由特定的群体界定的。霍华德·贝克使用**道德倡导者**（Moral entrepreneur）这一术语，来形容那些热心于制定和推行这类界定的人，以提醒我们注意到，他们在制造“越轨者”的过程中，也在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因此，相互作用论者会选择“弱者的立场”。[8]

例如，利用这种方法研究犯罪行为的社会学家，就会注意最先到达骚乱现场的警察的思维过程。他或她会选择怎样的视角来看待现场的情况？那个手中握枪的男子是正要离开犯罪现场的凶手，还是想保护自己家庭的普通邻居？他只是有些激动，还是非常危险？人们的整个一生，可能就会被警察在那一瞬间的看法根本改变。

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认为，在通常情况下，个人自身的行为方式并不会直接造成“越轨出格”、“行为不良”或“狂热”等。一个人的失足要经历较长的社会发展过程。许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违反规定、甚

至违法的荒唐举动。只有当被抓住、经过一系列正式的"标认、界定、识别、分离、形容和强调"的过程之后，问题才变得严重起来。[9]如果这种被贴标签的经历非常深刻，个人就会接受社会强加于他们的这些定义，社会的反应使个人确信他们就是"那一类人"。一个中小学生会因为许多原因（家庭问题、缺乏教导、饥饿等）而分心或疏忽。假如学校注意到这种变化，并把他或她看成是个"坏学生"，其本人就可能会把自己归入"那些坏孩子"之中，只想着混到毕业。所以，标签论者研究的并不是越轨的人，而是社会把人变得越轨的方式。为什么有些个人被选中，而其他人没有呢？如何中止界定他人有错的过程？一旦社会破坏了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如何才能加以挽回？



我们可以从一些有着自己规则的亚文化群体中清晰地感受到标签过程的巨大威力。被贴上标签的群体会逐渐接受并夸大他们被赋予的叛逆的标签。他们身上明显的差异会引来他人的反对，但这反应只会加剧他们的孤立。

女性主义取向

女性主义社会学家提出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论——**女性主义取向**(Feminist orientation)，以表达女性的声音。以男性为出发点的视角长期统治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将女性排斥在外。女性主义论者指出，传统的计量实验科学只反应了男性的观点：注重客观真实、符合逻辑、注重问题和简单实用。这些方法与男性典型的强调个人竞争、统治、控制环境及在世界上起作用的客观事实和力量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它忽略了真实发生的许多事情。[10]

由男性主导的研究方法同样会产生蔑视女性的结果。这是因为它把男性作为研究的参照点，采取传统的性别角色，无视性别的差异，过分地从男性的经验出发来概括和总结所有人。例如，药物研究者经常在男性身上试验新药，在获得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批准之后，就将这些新药给女性患者使用，根本不顾男女内分泌和体重的差别。在社会研究中，传统主义者使用“未婚妈妈”这类词语，而没有相对的“未婚爸爸”之说。他们认为，在一个家庭里，如果成年男子没有稳定的工作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但如果是女性没有工作，问题就不是很严重了。

同情的联系 同男性倾向于客观、逻辑和量化的方法相反，妇女一般强调社会生活的主观、同情、注重过程和包容的一面。她们将社会看作是人际关系的网络，通过信任感和相互的责任感使人与人联系在一起。妇女因而更重视调节和渐进的联系。

与这种女性世界观相一致，女性主义研究者敦促在构成调查研究基础的假设、概念和问题中摈弃性别歧视。女性主义者提倡在研究过程中融人女性的价值和观点，而不是采用事实上反映男性观点的所谓“客观性”。研究者应该融入自己的个人感情和经验，同他们的研究对象建立双向联系。这一方法认识到了人类经验中相互依赖的方面。

注重行为的研究 女性主义者对性别和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始终保持敏感。她们向传统的种种限制提出挑战，要求灵活选择研究技巧和采取跨学科的方法。由于父系制的模式和方法左右了过去的大部分社会学著作，采用新的方法已变得非常必要。而且，这一方法使研究者得以了解社会真相，而不受传统学科界限的拘束。这种传统的学科界限很可能限制了对真实情况的理解。

另一个受到女性主义论者攻击的传统观点是在研究和分析中采取的客观中立。它声称，尽管研究者试图证实假说和分析其发现，然而最后利用

这些发现制定社会政策和行动并不是研究者的任务。与此相反，许多女性主义社会学家深信注重行为的研究，试图推动女性主义价值观，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变革。她们相信，只有通过这种努力，世代以来的男性偏见和错误假设才能得到纠正。

后现代主义取向

后现代主义取向（Postmodernist orientation）是一种新兴的、仍存争议的社会研究方法。它认为，我们生活的时代与过去所有的时代明显断裂开来，是一个混乱占主导的时代。因此，需要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去理解它。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一个更加复杂和希望更加渺茫的世界业已代替了我们以为自己所处的现代世界。

现代主义开始于启蒙运动。它断言了一个由于科学发现而不断进步的世界。它取代了将世界看作一成不变的、由神创造并预先设定的旧信仰。现代主义认为，随着科学在人类生活中的运用，社会必然将向更加人道主义的方向发展。现代主义者相信，他们能证明人类善待对方是符合理性的，而社会将进入更加发达的阶段。近来，有观察家对此提出了严正的质疑。尽管科学和技术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但较之从前，无论是道德伦理还是在社会等级方面，我们的社会仍未达到暴力减少、福利增加和更为整合的阶段。科学也许并非通向未来之路。

后现代主义注意到科学思想的两个主要产物。第一，科技产生了大规模的消费主义和将会打破传统社会分界的计算机通讯网络。其次，对理性科学的信仰通过建立起巨大的信仰和社会组织的官僚体制，大大加强了当前的阶级和性别权利结构。关于社会生活的传统知识、直觉和不同解释被清除，或是湮没在许多被剥夺权利的群体之中。

类似于女性主义的取向，后现代主义方法对传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提出了质疑。但不同于女性主义摒弃客观性、倾向于主观性的观点，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客观性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世界观受到我们局部的知识背景的局限。因此，要真正理解所谓的客观的科学论述，必须注意到研究者自身的社会背景是如何引导他们得出结论的。

研究未来的指导原则

社会学的诸方法帮助我们理解了社会问题的起源和加强其持续性的社

会力量，并帮助我们判断哪些问题会在未来造成最严重的破坏。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实验与抗议的时代。人们满怀希望去展开“向贫穷开战”和“将权力直接赋予人民”的运动。然而，我们并没有完全预料到这些活动可能导致的后果，而且我们遭到了明显的失败。随着21世纪的来临，人们认识到在推行一项政策之前，必须进行更加充分的研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可能性做出预测，是进行充分研究和计划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上，我们面临着许多重要的抉择：毒品、犯罪和暴力；贫穷与社会福利；城市问题、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移民与种族歧视；环境污染、精英政治统治；超然于法律之外的少数群体；家庭破裂；城市学校缺乏等等。许多人目睹了大量问题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日趋恶化，现在开始对进步的必然性产生了动摇和怀疑。尽管如此，还是要做出选择。而它们是否有效，依赖于我们对未来的预测和判断能力。以下是用来审视未来的一些基本的指导原则。

我们不能总是预测未来，但确实能创造未来

今天所做的决定会成为明日的现实，我们正在按照前人的决定生活着。比如说，公众倾向从城市生活转向郊区生活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40年代末到50年代间，联邦立法提供了大量低价建筑和购房贷款，以及实行大规模的高速公路修建计划，从而使人们生活在远离工作和活动的城市郊区更加方便（本书第15章将详细讨论这一问题）。中产阶级郊区住宅的增加，以及随后许多商业企业搬向郊区的校园区或购物中心区，使得城市的经济活力和税收基础降低，造成了城市学校的教学质量和许多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大大下降。

你不知道的东西会伤害你：潜在后果

社会学家的一个作用就是对所提出的社会变化的各种后果加以分析和研究。在阅读本书时，你会发现政府的政策和态度有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常常是有害的——副作用。例如，将亿万美元的税收投入庞大的高速公路系统建设，它扶植了汽车和石油工业。但这一决定又使人们大量依赖于汽油生活，削弱了公共交通系统，交通事故和污染明显增加，而且推动了市郊化的进程。

罗伯特·默登对可见功能与潜在功能的区分，是预测结果的一项基本

手段。可见功能是明显和可以预料到的。让外来移民尽快同化，抛弃旧有的生活方式，并投入到“美国梦”中，这是善意的帮助。但我们没有意识到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即破坏了他们的民族认同，使他们脱离了民族传统。寻找未来的各种可能，意思就是对隐藏在发展中的问题或解决方法之下的潜在后果给予特殊的关注。

“计划或被计划在内”

这是写在费城西区黑人区中心一家基层社区组织墙上的一条格言。[11]毫无疑问，计划在当今社会是一项重要因素，无论它是由当地、地区、州或联邦的各级政府部门施行，还是由其他私人机构实施。有的时候，制定计划的人在设计中忽略了社会因素，因而导致了惨重的后果。六七十年代的许多城市重建计划就是这样的例子。第15章将对此进行讨论。[12]社会学家的职责之一，就是使官方的计划制定者考虑到新颖的不同对策和人的因素，避免发生可以用社会学方法认识和预测的潜在后果。

我们社会通过咨询专家以预测未来的情况，就像古代希腊人听从神谕那样听从他们的意见。这类专家被称为“侃侃而谈的脑袋”（从电视上的特写镜头而来）。然而，还有更为科学的选择。通过分析影响我们生活的重要问题，我们能够学会成为自己的专家。

检查想当然的想法

韦拉尔德·沃勒注意到，人们对社会政策的思考容易停留在想当然的假设之中，很少注意到所有的潜在选择，只看到那些不违反目前的价值观或正确概念的选择。[13]由于自由竞争的观念深深地植根在美国人的经济生活观念中，直到过了几代人之后，他们才对贸易垄断和残酷剥削采取限制措施。一定要带着开明的思想对目前社会进行真正的批评，寻找各种未来可能的对策。也许我们必须推翻传统的价值标准，或者改变公认的社会制度来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未来主义的方法和工作态度会对我们有所帮助。通过系统地展示未来的各种可能，可以学会摆脱社会习惯中所积淀的固执呆板。

利用设想审视未来的各种可能

每个人都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非正式的设想，例如，“假如……”或

者“如果我……”；“如果我接受了在夏威夷的工作……”；“如果我不在下个月而是明年再嫁给鲍比……”等等。我们所做的，就是提出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就像在一组不同的电影剧本或**设想**（scenarios）中。这样我们能够选择自己未来想扮演或避免的角色。其中最有趣的是那些刺激的、充满惊奇感的预测。“假如我继承了世上所有的金钱，或者当上了总统，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这类白日做梦和想入非非通常有一个有用的目的：我们可以想像我们需要从生活中获得什么。

社会学家和未来主义者也为大范围的社会的种种选择提出设想。根据社会预测的方法，我们将在各章中提出两种选择：

1. 如果情况恶化、问题加剧，世界将如何发展。
2. 如果培养出能够增进我们机会的态度、发明和政策，世界又将会如何发展。

最为可能的情况是，真实的未来存在于这两种对立的假设之间，但它们的对立说明了不同可能性的存在。它取决于我们是否能采取行动。

小　结

1. 社会问题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人对同一种情况是否构成问题意见不一，在历史上给予了这类情况许多不同的社会定义。性表现、同性恋、堕胎、安乐死和死刑只是其中的少数一些例子。
2. 大多数被公认的社会问题都有4项要素：它们造成相当严重的破坏；触犯了社会某权力阶层的价值标准；它们持续存在；并引出一系列的解决方法。
3. 价值观和判断特定问题之严重性的标准随着时间的变化会有明显的变化。人们倾向于从自身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出发对问题做出评判。政治和群体利益对如何界定问题有强烈的影响。
4. 问题之所以持续存在，是由于缺乏知识，或它与其他问题或制度的相互联系，或者有些人从中受益。
5. 文化习俗和文化矛盾以及似是而非论经常会给认识社会问题增加困难。
6. 社会科学家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客观地研究问题，避免价值判断，从而有助于社会对问题的理解。他们建构了关于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理论，以代替情感反应和文化偏见。
7. 研究思考使用假说以集中研究与理论相关的特定问题。我们利用经验

作参照和可操作性的定义，通过演绎或归纳获取假说。在验证假说时，必须描述所有条件，以使他人可以重复这一过程。

8. 研究观察可以利用现有的材料、有组织的观察（实验）、调查和自然的观察等方法。

9. 社会学中功能主义的取向强调社会"有机体"的瓦解。当结构的差异和变化打破了社会的功能平衡，个人就无法找到安全的社会位置。

10. 冲突论的取向着重研究由于利益驱动的错误信仰和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所造成的异化。

11. 相互作用论的取向告诉我们，问题常常被我们对它们的社会界定所曲解（甚至被制造出来）。把个人分类为越轨出格是一个复杂且常常并不确切的过程。

12. 女性主义的取向摒弃有关干涉和操纵社会生活的传统社会学方法，认为它们建立在男性的支配习惯之上。而女性主义方法则旨在对包括情感、合作和社会纽带的真实性等在内的因素进行全面的理解。

13. 后现代主义的取向把我们的时代看成是一个异常混乱的时期。旧的规则及其对未来的期望已不再适用。客观性无法实现，借鉴过去所谓客观的科学著作的惟一办法，是看研究者的社会背景在研究中有何作用，在运用发明创造之前先探讨它们的潜在影响，不要让他人左右我们的生活。

关键词

冲突论取向
演绎性假说
越轨
经验主义参照系
虚假价值观
女性主义取向
功能主义取向
假说
可见功能
道德倡导者
习俗
可操作的定义
后现代主义取向
似是而非论
设想
归纳性假说
制度
相互作用论取向
标签理论
潜在功能
身份地位
有组织的观察
调查研究
价值观

推荐书目

Berger, Peter.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New York: Doubleday, 1963. The classic description of "Sociology as a Form of Consciousness" is very helpful in seeing through apparent problems and recognizing real social problems and their causes.

Collins, Randall. *Sociological Insigh · An Introduction to Non-Obvious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The social importance of nonrationality and unanticipated interrelationships is demonstrated in analyses of religion, power, love, crime, and property.

Collins, Randall. *Four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A recent regrouping and clear stat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Douglas, Jack. *Investigative Social Research: Individual and Team Field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6. How to infiltrate, examine taken-for-granted feelings, overcome self-deceptions, and get at the truth in social grou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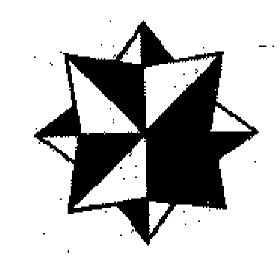
Katzer, Jeffrey; Kenneth Cook; and Wayne Crouch. *Evaluating Information, A Guide for User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82. How to read and understand research reports and determine how much belief you can safely invest in them. Excellent sections on assumptions, bias, noise, and rival explanations in research.

Kollock, Peter, and Jodi O'Brien. *The Production of Reality*.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1994. Essays and readings applying the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orientation, with many social problems as examples.

Tanur, Judith, et al. (eds.). *Statistics: A Guide to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San Francisco: Holden-Day, 1977. Studies specially collected to introduce the policy importance of statistics to "beginners."

Terkel, Studs. *American Dreams: Lost and Found*. New York: Ballantine, 1980. Interviews with hundreds of people who describe our problems and dissatisfactions from all possible social perspectives.

第2章 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异化、失范与后现代主义



社会中个人的几点事实

功能主义：社会环境造成个人的问题

羞怯与文化

集体的丧失

失范状态

冲突论：异化与软弱无助

软弱无助

政治异化

作为商品的人

消费

相互作用论：寻找有意义的本体

个人协商与社会变迁

个性的丧失：社会包装你的新身份

世俗化与寻求真谛

后现代主义：与过去的决裂

青少年自杀

自杀动机

媒体的影响

未来的选择

悲观的前景

乐观的前景

小　结

关键词

推荐书目

社会中个人的几点事实

- 较之以往，现在个人面临的重要的生活变迁大大增加了。
- 毫无意义的重复劳动伴随我们进入“信息时代”。
- 我们过多地将自己包装为商品向人出售。
- 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叫不出本地区的国会议员的名字。
- 十分之四的美国人不知道副总统的名字，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不知道他属于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 在美国，自杀人数高于死于他杀的人数。
- 50年代中期以来，青少年的自杀人数翻了3番以上。

本章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证明，个人的问题并非总是由自己造成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陷入到社会期待这张网中，而且被文化传承的价值标准所左右。同时我们又受到自身无法控制的、广阔的、宏观的社会运动的支配。因此，如果有坏事降临到个人身上，应该首先看一看他或她所生活的社会背景。

第二个目的，是使你更加熟悉本书中运用的一些社会学方法。通过认识它们有关个人与社会间的关系的不同方法，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它们对社会问题的不同对策。

在美国，对个人幸福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新的热点。这在我们评价和理解社会生活的方法上是一个明显的转折。在过去，人们只判断社会对其成员供给的好坏，只关心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的数量。关心**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这一新趋势，提醒我们要去理解和改进所有非经济的社会制度，去考虑任何会限制或降低健康、自由或幸福的因素。

对经济生产力的过度关注限制了政策决策者的社会生活观。几十年来，联邦政府投入巨资以收集反映数以千计的经济指标的材料，而有关个人满意或幸福层面的社会指标的研究只是近年来的事情。社会学家对于这种影响个人生活的社会力量的新认识，有两大主要贡献：

1. 看似微观层面的个人问题，常常源于宏观结构上的社会问题。社会学家强调指出，社会造成了在许多个人相互关系中的日常问题（失范），也带来了我们如何界定和感受自身的混乱（异化）。
2. 社会学家证明了社会主要价值标准的副作用或潜在功能。将现代生活置于一个历史背景之中，就可以看到过分强调物质并不是造成价值混乱的惟一原因。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科技进步的伟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们现在的问题。

功能主义：社会环境造成个人的问题

埃米尔·涂尔干的《自杀论》一书之所以成为经典的社会学研究著作，正是因为它证明了社会力量即使对最私人的和看似心理的决定（是否要自杀）也会产生作用。在精心的实证过程中，涂尔干排除了贫穷、自然环境和其他关于自杀起因的通行的理论，证明社会节奏与自杀率的变化高度相关。涂尔干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失范**（anomie）的概念——这种社会联系减弱、缺乏规则的情况造成了自杀人数的增加。[1] 他主要的发现是变化推动了自杀的增加，而不是痛苦或赤贫。例如，经济的快速变革，无论是繁荣还是萧条，所造成的社会混乱都会打碎个人正常的理想和规则，从而使更多的人走上自杀之路。

涂尔干将自我主义作为自杀率上升的第二个主要的社会原因。在一个价值标准集中强调于群体组织的国家——如在天主教会影响很大的爱尔兰——即使是严重的经济匮乏也没有导致自杀率上升。而在新教的德国，个人被认为是直接与上帝发生联系，即使是在相对经济富足的年代，自杀现象也较为频繁。涂尔干将这归因于新教的自我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它使得个人在社会中感到孤独无助。

羞怯与文化

并非只有你一个人对像自杀这样极端个人化的事情也受到了社会的影响感到不可思议。菲利普·辛巴多发现，即使专家也会错误地认为孤独和羞怯是个人问题。[2] 当他发现一所大学内有百分之五的学生曾到学校医院抱怨自己孤独时，就询问心理医生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每个病人都得到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治疗。辛巴多于是就问："假设500人同时前来看病……诊断会是怎样的呢？你又会到哪里找原因呢？"医生欣然回答

说，医院会立即打电话给宿舍管理部门，询问究竟是什么事情造成了如此大规模的反应。然而辛巴多观察到，正是因为学生们是一个一个来就诊的，医生便只是不断地追问每个人“你怎么了?”，而不问“那儿有什么问题?”这是极不合理的。我们只是对个人作出评判，而没有对社会情形作出评判（参见专栏2.1）。

专栏2.1 文化的规划

吃饭时你习惯用哪只手拿叉子？在切割食物时用左手拿，而在吃东西时用右手拿？如果你是美国人，你可能会这样；而欧洲人则总是左手握叉。在街上遇到朋友时，你会鞠躬吗？美国人可能不会，但是日本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视为粗鲁无礼。你更愿意帮助一个外国人还是自己的同胞？这取决于你的文化背景对本群体和外群体的定义。对希腊人而言，本群体包括家人、朋友和旅游者，而不包括其他陌生的希腊人。而巴黎人或波士顿人则不这样看，他们更乐意于向本国人提供帮助。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常常没有觉察到，文化决定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同时构造了我们思想、感情和行动的结构。即使像疼痛这样一个根本性的事实，也会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引出大不相同的反应。意大利人对疼痛非常敏感，并表现得极为夸张；犹太人对疼痛也反应强烈，但比意大利人更关心其对以后健康的影响；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只在私下对疼痛做出情绪上的反应，而爱尔兰人则会“咬紧牙关”，默默地承受痛苦，即使在私下也不抱怨或表现出痛苦。

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如何使人们表现出羞怯的？假如你是内务部长，就可以设计一个羞怯的社会来回答这个问题。你会提出这样10种促进羞怯的做法：

1. 重视坚韧的个人主义（独立地、单独地、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2. 提倡自我崇拜（自我陶醉式的内省、自我专注和自我意识）。
3. 在高度竞争的体制中，奖励个人的成功，使失败成为一种耻辱。
4. 建立起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含糊的标准，而不告诉人们如何面对失败。
5. 阻止人们表达感情及公开分享感受和焦虑。
6. 限制两性间的亲密关系，严格地禁止大多数形式的性表达。
7. 使容忍和爱情依赖于波动的、严格的社会行为标准。
8. 通过与过去无法企及的荣耀和未来理想之要求的对照，否定个人现实经验的实际意义。
9. 通过流动性、离婚、经济动荡和其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社会的不稳定性。
10. 摧毁对共同社会目标的信仰和属于群体的自豪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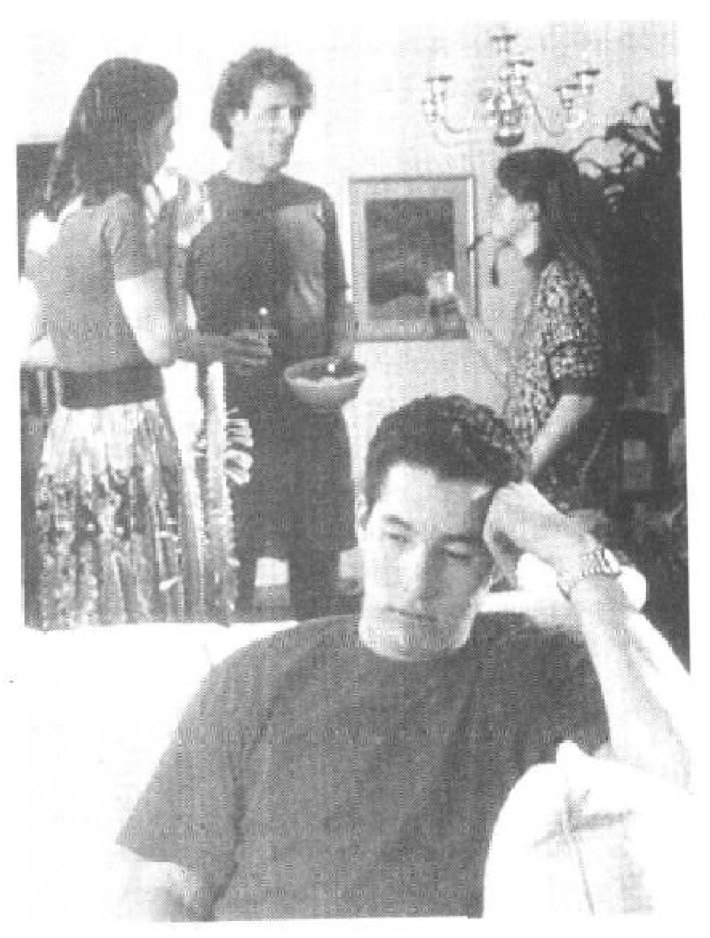
不妨想一想，你是否已处于这样产生羞怯的社会之中。其价值观难道不是早已存在于你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中了吗？我相信，在任何社会，只要羞怯是一种普遍的、令人不快的问题，就能够找到以上10个要素的某种变化形式。

资料来源：*Shyness: What It Is, What to Do About It* (excerpted from pp. 211－12), © 1979 by Philip Zimbardo, Inc.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集体的丧失

1887年，社会学家菲迪南·汤尼斯对传统的、包容一切的、给予情感支持的**集体**（community）与现代的、以效率为基础的社会这两个概念做出了重要的区分。在当时，许多人都正忙于赞美自由与财富在即将来临的时代唾手可得，但是汤尼斯却预测到人类将为之付出社会的和心理的代价。他把社会描绘成一幅恐怖的情景。“对汤尼斯来说，社会意味着全部非个人的、抽象的和无个性的关系之复合体，它以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及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所有力量为特点，将会逐渐吞噬社会构造。”他的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

巨大的空虚 受汤尼斯影响最大的是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看法。他们认为，现代城市生活天生就是令人生厌而致病的。许多社会学家和社会批评家持有同样的看法，认为稳定而小型的集体具有优越



社会孤立并不一定意味着与外界完全隔离。它可以发生在一大群人中间，有些人很难融入其中。在塑造像羞怯与犹豫这样个人的品格中，社会影响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性。罗伯特·麦克伊夫描述的“巨大的空虚”说明了这一点：

> 在过去，不懈劳作是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闲暇始终是一种奢望。尽管生活艰辛而痛苦，但却真真切切。人们与自己命里注定的一小块现实和谐相处，切身感受到土地的味道、四季的更替、生死不断轮回的意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闲暇，但是他们不仅越来越脱离了土地，而且与自身也逐渐脱节。从我们这个大得多的世界的地平线上，无数声音在召唤我们去接近、去理解和享受，但我们的耳朵却对此无动于衷。我们拥有的是闲暇，而非使用它的技巧。因此，闲暇变得一片空虚，而由于接踵而来的不安，人们只能在虚幻的兴奋和幻想中寻找逃避，不再回到属于他们的土地之上。[4]

80年代中期，一批社会研究者重新审视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并在《心灵的习惯》（1985年）一书中指出了延续至今美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研究者把传统社会看成是一个“记忆的共同体”，个人在其中有着永恒的情感联系。这种共同体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成员不会遗忘其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体现其集体价值观的往事。[5]在种族的、民族的和宗教的共同体中，仍然保存了这种活生生的、会引起共鸣的过去。人们在对陈年往事的耳濡目染中渐渐长大，参与其他“献身的实践”。他们了解了共同体的所欲所恨，因而主动分享其目标。

然而，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看来无法让这样的共同体继续太久。理性的自我利益规定，每种价值都必须通过显示直接而可见的好处来证明自身，因而压倒一切的自我利益的需要摧毁了对传统价值观的支撑。共同体由此沦落为一块“生活方式的飞地”。厌倦了寂寞孤独的人会寻找带有共同社会特征的群体——如单身汉或老年人。这些“飞地”通常只涉及到个人的一部分，而且常常是以像消费习惯或业余爱好之类表面的相似性为基础的。[6]

《心灵的习惯》一书的作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活有明显的减少。生活方式的飞地不能对个人提供足够的支持，主要有两个原因：它不会教导或引导个人使自我利益最大化；它不会为构成现代生活之理性计划和社会运作提供任何可贵的理想或目标。在现代社会，不再有固定的标准用来衡量个人的成就，个人只能同左右邻里去比较自己的物质收获，拼凑出“自己成功”的一些印象。

失范状态

失范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人们经常用其他的名词来讨论类似的情

况。比如我们会说现代社会过于盲目、缺乏目标、没有组织、支离破碎或是日渐解体；也会听人们说没有归属感、灰心丧气、胸无大志。我们将会探索这些想法产生的历史根源，但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些事例，来看一看社会变迁与这些想法的联系。

社会个人化 不久之前，我们还一直认为自己属于某个较大的单位，只有相当少的人独自生活。而现在，差不多25%的人口独身，远远高于过去任何时代。其中有许多人不到40岁，并且由于种种原因选择了单身生活，其中妇女一般是这一群体中最早选择单身生活的女性。[7]

转折 地位的明显变化引起情感的动荡，因而个人必须努力适应变化。今天个人必须面对的重大的生活转折大大超过了我们的父辈。传统的生命周期通常是童年、结婚、生育、抚养孩子以及最后婚姻的结束。而今天你可能还会面临漫长的青春期，婚前一段时间离家独自生活，长时间的单身生活，十分之四的离婚机会，以及再婚（现在近一半的婚姻中，至少一方是再婚）。[8] 这每个转折可能都会令人不知所措。而如此动荡的社会关系对儿童具有非常严重的影响，第11章将重点讨论这一问题。

无法界定的成功与无序竞争 一个多世纪以来，功能主义者一直提出警告，物质进步并不能提供人类所需的结构与内涵。[9] 他们主张，如果没有社会控制，个人是无力实现或维持进步的。因此，体制的瓦解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涂尔干这样说道：

> 要获得任何成果，首先不能过分的冲动热情。只有这样，热情才会与能力协调一致，人才会心满意足。但个人无法对之加以控制，所以必须借助于某种外在的力量。[10]

今天，物质进步使人的生命延长，生活更加舒适，但许多研究者仍然深信，它没有提供任何限制或方向感。

不再幻想 现代生活使我们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然而我们对传统的解决办法缺乏耐心，除非它有迅速的成效。我们不尊重过去的解释和方法，却赋予其现代的含义。在这过程中，我们抛弃了意义体系、精神或神圣的理由以及使前现代社会充实有序的迷人观念。传统的解决办法变得一无是处。

这就是通常所谓的**韦伯悖论**（Weberian paradox）。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告诉我们，科学的成果使生命神秘化，从而威胁到我们个性的根基："理性化的传播是以'爱情、仇恨和一切纯粹个人的、非理性的、感情的等未加考虑的因素'为代价的。"[11]

模糊 社会学家威廉·托马斯把现代生活的特征归结为不断地界定模

糊的东西：人类缺乏完全掌握情况或其大概的能力。在前现代社会里，个人不会不停地追问自己："我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去做？"[12]对目前所要做出的决定，人们不再以过去及其传统作为必须的和有效的参照点，而把它们看作是毫无价值和毫不相干的。

冲突论：异化与软弱无助

自我实现的自由是卡尔·马克思关于个人与社会思想的核心观点。只有在推翻了"事物"的统治之后，真正的人性才会显现。为了解放他们自身和发挥自己内在的潜能，人们必须对自然环境和其生活有意识地采取合理的控制。[13]然而，由于大规模公共和私人官僚机构的需求，大众社会的非个性化，工作场所和复杂的、相互依存的世界的支配，个人根本无法对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加以控制。正如一些冲突论者所言，其后果就是造成了一种异化感（参见专栏2.2）。

专栏2.2 日常生活的异化与比喻

异化（alienation）指的是两种深刻的体验。第一，个人感觉是自身生活环境中的陌生人。

异化的第二条体验……就是一种确凿无疑的感觉，即人类失去了对其生活至关重要的某种东西。

马克斯·韦伯很早就给现代生活做了一个有力的比喻……日常生活是个**铁笼**（iron cage）。试想一下，困于铁笼之中的是谁？如果你认为自己不在其中，比起那些看得见周围铁栏的人们，你陷得更深、更加无望。生活是铁笼，而社会则是监狱。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囚室里无聊地打发时间，就像一群饥饿的恶犬等待着下一顿饭，或是等着排队上厕所，计划着放风时如何尽情享受那点可怜的自由时光，疯狂地幻想着如果能出狱、生活该是什么样子……

第二个比喻是把日常生活比作一台机器。它依靠自己的能量、按照自己的逻辑和目标自动地运转。到最后，它可能同我们的目标不相一致，而我们这群小人国的居民则围着这台机器盲目地干这干那、四处乱转……

第三个比喻……把生活比作在社会这个舞台上上演的一场戏。作为演员，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要背台词、塑造角色、掌握表演技巧。这是用戏剧艺术对现代生活所作的比喻，对此反应不一。批评者指责这种比喻是一种浅薄的、刻薄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或是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比喻突出了现代生活的某些独特性，而且对充分理解现代社会中的异化是必要的。然而，少数社会学家依然坚持认为，人生如戏的比喻抓住了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的和普遍的方面：表现和接受有意义的自我是

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步骤，它同时也是一个戏剧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物体天然的行为和无意识的物质存在逐步转化为富有意义的人际交往和可信的人生。如果这个关键步骤稍有中断，自然的事件向人生意义的转变也会中断，我们就可能堕入到混乱和罪恶之中。那样，我们就是真的被异化了；生活在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中，都成了无家可归的陌生人了。

资料来源：Andrew J. Weigert, *Sociology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Longman, 1981, pp. 292 - 93.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软弱无助

在马克思主义自我实现的观点中，劳动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理想的情况下，劳动成为一门艺术，是个人创造力和才能的表现；每一种"工作"都可以自然地获得最佳结果。不再有标准化，更没有流水线。但是，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迫使工人生产那些同他们个人没有联系的"物质"。由于劳动与对产品的认同相脱离，生产过程变得过于抽象而难以令个人感到满意。[14]这就是马克思的名言"生产工具的丧失"的心理学意义之所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使人成为劳动者，并随着生产需要在工作场所间轮换。

蓝领阶层的软弱无助 劳动的不断专业化，是基于对建造汽车这类生产过程加以分析并分解为许多细小简单的任务，虽然这也许有益于生产的良好组织，但却破坏了个人的选择和技能。罗伯特·布劳纳提出了经典的论述，列举了将工人限制在过分简单的工作中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 由于对劳动缺乏控制而造成的弱小无助。
- 由于只生产终端产品的一小部分而造成的意义失落感。
- 由于工人不再属于亲密的劳动团体而造成的社会异化。
- 由于劳动仅是一种谋生手段、不再是个人价值的实现而造成的自我疏远。[15]

白领阶层的软弱无助 在美国的劳动大军中只有16%的人仍然从事制造业。[16]大部分雇员都是白领工人，他们同工厂工人一样，面临着由于工作毫无意义而造成的异化现象。他们的案头工作也像蓝领工人一样，变得平淡乏味、毫无意义：

为了获得一份白领的工作，你必须呆在学校里。学校教育本应发展你的内在力量，使你同社会中的生产阶层相比更有实力。如此看来，步入白领阶层是你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的结果。然而，大多数人在成

为白领之后，却发现现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工作内容基本上并不需要任何智力[17]

近来经济从原先以制造业为基础转向以服务为基础。这个所谓的"信息社会"初看起来似乎可以消除工作中的标准化和无意义。但在另一方面，这可能只是从"生产产品"向"生产产品目录"的过渡。假如这样的话，这一转变是从创造性的和自我实现的工作倒退到一个文员社会。

政治异化

根据1996年由《华盛顿邮报》、哈佛大学和凯瑟家族基金会主持的一项全国性调查结果说明，美国正在成为一个到处是可疑的陌生人的国家。在60年代对人们信任程度的一次调查中，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信任自己的同胞；而在这次新的调查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还依然抱有这种



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作只是一些缺少挑战、毫无意义和平淡乏味的案头工作，仅有有限的创造性的表现机会或升迁机会。当周围的人与你干着同样的事，每个人都在互相看着的时候，很难得到个人的认同感和成就感。

信任感。个人的不信任感和异化的急剧上升正好同对政府的不信任度的上升相一致。[18]

这种不信任表明，许多美国人对联邦政府丧失信心。通过这次调查，研究者可以证明，那些不信任他人的人，也不相信政府和任何制度。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对经济状况不安，也更易于不信任政府。年轻人则比年龄大的人怀有更多不信任感。最为愤世嫉俗的是介于18到23岁的青年，尤其是来自父母离异家庭的青年。他们经常这样回答研究者的问题，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信任，他们更不会相信任何人。

调查负责人之一的罗伯特·布兰登指出，不信任的根源在于，政府无法向人们提供他们所关心的东西：让他们的孩子能有机会过更好的生活，解决暴力犯罪，防止家庭破裂：

> 他们实际上不会在意政府究竟做了些什么，但却很在意自己生活中的事情。他们看到政府日渐膨胀，税收不断增加，而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似乎不但没有丝毫的改善，而且还有所恶化。所以当别人在为各种各样的新计划和解决方案争论不休时，他们心里根本毫不在乎……
>
> 我认为，人们对生活的改善是如此的灰心丧气，以致于每当政府说要花更多的钱或是要增员时，人们根本就不信任它。这是因为，从亲身经历中他们知道，事情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19]

政治异化导致人们对政治缺乏兴趣和了解。在1996年的调查中，有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叫不出本地国会议员的名字，一半的人不知道他们是属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十分之四的人不知道美国副总统的名字，三分之一的人不清楚他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

在对这些基本信息毫不了解的情况下，美国人“对政治充耳不闻，对投票毫无兴趣”。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根本不去投票，因为他们缺少必要的动力，而且不知道要投给谁。注册选民仅占全部合法选民的62%，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参加了1996年的总统选举。[20]现在美国总统的选举只是根据大约三分之一选民的投票结果而产生的。

作为商品的人

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影响，在个人的社会角色这点上，两个非常巧合的变化造成了更为严重的自我疏远：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变化和从创业者到**商品本身**（commodity-self）（按照可出售性对自己进行评价）的变化。

消　　费

在早期以工厂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阶段，个人仅仅是劳动者，他们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生产最多的产品。但是制造商们很快意识到，如果没有对新商品的不断需求，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就难以为继。一项旨在"开化"大众的计划取代了先前仅仅满足其基本物质需求的目标。各种广告不停地用一些"虚假需求的谎言"让老百姓在消费中"不仅对商品而且对新的体验和个人的满足都产生无法克制的强烈欲望"。[21]冲突论者将这种消费刺激下的个人成长看作是最有疑问、最使人困惑的错误价值观之一。

出卖个性　赖特·米尔斯曾试图提醒美国人注意，从小企业竞争到大公司时代的变化，将给个人带来危险。[22]我们不再为了制造更有销路的产品而展开竞争，现在我们出售自己的个性。我们将自身变成最具吸引力、最有效的竞争工具，为了取悦体制中的上层进行竞争。这培养了一种**空姐综合症**（stewardess syndrome）：对着刚刚遇见的陌生人热情微笑，好像有什么亲密关系一样。[23]这种商品情感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故意将自我重新包装成一个"组织人"的形式。

孤芳自赏　竞争和对经过重新包装的自我的冷酷出卖从经济领域扩散开去，现在业已渗透到个人情感的交流之中。我们早已不是生活在那种被动顺从的年代。今天，我们不再会为了组织而放弃自己的个性；我们变成了积极的掠食者，拼命地利用外在的自我获取各种机会，与他人进行竞争。这种不顾一切的**自恋**（narcissism）根本就是异化的梦魇。错误的消费价值观，使我们隐藏在有意塑造的虚假自我的面具背后进行竞争，无法看到真实或有价值的自己和他人。[24]

相互作用论：寻找有意义的本体

象征性相互作用论者并不认为个人受到社会结构的控制或支配。首先，相互作用论者承认需要稳定的参照标准，以避免重复劳动。但是他们依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准则是在不断变化以适应新的制度。这是一种非常乐观的观点。因为即使是在最具有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中，对如何共同生活、如何改变这种社会结构，仍然存在达成新的共识的可能性。自我也能存在下去。

其次，关于"虚假"或事先安排的生活角色问题，相互作用论者也与之前的观点不同。对人而言，表演是一贯性的和有代表性的。几乎每个人

都会预先打扮，并尽量表现出自己最佳的外表和个性。大多数人会掩饰或淡化自己的缺点。这是对他人看法的一种正常调节，绝非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才新出现的现象。相互作用论者承认我们存在的问题，但认为它们并没有其他社会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过于严重。个人问题是正常的人与人关系的过度表现，无需改变整体的社会结构就能加以缓解。

个人协商与社会变迁

相互作用论集中研究人们从文化准则中选择特定指导原则的方式，也研究人们是如何不断地对这些文化的准则加以重新界定的。人们一般倾向于两种方式来适应或协调自身：通过角色距离和通过印象处理。

角色距离 要做到超然于当前情况之外，并不需要像一些教派或东方神秘主义那样采取完全逃避的极端形式。所有人有时都会有置身于自己扮演的角色之外的感觉。[25]我们想要感到自己超然于某些角色，也常常想让别人知道我们这样的感受。一个穿得像大学教师的企业行政主管就像是在声明说，自己要远离自己目前的处境（反之亦然）。经典的例子是家长在处罚孩子时常常说的："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实际上，家长本人是不想承担对孩子进行体罚的责任，是为人父母的角色强迫他（她）这么做的（参见专栏2.3）。

专栏2.3 对冷静的广泛需求

对冷静的广泛需求似乎是个新发明。举一个非常现代的例子：与电脑打交道的系统分析师或技术员。在这种情况下，电脑不可能对人的愤怒、挫折、激情、冲动、甚至爱情做出任何反馈。换言之，面对这种二三十年前完全未曾预料到、现在却已经是中学乃至小学基础教育的现代情形，投入人类"热烈"的情感对机器没有任何效果，事实上只会损害人类有效利用电脑的能力……

冷静态度（cool attitude）的中心形式在于人们的认同感，也就是说，个人如何在社会机制中为自己找到一个有意义的位置。在现代社会中，从被压制的下层阶级，到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到占统治地位的富有和权力阶层，冷静是认同的中心内容。被统治阶层需要冷静，以免对任何形式的排斥和对压抑、无望采取暴力行为；中产阶级需要冷静是为了面对每天处理的各种官僚化的表格、电脑打印件和令人厌倦的人际"服务"，就像推销员那样，对自己毫不关心的事情也要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而权力阶层需要冷静，则是为了在面对缺乏信息、偶发事件、经济衰退、政治泄密或军事冒险等等情况下，进行合理的决策。其中没有一种身份可以轻易地和充满信心地从传统中、从个人感情中或是对某个虚幻理想的狂热追求中寻找到意义。

资料来源：Andrew J. Weigert, *Sociology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Longman, 1981, pp 165-66.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印象处理 我们通常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不负个人责任地扮演社会角色。**印象处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的事实有两个方面的不同含义。首先是乐观的一面：我们不必一定要顺应社会结构强加给我们的角色。可以细加挑剔，设法避免一些最坏的限制或义务。在接受一种新的身份如新的工作或初为父母之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称职。人们假定，我们会"完全进入"角色，最终去感受别人希望的那些感情。这就意味着，虚假的相互作用使得社会机制得以顺利运转，而个人也可以在试图改变它的同时躲避这种机制。

其次是悲观的一面：诚实不是成功地扮演角色所必需的条件。虚假的相互作用频繁且具操纵性，可以用在浪漫关系中常见的两种错误态度来加以说明。第一种态度是，一方尽管被另一方所吸引，但却还是努力地装作不感兴趣，让人"难以追到"。[26]第二种态度是，女性"装聋作哑"，隐藏起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以适应这个性别歧视的社会标准。[27]



对大众消费的过分强调造成了自我漠视。根据物质占有量来评估我们自身和他人，将自己像商品一样包装一新放上货架，这只会减弱我们形成自我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模仿他人。

个性的丧失：社会包装你的新身份

当代社会关于个性的看法是，它是我们在日常与人接触中所表现出的不同之处。只有通过认识我们如何表现出同群体的差异，我们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这种差异使我们与家人朋友区别开来。作为个人，时时处处要表现出不同之处。因此，必须要克服平淡乏味。如果没有新鲜的事情，我们非但不会觉得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是安全的，反而会有“相脱离”的感觉。就像追求新时装一样，我们不断地寻找新的运动、兴趣和信仰。然而，现代社会会同化并破坏这些新生事物：

> 一条通向真我的道路刚刚打通，就会被包装好送上旨在消费的超市货架；一种新的语义词汇刚刚形成，其概念和口号就会被日历和磁带制造商盗用；我们刚刚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行事，就会发现四处都是模仿和效颦的人。[28]

我们也许觉得已经找到一个新的生活方向，但一转眼就发现它已变得再寻常普通不过了。因此，在一个如此看重个性、而个性又是以同他人不断变化的差异为基础的社会里，个人是很难令人满意的。这就难怪米克·杰格和“滚石”乐队歌中所唱的“无法得到任何满足”会引来那么多的共鸣。

世俗化与寻求真谛

过去，宗教是一个有力的、渗透全社会的制度机构，它对思想和行为都加以规范。“由宗教机构限定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旦跨出这个宗教界定的世界，就会踏入一片混乱的黑暗、越轨，以至疯狂之中。”[29]

世俗化（secularization）就是使个人生活中的社会的、结构的和象征性的因素摆脱宗教控制的过程。社会不仅经历了教会和国家的分离，而且也经历了意识的世俗化。正如社会学家彼得·博格观察到的：“近代西方造就了大量的个人，他们不要宗教解释的帮助，独立地看待这个世界和他们自己的生活。”[30]

博格注意到，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的彻底性，在经济的世俗化与家庭和国家的世俗化之间存在着文化的鸿沟。宗教的象征性一直保留在政府和政客们的言论之中，而且也部分地与家庭的组成相关联。然而，宗教意义已不再渗透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经济活动和与之相关的个人自我价值的评判。对许多人而言，用宗教解释现实的合理性早已不存

在，随之而去的是以前用来判断行为合理性的共同标准。个人现在面临着更加多样的解释，但其中任何一种解释都没有强制的力量，也缺乏令人完全信服的传统基础。

在这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中，面对众多对行为方式的不同解释，许多个人为了寻求生活的真谛，而回复到了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或是参加一个可以提供归属感和许诺更美好生活的教派。

原教旨主义：向传统意义的回归 宗教分歧和创造新的宗教形式，是美国式价值观的原始基础之一。在美国，有众多的教会、派别、教派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但是即使根据美国的标准，近年来新兴教派的增长也是异常惊人的。自1965年以来，在美国至少出现了1300个新的宗教团体。[31]其中许多团体都试图回复到基督教的传统形式中去。还有许多是东方神秘主义的变形。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原教旨主义在美国的复活呢？许多社会研究者将这看成是对异化了的现代社会的一种反应。欧文·霍洛维茨认为，这一宗教趋势是对现代性的一个世界范围的反应。[32]在中东，尤其是伊朗，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对工业化的发展——科学化价值观作出了有力而压倒性的反应。向原教旨主义天主教、新教或伊斯兰教的大规模回归，是在世界各地都出现的现象。

这种宗教复兴现象会成为美国社会的一项稳定因素，还是只是一种"周期现象"或反动的运动呢？只有时间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霍洛维茨告诫人们不要把它看作是美国生活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现象：

> 我们所目睹的并不仅仅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挑战，而且还是对复杂性、特别是对科学的发现和程式的攻击。兴奋和热情的宗教情绪即使局限于少数人之内，也还是一种相对容易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圣经》取代了大量书籍；道德的确定性代替了相对性；由确定性的说教所引发的一系列答案代替了一系列产生更多疑问的问题。[33]

利他性的逃避 许多人为了成为一个严格但有意义的阶层的一员，都愿意遵守外人看似严厉的纪律。参加者来自特殊的人群，他们一直都在寻找着自己在世上的位置。很多信教者都是在遇到个人危机或孤独的时候才加入教派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个著名教派中有90%的成员以前属于类似的群体。[34]

要理解这种自愿屈从于团体的现象，必须再一次引用涂尔干关于社会整合和自杀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他认为，在那些紧密结合的团体中，只要团体幸福在每个成员心目中占据主要位置，就会导致利他性自杀或称作

利他性逃避（altruistic escape）的增加。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军事性较强的文化中发现这一倾向的极端表现。例如，二战中的日本神风敢死队为了延缓对日本本土的进攻，不惜采取自杀性的战斗方式，数以千计地牺牲自己。19世纪的普鲁士军官宁可自杀殉职，也不让其连队或家庭为之蒙羞。19世纪祖鲁酋长沙卡的军队会服从他的命令，整队整队地跳下悬崖，不露一丝不服之色。

历史上集体使得个人贬值甚至丧失自我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上只是少数几个。然而在现代社会，推动个人放弃个性的力量并不是由于单一的、过度整合的社会压倒了个人，而是由于社会变动和传统价值观的瓦解使得个性迷失，要去寻找更新、更小的团体以容纳他们自己。

无论是（印度教）克利须那教派运动还是统一教会——后者由一位韩国工业家孙明暮创立——都要求其成员顺从，包括放弃一切财产和严格遵守教义。更为极端的是，有些教派的信仰会将他们引向集体自杀，如圭亚那琼斯城的“人民圣殿教”（在1978年造成914人死亡）、加拿大和欧洲的“太阳圣殿教”（从1994到1997年间共有74名教徒死亡）和加利福尼



当传统的价值标准沦丧的时候，许多人采取接受那些背离社会准则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方法，去试图寻找生活的意义与社会认同。各种教派提供了人们利他性逃避的机会，其主要形式是放弃个人的独立性、在冥想中实现圆满（如上图）和捐出财产献身教派。

亚的圣达菲牧场的“天堂之门”（在1997年造成39人死亡）。“天堂之门”在其网址上列出的犯戒条例，可以作为个性淹没于集体中的明证。这些戒条包括：

- 未与同伴商议，单独采取任何行动。
- 相信自己的判断——或是运用自己的思维。
- 有独立思想，保留个人的想法。
- 先己之先为先，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反叛，自私。
- 带有好恶之情。
- 渴望被注意或赞同——希望被认为是出色的。

就像“人民圣殿教”的吉姆·琼斯和“大卫教派”的戴维·考莱西（1993年在被政府包围51天之后，与79名信徒一起死于得克萨斯的瓦科）一样，“天堂之门”的领袖马歇尔·艾泼怀特代表了一种有力的、拥有超凡魅力的宗教领袖的形象。他经常扮成教父或神的代表的角色。“天堂之门”代表了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宗教崇拜，强调严惩怀疑和背离。

觉悟的陷阱　对个人意义和价值实现的关心，会使我们分散从社会中寻求我们不幸之原因的注意力。埃德温·舒尔提醒我们，过于关注个人的快乐和成长，应该注意到这有夸大社会问题的危险。[35]在寻找“真我”和“有意义的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忽视了存在于更为广阔社会范围里的不平等的、分裂的结构性和制度化根源。[36]因此，在面对只有通过改变给予我们价值标准和约束的社会结构才能解决的问题时，我们却常常是怪罪于自己或他人。

后现代主义：与过去的决裂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个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一片混乱之中。在某些方面他们的观点与功能主义者相类似，因为两者都强调由于社会变化造成的社会功能紊乱，特别是在科技、工作场所和家庭生活方面的变化。与此同时，他们对不断扩张的大众消费主义的看法，也近似于冲突论者对通过消费刺激而促进个人成长的错误价值观的关注。同样相近于冲突论观点的是，后现代主义也关注对环境的不断剥削，而他们对虚假现实不断增加的注意也让我们想起相互作用论者对身份和意义的关注。

然而，后现代主义在许多方面与这些理论相决裂。他们把过去所有关于社会的概念都看作是毫无意义的。对他们而言，变化是扰乱性的，而不

是进化性的，他们反对客观性和科学分析的观念。而且，新的科学技术使得目前的政治界限和社会秩序都变得过时了。在未来，由于后工业时代的高新技术控制了大部分现实和生活中的活动，人类将拥有更少的个性、自由选择和亲密感。

专栏2.4总结了现代主义对现在和未来的设想，以及后现代主义对它们的批评和不同分析。尽管这一理论依然在发展之中，但在这个表中基本包括了到目前为止，后现代主义对现代造成的混乱局面最完整的观点。它将帮助你考虑这样几个问题：

1. 个人在我们这个复杂社会中的位置何在？
2. 作为一个巨大转变的组成部分，你是如何感受的？
3. 你是否依然乐观，或者已经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悲观论调的受害者？

专栏2.4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比较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科学的方法：对客观材料的研究	客观性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局部的知识背景中形成世界观，它仅仅是语言结构，是我们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文化的产物。
科学的假设：世界是由因果关系组织和构成的。通过科学的研究，我们能够理解其根本上的平衡。	世界极度复杂与混乱。变化不是规则的和进化的，而是断裂的。平衡从未达到，也永远不会达到。
社会的假设：如同自然世界一样，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将向平衡状态发展，个人将在其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	特权等级和种族区分将持续存在。规范和价值观存在于社会背景之中，只能在这些背景下加以判断和理解。而且，对那些所谓客观的科学论著，只能通过探寻作者的社会背景如何导向其结构来加以理解。
自然将被合理开发，以创造一个利于人类的环境。	环境由于目光短浅和贪婪被过度开发。科技现在正沿着它自己的道路发展，缺乏正确的引导。世界范围的计算机互联网使得传统的国家、法律濒临崩溃。目前的社会秩序也变得陈旧过时了。
亲密感和相互的支持将通过进步而得以加强。技术进步使人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改善家庭生活和与亲友相处。	后工业时代的工作使父母双方都走出家庭。电脑和传媒的新近联合将使模拟亲密感取代“真实”的亲密感。符号、名流及其形象将会取代“现实”，并促使大众消费主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青少年自杀

前面我们讨论了涂尔干对自杀的研究及其结论，即社会纽带的削弱和缺乏控制导致了自杀数量的增加。然后我们又讨论了冲突论所强调的异化和个人的软弱无助，相互作用论寻找意义的观点，以及后现代主义关于"真实"亲密感日益弱化和当前社会秩序业已过时的想法。所有这些观点都为理解自杀的悲剧提供了见解，帮助我们了解隐藏在看似个人行为背后的各种社会力量。

在美国，因自杀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他杀。一般每天有 86 人自杀身亡，大约有 1900 人试图自杀。男性死于自杀的可能性是女性的 4 倍，尽管女性企图自杀的可能性更大。所有自杀者中有近四分之三是白人男性。西部各州的自杀率一般高于全国的平均自杀率，而东部和中西部各州则要低于这个数。[37]

更加令人沮丧的是，在 15 到 24 岁的人中自杀率最高。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年龄层的自杀率已经增加了 3 倍多，而且一直是全美平均自杀率的两倍。虽然黑人的自杀率要低于白人，但从 1980 年到 1992 年，15 到 19 岁的黑人男性的自杀率增加了 165%。[38]25 岁以下的人占了所有自杀者的六分之一。在 15 到 24 岁的年轻人中，自杀是第三个导致死亡的首要因素，仅次于无意伤害和谋杀。自杀死亡的青少年远远多于死于癌症、心脏病、艾滋病、先天缺陷、中风、肺炎、流行性感冒和慢性肺病这些病症的总和。[39]

自杀动机

1993 年，全国防治慢性病中心的青少年和学校健康处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了全国范围共 1.6 万名高中生。结果令人大为吃惊。有近四分之一（24.1%）的被调查学生表示曾经认真考虑过自杀；19%的人制定了特别的自杀计划；而 8.6%（十二分之一的学生）自杀未遂。这其中有 2.7%的人被发现并接受了治疗。[40]

为什么青少年想要杀死他们自己？他们面前还有着漫长的生命历程和广泛选择的可能。没人可以确切地回答，但是疾病控制和防治中心（CDC）的流行病学家阿历克斯·克劳斯比博士提出：

可能是危害因素——如吸食毒品的历史、精神错乱的历史、自杀倾

向、家庭破裂和暴力倾向——发生了改变，即增加或在某些方面加剧了。例如，研究者现在相信，在自己家里看到过暴力行为的孩子更有可能自杀。其他专家怀疑是否只是因为孩子的处事能力无法同现代社会快节奏要求相协调。人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快点长大，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任何事都能出类拔萃，但支持孩子的最主要的系统——家庭，却常常不能给予他们必要的帮助。[41]

克劳斯比博士的意见反映了专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采用各种社会学方法对它加以分析，就可以轻易发现其中涉及到失范和异化问题。自我疏远、家庭失调和科技社会非人性的、快速的变化——这些因素无论是单独作用还是共同作用——造成了集体感的失落、不满和无意义感。对许多个人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问题。他们感到彷徨失落，被这个无情世界的极端复杂性所压倒。消沉的年轻人常常吸毒和酗酒。但是不幸的是，这两者都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镇静药物，会加剧消沉，增加想要自杀的冲动。

媒体的影响

此外，传媒也对这一问题难辞其咎。媒体常常把自杀描绘成为充满浪漫的和具有英雄气质的行为，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死亡诗社》、《末路狂花》这类电影，根本不对自杀的后果做任何的讨论，就大肆渲染自杀的行为或企图。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也常把自杀者同虚构的浪漫或英雄人物相提并论。音乐，尤其是作为“重金属”分支的“死金属”或“快金属”音乐中常常带有自杀的歌词，许多演唱组合歌唱年轻和不满，给自己取一些怪异的名字，如“自杀机器”、“无私自杀”、“市郊自杀”、“自杀之王”、“代数自杀”和“自杀突击队”等等。

在最早的一项对音乐与青少年自杀关系所做的分析中，凯伦·希尔(1996年）对121名中西部地区公立高中的学生（平均年龄17.2岁）同时做了两项心理评估，回答关于生的理由和自杀的危害两份问卷（都是用来测定自杀的危害），并了解他们的音乐爱好。她发现，相对于乡村音乐、流行音乐、主流摇滚乐和说唱乐的歌迷，重金属乐迷在生的理由的测试中得分较低（表明自杀的风险更大），而且他们更加有可能承认曾经偶尔或认真地考虑过要杀死自己（女生为74%:35%；男生为42%:15%)。然而希尔指出，虽然研究“确实表明孩子喜欢重金属音乐可能是一个自杀倾向的‘危险信号’，但结果并不说明随时都会发生自杀行为，而且也“不代表听重金属音乐与自杀行为之间有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42]

无论音乐还是其他的传媒起了怎样的作用，许多青少年都觉得自己处

在极度的绝望之中，只有自我毁灭才是惟一的解脱。因此有必要找出那些存在问题的年轻人。1991年，疾病控制和防治中心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专家对如何控制青少年自杀献计献策。会议提出了两项有希望的方案：借助学校和社区成年人的“看门人计划”和借助高中学生的“同伴互助方案”。两项计划都对专门人员加以培训，使他们辨别出那些有自杀危险的年轻人，并将他们引向适当正常的状态。也许这种干预计划可以让青年人同自己和社会重新联系在一起，从而减少青少年不断产生的自杀冲动。

未来的选择

电子革命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科技、大型管理组织和“信息社会”受到重视。本书有许多章节都将讨论到这一转变的意义。在这一章里所着重论述的是它对普通个人关于社会、关系和幸福之观念的影响。

悲观的前景

到公元2030年，科技将统治全社会，它被牢牢控制在由大型公司组成的网络手中，以至于政府和私人部门实际上已经不可区分了。当20世纪乐观的预言家们预测说新的科技将改善我们的生活之时，他们并未注意到技术专家从未掌握过经济及其发展方向。例如在80年代，《名人录》上只有4%的人是科技人员，其他的精英人物都是些金融家、律师和企业管理家。对他们而言，计算机信息革命仅仅是提供了一个更加简单的控制产量的方法，因为计算机在测算被雇用者的生产率上比管理人员更为精确。

到21世纪30年代，个人仍带着强烈的竞争精神。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力图在体制内得到升迁。这在普遍存在的“速成育婴综合症”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婴儿从两岁开始，便被按照他们的潜在能力仔细分类。在确定了每个孩子的竞争力之后，成年人就把聪明的孩子与稍差的孩子区别开来。由此以后，孩子的教育和社会化都体现了最初的这种划分。

政府和公司控制下的教育体制利用计算机记录下以能力划分的不同班级，以保证人们一直同与自己能力和智力接近的人相互竞争。所以，孩子从很小开始就受到高度的压力，只有那些最具竞争能力的人才能避免被淘汰降级。不能或不愿意接受这种终生重压的人很少有其他选择。他们可以躲进无数准宗教派别当中，或者搬到一个为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专门划出来

的特别城市里。但即使是这些选择也已是制度化的，受到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的操纵。就像大公司一样，它们存在领导的等级制度，其中的身份地位都是自父母或亲属那儿继承来的。

互联网和可视媒体成了人们永远的伴侣，而人际间的交往则变得越来越少。正如雷·布莱德伯里在《451华氏度》中所形容的“家”，四面墙上是环形的屏幕，每天不停地播放着一部现实题材的家庭肥皂剧。人们无须离开自己的家庭电脑，就可以从屏幕上订购所有的东西。即使举家出访也变得极为方便，只要通过环形屏幕的双向接口同被访者相接即可，不必像过去那样要跑到被访者家里、那么多人拥挤在一起。个人隐私也像面对面接触一样变得过时，你买的每件商品、你联系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监视和记录下来，你的一切行动都在电子监控和纪录之下。

媒体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人们现在越来越认为人际交流和浪漫的关系要花太多精力，也太具操纵性。个人宁愿通过快速放松紧张的心情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以迅速回到竞争当中。即使是想要寻找一个伴侣的人们，也只想满足他们自己的感情。分享已变得麻烦和不重要了。

对于孑孓一身者来说，逃避的方式有3种。首先是幻想，这已经成了一项大产业。它使得个人可以利用药物和电子效果，来享受在现实中冒险的乐趣。其次，科学家已将大脑的快乐中枢分离出来，并改善了不断刺激它的方式。数以万计的人为了与这种刺激器连接而辛勤工作一生，他们惟一的梦想就是挣足够的钱，以便不再与之脱离。最后，自杀不再被看作是一种悲剧。而且，自杀受到鼓励，重病患者为了减轻他人的压力而自杀，其家人可获得现金奖励，以使健康花费维持在最低水平。

乐观的前景

到2030年，由计算机控制的工厂和办公室使人们从案头工作和流水线上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最直接的好处是空闲时间增多，这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看待生活的美好。物质财富的积累不再被认为是最佳的选择，人们更重视与志同道合的人们一起生活工作。20世纪的个人只能在工作中体现其创造性，现在人们有更多的方式获取成功和个人真实感。就算是工作也变得更加自由了。生产工具和工人的生活方式已不再受大公司的支配，雇佣关系主要是基于互相提供服务，或是处理信息和进行决策。

劳动力队伍的状况现在同最初的行会模式相似。如果情况变得难以忍受，专家可以去寻找新的工作，因而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实际

上，这些个人的经济自由破坏了理性主义的、组织过度的大公司机构。互联网的兴起产生了通过电脑投票的交互式民主形式，通过家庭的计算机终端来自全国的“每周输入”来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政府根据投票结果采取行动。人们知道他们自己控制了政府的走向，因而，政治参与的程度是20世纪90年代所难以想像的。此外，个人因了解了共同的兴趣和才能而走到一起，而不是为了适应相同的社会位置，这使得个人不再感到他们必须通过属于一个工作团体或地方利益集团而寻求个人的满足。

随着个人生活与工作需要的脱离，死板的角色扮演和控制逐渐消失。在工作和社会交往中，更多的个人满足于大大减少了的异化和空虚感，使人们不再拒绝和反抗变化。由此，人们认识到不断协调目标的重要性，这使得学习、灵活性以及对个人特色的承认成为备受尊重的价值观。不同利益群体和亚文化的大量增加，使每个人几乎都能找到一个适合的群体，与之分享有意义的、受欢迎的和更好的生活方式。

小结

1. 对个人生活质量的关注只是近来的事情。过去判断一个社会，仅仅是看它是否能较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现在我们则更多地考虑个人是否能很好地融入社会，个人在其中是否感到幸福。
2. 社会的价值标准是一些看似个人反常的问题，如自杀、羞怯等的根本原因。
3. 像没有方向感、不明正确与错误之分这样的失范，都是由于记忆集体——有共同历史传统的紧密团体——的毁灭所造成的，同时也是由于社会孤立、身份地位间的过多转移、不能确定成功与否、对“制度”的幻灭以及现代生活在总体上的模糊暧昧所造成的。
4. 冲突论认为，个人问题中以软弱无助和空虚为主。社会和自身的异化是由利益和竞争的错误价值观造成的，它迫使我们变成了商品，在社会这个市场上互相兜售。我们日益增加的相互不信任与对政府的不信任相一致。许多人对政府不感兴趣，甚至不知道谁是他们选举出的政府代表，这又导致了参加选举的人数的减少。
5. 较之其他的理论，象征性相互作用论认为社会有更强的可塑性。个人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微观交流不断地重塑社会。这一乐观态度假定，适应和变化是可能的，而社会问题也不是牢牢固定在社会结构中的。但是，个人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他们的相互交流包括印象处理和出售

个性。人们非常容易丧失自我感，除非他们认识到生活就是不断地扮演各种角色。

6. 社会的世俗化使得追求生活的意义变得更加复杂，它使一些人回复到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信仰之中，而使另一些人屈从于某一教派的支配，并以此寻求逃避。
7. 后现代主义把我们的时代看成一个新的混乱时代，旧的秩序及其所支撑的对未来的希望已不再适用，依靠客观科学解决问题的方法已走入绝境，它所产生的技术成果正沿着它自己的道路盲目前进，而个人则迷失在电子技术的混乱之中。
8. 50年代中期以来青少年自杀率已经上升了3倍，这提出了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各种社会学理论对其潜在的动机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其中大众传媒对此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它不断地把自杀描绘成浪漫英勇的行为，或者是不可避免的做法。

关键词

异化
利他性逃避
失范
商品自我
集体
冷静态度
印象处理
铁笼
自恋
生活质量
世俗化
空姐综合症
韦伯悖论

推荐书目

Bellah, Robert N.; Richard Madsen; William M. Sullivan; Ann Swider; and Steven M. Tipton,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An extensive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values and how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has prompted people to seek out lifestyle enclaves as lesser substitutes to overcome social isolation.

Berger, Peter; Brigette Berger; and Hansfried Kellner. *The Homeless Mind*:

Modernization and Consciousness. New York: Vintage, 1973. A description of th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on the individual's consciousness and the limits of attempts at demodernization.

Cohen, Stanley, and Laurie Taylor. *Escape Attempt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sistance to Everyday Life*. Baltimore: Penguin, 1978. How we get through our days by mental management, identity shift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banal, trivial, and repetitious.

Gergen, Kenneth J. *The Saturated Self: Dilemmas of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A Postmodern classic detail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technology on society and the formation of individual identity.

Goffman, Erving.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Anchor, 1967. Individual problems traced in detail within their determining social fabrics. The sections on "Alienation from Interaction" and "Embarrass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are pertinent classics.

Huxley, Aldous. *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 New York: Harper & Row/Perennial, 1965. The creator of one of the most famous fictional futures prophetically describes our current troubles with propaganda, the arts of selling, chemical persuasion, and overorganization.

Josephson, Eric, and Mary Josephson. *Man Alone: Alienation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Dell, 1962. A compilation of social scientific, fictional, and political statements on isolation, work,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rebellion.

Pawley, Martin. *The Private Future*.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7.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ommunity collapse in the western world, including the retreat to secondary, created, private reality and triumph of "sensation divorced from action."

Sayer, Derek.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An Excursus on Marx and Web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An examination of the limits of Modernity and the prospects for Postmodernity through a review of the concepts of two of sociology's classic theorists.

Smith, Adam. *Powers of Mind*. New York: Ballantine, 1975. "Every mind trip under the sun" is interestingly described: all the alternative escapes and self-improvements of the 1970s explained in a popular discussion.

第2部分 对个人安康的挑战

虽然盛行的社会价值观、态度和信仰构成了理解社会交流的基本框架，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规则，也不是每个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都遵循相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第1章讨论了社会定义的重要性。现在要问的是，在什么时候自我表现会成为问题呢？比如说，吸食可卡因或同性恋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社会问题呢？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要分析在人们的生活中维持社会稳定的有关问题。其中我们将注意到人们对各自生活方式和娱乐活动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有时是如何给个人和社会造成问题的。我们将会看到，社会的反应是将其中一些选择贴上越轨行为的标签，并试图加以压制。另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中的破坏性模式，它造成了恐惧和损害或潜在损害，这些都会逐渐破坏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在整个这一部分，我们都要注意到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在形成对社会情形的反应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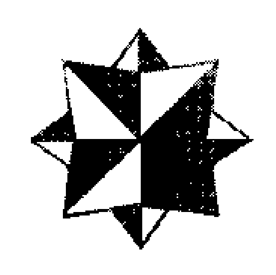
第3章集中论述滥用酒精和毒品对使用者和社会所造成的后果。为什么有些消遣性的药物能被接受，另外一些则不能呢？这个问题已经扩展到什么程度呢？吸毒如何有害于社会呢？对此应该采取怎样形式的社会控制和对策才会有成效呢？

第4章的主题是不同形式的性表现和性行为。许多人认为色情、卖淫、同性恋和私生子等现象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社会腐败堕落的表现；也有人的观点极不相同。我们将研究社会是如何具体界定这些问题和制定政策来处理这些问题的。

第5章主要讨论犯罪的各个侧面和法律制裁的运作方式。就像有关吸毒和性行为的价值标准变化了一样，有关怎样才构成犯罪以及如何合理地惩治犯罪的价值标准也出现了变化。毫无疑问，犯罪受到公众广泛的关注；但同时你也会看到，在防止犯罪和改造方面又存在许多的不一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对犯罪似乎束手无策？死刑能否起到震慑作用？对一些罪犯处以死刑是否公正？或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是一种野蛮的行为？

另外一点是关于暴力，它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存在。对恐怖主义或暴力犯罪的忧虑，时时萦绕在许多人的心头。我们的恐惧是否歪曲了现实？我们的时代更充满暴力吗？应该如何解释所有的暴力行为？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制止暴力？

第3章 酗酒和吸毒



关于酒精和毒品的几点事实

- 大约43%的美国人在家中有过酗酒的体验。
- 与酗酒相关的事故是造成15到24岁间的美国青年死亡的头号杀手。
- 八分之一的美国人有一个酗酒的父母。
- 可卡因是最容易上瘾的毒品，吸食可卡因上瘾是增长速度最快的毒品问题。
- 使用海洛因和大麻的人数也在增加，部分是由于传媒和音乐团体的鼓励作用。
- 终生吸烟的人直接死于烟草的可能性相当于所有其他潜在死亡原因的总和。
- 大约五分之二的美国人在一生中会遭遇与酒相关的交通事故。

酗酒和吸毒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严重影响个人生活的个人问题，它也是影响整个社会的一个主要社会问题。意外事故、反社会行为、关系破裂、家庭不稳定、犯罪和暴力、贫穷、交通事故以及工人旷工和丧失生产力等等，常常都与吸毒有关。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我们的社会存在着毒品问题，但对问题性质的态度却不尽相同。吸毒是一个医学问题还是犯罪问题？吸烟比其他任何毒品造成的死亡都多，但任何人只要年满18岁都可以合法吸烟，然而拥有和使用大麻则是非法的。酒精是另外一种美国人广泛使用的合法毒品，它同样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从科学和社会法律的观点看，毒品是一种在生理上改变大脑或神经系统功能的物质。**精神刺激性药物**（psychoactive drug）是一种影响意识、情绪和感觉的化学物质。前面已指出，社会认为一部分——但并非全部——精神刺激性药物会造成问题。而一种药物能否为社会接受，很明显并不是基于它对使用者健康的有害程度。例如，虽然科学研究业已证明酒精有害并会成瘾，但社会并未将它归于毒品之列。同样，只是最近以来，政府才采取行动抵制烟草广告和销售，以减少人们接触和使用烟草制品的机会。

为什么美国社会愿意斥资亿万美元去根除某些上瘾的药物，而对另外一些却不闻不问？“向毒品宣战”是否是一个错误？在《仪式性化学》一

书中，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茨（1985 年）认为目前方法的弊远大于利，并且造成了包括瘾君子和普通人在内的每个人生活方式的堕落。[1] 本章将对这种意见进行研究，探讨与常见毒品有关的社会现实。

社会历史背景

在历史上，公众对于某一特定毒品的态度可能是不断变化的。例如，含有大量咖啡因的咖啡在 17 世纪的英国受到广泛的批评。1674 年的一本题为《妇女反咖啡请愿书》的小册子声称，男人由于放弃了“过去美好的”大麦啤酒，改而饮用“低级、深黑、浓稠、肮脏、苦涩、腥臭、恶心的”咖啡而变得性欲低下。[2] 然而到了 18 世纪，咖啡馆在英国已经成了令人尊敬的社会机构。一个世纪以前，在有女士的社交聚会中，吸烟甚至比喝啤酒或咖啡更为无礼。而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正好相反，在公共场合吸烟早已被认可，并且极为平常。直到最近，公众意识到吸烟危害健康，其态度才转而反对香烟广告和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

19 世纪中叶，欧美的禁酒运动使得人们在医学上使用鸦片酊和吗啡等麻醉剂替代酒精。通过商店或邮购可以得到许多鸦片制成的万能灵药，其中包括用来治疗小儿焦躁的“布朗出牙液”等。以后由于这些药物被证明容易使人上瘾，可卡因成了新的替代品：医生高度评价它使人精力旺盛、振奋情绪和增加警觉的能力。到 1885 年，可卡因成了香烟、吸入剂、芳香剂、药膏、苏打饮料、喷雾剂、糖浆、茶、葡萄酒等的关键成分。到 19 世纪末，拜尔医药公司首先制造了海洛因，把它作为一种“咳嗽镇静剂”。据说之所以取名海洛因，是为了表明它“英雄般”的药效。然后在 1914 年，可卡因和海洛因的危险性显露出来以后，国会通过了“哈里森麻醉剂法案”。不久之后，成为非法毒品的海洛因的黑市价格就从每盎司 6.5 美元上涨到了 100 美元。与此同时，同样影响情绪的酒类继续合法存在，直到大多数州后来颁布了禁酒令（有 34 个州在 1907 至 1919 年间颁布了禁酒令）。最后，第十八修正案（于 1919 年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了酒类的生产、销售和运输。[3]

总而言之，文化价值观和集体规范决定了哪些药品可以被社会接受，哪些会构成社会问题。使用和滥用药品的界定随着历史时期和环境而变化。而且，法律上的定义和公共道德观念也许是不相一致的，就像在禁酒时期那样。即使在社会内部，法律上的和公众的定义也可能不相同。近来各州对最低饮酒年龄的不同限制和一些地方在大麻合法化问题上的不同态

度就说明了这一点。

酒精和毒品使用的国际背景

在一种文化下能够接受的做法，在另一种文化中就可能无法接受。在美国的大多数州，拥有大麻仍然是一种犯罪行为，而在中东和北非它却被广泛接受。饮酒在美国司空见惯，但在《古兰经》中却被明令禁止，在一些伊斯兰国家里它是不合法的。在印度，宪法严禁酒类消费，但鸦片却可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在许多国家，使用或拥有可卡因会招致重罪，但是在南美的印第安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中，这却极为普遍。他们经常口嚼未经提炼、更未经稀释的古柯叶。

在美国抑制酗酒的社会压力在其他国家也许并不存在。虽然在表3.1中所列的一半国家中，人均酒类消费有所下降，但在其他国家，酒类消费反而有所增加，特别是在欧洲。饮酒的副作用之一是造成肝硬化等肝

表3.1 1993年的人均酒类消费和肝硬化死亡

	酒（夸脱）	每10万人中的死亡人数		酒（夸脱）	每10万人中的死亡人数
1. 卢森堡	13.3	27.0	16. 爱尔兰	8.8	3.2
2. 法国	12.2	23.9	17. 罗马尼亚	8.5	50.1
3. 奥地利	11.1	41.6	18. 荷兰	8.4	6.2
4. 德国	11.0	33.1	19. 澳大利亚	7.9	8.8
5. 葡萄牙	11.0	40.6	20. 塞浦路斯	7.9	不详
6. 匈牙利	10.8	104.5	21. 阿根廷	7.8	15.0
7. 西班牙	10.6	28.9	22. 英国	7.7	7.2
8. 丹麦	10.6	18.8	23. 新西兰	7.7	5.1
9. 瑞士	10.6	13.7	24. 芬兰	7.2	16.7
10. 希腊	9.7	13.2	25. 美国	7.2	13.7
11. 比利时	9.6	14.5	26. 日本	7.0	19.1
12. 捷克	9.4	27.0	27. 加拿大	6.9	11.1
13. 意大利	9.1	34.8	28. 智利	6.8	不详
14. 斯洛伐克	9.1	不详	29. 波兰	6.7	15.6
15. 保加利亚	8.8	28.9	30. 南斯拉夫	6.6	不详

资料来源：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病，虽然它的发病率很不均衡，但在人们经常饮酒（哪怕是经常饮一点儿）的国家，它的发病率就要高一些。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大约有1500万人因使用刺激精神的物质而对健康造成危害，其中至少有500万人注射毒品。吸食大麻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有意吸食挥发性溶剂和其他吸入药品都是日益加剧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在街头的流浪儿童和本地的年轻人等边缘群体中。[4]

烟草超越了一切文化障碍。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0至20万人死于吸毒，但是约有300万人死于吸烟。死于美国烟草制品的哥伦比亚人要比死于可卡因的美国人还要多，死于美国香烟的泰国人也要多于死于东南亚海洛因的美国人。[5]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今天全世界有11亿固定的烟民，其中3亿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几乎是其3倍（共有8亿，其中男性7亿，女性1亿）。在发展中国家一半的男性都是烟民。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如果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均香烟消费量的增长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到21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死于吸烟的人数将剧增至每年700万人左右。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由于缺乏任何逆转的趋势，这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6]

酒 精

适量饮酒（最多每天两杯）非但无害，甚至可能有助于减轻压力。作为工作一天后的安神或适度的社交活动，喝一些酒不但时髦而且非常安全。问题当然是过量饮酒。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喝酒，但其中10%的人喝掉的酒就占到全部的一半。[7]

约43%的美国成年人——7600万人——有在家中体验过酗酒的经历。他们或是生长在有酗酒者的家庭，或是与酗酒者结婚，或是有亲属酗酒。[8] 估计有660万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生活在至少有一个酗酒者的家庭环境中。[9]

酗酒造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问题：交通事故、婚姻破裂、行为暴躁、犯罪、事业荒废、贫穷和身体衰弱。事实上，所有的社会科学家和医学专家都同意，酗酒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严重的毒品问题。每年酒精要夺走10万条生命，几乎8倍于所有其他毒品（不包括尼古丁中毒）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和。[10]

危　险

酒精是一种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镇静剂**（depressant），其影响根据饮酒量、饮酒速度和每个人的酒量而变化。它可以减轻压力、缓解压抑情绪，所以能使人感到放松和愉悦，但是它也会削弱记忆、判断、协作、反应和运动能力（说话、行走以及手和手臂的活动）。而饮酒过度会造成精神恍惚、嗜睡、昏厥或死亡（参见表 3.2）。

表 3.2　酒精的危险

两小时内摄入的纯酒精量（盎司）	血液中的酒精浓度	典型的效果
3	0.05%	思维、判断和克制力放松；压力释放；感觉轻松
4.5	0.08%	缓解日常生活的紧张和禁忌
6	0.10%	随意运动的能力受到影响；手和手臂活动、行走和言语笨拙
10	0.20%	严重的运动减弱；言语惊人、吵闹、不连贯；情绪不稳定（酣醉）；重大的交通事故风险
14	0.30%	大脑深层受影响；影响到对刺激的反应和理解混乱，不省人事
18	0.40%	沉睡；无法活动（相当于外科麻醉状态）
22	0.50%	昏迷；呼吸和心跳控制中枢麻木；死亡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information furnished by the National Clearing House for Alcohol Information.

酗酒者会在心理上对酒精形成依赖，需要酒精才能在人群中感到放松和处理困境，进而有可能在生理上对它产生依赖。在这时候戒酒，就会出现严重的症状（如心跳加速、出汗、恶心、颤抖等）。比起戒毒，戒酒更可能招致丧命。另外，酒精与其他药物、特别是巴比妥酸盐结合作用也是潜在致命的。

酒精会对肝脏（肝硬化是 25 到 50 岁年龄间人的第四大死亡原因）、脑细胞和其他身体组织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酗酒者也比不酗酒的人更易于患上口腔癌或喉癌，如果同时抽烟和酗酒，概率则要超过 15 倍。酗酒者通常患有营养不良，更容易得心脏病，自杀的可能性也比常人高 6 倍。

青年与酒精消费

约1000万不满21岁的美国人每个月至少都要喝一次酒。其中有440万人是“狂饮作乐者”（一次连续喝5杯以上），这包括170万酒棍（至少每隔5天有一次要连喝5杯以上）。[11]虽然在全部50个州里，未满21周岁的人购买和公开拥有酒精饮料都是非法的，但大约三分之二接受调查的喝酒青少年承认，他们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酒精饮料。[12]

青少年酗酒 未成年人通常在13岁左右开始喝酒。[13]到高中毕业前，81%的青少年曾经喝过酒。而且，在全国大约有8%的八年级学生，21%的十年级学生和33%的十二年级学生每个月至少喝醉一次。[14]高中生一共要消耗美国每年销售的冰冻葡萄酒的33%，同时每年还要喝掉11亿罐啤酒。尽管如此，青少年对酒精的知识非常有限。例如在一次全国性的调查中，80%的受访青少年不知道一罐啤酒所含的酒精与一杯威士忌或葡萄酒相同。199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狂饮作乐的青少年中，39%的人说他们单个儿喝酒；58%的人在他们心烦意乱时喝酒；30%的人无聊时喝酒；37%是为了体验兴奋而喝酒。[15]

另一项研究显示了广告对未成年人饮酒的影响。令人吃惊的是，有56%的五至十二年级学生认为，是酒类广告鼓励他们喝酒的。[16]第二个影响来自同伴的压力。1995年《读者周刊》组织的一项研究揭示，30%四到六年级的孩子说同学施加了“许多”压力让他们喝啤酒。[17]很明显，青少年中普遍的饮酒和滥用酒精现象远远超出许多成年人的想像，而考虑到由此产生的许多消极后果，对此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

大学生酗酒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喝酒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研究表明，尽管约80%的学生不到法定喝酒年龄，但是平均五分之四的人每个月都要喝酒。哥伦比亚大学毒品与成瘾物质研究中心199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东北部地区的学生喝酒最为严重——大约两倍于美国西部的学生。经常参加狂饮聚会的大学生超过40%，而校外青年则为33%左右。在对弗吉尼亚州大学生的一次调查中，白人学生狂饮作乐的比例最高（男性为43.3%，女性为24.4%）；在非洲裔学生中，男性的比例为24.8%，女性为5.4%；而在亚裔学生中，男性为32%，女性为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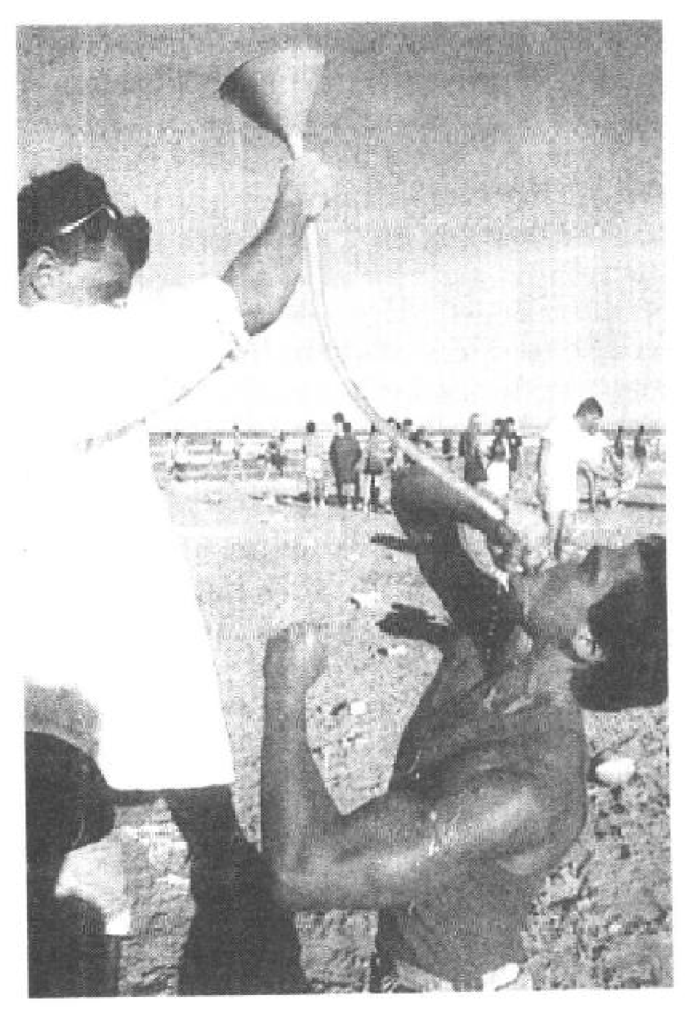
在全国范围里，大学生中的喝酒现象按所获得的学分成比例地减少：大学新生喝得最多，四年级学生最少。同时，每周的饮酒量与平均等级分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喝得越多，他或她的平均等级分越低。[20]

研究显示，大学男生在酒后发生攻击性行为的可能要远远大于女生，

如打架、车祸或损坏财物。而在其他的负面影响中，则表现出一种性别趋同现象，性别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男女生都会出现学习问题、记忆丧失、无意性关系、关系损害和自残的情况。[21]

性别与酒精消费

在任何一天中，男性喝两杯或两杯以上的酒的可能性要比女性高5倍——在各自的性别人口中约为10%:2%。[22]然而，妇女对酒精的代谢能力要低于男子，这会在短时间内造成血液中的酒精集中，更易导致肝脏损伤。[23]超过400万18岁以上的美国妇女可以被归为酗酒者或存在问题的酒徒；其中，370万是白人，30万是非白人。[24]在所有接受酒精中毒治疗的病人中，妇女占了将近四分之一。[25]35%的嗜酒者互诫协会的成员是妇女，



大多数美国人把喝酒同行乐联系在一起，酒精是使聚会顺利进行的社会润滑剂。然而，喝酒对喝酒者本人、他的家庭和陌生人来说，又常常会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因为它会造成交通意外、酗酒成瘾、攻击性行为、破坏财物和无意性关系。

43%的成员年龄不到30岁。[26]最近的一项将受伤害与酗酒问题相联系的研究发现，几乎90%的嗜酒妇女在儿时都受到过体罚或性虐待。[27]

然而，她们的痛苦不仅局限于童年的不幸。成年妇女要经历各种与酒精相关的问题。一项对妇女酗酒的全国性调查发现，性功能障碍是长期酗酒问题的最大原因。[28]此外，五分之三带有性传播疾病的大学女生在被感染后才大量饮酒；五分之一的学生在酒后冒着怀孕或得病的风险，放弃安全的性措施；95%的校园暴力犯罪以及90%的校园强奸牵涉到酗酒。[29]在大学女生中，节食和饮食混乱也与酗酒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30]

家庭和酗酒成瘾 过量饮酒对家庭生活有严重的危害。在约1900万名存在问题的酒徒中，近800万是严重酗酒者，其中几乎一半是妇女。八分之一的美国人（约2800万）生长在酗酒者家庭，其中700万人尚未满18周岁，并至少同一个饮酒过度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由于遗传和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父亲酗酒成瘾的男孩成年以后酗酒的可能性要比父亲不酗酒的男孩高出4倍；而母亲酗酒的女孩成年后酗酒的可能性要比母亲不酗酒的女孩高出3倍。[31]最后，在一半以上的家庭暴力事件中都有酒精在作祟，而如果夫妻双方都喝醉了，妇女最有可能遭到殴打。[32]

可卡因和“噼啪”

可卡因是一种强力上瘾的毒品。它的吸食者遍布所有的社会经济阶层，从偶尔为之到重复再三到难以自制。可卡因成瘾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多数临床医生估计，大约10%的人最初仅仅是为了好玩和消遣，最后才大量使用毒品。一旦沾上了可卡因，个人根本无法预料和控制自己对毒品的依赖程度。[33]

吸食毒品的主要方式有鼻吸、注射和烟吸（包括加热烟吸和“噼啪”）。“噼啪”是贩毒者给一种可卡因取的名字，它是将盐碱化的可卡因加入碳酸氢钠（小苏打）或氨和水进行加工制成的，服用时加热去除盐酸，这样的可卡烟可以像烟草一样吸食。由于小苏打受热，这种混合物在吸食过程中会发出“噼啪”声，并因此而得名。

吸食可卡因

1996年对吸毒进行的全国家庭调查确认，美国各年龄层中偶尔吸食可卡因的人数为250万。特别令人不安的是，自1992年到1996年，在12

到17岁的人群中吸食可卡因的人数上涨了166%，从原来的0.3%增加到0.8%。但在更长的时间段里，至少曾吸食过一次可卡因的高中毕业班学生的比例，从1985年的17.3%降至1996年的7.1%。然而从1991年到1996年，在八到十年级学生中吸食过可卡因的人数比例却在稳步上升。在1995年已离开中学1到4年的大学生中间，3.6%的人曾在过去一年里吸食过可卡因（较1985年的17.3%已有下降）。在校外的同龄青年中，比例基本接近。大约有2200万12岁以上的美国人在一生中至少服用过一次可卡因，大约460万人吸食过"噼啪"可卡因。[34]在1996年，妇女占了全部"噼啪"服用者的约三分之一，而在其他类型的吸毒者中，她们只占四分之一的比例。[35]

1990年到1994年间，因服用可卡因造成的急症病例上升了78%。而在1994年到1996年间，数量基本持平，在1996年为14.42万例，其中35岁以上的人占的比例最高。男性的人数是女性的两倍，分别为66%：34%。在1996年，非洲裔美国人占了全部因服用可卡因而导致的急症病例的52%，而白人占了30%，拉美裔美国人占了11%。[36]其中的一些病例反映了从80年代中期"噼啪"最早出现以来，它对城市低收入聚居区的破坏性影响，包括剧增的帮派暴力和凶杀。

表3.3 毒品的使用（根据毒品类型和年龄层划分）：1995年

	（12～17岁）少年的比例		（18～25岁）青年的比例		（26岁以上）成人的比例	
毒品类型	曾经使用	正在使用	曾经使用	正在使用	曾经使用	正在使用
大麻	16.2%	8.2%	41.4%	12.0%	51.8%	6.7%
吸入剂	5.9%	2.0%	8.3%	0.9%	4.4%	0.5%
迷幻药	4.0%	1.2%	11.7%	1.5%	8.0%	——
可卡因	2.0%	0.8%	9.8%	1.3%	21.6%	1.2%
海洛因	0.4%	不详	0.2%	0.1%	不详	不详
止痛药	4.7%	1.3%	7.1%	0.7%	4.7%	0.4%
兴奋剂*	2.6%	0.4%	5.3%	0.3%	6.0%	0.1%
镇静剂*	3.2%	0.3%	1.9%	0.3%	3.9%	——
镇定剂*	2.0%	0.2%	4.5%	0.4%	4.3%	0.1%
酒精	40.6%	21.1%	84.4%	61.3%	90.1%	63.0%
香烟	38.1%	20.2%	68.6%	28.8%	76.8%	24.7%

备注：* 非药用，不包括药店出售的药物。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220, p. 144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可卡因与公共政策

美国的可卡因问题可以作为第1章所讨论的可见功能和潜在功能的一个极好例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初带有值得赞赏的目标的善意行为，最后却产生了未曾预料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服用可卡因打开大门 在1914年哈里森毒品法案通过之后，对可卡因的使用有了明显下降，主要局限在一些爵士乐手和其他社会边缘群体之中。[37]但从60年代后期开始，两项联邦的政策决定却促使可卡因从地下回到了主流社会。[38]第一，政府通过立法减少了安非他命类药品的合法生产，并对安眠酮和其他被滥用的镇静剂加以严格控制。这种强硬政策非但



里弗·菲尼克斯曾是一个有着美好前景的天才电影演员，如今却因死于毒品过量而成为又一个可悲的统计数字。尽管菲尼克斯和其他年轻名人死于毒品的事实令人震惊，但仍有许多青少年觉得自己可以在吸毒成瘾和意外死亡的威胁下安然无恙。

没有减少对神经性药物的需求，反而使可卡因再次成为一种“新”的首选药物。第二，世界银行投资建设了泛美高速公路，将南美偏僻的古柯产地与主要的大城市联系了起来，从而便利了大量精炼古柯制品的流入，并很快被分割包装成可卡因在黑市销售。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将我们带进了可卡因时代。

量刑不一 在80年代，“噼啪”可卡因——比可卡因粉末便宜并能产生更大的“快感”——很快成为黑市中首选的毒品。随着它日益受到欢迎，毒贩之间的竞争也日益加剧，导致凶杀案件和街头暴力上升。这种毒品的危害使华盛顿的立法者们警觉起来。他们确信“噼啪”可卡因要比可卡因粉末更加危险，因而先通过法律对贩卖“噼啪”可卡因处以刑罚，不久之后又通过法律对拥有“噼啪”可卡因进行惩罚。法律将可卡因粉末与“噼啪”可卡因间的最轻强制量刑标准定为100:1，即贩卖5克“噼啪”可卡因——仅一茶匙——就要受到最少5年的监禁，而贩卖100倍重量的粉末可卡因——大部分白人选用这种更贵的毒品——才会受到同样的惩罚。在通过这条“噼啪”可卡因的严厉法令的时候，并未从种族的观点深加讨论。事实上，国会的许多主要黑人议员都投了赞成票。[39]

然而到了1990年，反“噼啪”可卡因的法律对非洲裔美国人产生了极不成比例的影响，这点已变得日益明显。1995年，一家新闻杂志报道指出，根据这条新法律遭判刑的人中80%是黑人，而因可卡因粉末被判刑的黑人仅为30%。[40]到1997年，长期与“噼啪”可卡因交易相关的暴力行为不再上升，许多抗议者批评该法律充满种族歧视，要求政府官员缩小量刑中的差距。虽然美国刑罚委员会依然坚持要对“噼啪”可卡因交易处以重刑，因为它仍与一些重大的暴力活动有关，特别是在街头的毒品贩子之间，但该委员会提议将“噼啪”可卡因交易中5克的最低量刑限度，提高至25到75克之间，与此同时将可卡因粉末交易的最低量刑限度从500克降低至125到375克之间。直到本书付梓之时，这一问题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大　麻

大麻毒品是由晒干的大麻叶子制成的，该植物的树脂晒干后成为大麻麻醉剂，比普通大麻的毒性强烈6倍。尽管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研究者和国家机构对大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它仍是一种大受误解的毒品。1972年，加拿大将大麻排除在有罪的致幻毒品之外，不久之后又减轻了

对拥有大麻者的处罚。同一年，美国的全国大麻和吸毒委员会建议采取类似的行动，目前有11个州对它采取了温和的处罚。但在其他州，拥有大麻仍是一种犯罪行为，可能会被判刑入狱。

在18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三分之二认为毒品应该是非法的。但从1991年起，认为吸食大麻有害的人下降了大约10%。[41]影响这一态度变化的是《星期六晚间直播》这类电视滑稽短剧以及“黑乌鸦”、“柏树山”、“不再信仰”、“天堂”、“枪炮与玫瑰”、“金属”、“声音之园”、“旋转医生”这些乐队和说唱歌手德雷·波特等的歌词和演出道具。他们以独特的服装、首饰、甚至纹身而广受欢迎，这也因而成为一项亿万美元的大生意。[42]

危　害

虽然许多吸大麻的人都坚持认为大麻是天然的，不会上瘾，也不像酒精或“噼啪”可卡因那样同暴力和家庭问题有关，但毫无疑问，它仍然会对身体造成一些危害。它含有比香烟高出许多的焦油等致癌物质，其中主要的有毒致幻成分——四氢大麻酚的含量也远远高于过去。根据全国吸毒研究所的研究，所谓吸食大麻会影响遗传、沉溺**上瘾**（addition）、降低生育能力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43]然而它的确会削弱运动协调能力，从而增加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

在严重的大麻吸食者中确实存在所谓“无动力综合症”，即没有专注生活目标的动力，但是诸如个性和家庭环境等也可能是一部分原因。吸食大麻不会上瘾，没有断瘾症状，不会产生抗药性，不会使瞳孔放大或引发死亡，而且也不会导向使用其他毒品。尽管几十年来一直都把大麻指责为一种“入门毒品”，会引导人们去使用一些更加危险的毒品，但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44]同伴的压力是使用多种毒品的最大的原因。而一般与大麻一起使用的毒品中，可能性最大的两种是酒精和烟草。

吸　食

在美国，大麻仍然是使用最普遍的非法毒品。根据1996年对吸毒进行的全国性家庭调查，超过6850万的美国人（32%）一生中至少吸食过一次大麻，有1800万人（8.6%）在过去一年里曾使用过大麻。

在1991年到1996年，大麻在青年中的使用增长明显。国家吸毒研究所主持的“未来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一年里服用过大麻的中学生中，八年级学生几乎增加了3倍，从6.2%增至18.3%，十年级学生增加了一

倍多，从 16.5%增至 33.6%。1996 年，22%的高中毕业班学生承认在调查前一个月吸过大麻，而 35.8%的人承认在过去一年里吸过大麻。

随着吸食者的增多，被逮捕的人数也相应增加。1995 年，在美国（州和地方警察）与大麻相关的被捕人数是历史上最高的：共 588964 人，比 1994 年增加了 22%。在这其中，85%是由于携带大麻而非贩卖或制造大麻。[45] "大麻政策方案" 指出，从 1965 年至今，美国一共有超过了 1000 万的人因与大麻有关而被捕。在联邦监狱中有超过 1.7 万名犯人，在州和地方监狱中有近 2 万名犯人是因触犯了有关大麻的法律而入狱的。[46]

麻醉性毒品

麻醉性毒品（narcotics）就是鸦片剂，有天然的（可卡因、吗啡和鸦片）和人工合成的（海洛因、杜冷丁和美沙酮）等。它们一般都含有止痛成分，并且在现代医学中至关重要。在了解这些药物有致人上瘾的特性之前，医生经常在处方中随意地使用吗啡和海洛因等，无意中让病人上了瘾。现在医生已不再使用海洛因，而吗啡也只作为止痛药开给晚期癌症病人。美沙酮最初一般用于治疗海洛因毒瘾，但由于它本身会使人上瘾，因此也成了一种街头毒品。可卡因在处方中通常仅见于咳嗽药中，而吗啡、海洛因和杜冷丁则因为可以减轻生理的疼痛和心理的忧伤，在医学和外科手术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危　害

虽然非常容易上瘾，但是比起酒精、巴比妥酸盐或烟草，麻醉性毒品的致命性较低。因为前者中的每一种每年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夺去数以千计的生命，而因海洛因吸食过量造成的死亡者只有几百人。戒除海洛因也不像戒除酒瘾或对巴比妥酸盐的依赖那样残酷，后者可能会致命。而酒精和烟草对生理的损害更大。因此一个服用麻醉性毒品上瘾的人，只要避免过量和保持稳定的药品供应，就可以持续多年不出现任何病态或机体退化的生理迹象。但是，合用一个针头、使用未经消毒的针头或接触其他受感染的用具则会引起感染或传播艾滋病病毒。在海洛因吸食者中，由于肝炎造成的肝脏损伤也非常普遍。

吸　食

吸食海洛因在美国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1993年，世界范围内的鸦片供过于求使得海洛因价格降到了30年来的最低点，而街头海洛因的纯度也由20年前的3%～4%上升至80%。[47]如此高的药效使吸食者可以通过吸食充分享受快感，排除了不洁的、携带艾滋病病毒的针头的使用。结果是，几乎在全美所有地区，吸食海洛因的人数迅速增加，遍及所有年龄层，艾滋病患者包括中学里的青少年。同“噼啪”可卡因主要盛行于城市内部不同，海洛因渗透到城市和郊区，同时影响到富人和穷人的生活。

根据调查估计，在过去一年里，吸食海洛因的人数达42.8万人（1996年的全国性家庭吸毒调查）；而在过去一周里服用过海洛因的人数也达60万人（国家毒品政策办公室）。但是，有些专家估计，在美国至少有300万人为了消遣而吸食海洛因。[48]与海洛因和吗啡有关的急诊病例，从1988年的3.8万例飚升至1995年的7.6万例。[49]其中12到17岁病人的比例，从1991年的每10万人中0.9人，上升到1995年每10万人中2人。[50]

和大麻一样，海洛因的卷土重来与传媒和现代摇滚文化的日益发展相一致。从电影明星到流行乐手，偶像对青少年都有强烈的示范作用，他们在表演中或事实上常常使用毒品。**海洛因时尚**（heroin chic）成为广告（从广告到商用电脑）、时装摄影（最著名的是戴维·索伦蒂的作品，他在1997年20岁时死于海洛因吸食过量）和电影的一部分。好莱坞也非常热衷地推动了这种“海洛因时尚”，出现了大量以海洛因为主题的电影。

多年来，海洛因在许多青年人事业成功正值顶峰之时夺走了他们的生命。1996年，摇滚乐手乔纳森·麦尔沃因过量吸食海洛因死后不久，对“名人毒品”的病态追求迅速升温，人们争相购买一种名叫“红色朗姆酒”的含有特殊致命成分的海洛因。近年来，海洛因造成的名人死亡事件不胜枚举。

烟　草

在美国人使用的所有毒品中，烟草可能是对身体危害最大的。吸烟者吸入大量的尼古丁、煤焦油、二氧化氮、甲醛和其他有害物质。患肺气肿、支气管炎及喉癌、肺癌的概率显著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尤其是在服用避孕药的妇女当中。吸烟会缩短人的寿命：每天吸半

包香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寿命会缩短4年，而每天抽两包以上的人寿命会缩短8年。吸烟的孕妇发生流产或早产的可能性要高两倍，而且婴儿体重可能过轻。

在这个国家的每6起死亡中，直接死于吸烟的就有一起。它造成十分之九的肺癌和慢性肺炎病例，是引起心脏病发作的3个主要因素之一。大体来说，烟草每年在美国造成超过43.5万人死亡。事实上，一个终身吸烟的人死于烟草的可能性，相当于其他所有死亡因素的总和。[51]

1996年，有29%的12岁以上美国人吸过烟，1965年为42%。每天大约有6000人开始吸烟，其中主要是青少年。这其中有3000人会成为经常性吸烟者，基本上同当天死于香烟或戒烟的人数持平。过去大多数烟民的年龄在18到25岁间；[52]但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集中在18到25岁年龄层。在过去的20年里，开始吸烟的女性比例一直要高于男性，很快吸烟的妇女人数就会超过男子。[53]在大学生中，女性吸烟的可能性已经超过了男性。并非巧合的是，1986年以来，死于肺癌的妇女人数一直高于死于乳腺癌的人数。在美国，每年至少有14万妇女死于与香烟有关的疾病。[54]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15岁以上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吸烟。在90年代初，吸烟每年造成300万人死亡。每10秒钟，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就会有一个人死于吸烟。死亡人数还在稳步增加。在本章前面已经提到，到下个世纪的20年代或30年代初，这个数字可能会升高到每年700万人，其中70%在发展中国家。[55]

为什么吸烟?

吸烟会危害身体健康的道理早已为人熟知，但为什么还有人继续吸烟？为什么还不断有人加入到吸烟者的行列呢？在许多可能的答案中，有两点是最主要的：上瘾和诱惑。

上瘾 吸烟者会很快对尼古丁——一种极易上瘾的药物——产生耐药性，所以必须不断加大每天的消耗量。大多数吸烟者每天抽15支以上的香烟，基本上在醒着的时候平均每小时至少一支。大量的研究表明，尼古丁至少与一些非法毒品如可卡因和海洛因一样容易上瘾，吸烟者表现出吸毒者带有的所有生理特征。例如，在早晨第一支烟之前，吸烟者会有所有的停药反应，包括条件反射敏感、注意力不集中和脑电波改变等。[56]

由于对烟草的依赖非常强烈，所以要戒除吸烟的习惯也就极为困难。四分之三的吸烟者承认有瘾，80%的人说自己要是不吸烟就好了。研究表明，在真诚努力戒烟的人中，即使是通过特殊的治疗，超过80%最后都

失败了。[57]

诱惑 在销售量首次出现停滞和衰退之后，美国烟草企业发动了大规模的广告攻势，以诱惑妇女和青少年这两个以前未被充分开发的潜在吸烟人群。弗吉尼亚细长型烟的广告“你历经千辛万苦，宝贝”大获成功，促使了大量女式香烟的出现，并掀起了昂贵的广告战高潮。例如，新港的许多香烟广告都带有两性斗争或女性试图推翻男性统治的主题，所有这些都被巧妙地包装在户外嬉戏的幸福场景之中。

骆驼乔伊的卡通形象——专门用于针对年轻人的香烟广告战——有效地吸引了许多青少年，增加了骆驼牌香烟的销售量。在“骆驼乔伊”广告战的最初3年内，骆驼牌香烟在未满18岁青少年的烟草市场上的份额从0.5%猛增至32.8%，使RJR纳比斯科公司的年销售额增加了4.76亿美元。在“骆驼乔伊”出现以后，吸骆驼牌香烟的儿童增加了50倍。90%以上的6岁儿童会把“骆驼乔伊”和香烟图案联系起来。它在这个年龄层的儿童中间像米老鼠一样有名（比较而言，只有67%的成年人认识“骆驼乔伊”）。[58] 1997年，由于多年来备受批评，“骆驼乔伊”被RJR纳比斯科公司正式停止使用。

另一个有力的诱惑就是RJR公司的“万宝路”牛仔形象，它诞生于50年代。当时菲利普·莫利斯的研究发现，寻找自己身份的年轻人经常通过开始吸烟来宣布自己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这则广告的思想就是利用他们对自由和反叛的渴望，但又不使之显得过于反社会。万宝路的成功（60%的青年吸烟者选择万宝路）不仅仅在于它粗犷的男性魅力，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对约束和规则平静的反叛和一种归属感（属于万宝路的一族）。RJR公司过去的一份秘密报告（现在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获得）称，“由于社会压力倾向于把吸烟的年轻人从不吸烟的同伴中孤立开来，他们就更加需要与吸烟的同伴互相认同，于是就抽给予‘归属感’的那种香烟”。[59]

正如约翰·利奥所说的，烟草公司过去在吸引青年人方面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在于他们“在一个除了肤色和性别将人区分之外、似乎谁也没有归属的社会中，推销一种归属感和自我心理控制”。[60]1994年，当时的卫生部长乔瑟琳·艾尔德斯就批评烟草公司利用青少年的不安全感和离开父母寻求独立的愿望，使他们相信，通过吸烟，“他们变得苗条、性感、友善、老练和成功”。[61]

至今为止，许多年轻人和成年妇女之所以开始吸烟，主要还是因为同伴的压力和烟草公司成功制造出的形象，即吸烟可以使人成熟老练、性感漂亮。还有许多女性吸烟是为了控制体重，因而迟迟不肯戒烟，或者是戒

后不久又重新开始吸烟，只是因为担心停止吸烟后通常会导致的体重增加。[62]许多人甚至还漫不经心地认为，对健康的危害还很遥远，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把烟戒掉。

禁烟运动

在美国，吸烟的历史可以清晰地说明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吸毒标准的转变。当进入20年代的文化解放时期，特别是对20世纪初的性别界限的反叛中，吸烟代表了妇女一种新的成熟。30到50年代的电影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表明吸烟是正常的和“酷”的，而不吸烟者一般都是古怪或“呆板”的。

之后，随着对吸烟危害性的各种报告的不断发表，政府从1964年开始在所有香烟包装上强制印上警告的标识，70年代起又禁止在广播和电视上播放烟草广告。时任卫生部长的艾弗瑞特·库普在1986年的一份报告中，把吸烟称为“我们社会中主要的、惟一的、可以避免的死亡原因和我们时代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在这之后，如加利福尼亚等许多州制定了强调吸烟危害性的教育计划，并对香烟征收重税以资助这类运动。逐渐地，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过去一度是正常的事情变得不正常了。在公共场所首先出现了禁止吸烟的区域，不久便全面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要求吸烟者到室外继续沉湎于他们的恶习。现在，吸烟已被认为是一种毒瘾和自我毁灭。

被动吸烟 禁烟运动者通过详细研究非吸烟者被动吸烟的危害积聚了更大的影响和力量。环境保护署在1993年的一份报告中把**被动吸烟**（second-hand smoke）归为A级致癌因素——即已知的最强的致癌因素之一。分析显示，吸烟者吐出的烟雾中含有4000余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包括氰化物和甲醛等43种致癌物质以及氨等其他有害物质。根据30项流行病学研究数据，环境保护署估计在不吸烟的美国人中，每年有9000人死于被动吸烟，有30万以上的人因被动吸烟导致呼吸道感染，如小儿支气管炎和肺炎等。[63]而且，根据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在1996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在不吸烟的美国人中，近十分之九受到被动吸烟的威胁。科学家的这个结论是通过化验10000多人的血液，测量其中所含由尼古丁代谢形成的化学物质康提宁而得出的。[64]



70年代中期，美国人重新把吸烟归为在公共场所不能为社会接受的行为，对吸烟者给予强制的法律限制。研究结果显示，被动吸烟会对非吸烟者带来健康危害，因此在许多地方全面禁止吸烟，其中包括全部的美国国内航班和部分国际航班。

烟草业与政府的协议 1997年6月，烟草业的谈判代表宣布了一项历史性的解决方案，承诺永远地改变香烟在美国的销售形式。烟草业向各州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赔偿，并永久地改变国家的立法、规章和公共卫生情况。这项复杂的协议是由各州的检察长、原告律师和企业代表共同谈判产生，它要求烟草公司在今后25年里向各州提供3685亿美元的赔偿，作为治疗与吸烟有关的疾病、资助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和负责照顾数百万没有医疗保险的儿童的健康开支。在这项方案的条款中，烟草企业第一次同意在每包香烟的包装上使用新的标识，警告吸烟会使人致命和上瘾。方案对烟草的销售和宣传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包括禁止使用自动售货机和户外广告牌。它也给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以新的权力，使它有权把尼古丁和香烟作为一种毒品和传播毒品的工具加以控制。

按照商定的条款，烟草公司必须实现在青少年中减少吸烟的目标——5年内减少30%，7年内减少50%，10年内减少60%。它们至少要拿出5亿美元进行防止青少年吸烟的宣传。如果上述的目标没有实现，每相差一

个百分点，烟草企业每年就必须支付 8000 万美元。所有针对未成年人的香烟广告和销售计划都必须停止，广告中的所有人物和卡通形象、所有在互联网上进行的广告宣传和在电影电视中安排使用烟草制品也都必须禁止。烟草公司被禁止赞助任何体育活动或室外音乐会，停止销售和散发任何带有香烟标志的商品。[65]

这项划时代的协议受到许多国会中有影响的人物和健康组织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一协议向烟草企业让步过多，限制了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控制尼古丁的权力，对防止青少年吸烟也没有制定足够严厉的处罚措施。国会最终通过的立法几乎可以肯定会比这项协议要强硬，而它的通过则将标志着美国对烟草销售、管理和使用的新时代的到来。

吸毒的社会后果

乍看起来，吸毒可能似乎只是一种自我伤害的行为或是潜在的自我毁灭。但事实上，吸毒造成了大量的社会和经济的紊乱，无论是无辜的受害者还是社会都深受其害。即使社会自身的准则也会产生许多这类的社会问题，但是吸毒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后果则可能是毁灭性的。其中有些问题是明显的和可以测量的，但还有一些则是隐蔽的，其造成的社会后果也是很难估量的。

犯　罪

认为吸毒导致犯罪的盛行说法并不准确，尽管在暴力犯罪和某些毒品之间的确存在很强的联系。在各州监狱的暴力罪犯中，50%承认在犯罪时受到了毒品或酒精的影响。酒后犯罪的人占了全部谋杀案的 86%和全部强奸案的 72%。[66]安非他命类毒品的吸食者由于受到毒品的强烈作用，进行暴力犯罪的人数最多，尤其是进行斗殴和抢劫。事实上，有许多重要的证据表明，使用酒精、安非他命或巴比妥酸盐的人施行谋杀、强奸和斗殴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吸食麻醉性毒品的人。[67]

“噼啪”可卡因和海洛因的瘾君子和非暴力犯罪密切相关。吸毒者经常会从事偷窃、入室盗窃、贩卖毒品或卖淫等活动以维持毒瘾，因为吸毒每天要花费 200 美元左右。反毒品的法律虽然是为了保护社会免受吸毒和毒品犯罪的危害，但也常常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和无法预料的消极后果。因为这些法律使违禁毒品的价格升高，迫使吸毒者采取极端手段以维持他们

的习惯。[68]

现今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较之20年前更加恶化。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关于城市街头的枪战以及儿童和无辜路人被毒贩子弹击中的各种悲剧性报道。汽车收音机和录音机仍然会不翼而飞。绝望的吸毒者仍然会为了一点购买毒品的钱而杀死他们的奶奶或别的人。

在使某些毒品非法的过程中，社会又制造了一个黑市，这使得有组织的犯罪在其中大获其利。这种地下垄断——加之以制造、运输或贩卖非法毒品所带来的风险——使毒品价格远远超出了它的正常水平。大多数吸毒者由于无法负担如此高的价格，而孤注一掷从事犯罪，整日寻找机会伺机作案，而不是在社会中发挥正常的生产作用。除了设法盗用他人钱财购买毒品之外，这些吸毒的罪犯因为盲目地使用各种可以获得的不同药性和纯度的毒品，也使他们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陷于危险境地。

因此很显然，麻醉性毒品上瘾本身并不会导致犯罪，但是它的非法性却会导致犯罪。因为吸毒成瘾被认为是一种犯罪的越轨行为，而不只是一种病态。对它的惩罚性法律使社会每年花费数亿美元用于执法，给司法和监狱系统带来巨大压力。有组织的犯罪从贩卖毒品中迅速壮大，吸毒者为了购买毒品而犯罪，而用来制止吸毒的法律又不断导致犯罪和罪犯的产生。

交通事故

由于酒后驾车造成的汽车交通事故是全国发生最频繁的暴力案件。其问题之大，几乎每5个美国人中有两个会在一生中卷入到一起酗酒造成的交通事故中。在过去10年里，死于酒后驾车肇事的美国人是死于越南战争人数的4倍。仅1996年一年，美国就有1.7万人——其中近三分之一不满25岁——死于酒后交通肇事，平均每32分钟就有一人死去。（由于饮酒而造成的汽车事故长期以来一直是15到24岁年龄层主要的死亡原因。）此外，每年酗酒还造成超过50万人严重受伤和数百万美元的财产损失。酗酒引起的撞车事故造成全国的生产亏损、医疗费用、财产损失和其他直接支出每年共计为460亿美元，此外，还有720亿美元是因生活质量下降而造成的损失。因为每年有3万人因此而永远失去工作能力变为残疾。[69]尽管近年来司机酒后驾车造成的交通伤亡人数有所下降，但在重大交通事故中仍有三分之一的司机是酒后驾车。[70]

由于酒类消费非常普遍，到目前为止它仍是最严重的车祸原因，尤其是在22到34岁的年龄层中。这个年龄层的人在所有致命的车祸中占了



由于饮酒造成的汽车事故是 15 到 24 岁年龄段人群主要的死亡原因。"反酒后驾车学生协会"是"反破坏性决定学生组织"的地方组织。他们常常在一些中学反对酗酒和酒后驾车以提高公众的自觉意识，并用被撞毁的废旧汽车说明和指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35%，占了全部酒后驾车造成重大车祸的司机的 47%。在 18 到 21 岁年龄层中，这两项的比例分别是 14%和 18%。[71]

联邦安全统计数字显示，7 月 4 日这天同饮酒有关的车祸死亡人数要高于其他所有的节假日。从 1991 年到 1995 年，在全国范围内，7 月 4 日独立日这天因司机酒后肇事共杀死 1572 人，而死于新年除夕的人数为 990 人。如果独立日适逢周末，流血事故还会增加。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什么死亡人数在劳动节（1390 人）和感恩节（1331 人）期间特别多了。专家指出，无论 7 月 4 日是否是周末，它都是最危险的假日，因为人们花在路上的时间较多，经常要驾车走很长的路程去走亲访友，而且较炎热的天气会让人忍不住多喝上一罐冰啤酒或杜松子酒，于是又增加了因饮酒引起致命车祸的可能性。[72]

危害健康

对毒品的依赖不仅对吸毒者个人的健康和精神状况造成严重的伤害，而且也常常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庭。酗酒者的死亡率是全部人口的 3 倍。长

期的过量饮酒会引起营养不良和抵抗力下降，造成各种心脏疾病，并可能引发癌症。每年有三分之一的自杀者是酗酒者。家庭暴力和虐待子女配偶的事件在酗酒者中十分普遍。而由于紧张、应付不可预测行为的负担和金钱方面的担心带给酗酒者家庭成员的感情问题，也要高于平均比例。

酗酒是这个国家中造成先天缺陷的第三个最常见因素。每400名新生儿中大约有一人因为母亲在怀孕期间饮酒而患有先天缺陷。[73]这是因为胎儿无法对酒精产生代谢变化，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约10倍于饮酒的孕妇。酗酒母亲产下的婴儿本身就带有酒瘾，并可能带有**胎儿酒精综合症**（fetal alcohol syndrome），表现为智力低下、心脏问题、畸形等许多先天问题。同样，吸食麻醉性毒品成瘾的孕妇所生的婴儿一出生就带有毒瘾，并患有**胎儿毒品综合症**（fetal narcotic syndrome）或戒毒症状。母亲经常服用巴比妥酸盐或其他镇静剂的新生儿，出生时也会出现这些症状。而且所有的婴儿，无论是因为哪种毒品，在增加体重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吸毒的孕妇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较高，而且病毒会传染给未出生的胎儿，因而导致胎儿早死。在1994年，大约有200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艾滋病。[74]

酗酒和吸毒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损害器官和破坏身体的防疫系统。意外受伤、血液循环困难、长期疲劳和呼吸道感染等问题也极为常见。因而酗酒者不成比例地占用了全国的健康资源。美国20%到40%的医院床位被患有酗酒和酒精中毒并发症的病人占据。酗酒者和吸毒者在许多疾病中的死亡率要远远高于普通人。[75]酗酒者的寿命明显比非酗酒者短10到12年。1982年以来，毒品引发的死亡率一直稳步攀升。事实上，在1980年到1993年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倍，从6900人上升到1.3万人。[76]

经济损失

在从飞机场和建筑工地到化工厂和公司办公室的各种工作场所中，工作中使用非法毒品是美国企业的一大问题。全部18岁以上的吸毒者中，有71%（740万全职和540万兼职工作者）目前都有工作。[77]这一事实，加之每个月至少有11%的人因严重饮酒而要旷工一天，给经济造成了难以置信的损失——每年约1000亿美元左右。[78]这些人的工作缺席率比其他工人要高3倍，而且更容易在工作中伤害到自己或他人。此外，调查人员还把40%的工伤事故同饮酒和酗酒联系起来。[79]

大多数吸食毒品的雇员都不是瘾君子。他们可能是一个在午休时偷着抽上一口大麻烟的公司秘书或蓝领工人，工作时吸一点可卡因的高技术人员或是华尔街的交易商，或是服用安非他命以保持精力的夜班工人。但

是，吸毒常常会导致产品破损、以次充好、轻伤和旷工增加及产量减少。

20年来，美国的企业界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超过63%的大公司现在要求合格的应聘者在被雇用之前签署一份不吸毒的声明，并通过有关是否使用毒品的身体检查。[80]许多公司聘请戒毒顾问，对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进行教育讲座。在《财富》杂志500强企业中，约有90%制定了“员工救助计划”，但在小公司里这个比例要低得多。在雇员不满50人的公司中只有9%制定了“员工救助计划”，而美国90%的企业是属于这一类的公司。[81]

体育界的吸毒现象

体育界的毒品和酗酒问题之所以受到公众的关注，是因为这牵涉到许多著名的运动员。使用非法毒品几乎影响到所有的竞技领域，从业余的体育运动（奥运会短跑明星本·约翰逊）到职业比赛，如棒球（德怀特·古登、达里尔·斯特劳贝里）、篮球（迈克·雷·理查森）、冰球（克雷格·麦克塔维什）和橄榄球（劳伦斯·泰勒、德克斯特·曼雷）。过早的死亡比起停赛或禁赛更加令人震惊。如1986年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最佳新人雷恩·拜厄斯和克利夫兰骑士队的后卫多恩·罗杰斯便死于可卡因。近年因吸毒死亡的有橄榄球明星莱尔·阿尔扎多（1993年死于脑癌）、史蒂夫·科尔森（1994年死于心脏病）和篮球界的波士顿凯尔特人队队长雷吉·刘易斯（1993年死于可卡因）。

对止痛药上瘾的现象在全国橄榄球联盟非常普遍。在1997年对队员和球队经理的一项调查中，一致的估计显示，全联盟1500名运动员中有10%对止痛药严重上瘾，尽管全国橄榄球联盟明令禁止使用这类药品。许多运动员在赛季间歇期间，要花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用来克服对药物的依赖和戒药症状。这些症状轻则只是引起颤抖，重则导致危险的发作，正像“超级杯”冠军球队绿湾包装工队的四分卫布雷特·法弗利所经历的那样。他在1996年赛季前，承认自己对一种叫“维科丁”的止痛药上瘾。[82]

职业运动员的生活方式——从少年到成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受到特殊的待遇、大量的金钱、长时间的旅行和在各地暂时停留、比赛的压力以及缺少职业的安全感——产生了吸食其他毒品的种种诱惑。由于合成代谢的类固醇和其他兴奋剂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运动员的力量和精力，许多运动员便不顾危险贸然服用，常常早在高中时就已开始。

如许多退役运动员和教练所承认的，一旦运动员沉湎于毒品之中，其

体力和技术就会下降。造成的社会后果并不局限在本人运动生涯的缩短，竞技场上的问题会削弱体育运动的健全和名声。全体美国人心目中的运动员形象——青少年对他们的崇拜尊敬——会逐渐消蚀。更有甚者，他们会给易受影响的年轻人造成不良的示范作用。

社会控制和对策的尝试

20世纪初期标志着对药物上瘾之社会界定的一个转变。1914年的“哈里森毒品法案”规定，除了用于“合法的医疗目的”，一切制造、销售和使用可卡因和鸦片剂的行为都违反了联邦法律。这项法案紧接着之前通过的反麻醉性毒品的立法，将使用这些药物归为一种犯罪活动而不是什么健康问题。如我们将在以后所要讨论的，把使用这些药物认作是一种社会问题和犯罪，是因为它往往与下层少数民族及其犯罪行为有联系。今天在美国，解决毒品问题的努力仍然主要集中于强制性的手段——逮捕和刑罚。尽管30年代联邦政府就曾建立了一些戒毒中心，但也只是在最近的几十年里——随着非法毒品的使用在中产阶级和上层的传播——在矫正行动之外，防范和治疗的计划才有所增加。

防范计划

对人们进行吸毒危害性的教育由于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大体上，毒品教育方案要么采取吓唬手段（其中带有大量的歪曲和不准确性），要么采取更为科学、准确的介绍。

吓唬手段 运用吓唬手段的毒品教育计划强调吸毒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长期以来一直不很成功。这种大惊小怪的做法往往会引起年轻人的好奇心，并且同他们的亲身体验或从朋友那里了解到的“事实”相抵触。因为许多年轻人只知道吸毒短期的和积极的一面，并且盲目地相信自己不会受到毒品的伤害，所以这些通过感化的方法根本没有可信度。

大多数10到20年前的毒品教育方案都毫无成效。社会学家戴维·汉森对130项毒品教育的效果进行了调查研究。他发现对毒品的态度只有很小的变化，或者根本没有变化，有时甚至会增加吸毒。[83]由兰德公司进行的另一项对毒品教育计划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研究者无法确定有任何实质性成果，却发现有时这类教育计划会刺激好奇心，一些人便开始尝试使用毒品。[84]

另外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是所谓的**入门毒品**（gateway drug），即从吸食毒性较小的毒品过渡到“烈性”毒品。一个叫作“消灭毒品合作组织”的机构与全国吸毒研究中心和白宫的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合作，以减少大麻吸食可以有效地减少使用更危险的毒品为前提条件，开始了一项针对大麻的运动。但是，吸食大麻与随后的吸食海洛因之间并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极少的吸食大麻者发展到使用烈性毒品。这两种毒品使用比例的长期不一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经常吸食大麻的人（比如一年中保持每周两次）比偶尔一吸的人（一年不到10次）使用可卡因的可能性要高得多。[85]但是，如果只是因为海洛因吸毒者曾经抽过大麻就宣布大麻不合法，那么照这种逻辑，也要为同样的原因把阿斯匹林、咖啡、香烟和抗酸剂等加以禁绝吗？

平衡的方法 现在，通过资助教师培训计划和针对不同年级的课程安排、课本和宣传材料，美国学校健康协会对毒品的防范措施明显变得更加现实。计划集中把小学作为第一条防线，因为现在初次使用毒品的平均年龄是13岁，低于5年前的平均15岁。有时这个年龄甚至更低：1995年的全国性家庭调查发现，目前有4.5%的12岁和13岁少年使用违禁毒品。

据会计总署估计，全国的学校每年花费1.25亿美元用于防治吸毒的课程。[86]在现有的47种课程中，只有10门（21%）进行过研究性评估，至少有8种方案在一些研究中被认为可以有效地减少吸烟或吸毒。一项课程（生活技能训练）表明其效力可以持续到青年时期。对生活技能训练的鉴定包括对使用烟草、酒精和大麻的评定。10门中的另6门课程（防止误用酒类、健康成长、认识你的身体、生活技能训练、北方计划和星计划）显示，其有效性至少可以持续两年。两项计划（警惕计划和挑战计划）并没有对防止吸毒表现出任何长久的影响，虽然它们在控制过早使用毒品方面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87]

治疗方案

许多治疗方法把酗酒和吸毒作为一种医疗和心理问题，而不是犯罪和误入歧途的问题（参见专栏3.1）。通过专业人员在吸毒者自助团体或健康诊所中的帮助，康复的努力获得了有限的成功。许多康复计划将戒毒和旨在培养自信心及避免旧病复发的意志力的训练结合起来，其他方法则提供替代品或多个疗程以战胜长期形成的对毒品的依赖性。

专栏3.1 无家可归的吸毒者

尽管在无家可归者中酗酒和吸毒的程度因城市不同而各异，但是全国的统计数字显示，它已超过精神病而成为困扰城市无家可归者的最严重的健康问题。上月美国市长大会公布的一项27个城市的调查发现，地方官员现在估计44%的无家可归者都吸毒（大约25%患有精神病）……

近年来，一种相对酒类更加便宜的选择——"霹雳"可卡因的出现，更加速了无家可归者中吸毒的盛行，特别影响到年轻的黑人和拉美裔人。在费城，治疗和康复中心过去20年里给数以万计的无家可归者进行戒毒。在1987年之前，这其中的大部分是酗酒者。但是现在，超过一半的无家可归病人基本上都是服用"霹雳"可卡因成瘾者，其中近90%同时又存在酗酒问题……

尽管大多数无家可归的酗酒者和吸毒者不引人注目，但如果对他们不加重视则是目光短浅。不同于有家可归的人，这些呆在公共场所的酗酒者和吸毒者几个月、甚至几年一直无家可归，不得不在监狱和戒毒所里消耗纳税人的美元……

比起对那些沿街乞讨的人们，社会对富有和知名的酗酒者和吸毒者明显地抱有更多的同情心。但是，民意测验专家仍然不断发现，美国人对无家可归问题的持续感到内疚。我们应该认识到流落街头的吸毒者同样需要关心和帮助。

资料来源：David Whitman, "The Return of Skid Row,"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anuary 15, 1990, pp. 28－29.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嗜酒者互诫协会 嗜酒者互诫协会由两个为了互相帮助戒酒的酗酒者在1935年成立，现在它已经在美国发展了5万多个分会，约120万会员。其协作组织还有协助酗酒者配偶和子女的机构。

嗜酒者互诫协会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朴素帮助的体制和安全感。它不是依靠专业的治疗专家或治疗计划，而是利用小型酗酒者团队的活力，互诉自己的饮酒史，进一步确信全面戒酒的必要。起初每次戒酒一天，经常聚会坚定他们的决心，同时在喝酒的诱惑加大时互相激励。重视精神信仰、上帝的帮助和加强自我形象，都是这种相互依靠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7年的一项研究证实了其他的研究结论，嗜酒者互诫协会在全部戒毒治疗计划中是最为有效的一种。这项研究所调查的大部分人都是来自旧金山，他们在初入嗜酒者互诫协会时，都是非常严重的酗酒者。3年之后，46%的人6个月内完全没有喝酒，也没有发生任何与饮酒有关的问题（渴望或其他生理症状、健康问题、家庭争执或被逮捕）。[88]然而，即使是这项"最有效"的戒酒方案也只帮助了46%的人，另外54%的人又渐渐重新沉湎于酒精之中。

美沙酮治疗 一个吸食海洛因成瘾超过一年的人，如果两次戒毒治疗失败，就要接受**美沙酮维持计划**（methadone maintenance）的治疗。吸毒者



为了帮助吸毒者克服药物依赖，戒毒顾问将他们组织起来讨论如何摆脱毒品、面对生活中的问题。不论其方法如何，大部分治疗方案都收效甚微。他们或是放弃戒毒，或是由于新的困难而再次沉湎于毒品之中。

首先进入诊所，逐步稳定地服用固定剂量的美沙酮以替代海洛因。美沙酮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麻醉性毒品，也易上瘾。它的作用在于防治戒毒症状和满足生理上对毒品的要求。美沙酮通常与果汁一起口服，不会产生兴奋感，可以使人正常活动，每次可以持续约24小时，比海洛因的效力长4倍。病情稳定后，病人就可以出院，但仍需每天回诊所服药。

美沙酮治疗只是简单地以一种合法的上瘾药物代替非法的毒品。但是其花费——大约每周3美元，而海洛因每天需200美元——使它成为许多吸毒者能够接受的选择。遗憾的是，美沙酮诊所受到来自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他们害怕吸毒者在本社区频繁出入，尽管瘾君子不再需要以偷窃或卖淫来维持自己的恶习。美沙酮的治疗使犯罪率大大降低。[89]在这个国家大约50万名的吸食海洛因成瘾者中，只有11.5万人接受了美沙酮的治疗。[90]

集体疗法 集体治疗计划是一项完全投入的努力。它让吸毒者自愿在一个治疗中心生活一年，那里有严格的纪律，每天的活动受到监控。戒毒者接受持续的反毒品教育，交流小组经常性地组织活动。随着1959年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了第一个集体治疗中心之后，这种中心在其他地方不断出

现，现在数量已经超过了400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包括专业人员和以前的吸毒成瘾者。这些治疗中心一共治疗了大约1.5万人。他们使吸毒者重新社会化的努力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四分之三以上的人中途退出，完成治疗的人中也有许多再次吸毒。[91]

相对而言，比较集体治疗和其他疗法，通过衡量减少伤害效果（相对于戒除的效果）的研究比较少。进行过这类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并没有证明，长期居住治疗比美沙酮治疗或门诊治疗更为有效。研究者一致确认的较好治疗效果是戒毒者对治疗计划的长期参与。[92]

对抗性药物 另一种纠正行为的方法是从反面进行加强——使用**对抗性药物**（antagonistic drugs）以抵消吸毒者的任何短期快感或从毒品中获得的其他好处。例如，病人在服用戒酒硫之后，如再饮酒，身体就会产生强烈的恶心感，进而对喝酒产生很强的抵制力。环唑辛和纳洛铜这两种麻醉性对抗药都抑制海洛因和其他毒品所产生的兴奋感。然而，这种药物治疗的成功要求吸毒者较长时间地服用，以克服对毒品的心理依赖，并不是所有的吸毒者都愿意定期服用对抗性药物。一年或更长时间以后，当他们发现自己无法面对某些个人危机的时候，就会重新开始酗酒或吸毒。

纠正的努力 把毒品归为犯罪之列并没有减轻毒品问题，对贩卖或拥有违禁毒品处以强行监禁的做法也没能解决毒品问题。正如禁酒令的失败说明通过立法和加强法律的手段不可能消除酗酒问题一样，针对可卡因、海洛因、大麻等毒品的法律的失败，也表明这种惩治做法的局限性。总的来说，由于法律为有组织的犯罪提供了一条生财之道，因而助长了毒品亚文化和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由于吸毒者需要钱来购买价格被人为抬高的毒品，这也增加了暴力、盗窃和卖淫等个人行为。

制止毒品进入消费者手中的努力也鲜有成效。偶尔破获的大宗毒品交易或走私经常成为重要新闻。但是警察也不得不承认，相对于那些安全交易的毒品数量，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消除了一个供应来源，只会产生另一个新的来源，无论目标是一个国家（许多地区种植鸦片和大麻）还是一个毒枭。美国的禁毒领导人、退役的陆军将军巴利·麦卡弗里就承认，美国"无法用逮捕来解决毒品问题"。麦卡弗里和其他人都认为，长期的答案在于劝导人们停止使用毒品。[93]

荷兰的经验 70年代中期，当吸毒在荷兰出现明显上升时，荷兰政府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这一问题。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要完全消灭吸毒是不现实的。它建议根据各种毒品的危险标准对其加以控制。在1976年的"鸦片法案"中，荷兰政府把某些安非他命类药物、可卡因、海洛因和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等归入危险品之列，而大麻和大麻制剂则危险

较低。由此，荷兰对使用危险类毒品的处罚加重了，而停止了对使用大麻制品进行惩罚。[94]

现在，阿姆斯特丹的300多家咖啡馆在菜单上单独列有各种优质大麻和印度大麻制剂，合法地向顾客销售。多数咖啡馆同时还散发关于温和性和烈性毒品危害性的印刷品。有趣的是，在荷兰，经常性服用大麻和大麻制剂的人数一直较为稳定，在1996年仍为5.2%左右。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8.5%，而且还在增长。[95]随着大麻和大麻制剂的合法化，许多荷兰年轻人非常冷淡地对待这些毒品。[96]

尽管对吸食烈性毒品的处罚异常严厉，但荷兰还是对那些不愿或不能抛弃自己习惯的瘾君子施行一项“减少危害”的计划。毒品辅导员找到瘾君子，向他们提供免费的消毒针头（以对抗艾滋病病毒）和免费提供美沙酮。据估计，在全国2.5万名烈性毒品吸食者中有1.4万接受这些帮助。荷兰的这一实用主义的毒品政策相对而言非常成功，对目前的美国毒品政策和实践不失为一种有用的选择。

社会学视角

在美国社会吸毒极为普遍，几乎已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出生、得病到死亡，毒品可以减轻我们的痛苦和伤痛。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毒品起到一些实用的目的，如保持清醒、帮助睡眠和减轻紧张感。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消遣性的毒品可以在节日或非正式聚会上增添快乐或社交性。我们日复一日地使用其他的毒品，根本不考虑它们是毒品，就像吸烟和喝含有咖啡因或酒精的饮料一样。

由于刺激精神的毒品改变思维、情绪和生理功能，所以，其不同的社会定义和社会意义与其生理能力在我们的理解中同样重要。为什么有些毒品合法或高尚，有些则不是？是什么原因在社会中引起了对某些毒品的价值冲突？是什么特别的原因使社会对某些毒品产生敌视反应？让我们采用不同的理论观点深入地认识这些问题，就好比是用不同的透镜看相同的问题。

功能主义观点

功能主义理论集中于研究在社会中助长吸毒的社会规范和条件，而不是个人为什么使用毒品的特定原因。我们已经知道有些毒品的使用是能被

社会所接受的：用于医学、消遣或治疗的目的。社会容许适量地使用酒精、安非他命、咖啡因、可卡因、镇静剂、大麻、麻醉剂和烟草。尤其是处方药品对医生和病人都有很大的用途。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它使精神病院中的病人人数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下降幅度超过了一半，从1956年的大约56万人到今天的不足21.6万人。这主要都是药物治疗——运用改变情绪的精神类药物的结果，[97]而许多人在治愈以前由于缺乏社会生存能力而沦为无家可归的城市贫民。这是需要采取行动予以纠正的社会不良现象。

"毒品"在美国是一项涉及亿万美元的产业，许多人依靠它而生存。他们参与毒品的试验、种植、加工、生产、运输或销售。酒类、药品和烟草产业获得极大的成功和兴旺，而在非法的毒品市场同样也利润丰厚。滥用和误用毒品也为那些执行反毒品法和帮助吸毒者戒毒的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失范　急剧的社会变革——高科技、职业模式的改变、聚居城市的低技能少数民族成员失业、农业工作机会的消失——加剧了社会问题的产生：贫穷、异化和阶级差别的加大。来自学校、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外在压力，也加剧了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紧张感。对许多由于自己的社会角色受到职业错位或传统变化的威胁而感到困惑的人来说，毒品提供了一种从不快和困难中逃避的途径。占统治地位的关于吸毒的社会准则对这些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们感到已被社会异化或是被面前过多的社会责任所压垮了。社会机制引起的功能障碍，如异化、困惑、无归属、紧张、不安、目标难以达到等，使得许多个人产生了对毒品的种种社会规范的漠视感。尽管遇到来自社会的强烈抗议，沉溺逃避于毒品之中的做法为许多遇到生活问题的人提供了一种充满吸引力的选择。

价值冲突

职业和专业中的广泛差异造成了明显的结构区别，大量亚群体或亚文化的存在即显示了这一点。因此，要对吸毒现象达成价值共识是非常困难的。能为一个群体所接受的标准常常不能被别的群体认可。禁酒令的失败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价值观的碰撞。虽然禁酒令最初受到广泛的赞同，并被四分之三的州政府所批准，但以后公众普遍的抵制使之不得不被迫废除。

今天的社会到处充满了各种价值观的冲突。禁烟团体成功地使在公共场所和电视广告中禁烟的法令得以确立，但是联邦政府仍然继续对烟草企业给予资助，尽管卫生部长不断地警告吸烟存在不可避免的危害。大麻和可卡因被广泛地使用，而且还在继续增长，特别是在一些时髦的社交场合。

但是一旦被抓，在大多数的州都要受到重罪的指控。在60年代，吸食大麻是嬉皮士们反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一种表现方式。同样，在今天的许多年轻人看来，吸食非法毒品是为了宣称从父辈的价值标准中独立出来。

冲突论观点

冲突论在分析毒品问题时也强调价值冲突，但是他们集中于分析那些有权势和影响的人对不同形式的吸毒如何作出反应以及为什么作出反应。如果一种毒品与一个被认为是声誉不佳或对社会产生威胁的群体联系在一起时，它就有可能被宣布为非法。这一看法认为，权力集团是为了保护自身不受任何潜在的威胁，而不是因为这种毒品会造成健康危害。统治集团试图将其道德观强加于他人，特别是当亚群体带有某些“破坏性”的生活方式（例如，嬉皮士反文化中的吸大麻和麦角酸二乙基酰胺、自由性爱、群居生活和非物质主义等）。

毒品与社会等级 历史中有无数的实例表明，当原来合法的药品与一个下层集团联系在一起时，价值标准就会发生改变。例如，从清教时代开始过度饮酒便一直存在。早在1785年，当时的美国卫生部长本杰明·拉什博士就把它称作一种“毒瘾”。但是，直到人们把酗酒同大量涌入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联系在一起时，才开始了全面禁酒运动。到1855年，正值爱尔兰移民高潮之时，当时的31个州中有13个通过了禁酒法令。尽管在随后的10年间多数州都废除或修改了禁酒法令，但在19世纪后期，以“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为首掀起了一场禁酒运动，主要针对居住在城市贫民区的黑人及天主教和犹太移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沙龙联盟”认为，主要的啤酒酿造厂都是德裔美国人的，它大大破坏了美国的生产力。[98]由于在战后这种反德情绪依然非常高涨，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止酒精饮料的宪法修正案于1919年被批准通过。

同样，种植罂粟和制造、销售鸦片在19世纪是一种合法行为。人们可以在药店、杂货店和百货店或者通过邮购买到鸦片剂，用于治疗牙疼、咳嗽、腹泻、痢疾、肺结核、疼痛、妇科疾病和许多合法的用途。许多含有鸦片或吗啡的专利药品都可以轻易获得。只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于经济困难，针对廉价中国劳工的排华情绪兴起之后，反鸦片的法律才获得通过。即使如此，法律针对的还是中国苦力（以禁止从中国进口鸦片和鸦片烟馆的形式），而不是吸食鸦片本身。[99]

直到19世纪末，报纸将可卡因同黑人、罪犯和暴力联系起来之前，它都是一种体面的药物。传媒耸人听闻的报道使公众相信，“黑人加上可

卡因就等于强奸白人妇女"。到1914年，它被宣布为非法。[100]海洛因之所以比其他一些使用更广的毒品得到更大的关注，是因为它常常与那些贫穷的非白人和罪犯联系在一起。至于大麻，如我们在之前所提到的，是反传统的亚文化的代名词，但是当许多"正常的"富有白人开始吸食大麻之后，有11个州放宽了对大麻的禁令。

利益集团 强大的利益集团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金钱去影响公众舆论和立法者。例如，烟草在许多州都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给制造者、批发商、运输者、广告机构、自动售货机公司和零售商带来了大笔的收入。这些商业利益使烟草企业通过他们的代言人"烟草协会"，进行了大量的院外游说活动，对抗和抵消了美国癌症协会和一些市民组织要求通过禁烟立法的种种努力。在为对抗国内日益增多的限制而加强院外游说活动的同时，烟草企业通过扩大海外销量以弥补国内的损失。

毒品问题使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相互联合在一起。宗教团体出于道德原因要求禁止或严格限制毒品，这迎合了有组织的犯罪的需求。对后者来说，非法毒品可以在黑市上创造出巨大的利润。执法部门也要求加大管理毒品的政策，因为这也就意味着更高的部门预算、收入增加、编制扩大和职业稳定。与此同时，民间鼓吹放宽毒品法令的自由论者发现，自己不觉间同那些想要扩大销量的主要制造者和毒品贩子以及寻找廉价、优质毒品的吸毒者站在了一起。

自身经济利益是如何左右毒品政策的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可能就是1931年到1962年间担任麻醉品局局长的哈里·安斯林格。在他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掀起了一场非常有效的反对大麻的宣传攻势。在1933年到1936年连续4年间，该部门的预算和人员被大幅削减之后，安斯林格通过媒体对大麻大肆攻击，称之为导致海洛因成瘾的青年生命的"刺客"。他向媒体提供了许多可疑的犯有"大麻暴行"的"吸毒成瘾者"的故事。1936年，麻醉品局赞助了一部轰动的商业电影《疯狂的大麻》，声称真实地纪录了吸大麻成瘾的人在毒瘾发作时，如何不择手段获得这种"天使粉"。作为对安斯林格的口诛笔伐的回答，国会在1937年通过了"大麻税法案"，旨在彻底消除吸食大麻的问题。麻醉品局的预算也毫无疑问地获得增加，用以对抗这一"罪恶"。[101]

相互作用论观点

吸毒者可能把毒品看成一种冒险、一种逃避、一种必需或一种宗教体验。同一种毒品用于医学目的可以被看作是对病人的帮助，但如果不是，

在道德家眼中它就成了一种罪恶。黑社会发现这是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而执法人员则把它看作犯罪活动的罪恶之源。而且，社会也时常把毒品及其象征意义重新界定一番，时而称之为一种罪恶，时而称之为一种社会问题，有时又说吸毒是可以为人接受的习惯。这一事实提供了相互作用论的分析基础。

社会准则 虽然有些人是由于个性失调或其他心理特征而影响到他们吸毒，但是社会学家发现这种个人化的解释并不充分，因为吸毒不是孤立于社会而单独发生的。相互作用论者把吸毒解释为一种行为模式，是通过在群体的相互交流中所发生的社会化和再社会化而得来的。例如，由于在美国饮酒是一种被认可的社会行为，儿童在长大的过程中，就学到了一种对其认可的定义和态度，以后饮酒的可能也更大。同样，成年人在孩子面前习惯性地吸烟、服用咖啡因、兴奋剂或镇静剂等，也会影响到年轻人的行为。

文化因素 饮酒的行为标准在某些种族群体中的盛行，说明了通过学习获得的行为模式的不同之处。正统犹太教徒把饮酒限制在亲友之间等特殊的场合，认为过量饮酒是对其文化的不良反映，醉酒不是一种犹太人的行为。由于从小学习这种克制的准则，即使成年后脱离正统的犹太人群体，犹太人在饮酒时仍然会坚持自制。[102]意大利裔的美国人把饮酒看成是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他们的子女对此耳濡目染，在饮酒时表现同样的行为准则。无论是意大利人还是犹太人，饮酒都不是为了减轻压力，因为他们并没有把饮酒定义为一种可以接受的处理问题的方式，而只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103]另一方面，爱尔兰裔美国人传统中就把饮酒同社交聚会联系在一起，用它来玩得高兴、玩得心跳。传统的爱尔兰价值观不像犹太人或意大利人那样，认为当众喝醉是件丢脸的事情，除非它导致了收入或财产的损失。因此，在这些聚会上狂饮是非常正常的。在爱尔兰裔美国男性中，酒精中毒的发病率相对较高，而在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中则非常少见。[104]

毒品亚文化 同龄人是吸毒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朋友常常介绍新人开始尝试吸毒——包括酒、安非他命、可卡因、大麻或其他毒品。如果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对使用某种毒品持否定态度，一个个人就更有可能会不顾社会的反对，无论如何也要在朋友面前吸毒。在一个群体的社会背景下吸毒最为普遍，同伴的鼓励使人更加放心和迫切地去尝试吸毒。因此，一个人同一种毒品亚文化的接触时间越长、越为密切，该亚文化群体的行为准则就越有可能超过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准则。

一旦一个人开始使用违禁毒品，共同的经历会使他更加接近这个群体及其行为准则。对许多人而言，这种群体内的同志情谊同毒品的效力一样

重要。为了能得到群体的承认，他们就会继续使用毒品。而其他的人，通常在亚文化中被称为"圆滑的家伙"，在大麻、可卡因等的作用下，全部空闲时间都用来过聚会、音乐和性交的生活，偶尔也会用上一点安非他命和迷幻剂。在他们看来，让人"开窍"是友谊的一种正常举动。[105]

在吸毒者中，存在着一个更加密切的亚文化。由于被社会和法律看成是不正常的，吸毒者受到了传统集团的种种非议、拒绝和排斥。他们被迫与那些和他们一样的吸毒者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以奋力争取生存和获得毒品。他们孤立于社会的其他部分之外，逐渐接受了一种不正常的身份，他们的行为围绕着不断吸毒而旋转，惟一对其不加指责的只有他们的同伴。[106]

未来的选择

关于毒品，我们似乎同时面对两种倾向。政府在斥巨资用于禁烟的同时，又用大量的美元资助烟草企业。有些州使个人使用大麻合法化，而有些州却拒绝如此。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对策，如销毁大麻种植、打击走私、逮捕和起诉等。但是，酒类消费在年轻人中日益增加，其他毒品，如可卡因和大麻、滥用兴奋剂或镇静剂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这是一个充满毒品的社会，但这些相互矛盾的趋势将会把我们带向何处呢？

悲观的前景

尽管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到2030年毒品将逐渐侵蚀美国的力量，使它沦为一个二流经济强国。整整一代美国人从小生活在充斥酒精、大麻、可卡因和其他毒品的环境中，并带着一种赞同吸毒的生活方式走上工作岗位。在近几十年里，由于员工毒瘾发作导致的生产力降低、旷工、迟到和不合理的决定，让大量的美国企业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最终导致的生产成本上涨和交货困难，将使美国在产量上落后于其他的工业国家。

警察无情的打击仍在持续，创纪录的大量违禁毒品被不断地查获和销毁，但总体的毒品供应还在继续增长。现在毒品的供应已经极为普遍，要搞到一点毒品不会比晚上酒吧关门后找个地方喝一杯更加困难。监狱早已被各种违反毒品法规的人塞得人满为患，其中还有因为酒后驾车而被强行关押的人。尽管如此，毒品泛滥是如此势不可挡，大多数人仅仅是轻蔑地嘲笑当局螳臂挡车的做法。

与毒品相关的犯罪活动也继续猖獗不止。海洛因依然是一种昂贵的嗜好。这使大多数吸毒者不得不依靠偷窃或卖淫才能满足毒瘾。生产力的下降在整个社会引起了反响，使得大量低收入城市居民失业，甚至根本找不到工作。他们不仅成为严酷的经济现实的牺牲品，而且因毒品最初提供逃避现实的诱惑而身受其害。政府对吸毒者人数的增长感到担心，于是加大了强制性手段。但无论是加大逮捕还是定罪，实际上都在使问题更加恶化。街头暴力和郊区的盗窃汽车、入室行窃的案件数字飞升，毒品导致的死亡和杀人事件司空见惯，而有组织的犯罪以给国家经济造成每年亿万美元损失的代价不断地兴旺发展。

如果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人民，那么美国显然有麻烦了。到2030年，年轻人的吸毒现象将会更加严重，酗酒和药物依赖不仅普遍存在于上班族之中，同时也蔓延到了学校。许多人每天不断地忙碌，只是为了得到一点可怜的毒品。其结果是，曾经导致人类无数发现、发明和科技成就的求知、决心、毅力和钻研精神，都成了遥远过时的东西。我们的文明不再前进，许多人相信，它永远都不会再前进了。

乐观的前景

到2030年，虽然美国仍然将是一个充满毒品的社会，市场上还会有更多新型的人工毒品制剂出现，但对毒品法律的一个重大修正，使吸毒不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在2008年，一个特别委员会提出了全面改革的建议，终于获得了立法者和选民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更加了解吸毒的情况。

在某些方面，对毒品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医生要对开出的各类药物进行详细的记录。医药公司只允许生产数量有限的毒品。对饮料中的酒精含量强行予以降低，使人既可以多喝，又不会中毒。电脑智能控制的点火报警系统，让喝过酒的人根本发动不了汽车，从而有效地消除了酒后驾车的危险。烟草仍然是合法的，但其中尼古丁的成分已被去除，同时取消了对烟草企业的补贴，转而向农民提供补贴，用以种植农作物向其他国家出口获利。大麻完全合法化，从药店即可购得。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对烟草和大麻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

最具有意义的是官方关于吸毒政策中的变化。在学校和媒体上防止吸毒的信息宣传，旨在消除吸毒和毒瘾。它集中于帮助人们掌握减轻压力的技巧，提高自信、自尊和生活能力。这种宣传基于一点，即人们若自我感觉良好，便不会随意伤害自己的身体。它成功地使大部分美国人相信，更大的快乐不是人为获得的，而是自然获得的——是高品质生活的结果。科

学也充分帮助了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价廉物美的身体自我检查设备使人可以直接检测毒品对身体造成的危害，从而使他在对任何毒品形成生理或心理依赖之前，就打消了吸毒的想法。

民众若是开明而有知识，就会适量地使用“毒品”。酗酒者和吸毒者的人数较之30年前有了明显的下降。毒瘾被看成是一种“病”，对其予以治疗。不可救药的吸食海洛因成瘾者，被送进按照英国的旧模式建立起来的戒毒中心。由于毒品是合法的，药量得到了控制，价格也不贵，这使得任何人都不能从毒品的非法交易中牟取暴利。有组织的犯罪因而失去了一个主要的财源，与毒品有关的犯罪也迅速下降。执法人员因而可以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到打击其他的犯罪活动之中，使犯罪率总体下降。这种新方法，同时还消除了过去由于对吸毒的反感和处罚而滋生的毒品亚文化。

通过特许、征税、规范、预防滥用毒品的计划和对吸毒者的重新界定，国家就此可以不再因为制定了错误的毒品政策而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并最终战胜因对毒品的错误使用和滥用所造成的问题。

小结

1. 酒精和其他毒品是世界历史上许多不同文化中的固有成分。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不仅是对其接受与否的文化价值观如何因社会的不同而不同，而且还有在同一个社会中的社会界定是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吸毒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2. 精神刺激性药物是影响意识、情绪和感觉的化学物质。有些更为有害的毒品，如酒精、烟草和巴比妥酸盐等，所受的社会批评比大麻等一些危害较少的毒品反而更小。尽管如此，所有的毒品都会产生有害后果，如果使用过量，将会危及到生命。
3. 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源自于吸毒：它为有组织的犯罪提供了一个利益丰厚的黑市，损害个人健康，毁掉个人的事业，对个人和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与吸毒有关的事故造成巨大的伤亡和财产损失。
4. 对毒品的依赖使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危害。吸毒使吸毒者寿命缩短，造成各种健康问题，服用安非他命或饮酒过量还常常会引起暴力。由于孕妇酗酒或吸毒，使得新生儿常常带有先天的缺陷或毒瘾。吸毒已经渗透到职业体坛（缩短运动寿命）和美国企业（每年要造成约1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和医疗开支）。
5. 对毒品的解决办法过去包括预防和治疗。无论是通过自助的治疗中心

治疗，还是健康诊所进行的康复治疗，都收效甚微。使用对抗性药物或改造的努力也鲜有成效。将毒品区分为危险或不太危险这两类的荷兰模式使后者合法化，并采取措施减轻严重吸毒造成的危害，起到了一定的控制效果，为我们制定和采取毒品对策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示范。

6. 虽然使用毒品在美国非常普遍，但美国人的价值标准认为，有些毒品是可以被接受的，有些则属于社会问题。功能主义分析了适量使用毒品在医学、消遣和治疗上的益处，以及由于价值冲突和人类潜力的浪费所造成的紊乱。冲突论分析了占统治地位与从属地位的道德价值观之间的碰撞，审视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自私动机。相互作用论强调了社会化、再社会化和同伴群体的行为规范。

关键词

上瘾
对抗性药物
镇静剂
胎儿酒精综合症
胎儿毒品综合症
入门毒品
“海洛因时尚”
美沙酮治疗
麻醉性毒品
精神刺激性药物
被动吸烟
治疗社区

推荐书目

Barrows, Susanna, and Robin Room (eds.). *Drinking Behavior and Belief in Modern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An informative anthology of articles on historical and cross-cultural drinking patterns, from Puritans to modern Irishmen, and on past and present efforts to regulate alcohol consumption.

Currie, Elliot. *Reckoning: Drugs, Cities,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New York: Hill & Wang, 1993. Draws upon three decades of research to explain why drug use has reached epidemic proportions in U. S. inner cities and why the federal war of drugs has failed.

Ettore, Elizabeth. *Women and Substance Abuse*.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Helpful analysis of women's use and abuse of alcohol,

barbituates, cocaine, heroin, and tobacco.

Goode, Erich. *Drugs in American Society*, 3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A definitive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of the issues of drug use and abuse, including an Interactionist view of attitudes toward various drugs.

Grinspoon, Lester, and James B. Bakalal. *Cocaine: A Drug and Its Social 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Offers a sociohistorical insight into cocaine's appeal, dangers, and mutation over the generations.

Inciardi, James A. *The War on Drugs II: The Continuing Epic of Heroin, Cocaine, Crack*. Palo Alto, Calif: Mayfield, 1992. A close-up look at the world of heroin, cocaine, and crime, using a vivid narrative and verbatim accou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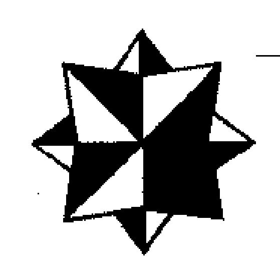
Inglis, Brain. *The Forbidden Gam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5. A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account of drugs, drug use, drug laws, and drug suppression efforts throughout the Western world.

Sandmaier, Marian. *The Invisible Alcoholics: Women and Alcohol Abuse in America*. New York: McGraw-Hill, 1980. Revealing portrait of an often-ignored dimension of alcoholism: problem drinking by women of all ages and backgrounds.

Szasz, Thomas S. *Ceremonial Chemistry: The Ritual Persecution of Drugs, Addicts, and Pushers*, rev. ed. Holmes Beach, Fla.: Learning Publications, 1985. An updated edition of Szasz's 1973 bestseller, in which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our nation's more recent anti-drug crusades.

White, Larry C. *Merchants of Death: The American Tobacco Industry*. New York: Beach Tree Books/Morrow, 1988. A thorough look at the harmful effects of tobacco and the industry's efforts to hide the truth from the public.

第4章 性行为



关于性行为的几点事实

- 约一半的青少年到16岁时都已不是处女或处男了。
- 75%的丈夫和85%的妻子坚称自己从未对其配偶有过不忠。
- 1994年，71%的男人认为要不带感情地进行性生活非常困难，这较1984年的59%有所上升。
- 约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带有某种性传播疾病，但许多人对此一无所知。
- 199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有3%的男性和1%的女性是同性恋者。
- 70%的美国人谴责同性恋行为不道德，只有35%的人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
- 大约有1万个网址是不同形式的色情网站。
- 11%~38%的女孩和3%~17%的男孩从小受到过性虐待。

由于不同的文化准则决定了社会成员如何恰当地表达性要求的方式，性行为在人类中间的表现千变万化。在任何社会，合法的性对象人数或类型、性行为形式都不是完全由个人决定的。所有的社会——通过严格的行为准则或法律——禁止与某些个人发生性接触以及某些形式的性行为。但是，一些社会对性较为随意，允许较多的性表达方式，离婚也很容易；而其他社会则采取对性的限制，对可以接受的性行为方式和离婚予以更多的控制。

其中两种受到最普遍反对的性行为是乱伦（亲密亲属之间的性行为）和成人与孩子之间的性行为（即使是对雏妓，也被认为是一种虐待行为）。然而尽管受到了普遍的指责，但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在美国仍有30万名出卖肉体的雏妓，而全球每年会新增100万名孩子从事这一行业。[1] 而且，对儿童的性骚扰和性虐待事件现在也日益增加。而“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成人卖淫，虽然继续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在美国仍然十分普遍。近些年来，卖淫在全世界都增长迅速，尤其是在非洲、亚洲、东欧和拉丁美洲。由于国际互联网和录像机的普及，色情行业更加生意兴隆。另一种性行为的方式是同性恋，它引起许多宗教组织的道德批评，尤其是

天主教、伊斯兰教和摩门教。但今天在美国，它已较诸以往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承认，现在美国法律也保护同性恋者不受任何歧视。

以上这些以及性解放、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未婚同居等性行为的方式，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社会定义变化或是新的社会问题的重要表现。跨出不属于社会学研究范畴的道德判断的局限，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性行为的不同社会形式。

跨文化的背景

正如本章开篇所提到的，性行为能否被接受的准则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变化。在一个社会被一致认可的社会准则，在另一个社会就有可能被视为异端妄为。例如在西方文明中，接吻和抚摸女性的乳房是非常自然的性表达方式。但在许多其他的文化中，人们觉得乳房不会产生任何的性吸引，认为吻它们是十分恶心的事情。

美国社会的性标准部分可以追溯到《旧约全书》，它严格限制任何异性婚姻之外的性接触。西方人过去曾经认为，惟一"正常"的性交姿势是男上女下面对面的躺着进行性交。1948年，艾尔弗雷德·金赛对性行为的开拓性研究表明，70%的美国人从未试过任何其他姿势。[2] 但很多其他社会的人们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古怪，在当时被调查的131个社会中，只有13个习惯性地采用这种姿势，或是偏爱这种姿势。[3] 19世纪太平洋群岛上的妇女在和来访的美国传教士发生性关系之后，嘲笑地称之为"传教士式的姿势"。

古代和原始社会

即使是在我们的社会看来是最荒唐越轨的性行为，在其他地方、其他时期的人们眼中也曾被看成是非常正常的。例如，在有些社会中，强奸是所有女人第一次的性经验。[4] 在亚诺玛末印第安人中，战斗中从其他部落抢来的女人遭到强奸，先是抓获她的人，然后是村落中的其他男性。[5] 没有人把这看成是一种战争罪行，更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野蛮行径。

许多古代西方文明都把所有性行为中最受指责的乱伦现象看成神明中普遍存在的正常行为。同样，日本神话中创世者就是一对兄妹，他们创造了万物，其中包括性交。[6] 此外，在古代埃及和夏威夷王族中，通过兄妹通婚以更加稳固地维护统治。

对性交的社会控制

事实上,在所有的社会中,婚内性关系占了成年人性行为的绝大部分。在被研究的原始社会中,大约有五分之二到一半允许女性有婚前性行为。如果将那些并不把婚前性行为看作是极为越轨的社会也计算在内,这个比例可以达到70%左右。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里,男人在这方面比妇女更为自由。[7]

在所有社会中,一旦结婚,就会对性加上种种不同的限制或约束。其限制之严格,以至于如果和配偶之外的任何人发生性关系,就要被处以死刑,就像在许多阿拉伯国家那样。其他一些社会在总体上禁止婚外性行为的发生,但却允许在某些仪式或节日中发生婚外性关系。例如,在婚礼中将妻子借给某些特定的个人可能是婚礼的一部分。而在阿拉斯加中部的爱斯基摩人和东非的巴希玛人中,如果主人不让过夜的客人分享他的妻子,就会被认为是一个不热情好客的主人。[8]



在我们的社会,接吻同时表示了爱与性。在我们眼中,这对青年伴侣的行为视为正常。但是属于西方文化之外的人们,也许会把这种场景看成一种怪行,甚至还有些不堪入目。关于可接受的性表达(尤其是在公开场合中)的界定,随着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差异巨大。

美国性行为模式的变化

直到6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对性行为都持保守的态度。事实上，虽然性革命从“咆哮的二十年代”就已开始，但是主流社会几十年来对此一直不予认可。当然，在每一代人中各种形式的性行为都有发生，但多数美国人的行为准则还是认为，性行为应仅限于婚姻之内，而且在那时主要采用的（如金赛的研究报告发现的）是同一种姿势。

随意性生活的兴衰

在60年代中期的美国，许多年轻人受到嬉皮士宣扬的“自由之爱”的影响，开始尝试随意的性生活。这种形式整整持续了20年，直到健康原因和其他社会现实促使其减退。拥有许多的性伙伴不再是自由和冒险的象征。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日渐复兴的传统价值标准，而且显得非常愚蠢和危险。因此，随意性生活逐渐让位于性生活的谨慎和把性与责任联系起来。[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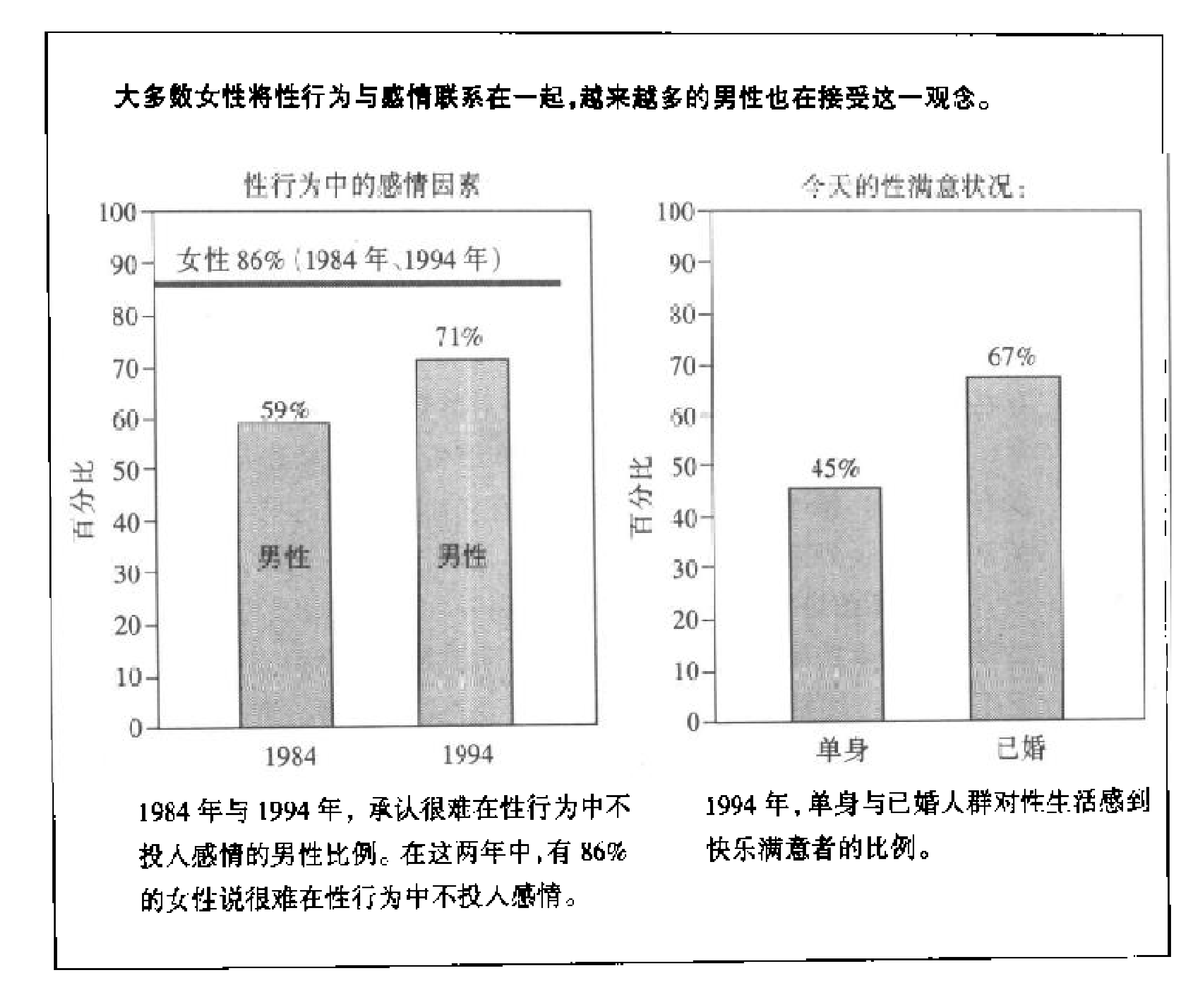
随意性生活并非个人实现

对许多人而言，所谓的性革命带来了一种羞辱感，意味着性伙伴不再回来和没有任何真正的个人联系。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对此产生了彻底的厌烦。而且，随着他们大多数人逐渐年届四十，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拥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和家庭生活。无论结婚是否是其目标，人们想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女人比男人更强调感情成分对性的重要性。如图表4.1所显示的，只有14%的妇女认为不带任何感情的性行为并不困难，这个比例一直保持了十多年。而在男性方面，对这一观点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认为接受随意性行为的比例从41%下降到了29%。[10]

婚前性行为

在60年代以前，婚前性行为问题还是作为一种越轨行为受到研究和



图表 4.1 性与感情

资料来源："Sex Survey" by Mark Clements. *Parade Magazine*, August 7, 1994.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author and from *Parade Magazine*, copyright © 1994.

分析，社会把性仅仅限制在婚姻关系之中。但从那时起，对性行为的标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在大多数人很早就开始性生活，婚前性行为也已变得非常普遍和寻常。如果年轻人推迟他们开始性生活的时间，可能不是因为社会的反对，而是有其他的原因。图表 4.2 显示，到 16 岁时，几乎一半的青少年都已不是处女或处男了。19 岁的年轻人中只有 20% 还是处子之身。这其中 80% 的人主要是因为害怕传染上艾滋病或其他性传播疾病，不到 40% 的人提到是因为道德或宗教的原因。[11]

造成婚前性行为增加的原因可能有二：第一，廉价有效的避孕药物和工具成为合法，并很容易得到；第二，人们初次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推迟。这两种趋势互相加强，同时又进一步受到了来自暴露性电影、电视的强烈影响。[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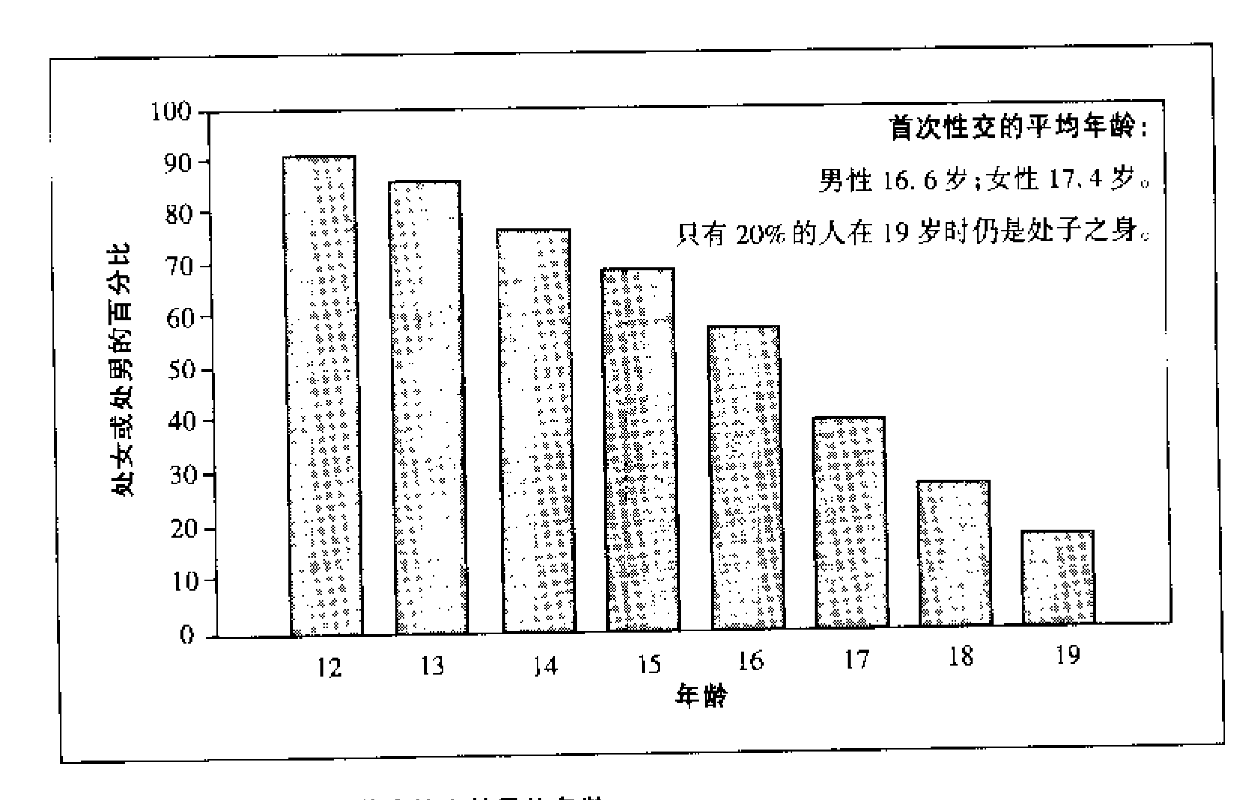
由于婚前性行为在 60 年代以前并不普遍，社会只把它看成一个个人

问题，而非社会问题。现在，它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除了根据道德理由，它仍然不被定义为社会问题。但是其潜在后果——如早孕、流产、未婚妈妈、单亲家庭、福利开支和疾病等——却的确被认为是社会问题。

婚外性行为

通奸的出现可能比卖淫还早，因为我们可以在许多古代文明中找到其存在的证据。到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尽管许多美国人相信通奸非常正常，但最近的研究发现，75%的丈夫和85%的妻子坚称自己从未对其配偶有过不忠，超过90%的人表示在调查之前的一年内只与配偶发生过性关系。现实世界当然不同于肥皂剧中的世界![13]

乔治·斯伯诺格勒总结了各种有关婚外性行为的研究中的变量。[14]发生婚外性行为事例最常见的一些变量有：赞成婚前性行为、对婚姻不满、缺乏宗教信仰、生活在一个较大的社区、支持性别平等、适当的机会、对婚内性行为不满意、社会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和没有孩子。



图表4.2 青少年与性：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

资料来源：*Sex in America: A Definitive Survey* by Robert T. Michael, John H. Gagnon, Edward O. Laumann, and Gina Kolata (Boston: Little, Brown), 1994, as reported in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安全性行为

安全性行为（Safe sex）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词，它指的是不发生体液交换的肉体性行为。这种为了预防传播艾滋病病毒和其他性病的措施，使避孕套在同性恋和异性恋中的使用大大增加。在一代人以前，避孕套作为一种“安全装置”用来防止当时各种性病的肆虐。但随着两种主要的性病——梅毒和淋病可以治愈之后，避孕套作为一种安全工具的意义开始减退。而在今天，各种广告攻势都强调避孕套是保证安全性行为的惟一手段。由于艾滋病病毒可能潜伏7年以上，有关不安全性行为的残酷事实是，你实际上在和性伴侣过去7年内所有的相好同床共枕，一次偶然的性生活可能传染给一个人至少5种不同的疾病（参见专栏4.1）。[15]

专栏4.1 性的灾难：一个古老的社会问题

大约3000年前，希伯来人在打败米底亚人之后，带着上千个女俘凯旋而归。不久性病的迅速流行使得摩西谴责“每一个和男人睡觉的女人”，并将这一问题称之为“全体犹太人的瘟疫”。最后他的对策是采取了一个星期的隔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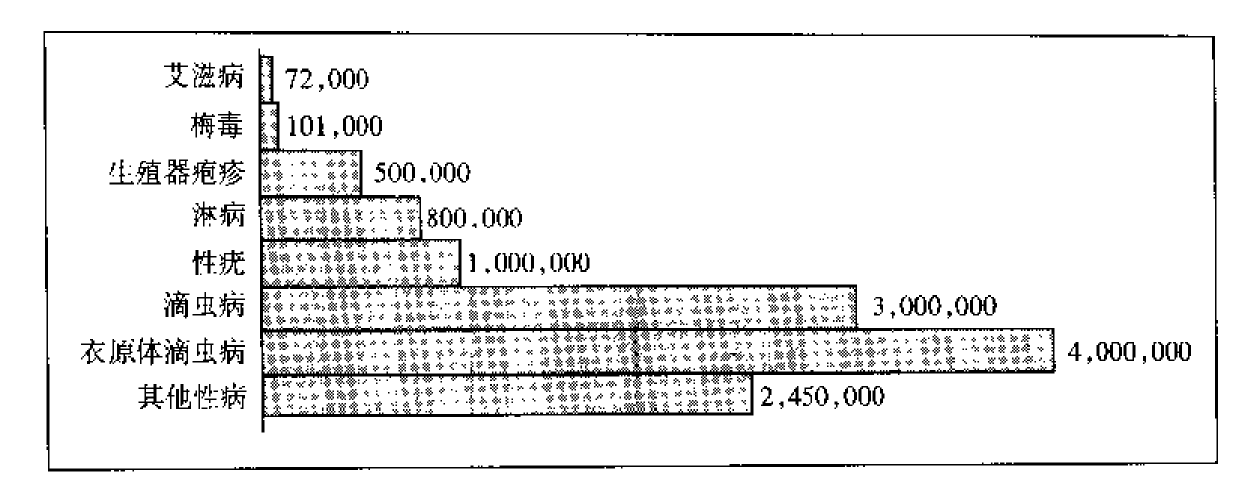
许多个世纪过去了，又爆发了许多荼毒和残害人类的性瘟疫。当15世纪90年代梅毒横行欧洲之时，各个国家之间互相指责。许多人把它称为那不勒斯病，虽然意大利人叫它法国梅毒。而法国人反而叫它西班牙病，认为是哥伦布的船员把它从美洲带回来的。直到今天，对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议。

教皇、国王和王后们都得过性病，而城市居民、军队和海员也常常被传染。16世纪的俄国沙皇伊万四世，最初似乎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但后来由于感染了梅毒，而变成了臭名昭著的“恐怖的伊万”。另一个暴君阿道夫·希特勒也患有这种病，此外还有20世纪美国有名的土匪阿尔·卡波内。

多年来，人们试着使用了无数的治疗手段。15世纪的德国人想到，经常上公共浴室以消灭淋病。但是由于担任擦洗工作的都是赤裸的女人，最后适得其反，反而扩大了疾病的传播。在20世纪之初，由于医生对性病束手无策，美国人主要依靠一些用酒精制成的江湖秘方。而事实上，许多医生认为，治疗性病就是沉默地宽恕这种罪恶的生活，因此对它根本不屑一顾。

1938年，国会拨出专款用于支持各州的控制性病计划。不久以后，每个州都要求在领取结婚证书之前，进行性病的血液检查。随着1944年青霉素的发现，40年代开始了全面清除性病的工作。尽管略有成效，但是始终没有获得彻底的成功，性病仍然是社会的一大弊病。在3000年的性灾难史上，艾滋病（或者更加准确地说，艾滋病病毒）是一种最新形式的性病。

性灾难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每年估计大约有1200万美国人感染一种性传播疾病，其中约三分之二的新增病例是25岁以下的人（见图表



图表 4.3 美国新增的性传播疾病病例：1995 年

资料来源：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4.3)。健康专家估计，有 5500 万美国人（约五分之一）带有某种类型的性病，许多人对此还一无所知。结果，超过三分之二的性病病毒被无症状的人们传播。其中一种——艾滋病病毒是极其致命的，两种会致癌，4 种会导致妇女不育。很明显，对健康的威胁和性病的广泛盛行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16]

安全性行为的另一种变异是电话色情服务。通过拨打以 900 开头的电话号码和使用一张信用卡，打电话者就可以直接进行一次坦率的性对话。正如国际互联网上的聊天室使得人们的性幻想得到实现一样，电话色情服务只是一种更快速的形式，而且通过真人的声音来加强对性的幻想。对许多男人而言，这种安全的性方式，为孤独、挫折、性欲等问题提供了一个让人着迷的解决办法。[17]在以 900 开头的付费电话业务中，电话色情服务占主要份额，成了一项亿万美元的产业，每个月平均要接到 10 万到 20 万个电话。[18]而在事实上，接电话的女人常常是一些业余赚点钱贴补家用的家庭妇女。[19]在日本，许多 13 到 18 岁的女学生为了购买新款时装，使用移动电话（在上课或和父母在一起时则用电子语音信箱）提供电话色情服务。[20]

国际性行为比较

表 4.1 中显示的最新研究表明，若以性伴侣的人数计，美国人的随意性行为要超过英国人和法国人，但不及芬兰人。

在被调查的 4 个国家中，法国妇女只有一个性伙伴的比例最高(46%)，而芬兰最低（28%)，美国其次为 31%。在另一方面，美国也与

芬兰最为接近：30%的美国妇女有5个或5个以上的性伙伴。

在全部4个国家中，被抽样的男性拥有的性伙伴都比被抽样的女性多。而与文雅、放荡的法国男人的传统形象恰恰相反，芬兰男子有5个或5个以上性伙伴的比例最高。

表4.1 性在国外：一生中的性伙伴总数（%）

	1个		5个或以上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英国	21%	39%	44%	20%
法国	21%	46%	45%	14%
芬兰	12%	28%	60%	34%
美国	20%	31%	56%	30%

资料来源：Robert T. Michael, John H. Gagnon, Edward O. Laumann, and Gina Kolata, *Sex in America: A Definitive Survey* (Boston: Little, Brown, 1994).

同性恋

许多年来，社会科学研究者——受到社会行为准则的影响，即以宗教为基础对同性恋的指责和精神病学把它看成是一种精神变态——主要把同性恋行为视为一种社会问题来研究。事实上，直到80年代后期的大量研究都是从精神病学或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认为同性恋是病态的，而同性恋者则是“有病的”或“堕落的”。[21]今天——随着同性恋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疾病，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性的不同喜好是一种生物功能而不是个人选择。[22]随着社会的逐步认可和随着性选择被置于民权法案的保护之下，研究者开始转而强调对同性恋的歧视是一种社会问题。

社会历史背景中的同性恋行为

历史记录下大量翔实的证据，说明同性恋的存在已有数千年之久。然而，我们对过去历史时期的性行为和性准则的主要知识，都是来自文献和档案的推断。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过去人们的行为方式。

古代希腊的同性恋 同性恋在古代巴比伦人和埃及人中间就已存在，且并不受到惩罚。而古代希腊人不仅承认它是人类性本能的自然表现，而

且赞美它比异性恋更加真实和温柔。“鸡奸”一词的字面含义应该是爱恋少年。而在古代希腊，大多数的同性恋都是发生在男人和青少年之间的——常常是在一个出身高贵的老师和他的学生或门徒之间——而非是在成年男子之间。对于非贵族阶层的古希腊人中的同性恋，则缺少明确的记载。大概我们现在拥有的惟一证据，就是史料上曾经提到过有生来自由的男妓。

妇女和婚姻在古代希腊社会的作用和地位同现代的美国社会极为不同。婚姻是指定的，女人一直处在父亲的权威之下，永远不会真正成为丈夫家庭中的一部分。妇女不能接受教育，并且基本上孤立于社会之外。因此，在两性之间难以形成伴侣关系：

> 对两性恋的希腊人来说，女人和少年都属于顺从的非男性。许多非西方的社会都有同样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而且至今在许多地中海国家仍可以找到这种形式的变异。只要一个男人拥有明确的支配地位，就可以同时“追求”两种性别的伴侣，包括娈童和女人。[23]

劳德·汉弗雷斯在其70年代对美国公共厕所内发生的非个人情感的性行为进行的著名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当问及被调查者对这种行为的看法时，许多人都表示自己不是同性恋，只是想让别的男人来为其“服务”。[24]

西欧的同性恋 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把同性恋和异性的肛交行为视作是一种罪恶和犯罪。从瑞典到英国到意大利的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政府，对犯了这种罪行的人一般都要采取极刑。例如在1492年，威尼斯的官员下令以犯同性恋的罪名当众将一名贵族和一名教士斩首和烧死。在法国，当局于1586年以在鸡奸中伤害了一个男孩为名，对一名巴黎大学的前院长处以火刑。[25]这些事件说明了教会和社会对同性恋的立场，但却没有说明这种行为在当时是否普遍。

同性恋在原始社会的普遍性 专门长期的同性恋关系在原始社会并不多见。虽然同性恋行为在一些特殊场合或特定的生活时期可以被接受，甚至得到鼓励，但是两个同性的成年人保持长期的性关系的现象却极为少见。在现在已知的原始社会中，有三分之二允许同性恋行为，但一般大多采取青少年与成年男人之间的性接触形式。[26]而且，对其他社会性行为方式的最系统的研究表明，女同性恋的行为并不多见。在被调查的76个社会中，只有17个社会存在女同性恋现象。[27]

美国的同性恋

60年代之前，公开的同性恋行为在美国极为罕见，除了在一些有着

强大的亚文化势力的大城市。乔治·乔西恩研究了从1890年到1940年的纽约同性恋社会，认为它有其自身的传统、聚会场所及文化和社会活动，以维持和加强同性恋文化的集体归属感。[28]尽管法律认定同性恋者的性行为、甚至他们之间的非性行为联系都是非法的，但对这些法律的执行并不热心。因此，同性恋者从情感、社会和商业上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支撑体系。到30年代，同性恋文化的迷人魅力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人参加街头的集会，报纸也发表文章对那些性感的装束予以详细的描述。

耻辱和处罚 可能是由于支撑宗教原教旨主义和禁酒主义等多股保守势力的结合，以及大萧条、劳工运动和布尔什维主义所产生的对社会瓦解的恐惧，公众对于各种生活方式实验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三四十年代对这些法律的执行开始加强，其中包括同性恋也被看作是一种越轨的性行为方式。在50年代的冷战期间，共产主义的狂热迫害者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出警告，称国务院中的同性恋者正在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在当时被发现或被怀疑是同性恋，就等于毁了一个人的全部事业和生活，很有可能会被解雇，并受到侮辱。很多年轻人会经常跑到一个同性恋者经常出没的地方，狠狠地揍他们一顿，并以此为乐。对大多数同性恋者来说，平常装作是异性恋的样子是至关紧要的。乔西恩指出："国家修建了厕所，并把同性恋者逼进了里面。"[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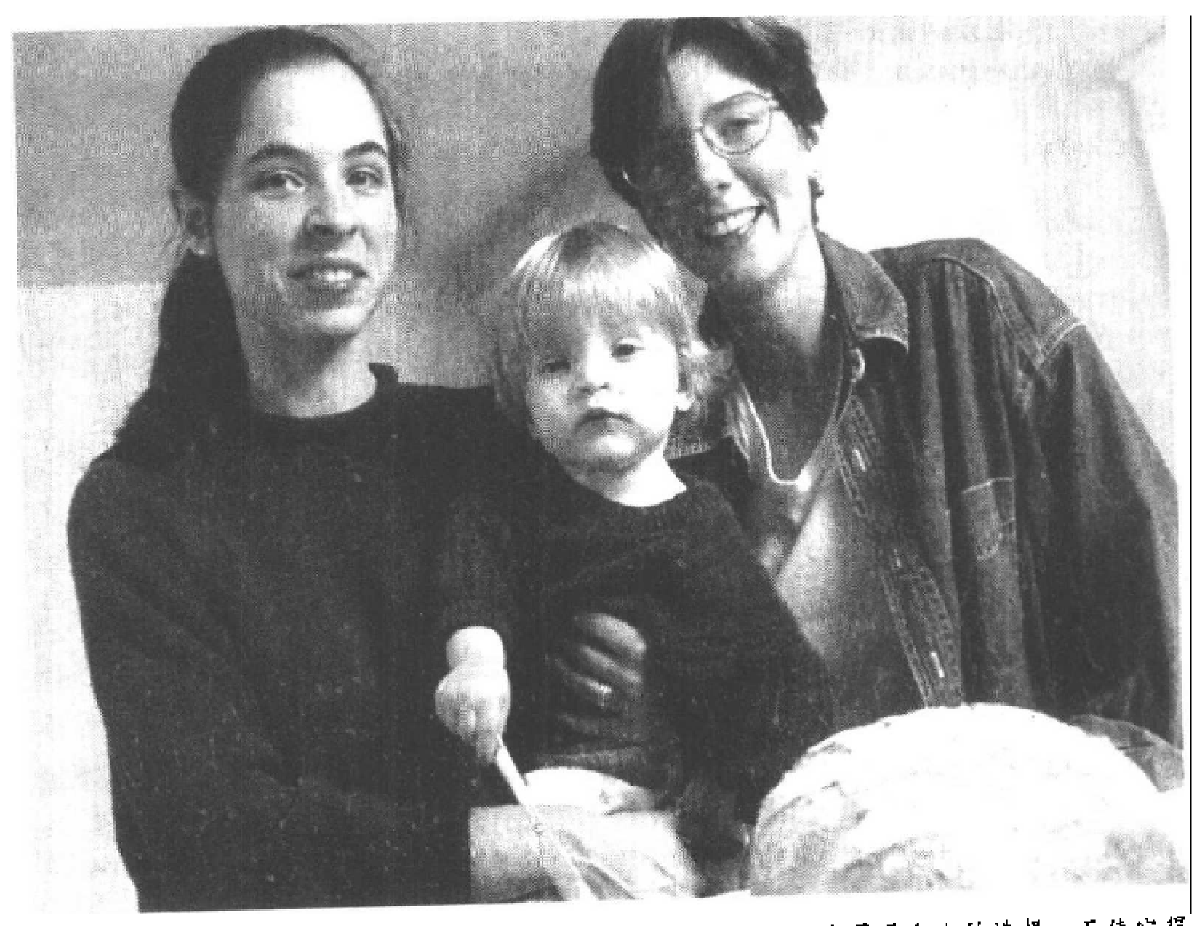
尽管不像英国的法律那样残酷（在英国，直到1861年，肛交仍要被判死刑），美国法律对同性恋男子的处罚仍是非常严厉的。直到近年来，许多在美国都已非常普通的性行为如口交和肛交，还是被看作"违反自然的罪恶"和非法的。市政当局援引这些法律，并常常和有关鸡奸的法令一起使用，主要用来起诉同性恋男子。

宽容和反应 50年代的**同性恐惧症**（homophobia）（对同性恋者没有理由的害怕）和由此而起的对同性恋者的侮辱和伤害，可能是由于他们对自己性倾向的公开化而引起的。这使得许多同性恋者不顾激进主义组织者在几个城市的努力，采取了一种低调方式。为了避免暴露，许多同性恋者对外面的世界隐藏起真实的自我，只能在他们的浴室和酒吧中寻找伴侣。[30]1969年在纽约的一家叫作石墙的同性恋酒吧所发生的事件，标志着同性恋团体从被动的适应转向积极的战斗。在过去，警察对这家酒吧经常进行突击搜捕。但是这一次，顾客没有撤退，反而进行了反抗。这一事件激励同性恋群体变得更加自信，促使他们公开自己的性身份。就像60年代初其他少数群体所做的那样，同性恋者建立起自己的组织，通过斗争来保证自己的平等权利和机会。[31]

70年代和80年代在公众的宽容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在从地方、

各州到联邦政府的反歧视政策和法律中，都加进了反对歧视性倾向的条款。随着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发展，人们对同性恋者的宽容也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走出厕所”，每年“同性恋之骄傲”的游行已经成为大型城市庆典的一部分。但80年代艾滋病的猖獗给予了同性恋群体毁灭性的打击，不但给个人造成了大量的损失和悲痛，而且还重新引发了反对同性恋者的偏见、歧视和暴力伤害。[32]在90年代，针对同性恋的纵火、袭击和谋杀案件出现了明显的增长。[33]

宗教和政治保守势力在90年代初发起运动，以通过谴责同性恋行为的地方性法令和阻止将性倾向置于各州反歧视法规的保护之下。[34]而且在1993年比尔·克林顿要求废除在军队排斥同性恋者的禁令之时，他们和军方的领导人一起反对这项提议。最后，“不问，不说”的妥协方案回避了各种性倾向的人应享有平等权利的问题。不过，这个方案允许同性恋的男女可以不受监督和迫害地在军队中服役，条件是他们不公开自己的性倾向。[35]



尽管同性恋者依然被许多美国人视为异类，但政府承认性倾向属于个人的选择，而使它得到了法律平等的保护。随着社会价值标准的转变，同性恋伴侣现在可以收养子女并把他抚养成人，如上图中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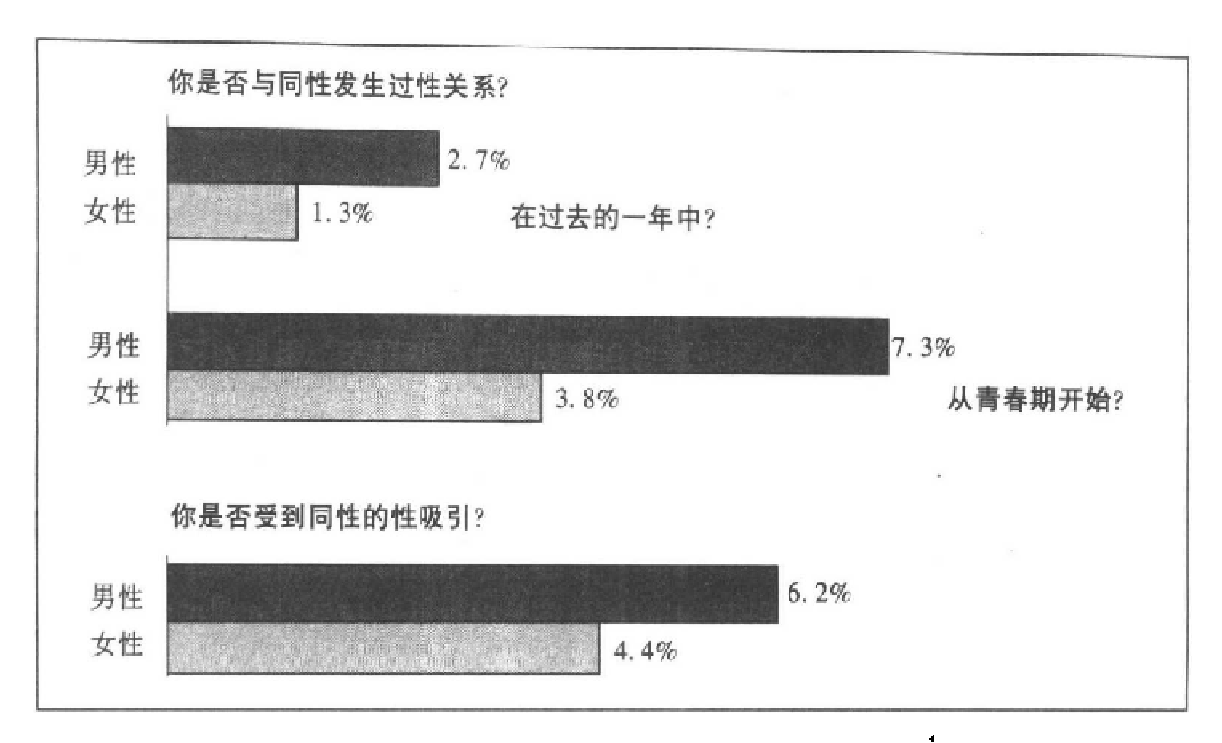
同性恋的程度

同性恋在美国的普遍程度如何？要准确地确定同性恋者的人数非常困难。直至最近，最经常引用的一直是阿尔弗雷德·金赛在1948年的研究，他估计有10%的美国人是同性恋。但是，尽管金赛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抽样，但并不是一种**随机抽样**（random sample），使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机会被选中。相反，金赛采取了一种**便利抽样**（convenience sample）的方法，它在一系列（未知的）方面不同于真正代表美国公众各阶层的抽样。这是因为便利抽样和随机抽样究竟有何区别是不可预测的。因此，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不是很愿意用它来做出概括性结论。

最近来自英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和挪威的研究显示，这些国家的同性恋比例一般在1%到4%之间，远远低于金赛所得出的同性恋在美国占10%这一比例。同性恋权利活动者认为，欧洲的研究成果存在缺陷，因为性倾向不仅是确定的行为，还是一种感觉——一种相爱的感觉，而这是不能确切计量的。这一比例的问题还有一定的政治含义，因为公认的同性恋者人数究竟多少，会加强或削弱他们作为一个选民群体对那些立法者和其他政府官员的影响。[36]

1994年，罗伯特·迈克、约翰·加农、爱德华·劳曼和吉娜·克拉塔提出了一个更加准确、科学的答案。他们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性行为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37]研究者通过电脑随机地挑选出一些地址，然后再次随机地挑选既定家庭的某些成员进行面谈。从培训面谈者到设计问题，研究始终按照收集科学数据的严格规则进行。他们发现，2.7%的男性和1.3%的女性承认，自己在过去的一年里与相同性别的人发生过性关系。如果把年龄限制提早到青春期，比例要高得多：男性为7.3%，女性为3.8%。当被问及是否受到同性的性吸引时，6.2%的男性和4.4%的女性的回答是肯定的（见图表4.4）。

比例的变化使人想到了金赛在1948年发现的一个关于性行为的重要因素。性倾向是连续性的，不能简单地把人分成两个明确的类别。金赛在从同性恋到异性恋之间提出了7个等级，根据欲望、行为和频繁程度确定各自的等级。但是，无论是怎样的标准，1994年的这一研究都说明，实际的同性恋人口要比金赛所估计的要少得多。



图表 4.4 美国的同性恋状况

资料来源：*Sex in America*：*A Definitive Survey* by Robert T. Michael, John H. Gagnon, Edward O. Laumann, and Gina Kolata (Boston：Little, Brown), 1994.

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

因为有70%的美国成年人把同性恋看作是不道德的，所以大部分人都不能接受把同性恋夫妇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同样正当可取的家庭模式。[38]只有35%的人同意承认同性恋者的"合法关系"，只有24%的人支持允许同性恋者收养子女的主张。[39]由于全部50个州都互相承认在其他州里确立的婚姻，夏威夷州在1997年对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对其他州都提出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很快有些州的立法者就提出议案，以防止对同性婚姻的互相承认。同样，在不同的州中，同性恋者在领养子女、获得监护权和探视权等方面所经历的困难程度也各有不同。法律上的障碍主要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即同性恋父母会向孩子"灌输"同样的生活方式，或是使孩子对自己的性别身份产生混乱和矛盾。研究者已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担忧。[40]

在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大多数的美国人（53%）称他们本人认识同性恋者（朋友、亲属或同事）。这比1985年有了显著的增加，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5%到30%左右的人认识同性恋者。值得注意的是，认识同性恋者的人更倾向于对同性恋权利持支持的态度，为73%；而在

不认识同性恋者的人中，只有55%的支持率。[41]而且，在所有的被调查者中，70%的人认为，社会应该给予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平等的工作机会。[42]

同性恋关系就像异性恋关系一样，表现出非常大的差异性。同样，社会的态度也有从宽容到不容的变化，其做法也有公平和歧视之分。尽管同性恋者、宗教和政治上的保守派采取极其不同的分析方法，但他们都同意，在同性恋问题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色　情

什么才是色情？就像其他许多被看成社会问题的领域一样，色情的定义也因地因时而变化。一些人把所有对性交或生殖器的口头的、书面的或可视的描述都称为是色情。但是历史上和史前的许多描绘生殖器或性交的器物，有时只是为了表达有关生命和生育的宗教情感，就像很多印度寺庙中常见的浅浮雕。这些例子使我们超越了有关道德与不道德问题的传统概念，或是保守与自由的态度，而认识到社会界定的重要意义。

正如总统委员会、最高法院的法官和许多其他人所意识到的，即使是在当代美国社会，要定义色情也是非常困难的。女性主义者凯特·米耶特提出，应将**性爱**（eroticism）（对性欲和爱的生动描写）和**色情**（pornography）（对造成人失去人性、堕落、虐待的野蛮性行为的描写）区分开来。[43]但是，即使这样的区分也会造成问题。例如，阿拉伯文化传统上就在文学中对性爱和色情有明确的区分，但在视觉艺术中却没有。因此，如果把受到高度评价的卡布·伊本·祖哈伊尔和哈桑·伊本·塔比特的情诗用视觉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阿拉伯人就会认为这是色情的。[44]

多年以来，法庭一直徒劳无益地试图给色情下一个能够被认可的定义。美国最高法院要么模糊地把淫秽（色情的法律术语）界定为“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用来满足“淫欲”的东西；要么就干脆拒绝加以界定，而把它授权给地方当局。即使如此，在1987年，最高法庭还是不得不澄清，法官和陪审团必须通过以“正常人”的观点评判其社会价值这种方式，来决定直接涉及性的材料是否合法。进而表明，那些极端放荡的或极端禁欲的观点都不能作为有效的标准。可是，什么样的人才是正常的人呢？因为这个问题实在难以回答，所以对于什么东西才算是色情，人们不能达成一致，而有关法规及其执行也因地区而不同。反对查禁色情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这样做违反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批评家则指出，第一修正



纽约时代广场周围曾经一度遍布各种色情电影和表演的巨型广告。尽管现在这种举动在此已被禁止，但类似的活动和地区又在其他城市出现。商业性的色情行业也在高速公路沿线开设店铺，或是经营盈利性的色情邮购活动。

案的全部目的，是为了保护那些不受欢迎的思想和表达形式不受被触怒了的多数派的迫害。

色情的受害者

色情不等于性爱——按照米耶特的观点——事实上它并不是关于性，而是通过性使妇女和儿童堕落。[45]通过使性行为非人化和使妇女物体化，大部分色情把女人描绘成唾手可得的性对象，她们渴望被占有和利用，即使最初拒绝也仍然享受性；此外还描绘她们被捆绑、遭侮辱、强奸、虐待、玷污和被剥夺人性的形象。苏珊·布朗米勒总结了许多妇女对这类色情描写的态度：

"当我们妇女看到色情描写时，大部分人都会感到恶心。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和我们的身体正在被剥得一丝不挂和扭曲。这只是为了满

足所谓‘男子气概’的荒谬目的，让他们通过把女人看成是可以使用、滥用、驯服和抛弃的无名者、玩物、成人玩具、非人的对象而获得兴奋和权力感。”[46]

在关于色情的争论中，有一个方面的错误并没有受到太多的争议，即在色情画册、电影和录像中使用儿童。没有人知道或者能够估计出究竟有多少儿童受到这样的对待。然而，在成人色情书店里充斥的有关儿童的东西，或是警察在搜查恋童癖者和儿童性集团成员的家时所查没的大量物品，都说明了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虽然儿童色情仅仅涉及到整个色情行业的一小部分，但它受到了来自公众的最严厉的谴责。

即使是主流的性描写，通常只是为成年观众描绘一些非暴力的成年女性裸体，也会把儿童放到有关性的照片中去。在对从 1953 年 12 月到 1984 年 12 月间出版的 373 期《花花公子》、184 期《阁楼》杂志和 126 期《赫斯特杂志》内容的分析中发现，一共包括了 6004 处有关儿童的性描写。其中近三分之二带有性或暴力，年龄主要都在 3 到 11 岁之间，女孩比男孩出现得更加普遍，往往是与成年男人联系在一起，在种族上几乎都是白种人。近 1000 个性场景是有关儿童与成人的，80%的儿童被毫无顾忌地用在各种场景中。所有的描绘都使儿童看起来没有受到伤害，或是在这种成人与儿童的性行为中有所收益。单从 1975 年到 1984 年，这 3 家杂志一共有 111 期对儿童、犯罪和暴力进行描绘。总而言之，在过去的 30 年里，这些杂志把成年女性的裸体同儿童、犯罪和暴力的形象等同起来，供给数以万计的青少年和成年读者。[47]

色情与暴力

在关于色情的争论中一个主要的论点，就是色情描写是否会刺激男人对妇女采取暴力。在 1970 年，尼克松总统属下的淫秽和色情调查委员会做出结论，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48]然而在 1986 年，司法部长爱德温·密斯的色情问题委员会则判定，暴力的色情描写“对性暴力有因果关系”。[49]

但是，在 1986 年的报告中被大量引证的爱德华·唐纳斯泰因和丹尼尔·林兹这两位社会科学家并不赞同报告的结论，认为报告的缺陷在于没有认识到，并非只有那些 X 级的东西才把女人描绘成乐意被男人占有的。事实上，社会还通过许多途径传播这种危险的形象。如唐纳斯泰因和林兹所说，“社会科学研究充分说明，最明显和最紧迫的危险，是我们社会中

所有的暴力题材的东西，无论有没有牵涉到性，都是把暴力指向妇女”。[50]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委员会会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呢？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很难确定究竟什么才是色情。两个委员会不同的成员组成以及15年来色情物品在内容上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在里根时代，保守势力和执法官员控制了后一个委员会，因而采取了较为传统的、倾向于家庭的价值标准；而在前一个委员会中主要是自由民权论者和自由主义者。而且，新技术制造出了并不太昂贵的家用摄像机和录像机，使得制作和观看色情影片更加简单，同时也产生了更多赤裸裸地描写性行为的污物。

自此，直接描绘性的物品一直急剧增长。根据《成人录像新闻》的统计，出租黄色录像带的数目从1985年的7500万上升到1996年的6.65亿。现在美国人每年将80多亿美元花在淫秽录像带、窥视表演、真人性表演、性用品、成人有线电视节目、计算机图片库、电话性服务和淫秽杂志之上，这要高出他们花在好莱坞电影或音乐磁带上的费用。同样，美国人花在脱衣舞俱乐部的钱也要高于花在百老汇戏剧、非百老汇戏剧和地区的、非盈利的剧院以及歌剧、芭蕾舞、爵士乐和古典音乐会上的支出的总和。

80年代末对主流家庭杂志《红书》进行的一项读者调查也许可以最好地说明色情文化在美国人中的泛滥程度，几乎一半的人称自己定期在家里私下观看色情影片。而且，今天许多从色情文化中赚取丰厚利润的企业已不再明显地与色情业有关。它们是一些家庭经营的录像商店、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之类的长途电讯公司、TCI和时代—华纳等有线电视公司，以及玛利奥特、希亚特和假日酒店等宾馆连锁企业，他们每年通过向客人提供成人电影获取亿万美元。[51]

色情业和国际互联网

国际互联网为色情业提供了一条简捷快速的途径。到90年代中期，万维网上约有1万个网址是不同形式的色情网站。[52]由于担心未成年人可能通过家用电脑轻易地接触到计算机淫秽物，家长、市民团体和立法者联合起来促使通过了“正当通讯法案”。法案于1996年颁布。它不仅禁止在儿童可能看到的网上散布淫秽或色情题材，而且还禁止有一切“下流的”言语或图像。禁令非常含糊，以致于有些艾滋病教育课程也在此之列。[53]但是很快，一个由互联网用户、电脑业团体和自由民权论者组成的联盟，以法案限制了计算机上的言论自由为理由对法案的宪法效力提出了质疑。

到1997年年中，最高法院对这一问题做出裁决之前，至少有17个州已经通过或是正在考虑立法加强对网络的控制。法院全票通过裁决，宣布

"正当通讯法案"违宪，认为在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应同书籍和报纸一样，受到第一修正案的最高保护。尽管最高法官们对保护儿童免受色情毒害的目标深表同情，但是他们还是裁定，"在一个民主社会鼓励言论自由"要比"审查制度的任何未被证实的益处"更加重要。[54]

其结果是，父母必须担负起监管责任，或是利用网络公司提供的家长控制选择权，或是利用一些安全过滤软件，以限制网络中充斥的色情。

国际间的色情比较

当然，互联网可以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进入网站。在计算机空间中，一个网站和观众之间不存在任何距离。从洛杉矶观看一幅储存在一台日本电脑里的图片，和观看储存在纽约或阿姆斯特丹的图片所花的时间完全一样。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观看到所有赤裸裸的描绘性的网址。电脑色情的普遍使得政府的限制手段几乎不可能，除非是在一些比较专制的国家，如新加坡和越南，它们通过对当地的互联网连接的基本设施加以控制，进行种种限制。[55]

在美国、大多数欧洲国家和以色列，直接描绘性的物品只在一些专门的成人商店才能购得。在对直接有关性的电影和印刷制品合法化的影响所做的长期跟踪研究发现，它并没有什么消极后果，甚至可能有一些积极意义。例如在丹麦，当这类物品变得极易获得以后，公众表现出对其日渐失去曾有的兴趣。[56]

卖　淫

卖淫（prostitution）是指出卖肉体换取金钱或物品的行为。它从有历史记载之日起就已存在，并在世界的几乎所有地方依然兴盛。今天在美国，大约有50万名娼妓从事这一行业，在全世界则有成百上千万。[57]大多数娼妓（或用她们自己的话说，是性工作者）是女性，但也有一些是男人。两者一般都是为男性客人提供服务。

在古代社会（埃及、希腊、罗马、中东和远东等），妓女受人尊敬并享有很高的地位。她们自由地出入于艺术界和政治社会的上层，也是寺院宗教仪式的一部分。然而今天，娼妓的社会地位极低，尽管有些高价应召女郎和娈童的地位显然要比妓院妓女或街头"野鸡"高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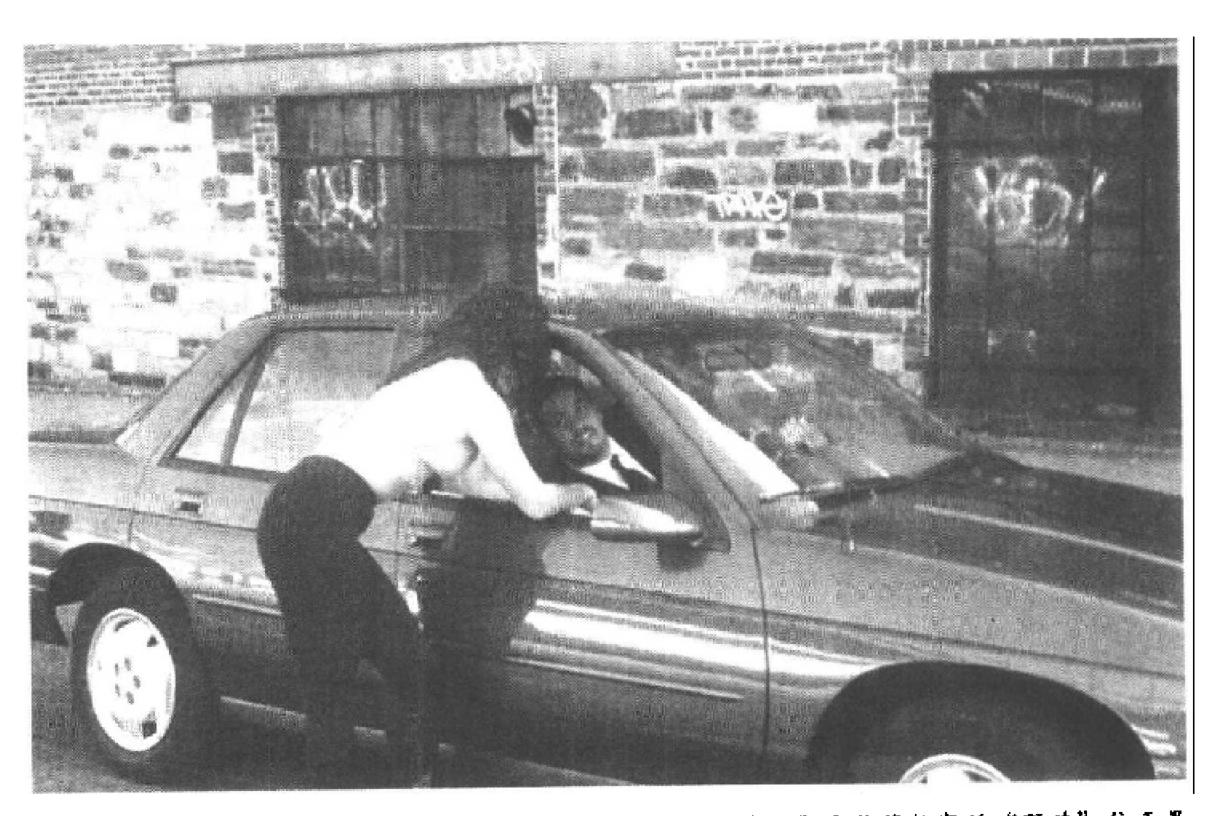
妓院是一个古老的机构，任何人只要看过那部叫做《去市政广场路上

的趣事》的关于古罗马的音乐喜剧就会知道这一点。今天，在内华达州及欧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还有合法的妓院。它们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且也同以前一样，不仅仅局限于异性之间。例如在18世纪的一个叫做“莫利”的男同性恋者俱乐部里，人们穿着女人的衣服聚会、饮酒、作乐。因此，同性恋的妓院又被称为“莫利馆”。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家同性恋妓院位于英国的一个度假胜地，由玛格丽特·克莱普经营，她又被称为“克莱普妈妈”。[58]她的名字今天成了一种性病的俚语名称。

妓女的性生涯

在美国，只有一小部分人是被迫卖淫的，可能不到全部性工作者的4%。社会学家感兴趣的主要有两个问题：[59]是什么社会因素促使那么多人从事这项为社会不耻和不容的职业？是怎样的社会进程使一个人逐渐变成职业娼妓的？

动机 谁会成为娼妓？为什么？虽然在任何变量和成为妓女的个人之



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可以充分地说明社会问题的顽固性。街头游荡拉客的“野鸡”位于最低层；妓院妓女地位中等；地位最高的是那些有着固定客人名单的应召女郎和娈童。在当今这个艾滋病和性病横行的时代，为什么卖淫会持续存在呢？

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在那些出卖自己肉体的人当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社会背景。

贫穷 艾琳娜·米勒在对街头“野鸡”进行实地调查后得出结论认为，贫穷是促使妇女卖淫的一个最重要因素。贫穷的妇女进入这一行业的可能要远大于富裕的妇女。[60]同样，T.M. 威廉姆斯和威廉·考恩布鲁姆也发现，在卖淫活动明目张胆的4个美国城市里，生活在贫困社区的年轻女子把业余时间的卖淫活动看成是一种赚钱买衣服和享乐的手段。[61]

幼时有被性虐待的经历 在妓女中，幼年受到过性虐待是第二个普遍存在的特征。研究者发现，在她们的被调查者中有一半在孩子时被强奸过，或是受到过其他的性伤害。这种经历可能会影响到受害人的自尊心，减少对把自己看成是一种“可出卖的商品”的抵抗力。[62]

社会孤独 另一个造成卖淫的因素是孤独。许多研究者确信，妓女通常都来自于一些破裂的或不健全的家庭。她们或是被父母所疏远或对父亲存在完全的敌意，或是感觉没有朋友、不被理解或是多余。[63]在对男妓的研究中也显示出类似的情况。许多人也在不稳定的或是领养家庭中受到身体或性虐待。此外，同性恋男妓常常因为他们的性倾向带来太多的争吵，而被迫离家出走或是被赶出家门。[64]

青少年行为不良 这也与卖淫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在调查中，卖淫者常常向研究者承认，在青少年时期，家庭和老师都把他们看成是“坏孩子”或是“惹麻烦的家伙”。参加少年团伙的经历使这种早期的不良标签刻骨铭心，更导致进一步的越轨举动。在30例对妓女的深入调查中，纳尼特·戴维斯发现，其中有23人在少年时都因为各种青少年行为不良的指控进过管教机构。在那里，她们接触到一些同狱的妓女，而其职业对这些女孩显得极富有吸引力。她们正对自己的身份而感到困惑，因而更易于接受一种新的角色。[65]

类别交往 在社会关系中倾向于某一类型的人——即类别交往——也有一定的影响。[66]潜在的卖淫者从朋友、亲属、其他卖淫者或皮条客那里了解到一种对卖淫的肯定态度，把它看成是一种“轻松赚钱”的手段，会促使她们进入这一行业。这种交往在将新手引入卖淫行业或介绍新的嫖客方面，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67]

吸毒 在街头的“野鸡”中，吸毒非常普遍。并不是所有的卖淫者都有毒瘾，但有许多都是为了买毒品的钱而从事卖淫的。一项研究发现，大约三分之二的男妓和十分之九的妓女在之前的一年，除了喝酒和吸烟之外还吸毒。[68]即使其中有些卖淫者只是偶尔吸毒，这么高的比例仍然说明，在她们中间存在的毒品问题要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严重得多。而且，通过

静脉注射的吸毒者易于感染艾滋病毒。在美国一些城市，20% ~ 40% 的妓女都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或是由于使用感染了的针头进行静脉注射，或是未采取保护措施就与带病毒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她们进一步传播疾病的危险也相当明显。[69]

那么，那些男性嫖客又怎么样呢？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去找妓女，而不是用社会所接受的方式寻找一个伴侣呢？分析发现有以下 6 个最常见的理由：不需商量的性关系、无须承担责任、满足性欲和变化的要求、一种交际方式、离家在外时的需要、不会遭到拒绝。[70]

沦为妓女的过程 成为一个职业卖淫者，并不单纯只是下定决心为了钱而不顾道德。从对狱中的妓女所做的调查中，纳尼特·戴维斯确定了沦为妓女的 3 个阶段：从随意的性行为经过一个过渡阶段，直到最后成为职业妓女。[71]戴维斯总结认为，这一发展中的关键一点在于，妇女将自我界定为不再受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束缚的人，而可以凭自己的意志自由行事。

第一个阶段是从随意性行为走向卖淫的第一步，通常发生在 15 到 20 岁之间，经常是在经过几年的随意性行为之后走向卖淫。这一步常常是从“随意寻找性伙伴”开始的，并且受到同伴之间期待早期性行为的影响，以期获得刺激和男性的注意。当从这种经历中获得的“乐趣”减退之后，动机就从冒险转向了赚钱。

在第二个过渡阶段中，个人通常把卖淫作为一种业余的活动，经济需要——可能还因为孤独或是受到皮条客的诱陷——是其动机。对自我的界定仍然主要维持在传统的观念中，因为个人与外界依然维持着直接的社会联系，可能包括职业和婚姻。在这个过渡期里，个人将确定他或她是否能够：(1) 接受满足各种客人的要求，其中包括一些似乎非常古怪的要求；(2) 学会适应警察的监视和诱捕的过程；(3) 应付那些不付钱的嫖客；(4) 用一种职业道德取代原先的动机。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完全适应这些条件，也许只能是一个业余的卖淫者。

第三个也是最后的阶段是接受一个职业卖淫者的身份。很小一部分性工作者仍然坚持他们的行为只是临时的，甚至极少的一些人还保留着家庭和孩子，并把这两种生活分开。但是大部分都完全改变到卖淫者的生活之中。

年轻和身体的吸引力是一个卖淫者的最大本钱。因此令人毫不吃惊的是，绝大部分卖淫者的年龄都在 17 岁到 24 岁之间，赚钱最多的时候是在 22 岁左右。[72]随着年轻美貌的衰退，卖淫者逐渐走下坡路。客人的减少迫使应召男孩或女郎开始直接拉客，而妓院妓女则转移到大街上去工作，街头的“野鸡”则通过降低收费来吸引嫖客光顾。

卖淫是一个社会问题吗?

根据一种社会观点，卖淫决不构成任何社会问题。它是两个你情我愿的成年人之间的私事，因此与社会和执法无关。而且，作为一种“没有受害者的犯罪”，它甚至不应该是非法的。[73]支持卖淫合法化（如在内华达州的部分地区以及德国和荷兰所做的那样）的观点声称，这种活动实际上可以减少其他社会问题的滋生。例如，不同于在国内的其他地区，非法卖淫活动造成了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在内华达州，由于州政府对有执照妓院的不断控制，使所有性工作者的检验均为阴性，从而防止了这种行为对健康的威胁。[74]此外，在非法卖淫活动猖獗的地区，各种惟利是图的皮条客和有组织的犯罪也非常猖獗。而在内华达州，没有发现合法卖淫与严重犯罪问题有关的迹象。

但是反对的意见则说，不道德的东西决不应该被合法化。非法的卖淫会传播犯罪和疾病。所有的卖淫活动——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会产生许多受害者：被剥削的儿童、青少年、男性和女性的成年人，被男性顾客用来作为性的玩物。根据这种观点，卖淫是一种使用权力和控制手段把人用作性对象的压迫性的系统，它使人降格、失去人性，把他们定义为仅仅满足他人快乐的工具而已。

国际间的卖淫比较

卖淫活动在全球蔓延，以致于很少有地方看不到它的存在。一些人是自愿选择成为妓女，但主要是贫困迫使她们开始这种生活。在过去6年里，受贫穷困扰的东欧妇女成百上千地移民到西方，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肉体维持生计。在曾经极为拘谨的东欧，现在街头的妓女和妓院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俄罗斯，女性的失业率达到了75%，因此数以千计的“娜塔莎”（这是她们通常的称呼）出国到以色列、日本、土耳其等国进行卖淫。甚至在中东地区，每个星期都有包机携带着有两周旅行签证的俄罗斯妇女来到迪拜等地，在那里辛勤地从事她们的生意，然后带着钱和礼物回家。[75]

在其他地方，许多更加不幸的妇女却要从事被迫的或并不迷人的卖淫生活：

> “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村，每年约有7000名青少年被人贩子卖到孟买的充满血汗的妓院。在巴西，估计有2.5万名女孩被强迫送到遥远

的亚马逊矿区进行卖淫。在意大利，大量的尼日利亚妓女充斥波洛尼亚的街头。而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红灯区里用霓虹灯装饰的橱窗里，都是穿着花边内衣的加纳女孩。在迈阿密一带，由古巴移民经营的按摩场所从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和加拿大等地进口妓女。[76]

并非只有东欧的妇女被吸引到西欧。在性俱乐部和妓院里还有来自拉美、亚洲和太平洋群岛的妇女，其中许多人是为了找合法的工作而受到性人口拐卖团伙的哄骗，最后沦为妓女的。有组织的性旅游团每年带着成百上千的德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和台湾人到泰国的妓院，而阿拉伯的性旅行者则涌到摩洛哥或印度的高等妓院。

有多少这样的妇女是生理虐待和经济剥削的牺牲品？几乎在所有的地方——从日本、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到比利时、捷克和西班牙，当局都公布有无数起皮条客和帮派团伙针对被骗妇女的暴力事件。1991 年举行的东南亚妇女组织大会估计，从 70 年代中期以来，有 3000 万妇女被拐卖为性奴隶。专家认为这一数字只是个估计，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一些西欧国家或是采取行动查处性人口贩子，或是在议会中讨论是否采取措施，或是如何进行打击。许多激进团体都希望，加强联合国的指导方针会有助于消除这一问题。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卖淫活动的繁荣继续在侮辱和剥削着数以万计的儿童和妇女。

猥亵儿童

除了利用儿童从事卖淫之外，其他的性掠夺者还通过性骚扰给儿童造成心理创伤。**猥亵儿童**（child molestation）是对儿童进行性虐待的法律术语，是指一个成人对一个未成年人进行暴露生殖器、抚弄、性交、口交或色情活动等性行为。

猥亵儿童已不再是一个被忽视的或隐性的虐待形式。它几乎贯穿所有的社会经济等级，尽管骚扰者主要为白人。[77]性罪犯有各种外形和身材，来自于社会各个部分，并且带有各种性倾向。许多儿童骚扰者在自己童年时都有过遭受性虐待的经历，而且受害人通常都认识罪犯。[78]

猥亵儿童的程度

在美国每年大约有 14 万起儿童猥亵案件被报案，但是未报案的事件

则要更多。因为孩子们常常害怕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别人。[79]1997年的一项对15岁及以上的加拿大人的研究显示，大约有八分之一的女性表示在儿童时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虐待，大部分都是来自非家庭成员。[80]心理学家吉姆·霍帕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估计，约三分之一的女孩在18岁前受到过性虐待，有四分之一是在14岁前，而大约六分之一的男孩在16岁前受到过性虐待。[81]在总结了14项美国和加拿大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后，安妮·萨尔特指出，女性受到性虐待的概率在11%～38%之间，男性在3%～11%之间。[82]在她的数字中，女孩的比例与其他的资料来源不相上下，但是男孩方面要低于霍帕的约17%。

无论准确的数字是多少，的确有大量儿童受到猥亵。在最近几年，对教练、老师、临时幼儿看护、日托工作者和神职人员的猥亵指控，极大地震惊了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爱尔兰和美国社会。凯瑟琳·贝克特——在对《时代》、《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和《人民杂志》的内容的分析中——确定，从1980年到1990年，所有被报告的儿童性伤害案件中33%来自于看护或日托工作者，22%来自于家庭成员。从1985年到1990年，临时幼儿看护和日托工作者猥亵儿童的案例一直维持在同等水平，但是牵涉到家庭成员的案件却骤升至55%。从1991年到1994年，没有临时幼儿看护或日托工作者猥亵儿童案件发生，而卷入家庭成员的案件也下降到39%，但是神职人员猥亵儿童的案件却突出地占了26%。[83]

对问题的对策

神职人员的性骚扰案件在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都有发生。这类案件尤其令人感到不安，因为犯罪者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他们的职业准则。虽然批评家曾经指出，过去教会当局常常忽视了这一问题，但希拉里·凯瑟还是注意到，美国现在通过积极和明晰的反应，有效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如支持团体对教会施加压力和为受害者找律师等。[84]万维网上有大量由激进和支持团体主办的网站，致力于与这种社会问题作斗争和帮助受害者。

一个有争议的关于减少儿童猥亵问题的计划牵涉到一项州法律的制定通过。它要求，当仍属危险分子的被释性罪犯住进一个街区时，必须通知当地的警察和居民。在新泽西和其他一些州，这项通告法被称为“梅根法”——得名于一个7岁的新泽西女孩。她在1994年被住在街对面的被释性罪犯强奸和杀害。1997年，一个联邦上诉法庭裁定，这一项法律符合宪法。反对意见声称，这项通告法侵犯了那些已经向社会偿还了罪责的

个人的权利。法庭以二比一的多数裁定，认为这只是为了提高"警惕以防可能再次发生的虐待行为"。直到最高法院在听取或拒绝原告的上诉之前，这一法律纠纷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与此同时，登记所有的性犯罪者和公开通知这些被归为危险分子的人的住址的做法，继续用于警示执法官员和周围邻居。在大约有800万人口的新泽西州，现在有近5000名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85]

社会学视角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常常是前面有些部分所进行的讨论的继续。

功能主义观点

一个世纪以来，功能主义对性行为的研究主要是在婚姻的背景下进行，因此他们把性表现界定为婚前、婚内或婚外。对性行为的社会控制是保护家庭所必须的，而家庭则是维护社会稳定所必须的。这种观点把越轨看作是一种社会无序的症状和社会道德、社会机制的崩溃。家庭是对下一代进行正当或不正当性教育的决定性根源。家庭的解体导致了角色关系的破坏，进而带来了越轨的性行为。例如，许多儿童性虐待事件都发生在重新组织的家庭中，暧昧的角色和不明确的界限产生了如继父猥亵继女的情况。

金斯利·戴维斯提出，卖淫是具有社会功能的。因为一方面，比起其他手工劳动，它为妓女提供了一个不太劳累又收入较佳的选择；另一方面，它又满足了许多离家的、太老或太不吸引人而无法获得性安慰或是想体验某些在家里不能满足的性行为的男人的性需要。[86]戴维斯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即使是在社会谴责卖淫不道德和堕落的同时，其存在却维护了道德体制。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不破坏家庭体系的性的排遣途径，而投入更多感情的婚外关系则对家庭体系造成更大破坏。

冲突论观点

在本章开头，我们讨论了所有社会是如何建立性行为准则的。从冲突论的角度来看，权力阶层将自己的价值标准强加到没有权力的人们之上，

从而把正当和不正当、道德和不道德、合法和不合法（例如，对同性恋行为）的行为标准制度化了。宗教建立了道德规范，它同家庭和教育等社会制度一道，把个人社会化为接受这些叙述和定义的人，认为这才是"正常的"。另一个强大的社会机构——媒体，也可以加强或削弱这些社会规范。通过把不符合传统规范的人交给公众加以指责，媒体的曝光促使他人由于害怕招致同样的窘迫和处罚而不敢采取类似的行动。而相反，通过传播煽动有关性的故事、电影和电视剧，媒体也能够鼓励一些与其他社会机制的宣传不一致的行为方式。

冲突论者认为，卖淫活动揭示了社会的权力关系。他们提出，值得注意的是，有那么多的女人向男人出卖自己，而很少有男人向女人卖淫。而且，男人（皮条客和嫖客）不断地以剥削妇女为代价从中获利，而妇女只有在还拥有年轻、美貌和健康时，她们才具有价值。此外，大多数妇女之所以沦为妓女，是因为她们低层的和劳动阶层的社会背景以及缺乏教育，使得她们的性能力成为其少量的经济资源之一。冲突论者还注意到，警察的打击和逮捕行动主要是针对大量妓女，而不是她们的"受人尊敬的"男嫖客。尽管在一些地方，男性嫖客现在也受到指控。

根据冲突论者的观点，卖淫是说明两性间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许多社会例证之一。在妇女获得平等的权利之前，我们只能期待卖淫现象不会进一步恶化。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冲突论分析的最后这一部分内容也补充了女性主义观点。

女性主义观点

过去的女性主义者——如评论家玛莉·沃尔斯通克拉弗特、政治活动家艾玛·戈德曼、妇女政权论者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和社会学家维多利亚·伍德赫尔都——指出，认识到妇女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是理解卖淫存在的根本。尽管今天有些女性主义者持亲卖淫的立场，认为这是性自由主义的一种"职业选择"，是妇女获得就业的一种形式，但是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主张，卖淫象征和固化了有害的父权制信仰和原则，它不仅有损于那些出卖肉体的妇女，而且还有损于我们社会中的全体女性。[87]

色情（在希腊语中这个词可以直译为"关于妓女的描写"）甚至比卖淫受到更激烈的谴责。苏珊·布朗米勒认为，黄色的色情作品"非但不是性自由的庆典"，而是"冷酷地利用女性的性行为，把所有这些行为、进而把所有的女性都'玷污'了"。[88]女性主义对色情问题的研究，常常集中在社会体系中的诸过程，其基本的动力是使妇女成为性的客体，作为维持

男性统治和女性屈从的手段。凯瑟琳·麦克金侬主张，色情就是这些情况发生的一种方式，它同时象征和实现了男人对女人所具有的社会权力。色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界定和强化了我们所知的“男性”和“女性”的性别特征。在把色情定义为“使妇女屈从的明确的性描写材料”之后，她把妇女的非人化置于一个女性屈从地位的连续统一体之中。这个统一体开始于在色情描写中从视觉上占有妇女，转移到在卖淫中从肉体上占有妇女，然后到强奸中的强迫性行为，直到最后的性谋杀。[89]（由于强奸是一种暴力犯罪，而不是一种性表达的方式，我们将在下面的关于犯罪和暴力的章节中进行讨论。）

在其著作《惟有言词》(1994年）一书中，麦克金侬强烈地批评了她所称的绝对主义观点，即认为色情属于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麦克金侬不同意色情是一种言论，指出它通过“无意识的原始心理调节”来交流想法。而即使把它看成是一种言论，也仍然应该把它置于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就像其他一些令人反感的表达方式因其内容受到监督一样。例如，“这里仅对白人服务”或是“如果和我睡觉，我就提拔你”这类说法。由于它们不仅被认为是一种言论，而且还是歧视和骚扰的行为，因此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没有人会认为它们值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也不会有人认为对它们的禁止，就会使我们接近乔治·奥威尔书中描写的专制极权主义的可怕梦魇。在这些例子中，消除种族歧视和性骚扰的社会利益要超出对言论自由权利的限制。

相互作用论观点

由于相互作用论强调日常生活中微观的社会相互关系，而不强调影响生活的宏观社会力量，因此其方法对深入认识那些性“越轨者”如何界定他们自身而不是对认识社会如何看待他们提供了帮助。性生涯和自我界定是两个有益的分析焦点。

性生涯 社会学家使用**生涯**（career）一词，指一个人生命中的一切连续的角色或活动。这一概念可以用来分析性行为的所有形式。如果一个年轻人有过一次同性恋行为（如果接受1994年全国性调查的研究成果，大约有7%的男性和4%的女性属于此列），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表示其同性恋生涯的开始。的确，1994年的研究发现，只有3%的男性和1%的女性在之前的12个月里有过同性恋性行为。

要开始这样一个性生涯，个人先得被贴上同性恋的标签，从而失去了异性恋的参照群体，被迫去寻找另一个参照群体——在这个例子中，就是

同性恋的亚文化群体。因此，给个人贴标签实际上引发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原先与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相一致的个人，由一次偶然的、孤立的越轨行为转向持续的越轨行为模式。他现在具有了不同的社会身份，并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准则和模式的亚文化群体之一员。和同性恋亚文化的认同直至最后加入同性恋亚文化群体，使个人开始了其同性恋的性生涯。

自我界定 在一个性的亚文化群体中，原先遭到污蔑的个人摈弃了他人对其持有的否定态度，创造了一种新的群体内的道德规范，以肯定他们作为平等的社会成员的存在价值，把他们的身份转变为一个积极可行的自我概念。妓女通常会形成一套自己的价值标准以加强其自我价值，轻蔑地认为那些“高尚的”的女人其实就是伪装了的妓女，以此来证明她们自身行为的社会价值。她们认为自己是诚实和值得尊敬的，嫖客则是虚伪的，而她们的工作也对婚姻关系和孤独受挫的男人有所帮助。[90]

有的时候，这一过程部分地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例如，通过对一份著名的女同性恋出版物《阶梯》中的文章和故事内容的分析，就显示了这样一个演进过程。在早期，《阶梯》倡导一种适应忍耐的态度，要求女同性恋者尽可能地适应其中，并且隐藏她们和异性恋妇女之间的外在区别。之后，《阶梯》逐渐从一份女同性恋期刊变成为一本公开支持女同性恋者的女性主义杂志。它把女同性恋行为界定为妇女在回应这个性别歧视的社会中所做出的一个明智选择。它主张，女同性恋行为是一项激进的政治声明，而不是一种把人分类和排斥的越轨行为。[91]

未来的选择

1932年，阿尔多斯·赫胥利在小说《勇敢的新世界》中运用文学想象，描绘了一个600年后的未来世界，在那里性行为（以及其他许多活动）明显地区别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准则。几十年后，赫胥利惊奇地发现，他的许多预见早已成为了现实。同样，社会预言家也运用目前的趋势来设想未来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有两幅迥然不同的情景。

悲观的前景

在2030年，社会严格地界定和设法控制性的表达方式。政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用来推行被“性违法者”尖刻地称为“三正确”的措施，

即同正确的人（你的配偶）、为了正确的理由（生孩子）、采取正确的姿势（“传教士式的姿势”）进行性行为。[92]但是尽管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手段，仍然有许多“性违法者”。经营妓院或出售淫秽制品的巨额利润使地下交易者可以轻易地向黑社会交付保护费，帮派间为了控制高利润的性行业而发生的冲突成为司空见惯的新闻。

这种性禁止的状况是如何发生的呢？学者在非法的“性广播网络”上提出，这一切都是开始于20世纪末，由于4种引起广泛关注的趋势汇集在一起，导致了压制性立法的极端反应。第一，性病的流行威胁到社会，也引起了对越来越多的人偏离“三正确性行为”的关注；第二，同性恋生活方式的公开出现，促使许多天主教徒和穆斯林成功地使反对歧视同性恋者的法令被废除；第三，政治和宗教领袖们以“性随意蔓延”为理由谴责未婚妈妈和单亲家庭数量的上升；第四，有线电视（包括互联网电视）把大量三级影片和其他色情内容带人家庭，使儿童可以轻易接触。因此，一个由不同团体组成的联盟被淫秽物品的狂轰乱炸所激怒，团结起来对“适合”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予以严格地控制。

在试图从法律上界定“正常的”和“可以接受的”性观念之时，许多群体就要求法律能够反映他们各自特殊的标准。最终，根据总统性规范状态委员会的建议，国会制定了一项法律，规定任何不符合“三正确”原则的行为都是变态的和反社会的。法律还禁止除了已婚夫妇之间为了生孩子之外而进行的一切性行为。根据禁酒法令中规定出售酒精也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先例，法律要求汽车旅馆、宾馆和其他的住所——甚至包括房东和房地产商——都必须在交易之前要求对方出示结婚证明。同时，家庭、教会、学校和青年组织把儿童和青少年社会化为这种性行为的思想模式。政府雇用的社会科学家把那些对其他性行为方式发生兴趣的人归类为患有“可纠正的心理性妄想”症。所有这些处于危险中的人都要强制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而坚持从事不被社会许可的性行为的人，则重被归为不可救药的越轨者和罪犯。

对性的禁令造成了许多潜在的后果。就像20年代的禁酒使得黑社会异常活跃和公开地藐视法律，对性的禁止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同性恋者只要可能，就对外部世界隐藏其真实的性身份，生活在一个秘密的同性恋者网络之中。尽管警察不断地进行搜捕和查没，非法生产避孕套、阴道隔膜和避孕药的活动还在继续。犯罪团伙通过贿赂腐败的政客和警察，还在经营妓院和为无数急切的顾客制造色情产品。由于社会从整体上并没有完全接受法律加诸于性表达的限制，一个在20世纪无法想像的巨大的性产业日益兴旺。支持这一行业的广泛基础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部分。一个象征

着“我们都是越轨者”这一地下格言的金丝弯成的“D”形标志，戴在数以万计的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那些有许多性伴侣和只有一个的人）的外衣翻领之下。由于有如此众多的人口被确认为越轨者，因此很难辨别究竟什么才是真正为社会所接受的。

乐观的前景

当2030年的年轻人在读历史的时候，总是惊讶地发现，20世纪的成年人把性表达等同于性行为，把它看成是人类活动中单独和孤立的一部分。他们吃惊的是，他们的祖先过分简单地把如此多的性表达形式称为“奇怪”和“越轨”的。性的多样化和越轨在那时已很难区别，在深深相爱的同性恋关系和不加节制地追求许多不知名的性伙伴之间，在对爱侣之间的性爱关系和对一个不情愿的受害者进行性征服的描绘之间，已经不再有什么区别。20世纪的社会把许多常见的性行为类型界定成超出了指导其他人际关系的规则。例如，供消遣的性行为无须认可他人的需要或价值观。在那时，追求个人的生理满足成了一种几乎绝望的搜寻，很少能够获得满足。

现在，支配所有关系的价值标准也决定着性行为。性表达的生理特性已变得毫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是否有益于伴侣的快乐。这种价值倾向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期。当时美国的长老派教会批准了“那些构成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性（性爱和性器官）表达，它为未来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前景，可以帮助治愈人们的恐惧、伤害和不安，让他们确信自己真正被爱的事实。这些是同耶稣基督所宣布的圣约相一致的行为”。[93]很快，其他的宗教组织也发表类似声明，都强调要采取“爱的关怀”作为标准。对性伙伴坦诚相待和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了解对方，变得非常重要。

由于认识到人类性表达的多样化，人们随即接受了它，并对其含义和场所予以重新界定。自由加责任的原则现在决定了人们的性行为，而带有感情的随意放纵是指导原则之一。尽管法律没有限制两个相互有意的成人之间的性行为，但今天道德和价值观的限制却要胜过20世纪。那些选择同性恋等另类生活方式的人们，也像异性恋者一样，接受了相同的人际关系准则，现在社会只把那些野蛮的同性恋和异性恋行为视为越轨。

男人和女人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也包括在性的表达方式上。女性主义者反对强奸的行动使人们认识到，原来把性社会化的一种模式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男人是性的主动者”综合症，它对男人和女人同样造成了伤害。现在，无论男人或是女人都可以成为性的主动者，

只要他们共有交流、快乐、友谊、爱情和彼此成长等目标。

随着把妇女看作是性对象的旧观念的消亡，作为促使对妇女使用暴力和剥削妇女的破坏性力量开始衰落。那些喜欢生动的性爱电影和书籍的人们，可以找到各种有关爱慕关系的描写。色情行业仍然存在，但其市场越来越小，主要是迎合那些认为武力和残酷能产生性欲的人。不过，社会把这部分人看作是一种病态。同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性关系中不止是为了寻求生理发泄，卖淫的市场也大大缩小了。

小　结

1. 文化规范改变着人们对性欲的表达方式，因为这些规范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产生极大的变化，"可被接受的"的人类性行为也各有差异。
2. 60年代在美国开始了整整20年的性解放实验，在此之前美国的性行为基本上较为保守。对健康的担心和缺乏个人满足导致了另一个转变。尽管现在大多数人开始性行为的年龄较早，而且婚前性行为已成为一种社会准则而非特例，但是人们通常都带着责任来寻求性关系，而不是随意地发生关系。
3. 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婚外恋。最近的研究显示，75%的丈夫和85%的妻子表示从未对配偶有过不忠。而且，超过90%的人称，在过去的一年里只和他们的配偶发生过性关系。
4. 安全性行为是近来对艾滋病和其他性病威胁所作出的反应。然而，五分之一的美国人都带有某种性传播疾病，许多人对此根本一无所知。
5. 1994年美国的一项研究确定，3%的男性和1%的女性是同性恋者。虽然公众对性差异的态度比以往要宽容得多，而且也有了反对歧视的法律，但是仍有70%的美国人认为同性恋不道德，只有35%的人赞同承认同性恋者的"合法关系"，而只有24%的人支持允许同性恋者收养儿童的主张。
6. 录像机和国际互联网等新技术造成了色情材料的明显增多。不同于性文学，色情文化不是有关性的，而且通过性贬低妇女和儿童。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在这些色情描写中存在的暴力倾向，是否影响到人们对妇女采取暴力行为。
7. 妓女共有的一般背景因素是贫穷、幼年性虐待、社会孤立、青少年行为不良、类别交往和吸毒。成为妓女有一个过渡过程和一个适应学习过程。卖淫是一种社会问题，还是没有受害者的犯罪？关于此问题存

在着激烈的争论。但在世界范围内，数以万计的人被迫从事这种职业，有些是在非常小的年龄。

8. 大多数猥亵儿童者都是白人，他们来自各种社会经济背景，有各种不同的性倾向。许多人自己童年时就有过遭受性虐待的经历，而且，通常受害者都认识罪犯。研究发现，约有11%～38%的男孩和3%～17%的女孩都曾是儿童性虐待的受害者。
9. 功能主义把越轨性行为看作是社会无序和社会制度崩溃的表征，而冲突论认为权力在描述和界定什么是"正常的"性关系中起着关键作用。女性主义认为卖淫和色情现象都根源于妇女在社会中的屈从地位。相互作用论有关标签论、性生涯和自我界定的概念为深入地认识卖淫和色情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关键词

生涯
猥亵儿童
便利抽样
类别交往
性爱
同性恐惧症
色情
卖淫
随机抽样
安全性行为
性传播疾病

推荐书目

Bart, Pauline B., and Eileen G. Morgen (ed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he Bloody Footprints*.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3. Anthology about social structure support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after the violence occurs.

Brownmiller, Susan,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New York: Bantam, 1975. Challenging presen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sexual violence and rape, and their roots in the male-female relationship.

Chauncey, George, *Gay in New York: Gender, Urban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Male World: 1890 - 194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A well-researched look at gay life in New York City before society built the closet.

Donnerstein, Edward; Daniel Linz; and Steven Penrod. *The Question of Pornography: Research Finding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 A good summary of recen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of pornography to attitudes and behavior.

Gagnon, John; Cathy Greenblat; and Michael Kimmel. *Human Sexualities*, 2d ed. Boston: Allyn & Bacon, 1995. Fine sociological overview of sexual expression and such issues as child sexual abuse, prostitution, and sexual identity.

Herdt, Gilbert H. *Same Sex, Different Cultures: Gays and Lesbians Across Cultur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A 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 of varying customs, norms, practices, and societal responses to homosexuality.

Johnston, Shawn Adair. "The Mind of the Molester." *Psychology Today* (February 1987): 60 - 63. Discussion of studies suggesting that child molesters associate sexual feelings with frustration and a sense of maladjustment and deviance, and that they see women as big, powerful, and threatening.

Karlen, Arno. *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 A New View*. New York: W. W. Norton, 1971. Offers a total compendium of sexual behaviors through the ages and morals and attitudes that have tried to categorize and control th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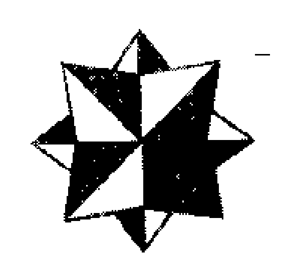
Kimmel, Michael S. *Men Confront Pornography*. New York: Crown, 1990. An informative, insightful book that includes material abou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pornography on masculine identity and sexual fulfillment.

Laumann, Edward; Robert Michael; Stuart Michaels; and John Gagn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An extensive study of sexuality based on a probability sample.

Michael, Robert T.; John H. Gagnon; Edward O. Laumann; and Gina Kolata. *Sex in America; A Definitive Survey*. Boston: Little, Brown, 1994. A readable book on the most thorough national survey ever conducted of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gal, Lynne, and Mary McIntosh (eds.). *Sex Exposed: Sexuality and the Pornography Debate*.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3.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on the value of eroticism and the danger of pornography for men and women.

第5章 犯罪和暴力



关于犯罪的几点事实

- 在美国，平均每两秒钟就发生一起严重的犯罪行为。
- 不足半数的暴力犯罪和不到五分之一的财产犯罪的罪犯最后会被捕。
- 几乎一半的美国人害怕晚上走在所居住的街区。
- 黑人青年男性死于谋杀的可能性是白人青年男性的8倍。
- 美国强奸案的比例是排在第二位的瑞典的3倍。
- 有组织的犯罪每年可以获得2260亿美元的收入。
- 雇员盗窃每年使零售业损失超过400亿美元。
- 在美国，囚犯人数现在已超过120万，为全世界最多。

社会把所有的犯罪都界定为越轨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越轨行为都是犯罪。犯罪是一个法律范畴，而法律是在不断改变的——它不断地增加新的犯罪名目，减除旧的犯罪名目。现在你可以自由做的事情，在过去或未来可能就是一种犯罪行为。随着社会中掌握权力和影响的群体的变化，法律也常常发生改变。例如，现在有些团体试图使某些毒品合法化，也确实有一些州修改了他们的毒品法。这似乎反映了社会的成熟，但你可曾想到可乐饮料的“生命”曾经是来自于可卡因。近年来，合法饮酒年龄被提高到21岁，这似乎表明社会对酒精的态度变得严厉，但回忆一下就会想到，美国宪法的第十八修正案甚至曾把饮用任何酒精饮料都定为一种犯罪。

犯罪、法律和起诉

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法律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控制方式包括三个基本层次：明确的行为规范、维持规范的处罚措施、特定的官员解释和执行规范。[1] 这些正式规定的措施是为了保证每个人都能被公平地对待。如

果违犯了一项规定，由违法的性质而不是违法者的身份来决定惩罚。但是在实际情况中，权力集团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在对应该执行哪些法律及哪些违法者应被逮捕的问题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一些特例外，在法官对违反同一条规定的不同案例进行处罚时，法律在处罚的严厉程度上还为他保留了相当大的**司法酌处权**（judicial discretion）。

社会的法律和准则

对犯罪的研究常常假定，刑法准确地反映了几乎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准则。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并不总是如此。尽管带有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许多相异的群体不得不生活在一起。因此，许多人怀有的价值观没有反映在法律之中，而许多法律也与一些人珍视的价值观相冲突。

例如，第一代美国人常常会发现，他们的一些文化信仰和行为触犯了美国的法律。最近在新闻中出现的例子有：一些非洲和中东移民用手术除去青年妇女阴蒂的习俗，拉美裔人在业余时间举行的斗鸡比赛，在一些加勒比宗教中使用动物作为牺牲，以及阿拉伯和吉普赛人在未成年人与成人之间结亲的习俗。一个更老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第十八修正案，违反它的人要比遵守的人还多。在14年后（1933年），第二十一修正案废除了它。

执法的差异

法律的存在并不就能保证可以把违法者定为罪犯。只有在一个行为被定为犯罪时，它才是犯罪。在许多州，大部分赌博形式都是违法的。例如，假如你每个星期组织一次纸牌游戏，参加者用真钱赌博，而赢家可以保留他的所得，那你就是在违法。是否因此就要被逮捕和受到起诉？这要视情形而定。你是否属于中产阶级，并且在社区小有声望？其他的玩家是否也和你一样？你是否有场所可以“私下”玩牌，避开他人的目光？如果是这样，你不大可能因从事一项犯罪活动而受到指控。但要是组织同样游戏的是个“街头小子”，并且在一个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你可能很快就会被捕。

逮捕模式的差异是社会的一大问题。警察在决定是否进行逮捕时的**警察酌处权**（police discretion）常常反映了社会的偏见，从而导致歧视性的行为或是优先的待遇。研究显示，警察在贫穷的街区比在中产阶级街区更

可能采取逮捕行动。[2]或是如威廉·莱恩曾经说过的："如果你居住在一个黑人贫民区，那在未来的12个月里，你被逮捕的概率约在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左右。"[3]而很有可能一个富有的白种人如触犯同样的法律，也许根本就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在警察逮捕之后，检察官必须决定是否要撤消案件、减轻指控，或提出起诉、请求宣判。对所有的违反者提出指控将使法庭不堪重负，也会很快地耗尽仅有的财政预算。所以**起诉酌处权**（prosecutorial discretioll）可以使当局合理地分配有限的资源，以便最好地服务于社会。另一种造成执法差异的原因是，有钱的被告可以聘请律师积极地为其解决问题，而穷人只能得到公共律师。他们常常因有许多案件等待处理而建议采取**认罪辩诉协议**（pleabargain）——对一个较轻的指控认罪，从而尽快地解决审判过程。

测算犯罪的程度

准确的犯罪统计对测算犯罪率的变化和防范措施的有效性都非常重要，它同时对评价犯罪原因的可应用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在美国，这一资料的主要来源是两份年度报告：《统一犯罪报告》和《全国犯罪受害调查》。

犯罪指数和《统一犯罪报告》

《统一犯罪报告》（*The Uniform Crime Report*）作为一项一般标准，被用于地方、县和州的执法机构对违法行为进行界定和制表，然后上报到联邦调查局。《统一犯罪报告》集中于那些可能引起警方注意的最频繁最严重的犯罪，对8种犯罪行为制定了一个**犯罪指数**（crime index）。它们又可以概括为两类：人身犯罪（谋杀、强奸、恶意攻击、抢劫）和财产犯罪（入室盗窃、扒窃、盗窃汽车、纵火）。如图表5.1所示，1995年属于犯罪指数之列的犯罪为平均每2秒钟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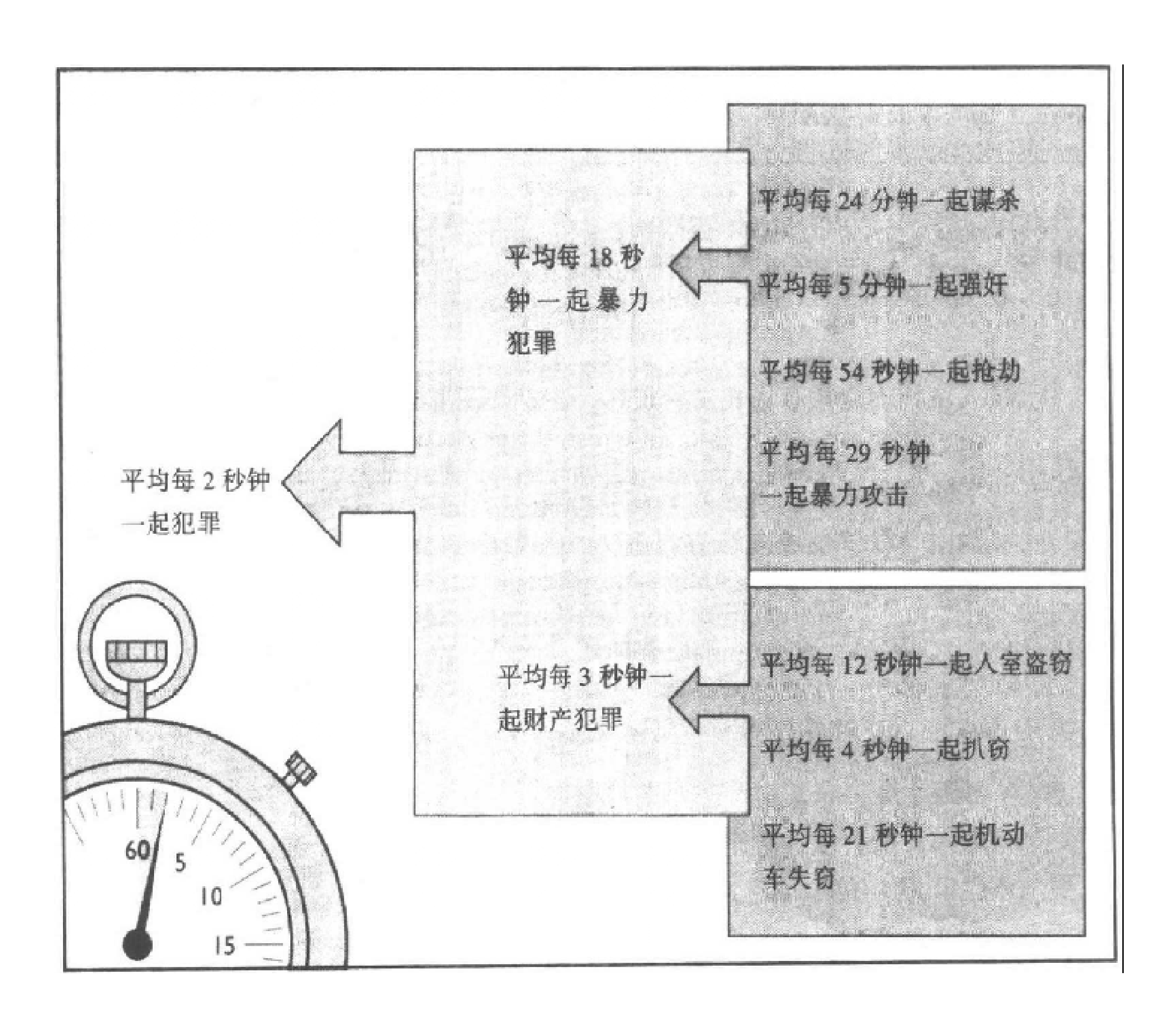
根据汇集而来的数据，《统一犯罪报告》将该年的各类犯罪制成表格，从而为对不同的年份进行比较提供了一个基础。另一个重要的统计数字是**犯罪率**（crime rate）（每10万人中的犯罪数量）。这可以用来对不同城市和地区发生犯罪的频繁程度进行比较。

批评家——尤其是冲突论者——指责说，《统一犯罪报告》忽视了白领阶层的犯罪、法人团体的犯罪行为和有组织的犯罪。所有这些都对社会

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每年的损失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4] 如果把注意力局限在那些通常由贫穷的少数群体所干的街头犯罪之上，就会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犯罪行为似乎主要囿于这一部分人口中。而且，《统一犯罪报告》只记录那些向警方报案的犯罪行为，而正如《全国犯罪受害调查》的惊人结果所阐明的，受害者并不是都会向警方报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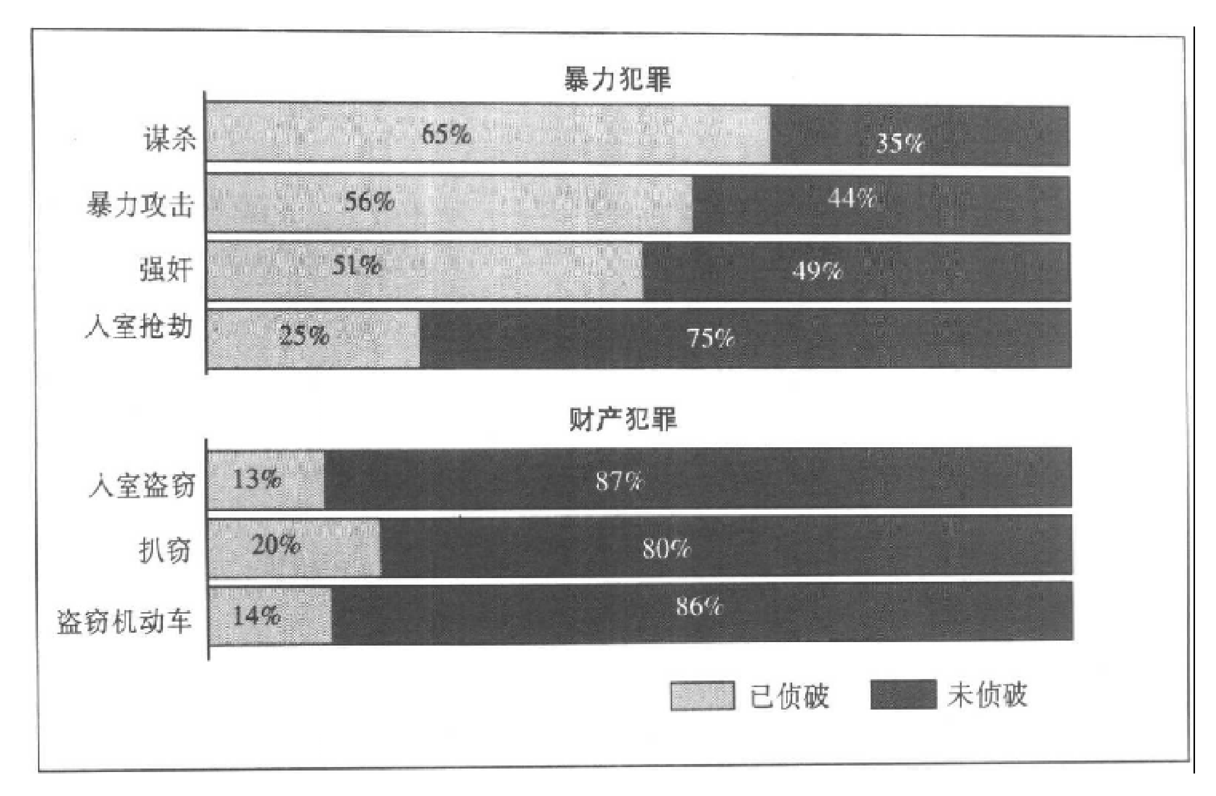
受害者和《全国犯罪受害调查》

《全国犯罪受害调查》（*The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开始于1972年。它在《统一犯罪报告》所提供的官方统计数字之外，提出了一个颇有启发作用的选择。通过采访全国5.6万个家庭里12岁以上的12万



图表5.1　犯罪钟：1995年

资料来源：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 *Uniform Crime Report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图表 5.2 经逮捕侦破的案件：1995 年

资料来源：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form Crime Reports*, Washington, D. C.: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1996, Table 4.19, p.396.

人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抽样，政府的研究人员了解到了更多的没有报案的犯罪和受害者。《统一犯罪报告》和《全国犯罪受害调查》两者统计数字的鲜明对比，明确显示犯罪的报案率较低。例如，1994 年全部犯罪行为中只有 36%曾向警方报案。这个数字细分则为，暴力犯罪的报案率为 42%，财产犯罪的报案率仅为 34%。[5]

很明显，64%的犯罪未报警意味着，在这些案子中没有警方的调查，没有备案，没有起诉。由于在所有报案了的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中，分别只有 45%和 18%导致了逮捕，[6] 因此，最后只有五分之一的暴力犯罪案件和五十分之三的财产犯罪案件中的嫌疑犯受到了指控。这些统计数字很难令人对社会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能力产生信心。另一个让人失望的统计数字是警方的破案比例（参见图表 5.2）。警方的调查人员无法侦破大部分的财产犯罪以及许多暴力犯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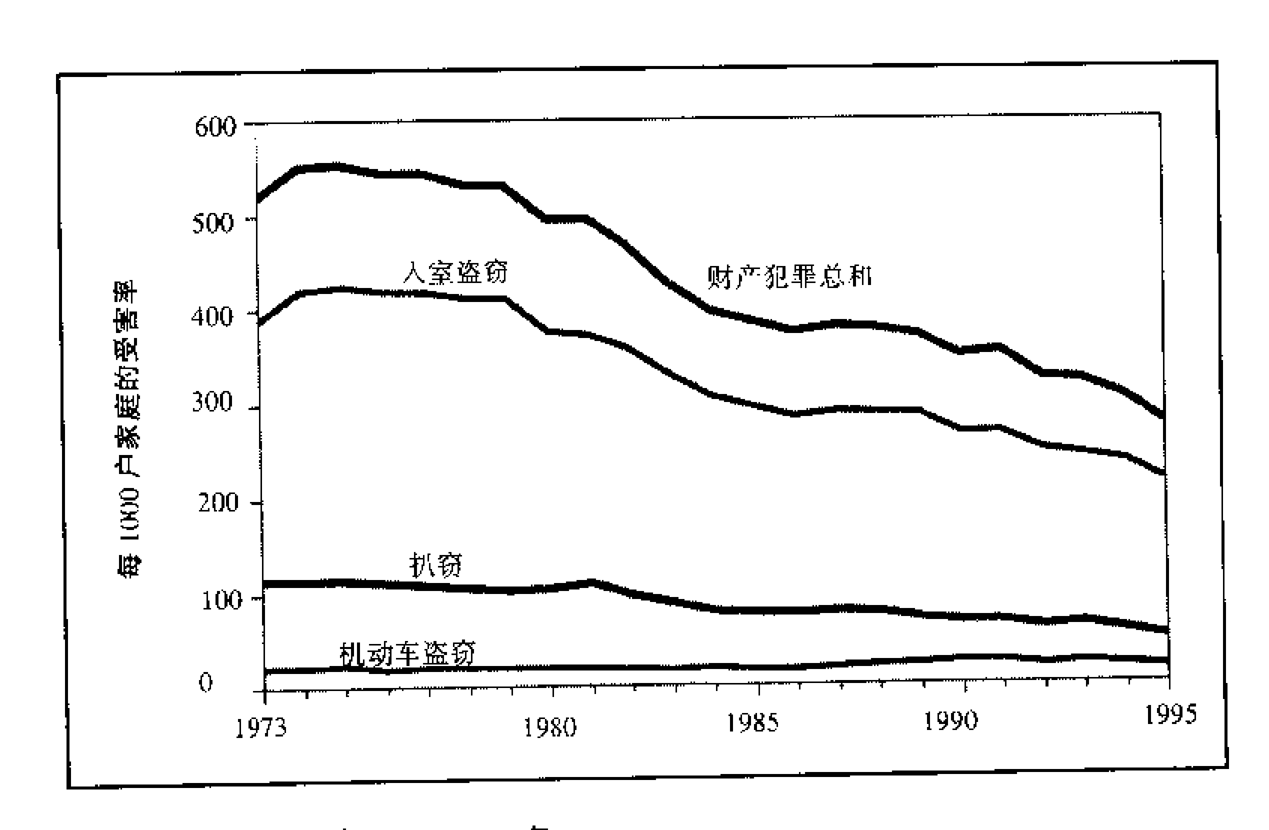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犯罪行为都被报了警？可能罪犯是一个朋友或亲属，受害者不想造成任何伤害或麻烦，或是受害者觉得犯罪（如敲诈或强奸）会有潜在的麻烦。其他的人可能担心受到报复，或者罪行较小报警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一些情况中会产生一种“有什么用”的态度，对能

否将罪犯绳之以法不抱希望。而在另外的情况中，公众普遍地反对执行某些法律，如未成年人饮酒、赌博或贩毒。最后，受害者可能不愿意与警察发生关系，要么是因为以前受到过警察不公平或粗暴的对待，要么是害怕自己本身的违法行为会被揭露。这是由于那些超出法律之外行事的人经常会互相伤害。

实际上犯罪有多少？ 财产犯罪几乎占了全部犯罪的四分之三，图表5.3显示，从1973年到1995年间美国的受害家庭一直在稳步下降。官方把整个家庭而不是个人作为财产犯罪的受害者，并以此计算财产犯罪率。这些犯罪行为包括每年2400万起偷窃，550万起入室盗窃和约200万起机动车盗窃。[7] 每年有四分之一的家庭成为它的受害者。

专家们从新闻报道中得到鼓励，暴力犯罪率在1986年到1991年间上升了15%之后，在90年代中期有了明显的下降。然而，与新闻报道中关于杀人犯罪率降到了8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陌生人或不认识的人进行的谋杀案件增加了55%。暴力犯罪中包括每年约660万起普通的攻击、250万起恶意攻击、130万起抢劫和43万起强奸和其他性骚扰。

青少年成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是25到49岁成年人的两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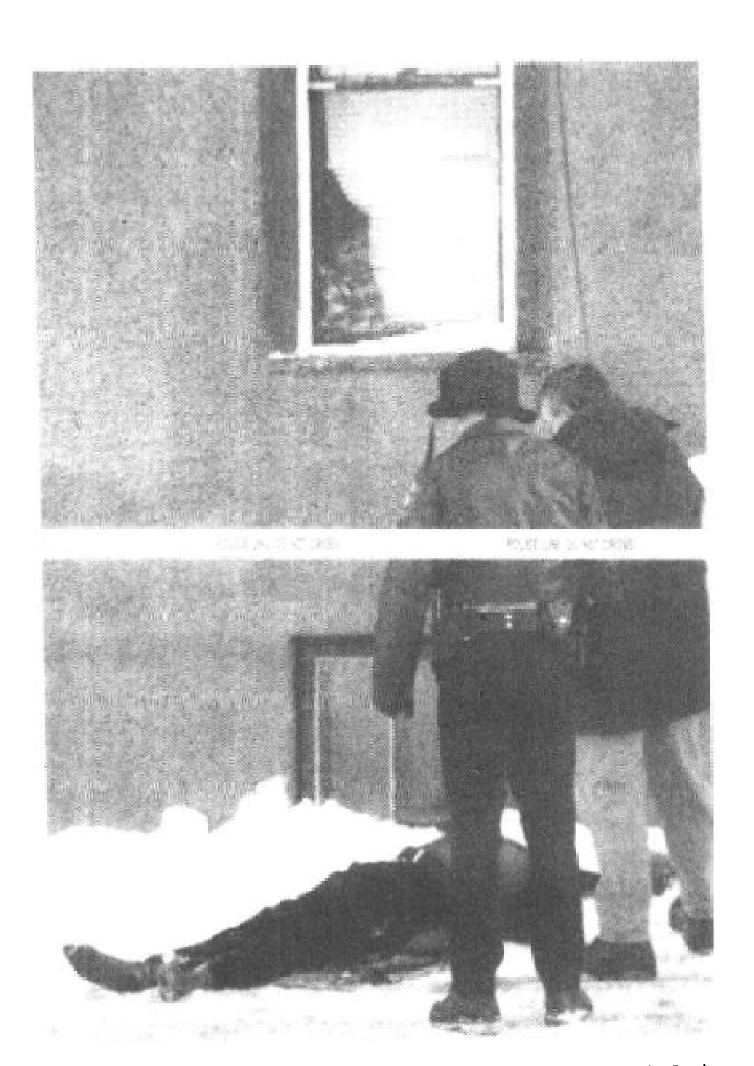
图表5.3 财产犯罪比率：1973～1995年

资料来源：*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1996.

约是50岁以上的人们的11倍。大多数受到暴力犯罪伤害的都是青年、黑人、男人和穷人。在1994年，九分之一的12到15岁青少年是暴力犯罪的受害者，黑人为十六分之一（相对于白人的二十分之一），男性为十七分之一（相对于女性的二十四分之一）。家庭收入每年不足1.5万美元的人比起收入较高的人被强奸或性骚扰的可能是3倍，遭抢劫的可能几乎是两倍，遭到恶意攻击的可能为1.5倍。

暴力行为在美国

美国人对暴力行为采取自相矛盾的态度。我们谴责暴力犯罪，不愿参



在我们这个社会，人们最害怕的就是成为偶发的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包括上图中所示的许多无辜者因此而不幸伤亡。由于可以轻易获得手枪和自动武器以及枪支暴力的严重影响，人们提出控制枪支的提议，但遭到了全国步枪协会的强烈反对。

加战争，认为在所有的情况中暴力的手段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然而我们却涌进电影院，看那些由克劳德·凡·丹姆、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科林·伊斯特伍德、布鲁斯·威利斯和成龙扮演的男主角，以法律的名义对着罪犯开枪射击、拳打脚踢、拷打折磨和扔炸弹。这些电影通常都利润巨大，所以人们肯定对此非常有兴趣，即使里面没有什么令人崇拜的英雄。这种对暴力着迷和恐惧的矛盾，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历史。

社会历史背景中的暴力

治安维持（vigilantism）即运用暴力手段来保护社区的价值标准占了美国历史的很大一部分。从1767年到1900年左右，法外（不受法律保护）的治安维持活动几乎是美国人生活的一个固定部分。[8] 治安团体远远不只是西部边疆城镇有名的施私刑的暴徒，或是南方的“三K党”。治安裁决的行为在东西部同样普遍，在许多新的聚居区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和秩序，因而被看作是正当的。由于缺少一个有序稳定的社会结构（教会、学校、凝聚的社区及有效的法律和治安体系），市民团体就会联合在一起，创建或保护他们认为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 治安维持会围捕那些没用的人和歹徒，然后是加以鞭打、驱逐或是杀害，不仅解决了混乱问题，而且还有极为重要的象征价值。治安维持行动是对那些目无法纪的居民发出的一个明显警告，新的定居点不会为腐蚀已经确立起来的文明价值标准提供任何机会。[9]

但是，无辜的人们常常会受到以维护社区价值标准为名的野蛮和丑恶的对待。在一开始，暴力的治安维持可能是对缺少法律体系进行社会控制的惟一有效对策，但它很容易转变成一种被任何有权力的集团所控制的恐怖的统治形式。如果要证据的话，只要看看俄克拉荷马城的爆炸事件或是那些极端主义军事团体所干的暴行。他们以所谓“美国人”的价值观为名，却采取完全为我们社会的大部分人所拒绝的手段。

最近的社会暴力形式 一个日益普遍的暴力行为是**公路狂暴**（road rage）。这是指一个不耐烦或恼怒司机在发生某种交通碰撞后，试图胁迫、伤害、甚至杀害他人的侵犯性驾车行为。1997年，美国汽车协会对最为过激的公路狂暴行为的一份报告发现，这类事件从1990年至今增加了51%。在37%的此类案件中，罪犯对其他司机使用火器，另外28%使用其他的武器，35%使用他们的汽车。美国交通部估计，在三分之二的交通事故伤亡中，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侵犯性的驾车行为。美国汽车协会

认为，狂暴司机每年要造成1.2万起伤害。公路狂暴还可以表现为愤怒的手势、跟车、切断汽车退路、紧急刹车、碰撞等。随着公路越来越拥挤，公路狂暴日渐普遍，包括特拉华、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在内的许多州，都开始采取针对这些司机的特殊的高速公路巡逻措施。[10]

另一个威胁来自于**民兵组织**（citizens' militias）。这种准军事性团体虽然不承认任何法律或权威，但却表示它们遵从宪法。这一运动发端于80年代，是极端右翼观点的一种反应。它认为腐败的联邦政府将很快试图没收有自由思想的爱国者手中的武器。1992年在卢比山和1993年在瓦科发生的与政府武装人员的冲突和无辜群众的死亡事件，给予这个新兴的运动极大的力量和信心。不久，布雷迪法案（要求枪支所有者登记他们拥有的火器）和攻击性武器禁令的通过，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民兵组织的领导人积极地煽动追随者的偏执情绪，声称即将开始的没收武器的行动仅仅是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大同政府或“新世界秩序”到来的一个序幕。

他们避开主流的传媒，通过枪支展览、时事通讯、电脑公告牌、国际互联网、传真机和短波广播推广其运动。俄克拉荷马城爆炸事件后媒体的宣传使这一运动更为可见，并吸引了更多的带有相似信仰的人。因此到1996年中期，在全部50个州都有民兵组织存在。[11]

这类团体的存在，意味着使用粗暴的武力而不是靠以理服人来实现目标。尽管大部分民兵团体都表示完全是为了防卫的目的，但他们却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偏执情绪，这会导致他们想像，即使对自身不正当的行为，他们也会认为是正当的。有时只是少数激进分子才会选择暴力手段。比如1997年7月4日，7名阴谋者在准备袭击得克萨斯州霍德堡的军事设施之前，被警方逮捕。然而，多数的这类组织都在为随时可能发生的与政府的冲突而积蓄武器装备，最终将导致极端的暴力行为。

暴力犯罪

在报警犯罪案件中只有八分之一是暴力犯罪，但在普通市民眼中，很少有事情比成为一个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更加可怕。对被抢劫、攻击、强奸或谋杀的恐惧，是几乎所有的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从1986年到1993年期间，随着暴力犯罪率在美国的升高，公众的恐惧之心也在日益增加。1991年，平均每天有15个年轻人死于枪杀，极大地加重了家长和青年人的忧虑。1993年由《今日美国》、美国有线新闻网和盖洛普民意测验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担心会成为谋杀受害者的人数几乎是谋杀率最高的

1981年的两倍。[12]女性比男性更担心成为各种形式犯罪的受害者，致使研究者认为，妇女对性攻击的担忧加重了她们对其他犯罪形式的恐惧。[13]

根据1994年的一次"全面社会调查"，47%的美国人害怕夜里在自己生活的街区独自行走。[14]而在其他国家，1996年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有同样的担心；[15]而199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英国，对犯罪的恐惧是公众最为关心的事情。[16]

大众传媒对人的影响也许不尽相同，但它对犯罪的大量报道似乎确实影响到公众普遍的认识和态度。[17]例如，1994年《洛杉矶时报》对读者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发现，只有21%的人表示，形成他们对犯罪的态度直接来源于亲身的经历，而61%的人的态度则是来自于媒体。[18]

暴力犯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犯罪率在90年代中期有所下降，尤其是1994年到1995年间。这是1972年《全国犯罪受害调查》开始以来所记录的最显著的一次下降。[19]

然而单纯数字的减少并不能说明问题已经被克服，也不等于这一趋势必然就会继续下去。在本书的其他章节，我们将会讨论家庭暴力和仇视犯罪。但接下来，我们将直接把注意力放到两个标志性的暴力犯罪行为：杀人和强奸。

杀　人

尽管有些杀人犯有过犯罪前科，但大多数都没有。而且，杀人犯并不是一眼就能辨认出来，对他们的行为也常常不能简单地加以解释。但是在我们对美国的分析中，还是可以使用某些地理和社会上的模式。[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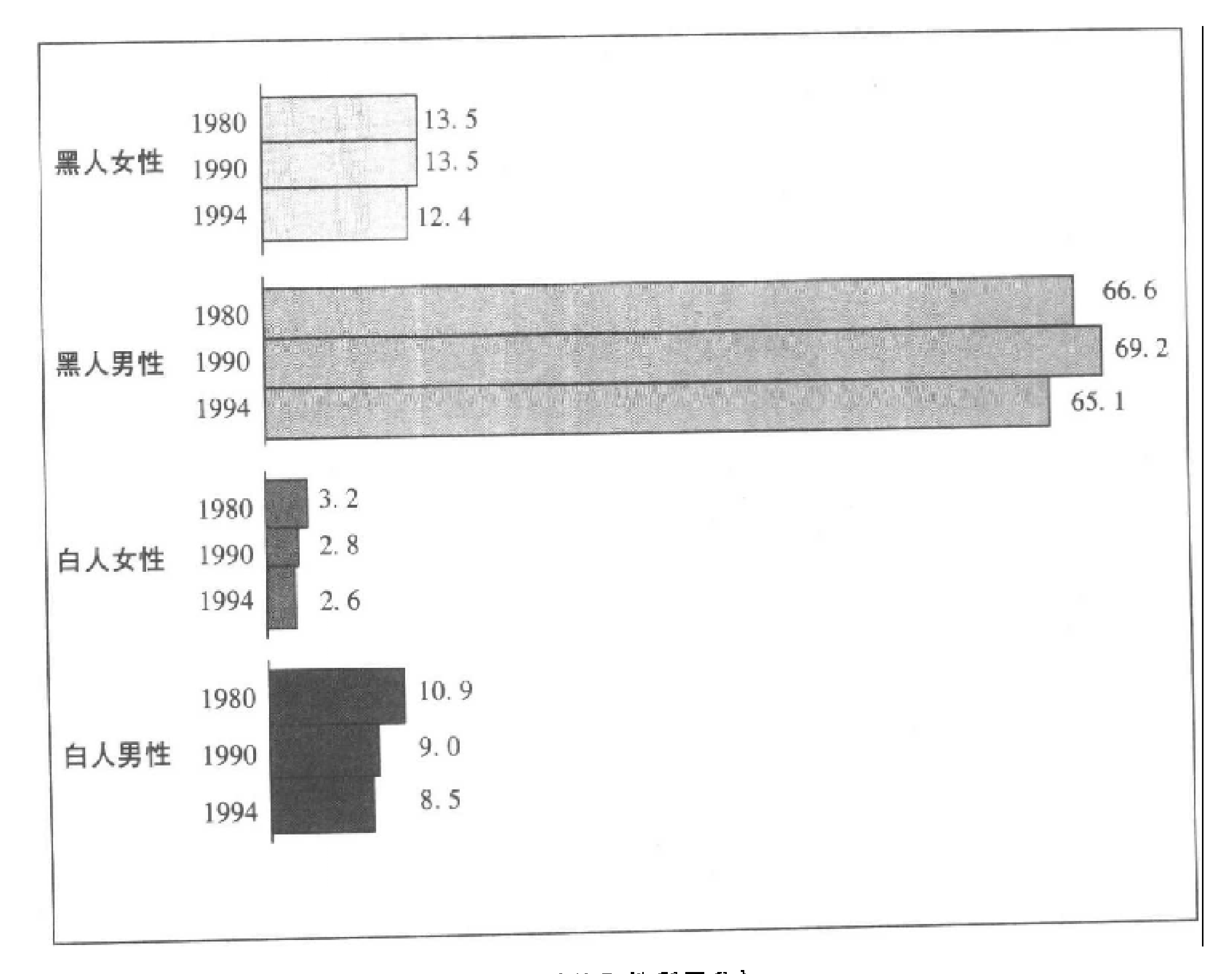
人口的地理统计　比起全国其他地区，在南部谋杀发生较多，而东北部较少。总体而言，南部和西部占有美国56%的人口，却占了全部谋杀的65%。是什么原因使得带有广阔乡村的南部和西部更容易导致杀人事件呢？答案可能在于，这两个地区在文化和历史上对拥有武器和私刑执法较为宽容。与此相联系，十分之七的杀人案件牵涉到火器，但管制枪支的倡议却在南部和西部受到严重的阻力。每当限制议案被提出后，就会有全国步枪协会和许多个人出来反对。

尽管大城市的杀人率是小城市和郊区的两倍，但这些谋杀一般都发生在大城市的某些特定区域。事实上，大多数城市街区同郊区一样安全。1995年，当小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都出现暴力犯罪减少的时候，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下降甚至更加显著，谋杀率平均降低了13%。

人口的社会统计　大多数杀人犯是不满25岁的男子，而大多数被害

者都是不满35岁的男子。18岁以上的男性占了全部杀人犯的85%和全部谋杀被害者的77%。十有八九，凶手和受害人属于同一种族。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是男性？这是因为男性更有可能为了打猎、军事目的或自卫而使用枪支（最为常见的杀人武器），他们的社会角色也更倾向于暴力行为。

关于凶手和被害人关系的统计更能说明问题。26%的女性被害人死于丈夫或男友之手，而同时只有3%的男性受害人是被妻子或女友所杀。而且杀人常常与饮酒、消沉、受挫或愤怒等有联系。1995年对全美最大的75个都市郊县的地方法院处理的谋杀案所进行的一项详细调查，为我们认识家庭杀人事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在全国总共3000多个县级区划中，前一年全国发生的谋杀案中有超过50%发生在这75个都市县。在那些杀害了家庭成员的凶手中，7%谋杀的是配偶：其中41%是妻子杀丈夫，59%是丈夫杀妻子。凶手的年龄从18岁一直到87岁，平均为39岁。而在全部12岁以下儿童被杀案中，57%是父母所为。[21]



图表5.4 每10万人中的被他杀率（根据种族和性别区分）

资料来源：U.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如图表5.4所示，年轻的黑人女性死于暴力的可能是白人女性的5倍，年轻的黑人男性被谋杀的可能是白人男子的8倍。正如为疾病防治中心从事研究的一位研究者所说："在全国的许多地区，现在一个15到24岁的黑人男子死于他杀的可能性，要比一名美国士兵在越南战死的可能性还要大。"[22]

几乎三分之一的谋杀是因为争论，或是在两个互相熟识的人之间，或是在偶然发生争吵的陌生人之间。攻击者和受害者一般都是男性，而饮酒常常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另外五分之一的谋杀是由于其他犯罪行为伴随而来的非预谋行为，如在抢劫和纵火时造成的人员伤亡。

死刑 近年来，对死刑的怀疑在美国越来越强烈。1995年一共执行了56例死刑，是1960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在这56个人中，33名是白人，22名黑人，还有一个是亚裔。[23]过去10年来进行的无数次民意测验都显示，超过70%的美国人赞成死刑。[24]有些人认为死刑是对未来犯罪行为的一种威慑，但现有的资料却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在处死刑相对较多的州，谋杀率却始终居高不下。[25]另一个论点是"治疗复仇"，即死刑可以平息受害者亲人的愤怒和悲伤，使其尽快恢复内心的平静和结束悲剧。但反对死刑的人认为，这种个人的报复过于野蛮，正义应该遵照法律和客观事实而不是感情来实施。而支持者则坚持认为，通过死刑提供心灵安慰是一种合法和有力的补偿方式。[26]

强　　奸

一些人错误地把强奸归为一种情欲犯罪。其实不是。强奸是一种以愤怒、挫折、权力欲或是其他复杂的社会心理失调为基础的攻击性犯罪行为。和其他暴力犯罪一样，攻击者常常不是一个陌生人。而且，强奸犯和被害人在生活中一般属于同一种族、街区和同样的社会地位（参见专栏5.1）。

长期以来，对强奸犯的起诉和判决一直相当困难，这是由于缺乏证据（伤痕、撕破的衣物、证人等），以及被害人因为害怕不友好的法庭诉讼或是担心强奸犯的报复而不积极控告。今天，有通情达理的警察、医生和咨询小组帮助受害人处理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而DNA的比较试验为证实强奸犯身份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这些积极的措施也许可以鼓励更多的妇女提出指控，但仍有大量的强奸没有报警。报警的强奸案只有总数的16%。[27]

专栏5.1 关于强奸犯和受害人的几点事实

由于许多强奸案没有报警，受害人经常保持沉默，因此关于强奸的可靠资料特别难得。但是，如果把警方正式的统计数字和民意测验的所得结合起来，则可以提供一个基本合理的轮廓。下面大部分的数字反映的调查，包括了那些报警和未报警的受害者。

对强奸的一个普遍印象是一个陌生人的突然袭击，乘着夜色的掩护，通常是发生在公园、停车场或大城市的街道上。但事实是，尽管三分之二的强奸确实发生在晚上6时到清晨6时之间，但几乎60%发生在受害者家中或是在朋友、亲属或邻居的家中。在五分之四的强奸案中，受害者和攻击者互相认识，而且53%的事件牵涉到所谓的约会强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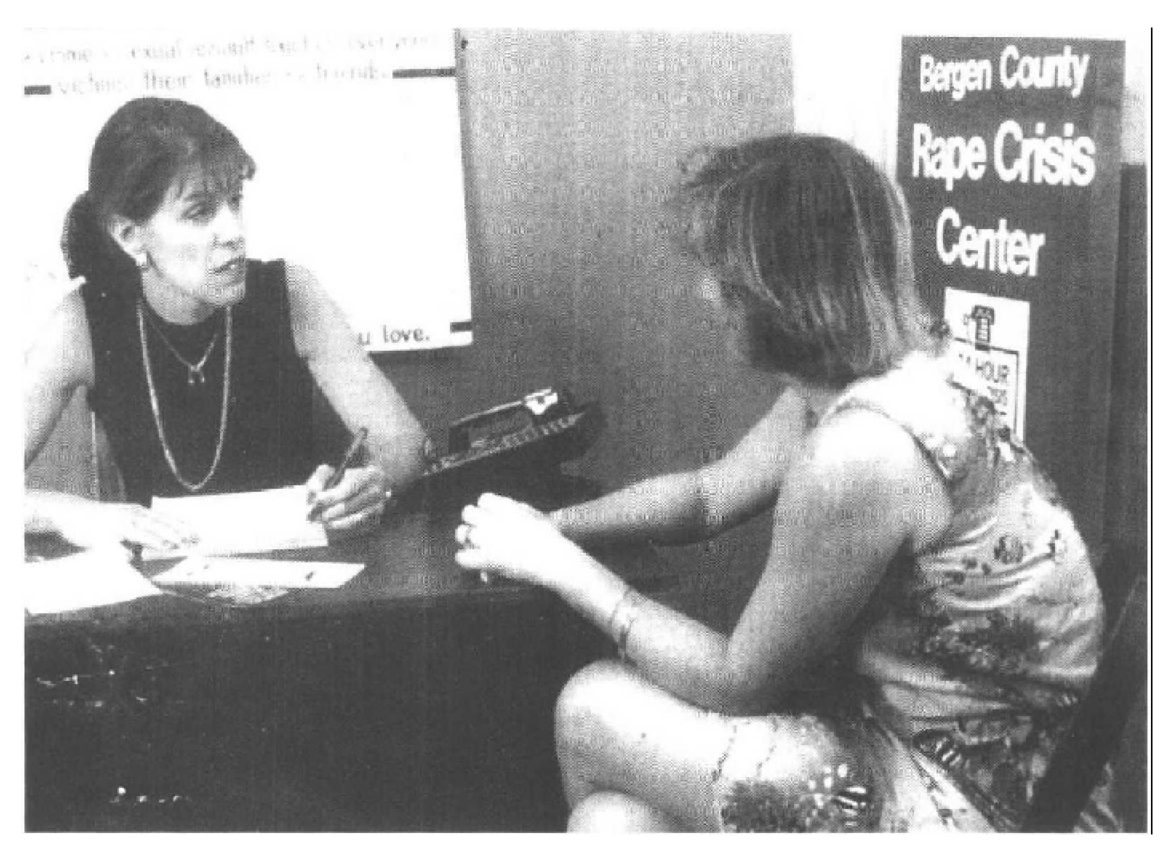
强奸根据地理区域的不同而发生显著的变化。生活在大都市的妇女被强奸的可能是小城市妇女的两倍。然而，最大的城市的强奸率并不一定是最高的。事实上，明尼阿波利斯和克利夫兰的强奸率是纽约的3倍多，后者的强奸率要大大低于美国大城市的平均水平。在地域分布上，西南中部地区（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俄克拉荷马州、得克萨斯州）比率最高，而中部大西洋区（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最低。在1994年，特拉华州以每10万人中75.6起强奸案、密歇根州70.8起、内华达州68.7起而居于各州前列。强奸率最低的一些州是西弗吉尼亚州（20.3起）、北达科他州（23.4起）、依阿华州（23.5起）和威斯康星州（23.5起）。

可能最令人感到不安的统计数字是关于年龄方面。总体来看，29%的暴力强奸受害者不满11岁，另有32%在11到18岁之间。因此，61%的强奸案（十分之六）中的受害者都未满18周岁。强奸被害人最集中的年龄在16到19岁之间，而强奸犯的年龄最集中的是25到44岁，这要高于大部分其他的主要犯罪行为。

资料来源：Lawrence A. Greenfeld, "Sex Offenses and Offender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Executive Summary*（January 1997）; National Victim Center, *Rape in America*, April 1992;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

约会强奸 约会强奸（date rape）有时也叫作熟人强奸，占了全部强奸案件的半数以上，而近几年来大学校园里约会强奸的增加更是让人担忧。[28]最近的一项长达3年的研究发现，八分之一的女大学生确认，自己在之前的12个月里受到过性攻击。其中84%认识攻击她们的人，而三分之二的人是她们的约会对象。[29]

客观地讲，约会强奸与被陌生人强奸并没有不同。对强奸的法律定义取决于暴力形式和未经同意，而不在于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关系。男人必须把"不"当作一种回答，而不论他和他的伴侣在什么地方，或是他为约会花了多少钱。如果一个男人不接受"不"的回答，而用暴力制服那个女人的话，那他决不能用"是她自己要求的，因为她进我的房间喝了一杯"为理由来逃避罪责。[30]然而，男人和女人常常对约会有不同的态度和期待，可能无法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暗示。[31]因此，研究者发现，情形的暧昧使得外人对女性此种处境的同情要少于对她遭到陌生人性攻击的同情。[32]



强奸是一种暴力犯罪。除非有人帮助受害者认识到这一点，否则犯罪的后果可能与犯罪本身一样有害。受害者在法庭诉讼中的身心折磨，以及为了未来与男性的社会交往和性关系而进行的心理调试，是一个极其困难的过程。

防止强奸 对强奸的成功防范极难施行。首要的和最明显的办法是，通过参加自卫训练和学习其他的避免强奸的技巧，教会妇女避免强奸。另一个方法是改变男孩和女孩社会化的模式，而不让人们把强奸看作使男人性能力与侵犯性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极端形式。各州防止强奸的法律现在都做出限定，规定被害人在之前同他人的性关系不足为证。这就使强奸者难以用“是她自己要求的”为理由，狡辩说被害人在性关系上极为混乱，不可能算是强奸。1996年的全国性法律规定，当一个性罪犯搬到一个街区时，必须通告社区居民，以此作为一种警告措施。这正像1994年的犯罪控制法案所做的，它要求各州对性罪犯进行登记。另一个威慑措施是在判决时加重性罪犯的服刑时间。许多专家把1995年强奸案的锐减归功于以上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35]

国际间的比较 1995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即使考虑到报案的比率各有不同，美国妇女被强奸的危险还是要比欧洲妇女大得多。在美国，每10万名妇女中118起强奸案的比率几乎是瑞典的3倍，它以每10万名妇女有43起强奸案排在第二位，而丹麦为35起居第三，匈牙利为31

起居第四。其他被调查的国家有奥地利（27起）、荷兰和德国（26起）、加拿大（23起）、保加利亚（21起）、挪威（20起）、芬兰和波兰（19起）、瑞士（18起）、法国（17起）、捷克斯洛伐克和西班牙（12起）、拉脱维亚（10起）、葡萄牙（5起）、以色列和意大利（4起）、马耳他（2起）。[34]

报案和记录的不同使得这些比较只是提示性的。尽管如此，调查结果仍然表明，暴力在美国文化中的泛滥使得强奸成为一个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的问题。

有14个拉美国家的法律规定可以免除那些与受害人结婚的强奸犯的罪责，而常常由于家庭的压力和强奸者的威胁使得妇女根本无从选择。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和委内瑞拉。但强奸犯和被害人的婚姻无须一直维持，而且事实上，强奸者常常在几个月后就抛弃了他们的妻子。在秘鲁（强奸率为每10万妇女中10起），轮奸案的全部被告中只要有一个人答应与被害人结婚，就可以全部被赦免。女性主义者迄今为止一直都未能成功地使这条法律废除，不过大多数秘鲁人都赞成它。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一法律向社会传递了宽恕强奸的错误信息，反映了对什么是强奸的一种根本误解。[35]

有组织的犯罪

如它的名称所显示的，有组织的犯罪是一种带有权力等级制度、明确分工和支配其日常运转的行为规则的系统。就像在任何机构一样，这些因素都是为了利益的目的，使其能够有效地运作和赚钱。其收入极巨，每年超过2260亿美元。[36]大多数犯罪集团的利润来自于贩卖商品和从事其他社会需要的活动，尽管其中有些——如毒品、赌博、高利贷、色情和卖淫等——是非法的。它还从事**劳动诈骗**（labor racketeering）——渗透进工会以获取养老金基金和以避免劳动力纠纷为由向资方敲诈。它还常常为了洗黑钱而渗透到一些合法的企业，或是强迫一些公司从他们控制的公司购买货物。

尽管黑手党由于他们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而最受关注，但是在美国，其他的种族团体也有高度组织的犯罪团体。其中大部分以合法公司的形式进行活动。有组织的犯罪仍然是一项获利极丰的事业，因为公众对其产品和服务需求很大，而且它也有能力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及贿赂警察和其他政府官员，使之对其视而不见。

白领犯罪

埃德温·萨瑟兰在1940年引入了**白领犯罪**（white-collar crime）的概念。[37]他最初将其定义为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违法行为。他们的犯法是在日常工作中发生的，而不是个人的病态行为。这些活动包括用欺骗手段获得的所有收益：内幕交易、逃税、贪污、虚假广告宣传、诈骗、价格操纵、贸易遏制或故意生产不合格产品等。医生和律师可以通过保健医疗或医疗补助方案诈骗、在事故案件中做伪证、酬金分成、未公开的利益分歧和其他欺骗手段进行职业犯罪。每天进行的数以亿万元计的电脑转账业务，使得电脑黑客——一种相对较新形式的白领罪犯——可以非法地进入和操纵保密的资料，或是从账户中提走钱款。雇员偷窃仍然是造成零售业经济损失的最大因素，每年丢失的商品价值高达400亿美元。仅就超级市场而言，雇员偷窃在1996年占了全部商品损失的55%。[38]

财产犯罪

财产犯罪的主要形式包括入室盗窃、扒窃、盗窃机动车和纵火。较轻的财产犯罪还有伪造支票、商店行窃和故意破坏等。犯这后一类罪的罪犯在其他方面倒是遵纪守法的公民，只是因为冲动和偶然才会犯罪。在前一类犯罪形式中，无论是有计划地作案并以此为生，还是为了一时利益偶尔为之，罪犯通常都是单独行动的。18岁以下的青少年占重大财产犯罪的比例最大。基于逮捕记录得出的《统一犯罪报告》的统计显示，1995年青少年罪犯占了全部入室盗窃案的34%，扒窃的33%，机动车盗窃的42%，纵火案的53%。[39]

少年犯罪

从苏格拉底时代以来，社会一直都在批评“年轻人行为不端的蔓延”。在17世纪的法国，学生经常殴打老师。19世纪的美国作家忧伤地感叹，没人能在旧金山的大街上安全行走而不遇到“小流氓”，这里专指当时青少年团伙的成员。[40]几百年来，多数的社会都把孩子看成是缩小了的成人。

但是逐渐地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认为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儿童应该受到特殊的保护、照顾和锻炼。根据这种观点产生了**少年犯罪**（juvenile delinquency）的概念，即一个“孩子”所犯的罪行不能等同于一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也不应该受到相同的惩罚。

什么是少年犯罪?

少年犯罪是一个法律范畴。一个违法的青少年必须根据**青少年审判法**（Juvenile Justice Code）的规定，接受专门处理少年犯罪的特别法庭的审判。属于少年法庭裁决的罪犯的最高年龄，各州的规定有所不同。有些州对男孩和女孩有不同的年龄限制，但18岁是一个通常的分界线。

少年法庭最早出现于本世纪初。在这以前，少年罪犯要和成年人一样接受相同的司法程序（以及相同的判罚）。法庭只对7岁以下的儿童予以赦免，对其行为不加追究，认为他们没有能力形成一种犯罪意图。在对待7到14岁的犯罪者时，法官有时也会根据情况酌情给予考虑。但在14岁以后，一个人在法律上就是成年人了，因此和所有其他成年人一样适用同样的处罚，包括鞭打、监禁和绞刑。[41]

随着20世纪的来临，社会改良家试图对儿童进行管理而不是惩罚。他们接受了通行的观点，认为孩子天生容易变坏，提出社会的职责就在于强迫他们服从。此后，许多现在称为**身份犯错**（status offenses）的行为都被归为特殊的少年“犯罪”，需要法庭进行干预。今天，身份犯错占了少年法庭处理的全部案件的20%。它们包括旷课、违背宵禁令、出走、不服从父母、携带或饮用酒类以及行为不受管束等不端行为。

虽然一般都把少年犯罪想像为主要是一种下层社会的现象，但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阶层中。[42]最强烈和最持续的阶级与犯罪的联系性确实存在，即长期下层社会的地位与持续的卷入街头犯罪两者之间确有联系。[43]但是，许多研究者都发现，少年犯罪行为与阶级界限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而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来自中产阶级的辍学学生比下层学生更有可能进行犯罪活动。[44]

帮　派

有些年轻罪犯单独行动，但大部分则属于一些帮派。对帮派的一个恰当的定义是“一个其成员在较长时间里定期聚会的团体。它以集体决定的标准接受成员，以集体决定的组织结构为基础，通常有一定的地域性”。[45]

最近以来，帮派成员的年龄结构有了变化。虽然少年仍然占大多数，但现在一些帮派甚至开始招收13岁以下的孩子。他们被利用、鼓励或强迫为“老板”从事犯罪活动，并把那些大一点的帮派成员看成自己的榜样。越来越多的人在长大后仍留在帮派之中，被称为“成年退出”（成年后即退出帮派）的现象逐渐减少。[46]对那些缺乏技能或动力从事更大的经济活动的人来说，帮派给他们提供了生活目的和（常常是非法的）谋生机会。因为对贫穷的少数民族青年而言，好的工作机会相对较少，所以帮派成员常常延续到成年阶段，年纪较大的人在其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因此，帮派参与的获利的犯罪活动变得非常复杂和广泛。与此同时，遵纪守法的成年人在社区的地位较低，影响较小。[47]

今天，事实上在每个州都有青少年帮派。在中北部山区的几个州和一些东北部的州里，帮派活动较少。但是在大多数州，过去10年里帮派活



对许多生活在美国城市中的低收入年轻人来说，加入帮会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身份的认同和归属感。在洛杉矶，“克里普帮”（如上图中所示）和“布拉德帮”是两个最为臭名昭著的帮派。近来他们已试图将势力扩展到美国的其他城市。

动都出现了增加和恶化的迹象。加利福尼亚的两个帮派"克里普帮"和"布拉德帮"，现在已在纽约有了分会。而新泽西州的一个地方检察官估计，仅在7个城镇就有99个主要的青年帮派。其成员从事的犯罪活动范围从偷车到贩毒到性攻击。

一项对圣路易斯的27个青年帮派的研究确认了他们的10种最常见的活动。专家认为这也代表了整个美国城市地区帮派的主要活动。它们是：恐吓、攻击、驾车射击、乱涂乱画公共财产、贩毒、将收入用于购买毒品及枪支和汽车、抢劫或盗窃、偷盗或破坏汽车、敲诈勒索、销赃。[48]在公众的思想中，帮派日益与毒品及其伴随而来的暴力相关联。

少年犯罪再思考

从80年代中期"噼啪"可卡因泛滥开始，全国的大街小巷变得越来越危机四伏，对立的毒品帮派常常互相交火。不久，青少年就开始用枪支代替拳头，只为了获得垄断、解决争端或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从1985年到1995年间，10到17岁的被逮捕的杀人嫌疑犯总数飞升了75%。[49]随着青年暴力犯罪的升高，主张强硬路线的人敦促，应该改变法律，以更方便地将青少年嫌疑人作为成人审判，使他们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青少年犯罪的受害者也要求改变青少年审判制度，对长期存在的认为杀人、抢劫和强奸的青少年应该与成年罪犯区别对待的观念提出了挑战。[50]

随着公众对改造严重和暴力的少年罪犯是否有效失去信心，各州也通过法律或行政命令对那些最为暴劣的少年罪犯强制延长刑期。1992年到1995年间，有40个州通过法律，使得把青少年作为成人进行起诉更为便捷。1997年国会考虑采取一项议案，赋予联邦法庭把小到13岁的少年放在成人法庭进行审判的权力，并将16到17岁的少年犯同成年人监禁在一起，而不是单独监禁在少年犯管教所。

然而这些措施也许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对佛罗里达州青少年及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青少年分别进行的两项研究发现，被像成人一样对待的少年罪犯更有可能再次犯罪，而且常常是犯更加严重的罪行。[51]在一项对改革青少年审判制度的看法的调查中，美国罪犯改造协会的成员反对任何改变诉讼程序的规定，反对因为某些犯罪就自动把青少年当作成人对待或是对他们采取强制性刑罚。另一方面，超过80%的人支持预防和控制青少年帮派，99%的人认为干预计划应通过教育、社会、医院和司法系统协作进行。[52]

刑事司法体系

社会结构中用来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的两个部门是警察（用来服务和保护公众）和监狱（用来囚禁和改造罪犯，并使其不敢进一步从事犯罪活动）。然而许多人认为，这些机构正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警　　察

作为刑事司法体系的看门人，警察是其中最明显和关键的一个要素。他们是公众接触最多的法律部门，也是那些违法者首先遇到的人，而且也是在现场决定应该采取如何行动的人。全美国有超过60.2万名专职的州和地方警察。他们在不同类型的社区和不同规模的部门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因此很难泛泛地说明他们的作用。[53]然而，他们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大多数警察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家庭背景中，至少接受过高中教育，大约四分之一还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一般观点较为保守，力求维持现状，反映了社会中大部分人所持的偏见。

对警察麻木、腐败或野蛮的指控早已司空见惯，特别是在那些少数民族居住集中的城市地区。有时候，像1992年洛杉矶警察殴打罗德尼·金，或是1997年纽约警察用警棍鸡奸和拷打艾伯纳·路易玛这类令人发指的事件会引起公众的轩然大波。然而更多的是，未受关注的日常遭遇使得少数民族和警察之间的怀疑和敌意日益加深。双方都以排斥对方为基础在内部形成了一致和团结，同时对那些不理解他们的外界社会产生怨恨。

对这一问题的一个令人鼓舞的方法是现在占主导地位的**社区警务**（community policing）的主张。它使警察和社区公众之间在控制犯罪方面形成一种很强的工作关系。警察加强在社区的巡逻力度，有时甚至就居住在同一块街区。通过街区的守夜队、以社区为基础的反应小组、时事通讯和报警系统，警察和社区居民间形成了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

另一个成功的方法是**关键警务**（strategic policing），是为了减少街头犯罪而采取的主动出击。通过计算机分析得出犯罪最频繁的地区，然后在这些地区增加巡逻、布置埋伏和突然打击。在纽约，结合对一些生活质量犯罪（如公开饮酒、地铁逃票、随地撒尿等）进行了严厉打击。这种方法使得犯罪率明显下降——降至1980年以来的最低点——并成为其他大城市

学习的榜样。[54]

监　　狱

1996年底，联邦和各州监狱里的囚犯人数从1990年的74万上升到超过120万人（全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全国的入狱率也从1990年的每10万人292名囚犯上升到每10万人427名囚犯，是全世界最高的。如果再加上关押在地方和县监狱的52万人，那么在美国监狱中的囚犯总数达到惊人的170万人。[55]

大多数囚犯关在州立监狱中，共有110万人。而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一共关押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囚犯。州立监狱的罪犯主要犯有以下的罪行：46%的暴力犯罪，24%的财产犯罪，23%的毒品犯罪。而在全国大约10.6万名联邦囚犯中，估计60%的人是因为毒品犯罪而服刑的。

囚犯人数的骤升大部分是因为刑期延长，这有许多原因。第一，一些州在过去10年里都对各种毒品犯罪规定了最短服刑期限。第二，"刑期名



由于世界上最高的入狱率和对毒品犯罪规定了最短服刑期限，美国监狱出现了人满为患的严重问题。这不仅使改造罪犯变得极为困难，而且法庭为了消除过度拥挤的状况，而定期将大量暴力罪犯提前释放。

实相符”的条款要求在狱中服刑的时间要尽量接近实际的判决，而不是根据假释委员会建议予以提前释放。第三，释放率自身的下降。第四，法庭把更多的人送进了监狱，大多数是为了与毒品相关的犯罪。到1995年，因毒品犯罪而在州立监狱服刑的犯人比1985年增加了6倍。[56]

过度拥挤的后果 尽管斥巨资用于监狱建设，但是联邦监狱管理局和各州政府还是无法跟上监狱人口的增长速度。在1997年初，州立监狱里的罪犯人数超出了其容量的16%～24%，而联邦监狱的则超出了承受力的25%。[57]一些州迫于法庭减轻监狱过度拥挤的命令，经常释放一些其他的罪犯，甚至暴力罪犯，以腾出空间关押那些被强制服刑的毒品罪犯。因为许多暴力罪犯没有法定最低刑期的强制规定，所以也成为被提前释放的候选人。

监狱的过度拥挤还造成了另一个严重问题：缺乏专业人员提供咨询和职业培训。只有十分之一的囚犯接受过一点职业培训，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警力阻止囚犯互相伤害。在监狱中，暴力和毒品滋生扩散，改造新生的机会微乎其微，交换犯罪的技巧心得成了囚犯们主要的业余活动。正如一名囚犯所说的：“我们中间许多人来这儿时还一无所知，而且出去以后我们也无法更好地应付社会，因为我们甚至不能处理好自己的问题。”[58]

不成比例的监狱人员构成 对监狱人口的深入考察会揭示出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大约41%年龄在20到29岁之间的囚犯是高中辍学学生，而高中缀学学生在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为11%。大多数囚犯在被捕前都没有工作，而所有犯人的平均收入在被捕前一年都低于贫困线。由于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比白人更容易低于这一标准，因此他们在囚犯中所占的比例很高。根据司法统计局的数字，在目前的监禁水平下，一个黑人男子在其一生中入狱的可能性要超过四分之一，而一个拉美裔男子为六分之一，相比之下，白人男子只为二十二分之一。[59]

美国黑人占全国人口的13%，但在全部州立监狱的犯人中却占了47%。拉美裔美国人仅占人口的9%，但在州立监狱的犯人中却为15%。拉美裔在监狱囚犯中的人数增长最快，1985到1995年间增加了107%。[60]这其中部分是因为非法移民，他们的比例也在增加。联邦监狱中22%的囚犯是非法移民，而他们中有一半的人是为了毒品犯罪而服刑的。[61]

其他的监禁方案 在提出了监狱过分拥挤、职业培训不足和改造不力等问题的同时，许多大的监狱管理部门为监禁计划提供了一些特殊的选择。至少有35个州开设了军事式的新兵训练营，用来改造犯人。支持者认为，严格的规章和纪律、严厉的体力活动和教化将会把罪犯变为有用的公民。利用把老百姓变成士兵的模式，这些计划是根据这样的理论，即学

会遵守纪律可以转变为面对压力的力量。研究显示，经过训练的“毕业生”从事新的犯罪的比例和监狱里的囚犯相同，不过训练营的教育和毒品治疗则较为成功。[62]

以社区为基础对缓刑期间的人进行改造对降低**屡犯**（recidivism）似乎更为有效。[63]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日常工作释放，即允许犯人可以在没有管教人员监督的情况下在社区工作，但在换班之后必须回到过渡教习所。这一计划试图在限制自由活动的同时，鼓励犯人进行生产劳动和提高自尊心，所以犯人可以同时接受惩罚和体验生活的目的。

每日报到的做法现在至少在15个州已经实行。它要求假释犯每天去报到登记。电子监视对缓刑者的影响极小，即让他们携带一种电子信号装置，以使工作人员能够跟踪其去向，把他们限制在一定的区域，远离那些他们可能会威胁到的人。[64]

为犯人提供工作 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华伦·伯格曾经建议，把我们的监狱从“仓库”改变成为一些有围墙的工厂。这将在两方面提供帮助。第一，犯人可以学会有用的工作技能，在出狱后会对他们有所帮助。第二，犯人的工作可以用来补贴维持监狱开支的大量费用，总数估计高达每个囚犯每年2.5万美元。

无论是在监狱中，还是在缓刑期间进行职业培训，这种方法通过提供一种重新进入社会的手段对减少再次犯罪展示了可能的前景。每年，美国的监狱要释放超过40万罪犯回到他们的社区。其中大部分人都不能避免再次犯罪。全国的统计数字显示，41%的人在释放后3年内又回到了监狱。[65]这是一个急需改变的现实。

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terrorism）是指个人或团体通过恐吓、强迫、威胁和暴力进攻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它总是意味着暴力和破坏，或是暴力和破坏的威胁。恐怖主义行动会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破坏。

政府有时使用恐怖主义的手段控制国民。例如在70和80年代，某些拉美国家的统治者使用**镇压的恐怖主义**（repressive terrorism），包括派暗杀小组搜捕“政府的敌人”和秘密处决。同样的行动如果来自非执政团体，就成了**革命的恐怖主义**（revolutionary terrorism）。**犯罪恐怖主义**（criminal terrorism）只是暴力犯罪的另一种形式，犯罪者的动机是为了从中得利。有时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人辩解说，自己的行为是“正当合理的革命的恐

怖主义"，但是社会的大多数都把它界定为暴力犯罪。简而言之，我们根据它们发生的情况界定和对待恐怖主义行动。

社会历史背景中的恐怖主义

1533年左右，再洗礼派——一个主要活动于瑞士、德国、摩拉维亚和低地国家的广受迫害的宗教团体的一个极端派别——断定政府是罪恶的，因为它横拦于人与上帝之间。因此，他们决定"现存社会必须被摧毁，这样新秩序才能够确立，其法律由先知或领袖的灵光所揭示"。[66]在其事业的名义下，他们焚毁城镇，破坏财产，杀害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在今天的许多恐怖主义团体中可以找到的同样信仰指引着激进的再洗礼教徒：相信暴力破坏可以救世，相信暴力作为一种目的具有其合理性，梦想在旧秩序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再洗礼教徒激进的恐怖活动最终导致了他们自身的毁灭及其领袖的死亡。因为一个更加强大的镇压性恐怖主义团体采取了反击措施。

正义的暗杀者 在20世纪中期以前，恐怖主义一直都与政治谋杀相近似，而且所遵循的规则也基本上近似于那些支配战争的规则和法律。尽管恐怖主义者常常让自己充当法官和陪审团，而且虽然他们的理由只能够满足他们自己，但大部分还是试图在有罪者和无辜者之间做出区别。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讲过一个年轻的革命者的故事：他被挑选出来，负责把炸弹扔到一个腐败政客的马车里。青年坚信自己的行动是正确的，于是开始等待时机。但是当机会来临时，他看到两个孩子坐在那个官员的怀中，便决定不扔出炸弹。在他告诉同伴自己的决定时，他们都同意"正义事业"的行动应该有限度。[67]但在今天却没有了这样的限度。

现代恐怖主义：没有无辜者 1995年4月19日，星期三，大约有600名公务员和估计250名参观者正在俄克拉荷马城的阿尔弗雷德·莫拉联邦大厦。早上9点，在大楼的日托中心，学龄前儿童正在玩耍、嬉笑、兴奋地说话，或是忙着看书、猜谜和做手工。5分钟以后，在这座9层的大楼外，一个国内的恐怖主义者引爆了一枚汽车炸弹。爆炸炸毁了大楼的正面，一共杀死了167人，其中包括十多名儿童。这起迄今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最大的破坏行动震惊了全国，使得每个人都痛苦地意识到，我们多么容易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

今天的恐怖主义者，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声称他们有权杀死任何人或是每个人。就像是革命的再洗礼派教徒一样，他们接受"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的原则。根据这个道理，只要有正确的理由，

在道德上就没有任何事是错误的。现代的恐怖主义者由此证明杀人是“必要的”，没有什么无辜者。

随着越来越野蛮地对民用目标使用威力更大的炸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造成的死亡人数从1995年的163人上升到1996年的311人。恐怖主义使用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威胁日益受到关注，尽管像这样的行动或攻击还很少发生。

然而，恐怖主义对社会的破坏却非常大，而且不仅是在人员伤亡方面。根据定义，恐怖主义的目标是更广泛的人群，而不仅仅是直接的受害者。恐怖主义分子在1996年再一次证明，他们能够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并带来破坏、恐慌和经济损失。这年6月，在沙特阿拉伯达赫兰附近的阿尔卡布公寓大楼的强烈爆炸事件，一共造成19名美国飞行员死亡，240名其他美国公民伤亡，并导致大量其他伤亡。同样，在过去的几年里，有100多人被一些旨在破坏中东和平进程的极端组织杀死于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一系列自杀性爆炸事件中。



没有什么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像1995年的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厦炸弹爆炸事件，提莫西·麦克维夫为此而被捕（如上图）。167名男人、女人和儿童死于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手中，令美国人深切地感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在恐怖分子眼中，没有人是无辜的。

对付恐怖主义者

对付政治恐怖主义分子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是不是完全不能和恐怖主义者讲条件？一些国家政府拒绝同恐怖主义者进行任何谈判，认为这只会鼓励其他的人效仿这种行动。恐怖主义在一些曾是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极为罕见。现在在古巴、中国和朝鲜仍然很少，因为恐怖分子知道这些政府不会做出任何让步。其他政府，尤其是那些高度重视个人生命的政府则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保护无辜的平民免受伤害都是至关重要的事。

美国的反恐怖主义政策强调3条基本原则。第一，不同恐怖分子作任何交易，不向任何勒索屈服。第二，把恐怖分子视为罪犯，对他们穷追猛打，直至绳之以法。第三，通过对那些保护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进行经济、外交和政治制裁，并要求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向恐怖主义施加最大的压力。[68]

虽然恐怖主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活跃性对明确界定其模式造成了困难，但政府表现出无视其动机、坚决打击所有恐怖主义是令人振奋的趋势。这种对恐怖主义毫不姑息的政府政策的一个积极结果是，由政府主持的恐怖主义活动出现了下降，虽然支持恐怖主义的最主要国家——伊朗仍未被阻止。随着恐怖主义的触角逐步伸向全球，国家之间的合作已变得必不可少。

政治恐怖主义

大部分恐怖主义行动都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国内的恐怖分子表现出革命的恐怖主义，旨在消灭联邦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海外的革命的恐怖分子把美国视为敌人，常常是因为美国在其祖国或邻国支持一个他们反对的政府。他们相信，通过向美国实行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可以加强他们自身的力量和影响、宣传他们的事业。

国内的恐怖主义　在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后，国内的极端主义言论甚至变得更加尖锐。右翼的极端主义组织——许多带有反动的、种族主义的或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断地在美国招收新成员。它们的许多支持者感到，自己被美国主流文化中迅速变换的标准所遗弃或剥夺了权力，另一些人仇恨或惧怕联邦政府。随着人口、经济和生活方式的继续变化，极端右翼的好战分子进行仇恨犯罪和反政府攻击的潜在可能也在增加。

联邦调查局的警惕性有效地防止了许多恐怖主义活动，但是企图进行

恐怖活动的数量令人吃惊。以下这份1997年里3个月的日志很典型地说明了问题。三月：联邦侦探在密歇根州逮捕了一些民兵组织成员。他们正在制造雷管炸弹和其他非法爆炸品，计划炸掉巴特尔克里科的联邦大厦、美国国税局大楼和一家电视台。四月："雅利安民族"组织一名在俄亥俄州的成员，因为通过电信诈骗获取淋巴腺鼠疫样品从事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被判决有罪；在得克萨斯州，联邦调查局逮捕了3个男人和1个女人，他们计划用炸弹袭击沃思堡西北的一个炼油厂，以转移警方的注意力，抢劫一辆运钞车来资助他们的极端主义活动。五月：西弗吉尼亚"山地人"民兵组织的一名成员承认有罪，因为他为策划袭击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指纹中心的其他民兵组织成员制造了炸弹。[69]

当然，其他国家也有国内的恐怖主义问题。阿尔及利亚、印度、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国内的革命恐怖分子都极为活跃。例如，在1997年年中，阿尔及利亚的恐怖分子在几个晚上的袭击中一共屠杀了数百名村民。秘鲁的恐怖分子在1996年末成了世界关注的中心。他们占领了利马的日本大使馆，并扣留许多外交官作为人质。之后他们全部死于反恐怖突击队的袭击中。种族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车臣、塔吉克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地也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库尔德工人党则继续与土耳其政府进行着恐怖战斗。

国际恐怖主义 国际恐怖分子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伊朗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真主党和哈马斯等许多正规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其他一些松散的极端分子都把美国视为敌人。在1993年致使6人死亡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发生之前，国际上的恐怖分子只是针对在国外的美国人和美国军事基地。自此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美国人，都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恐怖分子潜在的袭击目标。

中东地区的恐怖分子最常把美国人作为目标。其中特别危险的一个组织是1983年成立于黎巴嫩的真主党，也称伊斯兰圣战组织。由于其强烈的反西方和反以色列立场，它很快即因参与大量反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这其中包括1983年10月用自杀性汽车炸弹袭击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以及1984年9月袭击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附属建筑。它还在1985年劫持了环球航空公司的847航班，并对从1983年以来发生在贝鲁特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美国和西方人质的绑架和扣押事件负有责任。这个什叶派穆斯林组织致力于在黎巴嫩建立一个伊朗模式的伊斯兰共和国，在地区消除一切非伊斯兰影响。它对杀死数百名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无数起恐怖主义爆炸事件都负有责任。和爱尔兰解放军等世界其他地方的恐怖组织一样，它的整个价值体系是基于对这类行为的原则上和实际上的辩解。它同伊朗有密切的联系，有

时甚至得到其指导，成员人数达到数千人。

哈马斯是另一个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它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产物，于1987年创立。它积极地排斥西方的"罪恶"，呼吁建立一个泛伊斯兰教国家。其成员宣誓摧毁以色列，在《古兰经》教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哈马斯一词的意思是热情。与许多恐怖组织一样，其力量来自于深入地参与社区活动，建立学校、诊所、清真寺和慈善基金会。它针对大量以色列平民和军事目标，以及那些同以色列政府合作的巴勒斯坦人，进行了许多攻击行动。哈马斯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加沙地带和西岸的一些地区，其核心成员的数目不详，有数以万计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它的正式口号是"愿意杀人，愿意去死"。[70]

恐怖主义是怎样产生有效性的?

要确定恐怖主义的有效性，我们首先必须确定恐怖主义活动的目标。3个目标似乎最为重要：引起对该群体存在、重要性和力量的关注；通过证明目前执政的政权不能保护人民，使人们对它失去信心；迫使掌权的政府使用报复手段进行镇压，使得原先没有明显倾向的人转而反对政府和进行反抗。

一次恐怖主义行动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政府和公众对它做出的反应。恐怖行动似乎在引起人们对该群体的关注上最为有效。事实上，有些专家称恐怖主义主要是一种"广告"活动。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皮奥特·阿利克西维奇·克鲁泡特金注意到这些行动的"皈依"效应。他指出："通过引起全面注意的恐怖主义行为，新思想逐步进人人们的思想，并吸引新的皈依者。这一行动在几天内达到的宣传效果超过数以千计的小册子。"[71]

这一情况是否真的发生了呢？国内和国外的恐怖分子在第一个目标上已经不断取得了成功。美国人了解到了千里之外的政治形势的起因、争端和团体，也知道了那些原来闻所未闻的军事组织。然而，恐怖主义者却没能在美国实现他们的第二和第三个目标。他们通过暴力赢得了一些皈依者，但他们的恐怖活动却没能使人们对政府丧失信心。

社会学视角

大部分早期解释犯罪的非社会学的尝试都强调罪犯本身的过错和失当。这些解释包括外表、遗传和个性的缺陷。这些观点使人们对罪犯的改

造缺乏信心。相反，社会学分析试图深入认识，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功能主义观点

罗伯特·默登注意到，美国文化非常重视成功，但是其社会结构没有为人们提供获得每个人所期盼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手段。[72]越轨行为的起因是在迈向成功之路过程中的不公平资源分配。年龄、性别、种族或社会等级的歧视，可能会阻碍一个人合法地追求某些目标的能力。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分歧导致了紊乱，即行为准则的混乱状态。当一个社会出现失范和个人的发展受到制度的阻碍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会不能接受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所承认的目标。这不仅解释了下层年轻人和少数民族的高犯罪率，而且也为理解中产阶级的白领犯罪提供了新的视角。假如对财富和成功的追求本身受到重视，那当然是越多越好，一个人永远都不会满足。

另一种方法牵涉到联系、控制和扩展理论。它提出，传统的道德秩序和罪犯间关系的减弱是犯罪的原因。这种联系的减弱，或是因为社会的控制机构日益衰弱或瓦解，或是因为个人由于某些原因未受这些控制机构的影响。社会控制机构包括非正式团体（家庭、邻里和朋友）和正式组织(教会、学校和刑事审判系统)。

社会控制论相信，社会化的过程使个人与社会之间形成了重要的联系，导致了一致性。这种联系涉及到4个主要因素：

1. 依恋、尤其是对家庭的依恋，其中父母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2. 献身于社会所接受的目标，如为以后得到一个收入较高的工作希望和寻求更好的教育（一个带有这种责任感的人不会冒险卷入犯罪行为)。
3. 通过参加能够导向社会所重视的成功和更高地位的正常活动而参与社会。
4. 相信社会规则和接受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73]

当所有这些联系的因素非常强烈的时候，就可以把个人同犯罪的诱惑相隔离开。

功能主义者还强调，暴力反映了潜在的社会弊病。社会结构的功能缺陷造成了社会群体间的矛盾冲突，比如白人和黑人之间或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社会条件助长了一种灰心和愤怒气氛，促进了暴力行为的产生。

冲突论观点

有趣的是，冲突论者分析犯罪和暴力的出发点与功能主义不谋而合，即默登所指出的目标与手段的不一致。但是他们很快便分道扬镳了。冲突论者重点关注于权力关系而不是穷人们创新的犯罪活动。掌权者制定法律，界定什么是和不是犯罪。法律因此只是一个集团控制其他集团的工具而已，而司法审判系统也服从于统治集团的利益。[74]为此冲突论者指出，《犯罪指数》仅强调了下层成员更有可能从事的街头犯罪，而忽视了贪污或企业犯罪。这正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所经常从事的勾当。一次涉及几千美元的盗窃就要被罚入狱数年，但污染一条河流或是操纵价格或危害公共健康、或因人为抬高价格而耗费公众数百万美元，却常常只是罚款了事而不会入狱。

因而冲突论者重视权力集团的偏好、倾向和既定利益是如何界定犯罪这一社会问题的。[75]掌权者决定了如何将资源用于控制某些特定的犯罪。他们决定了警察应该对哪些犯罪进行执法，而听任另外的一些犯罪行为。因此，没有力量控制界定犯罪过程的“普通”人可能会发现，在他们的亚文化中可以接受的行为，在更大的社会中则被定为一种越轨的犯罪。

对冲突论者而言，暴力是社会不平等和压迫的自然而然和不可避免的后果。只有消灭了压迫，才能消除个人、国家和国际上的暴力行为。社会中财富和机会的分配不公，迫使人们选择暴力犯罪。所产生的压力和绝望也导致了暴力行为。暴力只是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极端方式。要理解暴力，就必须首先理解权力是怎样在社会中分配和运行的。

冲突论者相信，社会和大部分社会学家过于狭窄地关注个人和刑事犯罪，其后果非常严重。他们认为，我们不断地把对暴力的关注作为进行镇压和维持过分强大的警察和军队的借口。因而他们指出，在政府运用死刑作为惩罚手段，又通过暗中和公然地使用武力扩展自身国际影响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倡导一种非暴力的社会对策呢？

社会的价值标准和体制也鼓励了个人暴力行为。对不惜任何代价进行竞争、获得利益和胜利的过分重视，都促使人们采取暴力的方法。在对暴力行为的界定中我们并不一贯如一：只有敌人的行为才被界定为暴力。

相互作用论观点

不同于功能主义和冲突论强调在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或价值标准是如

何产生犯罪行为的，相互作用论试图理解，在许多处境相似的人中，有的人如何及为什么采取了暴力手段，而有的人则没有。关于一个人是如何变成罪犯的一种最有影响的理论出自埃德温·萨德兰的类别交往。[76]个人若是与从事犯罪或不良行为的人交往，就会学会从事这类活动的方法和技巧。他还会对这些行为形成自己合理的解释，将其价值置于其他的传统行为之上。不过，单纯的接触并不会产生罪犯或少年犯。这类交往的程度、强度和连续性，以及个人与那些罪犯或少年犯的感情联系，决定了一个人是否会变成罪犯。

另一个重要的相互作用论观点是**标签论**（labeling theory）。它主要探讨社会把个人标签为越轨者的过程。[77]大部分人都会偶尔犯错，但是一般都比较秘密，很少会面临负面的社会后果。但是，那些被抓住、甚至是被错误指控的个人，则会从最初的越轨行为（偶尔、秘密的犯错）发展到进一步的越轨行为（针对他人对其最初越轨的反应而持续采取的行动）。[78]"犯错者"一旦落到执法官员的手中，就被认定和变成了一个坏人。在这个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成为了一个越轨亚文化中的成员，其行为准则和标准支持人们去违反法律。由于对人的标签分类导致的自我概念以及社会概念的变化，增加了成为一个越轨者的可能性。因为个人没有任何其他选择，越轨也逐渐成为个人社会身份中的一部分。

一种关于暴力行为的极受欢迎的解释是**暴力亚文化**（violence subculture）的假说。它主张，个人的行为之所以暴烈，是因为他或她在之前已经接受了亲暴力的价值观和态度。这一尚未经证实的理论支持者认为，暴力亚文化存在于整个世界范围和许多文化之中。在这一亚文化中，暴力是对挑战或侮辱的惟一恰当的反应。以任何其他方式做出反应都是丢脸的。然而，对密歇根州一所监狱犯人的研究发现，在暴力罪犯和非暴力罪犯的比较中，不存在所谓价值区别。但是在对冰球运动中的暴力行为进行的研究中，和非暴力型的运动员相比，打架越多、受到处罚越多的运动员带有更多亲暴力的价值观和态度。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认识世界，因而也学会了不同的价值倾向。对恐怖分子来说，在向拥挤的公共场所引爆一颗炸弹并不是袭击"无辜的受害者"，而是以自由或真理的名义打击压迫者。在所有的暴力冲突中，双方互相之间一般都有对立的观念想法。一旦把他人界定为"敌人"，本无法容忍的暴行就变得可以接受了。"杀死一头猪"完全不同于冷酷地谋杀一个按步就班工作的青年。"维护和平"也不同于野蛮地殴打一个反战游行的示威者。因此，相互作用论者相信，如果不能理解攻击者如何界定他们的行为，就无法理解或解释暴力行为。

未来的选择

从今天美国社会的犯罪和暴力中产生的未来社会，可能有积极或消极两种极端，或是某种中间形式。由此可能会产生以下两种相反的未来。

悲观的前景

犯罪在2030年已极为普遍，以致市民在自己生活的街区都会感到危机四伏。有钱人可以负担居住在“保安社区”，但他们的安全感也仅限于其范围之内。如果他们冒险外出，其他社区的治安人员可能就会把他们误认为“侵犯者”，同那些被称为“盗匪”的流窜犯罪团伙一样对他们进行攻击。

在20世纪末很短的一段时期里，由于人口老年化和最经常地卷入到抢劫、盗窃和汽车偷窃等严重犯罪的青少年人口下降，犯罪率似乎已经开始下降。但是其他的危险趋势——特别是两极化的司法审判体制使得富裕的犯罪者可以逃避判罚或严厉的惩罚——造成人们对法律体系的怀恨态度。一种“为所欲为”的态度变得非常普遍。这种态度无论是在年轻年老、富裕贫穷、还是有权没权的人中间都极为盛行。与此同时，狡猾的电脑黑客篡改人们的账户和记录，增加了社会的偏执和恐慌，而亡命的下层年轻人则不顾一切地在社会各处铤而走险。事实上没有什么是“安全的”。每天都是战斗。

由于“篡改成绩”的做法盛行，学生的生活变得压力空前。竞争变得更加残酷，因为只有那些高收入的人才能居住在一个保安社区，购买复杂的计算机设备以便在家中工作。为了获得这样的成功，个人首先必须进入一所适合的大学。因为录取是基于权力、影响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以“欺诈”著称的整个体制鼓励人们进行欺骗和“交易”。在21世纪初，经济的衰弱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强制性缩减，使得进大学的概率大为减小，现在只有30%的合格学生能够进大学。社会等级高低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篡改自己和竞争者的高中成绩记录变得极为常见和复杂。

对大多数市民来说，搬到一个“更好的”街区是可望不可及的。只有“强大城镇”成为暴力犯罪团伙的避难所，能够阻止袭击团伙来自“贫穷城镇”的大肆攻击。那些与“贫穷城镇”有公路或铁路联系的城镇都充满危险。犯罪团伙不断侵入、攻击、偷窃。他们只要一到自己的社区便安全

无事了。警察不敢冒险进入暴力活动最严重的地区，那些保护严密的团伙完全控制了局势，并受到本地居民的支持。

最富有的街区雇用他们自己的卫队，并利用复杂的路障和警报系统。公共交通不再进入到那些"强大城镇"。严密警卫的交通路障阻碍了所有的交通出路，进出车辆必须出示身份证明才能通过。商务往来也要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交易。

大部分20世纪的大城市都已不再存在。由于恐怖主义爆炸活动的增加，分散居住已是极为必要的。人们不愿进入商店、饭店和办公楼等大型公共建筑，因为这些常常是炸弹袭击的目标。恐怖主义袭击以及伴随而来的街头暴力犯罪的增多，使多数大企业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地方。由于"自杀性"恐怖活动数量仍然在增多，即使是防卫森严的堡垒式建筑也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

乐观的前景

2030年，20世纪的暴力问题已不再存在。当犯罪成为所有年龄层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社会最终奋起反抗。人们认识到，与犯罪作斗争不只是执法人员的问题，最关键的是防止犯罪，而不是控制犯罪。街区警戒队的增多和相互合作有效地减少了犯罪活动，产生了一种新的社区感。对社区的责任感也超出了巡查犯罪活动的范围，还包括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依赖。这导致了对他人安乐的关心。年轻人的责任感也在逐渐增加，故意破坏他人财产的行为开始消失。当一个年轻人表现出破坏行为的迹象时，社区就会立即知道和感到不安，并努力寻找导致这种行为的原因。

这种对犯罪行为的早期发现和处理，使得职业的犯罪人口明显减少。教育和经济领域的改善以及更加严厉的反歧视法令，使所有的人都可以凭自己的劳动获得物质上的成功。加强对移民的管理和执法，切断了非法劳工的来源，从而消除了那些只能依靠犯罪谋生的人群。家庭和社会服务机构对合法入境的人热心相助，以使他们尽快地适应新的环境。

那些犯罪的人清楚地知道两件事：他们会被抓住，还会被判刑。现在科技把所有的执法机关都联系在一个共同的网络之上。在接到报警之后，所有的机关都会收到一份详细完整的描述。罪犯根本无处逃遁。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警民之间密切合作。对社区和"生活质量"的重新重视，代替了20世纪过度的物质追求和自我中心的价值观，鼓励每个公民积极配合。而且，犯罪的大幅度减少使每个案件都能尽快得到审判。量刑极为明确，

完全以犯罪性质和罪犯的前科为依据。法庭把暴力罪犯从社会中消除出去，但是对那些对自己和他人不构成威胁的罪犯，还是给予强制性的改造。

由于计算机技术在社会中的高度发展，在20世纪后期出现的计算机犯罪的“威胁”业已消失。个人和系统可以立即发现在电脑上出现的任何篡改。而且，真正富有创造性的“黑客”也以保护对社会极为重要的计算机系统而不是破坏它为骄傲。当然犯罪仍然存在，但是没有人把它看作是影响生活的重要因素。相反，人们把它界定为一种可以纠正的社会问题，为社会机制提供各种方法对它加以制止。

在80和90年代发生了无数起杀害数以百计无辜平民的国内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之后，国家间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合作行动，以消灭这种不幸事件的再次发生。世界各国领导人为谴责暴力而发表的各种呼吁、讨论和声明被广泛宣传，使人们对生活各部分里存在的暴力行为进行重新审视。政府投入巨资，不仅用于理解暴力行为的原因，而且宣传其现实的后果。虽然仍然会有无视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反社会者和心理变态者，但是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已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任何事情都不能为对他人使用暴力进行辩护。

小结

1. 犯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你在今天可以自由做的事情，在过去或是未来可能是一种犯罪行为。
2. 尽管人们假定，刑法反映了大部分人的社会准则，但在一个像美国这样复杂的社会，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法律经常没有能反映出许多人珍视的价值标准，甚至与之相对。
3. 可以从联邦调查局的《犯罪指数》了解报案的犯罪活动，其中包括8种严重的犯罪行为：谋杀、暴力强奸、入室盗窃、抢劫、恶意攻击、扒窃、盗窃机动车和纵火。《全国犯罪受害调查》根据每年对全国12万多人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只有36%的犯罪行为被报案。
4. 人们之所以不报案，是因为害怕尴尬或报复，或是认为犯罪较轻，报警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或是认为报警也不会有任何效果，或是不愿意让政府去加强某些法律，或是由于以前受到警方的错误对待或自身的违法行为不愿意与警察发生接触。
5. 占全部犯罪四分之三的财产犯罪从1973年以来在稳步下降。暴力犯罪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到高峰，但在90年代中期开始下落。最容易受到暴力犯罪伤害的是黑人、男性、青年人和穷人。

6. 美国人对暴力持矛盾的观点。我们谴责暴力，但却崇拜那些“以法律的名义”使用暴力的人。使用暴力（尤其是非法治安维持）保护社区的价值观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两种最新的社会暴力形式是公路狂暴和民兵组织成员进行的反政府袭击活动。

7. 尽管暴力犯罪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而且在全部犯罪中比例较低，但仍是美国人最大的恐惧。大部分杀人凶手和受害者是属于同一种族的青年男子。黑人女性成为谋杀受害者的概率是白人女性的4倍，而黑人男性则是白人男子的8倍。多数美国人支持使用死刑，而且执行死刑的数量近年来有所增加。但是支持者和反对者仍然在就其威慑作用和治疗性复仇的合理性进行争论。

8. 11到18岁的年轻女性占了全部强奸受害者的61%。熟人或约会强奸占了全部强奸案的一半多。强奸犯和被害人通常属于同一种族、年龄层、街区和社会阶层。

9. 有组织的犯罪是一项每年获利超过2260亿美元的大生意。白领犯罪包括企业犯罪如欺诈、价格操纵和生产危险产品。职业犯罪如贪污和欺诈以及雇员偷窃，它使雇主每年损失达400多亿美元。大部分严重的财产犯罪都是青少年所为。

10. 少年犯罪是一个法律范畴，它把未成年人（通常在17岁和17岁以下）置于未成年人审判法的保护之下。帮派现在逐渐开始招纳更年轻的成员，并有越来越多的大龄成员继续留在内部。其活动主要涉及毒品以及财产和暴力犯罪。青少年暴力活动的不断增加，使得40个州在1992年到1995年间通过法律，以便更容易地将青少年和成年人一样给予更加严厉的处罚。

11. 社区警务和关键警务是减少街头犯罪的有效措施。监狱的过度拥挤和监禁人数的高比例，源于对毒品犯罪强制判刑、服刑时间的延长和释放率的减少。黑人和拉美裔人在囚犯中的比例极高。结合教育和毒品治疗的训练营和工作释放计划是较有前途的不同监禁方法。

12. 世界贸易中心和俄克拉荷马城的爆炸事件说明，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威胁。恐怖分子不把任何人看成是无辜的，包括孩子。他们倾向于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而不是攻击较小的目标。

13. 功能主义和冲突论都通过对社会结构、价值体系和社会控制机制进行宏观的社会分析，来解释犯罪、青少年行为不良和暴力行为。相互作用论则利用微观的社会分析来研究，有些人如何和为什么进行犯罪和

暴力，而有些人则没有。

关键词

民兵组织
社区警务
犯罪指数
犯罪率
犯罪恐怖主义
约会强奸
司法酌处权
青少年行为不良
青少年审判法
标签论
劳动诈骗
《全国犯罪受害调查》
认罪辩诉协议
警察酌处权
起诉酌处权
屡犯
镇压的恐怖主义
革命的恐怖主义
公路狂暴
身份犯错
关键警务
恐怖主义
《统一犯罪报告》
治安维持
暴力亚文化
白领犯罪

推荐书目

Athens, Lonnie H. *The Creation of Dangerous Violent Criminals*.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9.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imprisoned violent offenders, the author employs interactionist theory to explain the evolution of dangerous criminals.

Bernard, Thomas J. *The Cycle of Juvenile Jus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a helpful historical overview of legal cases and policy changes in juvenile justice.

Coleman, James W. *The Criminal Elite*, 2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An informative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white-collar crime, including at the top levels of society.

Cox, Steven M. *Police: Practices, Perspectives, Problems*. Boston: Allyn & Bacon, 1997. A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and social look at police issues, including discussions of current problems and potential solu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hange.

Cummings, Scott, and Daniel J. Monti (eds.). *The Origins and Impact of Youth Ga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A series of excellent articles providing vivid descriptions of and insights into the motivations, activities, and behaviors of gang members.

Gaines, Donna. *Teenage Wasteland: Suburbia's Dead End Kid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2. From a case study of four New Jersey teens who succeeded in their suicide pact, this study expands into an analysis of the fascination with deviance among all troubled youth.

Mann, Coramae Richey. *Unequal Justice: A Question of Colo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An indictment of the U.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for its treatment of people of color, based on extensiv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ir treatment.

Matza, David. *Becoming Deviant*.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9. An excellent review of the weaknesses of the "pathology" and "correction" perspectives, and a theoretical reorientation of the delinquency field.

Quinney, Richard. *The Problem of Crime*. New York: Dodd, Mead, 1974.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rim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any views that make up American criminology.

Reiman, Jeffrey H. *The Rich Get Richer and the Poor Get Prison: Ideology, Class, and Criminal Justice*, 3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90. A Conflict analysis of the disparity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for the wealthy and for the poor.

Sanders, William B. *The Sociologist as Detective*. New York: Frederick Praeger, 1974. A collection of basic research projects on crime and police: how data are collected, and what facts you should trust.

Thomas, Piri. *Down These Mean Streets*. New York: Vintage, 1967. Still the best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the lure and pressure of "the life" of violence and drugs on a ghetto youth.

第3部分 对社会平等的挑战

美国人总是坚定地相信抽象的平等理想。从《独立宣言》里鼓舞人心的语句断言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到今天的种种政治言论，都可以为我们文化中这一根本的价值观找到充分的证据。然而，过去和现在的现实，以及仍然延续的不平等模式却与这种明确的理想背道而驰。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植根于平等的概念，但为什么会有不平等对待和不平等机会之类的问题发生？

社会科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这种理想与现实的不一致，在以下几章里我们将加以讨论。无论是什么原因，任何形式的不平等只要违背了人们的期待，剥夺了他们平等生活的机会，在公众意识到有必要加以纠正时，就从社会条件转变为社会问题。在这问题出现以前，一种理性化的舆论或意识形态——一套概括起来的信念——用于为现存秩序辩护，给社会成员提供一种安慰性的说教，以解释同平等理想的宣扬相违背的令人不快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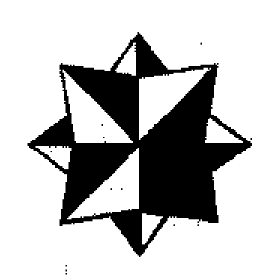
在第6章中，我们将讨论一个公认的不平等领域：少数种族群体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我们将讨论对少数民族的不平等对待是如何不仅遍布于我们的社会习俗，而且渗透到了经济、教育、法律和政治制度等领域。

贫困问题是一个通常与少数民族相联系的问题，我们将在第7章中集中讨论。和其他的社会问题一样，我们研究它的起因、影响和社会对它的认识，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种种努力。

性别歧视是第8章的主题，这是一个新近被界定的社会问题的领域。我们在此将关注的问题包括：当今社会中种种性别不平等的形式及形成这些形式的各种社会力量。

在读以下3章的时候，应该注意不同问题中的共同因素，比如广泛的公众的误解、成见、歧视活动、剥削和克服问题的努力。还要注意，大量的困难在于社会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受害者的任何内在缺陷。

第6章 种族和种族关系



关于种族和种族关系的几点事实

- 非洲裔美国人中的婴儿死亡率是白人的两倍多。
- 土著美国人中的杀人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 大约63%的非洲裔和71%的拉美裔美国学生上的实际上是种族隔离的学校。
- 拉美裔美国人中的辍学率是黑人和白人的2.5倍。
- 黑人的失业率45年来一直是白人的两倍。
- 亚洲裔美国人的教育水平和家庭平均收入在美国的所有种族群体中最高。
- 每年有超过100万的非法外国移民被抓，但估计大约有20万未被发现。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在提高少数民族的平等和机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60年代的民权立法以及之后联邦和各州采取的行动消除了许多公开的歧视形式，有效地改善了数百万少数种族人民的生活质量。这些变化令人鼓舞，以至于“全国促进有色人种协会”的前任主席本杰明·霍克斯宣称：“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的少数民族，像在美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了那么快速的进步。”[1]

然而，严重的问题依然存在。十分之三的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在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贫困包围着部落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在拉美人区、黑人区、贫民窟还是保留地，有大量的人居住低于标准、经济极度贫困。使**种族间关系**（intergroup relations）问题更为复杂化的是大量的移民和种族差异的日益加剧，引发了口头抗议、政治反对、种族暴力和犯罪等许多反对移民的活动。

社会历史背景

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得到白种美国人所享有的各种权利。直到1870年第十五修正案通过，非洲裔美国人才获得了选举权。土著美国人

在1924年才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并且经过了数十年的时间（直到50年代）才最后完成。亚洲移民过去在法律上一直被禁止入籍。美国历史上充满了种族奴役、剥削和驱逐的不公正的模式以及无数偏见、歧视和暴力的事例。这种严酷的种族主义传统至今仍影响着人际间的关系交往，因为美国人从未完全解决他们的种族关系问题，也没有在种族融合上取得任何进展，没有形成更加密切的社会关系。

在传统上，贫困的少数民族群体都居住在城市的聚居区，受到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和不同背景的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的蔑视、仇恨和躲避。19世纪的爱尔兰天主教徒、20世纪初的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及20世纪后期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都分别遇到过伴随城市贫困而来的犯罪、疾病、混乱、缺乏教育、失业和暴力等问题。今天和过去的一个关键性区别，就是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技术要求低的工作越来越少，这使得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向上攀升。

在历史上，每当有移民群体进入这个国家，美国的公众及其领导人就发出新来移民会“威胁”社会凝聚力的警告。今天人们对移民的“抱团”、种族、文化、语言传统和价值观以及他们维持**种族亚文化**（ethnic subcultures）等的种种担忧，不过只是老调重弹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接下来的一代——本土生长的成功的美国人，把那些以前被人们所害怕并被辱骂会损害“美国特色的力量和纯洁性”的群体同新近到达的群体相对照，称赞他们是勤奋和**同化**（assimilation）的榜样。自从这个国家创立以来，这种模式就多次重复。[2]

国际间的比较

曾经一度是主要的移民输出地的西欧，到1965年已逐步发展为一个移民接收地，这主要是因为本国人口的稳定产生了要求外来劳工增加劳动力的需求。从1989年开始，平均每年有230万移民进入西欧，使这些国家的人口进一步**多元化**（pluralism）和多样化。[3]这种不断的人口流入同样带来了许多问题。

比利时和瑞士两国的外国出生的居民人口比例高于美国，它们都是多元的、多语种的国家（参见表6.1）。比利时以荷兰语、法语或德语作为第一语言，而大多数瑞士人以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在这些国家，外来人口造成的问题都没有德国严重。在德国，法律阻止绝大部分外国人加入国籍，而新纳粹主义的暴力活动已经使十多人死

表6.1 一些国家的外来人口，1993年

国家	外来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例
澳大利亚（1991年）	4125000	22.7%
奥地利	690000	8.6
比利时	921000	9.1
加拿大（1991年）	4343000	15.6
丹麦	189000	3.6
芬兰	56000	1.1
法国	3597000	6.3
德国	6878000	8.5
爱尔兰	94000	2.7
意大利	987000	1.7
日本	1321000	1.1
卢森堡	125000	31.1
荷兰	780000	5.1
挪威	162000	3.8
西班牙	430000	1.1
瑞典	508000	5.8
瑞士	1260000	18.1
英国	2001000	3.5
美国（1991年）	19767000	7.9

资料来源：Continuous Reporting System on Migration,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ECD, Paris, 1996.

亡，并造成了大量的财产损失。

在整个西欧，外国出生的人常常居住在一些较为相互分离的地区或高层建筑中，他们的孩子都集中在附近的学校里。和本土出生的工人相比，他们的失业率较高，大部分有工作的人收入也较低，而且越来越低。他们还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敌视，因为当地人认为他们对国家的社会福利计划增加了额外负担。

问题的程度

在美国，无数相互交织的问题困扰着少数种族，使得很难找到有效的对策。尽管亿万美元被用于消灭贫困的计划，但仍有大量的非洲裔、拉美裔和土著美国人处于贫困之中。他们的生活环境日益孤立。在这些地区，高辍学率、长期失业、犯罪、不成比例的婴儿死亡率、成年人的过早死亡、低标准的住房、社会混乱和暴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1996年的两组统计数字突出地反映了美国黑人和白人在生活质量上的某些差异。黑人的婴儿死亡率是每1000例新生儿有14.2人，白人则为6.0人。[4] 黑人男子的被杀死亡率是每10万人有36.4人，白人为8.9人；同时，土著美国人的被杀死亡率是全国平均值的3倍多——16.4∶5.0。[5] 而一个婴儿安全存活和平静老死的机遇，非洲裔和土著美国人都要远远低于白人。

暴力对许多少数民族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实。如上一章提到的，在大部分案件中，受害人和犯罪者属于同一种族。根据美国民权委员会的说法，每年有数千起针对少数民族的暴力事件。它们包括用棒球棍进行殴打、焚烧家庭或商店、枪击、破坏财物以及1989年在迈阿密和1992年在洛杉矶发生的暴乱。在多种族混居的城市社区，难以驾驭的族间关系有时会引发严重的暴力冲突。[6]

由于居住布局中的隔离状况自50年代以来事实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下层和中产阶级的少数种族群体都可能与自己的同族人生活在一起。[7] 所以，居住格局是困扰少数民族的许多制度化的歧视领域之一。下一部分将会进行详细讨论。

制度化歧视

在种族关系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制度性歧视**（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全面渗透于社会习俗和制度（经济的、教育的、法律的和政治的）的对一个或多个群体的差别和不公平对待。

这种区别对待并不一定来自于偏见，而是由于主导群体对少数群体能力和作用的想象所至。因为这些看法渗透在社会结构之中，所以歧视是微妙的、非正式的，对社会成员来说是不明显的。因为这些行为可能不是有

意的，也不是由于仇恨，歧视的后果很难被发现。一切看来似乎都是正常和“自然”的。

例如，一个20世纪上半叶生长在南方的白人孩子，无须刻意去告诉他对黑人的歧视。一切都可以从身边观察获得。黑人不能和白人使用同一个公园、操场、饮水处、公共厕所、餐馆、候车室或火车车厢。他们总是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面，上不同的学校，而且常常很早辍学。他们生活在小街道的棚户、廉价公寓或低标准住房中，只干一些地位低、收入少的工作，而且警察常常以醉酒、吵架或更严重的犯罪逮捕他们。当白人孩子长大以后，黑人作为一个“下等”群体的社会地位对他而言已是不重要的和无可争议的了。那时很少有白人意识到，有关南部黑人的社会问题是由于黑人社会外部的歧视，而不是因为他们内在的缺陷造成的。然而，消除那些造成和支持这种种族分层社会的州法律，就可改变人们的态度、行为和生活方式。

只要稍加变化，我们就可以轻易地描述出许多其他的少数群体过去和现在在美国所遇到的相似经历。人和时间可能会变，但这种模式还在继续，而且常常把过错推到受害者身上，而不是形成这种状态的社会结构。但是对问题的错误界定阻碍了我们解决问题。以下我们将就制度性歧视的4个特殊领域——教育、就业、住房和司法——进一步加以讨论。

教 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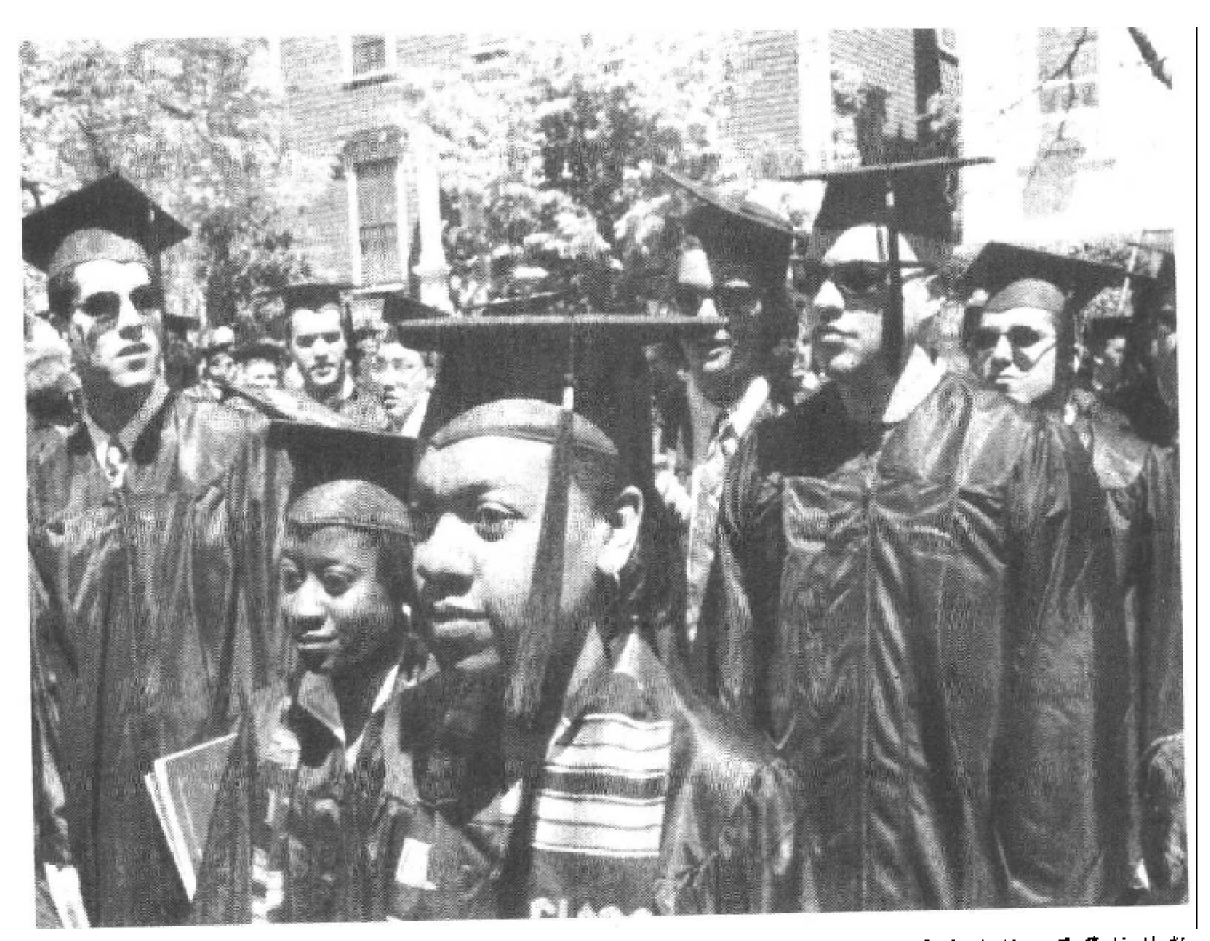
从托马斯·杰弗逊最早提倡推广大众教育至今，美国人对教育的方法与世界其他地方截然不同。不同于只把高质量的教育保留给经济或知识界的精英阶层，这个国家试图为所有人提供全面教育。虽然从未真正实现这个目标，但其潜在的思想仍然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文化之中。美国人对教育充满希望，把它作为提高社会地位、向上层发展、摆脱原来生活的途径。

但是，尽管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极为重要，教育体制为不同的孩子提供的教育质量却大不相同。社会等级和文化偏见也渗透在学校中。秩序、纪律、自我克制等中产阶级价值观对下层的孩子非常不利，他们的家庭环境鼓励更加自由的情感流露和较少的自制。大部分学校不再像两代人之前所常做的那样试图有意地抹除种族身份；多元文化的意识现在是教师培训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社会等级的偏见仍然常常导致学校重新产生阶级的不平等。[8]

校车作为一种解决办法 校车制度曾经是消除学校种族隔离的一个最普遍使用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少数民族青年的教育质量和成绩，他

们被认为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缺少正面的同伴作为榜样和“中产阶级”的教育环境。这种想法来自于1966年的一项研究，由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主持，一共在大约4000所学校、向57万学生和6万多名教师收集材料。[9]调查报告的惊人结论否定了传统的看法，认为是社会阶级背景而不是学校或教师的差别造成了教育成绩上的种族差异。

科尔曼报告暗示，将下层少数民族学生融入到中产阶级多数种族的学校，就能够使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又不会对大多数学生造成任何负面影响。这份报告对教育政策影响深远，推动了采用校车制度来取消隔离。早自1954年最高法院裁决布朗对堪萨斯州托佩卡市教育委员会一案摧毁了采取所谓“隔离但平等”双重体制的种族隔离学校开始，法庭及地方、州和联邦的各级政府便试图结束种族隔离学校，但却未能成功。今天，近三分之一的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在少数民族学生数量占到90%或更高的学校上学。从1972年起，63%的黑人学生在少数民族学生人数超过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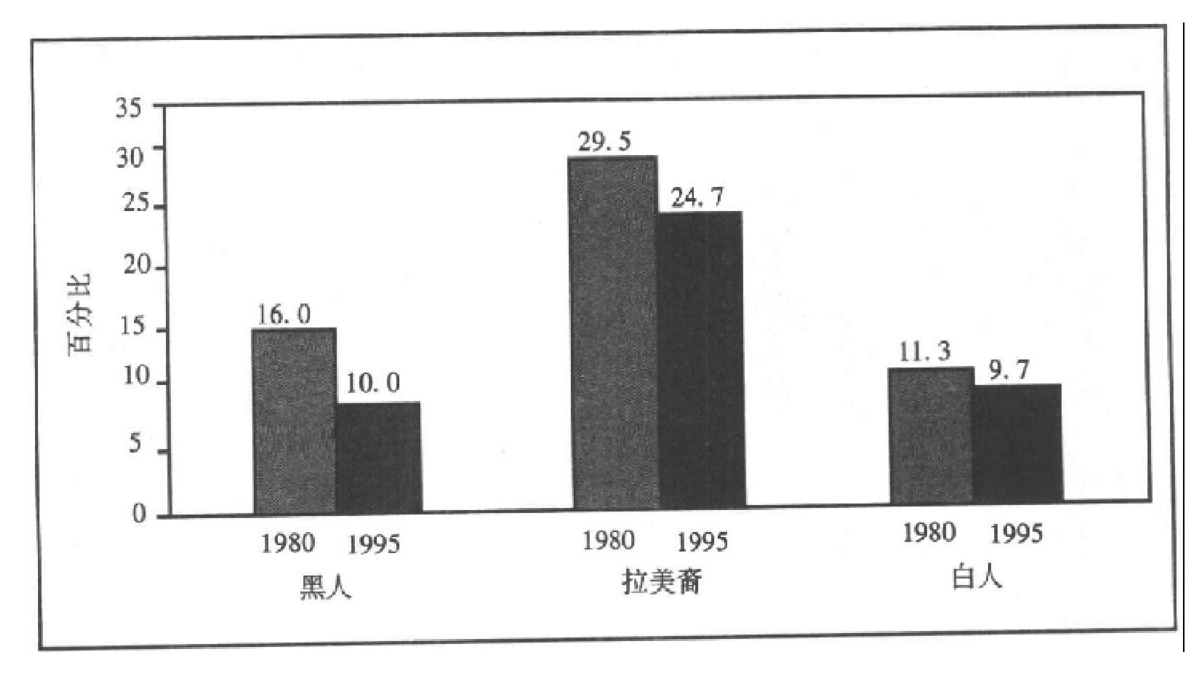
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相信，教育是提高社会地位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最佳途径。尽管统计数字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教育水平日渐提高，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在拉美裔和土著美国人中普遍存在的高辍学率。

50%的学校上学,而约71%的拉美裔学生进入少数民族占有优势的学校。[10]

居住格局 **居住格局**(residential patterning)可以帮助解释学校种族隔离现象的顽固性。许多白人从城市搬到郊区,使得黑人和拉美裔人大量集中在城市聚居区。1990年的人口统计数字显示,有900多万黑人生活在几乎完全的种族孤立的环境中,他们占美国黑人总数的约30%。即使在搬到郊区的黑人中,由于白人搬得更加远离城市,使得城市近郊黑人越来越多,因此种族聚居的状况依然继续。[11]但是,单单种族隔离并不会必然地导致学校教育不足。对于郊区的中产阶级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问题;而对下层城市居民来说,家长的关心和城市教会学校所培养的积极向上的风气,可以克服科尔曼报告中所揭露的社会等级的负面影响。[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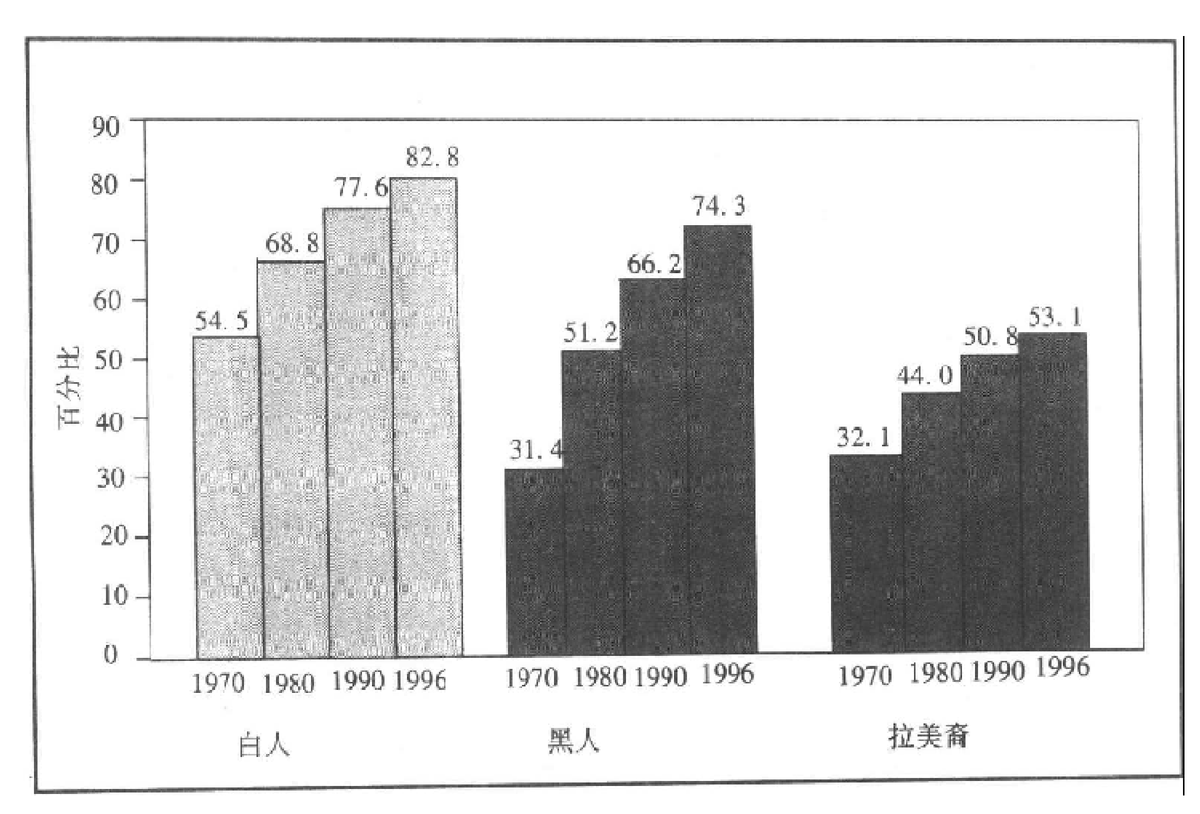
中产阶级黑人和白人出于对城市街区和教室里充斥的毒品和暴力的恐惧,到私立和郊区的学校去寻找相对的安全。因此,城市的公立学校变成主要来自下层少数民族的学生的天地,而资金不足常常进一步削弱了他们所受的隔离教育。而且,城市的公立学校不同于富裕郊区的新学校,许多都已年久失修。批评者认为,因为社会对学校物质条件的忽视,其氛围令人不快,而且传达一种教育并不重要的信息,恶化的学校环境使孩子不大可能真正学习。[13]

对某些学生来说,学校是个陌生的世界,在那里他们感到不自在和不够格。如果敏感的教师没能及时加以纠正,就会导致他们辍学。在下层少



图表6.1 辍学百分比:1980年和1995年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图表 6.2 受过 4 年以上中学教育的成年人百分比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d United States*: 1997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Table 243, p. 159.

数民族孩子中这一问题尤为严重（见图表 6.1）。那些留在学校的孩子则常常表现出学习成绩低下，这部分是因为环境的影响，以及教师的过低期望使他们失去了提高的动力。近年来，共同的努力使得少数民族学生进大学的人数有所增加，但是黑人和拉美裔仍然在教育成就上远远落后于白人。

学校种族隔离的继续 直到 1971 年前，法庭消除种族隔离的计划还主要集中在南部，它包括分配孩子就近入学（“分区制”）。之后，在斯瓦恩诉夏洛特—梅克伦堡区教育委员会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校车接送制度可以作为一种正常的和可以接受的教育政策手段”。此后 20 年里，法庭坚持在北部和西部执行（如反对者声称的）“强制校车接送制度”，试图通过跨越就近上学的界线，努力实现学校的种族平衡。通常主要是少数民族学生被校车接送到较远的学校上学。正如查尔斯·威利注意到的，在密尔沃基市用校车接送到其他学校的学生中，黑人孩子是白人的 9 倍，而在（北卡罗莱纳的）夏洛特－梅克伦堡区，这一数字更为接近，但黑人学生接受校车接送已有 4 年，而白人学生仅有两年。[14]

由于在南波士顿和路易斯维尔等地出现了愤怒的、甚至暴力的反应，进而又在新建的融合区引起了紧张不安，少数民族家长反对把孩子送到较

远的地方上学。此外，白人成群地逃离这些受到影响的区域，破坏了寻求种族平衡的努力。在米利肯诉布雷德利一案（1974年）中，最高法院的另一项裁决进一步促进了白人的逃离。法院认为，消除种族隔离的努力不能超出学校区的界线适用于整个城市范围（在该案中是指整个底特律）。1986年，最高法院允许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市结束校车制度"以阻止白人的外流"。之后在1991年，它又在俄克拉荷马城教育委员会诉多维尔一案的裁决中，推翻了原来把校车制度作为一种补救的做法，免除了所有有隔离情况学校必须按照法庭命令强行实行以校车制度为基础的消除种族隔离的责任。

对校车制度有效性的研究结果是不一致的。在消除了种族隔离的学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成绩确有提高，特别是如果孩子在受教育之初就处在一个积极的、多种族的课程环境时提高更为明显。[15]然而，这些肯定的结论是消除种族隔离带来的结果，而不是取得结果的手段。其他的研究显示，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差巨大的家庭背景、学校的种族紧张状况和在知识差异很大的学生中的竞争性课堂环境等因素，阻碍了他们取得任何明显的收获。[16]

其他消除种族隔离的努力 利用有诸如环境科学或美术和表演艺术等特色的公立学校〔即**磁性学校**（magnet school）〕的做法，美国取得了有限度的成功。它们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其所提供的学习，自动地吸引各个地区的家庭集中到一个地方，从而能够有助于消除种族隔离。例如，（马里兰州的）乔治王子县自从1985年开始推行磁性学校计划以来，在其教育机制中取得了更大程度的种族融合，而少数民族学生的成绩也大大提高。但是，磁性学校收费非常昂贵，并不是面向所有人的：全县三分之二的学生还是在少数民族入学率在10%～80%的传统学校中。[17]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采取了一项在全国最为雄心勃勃的消除种族隔离的计划（增加10亿美元资金用于改善校舍和教学），建立了56所高质量的磁性学校网络，现在少数民族的入学率（75%）已高出最初很多。总体而言，这些学校没能吸引郊区的白人回到城市的学校里来；它们的学生的实际考试成绩要略低于18所未加入计划的传统学校；它们有一半的学生最后没能毕业。[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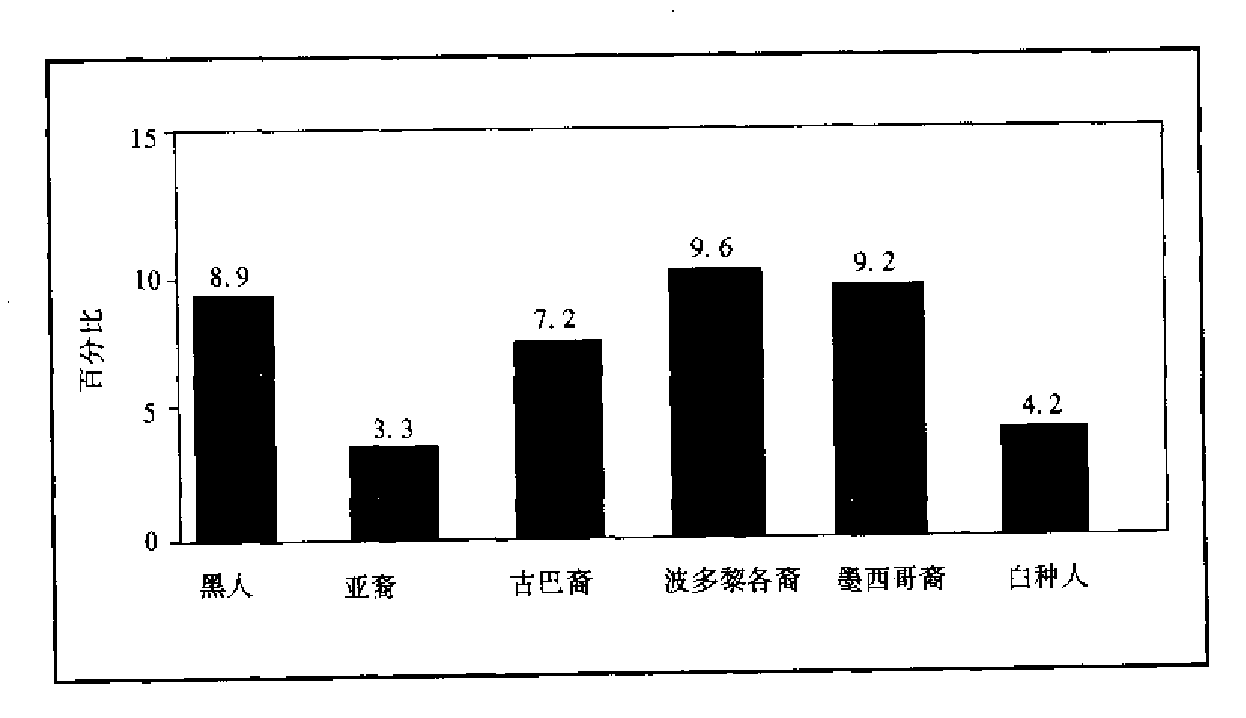
许多大失所望的少数民族家长现在坚持认为，只有少数民族学生的学校能够提供更好的气氛和榜样以满足其子女的需要。他们主张，如果将用于消除种族隔离的资金用于那些历来资金缺乏的少数民族学校会更好。堪萨斯城的J.S. 奇克黑人中心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缺乏先进的教学器材或大量的计算机设备，但其对阅读、写作、数学和科学等基础课程的高度重视，使学生的考试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学校用积极的努力让家

长参与其中，对他们的表现发布季度性的通报卡片，比如出席家长会的情况。[19]这一做法能否被施用到一般的公立学校尚未可知，因为那里的家长对孩子教育的关心和承担的责任较少。

许多教育家和社会学家还担心这种新形式的"分开但平等"的学校会产生危险的后果。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学生，如果不直接面对各种差异，就无法学会在一个融合的社会中合作共生。诸如一些孩子在J.S.奇克黑人中心学校等地上学的家长则认为，"分开但平等"的做法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的学校就要低人一等，而更高的考试成绩和毕业率都能明确证明这一点。

就　业

随着美国从一个工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后工业社会，其经济重心也由制造业转移到了信息和服务行业。大量原来的少数民族工人——甚至根本不会说英语的人——赖以获得收入和改善生活质量的低技术工种消失了。即使是服务行业中的许多初级工作，也要求相对较好的教育背景和诸如计算机等技能。那些辍学的或没有很好教育背景的新来移民因而难以有机会过上像样的生活。良好的教育和较好的职业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解释许多关于收入和失业的统计。



图表6.3　成人失业百分比：1996年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社会指标　美国黑人相对白人的失业率，自 50 年代以来一直保持在 2:1 的比率上。1996 年，黑人的失业率为 8.9%，而白人是 4.2%；拉美裔美国人的失业率据报告为 8.0%（见图表 6.3）。[20]

一个人的就业状况决定了他或她的收入水平。毫不令人吃惊的是，少数民族的收入远远落后于白人。如表 6.2 所示，黑人家庭平均收入占白人家庭平均收入的百分比在 1980 年来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但还是要比 70 年代低。拉美裔家庭的平均收入虽然一度曾高于黑人，但由于拉美移民的不断涌入和拉美裔人的高辍学率，现在已经低于黑人。在实际收入的钱款上，白人与黑人和拉美裔之间的差距比任何时候都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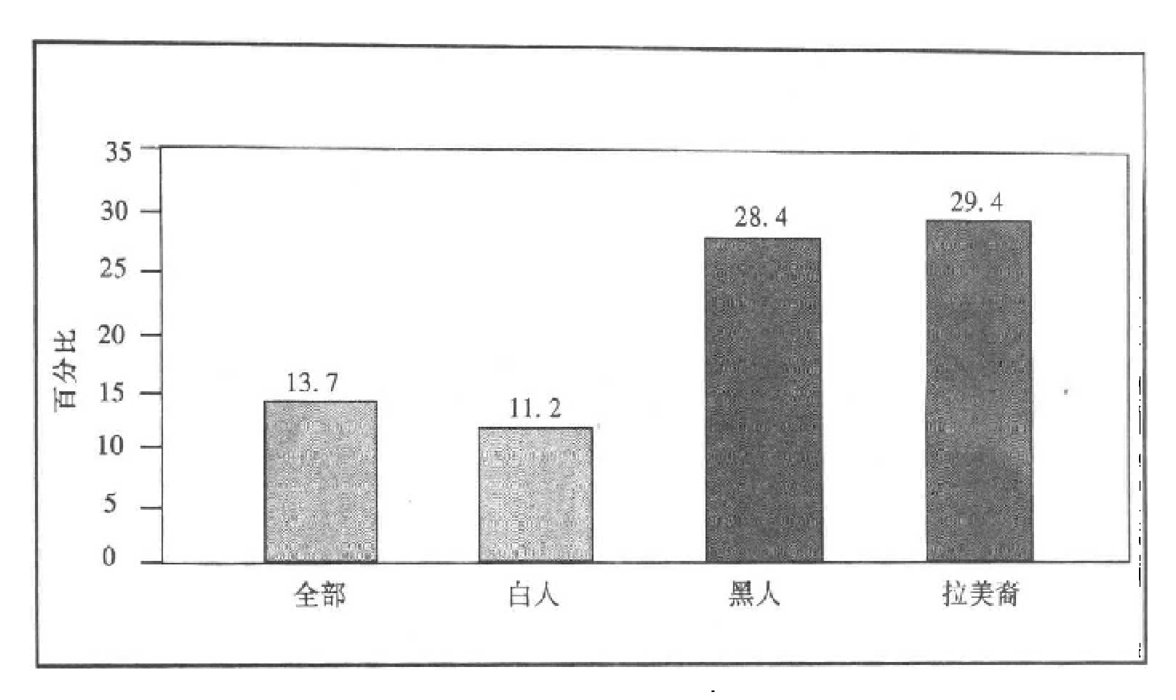
表 6.2　家庭平均收入（单位：美元）

年份	白人（美元）	黑人（美元）	拉美裔（美元）	占白人收入的百分比		实际收入差距（美元）	
				黑人	拉美裔	黑人	拉美裔
1950	3445	1869	不详	54.3	不详	1576	不详
1960	5835	3233	不详	55.4	不详	2602	不详
1970	10236	6516	不详	63.7	不详	3720	不详
1980	21904	13843	14716	63.2	67.2	8061	7188
1990	36915	21423	23431	58.0	63.5	15492	13484
1995	42646	25970	24570	60.9	57.6	16676	18076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724, p. 469.

另一项反映少数民族就业和收入状况的指标是贫困率（见图 6.4）。在 1959 年，55.1%的非洲裔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1996 年，这个数字为 28.4%。白人的贫困率在 1959 年为 18.1%，1996 年为 11.2%。到 90 年代中期以前，白人和黑人的贫困比一直保持着 50 年代以来的 3:1 的比率。1996 年拉美裔的贫困率为 29.4%，连续 3 年超过了黑人的贫困数字。

少数民族的雇用和晋升　围绕着赞助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计划的争论开始于 1964 年。当时民权法案中明确规定雇主必须证明提供了平等的就业机会。如果少数民族雇员的比例明显地低于整个劳动力水平，必须采取行动在以后的招聘雇用中纠正这种不平衡。同样，如果少数民族在管理岗位所占的比例明显不足，雇主也得采取行动纠正存在的差异。



图表 6.4 贫困人群百分比，1995 年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Table 736, p. 475.

保守的批评者，如黑人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随后就指出，民权立法并不是要制造一种“数字游戏”或配额制度。[21]他们认为，要求优待某些少数民族群体的解释非但没有保证在雇用中的平等权利，反而歧视了白人，并因此而把社会分割成许多对立的部分。他们认为赞助性行动毫无必要，并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的第七款，它禁止在政府和企业根据种族、性别和宗教给予优待。[22]而赞助性行动的支持者则坚持主张，这种优待是创造一个“同等的竞争条件”以抵消制度性歧视所极为必需的。[23]

法庭和政府领导人都同意后者的意见。大批州和联邦的政策原则影响到商业、教育和政府活动的许多方面。1972年通过的一项联邦立法给法庭以执行赞助性行动标准的权力。优待的计划已经成为大学和研究生院招生、就业和升迁中的一种规范做法，政府也将一些合约专门留给少数民族所有的企业。[24]在通过强制性测试决定候选人雇用和升迁资格的公务员领域，常常根据“种族标准”用统计技巧来调整测试成绩，或是给少数民族候选者加分，或是将黑人和白人分开单独评分等等。但无论如何调整，结果都是一样的：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被雇用或晋升，常常要领先于得分更高的白人。批评者指责这种做法不公平和有歧视性。1991年国会在修正民权法案中禁止了采用种族标准。

这种争论及所导致的社会紧张继续存在。从1989年开始，一个更为保守的最高法院显得越来越不愿意采取“自觉的补救”——即通过帮助少数民族试图克服过去的歧视——如赞助性行动、消除学校的种族隔离和选举权等。1995年在*艾达兰建筑公司诉佩纳*一案中作出了一个重大的裁决。法院决定，在采纳任何优待制度以前，必须“严格审查和证明”过去有否所谓的歧视活动，而不是“国内一般的种族歧视历史”。

对赞助性行动的最先发难是在1995年。加利福尼亚州的校务委员会禁止在招生时使用这一措施，并从1997年职业学校入学和1998年9月大学新生入学中开始生效。之后于1996年，加利福尼亚的选民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加利福尼亚州民权动议，禁止利用种族或性别“为标准歧视或优待任何个人或团体”，从而取消了该州的赞助性行动计划。1996年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庭在*霍普伍得诉得克萨斯州*一案中所作出的笼统的裁决，使得得克萨斯州司法部长把这一决定解释为在招生、发放奖学金及扩展计划中禁止实施赞助性行动。因此，在1997年秋季这两个州法律学院的少数民族学生入学率急剧减少。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法学院新入学的少数民族学生从1996年的31名黑人和42名拉美裔学生，减少到1997年的只有3名黑人和20名拉美裔学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波特·豪法律学院从20名黑人和28名拉美裔学生，分别减少至1名黑人和18名拉美裔学生，而同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则由19名黑人学生减少至10名，拉美裔学生由45人减至41人。[26]

在以后几年里，毫无疑问我们将会看到继续不断的冲突和变化。如我们所了解的，结束赞助性行动的运动有着极为强大的后盾支持。然而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令人清醒的统计数字，也激励着那些支持赞助性行动的人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的结果还不得而知，但所展开的斗争几乎没有人能够无动于衷。

住 房

和所有有价资源一样，高质量住房的分配也极不公平。毫不令人吃惊的是，最差的住房更多地是集中在受到歧视的穷人和少数民族之中——简而言之，就是在那些“社会选择最少”的人中。他们的选择随着廉价出租房屋的逐步衰退和租金的不断上升而进一步减少。从里根政府（1981～1988年）开始及此后，联邦政府就一直在削减对低收入住房的资金投人，尽管对此的需求不断增多，而可用住房数量又在下降。[28]

除了政府缺乏努力之外，房产所有人追求更多利润的趋势也进一步减

少了承受得起的住房数量。在许多大城市，房东将数以万计租金受限制的公寓撤出市场，只希望能把它们改制为公私共有或合作制的形式。[29]因此，专家预计到2003年，对廉价租房的需求将达到1700万，而供应量只有1000万。[30]所以无须惊讶的是，保护儿童基金会指出，家庭收入减少和低价房屋的紧缩是造成今天无家可归现象的两大因素。

种族隔离 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学校种族隔离的问题与居住隔离联系紧密。在大多数地区，美国的少数民族仍然高度集中，常常也是隔离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街道或街区。黑人和拉美裔人往往居住在城市，而白人逐渐地搬到了郊区。不过黑人也在向外迁移，居住在中心城区的人数从1960年的78%减少到1994年的50%左右。[31]然而，即使少数民族生活在被归为郊区的社区，但并非都是属于那些新兴的黑人或拉美裔中产阶级。陈旧的、毗邻的“郊区”实质上常常带有城区的特征，而且主要居住的也都是低收入的少数民族。例如在对15座最大城市所属的全部郊区所做的研究中，皮埃尔·德·维斯发现最为贫困的10个郊区社区，要么主要是黑人，要么主要都是拉美裔人。美国最穷的郊区是芝加哥以南约25英里的海斯堡，那里的失业率超过25%。[32]

美国日渐表现出一种居住隔离的格局，有色人种被限制在那些衰败的城市中心和毗邻的旧郊区，周围是白人占优势的新兴郊区。随着郊区办公场所、工业区和购物中心的增多，以及社交、文化和娱乐设施的发展，越来越少的郊区白人居民会冒险进入中心城区，种族隔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

昨天的政策，今天的问题 今天的种族住房格局部分地反映了50年前的联邦立法和政策决定。二战以后由于退伍士兵、生育高峰、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以及大萧条和战争期间住房建设较少，国家遇到了严重的住房危机。1949年通过的住房法案强调在空地建房，而不是改造和重建已开发地块（参见第13章）。随着政府支持私人建筑商和为购房者提供低价抵押贷款，郊区迅速地繁荣起来，相应的商店、医院、教堂、办公楼、企业和其他公共设施也随之兴起。在50年代，成果极为喜人：住房危机就此消失，一半的美国人可以买得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这种最初的白人逃离情况，加上联邦住房管理部门只同意将相邻地区的住房抵押贷款给那些在社会和种族上相同的群体，造成了城市和郊区种族隔离的住房格局。居民、房产商、银行和市镇领导悄悄地贯彻实行着这一新兴的价值取向，以支持这种同质的社区。在60和70年代，城镇增加了对新房子的最小土地面积限额，以努力限制有学龄儿童的家庭数量，从而控制迅速增多的学校开支。因此，单独家庭住房的价格盘旋上升，使许

多人买不起房子，特别是那些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

有时居住在一个种族隔离的社区是一些少数民族有意识的选择。例如新兴的富裕黑人郊区住宅区，吸引了许多喜欢生活和交际于共同种族环境中的中产阶级黑人，如迈阿密附近的洛林橡树区，亚特兰大附近的布鲁克谷、帕诺拉米尔区和温德汉姆园，圣路易斯附近的黑杰克区、詹宁斯区、诺曼底区和大学城。同样，许多黑人居住在马里兰州郊区的乔治王子县，在那里他们占了总人口的55%，共同生活在一个富裕的但黑人占多数的社区或街区。[33]

当然，人们选择生活在他们希望的地方，并从中获得满足的现象似乎并不构成社会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这种格局是否会使因为限制了种族间的社会交往使得种族关系中的问题继续下去。



今天的拉美移民正在重复着当年欧洲移民定居美国的模式，常常按种族聚居。在他们开办的商店里，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招牌、广告杂然并立，反映了典型的第一代美国移民所具有的多元性和同化的双重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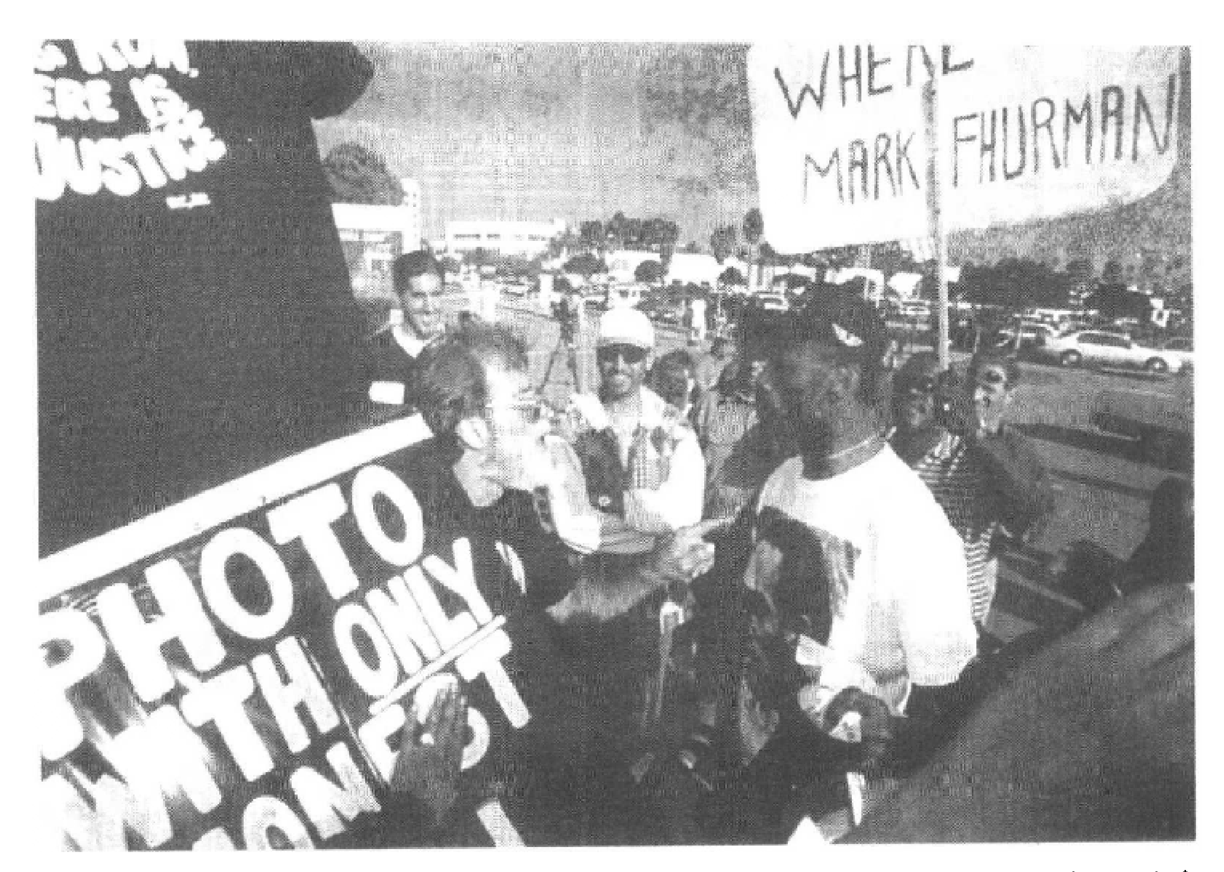
司 法

制度化歧视的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司法制度中。蒙住眼睛手持天平的正义女神形象代表着美国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但在事实上，法律体系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他们的偏见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偏见。扮演这一制度看门人的警察，决定被告命运的陪审团成员和判罪量刑的法官都试图做到尽量客观。但如许多研究所示，主观因素影响着他们的行动。[34]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处于社会经济阶梯底层的少数民族群体不成比例地占据了被捕、定罪和入狱的大部分。从前或现在，爱尔兰人、中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黑人、印第安人和拉美裔人都受到了这一法律制度的不平等对待。同早期的少数民族群体一样，今天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群体成员都是一些守法的公民，他们和主导群体成员一样热切地希望对罪犯加以严格监禁，因为他们自己最经常地成为街头犯罪的受害者。由于其在大城市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增大了他们进入陪审团的可能，所以他们也常常可以有机会这么做。尽管如此，不平等存在于整个刑事审判体系之中，以下几点原因可以用来说明存在的这种不平等：

1. 警察不成比例地逮捕少数民族成员的倾向，甚至是在一些自由决定的情况下。
2. 法官对有少数民族被告的案件订立很高的保释金的倾向，惩罚性地对他们加以拘禁。
3. 穷人交纳保释金存在困难，这可能使他们在开庭之前就要入狱数月备受折磨。
4. 由于陪审团的组成一般大部分是拥有较高社会经济等级和常常属于不同种族背景的人，对少数民族被告来说陪审团中缺少与其同等的人。
5. 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水平低下。
6. 对犯有相同罪行的少数民族和主导民族成员刑罚的不一致。[35]

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法律体系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它极为典型地（并错误地）认为低收入少数民族群体的一个“特性”就是无视法律。这一消极的定性和怀疑导致了更严格的监视、更频繁的逮捕、更高的定罪率和更为严厉的刑罚。为了说明这一点，美国司法部属下的全国改造研究所根据加利福尼亚、密歇根和得克萨斯的一些数据进



司法制度中的种族区分在人们近来关于辛普森一案的不同反应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受到两项谋杀的指控却又被无罪释放。潜藏在黑人们对判决的欢庆之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美国黑人很少得到警察和法庭的公平对待。

行了一项为期两年的研究。它显示，在同等的罪行中，对黑人和拉美裔人量刑要长于白人。[36]

而且，如第 5 章所指出的，同早期的种族群体一样，黑人和拉美裔在监狱中不成比例地占了相当大的数量。尽管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只占不足 13%，但在全部监狱犯人中占了 45%。而占人口 9% 的拉美裔人占到了全部犯人的 14%。[37]为什么少数民族群体成员与主导民族成员之间，在暴力和财产犯罪以及逮捕、定罪和刑罚中有这种不同？在某种层面上讲，答案在于刑事审判体制中存在偏见，但这又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因为社会问题存在相互联系，在教育和就业中的根源问题首先被解决之前，这一制度性歧视也许不可能被克服。

特殊的问题领域

需要提醒一下的是：由于特定群体中的文化差别和经济变化，在以下

按肤色区别人们的各种分类中，存在着大量的差异。例如，在483个正式确认的土著印第安文化中，部落的生活状况中有经营着一个数百万美元商业帝国的帕萨玛阔底族，也有失业率高达90%的穷困潦倒的罗斯布德苏族。美国的黑人包括加勒比地区和非洲的移民以及本土出生的黑人，而在经济上他们中有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也有陷于贫困之中的下层阶级。拉美裔美国人中包括属于中产阶级的古巴、尼加拉瓜和南美来的专业技术人员，属于工人阶级的萨尔瓦多人和哥伦比亚人及贫困的波多黎哥人和墨西哥人。亚裔美国人中包括中国和日本的商人、科学家，韩国的企业家，菲律宾的护理工，以及为获得经济保障而苦苦奋斗的下层印度支那劳工。然而，尽管在种族内部千差万别，但白人和非白人美国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深刻地说明了种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土著美国人

美国近200万土著印第安人中，约51%生活在农村的部落土地上。剩下的49%居住在城市，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周围。大约三分之一的青壮年为了寻找更好的经济机会而离开保留地，但到老年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又回到老家，最后在保留地了却他们的余生。[38]

有约12%的印第安人年龄在10到19岁之间，而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中在这一年龄组中的人只有9%。但是他们高中毕业的人数却要少于其他少数民族（55.4%对66.5%），完成大学学业的人也较少（7.4%对16.2%）。[39]较低的教育程度可能是源于他们不很相信教育与个人未来之间的联系，以及贫困生活所带来的隔离、绝望和失意的感情。[40]

长期失业在大多数保留地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常常要超过50%，有时（如在罗斯布德苏族人中）甚至高达93%。即使是在开办了锯木厂和滑雪度假地年收入达3900万美元的白山阿巴契人中，失业率也达到21%，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整体而言，居住在保留地的贫困人口的比例在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三之间。[41]

比起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住房拥挤的印第安人数量更多。约有一半得到印第安人事务局帮助的家庭住在低于标准的住房中，其中三分之一的房屋破旧不堪。[42]七分之一的家中缺少足够的供排水设备，使得传染病的传播更为迅速。对新墨西哥州印第安人的一项研究发现，他们之中因为肺结核、流行性感冒、肺炎、肾脏感染、脑膜炎和寄生虫病等传染病所导致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其他的人口群体。[43]

非洲裔美国人

在黑人移民中，海地人的失业和贫困比例最高。牙买加人一般在服务行业找工作，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方面，而非洲移民则有可能受过较好的教育和进入中产阶级职业中。在土生黑人中，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现实世界。一方面占到70%的黑人人口，主要是工人或中产阶级，他们与有着同等教育背景的白人相比，收入要低24%～27%左右，这也是种族歧视长期存在的一个标志。[44]另一方面是剩下的30%，是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这一贫困人口的比例是白人的3倍，而自50年代以来这个三比一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

如在关于贫困和家庭的章节中早已充分讨论过的，大部分贫困的黑人孩子和青年生活在女性为家长的家庭。在1996年，31%的18岁以下黑人孩子生活在单身母亲为家长的家庭，而总计53%生活在由于死亡、遗弃、离婚或单身而造成的只有母亲的家庭中，[45]其中超过一半的家庭处于贫困线之下。通常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工作技能和教育资格有限，从而阻碍了他们挣取足够的金钱来摆脱贫困，即使他们能够将孩子送到廉价的托儿所。

在过去25年里，黑人和白人间的教育差距已有所接近，因此今天25岁以上成年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差异并不明显。黑人的辍学率已由1970年的22.2%降至1995年的10.0%，几乎同白人9.7%的辍学率相等。虽然现在黑人高中毕业的百分比已接近白人，但其上大学的比率却没有和白人的大学入学率一起相应增加。1995年，63%高中新毕业的白人升入大学，1980年时为50%；而在1995年，只有51%的黑人升入大学，1980年时为42%。[46]其中的差距还由1980年的8%扩大到1990年的12%。

黑人中的婴儿死亡率是白人的两倍多。不过，即使侥幸长到十几岁，又会带来另一个严峻的现实。虽然他们只占美国全部人口的13%，但黑人却占了凶杀受害者中的一半人数，尤其是在15至34岁之间。[47]事实上，凶杀是导致黑人男性死亡的首要因素，他们遭到谋杀的可能是白人男子的8倍多。[48]

拉美裔美国人

拉美裔美国人现在占到了全部人口的10%。人口统计局估计，到2013年，他们将成为美国最大的一个少数民族，到2050年，五分之一的美国人都会有一部分拉美血统。[49]在我们考察拉美裔中的社会问题时，无

须过多关注古巴裔人。古巴人现在是美国最富有的拉美裔群体。他们保持着很高的教育和家庭收入水平以及较低的失业和贫困率。在本节的剩余部分，主要是指原籍是波多黎哥、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拉美裔美国人。不过要牢记，即使在这些群体中仍存在着大量的社会经济差异和波动。

教育状况尤其令人失望。在1995年，16至24岁的拉美裔人的高中辍学率为24.7%，而黑人和白人分别为10.0%和9.7%。到1995年底，25岁以上的拉美裔男子中47%没能高中毕业，非拉美裔群体相对为16%。

在贫困率和平均家庭收入上，拉美裔比黑人和白人更糟。与1995年白人4.2%的失业率和黑人8.9%的失业率相对，拉美裔的这一比例为8.5%。1996年他们中有29.4%生活在贫困之中，略高于黑人的28.4%，远高于白人的11.2%。1995年，拉美裔人的平均家庭收入比黑人少1600美元左右，而比白人要少1.8万美元。[50]

大约58%的拉美裔美国人居住在出租公寓中，相对黑人和白人中的比例分别为56%和31%。[51]因为他们主要集中在城市住宅区，所以同早期欧洲移民社区非常相似。虽然这样增强了种族的团结，但也如前面所说的，造成了社会的孤立和学校的隔离。

亚裔美国人

在1990年，亚裔美国人占了美国总人口的3%。根据目前的人口形势，到2000年这个比例可能会增加一倍。由于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收入超过了包括白人在内的所有群体，因此常常被称为“模范少数民族”，亚洲人似乎比其他种族群体更加同化。在2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38%都是大学毕业。相比之下，白人为24%，黑人是13%，拉美裔为9%。因为他们的敬业精神以及在管理和专业职位中人数众多，使得亚裔美国人的平均家庭收入要比白人家庭高5000美元，几乎是黑人的两倍，比拉美裔家庭高出三分之一。[52]

然而，在这些喜人的笼统的统计数字之下，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实。许多小的亚裔群体，如柬埔寨人、老挝人和越南人并不成功。他们的平均家庭收入，尤其是在那些没有掌握英语的家庭，只有白人的一半。那些在黑人或拉美裔城市聚居区经营小生意的亚洲人可能会受到仇视，有时甚至会升级为社区居民以联合抵制、故意破坏或其他更严重的方式进行的种族冲突。即使是成功的中产阶级亚裔在郊区要得到接受也非常困难，在社交上依然常常与别的美国人相隔离或被排斥。[53]

一些黑人、拉美裔和白人对亚洲人的仇视，或许是因为种族歧视及西

方和非西方文化的区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亚裔在黑人或白人社区中所表现出的种族内部的团结。少数民族种族群体总是较为“抱团”的，在自己本民族的人中互相交往寻找安慰。然而，他们通常都是在自己所住地区的种族群体之中这样做。但中产阶级亚裔无论是居住在一个以前种族单一的郊区，还是作为城市种族聚居区的店主，都带来了一种迄今无法确知的种族划分，这也常常引起了其他种族的敌视。

亚裔美国人的大量成功有时会引发嫉妒，导致消极反应。贫困的城市少数民族或许会嫉妒自己周围的亚洲人所取得的经济成就。非亚裔的郊区居民会认为亚洲人过多地赢得了大量的奖学金和其他奖励，而作出敌对的反应。其实这些成就都源于亚裔人在各方面更为努力。某些大学已开始歧视性地对待亚裔的入学申请，以防止他们在学生总数上占据过多的份额。

非法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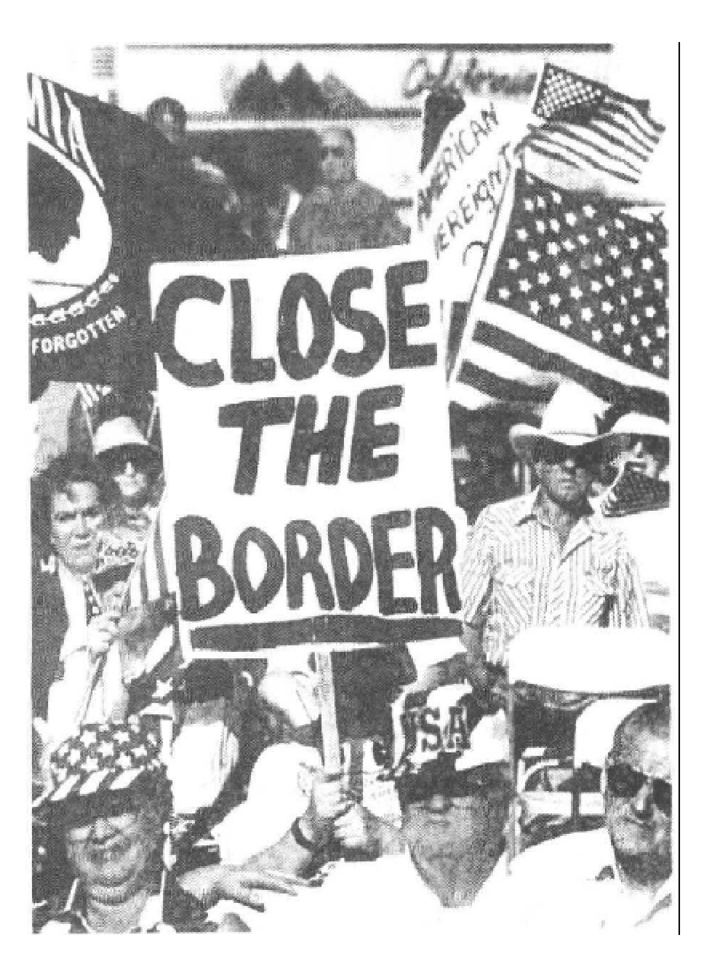
虽然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证明的外国人来自一百多个国家，但大部分都是来自墨西哥。由于人口增长（1980年为6870万，预计到2010年将达1.13亿人）和经济贫困，驱使许多墨西哥人来这里寻找更好的机会。美国移民和归化署的侦探每年要逮捕100多万非法移民，但据估计每年仍有大约20万人侥幸逃脱。

1986年的移民和改革法案规定，只要能够证明自己是在1982年前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就可以得到特赦并有机会获得公民权。但只有不到300万人要求合法身份，远低于官方所预计的数字。由于缺少有效的证据证明自己在1982年已在美国，或是因为文盲而担心无法在规定的18个月里通过公民和英语考试，或是害怕1982年之后来美国的其他家庭成员会被发现而遣送回国，因此许多非法移民选择了继续生活在地下状态。[54]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非法进入或滞留在美国，而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开始对他们的存在显示出反感。

非法移民问题因为许多原因激怒了美国人。最通常的抱怨是，这些外国人不纳税，却在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开支上占用纳税人的大量款项。这一问题在收容了80%外国出生人口的6个人口稠密的州尤为严重。它们是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得克萨斯、纽约、伊利诺斯和新泽西。批评者指出，非法移民降低了工资水平，取代了低技术的美国工人，后者常常是一些其他的少数民族。然而，另一些观察家反对这一指责，认为非法移民从事的是一些没人愿做的工作；他们支付的租金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财产税，间接地用来支持公立学校；而且通过他们的消费也对经济有所帮

助。

近来这种公众敌意最生动的例子，可能是1994年加利福尼亚59%的选民支持通过的第187号提案。这项措施旨在禁止政府资助的教育和医疗机构对非法移民开放，尽管不久便对它是否符合宪法提出了质疑。这一行动的基础是1982年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根据第十四修正案中所规定的“任何州……也不能在其辖区内拒绝给予任何人平等的法律保护”，法官投票以5:4决定，得克萨斯州必须为无身份证明的未成年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反对这项裁决的人声称，宪法中所界定的“人”并没有包括非美国公民，他们故意非法进入，并因此而拒绝了合法的管辖。



美国人，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对涌入的大量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感到非常愤怒和担心。这些本土主义情绪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反移民活动，让人想起了20年代，当时国会过激地通过了限制移民的法案。同样受到批评和攻击的是旨在帮助移民的赞助性行动和双语计划。

反移民情绪

随着每年超过90万新移民的进入，其中约85%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要求采取新的限制移民政策的呼吁越来越多。本土主义者的担心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无数有色人种的进入所带来的人数优势，再加之国内的低出生率将极大地改变人口的种族结构。其他的担心还有，某一外国语种（西班牙语）人口数量的巨大，以及大量的非西方（亚裔）因素的存在会破坏美国的文化和社会凝聚力。[55]

这些担心常常表现为一些特定的行动。双语教育的反对者（参见第10章）认为，学校应该为熔炉提供"热量"，而不是成为"巴别塔式的课堂"。[56]在80年代，只使用英语的立法在三分之一的州被通过，直到1990年一位联邦法官以违反第一修正案为由取消了亚利桑纳州官方的英语法令。尽管报纸的民意测验和学者的研究显示，移民子女在家长的鼓励下，学习英语的速度与早期的移民群体一样快，但许多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仍然担心外语的影响。[57]

经济因素也导致了负面的影响。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主要接收移民的州，新来的移民成为经济上的竞争者。个案研究显示，移民有时会取代本土工人的职位，在某些"种族飞地"的职业，如农业、看门、家政服务和其他无须技能的工种，移民还会降低工资标准和工作条件。[58]

经济学家乔治·波尔加斯认为，因为现在许多移民工人都缺乏技术，因而他们降低了美国劳动力的质量和平均收入。[59]不过其他的研究显示，移民加强了国家的经济。1986年，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总结指出："作为一般规律，（移民）所带来的产量增加……比由于竞争所造成的工人收入的下降更为重要。"[60]80年代的一项纵向研究显示，大约1100万移民劳动者，其中包括150万大学毕业生，每年收入为2400多亿美元，交纳900多亿税收，远远多于他们在社会福利中估计所获得的50亿美元。[61]

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的分析可以为深入认识种族间的关系问题提供有益的帮助。功能主义和冲突论的观点分析那些使制度性歧视长期存在从而把某些群体排除在主流之外的因素。这些宏观的观点也解释了压抑的紧张情绪和偶尔爆发的暴力冲突，就如相互作用论的方法一样，它还考察了群体外成员作出

的社会解释所带来的后果。

功能主义观点

功能主义分析的前提是，在一个理想结构的社会机制中，所有部分都平稳地相互发生作用。将一个社会联系起来的社会黏合剂就是**规范整合**（normative integration）——相互共享价值观和态度，使人们可以平等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不过，在不平等的状况下社会也能平稳运作。由于社会所需的工作要求不同水平的才能和专长，也产生了不平等的报酬（收入和声望），因而社会不平等可能是源于一个功能上整合的社会。有时，一些群体发现自己在劳动分工的自然过程中处于等级下层，如没有技术的移民成为了农业劳动力。

无论是快速的社会变化，还是影响到更广泛社会的群体内部的功能障碍，都会打破社会平衡。例如，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很快地把流入的大量文化迥异的移民吸收进它的文化，就会发生体制的解体，甚至部分被同化的少数民族群体不断地会产生各种问题。新的和老的少数民族群体都保留着足够的区别可以减少社会的统一和团结。

促进融合的措施的失败会增加种族间的紧张和冲突。这种情况会导致社会的功能障碍。因为它不给人们以作出自身贡献的充分机会，从而大大浪费了人力资源。这种体制的解体如果不及时纠正就会顽固存在，导致某些群体一代代被剥夺平等的机会。随着限制机会和参与传统的继续，缺乏教育、收入、失业、住房、健康和寿命以及犯罪和青少年行为不良等问题就会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而少数民族人民也要继续忍受这些问题。歧视导致的社会功能失调，使得生产力下降，社会福利援助丧失，成为社会动荡和相互对抗的根源。

功能主义者强调，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将社会机制恢复到平衡状态。必须进行有效的改革消除歧视，消除阻碍获得完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机会的种种障碍。如果我们做出了这些调整并重建我们的社会机制，就建立起了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培养了相互尊重与合作的精神。一个完全整合的社会将可能产生最少的冲突；但我们也可以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达到团结，只要所有的群体都接受和尊重彼此的权利和亚文化。如果所有人都能和平共处和合作，如果美国社会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核心，差异就不会产生任何的不和。

冲突论观点

由于人们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往往会变得更加充满敌意，因此许多社会科学家仔细地考察了经济竞争和冲突所造成的歧视。美国历史上记录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当失业率升高和就业竞争增大时，就会出现种族对抗。这一模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适用于许多不同的种族群体：西海岸的亚裔；南部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东北和中北部工业州的南欧、中欧和东欧人；及（60年代以来）全国许多地方的黑人和拉美裔人。

经济剥削是造成不平等的关键原因。雇主常常放弃非少数民族而雇用廉价的少数民族工人。当劳动力市场依据种族界线如此划分之后，种族歧视、种族主义和敌视就会产生并支配了工人间的冲突。[62]此类例子不计其数：19世纪末塞缪尔·贡朴斯和美国劳工联盟试图禁止华人进入美国，19世纪90年代在宾夕法尼亚州杀害匈牙利和斯拉夫矿工的事件；1919年随着回国的战争老兵与移居北方的黑人就业竞争，在许多城市发生了种族骚乱。

血汗工厂依然存在并剥削着少数民族工人。由于语言障碍、缺少财力或非法移民身份，使他们无力反抗低廉的工资或危险的工作条件。但无论在工厂还是农场，非法和合法的外国工人都接受低于美国标准的工资，因为这还是要好于他们原先的情况。这种情况降低了该地区的工资标准，取代了本土出生的美国工人，致使出现了对抗和直接冲突。当制造商发现劳动力价格因为劳资谈判而升高时，便常常把工厂迁到南部没有工会的地区，或是墨西哥、斯里兰卡、韩国或台湾等地，从而造成在受到影响的美国工人中对那些在海外取代他们的人的种族歧视。

冲突论者用“谁受益？”这一提问考察了过去和现在的少数民族问题。拥有特权地位的社会成员努力维持其地位，只允许一小部分新来者进入他们的圈子。为了扩大自身的利益，他们利用那些没有权力的人，并制造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强化其主导地位。随着这种信仰体系渗透于社会，所形成的错误意识欺骗人们使其认为，他们所看到的是一种“正常”状态。因而制度化强化了统治集团将下属群体视为劣等的错误观念。

相互作用论观点

相互作用论专注于不同群体成员的日常接触。当占统治地位群体和少数民族群体共有相近的价值观、外表和生活方式时，其相互关系便趋于和

谐并出现同化。然而，文化差别越大越明显，发生冲突的可能也越大，同化的过程也越困难。这一观点强调种族中心论的因素影响着情况的界定，它会导致不同种族成员间的误解和问题。

许多非拉美裔美国人把西班牙语的广泛运用，错误地解释为对使用英语作为美国社会的统一作用的一种威胁。他们声称早期的移民学习英语迅速，就此指责今天的新移民在思想和行动上为拒绝同化者。然而，相互作用论者分析了过去和现在的移民，指出第二代的亚裔和拉美裔确实把英语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由于大众传媒的影响，学习速度甚至比早期移民更快。而且，非西方移民加入美国籍的比例远高于西方人。这也表明他们希望加入而不是分离于美国的总体之外。在第一代美国人中的内部团结和社会孤立是一种正常的模式，但它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除非是受到了种族障碍的阻挡。

种族、宗教和其他文化差异会造成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猜疑和紧张。尽管从殖民地时期至今，美国一直存在着种族差异，但美国人在过去和现在都很少知道如何去处理社会交往中的多样性。种族关系的历史阴沉笼罩，而且至今尚未解决。宗教偏执虽然在过去更为强烈，但它以许多形式继续存在。人们仍然以种族中心论的观点对不同亚文化的特点（外貌、饮食、习俗等）表示反对。

在维持歧视态度的不平等的结构性条件发生改变以前，相互作用论者提出了两项策略来改善种族间的关系。第一，通过教育和积极的相互交往机会开导公众，从而加强种族间的理解、宽容和接纳。第二，一旦公众关于种族间活力的意识有所提高，种族中心论态度的弱化能够创造出一个更为宽松和包容的气氛。

未来的选择

过去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虐待依然伤害着美国社会，但在欧洲移民的后裔身上情况则不是这样。那些原先受到虐待的白人群体现在已经高度融合了，即使他们保留了天主教或犹太教以及其他文化特征，从而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加多元的国家。今天的移民——主要是亚洲人或拉美裔人——来自许多完全不同的国家，使人们对过去的同化模式对他们是否仍然适用产生了疑问。让我们根据目前的趋势预测一下一些未来的可能性，当然预料不到的事件或许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令未来的图景发生戏剧性的改变。

悲观的前景

过去30年里美国社会的人口构成急剧变化。今天在2030年，黑人人口占了总数的15%，拉美裔为23%，亚裔为10%，土著印第安人为1%，总共占了美国总人口的49%。白人人数从1990年占总数的75%大大缩减。由于其职业地位和积累的财富，白人仍然掌握着政治权力，并绝望地试图保留自己的权力基础。

较之从前，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更加多元和多种族的社会，但观察家怀疑她的统一还能维持多久。受到魁北克独立的鼓动，严重的分裂主义在西南部和佛罗里达等地活动——拉美裔在这些地区高度集中，实际上几乎没有其他种族群体居住在那里。随着这些地区被暴力活动和恐怖主义爆炸事件弄得混乱不堪，随着它们的议会代表四处进行煽动并在国会立法中设置障碍，以及随着它们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包括极高的贫困率及随之而来的巨额福利和社会服务开支）对国家经济的损耗，许多非拉美裔的领导人也开始认真地权衡允许这些地区正式脱离的益处和可行性。

黑人也是被高度隔离的，他们主要生活在旧的中心城区和被白人放弃的一些郊区。虽然贫困和失业仍是很严峻的问题，但黑人至少在这些城市地区达到了结构上的同化。他们现在占据了其社区所有社会机构的主要决策地位，包括市政、经济、教育和法律上的。由于不断地向外迁移，全国性公司已不再将总部设在这些城市，大部分都搬到了郊区。

然而，许多公司在城市保留了全部是黑人的办公场所、专卖店或制造厂。在私营的黑人商店、餐馆及服务机构、公务员和市政工作之外，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实际上，这二十多个主要的黑人城市已成为美国国内的一个个微型国家——在为其居民提供工作、休闲和居住方面完全独立，只不过在食品和其他物品的“进口”上还大大依赖于白人的美国。联邦的大笔补助和国内救济计划帮助维持着这些城市中的种族飞地。

国家被意见不一的争吵搞得四分五裂，失去了民族认同感和共同感。文化的整合被文化分裂取而代之。为了重新获得自我感，最为开放吸收的国家封闭了它的边界，严格限制合法和非法的移民。所有人都要求随时携带身份证明；在就业和支付工资时身份证明要经一台主计算机反复核对。因为激烈的就业竞争，黑人和拉美裔经常发生冲突。有时他们的愤怒指向白人，白人自身也普遍地将亚裔美国人想像为社会动荡背后的黑手，试图为自己攫取权力。亚裔早已完全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并在西海岸和东海岸的其他地区获得了优势。他们大部分属于中产阶级，是国家第二个最强大

的群体，同远东国家建立了非常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严重地影响着美国的内外政策。土著印第安人仍然在保留地饱受贫困之苦。新的千年刚刚过去30年，美国的多元性就使本土主义者最坏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乐观的前景

到2030年，经济从低潮中的复苏和工商业向先进的计算机时代成功转变，为美国带来了一个发展和多样化的时期。它不再只有3个主要的信仰——天主教、犹太教和基督教新教——而是有许多主要的信仰，包括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全国大量的拉美裔人口使天主教成为最大的宗教实体（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天主教）。宗教的多样性并没有成为冲突的一个源泉，因为平等的教育机会和经济保障为所有人创造了一个文化整合的社会。

几年前，政府的决策者就将精力主要集中在为全体公民实现经济自足，把它作为建立文化联系及减少种族间歧视和紧张关系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州和地方的规划控制代替了市政当局，使地方管理成为一个被废弃的概念。这使得大范围地将高、中、低等收入的住房规划同工商业相结合成为可能，使各种类型的人可以相互接触。教育、就业和住房的成功整合促使少数民族进入主流，消除了陈旧的消极的固定模式。最近对刑事审判制度的统计反映了这种种族间的和谐：没有一个少数民族群体在州和联邦监狱里不成比例地过量出现。

重视经济作为实现种族间和谐的关键做法延伸到了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以及印第安人保留地和中心城区。美国以南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在阻止合法和非法的民潮上比其他任何措施都要有效。尽管仍有拉美人移民美国，但其数量更便于管理，因为他们本国经济条件的改善减轻了移民压力。那些带有职业技能的移民更容易融合其中。

群体融合和经济平等的成功，在双语教育中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每个学生现在都能流利地讲两种语言，不再有围绕这一计划展开的争论。美国大量使用西班牙语的亚文化拓宽了其他公民的文化视野，美国不再死守着自己是惟一一个使用一种语言的发达国家这个可疑的特性。今天，学生学习的不是“外”语，而是“当代”语或“世界”语——这些提法说明在美国人的世界观上，种族中心论的色彩有所减弱。他们不仅学习西班牙语，还有阿拉伯语、汉语、德语、日语、俄语和别的语言。

当然，某些问题仍然存在。紧张的生存关系及偶尔的爆发，提醒人们美国虽然成功地实现了多元文化，并被戏称为“西半球的瑞士”，依然有

着不同种类的人，他们并非总是能够互相理解和欣赏。然而2030年的美国对黑人和拉美裔来说，相比35年前已今非昔比，就像1995年的德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相比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情况一样。

小 结

1. 美国历史中包括了许多涉及有色人种与白人种族团体的剥削与冲突的事例。最近几年，西欧也经历了巨大的移民潮，产生了类似于美国的反应模式。虽然在美国取得了许多成功，但仍有不少严重的问题，包括健康、住房、教育、就业、收入、安全和生活质量等。
2. 美国人将教育视为向上攀升途径的想法忽视了体制中存在的偏见。对一些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学校是一个有着陌生的价值取向和对文化麻木不仁的异己世界。校车制度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但它仍是一个制造分裂的计划，现在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甚至比30年前更严重。虽然磁性学校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许多心灰意冷的家长现在开始提倡纯粹少数民族学校的存在。
3. 尽管少数民族工人取得了一些收获，但他们仍然不成比例地大量失业，并易受经济冲击。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不到白人家庭的三分之二，黑人高出3倍的贫困率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赞助性行动计划受到批评，随着加利福尼亚州的采取行动，它可能在全国被取消。以后几年中这一问题将会继续引起争论。
4. 住房的隔离仍是一个严峻问题，尤其是在黑人和拉美裔中间。一定程度上，这一形势要归于过去政府所制定的歧视性政策，以及人口迁移模式和就业现实。刑事审判体制也暴露出严重的不平等，少数民族在整个过程中——从被捕到服刑——过量和不成比例地受到苛刻对待。
5. 土著印第安人中10至19岁年龄组的人口比例要高于（而在教育程度上要低于）其他人群。失业、贫困、低标准住房和健康状况恶化仍是大部分保留地的共同问题。
6. 三分之一的美国黑人生活在贫困中；在他们之中，婴儿高死亡率和凶杀率继续存在。越来越多的黑人接受了高中教育，但他们的大学入学率依然落后。
7. 除了古巴人之外，拉美裔美国人中有着很高的辍学率和贫困率。
8. 除了一些印度支那难民，亚裔美国人在教育和经济成就的各种统计中都表现良好，但他们还是受到其他美国人的各种消极反应。

9. 非法移民在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中引起愤怒和采取行动的要求，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第187号提案。由于害怕非西方和说西班牙语的新移民数量继续上升，反移民情绪在抬头。经济问题是造成这种种族对抗的另一个主要因素。
10. 功能主义者把社会无力吸收大量移民视为一种功能障碍。在他们眼中，体制的不平衡已顽固不化，必须采取必要的改革来消除歧视。冲突论者强调对少数民族的经济剥削，以及特权等级维护自身地位的努力。相互作用论者集中认为，问题的产生是因为误解和缺乏共同认可的现实。

关键词

赞助性行动	磁性学校
同化	规范整合
种族亚文化	多元化
制度性歧视	居住格局
种族间关系	社会经济地位

推荐书目

Bouvier, Leon F. *Peaceful Invasions: Immigration and Changing America*,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2. A demographic and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population, with arguments for lowering the current legal limit.

Chavez, Leo. *Shadowed Lives: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in American Society*.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1992. Informative insight into skilled and unskilled Mexican alients residing in the urban and rural United States.

Hacker, Andrew. *Two Nations: Blacks and White, Separate, Hostile, Unequal*. New York: Scribners, 1992. A data-extensive comparison of social indicators and power that assesses the relative status of the two races.

Kitano, Harry H. L., and 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ns: Emerging Minoritie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88. A thorough sociohistorical

profile of the different Asian people who have 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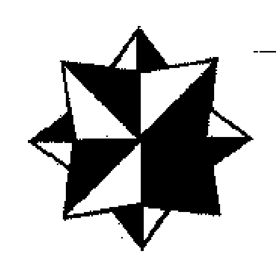
Moore, Joan W., and Harry Pachon, *Hispan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5. A fine sociological portrait of values,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diversity among Hispanic groups.

Parrillo, Vicent N. *Diversity in America*.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1996. Examina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dispel misunderstandings and anxieties about our future.

——. *Strangers to These Shores*, 5th ed. Boston: Allyn & Bacon, 1997.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ethnoracial and religious groups and issues that confront American pluralism.

Snipp, C. Matthew, *American Indians: The First of This Land*.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9. A demographic profile of Native Americans, with detailed reports on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housing.

第7章 贫 困



关于贫困的几点事实

- 美国有超过3600万人——美国人口的七分之一——生活在贫困中。
- 在生活贫困的美国人中，45%是非拉美裔的白人，27%是黑人，22%是拉美裔人。
- 九分之一的白人生活贫困，亚裔为七分之一，黑人和拉美裔为十分之三。
- 与其他的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有更多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
- 在美国，55%的穷人生活在中心城区以外的农村或郊区。
- 穷人中婴儿的死亡率是其他美国人的两倍。

贫困不是本书大部分读者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一种情况。事实上，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你整个人生中你根本不可能直接面临这一问题。那么，如果像《圣经》中所说的，“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你们为什么还要去关心他人的不幸呢?[1] 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的责任），还是贫困者自身必须战胜的一个个人问题呢?

尽管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同意，我们只能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理解贫困问题，而不是仅仅关注于贫困者这一亚文化群。贫困或许是一种经济现实，但它的持续——以及某些相关社会问题（犯罪、吸毒、教育低下、单亲家庭和暴力）——说明改善贫困者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如果美国社会打算消灭这些贫困的副产品，除了向贫困宣战外，它还必须做更多的事情。因为物质的贫困并不是大部分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贫困造成数百万美国人堕落和受苦的各种因素。

社会历史背景中的贫困

尽管有许多人成功和富裕，但美国长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贫困

问题。1937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明确承认："我们国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住房、衣物和营养上条件极差。"到 1964 年，对穷人而言情况并未有什么改变，林登·约翰逊总统发动了一场消除贫困的战争。这一运动所基于的假设是，贫困家庭由于缺乏教育，无法适应社会，使得贫困问题持续存在。根据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观点：

> "贫困衍生贫困……贫困的父母无法为孩子提供可以改善他们命运的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机会。相对于缺乏经济手段，缺少诱导、希望和鼓励是一个更加具体、同样有力的障碍。所以贫困的残酷遗产从父母又传递到孩子手中。"[2]

之后的政府计划试图通过丰富儿童文化生活的早期干预计划（包括各种各样的尝试如领先行动、学前教育中心和《芝麻街》节目等），消除贫困亚文化中的这种自我沉沦的问题。通过各种培训计划（职业介绍公司、综合就业培训法案、志愿者服务及社区行动等计划）使成年人重新社会化，使其重建自信，并重新培养成人的工作态度，找到获取收入的机会。



七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白人所占数量最多。美国的贫困儿童比其他发达国家都多，对他们而言，未来一片黯淡。由于从小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严重贫困和缺乏教育，即使成年以后，他们也很难有机会摆脱贫困。

虽然有些计划完全或部分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消除贫困之战所取得的成果却有得有失。

贫困之战有限的成功，促使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竞选运动中再次重申，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晚上饿着肚子睡觉。在进行干预的年代，贫困水平波动不定；今天，美国——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仍然有着几千万的贫困公民。尽管花费了数亿美元的金钱用于反贫困和社会福利计划，但仍有七分之一的美国人处于贫困之中。1995年，黑人的贫困比例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低点，而拉美裔人，部分是由于近年来的大量移民，则达到了他们至今的最高比例(参见表7.1)。

表7.1 低于贫困标准人数的百分比

年份	总人口	白人	黑人	拉美裔
1960	22.2%	17.8%	不详	不详
1970	12.6	9.9	33.5%	不详
1975	12.3	9.7	31.3	26.9%
1980	13.0	10.2	32.5	25.7
1985	14.0	11.4	31.3	29.0
1990	13.5	10.7	31.9	26.2
1996	13.7	11.2	28.4	29.4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国际间的比较

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贫困中。[3] 虽然有些居住在发达国家，比如3650万贫困的美国人，但大部分都分布在发展中国家。最贫困的国家中有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尼泊尔、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然而，对贫困进行国际间的比较非常困难，因为各个国家在发展阶段、生活标准和生活开支上的差别极大，常常难以进行有效的对比。所以，比如贫困在美国所指的就完全不同于索马里，在那里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

不过，一个有意义的比较尺度是发达国家中的失业率。因为美国的许多穷人都有工作，所以就业也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评估贫困的标准。然而在一个工业化社会，失业即使不能反映真正的贫困，至少是预示贫困威胁的一个指针。如表7.2所示，美国在25到64岁成年人失业率最低的

表 7.2 各个国家 25 至 64 岁的成年人失业率（1996 年）

1. 卢森堡	3.1%	8. 新西兰	6.1%	15. 比利时	9.8%
2. 日本	3.4	9. 荷兰	6.3	16. 瑞典	10.0
3. 瑞士	3.7	10. 葡萄牙	7.3	17. 意大利	12.0
4. 奥地利	4.4	11. 英国	8.2	18. 爱尔兰	12.3
5. 挪威	4.8	12. 澳大利亚	8.6	19. 法国	12.4
6. 美国	5.4	13. 德国	9.0	20. 芬兰	15.7
7. 丹麦	6.0	14. 加拿大	9.7	21. 西班牙	22.2

资料来源：*Standardised Unemployment Rates*（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7）.

表 7.3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一些发达国家的儿童贫困状况

国家	年份	贫困儿童百分比 政府救助前	贫困儿童百分比 政府救助后	经政府救助摆脱贫困的儿童比例
美国	1991	25.9%	21.9%	17%
澳大利亚	1989	19.6%	14.0%	29%
加拿大	1991	22.5%	13.5%	40%
爱尔兰	1987	30.2%	12.0%	60%
以色列	1986	23.9%	11.1%	54%
英国	1986	29.6%	9.9%	67%
意大利	1991	11.5%	9.6%	17%
德国	1989	9.0%	6.8%	24%
法国	1984	25.4%	6.5%	74%
荷兰	1991	13.7%	6.2%	55%
挪威	1991	12.9%	4.6%	64%
卢森堡	1985	11.7%	4.1%	65%
比利时	1992	16.2%	3.8%	77%
丹麦	1992	16.0%	3.3%	79%
瑞士	1982	5.1%	3.3%	35%
瑞典	1992	19.1%	2.7%	86%
芬兰	1991	11.5%	2.5%	78%

资料来源：Lee Rainwater and Timothy M. Smeeding, "Doing Poorly: The Real Income of American Children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rking Paper No. 127,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Maxwell School of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ffairs（Syracuse, N. Y.：Syracuse University, 1995）.

发达国家中排名第六。如果我们假定失业与贫困两者相互关联的话，按人均统计，我们发现日本、瑞士、奥地利和挪威的贫困率低于美国，而爱尔兰、法国、芬兰和西班牙则要比美国高得多。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所收集的数据也显示，情况确实如此。[4]

然而，当我们比较各国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数量时，出现了一幅并不太令人乐观的情景。如表7.3所示，比起其他发达国家，很大一部分美国儿童生活较差，即使是在接受了政府的援助计划之后。

谴责穷人

因穷人艰难的经济处境而对他们横加指责一直是美国人的一个普遍做法。它至少已经有了150年的历史，从早期大量爱尔兰移民在城市贫民区定居，并为了克服歧视和改善生活而奋斗之时就已出现。因为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数以万计贫困移民寻找经济机会的灯塔，所以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一直将贫困和新来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联系在一起。无论哪个少数民族群体处在社会经济阶梯的最底部，他们同时代的本土美国人常常都认为，是他们群体中带有缺陷的文化价值观或先天的能力不足导致了其贫困。

这种想法何以会盛行那么长时间并不难理解。美国的信仰体系是以个人主义和广泛的经济机会为中心的。在这个国家，拥护者坚持认为，如果一个人工作努力并投入地与他人进行竞争，就能够“成功”。通过各种从乞丐到富翁的例子来证明这一信仰，一代又一代美国人一直将经济上的失败归咎为懒惰、无能和其他想像中的属于那些失利的个人和群体的性格缺陷。[5]

智力作为一种解释

社会科学家们引起争议的分析常常导致以智力原因指责人们贫困的倾向。1973年，理查德·赫伦斯坦提出，穷人的智力要低于不贫困的人，而他们又常常同智力较低的人结婚，因此生育出低智力的孩子。[6] 随着在1994年《钟形曲线》一书的出版，赫伦斯坦和查尔斯·莫雷重申了这种遗传学观点，将低智商和贫困、依赖福利、违法和犯罪联系在一起。[7] 这一陈旧的、令人怀疑的观点附和了过去一度反对来自南欧和东欧的贫困移民的类似主张。[8] 然而有大量的证据驳斥了这一观点。[9] 好像是施展了魔法，

人们经济状况的变化会改变他们"智力"测验的结果。而且，有许多穷人生养的孩子后来通过努力成为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

贫困文化

另一个更加被公众广为接受的解释，是认为穷人形成了一种**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以适应其环境。根据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10]以及爱德华·班菲尔德[11]等人的观点，贫困现象的持续加强和循环发生，是因为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了引起贫困的价值观和态度。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信仰和行为方式包括冷漠、屈从和宿命论的态度；对学校教育的不重视；倾向即刻的满足而不是节俭；早期性体验和导致的意外怀孕；不稳定的家庭生活（常常是专制的和以女性为中心的）；以及对权威的不信任，无论是警察、学校、政府或社会机构等任何形式。刘易斯指出，当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他们对生活和工作的消极倾向使他们难以进入社会的主流。刘易斯观点的批评者，如威廉·莱恩和查尔斯·瓦伦丁则声称，只有当我们首先认识到导致贫困的社会原因之后，它才可能被消灭。对他们来说，低收入的人们本身就是受害者，而不是制造问题的人。

莱恩坚持认为，**指责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的做法导致了社会计划的方向错误：由于将后天从社会上获得的贫困耻辱归因于遗传的个性缺陷或有缺陷的亚文化价值体系，我们忽视了造成受害的社会力量的持续影响。结果，外界的干预力量试图帮助"紊乱的"黑人家庭，而不是克服种族主义；或者他们努力培养低收入孩子"更好的"态度和技能，而不是改进他们所上的低质量学校。[12]

瓦伦丁指出，刘易斯所谓许多穷人的"阶级特性"，实际上是"外部强加的状况"（失业、住房拥挤和恶化、缺少教育），或是"不可避免的情势所迫"（对社会制度的敌视、期望降低、消极的自我形象）。[13]瓦伦丁认为，穷人拥有许多与中产阶级相类似的积极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但所处的社会环境迫使他们为了生存形成某些特殊的亚文化特性。只有改变贫困者可获得的资源和改革社会结构，才能改变贫困亚文化的特性。

这种主张贫困的过失在于贫困者个人的理论争论，应该使你想到我们在第1章中有关性格缺陷的谬论和似是而非论的论述。在此，贫困者因为所遭受的贫困而受到分析，以决定他们与其他人有多么不同。而后，这些业已认定的差异又被错误地界定为造成贫困这一社会问题的原因，进而推动公共资助计划以根除或减少差异。早在这些计划开始之前，就注定了它们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们没能发现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

贫困的性质

乍一想来，贫困似乎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来解释：缺少足够的金钱来满足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但多少钱才足够呢？使人获得这些必需品的最低标准是什么？例如，高于贫困标准的住房满意程度的最低条件是什么？一个人可以自己付房租和穿较好的衣服还贫困吗？一个家如果没有电视机和没钱去看电影还贫困吗？为什么某些地区生活必需品的开销高于其他地方，或者为什么农村人口不同于城市居民，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靠土地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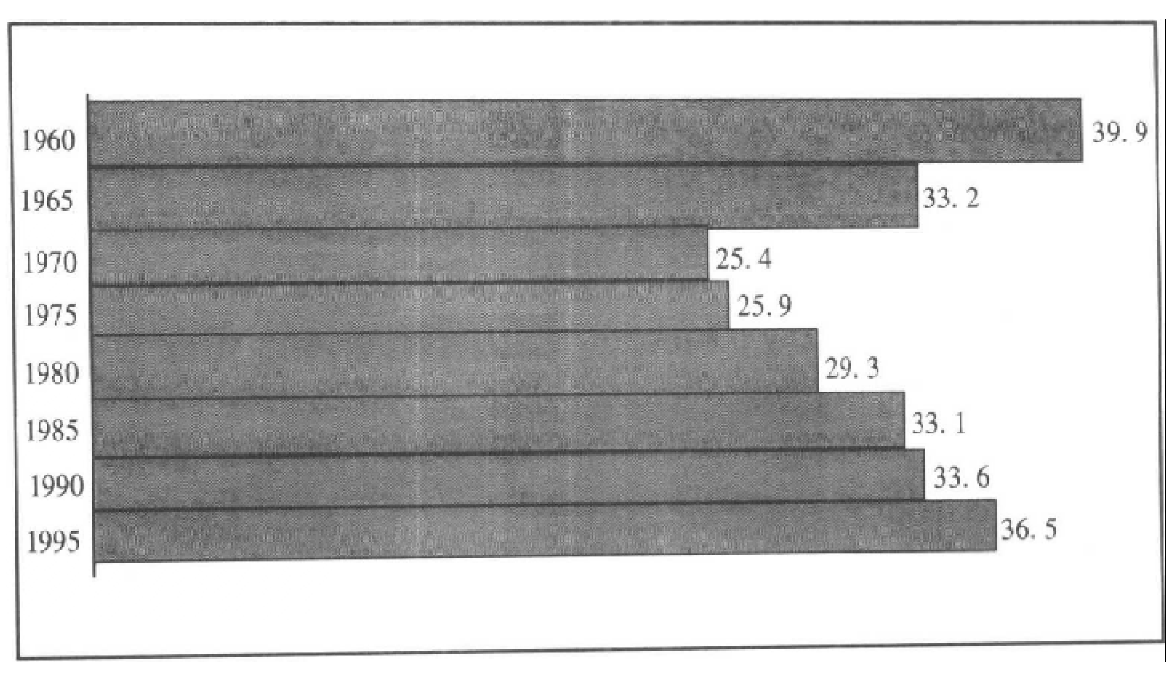
对贫困的准确定义实际上很难阐明。穷和不太穷之间的界线应划在哪里？尽管有困难，但如果要帮助穷人，就必须先对其加以确认。许多专家为了这个问题而努力，而他们的建议通常都基于这样两个主要思路之一：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绝对贫困

为了避免主观地判定贫困的缺陷，联邦政府和其他官方机构使用**绝对贫困**（absolute deprivation）的方法，它将收入作为决定性因素。它假定，一个家庭需要最低数额的金钱以确保其生活的基本必需，如果达不到这个最低数额，就应归之为贫困。

根据政府的研究显示，贫困家庭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以购买食物。同时农业部提供了满足最低营养标准的食物的平均价格，因此社会保障部每年用这些数据确定贫困收入线。社会保障部将每年的食品开支数字增加3倍，加上整个的生活支出的变化因素（如消费价格指数），然后根据家庭的规模和是否为农业家庭，确定不同的贫困标准限度。例如，1996年一个非农业的4口之家平均最低的贫困限度是1.6183万美元。

贫困指数的变化 根据绝对贫困的条件，贫困的美国人数量在向贫困宣战期间有所下降，从1960年的3990万（22%）降至1975年的2590万（12%）。在之后几年，总数一直稳定在2500万左右，但到1980年又升高至2930万（13%）（参见图表7.1）。在这之后3年里，又有600万人跌到了贫困线以下。受害者或者是因为经济衰退，或者是因为旧的工业衰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在1983到1989年间，全国的贫困率稳定下降；然后在1994年、1995年和1996年急剧下降以前，连续3年里出现了相反的趋势，每年都有上升。[14]



图表7.1 美国贫困线以下人口数量，1960～1995年（单位：百万）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60－198.（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然而，许多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激进分子认为政府的数字过低，认为许多贫困的人根本未被计算在内。因为他们的身份是暂时的或非法的外国移民，或其住所是经过非法改建过的多家庭住房，或是他们生活在偏僻的农村根本无法统计等原因。另外一些批评者认为，官方的贫困数字太高，因为一些非现金的救济，如食品票证、住房津贴和医疗救济等，都没有包括在评估一个人的财政状况是否超过贫困标准的现金收入内。[15]

武断的指标 利用家庭收入水平来决定哪些家庭生活在贫困中是一种直接的衡量办法，但它也是武断的，因为生活费用在不同地区各有不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那些设定最低食品开支水平的联邦专家所假设的贫困者的营养习惯和消费知识可能并不正确。不同于中产阶级，贫困者不可能有钱在促销时大量采购；买报纸杂志剪下上面的食品赠券；购买大包装的经济实惠食品，或避免在其居住地附近食品和商品价格通常较高的商店购物。[16]

单纯依靠收入判定贫困者生活的一个问题是忽视了实物救助。例如，食品票证为有孩子的贫困家庭大约平均提供了家庭收入总数的16%。其他形式的支持——免费医疗、租房津贴和学校午餐计划等——也部分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低收入家庭的成员看病的次数通常要超过中产阶级的美国人。[17]

另一个关于收入的事实是，最贫困的家庭常常隐瞒打零工所获得的收入或来自亲友的资助，以便继续得到福利救济或减轻纳税义务。经济学家苏珊·梅耶和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夫·简克认为，低收入美国人的消费形式和生活状况与收入相比，提供了一个更加现实的估计贫困者物质生活水平的方法。他们的研究证明，25年多来，全国最穷家庭的花费远远高于他们申报的收入。事实上，这一差距在最近10年里进一步扩大，1990年，最穷的十分之一有孩子的家庭中，开支是其申报收入的两倍多。[18]

相对贫困

关注生活必需的绝对贫困的办法或许是最为广泛被接受的做法。但另一些专家认为，贫困者与非贫困者之间的关系，或美国的贫困者与世界的贫困者之间的关系，要更为重要。根据**相对贫困**（relative deprivation）的方法，贫困的定义在于人们相信什么才是他们的最低需求。

贫困的比较 在美国，今天的许多贫困者——尤其是那些家里有抽水马桶、电话和电视机的穷人——境况要比从前的穷人们好得多。当然，现在的生活标准要高于过去。例如，1994年梅耶和简克的研究揭示，比起70年代最贫困的家庭，现在即使是最贫困的家庭也很有可能是每人一个房间，以及完整的浴室、空调、中央暖气、电话和洗碗机等设施。[19]

心理尺度 贫困的心理尺度所包含的贫困的范畴常常令非贫困者深感不安：冷漠、犯罪、越轨、教育低劣和社会紊乱。例如，如果有强大的社区凝聚力，一个楼宇破旧的居住区并不一定是贫民区；而一个贫民区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无望、绝望和冷漠的心理状态，因此它可以存在于现代的高耸的住宅区中。如果人们感到自己远离了美国的平均生活标准，那么就不会认同主流社会，各种下层病态症状就会显现。[20]

谁是贫困者？

因为大部分美国人与贫困者并没有直接接触，他们主要依靠新闻媒体了解他们的情况。不幸的是，对城市少数民族的过分强调歪曲了国内的贫困现实，并助长了许多盛行的错误观念。在《另一个美利坚》这本60年代很有影响并帮助发动了向贫困宣战的书中，迈克·哈林顿谈到，大部分中产阶级美国人根本“看不到”贫困者。[21]普通人生活和工作在几乎没有贫困者的地区，这种隔离由于分区规划而进一步加强；高速公路绕过贫民

区；地方法规对沿街叫卖、乞讨和“不受欢迎者”的出现执法极为严厉。然而，当我们考察国内贫困者的真实状况时，情景却与过去的成见大不相同（参见专栏7.1）。

专栏7.1 关于贫困的社会观念中的偏见

美国及其决策者避免处理贫困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将某些贫困者归为有道德缺陷或是不值得帮助的。这一推理过程首先假定每个人只要做出努力，就能有许多好工作，都可以摆脱贫困并成为中产阶级。

这极具讽刺性，因为大部分穷人和所有人一样渴望成为中产阶级，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这同样也是那些中途辍学、没有工作、未婚母亲、从事抢劫或其他犯罪活动、沉溺于酒精、毒品的少数民族穷人的真实愿望。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主要是由于与贫困有关的原因才这样做的，它源于完全缺少财力和在与贫困斗争中的沉重压力。

无论是由贫困者还是华尔街的百万富翁所为，犯罪都是邪恶的，但从未有材料表明，穷人作为一个阶级比中产阶级或富人更不道德。（新闻媒体上现在充满了日渐上升的中产阶级的失业现象，但并没有人暗示过中产阶级的失业是因为懒惰。）

把贫困者归为不值得帮助，并不能减少贫困或与贫困相关的行为，其中包括犯罪率。虽然在学术界和理论界，对造成人们长期贫困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的相互作用仍有争论，但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当穷人在为摆脱贫困所做的努力失败以后，他们才放弃了主流的行为方式。例如，贫困者中形成单亲家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男性的高失业率，这使得所有肤色的贫困男子都有可能成为婚姻中的不稳定因素……

最后，真正的不幸是贫困本身。在观念的选择上少一点偏见、多一些关心，也许会有一些帮助，但仅仅只有一些。中产阶级青年不会行凶抢劫，而一些穷人却会，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惟一真正有效的解决与贫困相关行为的办法，就是消灭贫困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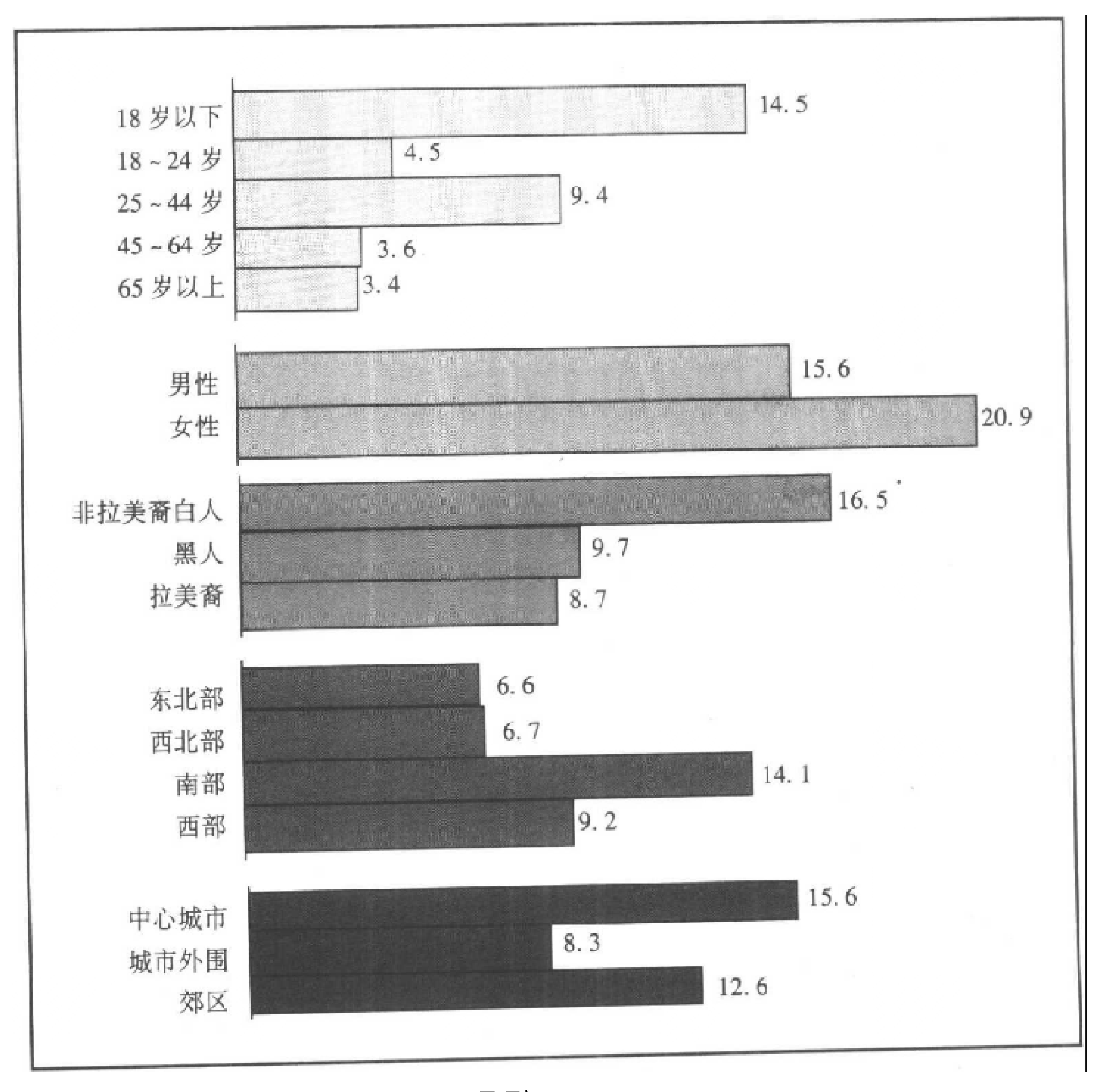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Herbert Gans, “Fighting the Biases Embedded in Social Concepts of the Poor,”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uary 8, 1992), p. A56.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These ideas are developed further in Gans's *War Against the Poo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少数民族地位

和普遍的想法不同，在美国最多的贫困人口是白人而非黑人（在1996年为1650万比970万）。在比例上，45%生活贫困的人是非拉美裔白人，27%是黑人，22%是拉美裔人，6%为亚裔或土著印第安人。[22]这些数字给了我们关于美国贫困状况的一个准确概况，但当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这些数据时，却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虽然几乎一半的贫困者是非拉美裔白

人，但少数民族在总数中仍然不成比例地高。黑人构成了全国人口的13%，但在穷人总数中却有27%；拉美裔在全国人口中只有9%，但却占了美国贫困者的22%。换一种表述，大约九分之一的白人生活在贫困中，但有十分之三的黑人和拉美裔人是贫困者（参见图表7.2）。

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有许多原因。从19世纪的爱尔兰移民开始，许多来自其他地方的穷人来到这个国家，以改善其经济状况。尽管有些人很快得到了经济保障，但大多数移民直到第二和第三代以后才进入到美国的经济主流中。由此，对存在大量少数民族贫困者的部分解释，就在于不断有贫困的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来到美国，而他们爬上社会经



图表7.2 谁是贫困者：1996年（单位：百万）

资料来源：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Series p60－198.

济阶梯又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幸的是，对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来说，向上攀升并非易事。几十年来，种族歧视一直剥夺了黑人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今天，贫困的非白种少数民族通常聚居在衰败的城市地区。在那里，无论是儿童的教育质量还是成人的就业机会都很有限。无论他们是居住在保留地附近的土著印第安人，或是西南部的墨西哥人，还是生活在全国各地的黑人或拉美人，缺少教育和职业技能限制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从而也限制了其收入。

家庭结构

1996年，全部18岁以下儿童中有28%（其中白人占22%，黑人占57%，拉美裔占33%）生活在单亲家庭中。[23]因为高离婚率和大量的非婚生育，所以有18岁以下孩子的单亲家庭数量从1970年的380万飞升至1996年的1170万。[24]由于一个家庭的结构与家庭的经济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一统计数字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例如，在1995年，一个有丈夫和家庭妇女的传统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是2.7567万美元，相对而言，一个单身女性为家长的家庭则只有1.946万美元。[25]

六分之五的单亲家庭由女性维持。有限的职业技能和教育、少量的工作和赚钱机会，以及找不到托儿中心或费用过高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女性为首的家庭较之其他家庭更有可能陷入贫困。事实上，生活在贫困中的这类家庭的数量在25年里几乎翻了一倍，从1970年的750万增加到1995年的1420万。[26]因此，女性为首的家庭成为增长最快的生活贫困的人口群体。今天，有18岁以下孩子的女性为首的家庭中的42%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27]

贫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与少女生育和非婚生育的高发生率相对应。[28]如表7.4所示，有八分之一的生育是少女生育，三分之一的生育是未婚母亲所为。一项研究发现，79%由未婚的高中辍学女生所生的孩子生活在贫困中。[29]在美国大陆，某些群体在单身母亲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之高：黑人、波多黎哥人和土著印第安人。考虑到前面所提到的经济现实，这些群体有着最高的贫困率就并非简单的巧合了。

表7.4 根据种族和拉美血统的出生情况，1994年

种族和拉美血统	出生人数（单位：千）	青少年生育百分比	未婚生育百分比
白人	3121	11.3	25.4
黑人	636	23.2	70.4
土著印第安人	38	21.0	57.0
亚裔及太平洋岛屿	158	5.7	16.2
菲律宾人	30	6.0	18.5
华人	27	1.0	7.2
日本人	9	2.8	11.2
夏威夷人	6	19.6	48.6
拉美裔	665	17.8	43.1
墨西哥人	455	18.6	40.8
波多黎哥人	57	23.2	60.2
古巴人	12	7.3	22.9
中美及南美人	93	10.4	45.9
总数	3953	13.1	32.6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89, p. 74.

年龄分布

18岁以下的孩子占了全国贫困人口的21%，这是最大的一个年龄段。这些孩子大部分生长在单亲家庭，一般由3口人组成（一个成人和两个孩子）。美国贫困者中另外18%的人是在18至24岁的年龄段。这些年轻人通常是高中辍学生，而且失业，或是从事低收入工作，或是单身母亲。合计共有39%的贫困者是24岁以下的人。另有13%是在25至34岁年龄段，65岁以上的人占了另外的11%。[30]

地域分布

由于媒体广泛的报道和贫困者集中于中心城区，大部分人对城市的贫困现象都很熟悉。然而，全国还有55%的穷人生活在中心城区以外的乡村或郊区。[31]乡村的贫困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规模机械化综合性农场降低了小型独立的农场的生存能力，使得许多没有技术



未满20岁的少女妈妈们由于自己还尚未完全成年就要担负起养儿育女的责任，她们所要面对的未来就更为艰难。当一个未婚少女成为母亲，她往往要辍学离校，找一份收入微薄的工作或是失业在家，同时还要负担一个贫困中的家庭。

的农村劳动者失去了谋生手段。同样，非农业乡村人口——如那些生活在阿巴拉契亚山脉、西南部和大湖区上游的人们——也只能找到一些临时或季节性的工作，而改善生活的机会几乎毫无指望。

相当大比例的农村人口生活在美国南部。因此毫不意外的是，全国的贫困者中约有40%也生活在这里，其中包括大量的海地难民、墨西哥裔和移民工人——它们也是全国最大的贫困群体中的3个。不过，农村贫困者中大部分仍然是白人。[32]

重复着几个世纪以来的模式，许多农村贫困者迁移到城市地区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然而，他们发现实际上根本没有工作空位，只有更高的生活费用、代替他们小木屋的廉价公寓、危险的街道、不卫生的生活条件以及早已生活在此的贫困者所遇到的种种城市问题。由于缺少教育、职业技能和就业前景，又不能像过去在农村那样捕鱼、种菜或捕捉猎物，许多乡村移居者要么求助于政府福利计划救济以保证基本的生存所需，要么不得不回到他们农村的老家。

贫困的影响

贫困造成的代价和后果，不仅对穷人本身有害，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的其他部分。只要贫困现象依然大量存在，美国社会就要损失相当多的、能够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他们交纳的税收和增加的购买力将会进一步刺激国家经济。在战胜贫困之前，纳税人必须承担巨大的责任，以保证急速发展的社会和福利计划、清理贫民区和城市重建工程及正在进行的控制犯罪行动。对贫困者来说，缺少收入事实上对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破坏性和侮辱性的影响。

健　康

由公共卫生部门支持的研究显示，相对于非贫困者，穷人患缺铁性贫血的概率要高4倍，濒临介乎贫血的概率要高两倍。贫困者缺少维生素A、C和B_2也是一般人的两倍。这种营养摄入的缺乏是导致新生儿疾病和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营养不足的孕妇更有可能早产和羊水提前破裂，这也是造成新生儿疾病和死亡的两个最主要的原因。[33]尽管紧张、吸烟、酗酒和咖啡因也有影响，但社会经济的因素在造成提前分娩中起了主要作用。[34]

因而低收入家庭婴儿死亡率更高。由于少数民族在贫困者中不成比例地占据了大部分，他们的婴儿死亡率也就高于白人。例如，虽然黑人婴儿的死亡率从1989年以来有所下降，但仍然是白人婴儿死亡率的两倍多，这一比例已存在了几十年的时间。而且，贫困妇女死于生育的比例比一般人高4倍。[35]

营养不良、住房不合标准（特别是没有供暖设备）、低劣的卫生条件、空气污染以及缺乏医疗保健，致使贫困者更容易感染疾病，也更经常地遭受急性或慢性疾病的侵害，其寿命要比一般人短7年。[36]

从积极的方面看，现在贫困者比过去可以接受更多的医疗保健。国民医疗补助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贫困孩子和老人，特别是居住在养老院的老人。通过追踪研究1970年至1993年中10%最贫困家庭的孩子，克里斯托夫·简克和苏珊·梅耶发现，到1993年，在儿童看病方面的收入差距实际上已经消失。[37]

住 房

随着全国农村人口的萎缩，贫困人口变得更加集中。几乎两倍的人现在集中居住在贫困地区——相对于1980年的560万和1970年的370万，现在为1040万人。国家科学协会199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高层建筑公共住房计划，加强了贫困者在那些饱受失业和犯罪所困的残破的城市地区的集中。[38]

当美国人想到联邦政府的住房计划时，常常会联想到城市里最差的公共住房工程。这些住房都是一种羞辱。幸运的是，接受政府租房救助金的人中只有不到10%居住在这些地方。自1975年以来，几乎所有新增的用于低收入住房的联邦资金，主要是帮助贫困家庭支付私房的租金。[39]

每隔两年，美国住房调查就要收集关于住房条件的相关资料，包括家庭住房单元是否有一个完整的浴室、地板上的洞、墙壁或天花板的裂缝、每间房间的电源插座、屋顶漏水、油漆或灰泥脱落、中央供暖以及老鼠的痕迹。在1973年至1975年和1991年至1993年间，所有这些贫困者的住房条件都有了改善，而且相对于中产阶级家庭，贫困家庭的改善更多。

即使是中等收入的家庭也常常会有一两个住房问题，但就算是在最贫困的家庭，多种住房问题并存现在也很少见了。在最贫困的10%的家庭中，只有9.6%在1991年至1993年的美国住房调查中碰到过至少两种住房问题，而在1973年至1975年的调查中有14.7%。收入处于最低层又居住在最差的，即至少有4种问题的住房单元中的人们的百分比，从1973年至1975年的3.1%降到了1991年至1993年的1.1%。[40]

但并非都是好消息。在1991年至1993年与1973年至1975年的调查中，拥有自己住房的低收入家庭减少，而生活在棚户区的人数却有增加。无家可归者的增多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没有将精神病人加以收容，以及收入极低家庭的住房破损，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41]

家庭生活

正如社会科学家在各种背景和各个时期的较低收入家庭中一贯所发现的，贫困者中的家庭不稳定现象较别处更为普遍。早婚和早孕多发，离婚与遗弃的比例高，家庭争吵和暴力都更为频繁。由于家庭生活是个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紧张与不和的可能性越大，从而缺少稳定的情感支持，就会成为一个人以后反社会行为的一个原因。

态度的反应

许多非贫困者排斥甚至蔑视穷人，认为他们懒惰、无能和不道德。大量生活在城区、拥有职业的美国黑人对那些生活在穷人区的失业者也持同样的态度。社会学家威廉·威尔逊和一个研究小组访问了芝加哥贫民区的2000多名居民，他们不断地听到对他们邻居和朋友的严厉和轻蔑的指责，批评他们对工作、孩子和婚姻的态度。有工作的贫困居民称失业者"懒惰"，怀疑他们的勤奋，认为个人性格非常重要，宁愿"谴责受害者"而不是"制度"。[42]显然，他们认为自己在用一种更负责任的态度来应付生活中的困难。

当然，许多贫困者确实在为生存和改善自身境遇而奋斗。然而，有些人无论多么努力，仍然无法找到工作以摆脱对福利救助的依赖，导致绝望和冷漠感的出现。由于个人无力进行任何改变，因而形成了宿命论的观点，这就会使他们寻找各种办法以求生存，从敌视和挑衅（破坏行为、盗窃、袭击）到退缩和全然的冷漠。另一些人仅仅是适应这样的情形，尽力工作以求生存。还有一种应对方式是通过宗教热情、酗酒或毒品来逃避现实。[43]

教　育

缺乏教育既是贫困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在处于贫困的家庭中，有四分之一的家长没有高中毕业。[44]甚至更为惊人的是，在1995年接受"赡养儿童家庭救助"的家长中，68%没有高中学历。[45]他们的孩子高中毕业或升入大学的可能也小于一般家庭的孩子。由于在家中几乎得不到什么学业上的鼓励或帮助，而且老师的期望也较低，这些学生常常中途辍学。结果，他们又不知不觉地处于收入糟糕的工作中，再一次重复着贫困的怪圈。因此教育的低水平同数代连续贫困的现象密切交错。

没有辍学的贫困者得到的常常也只是低水准的教育。农村贫困者中的正规教育常常只是初步的，甚至根本不存在。城市的贫困者常常只能在一些财力有限又拥挤不堪的学校上学。缺少父母对学习的关心，来自同伴阻碍进步的压力，严格纪律和良好师资的缺乏等负面环境的影响，破坏了许多孩子的学习潜力。其后果是，在我们这个高技术的后工业社会中，许多年轻人根本没有资格从事大部分收入较好的职业。在第10章里，将会更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

工 作

与盛行的错误观念相反，许多穷人都有工作，工资是贫困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在1994年，年龄在22到64岁的贫困者中20%的人每年至少工作50周；10%工作27至49周；26%工作26周或更少。所以，将近一半的贫困家庭从与工作有关的活动中获得收入。[46]

大约60%有工作的贫困者从事的常常是全职工作。在全职工人中男子略微多于妇女，白人工人占了所有有工作的贫困者的大约四分之三。通常青年工人贫困率最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收入较低，失业率较高。黑人和拉美裔中辍学的青少年，尤其有可能会成为有工作的贫困者中的一员。[47]

有工作的贫困者之所以贫困，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足以使他们摆脱贫困。例如，在90年代初，一份全职工作的最低工资，只是一个3口之家要摆脱贫困所需的约70%。[48]低技术工人也非常容易受到经济衰退的伤害，在这种时候他们是最先被解雇的人。一些人发现，由于技术过时或公司迁址，他们的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稀少。因为一年中只有部分时间在工作或是收入极低，这些贫困者和许多不工作的穷人遭遇一样。从频繁的小病症到与紧张相关的心脏疾病等健康问题，也常常令他们蒙受额外的收入损失，因为他们通常没有他人理所当然所拥有的病假补贴。

工作和福利

在19世纪，欧洲人和美国人开设劳动救济所，为穷人提供就业和职业培训。今天虽然没有了这些机构，但是一般的公众态度仍然相信，如果迫使贫困者参加劳动，而不是放任他们不劳而获等待救济，贫困是可以被消除的。这一观点正是1996年被称为个人义务和工作机会法案的福利改革法令潜在的主要推动力。

接受福利救济的贫困者

自30年代以来，**福利**（welfare）——对贫困者的公共救助计划——将亿万美元的税收收入重新分配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它并没能使贫困问题得到控制。通过颁布一个又一个重要的社会计划，在这些年里用掉了

大量的金钱，但怎么依然有七分之一的美国人依然生活贫困呢？部分的答案在于努力方向的错误：仅处置表面的症状而忽视了结构性的原因，或是如“向贫困开战”这一例子中，强调了同“病态的”贫困文化斗争，并把这看作是问题的原因。

另一方面是，超过1万名联邦官员及51.6万名州和地方官员组成的庞大笨重的官僚机构，用一种无系统、不一致的方法管理着各种各样的公共福利计划。[49]各州之间在适合条件和支付款额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在有些州符合某种福利救助条件的人，在其他州可能就不合条件。最高收入标准在一些州可能低于或略高出贫困线；“抚养儿童家庭救助”的标准可能是指没有父亲的家庭，或者相反。

第三个因素是一些福利机构员工的态度。他们的傲慢作风阻碍了那些依赖其摆脱贫困的穷人。最后，与接受福利救助者相伴随而来的羞辱感，使许多可以合格接受帮助的穷人感到灰心气馁，尤其是老人。

公共福利计划

“福利”一词通常的用法是指面向穷人的公共救助计划。然而，如果我们将福利定义为对个人和家庭给予的一切直接的现金或实物形式的政府救助，就会发现联邦的社会支出计划要广泛得多。事实上，只有四分之一的联邦社会福利开支是给穷人的。社会救助计划从广义上可以归为两类：社会保险计划和**贫困救助计划**（means-tested programs）。

社会保险计划 这一计划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占总数的73%）和最为广泛接受的公共救助。其中最大的一部分（38%）是提供给退休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退休金，在某些情况下还支付给他们死后遗留下的亲人。这些计划随着生活费用的提高而增加。尽管许多领受者得到的要超出他们在工作期间被扣除的数额，包括利息，但公众很快认识到，这是他们过去的劳动所得，是他们应得的收入。第二大部分（21%）是用于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计划，这支付了大部分处方药品、医疗用品、门诊和住院的费用。其他社会保险计划还包括联邦雇员退休金和保险金（9%）、失业补贴（3%）和退伍军人医疗保险（2%）等。[50]

贫困救助计划 这一种类中的大多数计划是用来帮助那些贫困者维持生活而不是帮助他们脱离贫困的。其中只有大约10%的救济金用于教育或培训，以使接受者生活能够更加自给自足。其余则包括医疗补助制度（占全部公共救助的10%）、食品票证和商品分配计划（4%）、追加基本保障收入（3%）、公共住房和租房津贴（3%）及减免所得税（2%），即

减少低收入纳税人的所得税或者如果他们没有欠税则给予一定的退税款。这一类别中还包括了受批评最多的“抚养儿童家庭救助”，但它在全部公共救助计划资金中只占到2%。[51]

追加基本保障收入计划每个月为650万需要帮助的老人、盲人或残疾人平均提供358美元。1995年开支总计270亿美元，比1990年约高出110亿。这主要是因为大量新增的老年移民投奔早已在美国的家人，而后者又不愿承担赡养义务。[52]这种对联邦预算的滥用和侵蚀促使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1996年通过福利改革缩减了这一计划，认为家庭担保人应该对老人的生活承担更大责任。虽然在过去的规定中，非美国公民在居住满3年后就有资格得到福利救济，但今天只有公民才够格，而移民则必须居住满5年才有资格取得公民权。

“抚养儿童家庭救助”过去一度开销较高，在1995年它比追加基本保障收入计划少了42亿美元。[53]它受到保守的中产阶级美国人的大量批评，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计划应在一定程度上对非婚生育和女性为首的单亲家庭的增加负有责任。其中后者数量从1970年的550万增加到1996年的1250万，增加了一倍多。[54]非婚生育翻了3倍，从1970年的不足40万增加到1994年的近130万。[55]与此同时，得到抚养儿童家庭救助的家庭从1980年的380万增至1994年的500万。[56]虽然接受救助家庭数量的增加小于女性为首的单亲家庭的增长幅度，这表明大部分的单亲家庭并没有求助于福利，然而，在5年期间抚养儿童家庭救助的开支增加了40亿美元，使得这一计划成为那些热衷“家庭价值”的人们批评和改革的主要目标。

关于福利的许多负面形象可以从对抚养儿童家庭救助计划的指责中找到，这一计划中有大量长期领受救济者。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接受福利救济长达6年或更长时间。[57]尽管相对于所有其他领受救济的人来说，他们在数字上只代表了很小的一个群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他们常年接受救济，因此得到福利支出的份额也较大。

福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福利是不是一个圈套，使领受者对此长期依赖，不愿工作？或是一个短期的安排，使领受者得以暂时克服死亡、残疾、离婚、遗弃或突然失业等危机，从而恢复稳定的状况？虽然一些个案研究和某些“贫困文化”的著作制造了对那些长期贫困的下层阶级的盛行看法，但这决不是一个完整和准确的描绘。

在1968年开始的一项重要的并仍在进行的纵向研究中，密歇根州立

大学的收入动态研究小组每年跟踪全美具有代表性的8700个贫困家庭（一共包括5万多人）的命运。从这些重要的资料基础出发，研究者分析了贫困的“动态变化”。在80年代中期，研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1. 贫困极为普遍、但通常并不持久。
2. 大约只有六分之一生活贫困的人，一生中身陷贫困的时间在8年或8年以上。
3. 长期贫困者的性格特征与传统的认识并不符合。
4. 贫困者的经济状况似乎并不是由心理倾向造成的。
5. 在任何特定时候被考察的贫困者，半数以上的人处于贫困中已有8年或更长时间。
6. 父母的贫困或接受福利救济的状况，与孩子日后同样的情况之间存在微弱的联系。
7. 在来自贫困家庭的年轻人中，有很大的向上攀升的可能存在。
8. 儿时就处在或接近贫困线的人中，只有五分之一成年后仍然处于或接近贫困线。[58]

这最后一个发现是否说明，父母的贫困与孩子以后的命运之间并没有相互联系？尽管只有4%的贫困成人在童年时曾长期依赖福利救济，但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成年后生活贫困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要高于来自非贫困家庭的孩子。其他的研究也支持这些发现。[59]

第2和第5项结论间表面上的不一致，是因为在观察中，长期贫困者比其他生活一度贫困的人更容易辨认。这一相当小的群体的成员也可能获得了贫困计划开支的大部分。[60]

近来，另一些研究者对扩展了的收入动态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长期贫困者要比原先所认定的更多，占全部贫困者的36%。被确认受长期贫困之苦最深的群体，包括了生活在以没有高中学历的黑人女性为首的家庭里的人。他们的长期贫困率比整个美国人口中的比例要高出12倍。这一群体的长期贫困率保持在大约69%左右，而用整个贫困人口进行的纵向研究的结论则为3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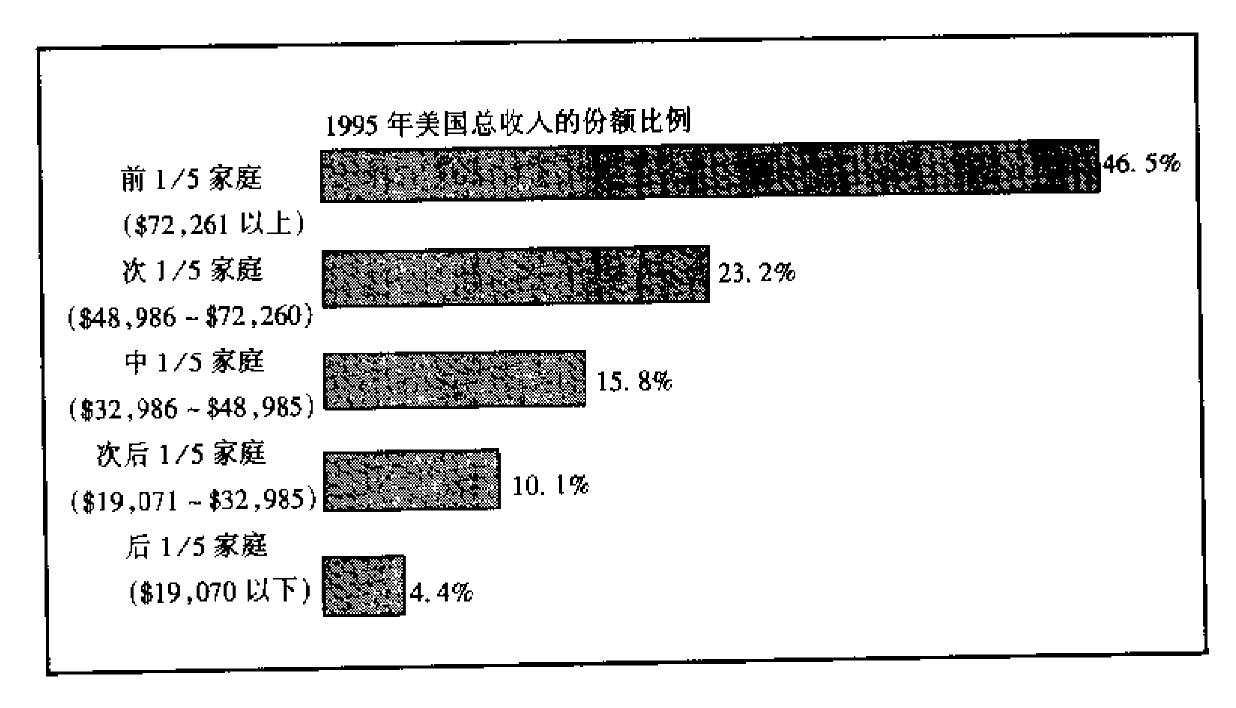
为什么最近的这项研究所发现的处于长期贫困的人是过去研究的两倍多？或许资料数据的扩展发掘出了更多潜藏的贫困者，或许可能是在第一项研究中当时还没有被归为长期贫困者的人现在又沦为了长期贫困者。显然，需要立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这一问题。

收入分配

贫富不均不仅仅是收入不同的问题（在任何竞争的社会这都是一种正常现象），而且还在于各个社会经济群体所占有的总收入比例分配的不同，以及每个群体的收入状况逐年如何变化中的不同。这一信息有助于我们认识关于贫困的宏观社会因素。

如果家庭收入在人口中平均分配，根据**五分法**（quintile）或20%的人口段相应地得到总数的五分之一。但如图表7.5所示，1995年那些平均收入超过7.2261万美元居于最上层的20%的美国家庭，获得了家庭收入的46.5%。这其至大大超过了最后五分之三的贫困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的总和。最前面的五分之二家庭得到了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使得最后20%的家庭平均收入不足1.907万美元，只得到了全部的4.4%。

1968年以来，在最富有的美国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一直在逐渐扩大。到1993年，达到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大程度。[62]不过，在1994年和1995年，后五分之三在全国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各有增长，而前五分之一家庭则略有下降。尽管家庭收入有所增加，但男女全职劳动者的收入却都有所减少，说明要么是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参加了工作，要么是这些劳动者从事不止一份工作。[63]未来几年的资料将会告诉我



图表7.3 1995年美国家庭收入分配状况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60－193.

们，在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中，1994年至1995年的减少是一种侥幸还是收入不平等逐渐缩小的新趋势的开始。

消除贫困

虽然贫困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但贫困依然存在。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和通常一样，各种建议方法并不少见。我们将考察3种主要方法："滴入式"、"罗宾汉式"和干涉主义方法。

"滴入式"方法

里根和布什的共和党政府（1981～1992年）通过采取有时被称为**"滴入式"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政策来处理贫困问题和国家经济困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借用了民主党总统约翰·肯尼迪"水涨船高"的比喻。保守党试图削减税收和政府开支，以消除那些限制工商业发展的烦琐的政府法规和拖沓的公务程序，鼓励私有经济以扩大和增加就业。拥护者认为，这些引起争议的努力将会控制通货膨胀和创造一个繁荣时代，从而如水滴一样滴落到社会最底层，使每个人都从中受益。批评者反驳指出，这样做相反会为最富有的美国人制造意外的收益，扩大贫富差距，对老人、残疾人或无技术者等贫困者没有任何帮助，除了需要直接的救助，他们从其他人经济状况的改善中只会一无所获。[64]在1986年税收改革法颁布以后，联邦赤字明显增加，贫富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1993年前，处于贫困的美国人的比例几乎每年都在增长。显然，"滴入式"经济并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

"罗宾汉式"方法

拥护"罗宾汉"劫富济贫式做法的人们试图对**财富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wealth）。一些人提出将大公司国有化和没收大宗财富。这些建议在一个建立在自由竞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是不可能获得太多支持的。美国人惟一赞同的平等观念是机会均等。相反，欧洲人的理想还强调财产和收入的平等，而且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有漏洞较少和较为严格的税法，以减少各个社会群体间的净收入差别。[65]

一个更加适度、更受欢迎（而且不太可能被法律批准）的方法是对富

人课以重税。的确，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消除涉及合法逃税和地产的税收漏洞，努力使富人承担相应的政府管理负担，包括消除贫困计划的负担。1991年和1993年对最高税率的一再增加试图使联邦所得税制度更加合理。然而，规避税法的伎俩仍使那些“金融工程师”可以找出新的漏洞进行逃税。[66]至少迄今为止，要求富裕的美国人支付更多税款的努力还只取得了很少的成功。就算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在国会消除贫困的想法中并没有包括一个要求重新分配财富的积极态度。

干涉主义方法

另一种想法赞成使用大胆直接的联邦行动作为解决贫困的惟一方法，类似于罗斯福政府在大萧条时期的做法。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并都涉及到了政府。

就业 为没有技术的劳动者提供职业培训是“贫困之战”的一个重要



上图中排队等候的是大约700多万失业美国人中的一小部分。对他们来说，失业救济金至少暂时提供了一笔收入来源。在官方正式公布的失业率数字中并没有包括长期失业，而这会使失业者失去救济金，变得失落消沉，不再积极地寻找工作。

部分，但产生的结果却不一样。为失业者创造就业在大萧条时期卓有成效。然而，对纳税人来说，这种行动过于昂贵，而且会导致通货膨胀，但在30年代这一问题并没有发生。目前的联邦政策是刺激经济，为在贫困地区拓展和雇用失业者的私有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向接受"抚养儿童家庭救助"的人们提供就业机会和基本技能培训，及向超过6万多名14至21岁的贫困者提供教育和培训计划的职业介绍公司，代表了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微小进步。随着承担福利的责任现在主要转移到了各个州，许多州正在这一方面采取更加主动积极的举措。

教育 由于教育通常可以提供人们向上攀升的途径，缺乏教育也容易造成贫困，因此一些评论家要求扩大在教育方面的努力。例如，迈克·哈林顿就强烈主张推行一种士兵福利法案类型的立法。在此之下，联邦政府让贫困者免费入学，如果拖家带口还可以获得一份生活补助。[67]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类法令在提高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军人的教育水平和生活机会上极为有效。同样，70年代为执法人员提供的一项开支补贴计划也包括了他们的教育费用，明显地提高了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不过，我们要再一次重申，单单教育并不是问题的答案，在完成教育以后贫困者还需要工作。

福利改革 多年来，政治家、市民领袖、纳税人和福利享受者本身，都不满于我们福利制度的无能低效，认为它是联邦、州和地方法规和机构所拼凑而成的。治标而不能治本，阻碍了许多穷人去找工作挣钱，因为如果他们这么做了，救济就会减少或取消。在1984年一本名叫《必败无疑》的极有影响的书中，查尔斯·莫雷批评福利制度延长了贫困，而不是消灭贫困。[68]他认为，自动的福利制造了一种生活方式，从而使贫困者失去了试图摆脱困境的经济刺激。随着公众中保守情绪的增加（如国会选举结果所反映的），莫雷的书引起了大量有关福利改革的立法提议。

国会最后通过了1996年的个人义务和工作机会法案。克林顿总统宣告，它结束了"我们以前的福利"。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该法案将在以后6年里削减近550亿美元低收入救济计划。节约下来的550亿美元将几乎全部来自除了抚养儿童家庭救助外的各种计划的减少，特别是大幅削减食品票证计划对老年和残疾贫困者的追加最低保障收入计划及对合法移民的救助等。低收入家庭的残疾儿童、有工作的贫困家庭和老年贫困者都属于那些将受到该法令不利影响的福利受益者。

尽管削减主要来自抚养儿童家庭救助以外的领域，但许多领受这一救助的家庭也都将在以后几年内受到严重影响。因为法案大大改变了救助计划的结构，将之改变为一种有基本固定资金来源的固定拨款，改称为贫困

家庭临时救助计划。各州将根据1994年的开支情况，划出固定标准的基金，以开展收入补助和工作计划，而不论以后是否有任何新的变化。

联邦福利改革法案允许州拒绝向任何贫困家庭或任何类型的贫困家庭给予救助。此外，除了某些特例以外，法令禁止各州使用固定拨款救济金继续帮助那些接受救济已达5年的家庭。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有250万到350万儿童会因这种5年救济期限的完全落实而受到影响，全国至少有80%的领受救济者适用于这一规定。适用于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的救助期限是两年，除非他们在此之前找到工作。而且，州也可以制定少于5年的限期。它可以适用于现金救济和工作职位的帮助，时间限制可由州政府随意地缩短。如果它们那样做——这很有可能，那么受到影响的儿童数量将会更多。

福利改革法案还强制削减了280亿美元的食品票证补贴。如果得到充分落实，这些条款将减少大约18%的食品票证救济。相当于将食品票证救济金额从目前平均每人每餐80美分的水平降至每人每餐66美分。这些削减将影响到全部的食品票证领受者，包括有工作的贫困者、老人和残疾人。

新的法令中包括了一项特别严格地针对18至50岁、不抚养孩子的失业者的食品票证条款。根据法令，在任何连续3年的失业期间，这些人所接受的食品票证救济将一般只限于3个月。（不过，其中某些人可以在3年失业期间获得6个月的救济。）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仅此一项平均每个月将减少100万人的食品票证救济金。这些人很多都是愿意工作，但只是苦于没能找到工作或者没有得到劳动福利计划或培训空缺。

很难预测福利改革法案将会带来的长期后果。90年代中期强劲的经济形势使得失业和贫困人口都有所下降。但一旦经济出现衰退，将会发生什么？而且，目前接受福利救助的人们的现金救助限期仍有几年可用。新的福利制度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为福利领受者寻找就业机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缺乏教育和职业技能。其他就业的障碍包括，身体残疾（三分之一接受“抚养儿童家庭救助”的妇女家中有一个部分残疾或残疾的人）和培训不足（25%～40%的人知识不足，阻碍了其拥有一份全职工作）。[69]

威斯康星模式 在80年代，全国接受福利救助的人数增加了31%。而在威斯康星州却减少了24%，使之成为全国减少福利和贫困最成功的州。通过首先投资5000万美元用于日托中心、职业培训和交通运输，威斯康星得以在几年内实现每年节省2亿美元。州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在失业上，通过与私营企业建立紧密的联系，为特定职业培训人员。它将其福利救济机构变为职业介绍所，在进行救济之前便尽力帮助人们寻找工作。通

过这一计划，失业男性找工作要比单身母亲快，但整体的效果却要比以前的任何尝试都更加鼓舞人心。现在威斯康星州的计划已成为其他各州学习的一种模式。[76]

社会学视角

或许没有别的社会问题像贫困的原因这样，引起了政治领导人、社会科学家和公众如此多的关注和争议。由于正确地确认原因对找出对策至为关键，因此这些不同的观点影响着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是如何在“这片充满着机会的土地”上处置关于贫困的问题和矛盾。

功能主义观点

运用功能主义的方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贫困。一种观点



这是1997年挂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一家福利机构外的一幅标语。它有力地抓住了支持福利计划的人们对修改州和全国福利法案的反应。现在，身体健全的成年人必须参加工作或是职业培训，以获得支票、食品券证、医疗资助和育儿津贴。

是，贫困的范围和性质是整个世纪里社会快速变迁的结果。社会需求因自动化、高科技、低技术的城乡劳动机会减少、歧视及居住格局的转移等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此，相当大一部分人口发现自己被困于其中，在这个后工业社会中显得脆弱而毫无准备。很像伴随着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巨变，20世纪末的美国人经历了许多不能被社会机制完全吸收的重要的经济变化。

另一种观点认为，贫困并不代表社会制度的崩溃，而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贫困的威胁促使人们去工作，但如果一个人所从事的劳动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收割庄稼、洗盘子、管理员工作），得到的经济回报就很低。相反，对那些从事被认为是重要的、更为困难或复杂的、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准备的工作的人们，我们给予更多的金钱和更高的地位。[71]虽然所有的工作都对整个社会的运作发挥着作用，但报酬的等级化制造了社会的等级层次，其中最底层人们的收入相对较少。

消极功能 尽管贫困的存在是对工作的消极刺激，或是对低价值劳动贡献的一种低额酬劳，它也会给社会造成功能障碍。如果贫困变得过于普遍，就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对大量的公共开支或在社会内部造成强烈的破坏作用。此外，如果低收入工作的工资刺激还不如一个人可以得到的福利救济金，就会出现双重的问题：工作空缺和过量失业。功能主义对此的对策是建立一种更有效的经济制度，有效地利用职业培训和教育计划，从而满足农业、商业和工业的需要。

积极功能 贫困之所以会持续，也是因为有人直接从中受益，所以这些人会坚决抵制种种改变现状的努力。赫伯特·甘斯指出了若干贫困者提供给那些更有权力和富有的人的积极功能：

1. 贫困者形成了一个廉价劳动力群，从事那些没有人愿意干和补充雇主经济活动的“脏活”。
2. 他们的活动使富人的生活更加轻松，通过仆人、园丁等的劳动，减轻了他们单调乏味或劳动强度大的繁琐的日常工作。
3. 他们的贫困为非贫困者创造了许多职业：社会工作者、刑罚学家、警察、当铺老板、数字博彩者、酒店老板、毒品贩子、高利贷者等。
4. 贫困者通过购买别人不要的二手的、破损的商品（汽车、住房、电器、过期面包、水果和蔬菜）资助了商人。
5. 贫困者为用来加强勤劳、节俭、诚实和道德等传统价值观的法律，提供了一个方便直接的指责和惩办的对象。
6. 贫困者使那些非贫困者通过利他或慈善的活动有机会感受到自己

的善良，他们同时还成为人们比较自身优越性时的一个参照点。

7. 贫困者帮助其他人有机会向上层攀升，因为他们无法以良好的教育和工作与人竞争。

8. 贫困者没有权力，所以可以被用来作为承受社会变化的代价（由于城市改建、高速公路或市政建设而被迫拆迁；由于科技进步或是政府为避免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银根措施，而成为首先失业的人）。[72]

甘斯总结道，尽管贫困的存在有一定的积极功能，但他们也会通过要求增加开支和要求没收富人的财富和权力，给后者造成影响。只有当贫困的存在对非贫困者造成功能障碍时，或是当穷人获得足够的权力改变社会时，情况才会改变。

冲突论观点

甘斯关于贫困的积极功能的分析实际上也融入了冲突论，因为他考察了权力阶层维持一个贫困阶级的既得利益。也许没有其他社会问题像贫困这样引出这么多冲突论的分析。经济的不平等促使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资本主义促进了那些拥有生产方式的人的利益，并对那些没有的人们进行剥削。社会学家拉尔夫·达连陀夫研究了现代社会新的所有制形式（如股票和共有基金），提出了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认为是权力而不是所有制才是阶级统治和压迫穷人的基础。[73]

归咎于制度 社会学家迈克·哈林顿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资本主义是贫困者面临的所有问题的根源。[74]他认为不充分的计划和对最先解决什么问题的误导，阻碍了对这一不难对付的问题的解决。只有提出一项全面的全国性计划——类似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导致的在收入、住房、公共交通、教育和医疗保健上的阶级不平等加以解决，贫困问题才能被克服。[75]

冲突论者反对以社会化不充分或价值观“不正确”来指责那些贫困的受害者。如果要指责，那么应该是制度的错误。它在贫困者中形成一种错误的意识，认为自己无法进一步取得成就，因而必须依赖于他人。贫困者被异化、夺去了尊严和充满了自卑，并依然是混乱和冷漠的。只要他们接受自己的困境，就会继续被禁闭在观念的桎梏中，无法逃脱贫困的束缚。在贫困者动员起来、采取政治行动和从某些当政者那里得到支持之前，经济的不平等不会有太大的缩小。存在一些证据可以用来支持这种冲突论观点。例如，迈克·贝茨发现，在1965年和1966年发生骚乱的23个城市，

相对于其他20个没有出现骚乱的城市，此后在福利救济金上有明显的增长。[76]

弗兰西斯·福克斯·皮文和理查德·克劳沃德也用类似的材料证明，在60年代末由于骚乱而出现了福利救济金的增加。[77]他们注意到，在决定是否符合给予福利救济的规定中，在高失业时期相对宽松，而在低失业期间则较为严格。因此他们得出结论，福利计划通过吸收和控制失业者的方法，作为一种预防社会混乱的安全措施。资本主义要求有大量没有技术的劳动者，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加以使用，所以它也必须在经济衰退的时候给被解雇的工人提供一个生存空间。否则，政治动乱将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贫困者成为一种威胁时，政府才会着手启动或扩大福利救助以缓解社会的动荡局面。同样，在条件改善时，又会削减甚至取消改良的计划。所以，援助贫困者的努力是社会在面临潜在的不安定时的一种情势所需，而不是代表了一种真诚的反对贫困自身的动机。

年收入保障 之后在1974年的一本书中，皮文和克劳沃德提出了一项结束贫困的激进想法。[78]他们号召建立一个激进民权组织、反贫困组织和贫困者的联盟，制造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大危机，以迫使国会颁布**年收入保障**（guaranteed annual income）法。他们的计划是推行一个大规模的补充计划，将全部有资格但尚未获得福利的人包括到福利救助计划中，这将使接受福利救济的人增加一倍。这一大规模行动将会引起政治和财政混乱，使得国会不得不采取行动以结束问题背后的贫困。作者承认，这一做法可能会导致阶级冲突和暴力活动，但贫困状况的继续也可能导致同样的后果。不过，他们所期望的动员并未发生，从联邦到州各个层面的福利计划的调整进一步破坏了这一行动的原有价值。

尽管皮文和克劳沃德的提议比大多数其他建议都要激进，但是这种全国性年收入保障的想法并不新鲜。例如，北欧国家通过这种为所有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的计划基本根除了贫困。在1975至1979年间，美国政府对低收入家庭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维持收入计划的试验。数千人得到保证可以在3到5年内得到不同程度的资助。在这期间，如果他们的收入开始增加，资助才会缓慢减少。同一些观察者消极的预期相反，大部分贫困者继续参加工作，用多余的钱来改善住房，购买耐用商品（冰箱、电视、汽车）、家用器皿和衣物，而不是用于奢侈品或娱乐。[79]在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婚姻破裂，使得许多立法者不愿意支持一项“鼓励”妇女因婚姻不幸福便离开丈夫的计划。

相互作用论观点

相互作用论集中关注人们认识和界定那些影响其生活的事件的方式。在贫困者中，这种认识和界定——与他人日常相互交往的结果——也会加强贫困的存在。例如，尽管在体育界和娱乐界，某些少数民族超级明星非常受欢迎，但对于贫困者，主要参照群体是他们的街坊邻居。如果他们所居住的街区是有着高失业率、严重犯罪、大量吸毒者和酗酒者以及很高的学校旷课和辍学率的城市贫民区，那么就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正面榜样。“成功”的榜样也许只是附近商店里有着稳定工作的店员或是街头的皮条客、妓女或数字博彩者。否则，一个年轻人可能会成为弥漫着辍学等生活方式的受害者，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不稳定、低收入的工作、过早怀孕和破碎的责任感。

标签分类的影响 这种观点的另一个方面是贫困者中自我观念的社会**标签**（labeling）的影响。贫困者对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指责受害者”的做法的反应如何，能够有助于说明社会成见是如何使贫困长期延续的。如果我们把贫困者界定为懒惰、无能、不道德、冷漠和缺少争取成功所必要的进取心，这些个人自己可能也会慢慢接受这些界定，认为它们是正确的。如果包括家庭、朋友、学校和媒体在内的社会环境也不断地使用这些标签，这一情况就尤其可能会发生。[80]回想一下这样的例子，在威尔逊对芝加哥贫民区有工作的居民看法的调查中，他们会反复地批评那些失业的邻居和朋友。

在学校，低期望值会是具有破坏性的。如果教师对学生成绩有很高的期望，他们实现这种期望的机会也会更高。相反，低期望值容易导致学生缺乏动力和成绩降低。[81]把一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归类为可能的失败者，会使这个孩子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可以预言，没有鼓励和自信，孩子的确更加有可能表现不好，长大一点就会辍学。

观念的强化 并不是所有的低收入者都接受这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的感受，或是顺从于低期望值。许多成年人试图向自己的孩子强调良好教育的重要性，许多年轻人也把他们的眼光投向了更高的目标并努力去实现。不过，社会各阶层的人仍认可社会阶级的价值取向。标签论者指出，把贫困者认定为不够格的长期不断的过程，常常使他们相信自己就是这样的——这种自我概念从内部和外部强化了贫困的亚文化。

因此这一观点意味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解释所起的作用是，使贫困者继续处于社会经济阶梯的最底层。贫困既是一个经济陷阱，

也是一个心理陷阱。贫困者往往把他们的社会环境界定为自身缺点所造成的结果，因为社会上盛行的就是这种观点。这一消极的自我形象使他们被动宿命地接受现状。只有打破持久的消极界定，鼓励更加积极的对自身及其潜力进行重新界定，贫困者才能克服自身的经济困难。然而，这种丰富和提高自我概念的努力，必须伴随就业和收入机会的增加。

未来的选择

如果我们考察整个20世纪贫困的情况，考虑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开展的各种计划，我们就能设想出许多不同的未来前景。和前面各章一样，这些前景彼此直接对立，但却代表了根据今天的趋势所做的符合逻辑的推断。

悲观的前景

科技给中产阶级美国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在2030年，大部分美国人的富足可以使他们在自己的电子别墅里尽情享受一种舒适悠闲的生活，工作和消遣都可以在家中进行，远离其他地方那些生活不幸的人。个人电脑通过网络连通主机，可视电话会议、网上信息交流和购物订货，以及全息图像家庭娱乐系统将戏剧、音乐会和所有娱乐形式都带进家中，使得人们不必穿街走巷甚至接近那些破旧不堪的城市区域。农村的贫困者仍然和过去一样处于人们的视线之外。这种躲避使大多数美国人对贫困者的艰难处境缺少直接感受。

至于穷人，他们所受的苦难和堕落从20世纪末以来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非贫困者与他们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当新老两代非贫困者掌握了计算机并带着日益增长的知识和能力进入21世纪的时候，贫困者教育的持续低水平使他们陷于停顿。由于仅能维持极低的技术和教育水平，而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却在不断提高，贫困者甚至变得更加落后了。由于看到这种不平衡太过严重实在难以纠正，几乎很少有人再会谈及消灭这一不平等现象了。

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对学校教育仍然不感兴趣。难以获得成就和缺少学习动力造成了令人震惊的辍学率。此外，基本的读写能力已不再重要。印刷的报刊读物业已消失；可视小说和学习录像极为普遍，由计算机操作的机器处理日常的采购工作。政府定期发放多余食品和免费的娱乐节目，令

人想起了古罗马给穷人免费提供的面包与娱乐。一个贫困的年轻人何必要去浪费时间，追求那些崇高但又难以实现的目标呢？更聪明的是学会如何尽你所能把现在的生活过好。贫困就是没有希望地生活和敷衍了事。公共救助计划依然提供生存的必需品，只有少量低技能的文员和蓝领工作仍然存在。然而，这些只够人们勉强过活。这表现在贫困者不幸的生活条件中，如营养不良以及婴儿死亡、疾病和慢性病的高比例等。在他们中间，犯罪和暴力仍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周围可见的都是触目惊心的事物——废弃的建筑、残破的居住区和被遗弃的人，时刻提醒着他们现在和未来将会成为怎样的景象。

乐观的前景

当人们在2030年回首往昔时，在过去30年里全国生活水平所取得的所有成就和进步中，看到的最大成就可能就是贫困的消除。社会等级虽然仍然存在，但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更加紧密了，贫富间一度巨大的鸿沟今天也大大缩小了。这一变化并不是政府的剧烈变革所导致的，而仅仅是由重新被唤醒的社会意识和决心更直接处理这一问题的公众意志造成的。

在多年的错误开端和特殊利益集团强烈的反游说活动之后，政府最终进行了广泛的税务改革，并完成了对福利体制的彻底改革。预算赤字直线上升，中产阶级反对增加额外的税收及下层阶级的社会动荡促使政府官员采取了这些大胆的步骤。立法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很快被通过，由总统签署颁布。

大公司和富有的个人现在按比例公平地承担税收份额，使得税收收入大幅增加。不过，仍留有充足的减免额，以避免削弱商业的再投资、州和地方公债及文化和慈善活动。废除福利制度，代之以为所有工作的美国人提供保障的年收入，重新树立了过去的贫困者的尊严和自尊心。速成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计划以及对贫困者的教育鼓励，为一代人重新提供了他们长期渴望的向上层攀升的机会。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的养老金计划使他们得以基本舒适地生活。

最早的一项职业培训计划是在照料儿童方面，为政府资助的日托中心提供人员，从而使低收入家庭中的单身女性得以自由地参加工作，而她们的孩子则可以参加各种有益的学习活动。其他人则从事泥瓦匠、木匠、修补和油漆等一些工作，随着旧贫困地区人们的收入的增加，又促进了附近地区的进一步改善。

奇怪的是，人们生活中的这一转变并没有依靠太多的公共开支。相

反，它是通过提高官僚机构效率以及调整联邦和各州陈旧过时的计划实现的。那些不再贫困的人们增加的购买力，以及那些不再不纳税的富有者对公共资金提供更相称的贡献，使得国家经济基础扩大，同时又进一步增加了福利开支的基础。

小结

1. 尽管尝试过许多方法和投入了数亿美元，贫困仍然是最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贫困中。失业率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衡量贫困的标准，但通过比较失业率的统计数字，还是可以一定程度地说明各个工业国家中的贫困程度。在1996年，美国是第六个失业率最低的国家，而且的确，相对于那些失业率更高的国家，其贫困人口比例也较低。
2. 因为贫困者的困境而对其加以指责，通常集中在认为他们智力较低这样的假设，以及认为贫困文化的价值体系否定责任和敬业精神。批评这一倾向的人则主张，问题是制度性的，需要从结构上予以解决，而不能集中于个人身上。
3. 衡量贫困的一种做法是绝对贫困的方法，它将没能挣到最低数量的金钱（由政府确定最低的标准）以保证基本生活必需视为贫困。第二种方法是相对贫困。这种方法是通过与他人生活标准的比较而确定贫困的程度。在90年代，美国贫困者的生活实际上要好于70年代的贫困者。
4. 尽管大多数美国穷人是白人，但按照比例少数民族却占了更多。女性为首的单亲家庭是贫困人口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它反映了“贫困的女性化”。在全部18岁以下、生活在女性为家长的家庭的孩子中，42%是穷人。全国大约55%的穷人生活在中心城区以外的农村或郊区。
5. 贫困对穷人有破坏性和有辱人格的影响。营养不良造成了早产及婴儿死亡的高比例。只有十分之一的贫困者居住在城市廉价公寓中，但许多人忍受着不稳定的家庭环境。大部分穷人都工作，但他们低收入的工作常常容易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他们经常批评自己失业的亲戚和邻居不求上进。不幸的是，少数民族穷人中的高辍学率减少了他们摆脱终生贫困的机会。
6. 几乎所有依赖福利救助的贫困者都不能工作，因为他们主要是儿童、老人、残疾人或是有小孩的母亲。只有1.4%的福利接受者是无法找

到工作的身体强健的男子。大部分福利计划（服务和现金）解决的是表面贫困现象，而不是其内在的原因。诸如社会保障金的保险计划帮助老年穷人，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就业计划深入到贫困的潜在原因，但是规模却不够大。骗取福利救济的人数实际上非常少，不到0.5%。根据一项研究，只有六分之一的贫困者处于贫困已超过了8年；但后来的一项研究得出这一数字为三分之一。

7. 几乎全部公共福利资金的四分之三都被用在得到广泛接受的社会保险计划中，如社会保障金、医疗救助制度、失业和工人赔偿金及退伍军人救济金等。在贫困救济计划中，医疗救助制度占了总经费的10%；其他计划有食品票证、追加保障收入、住房津贴、减免所得税和抚养儿童家庭救助等。最近几年，贫富差距有所扩大，尽管税收改革法已消除了许多税收漏洞。
8. 一些保守主义者建议采用"滴入式"的办法来消除贫困，即通过刺激税收和鼓励私有企业雇用失业者的做法，鼓励一种健康有序的经济。激进分子提出"罗宾汉式"的办法，主张将大公司国有化，没收大宗私有财产。而较为适度的主张是呼吁进行税收改革，建立一种更平等的财富分配体制，从而实现财富再分配。干涉主义建议联邦采取直接行动，进行职业培训、创造就业机会、鼓励教育投入、福利改革和补助低收入。
9. 1996年的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调和法，从根本上改变了联邦政府同低收入美国人的关系，它给予各州更多的权力制定计划。变化还包括对各州至少80%的接受现金福利救济者加以一个5年的时间限制，对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时限为两年，对失业达3年者的食品票证补贴时限为3个月，并拒绝向非美国公民提供救济金。在各州寻求减少开支的时候，威斯康星州的成功模式提供了一种消除贫困的有希望的选择。
10. 功能主义论提出贫困是源于体制的功能失调，并充满讽刺地认为，贫困对社会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冲突论强调对穷人的剥削。一些冲突论者建议，实行年收入保障的做法可以消灭贫困。相互作用论强调侮辱性的标签分类的强化力量，使得那些被社会分类标签的人对强加于自身的观点顺从和默认。

关键词

绝对贫困　　　　指责受害者

贫困文化
贫困女性化
年收入保障
标签分类
贫困救助计划
五分法
财富再分配
相对贫困
滴入式经济
福利

推荐书目

Devine, Joel A., and James D. Wright, *The Greatest of Evils: Urban Poverty and the American Underclas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3. A persuasive argument tha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sts of poverty far exceed the costs of eliminating its causes.

Ellwood, David. *Poor Support: Poverty in the American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An influential summary of research, policy analysis, and underclass theory,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working poor.

Hurst, Charles E. *Social Inequality: Form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Boston: Allyn & Bacon, 1992.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all aspects of U.S. poverty, covering many of the topics discussed in this chapter.

Jargowski, Paul A. *Poverty and Place: Ghettos, Barrios, and the American Ci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7. A data-rich description and a conceptually innovative explanation of the spread of neighborhood poverty since 1970.

Jencks, Christopher. *Rethinking Social Policy: Race,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A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 issues regarding affirmative action, crime, the urban poor, and welfare reform.

Lewis, Oscar. *La Vid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A prefatory exposition of Lewis's "culture of poverty" hypothesis, followed by a detailed portrait of Puerto Rican families in New York City and San Juan illustrating the hypothesis.

Murray, Charles.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 – 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A provocative and influential conservative analysis of American anti-poverty programs, accusing the welfare system of contributing to the problem of poverty instead of helping to solve 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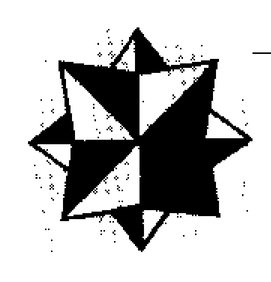
Ryan, William. *Blaming the Victim*,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1976. A very effective analysis of how society incorrectly blames the poor for their poverty, with a systematic piercing of the myths supporting this type of thinking.

Schwartz, John E., and Thomas J. Volgy. *The Forgotten American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A penetrating examination of the breadth of poverty existing today among the U. S. working poor.

Sidel, Ruth. *Women and Children Last: The Plight of Poor Women in Affluent America*.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6. A fine profile of the causes, conditions, and persistence of female poverty, and its impact on children.

Wilson, William J.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urban poor, explaining the deteriorating conditions in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failure public policy.

第8章 性别不平等



关于性别不平等的几点事实

- 超过15万有黑人血统的女孩和妇女面临着割礼的危险，或是早已被切除。
- 尽管性骚扰行为早已有之，但在70年代末以前，性骚扰这个词还没有出现。
- 今天，55%的学士学位获得者是女性。
- 今天，在有6岁以下儿童的双亲家庭中，64%的妇女外出工作。
- 尽管白人男性只占美国总人口的29%，但却占据了95%的高级管理职位。
- 虽然妇女占美国人口的51%，但在国会参众两院却分别只占9%和11%。
- 平均而论，如果从事同样的工作，男性的收入为1美元，妇女所能得到的只有75美分。

所有的社会都对社会交往的行为和模式加以规范。在这些文化规范和角色期待中，还包括性别差异的制度化标准。当然，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不一样，但生物的因素并不能解释两性在权力中存在的等级差异，也不能解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通过社会决定、社会学习和社会控制机制，社会确定了其对两性社会经历、资源和报酬的差异性系统。

当权力、名望和财产是以性别而不是个人成就为基础进行武断分配时，就产生了**性别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性别歧视**（sexism）包括用不同性别来分别对待的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从性别歧视中衍生出了社会成见、社会期望、带有价值取向的属性、能力的假定、社会分层以及资源和报酬的不平等分配，这些形成了社会结构的两性不平等。

生物学观点

科学家们曾经普遍相信，生物学差异决定了社会差别。查尔斯·达尔文认为男人比女人更有智慧和想像力。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埃里克·埃里克森都认为，男性的生殖器使男孩更具进取心，而女孩的生殖器则使她们

更为有限。不过，最为偏颇的伪科学论述来自于一位早期的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

> 1879年，古斯塔夫·勒庞……发表了在现代科学论著中对妇女最恶意的一次攻击……勒庞并不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他是社会心理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他所著的关于大众行为的著作至今仍被经常引用和广受尊敬……他说："在最聪明的民族，比如巴黎人中，大部分妇女的脑容量更接近于大猩猩，而不是男性发达的大脑。这种差别非常明显，因而没有人能对它提出质疑，值得讨论的只是其程度的高低而已。所有研究过妇女智力的心理学家以及诗人和小说家今天都承认，她们代表了人类进化的最低级形式，她们更接近于儿童和野蛮人，而不是成年的、文明的男人。她们感情变化无常、见异思迁，缺少思想和逻辑推理能力。毋庸质疑，有一些杰出的女性远远超出一般男子，但是，她们属于畸形生育产生的特例，比如就好像一只有两个头的大猩猩。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对她们视而不见。"[1]

这种想法反映了自古以来在男性控制的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它同科学并没有很大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盛行的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受到广泛的批判。

生物学观点的"证据"

今天，科学家对以生物学观点支持的性别歧视已失去了兴趣。不过，神经生物学的不断发现使我们认识到，性别的差异不仅包括生殖器、染色体和荷尔蒙的不同。大脑也存在性别差异，而且我们只是刚开始了解它对男女的能力的影响。

英国遗传学家安妮·穆瓦尔在1991年出版的《大脑的性别：男女间的真正差异》一书中，引用了大量研究以说明大脑的确存在性别差异。[2] 她提出，这种研究在政治上也许并不正确，但仍然是依据事实而得出的。例如，男性连接大脑中语言和情感区域的神经纤维较少。她由此推断，这就是为什么男人发现自己更难于表达感情的原因。但是，由于他们有更多的神经纤维与推理区域相连，他们在理解抽象关系中表现出较高的能力，这使他们天生更适合于从事数学和工程学等学科的工作。

研究显示，男女在从事某些空间任务时有着重要的差别。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这种差别有神经生物学的根据。[3] 妇女的大脑活动更容易出现过热，也就是说她们需要补充更多的葡萄糖，对于一项特定的工作，妇女大

脑的消耗更大。[4]

男人的大脑容量更大一些，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大，男人大脑萎缩得也更快。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技术透视大脑构造显示，这种老化在脑前部特别明显，这一部分负责抽象推理、心理适应和冲动控制。事实上，这种老化非常显著——男性大脑的前脑叶在年轻时要大于并重于女性——到40岁时就变得同女性的大小相差无几了。脑容量的变化同时也会降低工作中的表现，使男性失去了言语记忆、空间记忆、整体空间能力和注意力，而在妇女中这种变化就不是很明显。[5]

差别最大的地方是在**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中，这是指脑干周围的一圈环状结构，它构成了前脑中最原始的部分。在位于连接两个半脑并使其互相联系的密集的神经之下最原始的边缘结构中，男性表现得更为活跃。相反，女性边缘结构最活跃的部分位于较新的大脑皮层中。就像一位研究者所提出的，符合逻辑的结论应该是，男人在感情上更原始，而妇女"较为进化"。[6]

大脑性别的研究者不断阐述他们关于男女间能力差别的解释。科学证据显示，性别差异也许是因为脑叶的结构以及胎儿接触子宫中的性激素造成的。[7]

生物学观点的缺陷

显然，某些男女间的生物学差别会对行为产生影响。但如果真的如弗洛伊德所说的，身体结构注定了一切，我们就应该看到，在所有的文化中，固有的性别差异会表现为十分相似的男女两性地位和角色。但情况并非如此。尽管在跨文化比较中，确实可以发现一种男性统治的强大模式，但我们也能找到许多例外。玛格丽特·米德和其他人类学家提到许多文化，其中妇女更加积极，而男性则较为被动；或者在两性之间事实上没有角色差异。[8]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农业被认为是男人的工作，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在农业活动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在南亚，妇女出现在公共市场进行交易便会失去社会的尊敬，但在许多非洲国家，妇女是市场中非常活跃的生意人。[9]此外，在工业社会，文化价值观也以不同的方式限定社会所接受的男性和女性的目标和活动。不同于美国，几十年来，丹麦的女牙医、前东德的女工程师和俄罗斯的女医生都很常见。

生物学上的差异可以解释一般的趋势，但不能解释特定的社会行为方式。即使这些趋势代表了男女的典型行为，也不能解释全部的行为或两性间行为的重叠。例如，有些男人的进取心远远低于女性，而有些妇女也远

没有某些男子那样情绪化。而且，正如跨文化研究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的许多行为是学习得来的。在这方面，由于人类不是从生理上设定的，所以男人可以学会有些被认为属于女性的行为，而妇女也可以学会习惯上属于男性化的行为。[10]尽管如此，否认存在生理影响的可能似乎也是不合理的(参见专栏 8.1)。

专栏 8.1 遗传的力量

那些推崇女权主义的爸爸妈妈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遗传的力量。在 70 年代，我确信男女间的绝大部分差别都是由社会化造成的。在先天与后天的争论中，我认为先天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现在，作为一个家长，我观察了我的女儿，早在她开始看电视以前，她就宁愿要娃娃而不要汽车，用积木搭篱笆而不是城堡，在游戏中她更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投掷东西玩。但与此同时，我也看过儿童电视节目（甚至比起 70 年代都有所退步），它用一种报复的态度强调和夸大这些性别差异，好像男孩和女孩之间完全没有重叠相似的性格了。

资料来源：Susan Douglas，*Where the Girls Are*（New York：Random House. 1994），p.298.

社会化和性别歧视

社会学家把**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描述成一种**赋予地位**（ascribed status）——一种从出生开始就授予我们的标签，它决定了他人在我们整个一生中如何界定和对待我们。通过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家庭、学校和媒介——我们学会了别人所期待的、作为男性或女性的角色行为。社会通过训练我们，使这种社会认可的角色内在化，成为我们自身内在的部分，从而界定性别身份。通过不断地加强，社会还提供和证明了一种适合我们在社会中的性别地位的自我评价。

家庭的影响

在婴儿出生之前，性别角色早已在那里等待着它了，因为怀孕期间的父母会在心理上创造出即将出生的女儿或儿子的形象。研究表明，从一开始，父母的期望就左右着孩子的行为。当被要求描述婴儿的行为时，成年人的第一个反应是性别暗示，赋予孩子们还不具有的种种特性。在一群穿着蓝色、粉红色和黄色尿布的婴儿面前，成年人会把那些穿着蓝色尿布的婴儿形容为活跃吵闹的，穿粉红色尿布的婴儿是安静温柔的，而穿着黄色

尿布的婴儿常常会把观察者弄糊涂。他们甚至会偷偷地看看尿布里面，想搞清楚婴儿的性别再做出回答。家长通常会对男婴略微粗暴，可能使他们长大后比女孩更加独立和果断。家长还倾向于对儿子说话更加直接，通过比对女孩更多的语言刺激提高了他们的认识。[12]

孩子们也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学习他们的性别角色。这不仅仅是指穿上母亲的衣服，孩子还会接受对他们性别的态度和评价。他们会发现，妈妈为自己对机械一窍不通而感到自豪，而爸爸则对此了如指掌。在整个童年，大量语言和生理暗示继续着这一模式——奖励和申斥、玩具和游戏、书本和衣服——所有这些都强化着关于性别的固定看法。[13]

媒体的影响

大众媒介对性别角色的社会化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广告、书籍、动画、电影、音乐和电视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响了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

许多广告——尤其是酒类饮料、化妆品、牛仔裤和香水——明显地利用和强化了性别的固定看法。某些杂志和报纸的广告更为狡猾，通过照片中男人较为高大或处于主要位置，以及常常将妇女描绘成躺在床上或沙发上或是席地而坐，来暗示男性的优越地位。男人表现出能力和权威，他们的眼睛注视在商品上，而女性常常被描绘成温顺和合作的，她们的眼睛注视的是男人。[14]商业广告中具有权威性的画外音常常是男人发出的，而妇女最常见的是作为家庭主妇、母亲或性对象，甚至在计算机和机械工具的广告中也同样如此。[15]

在90年代，电影和电视在某种程度上改进了对妇女的描绘。然而，旧的性别观念在每周六上午的电视节目和许多儿童电影里依然非常普遍。在许多电影如《小鬼当家》、《空手道小子》、《年度新人》、《自由的威利》和《危险的丹尼斯》里，小男孩都是领袖，他们充满了冒险精神，表现出英勇行为，而聪明、坚毅和勇敢的女孩却几乎很少看到。[16]正如苏珊·道格拉斯所发现的：

> "当母亲坚持电影《小美人鱼》是少数积极描绘女孩的作品之一时，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它所做的是多么的不够。电影中的小美人鱼阿莱尔的确非常勇敢、好奇、活泼和大胆。她敢于面对自己的父亲，拯救溺水的埃里克王子，在潜水搜寻沉没的宝藏时战胜了大白鲨等。但是，她的腰身只有杨柳粗细，她的获救只能是年满16岁后同王子的结婚。

而片中邪恶残忍的恶魔也是个年老、肥胖、恐怖和渴望权力的母章鱼……"[17]

音乐也同样影响了对性别的看法和态度。尽管像玛丽·卡朋特、特蕾西·查普曼、茱尔·克里切、奎因·拉提法、纳塔莉·莫莘特和阿拉尼斯·莫里塞特等歌手演唱了许多积极向上、激动人心的歌曲，但大量说唱乐和摇滚乐及许多音乐电视，仍然在宣传着把妇女视为性目标等旧的性别模式。在《女孩在哪里》（1994年）一书中，苏珊·道格拉斯讨论了这类音乐对易受影响的青少年的影响：

在市场研究的影响下，音乐电视转变为美国社会厌恶女性最无情的表现之一。如果10年后音乐电视依然存在，如果其形象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我的女儿将看到一个又一个妇女被捆绑、抽打，或是跪在一些趾高气扬的男人面前企求永远为他们服务。这些女人或是穿着吊袜带的女色情狂，或是受鞭子驱使的荡妇；她们都有长长的红指甲、巨大的乳房、坚硬的臀部，而且毫无头脑；她们喜欢胸脯塌陷、背着一把大吉他的充满病态的男孩子。更糟糕的是，她们甚至希望或是应该被强暴。没有考虑到这种象征性的人们，肯定没有读过最近报纸头版有关这类事件的详细报道。大量的青少年男孩用这种方式对待女孩，或者渴望按照这种敌视女性的方法行动，尤其当他们成群结队、拉帮结伙的时候。[18]

在许多方面，媒体促成了**角色困境**（role entrapment），即在文化上界定女孩或妇女是“阴性”的。这常常阻碍了她们本来可能获得的成功和作为个人的自我实现。

社会历史背景中的性别歧视

直到最近几十年，支持带偏见的性别认同的意识形态一直是无形的和被广泛接受的。例如，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里，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证明男性至高无上地位的各种超自然力量。[19]正统犹太教的晨祷文中就包括这样一条：“感谢你，我们的主，宇宙的统治者，没有让我生而为女人。”在《新约》里，圣保罗命令道：“让女人在沉默和服从中学习吧，但我不能容忍女人来说教，或是篡夺男人的权威，只能容忍让她们保持沉默。”《古兰经》中也说：“男人优于女人，因为真主赋予了他们卓越的品质。”

在美国，新教信仰与接受妇女的被动、无地位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商业的成功和经济竞争的价值观使19世纪初美国人的生活非常世俗化，实际上将新教牧师和妇女（她们是最热情的信徒）从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相互交往方面排挤出去。由于被限制在良好的教养、优雅和爱好艺术等道德–文化领域，她们发现自己已被排斥在政治、斗争、白兰地、雪茄烟和商业等“男性”世界之外。[20]换言之，只有男人从事商业和决策等“肮脏的工作”。如果一位妇女要在“现实”世界里有所作为，暴露于男性领域中可能会破坏她谦逊的纯洁和作为道德典范的象征地位（参见专栏8.2）。

作为19世纪对“合适的”性别活动重新定位的一部分，社会期望男人（新教牧师除外）避开文化追求。对书本、音乐或其他与竞争和金钱不相干的事感兴趣是“没有男子气”的。

专栏8.2 宗教支持妇女和权力脱离

J.H.艾伦在1868年痛惜地感叹到，曾经是城镇的“集会场所”，崇拜、教育、商业等重要的社区活动中心的教堂，现在仅仅成了做祈祷的地方，一个只有语言、没有行动的地方。北方的中产阶级妇女在家中也看到这种类似转变的发生：过去，家庭是在其指挥下的公共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却成了孩子们在开始工作之前的一个住所，丈夫下班后的休息场所……

在整个内战前和内战期间，自由派牧师都在专注于建立和确定正确的女性角色；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所用的措辞强烈地表现了神职人员的要求和渴望。赫拉斯·布什内尔……用一句简短的话概括了理想中的妇女形象：“一个女人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他进一步就此发挥道，一个女人从天性而言，“其性格只有融入上帝才能得到完善”。另一位牧师于10年前在一本流行的公理会杂志上讲到了同样的问题。他对其女性读者的忠告甚至更加坦率：“比起能够自立的男人，宗教对你们来说更加必不可少。如果你们忽视宗教，那不仅是可耻的，还是失策的。”作者继续警告说，你们对社会的重要性完全在于你们的道德水平。同新近严格地隔离进教会领域的牧师一样，布什内尔及其公理会的那位牧师所谈及的妇女既得到夸赞，又受到威胁。这些自封的导师向她们保证，如果她们停留在适当的范围内，就可以受到尊敬，但如果越雷池一步，就将完蛋。而女性的信仰和牧师们的虔诚一样，应该特别的谦逊和缄默。布什内尔教导自己的女儿要一无所需，几乎不要有她自己的性格：作为一个女人，她“首先应该……无私”。他用一种委婉的辞藻解释道：“我们要求她应该看似为了世界的安逸和幸福而降临……自私始终是与她美好的使命极不相符的。”不知布什内尔是否意识到了，他和其他自由派牧师所概括的妇女形象，即使是神圣的，也显得幽闭并且非常狭隘。她应该去唤起他人而不是表明自身，她应被动地以个人的事例去说服他人。

资料来源：Ann Douglas，*The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New York：Avon，1997）.

国际背景中的性别不平等

在发展中国家，妇女生产80%的粮食作物，但她们很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在全世界，她们占了全部雇用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尽管有许多工作都是没有薪水的；而且在大部分国家，妇女的工作时间都要比男人长。[21]对妇女经济活动的估计有赖于收集资料的方式和对就业的定义，尤其是在农村的农业经济中。社会背景也很重要：在一些社会，人们期望妇女工作；而在另一些国家，妇女参加工作会有损丈夫的身份。不过一般来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妇女都为经济活动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而且其所做的无偿劳动是男性的两倍。[22]

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妇女的工资不到男子的四分之三。在坦桑尼亚、越南和澳大利亚，她们的工资达到男人的90%；在斯里兰卡、瑞典、肯尼亚、哥伦比亚、土耳其、约旦、哥斯达黎加、匈牙利和法国则只有男人的80%。[23]工作场所中的性别隔离和性别不平等是妇女工资和地位较低的关键原因。在大多数国家，妇女不大可能拥有工资较高的专业性、技术和管理职位。她们极不均衡地主要担任着文员、销售和服务工作。例如，在墨西哥和菲律宾，妇女在整个劳动力队伍中所占比例非常小，但她们在担任办公室文员工作的人数上超过了男性。[24]

性别不平等的一个严酷事实是，在某些亚洲国家，女孩生存率较低。尽管男孩和女孩105:100的性别出生比例是正常的，但在印度、韩国和中国这些国家，强烈的重男轻女的偏见，导致了大量女婴流产。在中国，男孩和女孩113.8:100的性别比例表明，每年要失去总共55万个女婴。[25]毫无疑问，在一个“偏爱”男孩的文化中，女婴的高流产程度受到了独生子女的压力的严重影响。在一些性别出生比例更接近于生物学标准的国家，女孩的死亡率仍非常高。在新加坡、埃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苏里南、牙买加和危地马拉等国，由于营养不良和缺少医疗保健造成的女孩死亡率较高，也反映了不同的性别角色，尤其是相对于男人而言，妇女的价值和地位都较低。[26]

最新确认的性别歧视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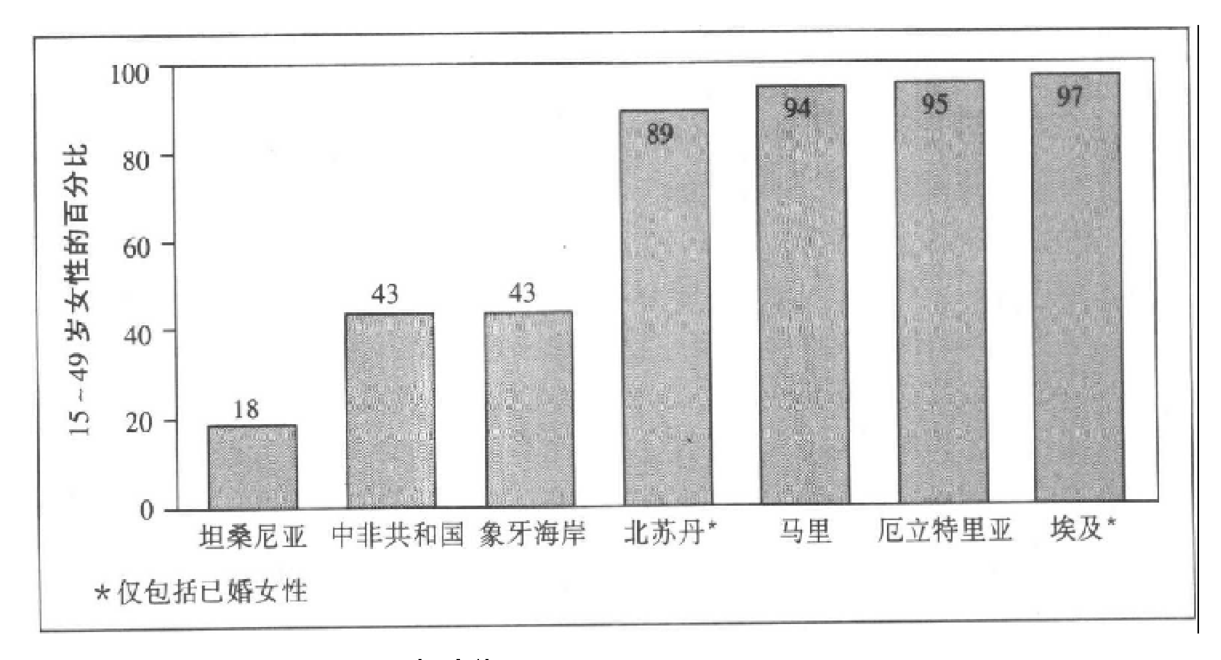
仅仅在几十年前，性别歧视的许多影响——在大学研究生入学、职业

选择、雇用和提升、薪金及学校和社区体育计划等方面——都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得到法律的承认。现在妇女意识到了这些歧视，也有了法律措施对此加以处理。在本章中我们将会讨论这些方面的状况。但首先，我们先考察一下两个“新近发现”的社会问题：割礼和女性性征及性骚扰。

割礼和女性性征

> 今天和以往一样，大约有6000名女孩将张开双腿进行一项外科手术(常常不是由医生主刀)。如果她们很幸运，那么只有阴蒂将会被切除。否则，她们的外生殖器将被切除，然后将剩余部分缝合在一起，可能是使用荆棘。而让她们维系传统文化、躺下接受手术的常常是她们的女友、母亲和祖母。这种手术被称为女性的割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女性割礼。[27]

女性割礼主要施行于一些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它在全世界伤害了1.3亿妇女（参见图表8.1）。这种习俗通常由女性亲属施行，发生在26个非洲国家、某些亚洲国家以及加拿大、瑞典、美国等移民输入国家。[28]通常女性屈从于这种习俗，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她就会被认定为在性欲方面可疑，不适合嫁给任何体面的男子。



图表8.1 部分国家的女性外阴切除状况

资料来源：*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1990－1996*（Calverton，MD：Macro international）.

尽管有人辩称女性割礼是一种宗教习俗，但这并没有得到《古兰经》或其他经典的支持。在大部分中东国家以及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伊斯兰国家，也没有这样的习俗。这一传统要早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本质上是男性实施权力控制女性性行为的一种文化方式，以使她们在婚前保持贞洁，并在以后对丈夫忠实。大量非洲穆斯林支持者认为，如果没有了某种形式的割礼，妇女将受到性欲折磨。因此，她们必须承受自外阴切除带来的感染、脓肿、坏疽、不育、性交疼痛、难产、甚至死亡的威胁。[29]

人们提出了许多方法以革除这一陋习。盖里·麦基指出，在中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结束了实行千年之久的妇女裹足的陋习的做法，如果运用到这一方面也可以取得成效。[30]那时关键性的革新在于，家长联合起来保证不再给女儿裹足，也不让自己的儿子娶小脚的妇女为妻。有迹象表明，妇女中的这种联合的努力，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受过初等教育的妇女之中，已使割礼有所减少。吉布提、加纳、象牙海岸和尼日利亚已宣布这种行为属于非法，尽管对公然违抗禁令所做的处罚非常罕见。（在本节开头一段中所描述的）使用肉刺封闭阴道口的最野蛮的行为，虽然在吉布提、埃及、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苏丹等国仍很盛行，但似乎也在日趋消失（参见专栏8.3）。[31]

由于有数以万计的非洲移民来到美国，割礼的陋习也随之而来。根据人口统计数据，疾病控制和防治中心在1996年12月估计，在美国有超过15万名有非洲血统的妇女和女孩受到这一仪式的威胁，或是早已被施行了割礼。尽管“中心”提醒说，这个数字并没有进行任何实地调查和证实。[32]

在1996年，当一名来自多哥的少女为逃避割礼仪式而到美国寻找庇护这样一起有名的事件发生以后，国会宣布在美国施行女性割礼的仪式为非法。它要求联邦官员通告从有相关习俗地区来的新移民，让女儿行割礼的父母和执行割礼的人都将判刑入狱多达5年。这一法令还指示美国在世界银行的代表，以及其他给存在这一习俗的28个非洲国家提供巨额贷款的国际金融机构，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教育计划制止这种陋习，就反对继续给予贷款。

专栏8.3 关于被残害的另一半

今天在埃及，一个男人可以合法地拥有4个妻子；父亲可以不经本人同意将女儿出嫁；妇女不能申请离婚；男人仅仅通过遗弃就可离婚；妇女无权要求孩子的监护权；如果妻子在性方面加以拒绝，丈夫不需要支付赡养费或孩子的抚养费；丈夫有权禁止妻子工作、旅行，

甚至在她自己的环境中自由活动；如果妻子未经丈夫同意私自离家，他有权强迫妻子回家。虽城市中少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逃脱了她们的“命运”，但是大多数埃及妇女仍然生活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中。

在《蒙面的夏娃：阿拉伯世界的妇女》（1982年）一书中，纳瓦尔·萨达维讨论了当代埃及妇女的生活现实，特别是在其中非常有影响的一节“被残害的另一半”中，考察了女性割礼的习俗。她解释道，这一习俗源于至今仍在阿拉伯世界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化观念，即妇女的童贞就等于男人的荣誉。人们最关心的是，新婚之夜的新娘是个“女孩”而不是个“女人”。与此相一致，女性割礼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妇女不会随便被诱使交出不属于她自己的贞洁。

萨达维医生用她的现身说法，动人地讲述了当今埃及社会的割礼。她是当地的教育主管的女儿，半夜里她从床上被人抓了起来，拉进了浴室，在那里她的大腿被掰开，阴蒂被割去。她紧闭双眼，在疼痛和恐怖中大声叫喊着母亲。当她睁开眼时，才发现母亲微笑着和割礼者一起站在她面前。

纳瓦尔长大以后，成了一名医生。多年来她一直听到病人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着这种经历，试图以此解释自己对性行为恐惧和痛恨的原因。女性的割礼不断地困扰着她，使她逐渐意识到，“阴蒂的割除……是同对女孩思想的洗脑密不可分的，男性用这种有计划的残忍的行动，使她们丧失思考、判断、理解的能力。”

在1997年初，政府由于国际压力禁止了这种做法，看似埃及的女孩们可以从此不再遭受强迫的割礼了。然而在1997年7月，埃及的一个法庭推翻了政府的禁令，同意这一习俗继续下去。当本书即将付梓之时，埃及政府正在就这项判决向全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专家估计，大约有70%的埃及妇女仍然遭受某种形式的这类仪式，范围从一个很小的切口到外生殖器的完全割除。[33]

女人作为一种可以任意处置的财产

或许在现代从生理上虐待妇女最严重的例子发生在印度。在那里，传统要求新娘的家庭支付给丈夫一大笔钱的嫁妆，作为婚约的一部分。嫁妆自古以来是新娘家庭的一种自愿的礼物，或是作为给女儿的一种遗产，但现在它已逐步转变为一种纯粹的商业交易。在70年代末，发生了大量新婚的新娘死于火灾的事件，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由于做饭时的一时大意导致失火造成的。但在事实上，每起案子中的死亡基本上都是因为新娘的家庭没能完全满足夫家对嫁妆的要求，同时也是因为妇女在印度社会中极低的地位和消费主义观念造成的。在案发率最高的1984年，据估计每天有22名妇女因为嫁妆问题而被烧死。[34]

调查人员也不能不承认在这种残忍的谋杀中存在着经济动机。新德里的妇女团体在所有嫌疑犯的家外进行抗议示威，并严密关注每一起案件的起诉和审判过程。她们的行动有助于推翻传统习俗，并对那些把新娘当作一种可以任意处置的财产的丈夫和婆婆予以惩治定罪。[35]然而，残酷地纵

火烧死新娘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印度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每年因嫁妆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在1991年为5157人，1992年为4954人，1993年为5817人，1994年为5199。根据最后的这一数字，印度平均每天有14人因嫁妆而死去，而据非官方估计，这一数字则要更高。[36]

许多人相信，只要经济发展了，新娘被烧、残杀女婴、非法堕胎以及作为印度社会中许多其他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根源的嫁妆问题就会逐渐消失。但令人吃惊的是，实际上新娘被烧行为在生活富裕的家庭发生得更为频繁。也有许多人相信，只要教育普及，这种罪恶便会消失；但是因为嫁妆问题造成的死亡率，在受过教育的家庭中反而更高，而在贫困的、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所谓“劣等”阶级的人中却相对较低。[37]

性 骚 扰

由于主流群体决定了社会的官方语言，因此日常用于相互交往的言语同权力和性别歧视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在美国历史上，妇女常常有被排斥在社会话语之外的感觉，有时甚至难以用言词来描述她们的经历。例如，在70年代中期以前，妇女一直无法轻易地表述为什么她们会因为男人在工作中的行为而感到不舒服和被轻视。1976年以前，妇女一直对此保持沉默，可能是认为这种经历只是一种个别的、个人的问题，并未意识到这是在职业结构中妇女从属和脆弱地位的一部分。1976年，《红书》杂志进行的一项调查确定了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在9000名自愿回答问题的妇女中，90%表示自己在工作的某个时期受到过骚扰。

到1978年，林·法雷才得以描述这个以妇女为中心的概念的由来：

“‘性骚扰’一词是第一个描述妇女对于这种行为的感受的词，它完全表述了对男性在工作场所的侵略行为的否定认识。由于有了这种新的认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管理专家正在重新审视男女在工作中的关系。我们对男人、女人和工作的理解也将从此改变。”[38]

之后，美国价值体系保护委员会支持的一项更大、更科学的研究显示，性骚扰造成了惊人的经济损失。在1978到1980年两年间，它在雇用、培训、旷工和工作完成量上总共造成了1.89亿美元的损失[39]。这个估计还只是仅仅包括了联邦政府；而在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营企业所造成的其他巨大损失毫无疑问将会更大。个人在这方面的损失也很大。根据联邦政府同一次的调查结果，研究者保守地估计，有1%的妇女即大约9000人曾经成为上司或同事试图强奸的受害者。



保拉·琼斯（左）对克林顿总统的性骚扰指控及其发言人苏珊·卡朋特·麦克米兰（右）向媒体的陈述引起了广泛的公众讨论。一位法官在 1998 年驳回了她的指控，而尽管别的妇女也提出了类似的指控，在民意测验中，总统的支持率仍然很高。

动机和性骚扰的背景　性骚扰是一种老板对下属、教授对学生、资深同事对新同事之间的高压关系。进行性骚扰的主要是男人，女性较少，但基本上都是握有权力的人对无权者采取的一种侵害行为。然而，与这种传统观念不同，1993 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77%接受调查的女医生曾经被她们的病人（主要是男性）骚扰，而且通常就在诊室中。研究者得出结论认为，“在男病人看来，女医生首先被视为女人而不是医生。这是她们性别中所固有的脆弱性，这远远超出了她们作为医生的力量”。[40]

这一发现说明了性骚扰问题的根本基础，女性在其中被视为一个性对象。典型的借口或掩饰是说，这“只是为了寻开心”或是为了奉承妇女，或者称这只是加诸于那些“自找”的妇女；而且任何“诚心的”女人都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处境。骚扰与非骚扰间的界线有时非常模糊。男人或许只是将他的性侵犯行为看成一个问候而已，但妇女或许会把一个完全没有伤害的表示错误地解释为危险的或猥亵的[41]。不过，通常双方都承认性骚扰是一种基于性特权假设的行为：

上司的性骚扰举动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世纪封建主对其附庸新娘的一种初夜权行为。尽管许多世纪以前封建时代就已结束，但仍然有许多人觉得作为一个上司，至少有某种不可剥夺的半神圣权利……利用工资单就有权对下属肆无忌惮地滥施性播扰，如果不是病态的，看来也是滑稽可笑的，但它却时时不断地在发生。男人不会在公共汽车或大街上掐一个妇女的乳房，但却可以对他们的秘书肆意妄为，就好像这是一种职业赋予的特权。[42]

解析性骚扰 1980年以来，美国法庭对性骚扰案件的判罚，大体上是以就业平等委员会制定的方针为基础的，它根据1964年民权法案第7款的条文对雇员进行保护。这些方针将**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界定为：

“不受欢迎的性攻击、性要求以及其他有关性的口头或身体举动……它通常是以工作为条件，或是会影响到未来的就业，或是会干扰人们的工作表现，或制造一种胁迫的、敌视的或攻击性的工作环境。”

在1991年，安妮塔·希尔控告最高法院候选人克拉伦斯·托马斯性骚扰，全部由男性组成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对此案进行的听证会经过电视直播震惊了全国。希尔和其他人在3天里所做的证词使公众了解到，下流和粗鲁的话也构成了性骚扰。尽管参议院后来通过了对托马斯法官的提名，但听证会扩大了公众的认识，使就业平等委员会收到的正式的性骚扰指控增加了近一倍。[43]

1993年，最高法院裁决指出，原告无须证明侵害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心理伤害或是对其工作能力的削弱，而是直接援引前面所引用的第7款的最后一条，接受了这个标准，即个人是否感到环境被性骚扰所破坏，以至于变得充满敌意，致使无法继续安心工作。虽然这个决定给予基层法院更多的处理性骚扰案件的自由，对那些没有明确医疗伤害证明的原告较为有利，但所谓**敌意环境**（hostile environment）的确切含义仍然非常模糊[44]。形形色色的解释使人们很难将“敌意环境”同其他利用权力发生在工作场所的侵犯行为和恶习相区分。

在整个90年代，军队里发生的性骚扰事件不断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从1991年美国海军的男性战斗机飞行员在会议上骚扰女军官的泰尔霍克丑闻开始，所有的军事部门都面临着严重的指责和麻烦。妇女关于性骚扰、攻击和强奸的控诉，包括新兵控告军士长、军校学员控告男同学、女飞行员控告男飞行员、副官控告长官（包括1998年对美国军队中尚未授衔的最高长官的控告），表明军队内有关两性关系的严重问题持续不断。在1997年，当空军因一起通奸事件开除一名女飞行员，但同时却试图对

一位正在竞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男性的通奸行为视而不见时，引起了公众对这种“双重标准”的强烈不满，迫使这名候选人自动撤消了自己的提名。

对那些反对从法律上认可性骚扰是一种可以控告的罪行的人们来说，1996年北卡罗莱纳的一所学校一个6岁男孩因亲吻了一个女生的脸颊而被以“性骚扰”加以处罚这一事件为他们提供了反击的机会。许多人，包括许多女权主义者都认为，学校关于性骚扰的政策中的“不受欢迎的接触”这一成年人的标准，不应该适用于一个一年级孩子天真无邪的亲吻。或许学校管理者失去他们应有的判断力，是因为他们害怕因为没能保护好孩子而遭到起诉。但无论是什么原因，仍有许多人对学校的做法表示支持，而反对者也抓住这点为基础，对整个性骚扰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批评。然而，利用一件荒谬之举或过度的反应为依据，对承认存在某种不合适的性别交流模式的努力加以非难，无论如何是错误的，就像因毫无伤害的一个吻而指责一名6岁孩子的做法一样。

变化的领域

从70年代开始，妇女实际上已开始加大了她们在教育和工作中的参与度。因此，对妇女的家庭和生育角色的社会界定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尽管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仍然存在。

教　育

70年代，男女不同校的大学数量下降很快，从16%减少到7%。[45]1996年，另一个完全被男人霸占的城堡也倒塌了。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弗吉尼亚军事学院长达一个世纪只招收男学员的政策被认定违反了宪法中保护妇女平等权利的规定，法庭命令学校开始招收女学员，否则就放弃州政府的资助。在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起性别歧视案件中，法庭敲响了利用公共资金所办的学校中性别歧视行为的丧钟。[46]

单性课堂 然而，就在这一领域的性别融合取得进步的同时，出现了关于妇女寻求性别分离的课堂的另一种争议。1996年最高法院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一案的裁决，显然没有对女子学院产生影响，因为这些地方“促进了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应对特定的经济不利条件”，并因此而得到

豁免。争议并非来自于此，而是对于在中小学试图建立单性课堂的努力。在十多个州里，一些学校区以教学改革的名义，对性别隔离教学进行了实验，以消除学生的注意力不集中和性别偏见。大部分这类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女孩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成绩，因为之前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在199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女孩在公立学校中所受教育不足，尤其是在数学和科学领域。[47]

许多研究发现，完全为女性设置的教育方式有着积极的效果。比起毕业于男女同校的学校的女生，女子学校和女子大学的毕业生更有自信，在工作中更为成功。大多数人在数学和科学课程中表现出色，并且更有可能在这些领域获得事业成功。[48]许多教育者在注意到这些成果之后，建议在男女同校的公立学校里，对诸如数学和科学等课程采取全部是女生的班级教学形式。对此法律专家认为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它只是一种不同的选择，而没有要根本取代男女同校教育模式。[49]

批评性别隔离班级的人担心，正当女生最终融合进纯粹男生的学校的时候，这样的班级会阻碍性别平等的目标。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研究性别平等的专家认为，他们的目的是提高男女同校教育，而不是通过单性课堂来破坏这一体制。[50]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项研究将21所独立的中学划分为3种类型——男校、女校和男女同校，对其中86个班级的某些特定课程中存在的性别歧视进行了测定。研究发现，在男校中性别歧视最为严重。尽管女校中性别平等表现最为明显，但也使得一种有害的性别歧视形式得以长久存在，即依赖学习和并不严格的教导实现自我价值。在入学、师资聘用和人际关系中积极推进性别平等的学校，是性别歧视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51]

尽管研究表明，单性学校能够产生有更多自信和更好成绩的女生，但至今仍没有对单性课堂和男女同校进行长期的比较研究。迄今为止，这一方法拥有许多忠实的支持者，也有彻底的怀疑者，但缺乏可靠的资料。其中的一位怀疑者是来自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瓦列莉·李，她也是刚刚提及的那项研究的作者之一。她说："这些（单性）班级是对一个极为复杂问题的虚假答案。"[52]

大学录取和专业 在大学这一层面，有大量迹象表明情况对女性有所改善。迟至1972～1973学年，59%的大学生还都是男性。而1985年，妇女占了全部大学生人口的52%；1996年为55%。妇女获得大学学位的比例从1975年的45%，上升至1985年的51%和1996年的55%。[53]由于妇女占总人口的51%，因此她们现在进大学和获得学位的人数比例要高于男性。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过去被认为属于男性的专业研究领域。例如，从1971至1993年间，妇女在商业和管理学学位中所占的份额从9%增加

到47%。其他领域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生物科学，从29%增至51%；计算机科学，从14%增至28%；工程学，从1%增至14%；法学，从5%增至68%。然而，教育、外语、保健科学等传统上由妇女控制的领域依然界限分明。[54]

工作场所

在美国的非军事性劳动者队伍中，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基本上与男性相近。1996年，72%的妇女从事有工资收入的工作，而男子的就业率为87%。[55]婚姻状况不再是一个决定谁工作的重要因素：61%的已婚妇女参加工作，而参加工作的单身妇女为67%。[56]家里有学龄前儿童也不再同妇女是否工作相关。在双亲家庭中，63%有6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参加工作，相对而言1975年只有37%。[57]

就像原先主要属于男性的大学专业向妇女开放一样，职业的选择也同样如此。妇女不断进入那些她们曾经很少涉足的职业。她们现在几乎占



尽管今天大多数妇女都离家出外参加工作，而且比几十年前更容易进入一些重要岗位，但她们中的许多人在“快速轨道”和“妈妈轨道”之间选择一条不同的职业之路。女性在高级管理职位中所占数量的不足正式由于这种被迫的选择。批评者还补充指出，所谓“玻璃顶”的最高职位的微妙限制，也阻碍了她们的向上升迁。

据了一半的管理和专业岗位，在大学教授、律师、政府官员和行政官员、财务经理和人事经理等工作上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58]其他许多工作仍然为**粉领工作**（pink-collar jobs），在习惯上被认为是等同于妇女的，因而也主要由妇女来担任。在如护士、营养师、幼儿园教师、牙医和秘书等职业中，妇女占了全部从业者的90%到98%。[59]

“快速轨道”和“妈妈轨道” 尽管如今妇女可以得到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但她们在求职过程中仍然受到微妙的歧视对待。这或者是因为雇主依然相信旧的性别角色观念，认为男性在注重技术或管理技能的工作中更为出色，或者是因为他们担心妇女的家庭负担会妨碍她们的劳动效率，而公司也将为妇女的产假增加额外的开销。[60]当然，妇女一般比男人承担更多的家庭义务，诸如家务劳动、养育孩子、照料生病的亲属。[61]

美国的职业妇女必须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公司中所谓的**快速轨道**（fast track）——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以获得快速的晋升资格——要求每周工作至少60小时，频繁出差，周末会议，偶尔还要求放下手头的一切去处理危机。为了达到这些要求，一些妇女推迟了生育，或是完全放弃了做母亲。选择成为母亲常常迫使妇女降低她们对职业的目标，放弃或至少推迟进一步晋升。很快，有孩子的妇女在收入上就会落后于没有孩子的女性，后者会在公司内部的等级阶梯上超过她们。十分之九的40岁以上男性高级主管都是有孩子的父亲，而只有三分之一的40岁以上女性高级主管是母亲。[62]

大多数妇女——尤其是在三十多岁的女性——都选择了**妈妈轨道**（mommy track）。那些试图同时把握住家庭和工作的母亲必须有可靠的人能为她照顾孩子。由于大部分公司都没有在工作场所开设日托中心，她们只能找亲属或邻居、或是某个邻近的幼托中心。照顾孩子的巨大开销常常是妇女放弃工作的一个主要原因。[63]

此外，当妇女下班回家以后，她们又要开始“第二轮的工作”，完成购买食物、做饭、打扫房间和照顾孩子的任务。她们在家务劳动上每周要用去大约26个小时，而男人相对而言每周用在家内修理、打扫院落和处理垃圾等杂务上的时间只有大约7小时。[64]因此职业妇女的负担要大大重于男子。正如艾尔莉·霍赫夏德所指出的，“在过去40年里，许多妇女做出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参与经济活动。现在是整整一代男性做出第二次历史性转变的时候了，即参与到家务劳动中去”。[65]

“玻璃顶” 许多年来，女性主义者和社会观察家都谈及到有一种**玻璃顶**（glass ceiling）——一条阻止妇女晋升中层以上管理级别的无形的界限——在公司最高层的男人中有一种任人为“性”的“老校友关系”网，

支持一些年轻男性提升而排斥女性。批评者指责，在传统观念、性别成见和对有雄心壮志的妇女的感到不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公司上层长期存在着这一排斥妇女的樊篱。[66]

1995年,由国会两党成员共同组成的一个叫作玻璃顶委员会的专门小组提交了一份报告,总结指出,妇女仍然被阻挡在高层管理职位(副总经理或更高的位置)之外。尽管白人男性只占了全部劳动力的29%,但在全国各行业中他们却把持了95%的高级管理职位。妇女在进入中层管理层(助理副总经理、部门经理等)中较为成功:白人妇女占了近40%的这类职务,黑人妇女约为5%。相反,黑人男子在中层管理职位中只有4%左右。[67]

一些管理咨询公司不同意把公司中的妇女描述为碰到了无形玻璃顶的悲观结论。他们提出，平均而论，一个公司总经理需要25年时间才能达到这一职位，而首席执行官则需30年。而大部分妇女参加工作的时间也不过这么长。一项对一些最主要的大公司最高层20人以下的级别所做的研究发现，半数次最高层的管理人员是女性。专家预计，在以后几年中，第一批没有中断地在公司效力达25到30年的全职管理层妇女在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之后，将开始突破进入到最高的职位之中。全国一流的咨询公司指出，许多公司对执行总裁的性别并不很看重，能力才是最关键的问题。[68]在以后几年里，我们将看到哪一种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更为正确。

一个被经常引用的统计数字是妇女和男子相对收入的不平衡。在1996年，如果男人每收入1美元，那么妇女只能得到75美分。尽管在某些年份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在整体上，从1985年（当时为68美分）开始已出现了一个缓慢的上升趋势。[69]不过，对这个比例要细加说明。因为它只是一个平均值，包括了许多变量因素——教育、技能、资历、工龄等。许多职业妇女从事低收入工作，倒也未必是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到歧视，而是她们缺少男人那样的资格，所以不能获得高收入的工作。这些数字并不意味着雇主对妇女采取欺骗手段，付给她们的工资只有男人的四分之三。在实质上，无论是由男人去做还是女人去做，同样的工作支付的报酬相同。男女之间平均收入差别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不同的资格条件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的就业机会。

政治参与

性别平等主义的期望和实际结果之间最令人吃惊的差距是，在政治权力中占有位置的女性人数太少。妇女在总人口、注册选民和实际选民的数量上都要超过男性。[70]但在国家公职人员中，妇女在第105届国会（1997～

1998年）中仅占了11%，而这已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但比起第104届国会也只增加了0.5个百分点。具体人数为51名女众议员（共435人）和9名女参议员（共100人）。而第104届国会中有48名女众议员和9名女参议员。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要用280年的时间，也就是到2276年，妇女才可能拥有国会席位的50%，而在参议员中，她们的人数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两位数。

相反，在古巴、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等国家，妇女在国家议员中占到了32%到40%之间。[71]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的妇女像挪威妇女那样拥有如此大的政治影响。在那里妇女几乎拥有内阁和国会中的一半席位。挪威也是惟一的一个国家，当孩子们问及父母一个男孩长大后能否成为首相时，得到的回答会是“没门儿”。[72]

在美国，尽管妇女在地方、县和州政府的公职中比例仍然很低，但在过去20年里她们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全国近50万个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和县的公职中，妇女占了20%。大约五分之一的州议员是妇女，而在20年前只有5%。[73]



父亲的角色只是在上一代开始才稍有了改变。男人不再仅仅扮演着高高在上的父亲角色，把全部养儿育女的工作都留给了妻子。特别是在中产阶级家庭，日益平等的家长角色促使父亲们成为一个新的、有意义的和参与家庭的角色，他们与子女有了广泛的相互交往。

尽管在政治公职中妇女人数越来越多，增加了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妇女的观点和利益得到考虑的可能性，但妇女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相反，妇女中有着各种不同的政治观念——从严格的保守主义到极端的自由主义——以及不同的种族、社会阶级、宗教和地区背景。

男性化的社会结构

在社会科学研究和公众心理中，男性不再被认为是“天生”就具有竞争力或优越的，或者甚至是蔑视女性的。相反，我们从非生物学的角度出发，去认识造成这种关于男性行为成见的根源和不利影响。以下将简要地讨论3个相关的发现：侵略性、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小男孩的下流游戏”中的发展；男人在感情承诺方面的无能；男人在成为父亲（一度被认为是所有行为中最具男性气质的）时所表现出的迷惑和不安。

“小男孩的下流游戏”是对少年棒球联赛所进行的一项观察研究得出的。加里·芬恩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处在青春期前期的男孩言行非常糟糕。[74]他们的行为在其生长的白人中产阶级社会几乎是不能容忍的。3类行为支配了他们的交流：

1. 相互之间搞侵略性的恶作剧，尤其是对那些不合群的同伴，而对群体以外的人则常常采用暴力。
2. 不断地使用种族主义的言语行为侮辱和蔑视少数民族。
3. 在他们关于性的谈论中，可以说出对某个女孩有性的兴趣，但却禁止真正喜欢上一个女孩。

研究青春期以前的成长可以揭示出消极的性别成见是如何被强化的。由于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将自己的群体与他人相区分，从而形成个人地位，因此这些男孩对待外人的态度非常粗暴。然而，这些态度并不是自发产生的。模仿成人社会常常是这种下流游戏的一个动因。但处于青春期前期的男孩们的行为常常极为夸张，甚至令他们的父母也会为传递给他们这种行为而感到懊悔不已。

不能在相互关系中承担责任，是今天男性生活环境的一个结果。他们处在“一个历史性的特殊场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他们是男性”。[75]他们对家庭、女人和工作的责任变得越来越模糊，他们还无法适应去与一个地位平等的人发展亲密关系。许多男人感到这相当于使自己置于一个女人的控制之下。当被问及对感情和行为的感想时，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是负有责任的；但他们所能理解的责任只是在工作中，也就是意味着向某个人做

汇报，也就是“为别人工作”。

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男性失范**(male anomie)，即缺乏确切的规范。男人对自己在柔弱和强健之间的位置不再清楚。困惑于这种毫无规范的情况，男人在一些强迫性的工作或运动中寻找逃避，在那里规则的界定更加明确。

社会越来越多地希望男人参与到妻子的怀孕和生育之中，但他们又无法处理伴随这些事情所必然产生的情感问题，于是发生了对父亲身份的双重困境。传统的男性一般置身事外，但大众文化所描绘的妻子怀孕时的父亲形象，却像小丑一样忙里忙外，又不断给别人带来麻烦，还要妻子来安慰他。性别平等使得人们希望生育应是一种夫妻双方共同的经历，但男人终究无法表达孕妇的担心或不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事例中这种尺度的差距导致了传统角色的复归：男人成了生育这出戏剧的导演或指导，妇女成了顺从的部属。这仅仅是扮演支配角色的一种新的形式，而不是分享角色或公开的亲密行为。[76]

这3个事例表明了人类历史中的一种全新现象：男性气质成了社会关注和科学研究的一个主题。数千年来，男性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特权，而享有特权的人也认为他们天生就具有这种优势，因此他们很少真正研究出他们为什么“特殊”。如同其他的阶级和种族特权一样，男性气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改变这种观点也许是克服性别歧视的斗争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亟待改变的一个方面。

社会学视角

正如你所想到的，有关性别不平等的女性主义视角特别重要。不过，除此之外，功能主义、冲突论和相互作用论的方法也提供了有价值的认识。

功能主义观点

功能主义社会学家把基本的家庭需要视为形成性别角色的基础。世世代代以来，人类的家庭中既需要一个能够长期照料孩子的人，又需要有人可以机动地去狩猎、采集和到远方打仗。在大部分社会，这两种角色是按性别划分的，而这种劳动分工的长期存在似乎使其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

然而到了20世纪，条件发生了改变。在这以前，妇女在整个生育时期一直要养育孩子，其寿命只有45岁左右。而在现代工业社会，妇女一般从二十多岁开始，在5年的时间内生两个孩子，而且平均寿命达到79

岁。男人不再是战士，大部分人也无须再使用其体力或感性能力并接受长期的专门训练，而这些对男性古老的狩猎角色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

早期功能主义者集中研究了这些变化引起的混乱。他们将当代的混乱与假定是稳定的过去进行比较，担心在一个性别角色更为平等的结构中，本来由传统角色完成的功能如何可能被忽略。

直至50年代，一种改造了的功能主义保留了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基本的角色区分是必要的。新的活动范围已从育儿和狩猎扩大开来，但对角色的要求依然相似。塔尔科特·帕森斯指出，每个社会群体、尤其是家庭依然需要专门的人完成两种功能：[77]一个引导决策和任务完成的**工具性领袖**（instrumental leader）及一个聚合群体和引导情感的**表情性领袖**(expressive leader)。男性通常履行工具性角色，而女性则为表情性角色。然而，近来对一些以群体交流模式解决问题的研究发现，当这些角色存在时，它们常常是与权力结构有关，而不是性别。也就是说，“头”常常是工具性的，他们做出决定和控制交往。

功能主义对早期性别角色是如何发展形成的提供了一个似乎合理的描述。但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还有许多的问题，功能主义者没有做出回答。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其传统角色感到不满意？生儿育女真的是妇女的一种功能吗？对此当代社会学家很少会表示同意。他们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妨碍其一般成员完全地参与经济活动，它的功能可能健全吗？”

冲突论观点

同其他人的设想一样，社会科学家的假定也可能是有偏见的。[78]大部分宏观社会理论都假设，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即使在传统家庭日益减少的时候，人们还倾向于通过家庭中主要的工资收入者——“一家之主”——的地位，来判断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对冲突论者来说，性别的不平等发轫于经济的不平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只要男人对家庭做出较大经济贡献，他们的地位、权力和威望就会相应地提高。那么按照逻辑，如果女人扩大了她们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性别不平等就会缩小。[79]

冲突论者还通过借用马克思的**错误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概念(对一个人情况的主观理解与客观事实并不相符)，来考察性别歧视的作用。性别歧视观念认为妇女是情绪化和劣等的，从而证明可以将她们排斥在领导和权力地位之外，剥夺她们的其他机会，使她们在家庭和工作中处于屈从地位，支付给她们较少的工资，及对其进行控制和虐待。

妇女作为财产 注重冲突的权力政治观点证明了妇女较低的地位是怎样使男人从中受益和支持资本主义的消费经济的。[80]传统的性别角色就是为了从意识形态上证明男权的统治地位。男人把女人看作私有财产，鼓励她们在婚姻市场上出卖自己、并为这一交易而精心准备，在与其他女人的竞争中把自己打扮成一种更吸引人的商品。[81]妇女长期的从属地位使她们对他人的行为更为敏感。她们并不是天生就想要取悦别人，但是由于男人拒绝给予她们平等或直接的权力，她们不得不学会使用这种间接的控制方式。除非予以坚决的抵抗，只要男人还在从中受益，这一体制就会继续下去。[82]

性别歧视的消费主义 今天，广告试图阻止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就像它自19世纪初以来一直所做的那样。当时工业革命创造出第一批剩余财富，并急需寻找新的市场以吸纳大量的新产品。广告鼓励作为主妇角色的妇女成为贪婪的消费者，并用各种产品维持家庭的纤尘不染、光亮如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广告操纵了妇女的渴望之情，试图使她们确信，家庭生活这一领域完全是属于妇女的责任范围。《女士》杂志的编辑格洛莉亚·斯泰内姆对一个曾经一度家喻户晓的洗衣粉电视广告发表的评论，说明了这一创造和操纵的荒谬程度。当看到这个清洁衣领的广告片里的妻子发现衣领上的污渍时，她有一次甚至希望那位妻子会掉过头对丈夫说："去洗洗你的颈脖子"，而不是吹捧清洁剂的强大效力。

克里斯托夫·赖什对广告业所谓促进妇女解放的动机提出了极好的分析。他说，对永远不断的消费的需求，驱使大公司对为工资而工作这种名义上的妇女解放表现出热情，以使她们有更多的收入进行消费。他补充道："制造需求的逻辑要求妇女在公共场所吸烟喝酒、自由活动，及坚持她们自己幸福的权利而不是为了别人而活着……（从而）将消费的自由伪装成一种真正的自主。"

相互作用论观点

相互作用论把性别看成一种**首要地位**（master status）——一个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社会地位，可以决定社会身份和影响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对女医生发生的性骚扰，这表明她们的性别身份要先于她们其他所有的身份。[83]由于日常的交流是围绕着首要地位而展开的，因此在这一根本层面上改变带有偏见的定义可能很困难。对许多人而言，比起不能确定别人所希望的东西的难度，有意或无意地使用带有偏见的范畴要更容易些。尽管存在这一问题，但相互作用论者还是强调，社会期待并不是固定的或僵硬的，性别歧视的界定是源于人我之间的交流。换言

之，性别角色是我们用以相互理解的文化—语言结构。然而，如果我们决定不再坚持这些概念，或者如果我们使用更适合目前环境的其他结构，那么，它们能够而且也将会发生改变。

我们选择3个相互作用论的要点进行讨论：性别差异的情形、早期相互交流的重要性及社会界定的真正影响。

情形和多样性的现实 社会成员分享着首要地位的界定，但个人常常是通过从自身社会地位中学来的特定亚文化定义，来看待大部分情形。当一个相互作用论者研究性别时，他首先关注的焦点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间的区别。正如我们现在所接受的许多智商测验在文化上存在偏见，因为它仅仅测试有关中产阶级白人社会的现实，现在我们也必须承认"男性现实"不是惟一的现实。我们将在女性主义观点一节中更加全面地探究这一点。

早期分类和自我评价 一个人的自我概念来自于将他人的期待和评价内在化。性别评价在婴儿出生以前就已存在。父母直接关注的就是孩子的性别。研究显示，初为父母者甚至在与孩子发生直接身体接触以前，就已区别地对他们新生的儿子和女儿的特性做出了不同的评价。"好"与"坏"的评价依赖于孩子有没有恰当地选择"男孩的东西"或"女孩的东西"。女孩将各种社会所认可的她们自身的形象内在化，这些形象是受欢迎的。但如果跳开间接而不断的社会威胁来看，它们似乎是不合理的有限和屈从。这不仅仅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社会规定适当的行为、抱负、甚至情感，因为它们开始极早，并被其所界定的人广泛接受。这些社会界定就可能错误地呈现为是"天性的"差别。

社会界定的后果 尽管相互作用论将性别差异看作是建立在社会界定基础上的，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差异是微不足道的。在威廉·托马斯常常被人引用的定理中，对人类运用了一个现在是性别歧视的名词，这使得它更符合于社会的真实："如果人们把情况界定为现实的，那么在其结果中它们就是现实的。"我们对情况的界定指导着我们的行为，它们会引导我们走上错误的途径，得到危险的结果。

例如，带有性别歧视的性别形象给男性带来的代价是在男女寿命长短方面。最近关于男女死亡率的研究归结出，男女间8年的寿命差异的75%是源于差异性的社会化情况。男婴比女孩更加娇弱。他们更易于带有某种先天缺陷和疾病，但我们对待他们比对女孩更严格，有时甚至拒绝给予必要的保护。在以后的社会化过程中，注重"男子气概"及成功和进取的谆谆教导使他们更容易因为压力和紧张而导致疾病。最明显的危险之一就是吸烟。长期以来，一个男性的行为就意味着强壮，但实际上却同焦虑不安有关。男性的性角色对男人的健康极为危险。[84]

女性主义观点

女性主义社会学借鉴了相互作用论者的视角，注重性别的社会创造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期望。尽管生理在我们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影响到某些个性和男女间行为的差异，但这一事实并不能使一个性别优于另一个性别，更不能证明以性别为基础不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和报酬是合理的。

多样的观点 女性主义理论家采取一种提出主张的策略，试图克服歪曲事实的性别歧视的推论和研究。然而到目前为止，在社会学中还没有一种统一的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者已不再接受有一种适用于全体女性的惟一真理的观念，但仍拥护为争取妇女权利要采取齐心协力的斗争。[85]事实上，来自黑人妇女、女同性恋者和工人阶级妇女对居于支配地位的白人、异性恋和富裕阶层的女性主义的挑战，已在女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复杂的女性主义活动和问题。[86]

黑人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提出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观点。她指出，必须同等地考虑种族、阶级和性别这些汇合在一起的因素，因为它们作为"人类身份永恒的诸方面"共同出现。[87]她解释说："种族歧视本质上是一个女性主义问题，因为它与性别歧视的压迫相互联系得极为紧密。"[88]她主张，由于各种压迫互相联系的性质，争论哪一种压迫最主要实际上徒劳无益。相反，确定各种压迫体制之间的联系和理解它们的相互作用将会有更大的帮助。[89]

女性主义的立场理论 个人的立场——或是个人在社会中的社会位置——包括使某些现实特征显现而掩盖其他特征的意识。**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始于这样一个想法，即由于受压迫的结果，权力较少的社会成员经历的是一种不同的现实。为了生存，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必须具备双重的敏感：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和他们自身的观点都较为敏感。因此，从属群体的成员有可能运用多种视角，对社会现实形成更广泛的认识。不过，这种广泛的认识并没有消除压迫带来的严重和破坏性的后果。相反，被压迫团体的成员必须把这种观点发展为一种对付压迫的生存技巧。[90]

莫雷·福尔曼提出，通过以经验的日常生活为理论基础、承认非正式的相互交流给人们一种在社会中的位置感和身份感，我们把那些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作是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力量。此外，通过批判地对现实形成一种不同的观点，支持立场理论的人可以使父系制的不平等和对女性社会的制度化压迫机制更明显地暴露出来，从而也更容易去面对和加以解决。[91]

玛丽·斯维根斯基评论道，由于生活经历构造了一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因此研究必须从具体的经历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开始。否则，我们

的分析将来自一个不正确的立场：

> "边缘群体成员的生活经历被错误地认为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支持或反驳某些论点的证据。从以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生活经历出发，能够减少在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描述中的偏见和歪曲。例如，对妇女的生活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澄清诸如生育、家务、虐待妻子、乱伦、强奸、性骚扰、色情和卖淫等问题。从大多数男性的生活经历看来，这些问题却并不明显。"[92]

南希·哈特索克建议将妇女的"立场"放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因为"每一种劳动分工的结果都可能会产生知识"。[93]她认为，关注劳动的性别分工及由此造成的物质状况，可以揭示这些状况同时掩盖和显现的不同社会经历：

> 同无产者的经历一样，作为一个被统治群体的妇女的经历和活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女性主义的立场就是从这一经历中挑选和扩大妇女解放的可能。[94]

女性主义者相信，立场理论可以使我们对天性和社会关系提出新的问题、学到新的东西，不是从那些控制着统治机器的人的生活中，而是从那些生活在边缘的人那里。这一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确认和控制个人、社会文化假想及偏见的方式，从而增强了客观性。没有一个群体的看法被排除在外，各自都从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中提供了独特的知识。此外，这一理论相信，各个群体的成员互相理解他人的立场，将构建起一种更为公平的对我们共同的现实的认识。[95]

未来的选择

在过去20年里，美国社会已向着性别平等迈出了很大的步伐。现在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在传统的男女角色中所固有的不足、浪费和不公。这些角色不再被认为是"天然法则"；而对性别角色的态度的调查显示，男人和女人一样已大大增加了对女性非传统角色的接受程度。事实上，到1978年，男性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已经接近于妇女了。[96]科技的变革使性别角色的改变显得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仍然存在的问题是，"这个过渡时期将会有多久，有多困难?"在议会或是各种委员会里，尚未发生任何政治对抗。妇女虽然占了选民的大多数，但大部分政客依然是男人，而且我们也不清楚这种不平衡将会持续多

久。妇女正在形成网络，以互相帮助，获得工作位置和权力位置；这就是所谓的**新女性关系网**（new woman networks），仿照男性持续世代之久的“校友关系”网，即将自己原先私立学校的校友提拔到有权力的职位。如果这两种关系网互相碰撞，又将会发生什么呢？

笼罩着未来的另一个因素是：界定美国式成功的以个人成就为取向的男性化竞争性价值观到底有多顽固？妇女是否会带来或创造一种更加合理、合作、人道和适度的方法，减轻压力和有助于使工作融入生活当中？或者是否将会有一段很长的时期，人们使用的是旧的成功价值标准，而性别平等仅仅加快了竞争？

悲观的前景

2030年的美国非常类似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几年前，妇女日益增长的权力对国家中的男性构成了太大的威胁。他们意识到，如果极少数白人可以控制占大多数的黑人，那么数量更多的男人少数群体应该毫无困难地抵挡住女性分享权力的企图。男人在妇女完全获得她们的政治权力之前，采取了必要的步骤巩固了自身的权威。在由男性控制的团体的帮助下，国会立法通过了对妇女的等级制度。援引20世纪80年代设置的先例，当时军方正式将妇女隔离在所有重要的战斗岗位之外，民政部门也正式将妇女的工作单独列出。私营企业也很快采取了这种措施，为了防止任何违宪问题而使用正式的“平等工资标准”。

妇女发现，她们无法闯入越来越广泛地控制了就业的男性非正式的“校友关系网”。她们试图停止对20世纪末妇女所取得的权益的侵蚀，但这些行动不仅彻底失败，而且使得在法律上确立了这种倒退。残酷无情的法庭，尤其是在赞助性行动被取消的那些年里，反映这个国家的保守环境和在新一代中加强男性统治的社会调整。

挫折和经济压迫导致了大量示威活动和暴力抗议，但都毫无效果。利用“家庭价值标准”和社会所坚持的妇女必须在家抚养孩子的观念，男性权力结构把抗议者视为“反动分子”，通过大众传媒大肆反对妇女所要求的权利、对其进行错误报道、冷嘲热讽，而且（随着妇女运动变得越来越边缘化）甚至不承认她们的观点和行动具有新闻价值。与此同时，大众娱乐和广告不断地强调，真正的女人知道她们真正的幸福在于在性生活上取悦男人、生儿育女、保持家居整洁，无须为商业和政治这些属于男人的世界而担忧。毕竟，妇女的能力是有限的！

男女间身体的亲密行为反映了新的价值体系。已婚妇女以丈夫的成就

为荣，单身女性热衷于将自己包装成一种可人的商品以获得一个“伴侣”，从而“改变她们的命运”。女同性恋者由于其生活方式而遭到轻视和排斥，并以各种理由被解雇工作，因而她们被迫退缩到隐蔽的亚文化之中以避免进一步的困扰。性别间的战斗就此结束，胜利的男性骄傲地获得了他们的战利品。

乐观的前景

20世纪开始的趋势到2030年终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妇女大学毕业、进入各种职业领域的持续的高比例及日益增长的工资水平，使得她们在2010年取得了与男人同等的地位。事实上，工作场所中的性别平等今天已经极为正常，每个人都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能力现在是聘用和提升中使用的惟一标准，性别与此毫不相关。一个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有可能成为高级主管，一个男人也和妇女一样有可能做一名护士。

大公司常常雇用夫妇雇员，以共同承担责任和提供完备的日托设施。这一选择和父母在照料孩子责任上的平等分担，意味着妇女无须再像她们的祖母那样，为选择快速轨道或妈妈轨道而难以取舍了。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和大量的兼职职位使人们可以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充分分配劳动。夫妻同工的模式成功地消除了过去在男女两个关系网之间的权力斗争。男人们也意识到，支持一个封闭的系统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妻子遭受不公正的对待。

在政治领域中也反映出了这种性别身份的文化解构。在州和国家议会中的女议员一般都占到了总数的一半。在最近的选举中，选民已开始交替在男性和女性之间选择总统的人选了。有5位女性出现在美国最高法院也不令人感到吃惊了，因为她们的性别并不成问题。而且由于律师中女性要多于男性，因而有更多的女性大法官也就非常自然了。

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中的性别平等，也大大改善了有色人种妇女的生活，从而也提高了这些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且，性别平等已扩展到生活的其他领域，包括个人的相互交往。分担工作和责任，作为个人相互交流，以及像伙伴一样平等地参与决策，有效地减轻了压力、减少了冲突，促进了时间的更合理利用，产生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及提高了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最后，女性地位的提高使得性骚扰、性犯罪和其他针对妇女的暴力活动的急剧减少。

小 结

1. 许多早期的社会科学家都认为妇女在生理上要劣于男性。例如，弗洛伊德认为“人体是天定的”。研究指出，生理差异造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个性和行为模式。然而，生理差异只说明了一般的倾向，而不是特定的行为模式。生理学不能解释同一性别中大量的不同，以及男性和女性行为中的许多文化差异。
2. 性别歧视中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出现极早，并受到价值观、规范和意识形态等稳固而整合的社会结构的支撑，因而使得人们相信性别角色是天生的而不是由社会造成的。家庭和媒体在性别的社会化过程中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3. 宗教的历史和经典中包含了许多贬低女性内在能力和道德的定义。美国的新教牧师也加入到宗教的“女性化”之中，从而进一步把社会生活分割为一个包括艺术、文化和宗教的“女性世界”和一个包括权力、金钱和决策的“男性世界”。
4. 人们最近意识到的一种野蛮的性别歧视行为，是通过从身体或社会上限制妇女的性能力来改变女性的生理天性。这在穆斯林国家中的阴蒂切除中达到了极至。但它在许多国家存在变异形式，包括发生在印度的烧死新娘的罪行。在所有国家更为普遍的是性骚扰，即一种对妇女性身份的滥用。1991年安提娜·希尔讼克拉伦斯·托马斯的听证会使美国人更加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1993年，最高法院裁决确认，一个敌意环境的存在即是采取法律行动的充足理由。但是极端的行政举措，如6岁男孩的性骚扰案例，并不能否认现实的问题。
5. 趋向性别平等转变的领域包括教育。此问题的争议主要围绕实行单性课堂而展开。妇女在上大学和大学毕业的人数上多于男子，而且学习的专业范围也比以往更为广阔。但在工作中，妇女面临着快速轨道和妈妈轨道的两难选择。一些观察家认为，存在一个无形的玻璃顶，阻碍了妇女进入高级管理职位。其他人则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达到在公司工作所必需的25到30年时间以后，妇女正在逐渐接近这些岗位。一些妇女从事被认为是“女性化的”粉领工作。在政治领域有了稳步的进步，但却非常缓慢。社会科学家现在已开始把“男性气质”作为一种后天的社会行为来研究，而不是天生的和正常的事情。
6. 功能主义者认为劳动的不断分工是必要的，但也注意到技术革新所造

成的解体，很难再形成一个有效的新的家庭结构。冲突论者认为传统的家庭模式仅仅是一种为男性支配地位辩护的意识形态。相互作用论者认为性别角色的界定是灵活的，相信社会对性别角色的不公正将会促成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对其加以改变。女性主义者则更相信立场理论，运用具体的经历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来理解附属群体的认识和经历。

关键词

赋予地位
表情性领袖
错误意识
快速轨道
性别身份
性别不平等
玻璃顶
敌意环境
工具性领袖
边缘系统
男性失范
首要地位
妈妈轨道
新女性关系网
粉领工作
角色困境
性别歧视
性骚扰
立场理论

推荐书目

Baca Zinn, Maxine, and Bonnie Thorton Dill (eds.). *Women of Color in American Socie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 anthology of articles representing the new scholarship on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gender, and class and its social impact.

Cherry, Kittredge. *Womansword: What Japanese Words Say About Women*. New York: Kodansha, 1987. Fascinating analysis of gender-based words and how they expose cultural assumptions.

Douglas, Ann. *The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Avon, 1977. How American women were segregated from the "dirty" parts of life (money and power) and into domesticity, sentimentality, and "culture."

Douglas, Susan J. *Where the Girls Are: Growing Up Female with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Delightful, insightful autobiographical commentary on the many media influences on young girls from the 1950s to the present.

Hochschild, Arlie.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Viking, 1989. A case study approach and discussion of the strategies, strain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working couples in dividing the tasks at home.

Lorber, Judith. *Paradoxes of Gend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A strong, detailed argument that examines gender as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whose social institutions promote and maintain inequality.

Reskin, Barbara E., and Irene Padavic. *Women and Men at Work*.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1994. A comprehensive yet concise examination of the gender and work issues raised in this chapter, including work-family choices, wages, and pink-collar jobs.

Rotundo, E. Anthony. *American Manhoo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The history of the transformations (not to say development) of masculinity since the Civil War period.

Tannen, Deborah.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0. A captivating book about how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everyday events lead to mis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men and women.

Walker, Alice, and Pratibha Parmar. *Warrior Marks: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and the Sexual Blinding of Wome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3. A powerful study of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in Africa, Middle Eastern societies, and Europe. Its effects and the justifications given for it are complex and thought provoking.



第4部分 对社会机制的挑战

过去和现在的所有社会，都试图通过有组织的信仰和行为模式——即社会学家们所谓的“社会机制”——来满足基本社会需求。家庭、宗教、教育、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医疗体制以及政治体制，这些都是社会机制的主要形式。它们中的任何一项都包括一系列稳定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地位身份、角色以及处理日常生活需求和问题的参与团体。每一种社会机制的确切性质都各不相同，这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文化和发展的阶段。

社会机制规范着我们的期望值和价值观。因此对一个社会而言，它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在实现其文化上所规定的目标的有效程度决定了这个社会幸福感的程度。而且，在各种社会机制之间都有紧密的联系，例如，政治和法律制度影响着经济和教育制度；而家庭的规模、结构、稳定性则强烈地影响着医疗和教育制度。因此，在一个社会机制中发生的变化会影响到其他的社会机制。如果一种社会机制在社会整体中特别有益于其中的某一部分，或者如果它失去了效力，那么这个社会的稳定就受到了威胁，其成员就不可能都过上心满意足的生活。

在第 9 章中，我们将研究家庭，它为儿童生活提供了基本的环境。美国的家庭是否仍然为儿童提供着生理和情感上的支撑？高离婚率、单亲家庭的增加、家庭暴力的高发生率以及家庭成员间凝聚力的日益减弱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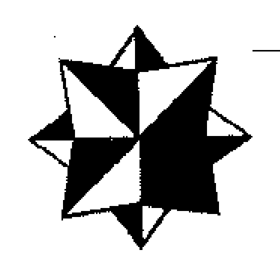
第 10 章讨论的是在近几年里受到强烈抨击的美国教育。受到批评的一个方面是教师的能力、学术水平和个人激励机制。另一个方面是城市与郊区学校教育质量的差异。

第 11 章考察那些大公司和跨国公司是如何以牺牲公众福利为代价而不断增强其力量的。相关的问题包括新技术对工作、收入、工人满意度和职业保障等方面的影响。

医疗支出的飞涨深刻地说明了我们国家在医疗体制上的不平等状况。这一有关生死两难的道德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构成了第 12 章的主要内容。在此还将讨论我们的保健制度，相比其他一些不很富裕的国家，它还要低效。

在整个这一部分，应该注意到在每种社会机制中社会经济情况的不同以及需要改进的各个领域中对所有人的服务质量这样一些持续的主题。

第9章 家庭



关于家庭的几点事实

- 在美国，现在未婚同居者共有370万对。
- 大约40%的初次婚姻以离婚而告终。
- 近一半的美国儿童在18岁以前已不再同时与亲生父母长期生活在一起。
- 虽然最近几年美国未成年少女的生育率已有所下降，但仍是西方世界最高的。
- 在法庭判决应给予抚养费的美国儿童中，只有一半真正收到了这些钱。
- 每年有超过200万妻子遭到丈夫的殴打。
- 在美国每天有3个儿童受虐待而死。
- 六分之一的妇女是乱伦的受害者。

今天，关于家庭的迫切问题是如何界定它。由于受到不断变化的潮流的冲击，家庭以无数种形式存在，其特点可以最好地概括为“处于过渡阶段”。大多数家庭中都有人已经离婚，许多人未婚就生活在一起，其中可能还有结成“家庭伴侣”的同性恋者——他们实际上就是同性夫妇。有观察者已经注意到，在得知已婚子女由于专注于工作而决定不要孩子时，那些一心想要成为祖父母的老人感到非常失望。在家庭这一领域内，可以经常听到对各种变化的讨论。一些看法认为，现在家庭生活变得更好（因为个人不再局限于婚姻和家长角色的束缚，而可以自己做出选择）；另一些则认为家庭正在土崩瓦解，而这种瓦解正在把社会带到崩溃的边缘。

社会历史背景中的家庭

要掌握家庭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变化，首先必须对历史上家庭的面貌及其功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电视里不断放映对过去家庭的黄金时代的描绘，它包括几个孩子和他们相敬如宾的父母，在同住的祖父母的帮助下，

他们共同劳动。权威和尊敬以年龄为基础，一种强烈的职业道德和精神价值观由长辈传给晚辈。然而，史蒂芬尼·库恩茨的著作《我们从未经历的方式：美国家庭和怀旧陷阱》反映了这种现实的难以捉摸。[1] 在过去，由于高死亡率，很少有大家庭存在。高死亡率也意味着父母经常会失去还在摇篮里的婴儿，孩子会失去兄弟姐妹，婚姻生活会突然终结。总之，那时死亡使家庭瓦解，正如今天离婚使家庭瓦解一样。事实上，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判断，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中的家庭都有重大的缺陷。例如，我们期望能使孩子充满职业道德，但我们之中几乎没有人会宽恕在19世纪下半叶非常普遍的做法，即让大量儿童在地狱般的工厂环境里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对过去的理想化也使我们去假想一种普遍的家庭模式，而忽略了任何时代都存在的阶级、民族的多样性和种族差异。例如，贫困家庭为了生存，其生活方式必定不同于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

但是总而言之，在近两个世纪以来，作为社会日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一个反应，家庭的规模变小了，孩子越来越少，亲属关系变得不再重要。对个人权利的日渐强调，使得婚姻不再被定义为一种社会义务或经济上有利的结盟关系，而成为一种个人满足的来源——并导致离婚率越来越高。妇女离开家庭参加工作的速度远比男子承担家务活动要快得多，其产生的一些变化已对社会造成了大量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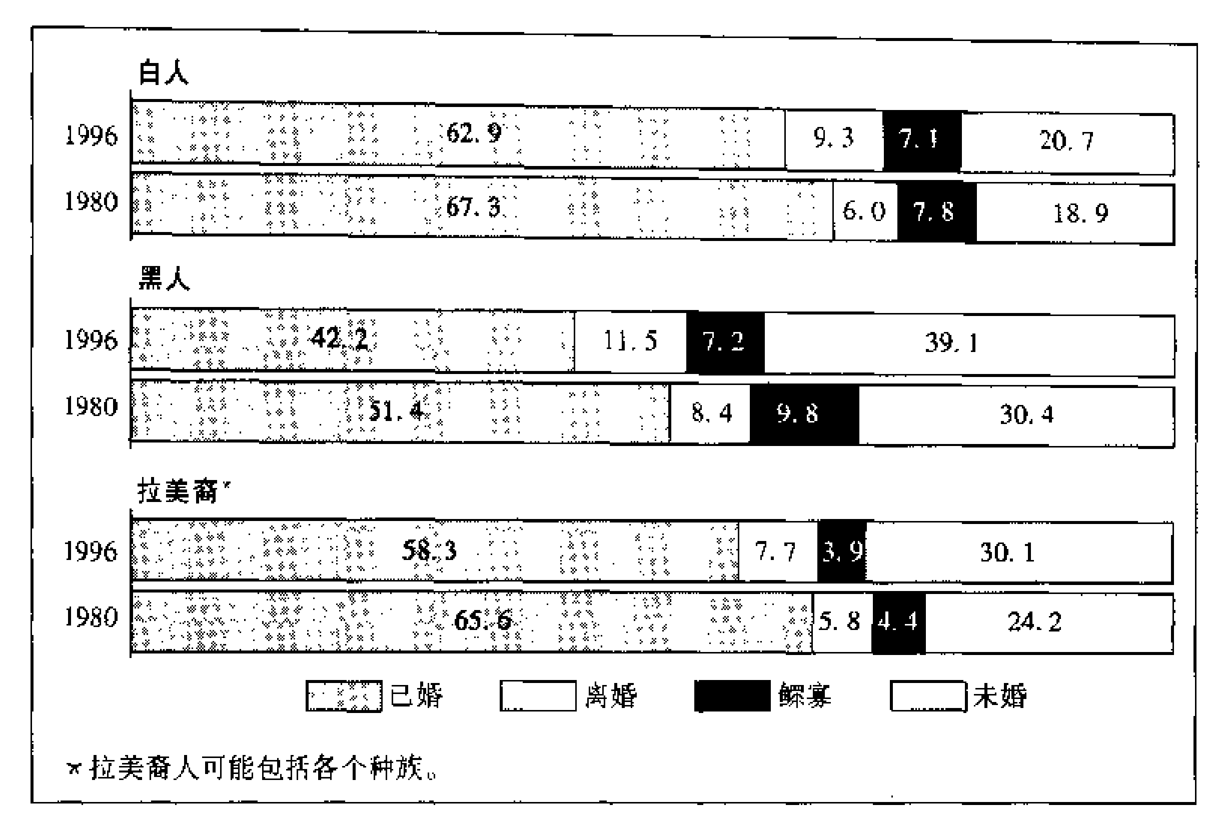
最近的变化

表9.1反映了从1970年到1980年直至1996年间美国家庭所发生的突出变化：由已婚夫妇和未满18岁的孩子所组成的家庭比例在下降，伴随着的是单亲家庭数量的增加，尤其是有孩子的女性单亲家庭。此外，独身的家庭也有明显上升。图9.1显示了已婚成年人比例的总体下降，这同时反映了离婚者比例的上升以及独身者的大量增加。后一种增长在黑人和拉美人中尤其显著（参见专栏9.1）。1970至1980年间的家庭快速变化已经有所减慢，到1990至1996年间，女性为家长的家庭所占的百分比已趋于稳定，但这一比例仍高于过去几十年。

表9.1 家庭构成，按18岁以下亲生子女数量的情况划分：1996年，1990年，1980年和1970年（单位：千）

家庭类型	1996年		1990年		1980年		1970年		年平均变化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1990～96	1980～90	1970～80
户数	99627	100.0	93347	100.0	80776	100.0	63401	100.0	0.7	－1.4	－2.4
家庭户	69594	69.8	66090	70.8	59550	73.7	51456	81.2	0.5	1.0	1.5
无18岁亲生子女	35391	35.5	33801	36.2	28528	35.3	22725	35.8	0.5	1.7	2.3
有18岁亲生子女	34203	34.3	32289	34.6	31022	38.4	28732	45.3	0.6	0.4	0.8
双亲家庭	53567	53.7	52317	56.0	49112	60.8	44728	70.5	0.2	0.6	0.9
无18岁以下亲生子女	28647	28.7	27780	29.8	24151	29.9	19196	30.3	0.3	1.4	2.3
有18岁以下亲生子女	24920	25.0	24537	26.3	24961	30.9	25532	40.3	0.2	－0.2	－0.2
其他家庭：男性户主	3513	3.5	2884	3.1	1733	2.1	1228	1.9	2.2	5.1	3.4
无18岁以下亲生子女	1885	1.9	1731	1.9	1117	1.4	887	1.4	0.9	4.4	2.3
有18岁以下亲生子女	1628	1.6	1153	1.2	616	0.8	341	0.5	4.1	6.3	5.9
其他家庭：女性户主	12514	12.6	10890	11.7	8705	10.8	5500	8.7	1.5	2.2	4.6
无18岁以下亲生子女	4859	4.9	4290	4.6	3261	4.0	2642	4.2	1.3	2.7	2.1
有18岁以下亲生子女	7656	7.7	6599	7.1	5445	6.7	2858	4.5	1.6	1.9	6.4
非家庭户主	30033	30.7	27257	29.2	21226	26.3	11945	18.8	1.0	2.5	5.7
独身	24900	25.0	22999	24.6	18296	22.7	10851	17.1	0.8	2.3	5.2
男性户主	13348	13.4	11606	12.4	8807	10.9	4063	6.4	1.5	2.8	7.7
独身	10288	10.3	9049	9.7	6966	8.6	3532	5.6	1.4	2.6	6.8
女性户主	16685	16.8	15651	16.8	12419	15.4	7882	12.4	0.7	2.3	4.5
独身	14612	14.7	13950	14.9	11330	14.0	7319	11.5	0.5	2.1	4.4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oports*, *series* p.20 no.488. "Household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March 1996"(Washington D.C.: U.S.Gov't Printing Office, 1997).



图表 9.1 1980 年和 1996 年的婚姻状况（18 岁以上）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20 – 491。(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专栏 9.1 有关黑人家庭的争论

大约 30 年前，当时的助理劳工部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引出了一场轩然大波。他宣布没有父亲的家庭是"黑人社区存在缺陷的根本原因"。在那时，四分之一的黑人家庭是由女性主持的。今天这种情况更加恶化。62%有孩子的黑人家庭现在都是只有父亲或母亲。其后果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家安德鲁·切林所说的："在美国黑人中婚姻和育儿几乎是完全分离的。"

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 1950 年以前，黑人和白人的婚姻模式非常相似。而且尽管在这以后黑人的结婚率迅速下降，但结婚的愿望仍然非常强烈。《新闻周刊》对单身美国黑人的民意测验显示，88%的人表示他们希望结婚。但是在过去的 25 年里，结婚的梦想受到了阻碍。在 70 年代，国家从以工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所造成的经济混乱对黑人的负面影响特别大，因为在此以前，他们大量迁移到北方从事制造业的地区……

一些白人忽视了职业和歧视是黑人家庭崩溃的重要因素。回到 60 年代民权运动的高潮时期，莫伊尼汉由于形容了一种"病态"的模式而激怒了黑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黑人不愿意忍受一个暗示他们与白人不同或比白人低劣的公开讨论。这一争论很快使得白人与黑人间的关系变得尖锐，也使自由派和保守派出现两极分化。保守分子受到里根·布什时代文化巨变的激励，责骂黑人说："这全是你们的错。"这些言论轻蔑地认为，黑人所需要的是主流的美国价值观，也就是白人价值观。他们告诫道："去上学，找工作，结婚，

家庭就会变好了。”但是自由派回击说，事实并非如此。如芝加哥大学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学家威廉·尤利斯·威尔森在《种族重要性的衰落》一文中认为，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的瓦解源于失业的增加，而不是因为价值观的丧失。自由主义者把保守主义的观点视为“对受害者的指责”。这一术语是1965年白人心理学家威廉·莱恩在评论莫伊尼汉的研究时创造的。在自由派看来，任何家庭结构只要能生儿育女，就是好的。马里兰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安德鲁·比林斯利撰写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白种人美国的黑人家庭》一文，他指出：“在黑人社区，婚姻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有心理准备的黑人来说，这并不是必需的。”

谁对谁错？双方都忙于指责对方，而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

资料来源：Michele Ingrassia, “Endangered Family,” *Newsweek* (August 30, 1993) (c) 1993, Newsweek, Inc.

家庭问题的范围

从总体上看，家庭受到社会中反家庭因素的破坏。美国在儿童补助、高质量的儿童护理和医疗保健以及夫妻产假等给予家庭的支持上，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直到1993年，美国才通过了家庭休假法令，要求雇主允许雇员为照顾家庭成员请假，而不能危及他们的工作。

在工作场所增设照顾儿童的设施的行动一直较为缓慢。大公司为那些既有工作又有家庭的妇女建立了“妈妈轨道”，减缓对她们的提升和培训；它们甚至还为那些在家中照顾孩子的男人创立了一种类似的“爸爸轨道”。[2]

绝大部分有工作又有孩子的妇女在家中承担着大部分家务。这使得她们回家以后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工作，使其生活变得异常紧张。[3] 我们不知道妇女劳累过度对社会的影响，但很可能造成健康恶化和经常旷工。然而，这种压力仍然被看成是纯属个人问题，而未被界定为一种社会共同的问题。

今天许多其他的家庭问题也被置于个人化的领域，例如成年子女回到家里居住所引起的身份的不确定，既要抚养孩子又要照顾老人的“三明治的一代”现象，以及一些祖父母在子女由于吸毒、失业或其他社会问题而不能照料自己孩子的情况下，承担起照料孙辈的主要任务。

许多人发现家庭的某些变化，例如同居（cohabitation），在道德上令人无法接受，尽管它们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明显的消极影响。同居伴侣（没有合法婚姻关系而居住在一起的人）现在大约有400万对。[4] 有人提出，这

种关系会产生一个消极的前景，如果同居越来越普遍，那么就不会有人再去找麻烦结婚。而如果因此引起出生率降低，可以招收的本土出生的新工人人数也会减少，社会将可能出现经济衰退。基本上讲，当其他社会机制感受到家庭变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时，这些模式就会被重新界定为社会问题。

这里列举3个与家庭有关的社会问题：高离婚率、单亲家庭增多和家庭暴力升级。

离　婚

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美国社会的离婚率相对较为稳定。在大萧条时期，由于人们没有能力支付离婚费用或维持两个家庭，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二战以后，部分是因为战前和战争中大量草率结成的不稳定婚姻，部分是因为分居造成的影响，离婚率出现了上升的趋势。然而，从1965年到1979年，离婚率翻了一倍多，从千分之二点五上升到千分之五点四。[5]离婚率在1981年达到顶峰，此后比较稳定并有一定的下降。对此可能的解释包括：结婚年龄推迟，独身人数增多，再婚率降低（传统上这一比例在离婚者中在75%到80%之间[6]），经济衰退也有可能降低离婚率。尽管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呈现出缓和的形势，但离婚数量仍然很大，在1996年40%的初次婚姻以离婚结束。[7]

导致高离婚率的因素

结婚誓词中的习惯用语表达了一种终生的义务——“我们至死不分离”和“只要你们俩都活着”，对大部分夫妻而言这些话曾经是名副其实的。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亲身经历过离婚或有离了婚的亲友。对婚姻的最大恐惧可能不在于它所要承担的巨大义务，而是可能在某一天自己的婚姻就被证明是那半数失败婚姻中的一个。导致婚姻瓦解的，除了个人因素之外，还有3种社会力量。

妇女角色的变化　在考察与高离婚率相关的社会因素时，我们必须承认妇女角色的变化。过去妇女往往在经济上依赖于男子，所以即使是不幸的婚姻，也不太情愿草草了结。但现在，许多妇女都有了自立能力。同样，离婚的选择对男人来说可能更有吸引力了，因为他们不太可能要负担他们有工作的妻子的离婚赡养费。研究表明，有较高地位和较多收入工作的妇女更容易离婚，而且不太可能再婚。[8]

态度、法律和人口因素 随着离婚变得越来越普遍，社会对它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今天对离婚歧视不但较少，而且更加宽容和接受。对于离婚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关于为了孩子的缘故夫妻即使不幸福也应该继续生活在一起的看法。1970年加利福尼亚州开始执行的**无过错离婚**(no-fault divorce)，放宽了离婚的法律限制，使得离婚变得更加容易。（无过错意味着任何一方都不应为离婚而受到谴责，这个决定是双方共同做出的。）现在全国只有两个州没有无过错离婚的法律条款。另外，在70年代，影响离婚率上升的因素还有越南战争的结束和一个纯粹人口方面的事实，即妇女离婚的年龄大多集中在20到24岁间，男子在25到29岁间。[9]70年代，随着上一个人口生育高峰中的孩子逐渐长大，大量人口进入这一年龄层。在之后的几年里，由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率降低，达到这一年龄的人口减少。最后随着人们日益晚婚，今天的离婚年龄普遍有所上升。

对婚姻期望值的改变 然而，比解释高离婚率更为根本的是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的改变。今天，婚姻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人们通过与另一个人的结合寻求自我满足，如果他们感情上的需要未能得到满足，婚姻的基础将不复存在。安·斯维德勒写道，今天正在形成的爱情伦理强调爱的反叛、自由和个人主义的一面，赞同灵活性而逃避持久性。[10]过去，一个婚姻的成功与否，通常以个人履行其社会角色的优劣为衡量标准（男人作为一个好的供给者，而妇女作为一个熟练的家庭主妇和好母亲）。由于成为一名熟练的面包师或为家庭赚更多的钱比做一个处理日常人际关系的专家要容易得多，婚姻变得更加冒险和不可靠。

离婚对成年人的影响

高离婚率引起社会的忧虑，担心遭受这种崩溃的个人会受到长期和短期的消极影响。离婚造成的两个最主要的损失在经济和生理—情感方面。若干研究证实，男人在离婚后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而妇女通常要出现连续几年的收入大幅下降。妇女的经济水平平均要降低三分之一，[11]其中25%的妇女在离婚后的最初5年里至少有一部分时间陷于贫困之中。[12]虽然她们可能最终回复到离婚前的收入水平，但无法达到那些仍然有一个稳定婚姻家庭的妇女的水平。许多离婚妇女只有通过再婚才能得到经济上的恢复。[13]这种经济差别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是无过错离婚法造成的。这一法律假设丈夫和妻子之间是相互独立和平等的，但却忽视了在收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另一方面也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部分妇女通常拥有孩子的监护权，而许多父亲在承担法庭规定的孩子抚养费上不负责任。

离婚同时对心理和生理的健康带来长期和短期的后果。3种类型的人——新近离婚者、多次离婚者和妇女——特别容易因离婚而变得消沉失落。

离婚者比已婚者、单身者和丧偶者有更高的自杀率，更多的人酗酒，接受心理和精神治疗的比例更高，更频繁地接受心理之外的治疗。[14]离婚男子通常比离婚妇女再婚更早，而在那些离婚6年后仍然没有再婚的男人中，发生车祸、酗酒、吸毒、消沉和焦虑的比例也相应升高。对离婚妇女而言，对她们的长期健康最严重的影响来自于贫困的压力、与前夫不断的冲突和子女的抚养问题。[15]

离婚的过程 保罗·波汉南把离婚描述成一个多阶段的分离过程：感情上离婚、法律上分离、经济上脱离、监护权脱离（就照顾孩子而言），社会离婚（必须通知各自的家庭和朋友）及心理离婚（个人必须为自己明确一个新的、无伴侣的身份）。[16]



《布雷迪·本奇》是一部流行的电视连续剧和1994年的同名获奖电影，描写的是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一个有3个儿子的父亲与一个有3个女儿的母亲结婚）。除了特殊的性别分配和家庭的规模之外，它反映了一个日益普遍的事实：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再婚夫妇将原来婚姻中的子女结合在了一起。

罗伯特·怀斯把婚姻关系的分离分解成许多不同的阶段，由于依恋的对象已经分离，个人在各个阶段中要分别经历悲痛、焦虑、恐慌和消沉等。在每个阶段伴随而来的也许是一种不再需要原来伴侣的快感，然后是一段非常孤独的时期。[17]即使夫妻双方都非常想离婚，但感情上的依恋仍然比大多数离婚夫妇所预料的要持久。真正的恢复最可能来自再婚或拥有新的伴侣。[18]

离婚对孩子的影响

十多年前，一项全国性调查估计，在当时生活在美国的儿童中，有近一半在18岁以前不能一直和他们的亲生父母共同生活。[19]今天，据估计这类儿童的比例大约在40%到50%范围内。其中黑人儿童的几率最高：只有不到20%出生在80年代的黑人儿童能和他们的父母共同度过整个童年。[20]家庭的破裂可能源于离婚、分居或遗弃、未婚生育，或是父母从未结婚，或是被迫同父母分居。进入90年代，每起离婚判决中的平均儿童人数有所下降，这是由于许多离婚夫妇没有孩子或生育率较低。但从1971年以来，每年这个国家离婚所牵涉到的未成年人数量仍然超过100万。[21]

研究结果 我们知道离婚对男人、女人和儿童有着不同的影响。对孩子的影响要视下列情况而定：父母离婚时他们的年龄、父母冲突的程度、此后与不是监护人一方的家长关系的性质和密切程度以及再婚家庭（如果有的话）的组成。研究得出的结果并不总是一致的。但保罗·阿玛托和布鲁斯·凯斯对92项研究进行的总结得出了某些一般性的结论。首先，相对于那些在完整家庭长大的儿童，父母离异的孩子读到高中毕业的可能性较小，更有可能从事低收入的工作，更可能依赖福利救济而生活，而且更有可能早婚。父母离异的女孩更有可能生下私生子女，她们自己也更可能离婚。[22]另一些调查显示，父母离异的儿童在少年犯罪、同伴关系和学校表现上出现问题的概率较高。男孩一般比女孩表现出更明确和直接的行为症状，例如挑衅和攻击。在青春期，离婚家庭的女孩在处理性问题和感情责任方面经常遇到麻烦。[23]最后，研究者还发现离婚与儿童疾病增加相关。[24]

今天，社会学家认识到，父母离异的孩子要比那些生活在完整但父母经常争吵的家庭里的孩子更加快乐，而且适应性更强，但在这两方面又不如那些生活在双亲俱全的幸福家庭中的孩子。此外，离婚可能在很大范围内影响到儿童。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那些可以减轻这些负面后果的因素。

儿童抚养 离婚对儿童最严重的影响是许多儿童因此而生活水平下

降。这是因为绝大部分时候监护权是判给母亲的，从而孩子不得不分担其经济状况的下降。经济的艰难可能使他们不得不搬到不很让人满意的街区，上较差的学校，营养不良和缺乏医疗保障。年纪大一点的孩子由于无法在获得象征其地位的物质条件，会在同伴中感到丢脸。

造成儿童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未获得监护权的父亲没有履行抚养的责任。弗兰克·弗斯腾伯格注意到，现在的父亲明显地分成好父亲和坏父亲两种。[25]好父亲在承担家长责任方面是个完整的伴侣，在感情上与孩子关系密切，在家庭里采取人人平等的标准而坏父亲则逃避作为父亲的义务（甚至否认其父亲的身份)。在全国，只有一半经法院判决应该得到儿童抚养费的家庭收到了父亲应付的全部金额，而有几百万的儿童什么也没有得到。官方指出，在争取儿童抚养费方面最困难的工作之一，是追踪那些在州与州之间迁移的父母。在全国1900万起儿童抚养案件中，其中超过30%的儿童与其父母不住在同一个州。[26]

甚至在父亲有支付能力的情况下，也经常发生不付抚养费的事情。不支付抚养费看似同男人与前妻间关系的性质及父亲和孩子之间的联系度有关。[27]经常探望孩子的父亲更会按期付钱。然而，对父母离异儿童的全国性调查发现，近一半生活在只有母亲的家庭里的儿童，在过去12个月里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在过去一年里六分之一的儿童只见过父亲一两次。[28]随着分开时间的增长，父子间联系的频率急剧减少，而那些再婚了的父亲更倾向于从过去婚姻留下的孩子身上解脱出来。[29]

1997年10月，对儿童抚养义务的执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联邦政府开始用计算机对全国所有雇主新雇用的每个人进行登记，使得联邦和各州的调查人员可以追踪那些亏欠子女抚养费的父母。各州用这种登记制度寻找孩子的父母，向他们催讨抚养费，通常通过雇主直接从孩子父母的薪金中扣除抚养费来保证法庭判决的执行。

家庭结构的变化

自二战以后，婚姻制度和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趋势、法制改革和职业妇女比例上升等导致了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的升高。妇女日益增强的经济独立、新式避孕手段的出现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变化使得美国人把婚姻放在传统束缚之外来评价。一对夫妇和几个孩子曾经是非常典型的家庭结构，但现在只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家庭仍然如此（参见表9.2)。这一重要社会机制的众多变化影响着家庭生活，有时成为造成涉及

家庭的有关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

表9.2 1990年的美国家庭结构（百分比）

家庭		70.9%
带孩子的已婚夫妇	26.3%	
无孩子的已婚夫妇	29.8%	
有孩子的其他家庭	8.3%	
无孩子的其他家庭	6.5%	
非家庭户数		29.2%
单身男性	9.7%	
单身女性	14.9%	
其他	4.6%	

资料来源：Bureau of the Census, P23－181, 1992, p. 15.

再婚和重组家庭

尽管离婚人数仍然很高，再婚的比例也非常高。这表明离婚所代表的是一种理想的破灭，与其说是对于整个婚姻制度而言，不如说仅仅是针对配偶个人的。在最近几年，再婚率——约占离婚女性的60%和离婚男性的70%——略微有所下降，尤其是在知识女性中间。[30]离婚父母的再婚产生了一个由丈夫、妻子、过去婚姻留下的孩子和新婚姻组合所生的孩子一起的**重组家庭**（reconstituted family）。

美国的黑人妇女比白人妇女和拉丁裔妇女的再婚率低。[31]一般来说，再婚夫妇表示他们和那些一直没有离婚的夫妇过得一样幸福，而比那些离婚后没有再婚的人要更为快乐。[32]但他们第二次离婚的可能性要高于初次结婚的夫妇，特别是当重组的家庭中有过去婚姻遗留下的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之时。[33]

对孩子而言，父母再婚可能会减轻他们正遭受的经济拮据，但它也要求调整与新的家庭和亲属的关系，这可能给他们造成非常沉重的压力。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再婚在角色和职责分界上模糊不清，是一种“不完备的制度”。[34]继母的权威尤其不明确，同时对继父和各种祖辈的责任和权利的界定也很含糊。这种模糊似乎与父母再婚家庭这一环境给孩子造成的生理及性方面的虐待这一更大的危险有关联。[35]虽然大多数再婚家庭都是非暴力的，但过去婚姻留下的孩子仍然更有可能受到人身侵犯，甚至被杀。

总之，关于离婚的影响的研究证实，需要一种更强有力的社会反应、通过咨询及其他服务形式来安抚人们度过一系列的困难转变。虽然成年人再婚的比例很高，但自杀、酗酒、消沉和其他情绪问题的发生比例预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各州也都需要开始制定法律，来澄清再婚家庭成员的权利和责任。

单亲家庭

离婚的高发生率导致了美国**单亲家庭**（single-parent families）的大量增加。由于获得监护权的妇女占了压倒多数，因此单亲家庭大部分是以女性为家长的。在1996年，如表9.3所示，18岁以下的儿童中有81.5%的白人孩子、90.8%的黑人孩子和87.1%的拉美裔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单独生活在一起。从表9.3中可以注意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群体中单亲家庭产生的途径各不相同：白人女性户主家庭通常源于离婚，黑人家庭主要是由于未婚母亲，而拉美裔的单亲家庭是由离婚、未婚和丧偶等原因共同造成的（参见专栏9.1）。10年前，由于父母离婚而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儿童几乎是与一个未婚家长共同生活的儿童数量的两倍。但是现在，前者的数量仅略高于后者。[36]

虽然女性户主的家庭可以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但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是这类家庭中贫困数量的增加：大约有三成白人、一半黑人和拉美裔没有丈夫的女性户主家庭现在生活在贫困之中。[37]在这类家庭长大的孩子自己日后也较有可能成为单身家长，不太可能完成中学教育或进入大学，更有可能在年龄较小时发生性行为，并更可能陷入贫困之中。[38]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看来似乎不在于单亲家庭本身，而在于他们幼年时所经历的贫困。例如，美国的黑人儿童通常都有一个由亲戚组成的强大的非正式的资助网络。[39]

我们已经看到，离婚会使妇女在经济上处于不利的境地，特别是当父亲不能充分支付孩子的抚养费时。而对于未婚母亲的孩子而言——在美国黑人中这一现象极为普遍——贫困是与低结婚率相联系的，而结婚率转而又直接与男性缺位（黑人男子通常有一个很高的死亡率和被捕率）、男性失业以及没有能力为家庭提供生活来源等问题相关。[40]美国黑人和拉美裔男性的高失业率与我们社会的两项主要的结构变化有关：由于工厂消失或是因为工厂搬迁它处而失去了制造业的工作；以及住房格局中的种族隔离使黑人大规模聚居，被迫进入劣等学校就读，从事低收入、无技能的职业。

表 9.3 根据种族、拉美血统和婚姻地位组成的单亲家庭(单位:千户)

主题	1996年 数量	1996年 比例	1990年 数量	1990年 比例	1980年 数量	1980年 比例	1970年 数量	1970年 比例	年平均变化百分比 1990~96年	年平均变化百分比 1980~90年	年平均变化百分比 1970~80年
所有种族											
单亲家庭	11717	100.0	9749	100.0	6920	100.0	3808	100.0	2.0	3.4	6.0
母亲主持	9855	84.1	8398	86.1	6230	90.0	3415	89.7	1.7	3.0	6.0
未婚	3721	31.8	2775	28.5	1063	15.4	248	6.5	3.4	9.6	14.6
已婚配偶不在	2067	17.6	1836	18.8	1743	25.2	1377	36.2	1.3	0.5	2.4
分居	1718	14.7	1557	16.0	1486	21.4	962	25.3	1.0	0.5	4.3
离婚	3660	31.2	3194	32.8	2721	39.3	1109	29.1	1.5	1.6	9.0
寡妇	406	3.5	593	6.1	703	10.2	682	17.9	3.2	-1.7	0.3
父亲主持	1862	15.9	1351	13.9	690	10.0	393	10.3	3.9	6.7	5.6
未婚	567	4.8	345	3.5	63	0.9	22	0.6	6.4	不详	不详
已婚配偶不在	346	3.0	217	2.2	181	2.6	247	6.5	5.9	1.8	-3.1
离婚	880	7.5	700	7.2	340	4.9	不详	不详	2.6	7.2	不详
鳏夫	79	0.6	89	0.9	107	1.5	124	3.3	-1.1	-1.8	-1.5
白人											
单亲家庭	7769	100.0	6389	100.0	4664	100.0	2638	100.1	2.2	3.1	5.7
母亲主持	6329	81.5	5310	83.1	4122	88.4	2330	88.3	1.9	2.5	5.7
未婚	1712	22.0	1139	17.8	379	8.1	73	2.8	5.0	11.0	16.5
配偶不在	1377	17.8	1206	18.9	1033	22.1	796	30.2	1.4	1.5	2.6
分居	1168	15.0	1015	15.9	840	18.0	477	18.1	1.5	1.9	5.7
离婚	2957	38.1	2553	40.0	2201	47.2	930	35.3	1.6	1.5	8.6
寡妇	283	3.6	411	6.4	511	11.0	531	20.1	3.1	-2.2	-0.4
父亲主持	1440	18.5	1079	16.9	542	11.6	307	11.6	3.3	6.9	5.7
未婚	358	4.6	253	4.0	32	0.7	18	0.7	4.2	不详	不详
配偶不在	236	3.0	169	2.6	141	3.0	196	7.4	4.0	1.8	-3.3
离婚	780	10.0	591	9.3	288	6.2	不详	不详	3.2	7.2	不详
鳏夫	66	0.9	65	1.0	82	1.8	93	3.5	不详	-2.3	-1.3

表 9.3 （续表）

主题	1996 年		1990 年		1980 年		1970 年		年平均变化百分比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990～96 年	1980～90 年	1970～80 年
黑人											
单亲家庭	3493	100.0	3081	100.0	2114	100.0	1148	100.0	4.3	3.8	6.1
母亲主持	3171	90.8	2860	92.8	1984	93.9	1063	92.6	1.1	3.7	6.2
未婚	1884	53.9	1572	51.0	665	31.5	173	15.1	3.3	8.6	13.5
配偶不在	620	17.8	570	18.5	667	31.6	570	49.7	0.9	-1.6	1.6
分居	503	14.4	502	16.3	616	29.1	479	41.7	0.1	-2.0	2.5
离婚	581	16.6	574	18.6	477	22.6	172	15.0	0.1	1.9	10.2
寡妇	87	2.5	144	4.7	174	8.2	148	12.9	-4.0	-1.9	1.6
父亲主持	322	9.2	221	7.2	129	6.1	85	7.4	4.6	5.4	4.2
未婚	152	4.4	74	2.4	30	1.4	4	0.3	不详	不详	不详
配偶不在	94	2.7	38	1.2	37	1.8	50	4.4	不详	不详	不详
离婚	64	1.8	93	3.0	43	2.0	不详	不详	-3.1	不详	不详
鳏夫	11	0.3	18	0.6	19	0.9	30	2.6	不详	不详	不详
拉美裔											
单亲家庭	1702	100.0	1140	100.0	538	100.0	不详	不详	4.9	7.0	不详
母亲主持	1483	87.1	1003	88.0	526	92.6	不详	不详	4.8	6.5	不详
未婚	622	36.5	361	31.7	120	21.1	不详	不详	7.2	11.0	不详
配偶不在	418	24.6	314	27.5	199	35.0	不详	不详	3.3	4.6	不详
分居	326	19.2	249	21.8	170	29.9	不详	不详	3.1	3.8	不详
离婚	389	22.8	266	23.3	162	28.5	不详	不详	4.6	5.0	不详
寡妇	54	3.2	62	5.4	46	8.1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父亲主持	219	12.9	138	12.1	42	7.4	不详	不详	5.9	不详	不详
未婚	111	6.5	62	5.4	7	1.2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配偶不在	38	2.2	26	2.3	13	2.3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离婚	61	3.6	40	3.5	13	2.3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鳏夫	9	0.6	9	0.8	8	1.4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提示：Family groups comprise family households, related subfamilies, and unrelated subfamil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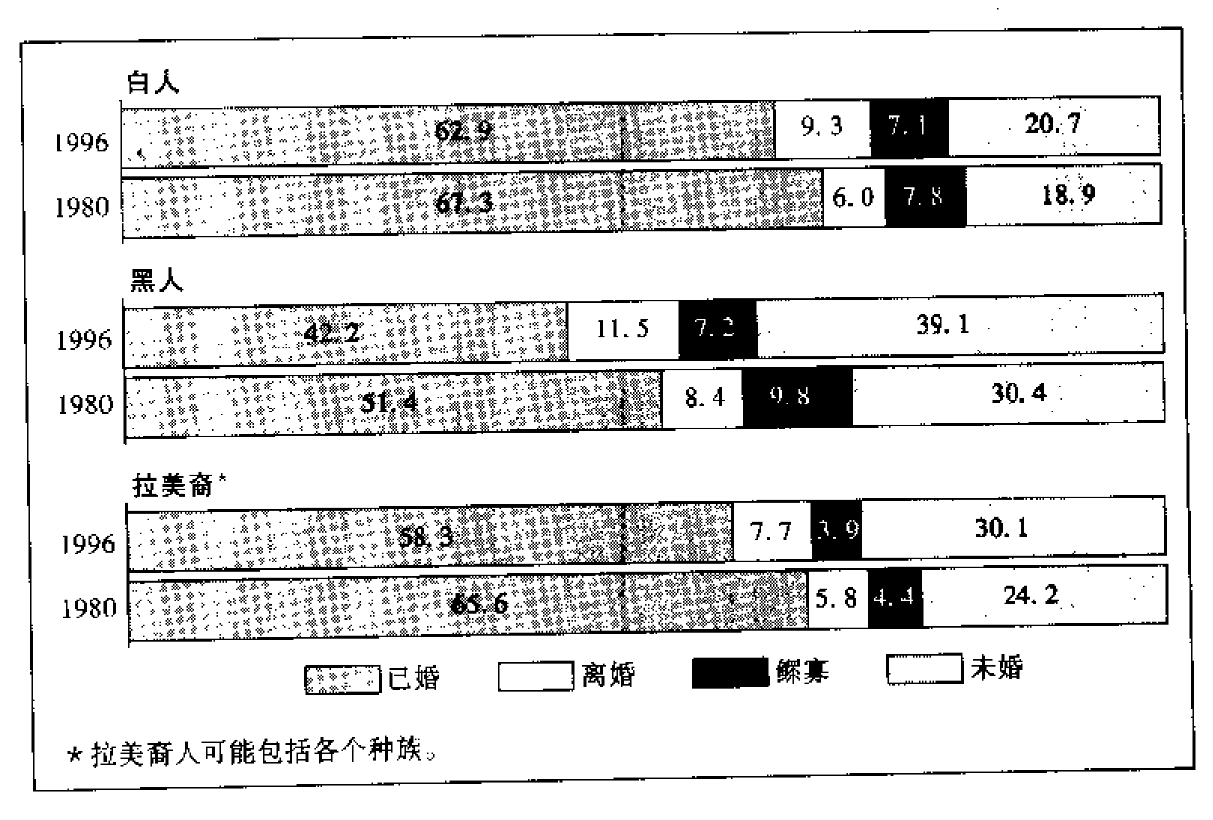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20, No.488, "Household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March 199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长期的经济计划有必要针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但在短期内，社会应更关注那些单亲家庭的妇女，通过工作福利计划为他们提供有望提升、充分照顾孩子和健康福利以及减少歧视性的工资标准的有意义的工作。

少女怀孕

较之1950年的4%，现在所有的生育中有三分之一属于非婚生育。而且，从1970年到1994年，年龄在15至19岁间的未婚少女的生育率翻了一倍多（参见图表9.2）。20至24岁的未婚妇女占了非婚生育的主体，约在35%左右，其生育率在1970年到1994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41]虽然20到24岁和25到29岁年龄层的未婚女性的生育率要远远高于15到19岁的年龄层，但在西方世界，美国的少女生育比例一直是最高的。

有关少女怀孕的因素 导致少女怀孕高比率的因素各不相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今天的青少年中性行为较多（参见第4章）、心理冲动、感情需要或渴望离开父母以及错误地使用或不使用避孕用具。后者在经济水平较低的黑人和拉美裔人更为常见。此外，黑人和拉美裔少女不太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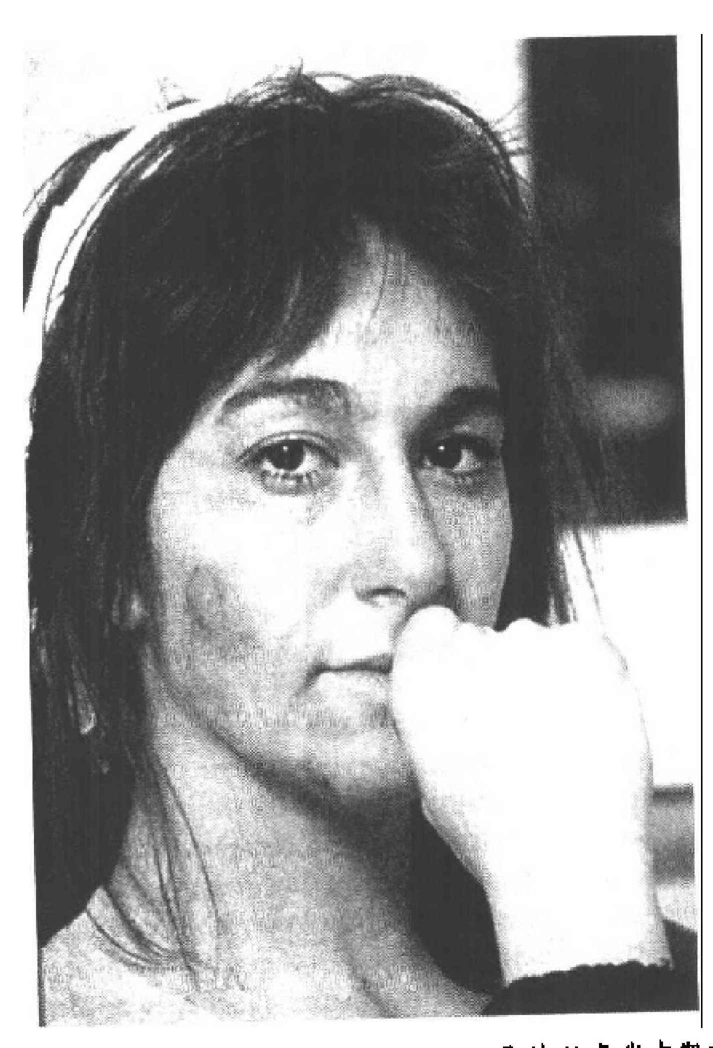


图表9.2 1970年和1994年美国未婚妇女的生育率

资料来源：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堕胎，因为在这些人生活的社区，做一个单身家长并不太被视为一种污点。这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历史上的社会和文化状况：在美国的黑人奴隶中，婚姻在法律上是不被承认的，当奴隶被解放以后，在南部乡村非常普遍的是习惯性婚姻。同样，在波多黎哥乡村非婚生育也有很长的历史传统，这种价值趋向随着大量波多黎哥移民一起被带到了美国社会。[42]

少女怀孕的后果 少女怀孕的一些消极后果有：少女更有可能中途辍学、从事低收入的工作或失业。此外，处在青春期的母亲所产下的婴儿面临健康问题的危险更高，比那些20多岁的产妇更加有可能产下体重过轻、早产或发育不全的婴儿，并有先天畸形和婴儿高死亡率的风险。[43]



尽管责打妻子的行为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但只是到70年代中期它才成为一个被公众确认的社会问题。每年有200多万美国妇女被殴打。现在，许多社区的"被殴打妇女之家"为那些不堪忍受家庭环境的妇女提供了避难所和救助。

暴力和虐待

1994年，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国的案件：南卡罗莱纳州的一位年轻母亲承认，她有预谋地把她的两个年幼的孩子绑在汽车后座上，然后把车推进湖中淹死了这两个孩子。尽管有许多人对这个长相甜美的女人居然会用如此残忍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感到不可思议，但是美国司法部的报告指出，每年大约有600名妇女杀死她们的孩子。[44]而这些还只包括了谋杀，家庭中非致命的针对身体的暴力行为要更加普遍。的确，在美国，家庭暴力已经非常普遍，许多家庭已不是缓解日常生活压力的美好的避风港，而成了战场和未来暴力的训练学校。尽管一直都有虐待行为，但是直到1962年才有人公开确认存在殴打儿童的问题。[45]直到70年代中期，配偶间的虐待行为——尤其是殴打妻子——才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受到了关注，而虐待老人的现象要到更近期才受到注意。**虐待**（abuse）一词在广义上讲，包括了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而狭义而言通常单指是身体上的，正如在警方的记录所证实了的。

家庭暴力的发生率

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暴力事件被公之于众，它们揭示出，除了儿童和妻子之外，其他的家庭成员也会受到虐待。家庭暴力网还涉及到丈夫被妻子虐待，父母遭子女虐待和兄弟姐妹间的相互虐待。在美国，每15秒钟就有一个人在家中受到攻击。每年有1500万男人、女人和儿童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遭殴打的妇女中，45%怀有身孕。尽管有如此惊人的数量，但是受害人仍然不愿意因这些暴力行为而报警。[46]

1996年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参加全国家庭调查的近7000对夫妇，发现在夫妻间的打斗中，男女有相似的身体暴力形式。大约5%的妇女和6%的男子表示，婚姻中的分歧在某些时候会导致身体上的暴力行为，而且他们都有可能表示，是配偶对其进行殴打、推搡或扔东西的。此外，表示有身体暴力冲突的45%的男人和40%的妇女回答称双方都有暴力举动。城市居民、年轻夫妇、低收入夫妇和受教育少的夫妇更有可能承认有身体暴力行为。黑人被访者表示有暴力行为的可能比白人高58%。相反的是，拉美裔人则是白人的一半左右。[47]

专家们现在意识到，婚姻中的暴力行为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根据

调查，每年至少有八分之一的丈夫在肉体上攻击自己的妻子。每年有近200万男人殴打他的女伴。如果把双方的暴力行为都计算在内，每年有870万对美国夫妇（约为六分之一）经历了暴力，340万对夫妇遭到严重的暴力。[48]

最明显和最严重的危险是肉体创伤和死亡。在美国，超过25%的杀人罪是由丈夫或妻子针对他们的配偶所为。婚姻中的暴力与包括消沉、酗酒和精神创伤等在内的许多心理问题也有关系。婚姻中的暴力通常还会衍生出对儿童的虐待，即使没有也会给孩子造成心理伤害。男人的暴力行为相对要更为严重，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男人身材更高大、更强壮，比起妇女的攻击它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健康恶化、紧张和身心失调等症状。[49]

夫妻间的暴力 关于家庭暴力的统计数字令人震惊。在这个国家，每15秒钟就有一个妇女遭到殴打。每年总计大约有200万妇女遭到严重殴打。如第5章中所讨论的，三分之一的女性被害者是被她们的丈夫或男友所杀。夫妻间的暴力行为在所有种族、民族和经济群体的家庭中都有发生。例如，在罗德岛州立大学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家庭收入在4万美元以上的妇女中，近2%表示曾经成为严重暴力行为的受害者。[50]

确认和帮助被殴打妇女的部分难题在于，由于夫妻关系中的隐私和秘密的观念，她们常常不愿公开自己的遭遇。此外，羞耻以及遭到虐待后会带来的社会耻辱也阻碍了妇女去寻求外界的帮助。这种态度导致了她们与社会的疏远，并增大了被殴打的可能。[51]

此外，夫妻间的暴力本身已非常不幸，还产生了许多与暴力相关的问题。目睹暴力行为的孩子会在心理和感情方面受到永久的伤害。一些城市的调查显示，有10%的小孩目睹了殴打行为，高达90%的孩子目睹过某种形式的凶狠的争吵。那些目睹家庭内部暴力行为的孩子可能更加悲惨，因为他们无法得到父母的安慰。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可能会相信，暴力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行方式，男孩可能会成为施虐者，而女孩则会同他人建立被虐待关系，或者他们会求助于酒精或毒品以减轻自己的焦虑。[52]

虐待儿童 去年一年中，超过100万十几岁的青少年离家出走。其中大部分并不是因为贪玩或是想尽快独立，而是为了逃避家里的殴打、性虐待和一些更糟的境遇。根据美国卫生服务部的统计，每年有大约150万起儿童虐待案，每天有3名儿童被虐待致死。[53]根据美国虐待和忽视儿童顾问委员会统计，除了遭受虐待致死的儿童外，另外每年还有14万儿童受重伤。[54]

此外，在青春期受到体罚可能会导致在将来的成年生活中倾向用暴力手段对待配偶、消沉以及婚姻中的高度冲突。孩童时期目睹父母之间的暴

力行为，也与后来不断地使用身体暴力来对待配偶有关。消除体罚会在将来使得婚姻中暴力行为和消沉情绪发生率下降。[55]

虐待老人 在70年代晚期，公众开始关注老人受虐待的问题或者被让·伦瓦茨称作的“粗暴对待老奶奶”的现象。[56]1988年，研究者在波士顿完成了关于虐待和忽视老年人的第一次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研究发现，老人受虐现象非常普遍，达到3.2%，或者说有100万老人受到虐待。[57]此后，家庭内部针对老人的暴力行为的统计数字不断上升。[58]据估计，现在全国有4%的老年人受到虐待。根据全国解救老年虐待中心的统计，几乎三分之一的虐待是来自于老人的成年子女，这包括身体、经济、心理和感情等方面的虐待。[59]

随着人们越来越长寿，有些（特别是鳏寡的）老人可能会受到成年儿女的欢迎和照顾，但也会因为日常的要求、抱怨和冲突而与子女关系恶化。通常成年子女首先就不太愿意接受他们年老的父母，对老人的虐待可能是他们表达怨恨的一种方式。在另一些人中，对老年父母的虐待可能是家中早已出现的暴力问题的进一步暴露。

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老人是那些超过80岁、患老年痴呆和其他疾病的女性。她们可能存在一定的交流障碍、丧失听力、瘫痪和大小便失禁。有些虐待老人的行为实际上是配偶所为。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施虐者都是那些在经济上依赖于老人并照顾他的孩子。[60]

不同于照顾孩子，看着孩子成长的愉悦可以缓解孩子不断的要求，而照顾一个老人则可能要不断地处理长期的身体残疾，而且可能增加家庭内部的紧张程度。虽然对虐待老人问题的认识已经存在，但要减少这样的问题仍需做许多工作，包括“热线”电话、援助团体、养老院以及当家庭中其他人在过周末或度假期间能够收留老人的临时住所等。

与暴力有关的社会因素

理查德·盖勒斯总结了大部分关于与家庭暴力相关的社会因素的研究成果。[61]家庭内的暴力行为与家庭成员的社会压力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当这种压力是因为男性失业或半职、怀孕、单亲家庭状况及经济状况而引起时。身体虐待更可能发生在那些较少社交以及与亲属、邻里或朋友的关系网联系不紧密的家庭，这些亲友可以提供帮助或调解。

与对儿童施以暴力相关联的因素包括：较大的家庭规模、婴儿体重过轻或早产（他们得到更多的照料）以及母亲和孩子之间缺少感情联系。受害者较多是婴儿、幼儿或年龄较大的青少年。这些群体的成员或是不能或

是不愿“讲道理”。母亲更有可能虐待孩子，因为她们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以及母亲的角色在其身份中似乎必不可少。那些残疾的、低能的或是“异常”的孩子被虐待的风险也较大。

对虐待妻子的研究发现，在丈夫和妻子都对男方工作的满意程度较低、丈夫没有宗教信仰以及存在酗酒问题的时候，这一问题较为常见。酗酒通常在家庭暴力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专家不清楚它是家庭暴力的一个起因还只是一个相关因素。[62]

社会经济地位 虽然新闻媒体的注意力更为集中在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夫妻暴力问题（例如对辛普森案件的关注），但更多的虐待案件发生在下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低收入者更多时候不得不到医院就治，更经常地受到警察的区别对待，使得他们之中的虐待情况看似更为明显。然而，尽管家庭暴力毫无疑问地发生在社会所有阶层中，但是否认在下层阶级这一情况发生率更高便是忽视了家庭暴力的社会基础。如果所有的阶层中暴力程度相等，虐待就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个人精神障碍——一种需要精神分析治疗而无需社会反应的疾病。然而，各阶层行为间存在的现实差异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是社会本身导致了这种暴力行为。正如莫雷·斯特劳斯所说的：

> “我现在确信，与其说心理因素在造成家庭暴力方面与各种社会原因几乎同等重要，不如说它仅能用来解释极少数家庭暴力行为——至多只占全部的10%。总之，在美国家庭中，至少90%的暴力行为根源于家庭和更大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因为个人的精神失常。”[63]

近期的发现 莫雷·斯特劳斯和克里斯丁·史密斯提出了与家庭暴力高比例相关的5种社会因素：家庭矛盾、男权地位、文化准则、社会化和社会中暴力行为的泛滥。[64]

在一个小规模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所制造出的那种极度亲密的氛围中，仅有的少数个人必须依赖于彼此共同的身体和情感资源来满足家庭的需要。在这种环境下，个人对于家庭其他成员的言谈举止非常脆弱敏感，所以一个小火花就很容易变为冲突，随后演变为暴力。相反，那些可能包括了祖父母、姑舅叔伯等的**大家庭**（extended family）更易于缓和或驱除家庭中的感情冲突，从而恢复家庭的稳定。斯特劳斯和史密斯进而指出，作为传统家长制社会的一种倒退，在只有夫妻子女的核心家庭，男人可能会采用暴力作为维持其权威和解决冲突的主要手段。

暴力遍及美国社会的各种机制之中：警察和军方的武力行为，枪械和其他武器的泛滥，电视电影中充斥暴力镜头等等。令人丝毫不感到吃惊

的是，社会上无处不在的暴力会蔓延进家庭生活之中，而某些文化规范甚至允许家庭暴力的存在。例如在美国，许多成年人赞同将打孩子屁股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绝大部分人并不把兄弟姐妹间的相互打斗界定为家庭暴力。

在那些家庭成员习惯于把暴力作为一种反应方式的家庭更可能出现暴力。受到虐待的儿童长大以后，比那些儿童时期很少或没有受到过暴力对待的人，更有可能对孩子和配偶施虐。专家估计，受虐儿童比没有受过虐待的儿童在长大后成为有虐待行为的家长的可能要高出30%。

家庭中的性暴力和迫害

在家庭生活的另外一面，还有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事实，即对配偶和孩子的性迫害。这种行为可以是暴力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表现为婚内强奸或乱伦两种形式。

婚内强奸

配偶间的强奸问题在1993年一度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洛特娜·波比特被指控阉割了她的丈夫，其原因是所谓强奸。在轰动的新闻报道狂潮之后，两人都被宣判无罪——一方被控强奸，一方被控故意伤害。当时，许多专家都注意到，配偶的强奸行为很难证实，而被定罪的情况更是极为罕见。然而1994年，在对密歇根州的一例案件的重新审理中，丈夫在判刑前后一直坚持自己无罪，揭示了婚内强奸案件的另一个难点。他提出，对其定罪的基础是“模糊的偶然证据”和“出于政治目的而操纵的证词”，最后这个男人在服刑9年后推翻了原来的判决。[65]

婚内强奸最经常发生于婚姻关系正在破裂或夫妻分居时。一项研究发现，在40%的案件中，妻子说他们的丈夫还打算从肉体上伤害她们。这种非攻击型的犯罪似乎主要是强奸者对自己权力的使用。然而，几乎半数的案件涉及到攻击型强奸，有意识地将痛苦加诸妻子，以作为对她们的惩罚或报复。无论在攻击型或非攻击型的案件中，遭受强奸所带来的持久影响，都使得许多妇女对性生活做出调整和在将来的性关系的信任上存在困难。[66]

处理婚内强奸案件的部分困难在于那种支持不予执法的普遍态度。正如在殴打妻子案件中常常显示的，许多妇女没有意识到或者并不认为，她

们所受到的强迫的性服从是一种越轨行为。她们接受自己是丈夫的性财产的观念，认为拒绝丈夫的性要求是说明自己性冷淡或未能尽到妻子的义务。所以，她们得出结论，认为自己应该受到惩罚——一种归咎于受害者的观点。

在1996年对大学生的一次调查中，男女学生在把丈夫和陌生人所犯的强奸进行对比时，倾向于尽量将前者的严重性减小。即使同男性相比，女生虽然把强奸视为一种更具破坏的事件，但对性角色的期望仍然影响了她们对婚内强奸行为的判断。这种容忍婚内强奸的想法，与对约会强奸看法相一致。[67]

至80年代，大部分州仍然没有制定出针对婚内强奸的法律。但是在今天，实际上都已经取消了过去在强奸法中对配偶间这种行为的额外条款。尽管如此，要保证有关强奸的法律能充分保护已婚妇女，仍然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教育应该摧毁这样的神话，即认为妻子的身体是丈夫的财产，及在婚姻中同意性关系是一项永久的责任。与此同时，应该让检查官、法官和陪审团们认识到，配偶强奸的法律不能被怀恨在心的妻子们所滥用。婚内强奸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这类指控如同猥亵儿童一样，在界定中可能有模糊和不明确的地方：两者都常常是以一面之词来反对另一方，也都可能被用作离婚或争夺孩子监护权中的武器。[68]

乱　伦

我们没有关于**乱伦**（incest）现象普遍程度的准确数据。联邦政府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大约有超过17%的女孩是乱伦的受害者，而有几乎5%受到她们父亲的性虐待。[69]在对大约800名大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戴维·芬克勒发现，19%的女生和8.6%的男生在童年曾受到过性伤害；在超过半数的情况中，他们都是被强迫服从的。[70]**性伤害**（sexual victimization）一词表明，与其说是出于攻击性的目的，不如说是孩子的年龄、天真的言行以及与成年人的关系使他们受到了性伤害。更狭义的乱伦性行为除了父母与孩子间的乱伦关系外，还包括发生在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属间的性关系。研究者还发现，在被送入戒毒中心的吸毒者中，大约有半数过去曾是乱伦行为的受害者。[71]

痛苦的经历　朱迪丝·赫尔曼在对40名遭到父亲乱伦的女性受害者的研究中发现，与一名成年人、尤其是一个受到信任的亲属发生性关系会导致极大的精神创伤。经常被提到的长期伤害后果包括以后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会不断遭到男人的性伤害。赫尔曼发现，40名受害者中有13

人离家出走，18人怀孕。很有意思的是，她们中的许多人将男性理想化而仇恨女性，对后者的敌意显然是源于她们自己的自卑和自责，以及对没有出面加以干涉的母亲的怨恨。那些曾遭受父亲乱伦的妇女通常还表示，她们在如何去做母亲方面存在困难。[72]

与乱伦有关的社会因素 增加乱伦机会的一个家庭的结构性特征似乎是**父权组织**（patriarchal unit），即父亲认为他们有权在自认为合适的时候使用家中的女性成员——首先是妻子，然后是女儿。通常，在发生乱伦的家庭中都有一个软弱、无力、顺从、酗酒或者经常不在场的母亲，她们无力保护自己的女儿。其中许多人在发现乱伦情况后反应麻木。[73]她们自己早已成为父权统治下的感情疲惫不堪的受害者。如果她们在经济上依赖于丈夫而没有其他选择，可能是因为害怕与丈夫相对抗会危及婚姻。所以，对待乱伦受害者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树立起母亲们的信心、增进母女间的关系。

在制度上明确继父以及继兄弟姐妹的角色是非常有效的。重组的家庭在性伤害方面有很高的发生率。这些家庭通常缺乏明确的相互关系，因而可能常常使得继父或继兄感到可以更加自由地对一个脆弱的、容易到手的家庭受害者进行伤害。[74]这种倾向一定意义上可能是由于媒体把年轻女孩描绘成是一些勾引成年受害者的小荡妇，而不是真实地描述压迫在那些没有保护的孩子身上的强权。同样，在广告里也经常把少女作为挑逗的色情背景，利用她们刚刚萌发的青春来推销产品。

社会干预的必要

对大批人在家庭中遭受虐待的揭露和社会意识的觉醒，促使我们要立即采取行动，进行干预以保护受害者。

帮助遭殴打妇女的机构

在英国，艾琳·皮西的《轻点喊，否则邻居会听见》一书导致了齐斯威克妇女援助会的建立。这个机构后来成为全世界遭殴打妇女避难所的蓝本。这种避难所不仅提供食物和住宿，而且还帮助受害人树立自尊提供个人和集体的咨询。由于许多被殴打妇女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经济上要依赖于有虐待倾向的丈夫，因此避难所的另一些服务还包括介绍工作和工作培训建议等。

对虐待儿童的干预

对于被虐待的儿童，社会的干预通常意味着在法庭调查虐待指控时，把孩子安置到一个领养家庭。由于在美国医生和辅导员都有义务报告虐待事件，因此非常需要扩展这方面的社会服务。目前，相对于大量的儿童受虐案件，这方面的资源配置显得非常不足。对一个危机情况的干预时常被延误，之后也只能暂时把受害孩子安置到另一个家庭，他最后又不得不回到那个毫无变化、虐待他的家里。与此同时，让别的家庭暂时收养照顾的安排可能会进一步造成儿童心理上的困惑。大部分儿童不愿意同父母分开，因而常常把政府命令的这种转移解释为是“他们自己犯的过错”而引起的。在对待家庭的方法上我们需要更多的后续措施，而不是短期的监控。此外，资金是基础——社会通过其领导者及公众的压力必须决定要优先解决的社会问题。

警　察

在过去，警察和法庭对家庭暴力——特别是殴打妻子——的通常反应是问题的一部分。警察不愿意对此加以干涉，倾向于把家庭暴力视作是冲突双方的私事而不予受理。然而现在，警察接受了干预家庭事务方面的训练。但即使如此，在大部分州，除非妻子正式提出刑事起诉，否则警察不能在处理配偶间暴力案件中实施逮捕，而事情往往是许多妻子都不直接提出指控。而且，在提出控告的人中，很多人后来都撤回了起诉。因此，一些州正式通过了授权逮捕殴打者的法律，允许检查官可以不经妻子同意直接提出起诉。从 1990 年起，许多州又通过了进一步的法律，禁止已离婚的配偶跟踪或以其他方式威胁对方，使执法人员可以处理这一相关问题。

预防家庭暴力

比起加大拨款干预家庭暴力行为更为重要的，是预防家庭暴力的产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指明，社会和经济变化是努力的方向。首先需要注意那些能够缓解家庭压力的变化：减少失业和贫困；加强计划生育，以减少无意生育的人口数量；建立更多的儿童日托中心；设立更多的为成年人服务的咨询热线。其次，由于滥用暴力的父母通常都对孩子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因此进行家长培训对许多成年人非常有好处。第三、从长远来

看，由于强调家庭中男性对妻子和孩子的支配地位似乎在过去这些年里助长了虐待事件的发生，因此促进性别平等的措施也许能够缓和家庭暴力问题。最终，人人平等的家庭结构以及改变助长暴力的文化规范都将有助于阻止虐待的发生。[75]而要做到这点，需要限制电视和图像游戏中的暴力描写。例如在瑞典，就禁止在儿童电视中播放《强力骑士》等电视节目，并通过一条法律宣布打屁股行为违法。

国际背景下的家庭问题

随着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冲击，全世界的家庭生活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这些社会面对现代化时，血亲联系开始减弱，个人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当传统社会接受了孩子并非经济财产这一工业化的经济观念之后，便出现了避孕方法的普及和随之而来的家庭规模的缩小。然而，变化形式并不一致。例如，在加纳，家庭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一样，平均仍然有6个孩子。在减少家中孩子数量方面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现在妇女对自己生活的控制程度以及在生育之外她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在世界许多地方，例如在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妇女的地位仍然低人一等，并且仍被视为男人的私有财产。

在发达国家，许多不懈地争取平等权利的妇女把焦点集中到事业上。机会较多的妇女更为经常地选择逃避婚姻、少要或不要孩子以及离婚等。同时，还有许多妇女在工作、家务和照顾孩子的繁重劳动中挣扎。另一个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妇女单独组成和支撑了家庭。然而，在世界各处都相似的是，贫困给家庭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性别不平等可能带来暴力后果。戴维·莱文森选取了《人类关系的区域性卷宗》中所列的90个未使用文字的社会和农业社会，第一次对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进行了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76]研究最后得出了7个主要的结论：

1. 在全世界只有少数家庭暴力形式较为常见：殴打妻子、体罚孩子和兄弟姐妹间的争吵打架。
2. 最经常的受害者是成年妇女，而成年男性是最主要的施暴者，是最少受到伤害的人。此外，妇女比其他类型的家庭成员更有可能因家庭暴力而受到严重和过度的伤害。
3. 世界上大部分人在他们的生活中，特别是在童年时期，或是亲身经历或是亲眼目睹了自己家中发生的暴力行为。
4. 在全世界，殴打妻子和体罚孩子都是两种最普遍的家庭暴力形式。

5. 在那些丈夫在家庭中掌握了经济和最终决定权以及成年人之间通常以武力来解决冲突的社会，殴打妻子的事件更为司空见惯。
6. 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相对复杂的社会中，体罚孩子已趋于成为抚养孩子的一种常规部分。
7. 暴力不是家庭生活中无法避免的后果；在莱文森考察的社会中，有16个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这一现象。[77]

我们也许能预料到，在那些以合作、共享和平等为特征的社会，家庭暴力发生率最低。而在那些允许男人控制妇女生活以及接受用暴力解决矛盾为合法的社会，家庭暴力发生率最高。

瑞典可能已经达到了最高程度的男女平等。瑞典妇女在劳动力队伍中所占的份额最高：家有幼儿的母亲85%参加工作，妇女的平均工资达到了男性的90%。虽然妇女仍然比男人更多地投入到照料孩子和家务的活动之中，但同其他国家相比，瑞典男人修产假以照料新生儿是最多的。[78]

在工业化世界中，瑞典的结婚率最低，同居率则最高。估计只有2%



多数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生活在一个由父母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部分第一代美国移民继续着他们母国的家庭模式，生活在大家庭中，包括父母、子女、祖父母，以及其他亲属（如叔侄姑嫂等）。

的妇女未曾在婚前同居过。而瑞典的分手率也是欧洲最高的，因为同居者比那些没有生活在一起就结婚的夫妇更容易结束关系。[79]

婚姻和同居的高失败率导致了相当数量的单亲家庭，占了全部有孩子家庭的18%。[80]然而，由于瑞典政府的保护性措施，这些家庭没有像美国的类似家庭一样受到贫困的压迫。瑞典的高税收政策为照顾儿童、卫生保障和儿童教育提供了资金。

尽管同居和离婚的比例很高，但波佩诺还是发现，瑞典人家庭的责任感仍然非常强烈。大多数人渴望过家庭生活，并生儿育女。[81]

为什么家庭会有不幸?

在试图解释家庭中的社会问题时，让我们首先看一看人们一般认为什么是问题的原因。最为普遍的看法是个人的过错。

个人过错

卡尔·齐默曼把4000年来的家庭生活描述为一个钟摆，从一端的托管家庭，经过中间点的族内家庭，最后摆到另一端的核心家庭。[82]在托管家庭中不存在个人权利这一概念。通过父权具体化了的家庭权威是绝对的，不容外来因素的控制。然而。这种绝对控制中蕴藏着其毁灭的种子：作为男人财产的妻子和孩子屈从于男人的虐待。最终，随着教会和国家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它们从受害者的利益出发进行了干预，随着个人权利观念的产生形成了权力共有的族内家庭。齐默曼高度评价这种家庭形式，并把它作为一种理想的形式，因为它在家庭的利益和个人的需要之间达到了平衡。

对个人权利的日益重视

然而，个人主义的精神还在继续发展，导致产生了今天的核心家庭。现在社会强调保护家庭个体成员的权利，而所有的个体成员都渴望追求自己的自我实现。这些受到国家保护的权利优先于家庭关系的维系。法庭不顾父母反对治疗的要求，决定对一名畸形婴儿采取外科手术就是一个例证。齐默曼把一些“个人主义的猖獗”归因于核心家庭，如青少年犯罪、妇女解放和高离婚率等。

齐默曼的理论说明了两点。第一，强调个人主义将会把家庭成员描绘成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只顾自己的满足和为了自身利益甚至宁愿牺牲家庭稳定的人。根据这种看法，妇女在今天常常会受到“指责”，因为她们不愿再为家庭服务，强求平等，扰乱了家庭的结构。所以，根据某些研究，那些追求事业的妇女所丢下的无人照管的孩子犯罪的比例较高。然而，这一观点没有关注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结构，正是它推广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并且忽视了妇女处于屈从地位的代价。

齐默曼理论所证实的第二点是，选取一种家庭类型作为理想形式，会导致把其他所有的家庭形式视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缺陷或反常的。

反常家庭和不健全的人

过去，离婚家庭被看作是反常的。今天，随着离婚现象的普遍，这种看法已不大常见了，尽管仍然能够听到“破碎家庭”的说法。单亲家长和非婚生育较多的黑人家庭普遍声誉不佳。

在虐待方面，作为个人过错的解释极为常见。施虐者被看成是“有病的”，如存在严重的性格混乱的精神病患者。同样，虐待儿童的人也被认为是无法舒缓欲望和在童年时代未得到情感满足的人，这导致了他们在自己的孩子——甚至是婴儿——身上寻找满足。但孩子显然是不能用来填补这种情感空虚的。最后，那些在性方面伤害了年轻的家庭成员的父母或其他亲属，也只是被视为“变态者”。

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病态或不健全的个人的解释方法，忽视了虐待行为在某些特定群体中特别普遍的事实，也不能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模式。

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家在承认确实存在“病态的”个人和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个人的同时，还通过寻找更广泛的社会模式来认识家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功能主义观点

功能主义把家庭看作是社会制度中的一个机制，并在其中发挥着基本的功能。

家庭功能的丧失 根据威廉·奥格本的观点,[83]群体家庭至少发挥了7种功能:

1. 经济功能,家庭在其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提供自身的衣食住所。
2. 教育功能,因为家庭传授给孩子参与社会和在社会中生存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
3. 保护功能,这特别体现在父亲的形象中,他保护家庭成员不受外来的身体伤害,而不是依靠警察。此外,家庭还通过在其成员年老或生病时加以照料来进行保护。
4. 娱乐功能,在家中以唱歌、跳舞等家庭活动的形式进行。
5. 宗教功能,因为信仰由家中的年长者传授,以及在家里进行礼拜。
6. 地位安排,这决定了家庭成员的地位和声望。
7. 生育后代和家人间的亲情。

当我们分析今天的家庭时,可以发现其中许多功能是由外来的因素所完成的——通过学校、警察、疗养院和其他。工业化把生产功能从家庭中剥离开来。而随着其他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发生,大部分剩余的功能也被剥夺。由于没有什么功能留给了家庭去完成,它成了一个脆弱的组织。罗伯特·尼斯贝特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被剥夺了功能的组织是否还是使其成员产生心理认同的来源。[84]离婚及随之而来的对社会的消极后果,源于家庭的衰弱,它不再被认为是个人生存所必需的。

新的功能:情感满足 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家(特别是塔科特·帕森斯)认为,当代家庭可以作为承担少量专门任务的自由体。家庭与不带感情的官僚体系世界相联系,专门为其成员提供亲情和情感上的满足,从而实现一个对社会和个人都必不可少的功能。然而,女性主义者批评帕森斯的观点,因为人们期望妇女为家庭成员创造一个感情的避难所,而她们自己的许多需要却无处得到满足。今天的家庭是否满足了这个功能,也是值得怀疑的。

新的功能:消费 沿着功能主义的思想轨迹,我们可以把今天的经济体系描述为以消费者为取向、日益以服务业的增长为基础的。家庭对这种变化的适应表现在出生率降低和职业妇女人数增加两方面。有两份收入的家庭可以进行更多的消费。同时,消费的标准也提高了,父母希望给每个孩子更多的东西、更多的教育等等。也许除了富人(他们能够供养更多的孩子)和穷人(他们很少控制生育)之外,现在一个家庭拥有一、两个孩子已是普遍的模式。

然而消费家庭仍然要满足家庭成员的感情需要。由于家庭人数减少以

及现在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工作，家庭成员可能没有什么时间或精力去满足家人的心理需要。当被他人寄予如此高的期望时，出现高离婚率也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

家庭解体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功能主义观点认为，家庭之所以解体，是社会出现的变化所导致的。在一种新的稳定体系或新的平衡形成以前，我们只能继续面对那些与家庭相关的社会问题。关于一些丈夫所做的虐待行为的部分解释是，男人们抵制日益促进家庭和社会生存的民主家庭的结构。相反，他们试图维持旧有的、父权制的、工业化社会制度中的角色和价值观。

冲突论观点

由于冲突论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把家庭描绘成一个和谐的组织，因此只是在近来，冲突论者才将其观点运用到家庭问题的研究当中。

妇女的不平等 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较早从不平等的结构出发对家庭进行了描述。在书中，他主张家庭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85]恩格斯认为，事实上，一个妻子和一个妓女之间的惟一区别是，前者出卖了自己的一生！他把妇女的屈从地位归因于以私有制为根本信仰的资本主义制度。工业化使男人走出家庭，并奴役一些儿童，使妇女在经济上依赖于男子。

今天，冲突论者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家庭中的权力关系。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离家参加工作的妇女获得了一定的权力。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妇女——认识到自身受到经济压迫——开始同压迫她们的男性展开斗争。她们在工作中和家庭中都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对许多妇女来说，离婚就代表着摆脱了不平等。家庭中的一些暴力行为也直接源于这种权力平衡的改变，男人——不再拥有社会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只能诉诸暴力来使妇女"安于其位"。

与外部组织的冲突 在宏观的社会层面，家庭组织不是像功能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与其他社会机制相互依赖，并与之相适应，而是被外部组织所压制。经济组织从事创造利润的活动，并希望家庭服从于官僚的安排。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工作，现在家庭中的两个成员都处在工作的重压之下，而孩子必须满足教育和娱乐组织的要求。家庭努力维持它作为这些压力的避难所的观念，但是人们发现很难区分公共和私人生活的界线。不幸的是，许多人因为婚姻问题而自责，但事实上，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家庭以外的组织所造成的巨大压力。罗莎琳·菲尔德伯格和詹妮特·科恩提出，

家庭存在于一个“反家庭的环境”中。[86]社会的外部组织完全漠视家庭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并与之发生直接冲突。

阶级结构 最后，不平等的视角使我们注意到，那些与家庭有关的社会问题在社会下层中的发生率很高，如离婚和暴力等。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导致了资源缺乏，迫使贫困家庭为了维持其完整而不断挣扎奋斗。健康不良、失业和家庭规模较大以及其他由贫困带来的压力，造成了家庭生活的不稳定。

对那些生活在社会结构最低层的人们来说，贫困与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相交织，导致了很多单身黑人和拉美裔妇女为主的家庭处于贫困和不稳定之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孩子——以及几乎一半的黑人儿童——在贫困中长大。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社会对家庭承担了多少责任，尽管政客们常常提到所谓的“家庭价值”。



一些社会观察家提出，由于电视过早地将成人世界的全部秘密揭示于孩子们的眼前，现在孩子的成长显得太快了。即使是在普通的家庭剧中，孩子们也能看到许多以前并不知道的事情，如父母在子女抚养过程中的种种犹豫不决。他们认识到，爸爸妈妈也并非是无所不知的。

相互作用论观点

在整个讨论中，我们反复提到，对家庭角色的重新解释是正在发生的一个过程。

婚姻意义中的变化 如前所述，赋予婚姻的意义本身已经改变了，情感需要的满足在其中居于首位。这使得人们对婚姻极为谨慎，也解释了高离婚率的原因。此外，社会还对婚约自身的本质重新解释，将这种两个人之间的联系由一种神圣的联系，转变为公民的、乃至私人的联系。伴随着婚姻定义的变化，对离婚也进行了重新解释。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他们的离婚归咎为个人的失败，而把它评价为一种人生发展的阶段——作为一个“没有取得好结果”的关系。离婚不再会在社会上给个人带来耻辱。一位研究家庭的社会学家甚至形容说，今天的个人在选择对象的过程中“永远可供使用”。[87]

家庭角色的转变 相互作用论的观点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对家庭角色的期望的改变。对什么因素真正构成丈夫、妻子、父母和孩子的角色的不同解释的冲突，导致了相互的权力斗争，因为他们各自使用不同的定义。那些殴打妻子或孩子、或是对女儿进行性伤害的男人，便是统治群体试图维持男人角色的传统界定的一个明证。两个成年伴侣按照他们特殊的情况和生活方式，逐渐界定他们在婚姻中的角色。例如，他们也许会根据谁有空或个人爱好来分配家务，而不是根据某种固定的劳动力分工。由于社会很少界定婚姻中的角色，因此夫妻间也许需要很长的一段协商过程，才能达成平等的协议。妇女仍然受到传统女性角色定义的重压，要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劳动，而在工作中，她们的收入只是男人的四分之三。

随着离婚率的升高，再婚和继父母的角色大量出现。在这一领域，义务和权利缺乏界定和法律规范。因此，这类家庭中的孩子遭受虐待的风险较高。

童年意义的变化 在虐待儿童的案件中，象征性相互作用论者注意到童年意义的变化。在历史上，社会把儿童视为微型的成年人和经济财产；到现代，成为经济负担的儿童被看作是为了满足情感的需要。[88]今天的社会对养育儿童采用更高的标准，并由专家——营养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对其加以评价。这种高标准对家长造成的压力更大，而且还伴随着开支的迅速上升。许多社会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是“童年的消失”，因为儿童从电视上了解到许多在以前只有到青春期或成人之后才会知道的“秘密”。今天，电视节目经常性地暴露成人世界的问题、困扰和弱点。[89]暴

力、政治和性问题生动地再现于各种媒体之上，暴露出大部分成年人的隐秘。与此同时，新一代年轻人在许多方面超过了他们父母的科技知识，特别是电脑技能方面。在角色期待中的界定、重新界定和伴随而来的混乱，是今天的家庭受到压力的基本原因。

作为社会问题的有关家庭事务的界定 最后，在本章中我们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只是在最近才作为被社会所界定的问题而出现的。虐待儿童和殴打妻子的问题进入公众视野只是过去30年间的事情，尽管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古代。当它们被界定为“家庭事务”时，警察和法庭仅是勉强地予以干预。但随着对它们的社会基础的确认，社会确认了它的责任和重新界定其角色的需要。

未来的选择

今天的趋势将如何显示家庭在未来社会中的状况？让我们再一次看一看发展过程中两个极端的可能性。

悲观的前景

在2030年，占人口大部分的老年人继续握有政治权力，并依照他们自身的利益为住房、卫生保健和政府养老金等提供资金。由于几十年来的低出生率，相对较少的劳动者负担着这笔沉重的开支，各个年龄群体间的对抗冲突极为常见。由于公共养老计划基金的缺乏，年轻的家庭成员不得不把自己年老的父母接回家中。不幸的是，虐待老人的事件充斥社会。

离婚率较20世纪末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结婚的人越来越少。男人（他们发现婚姻毫无益处）和女人（她们乐于从事自己的事业）都同意不值得为婚姻而努力。男人继续拒绝担负照料孩子和家务的职责，越来越多的女人接受了男性模式，即通过职业的升迁争取社会地位。男人和更多的女人向那些大公司表示自己最大的忠诚，去满足这些机构的要求，而且很少有时间从事个人事务。在大公司方面，它们不是去满足雇员家庭的需要，而是创造了一个伪家庭的环境。各种组织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个人将其视为自己的家。同时，人们的感情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完全成了公司追求利润的工具。

出生率普遍很低。由于极高的物质水平，生养孩子的开销非常昂贵。生物和遗传工程的高速进步，产生了一批领有执照专门进行生育的人。对

那些没有执照、仍然在生儿育女的人“遗传质量”的担心，造成了恶意的攻击和社会群体之间精英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相互指责。而且预先决定孩子性别的能力使得新生儿中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孩数量过多，20世纪开始的重男轻女的价值观仍然极有影响。因此，重男的倾向继续支配着社会，助长了人们的进取心和竞争性。

大多数有工作的家长的孩子从3岁开始，就过着高度组织化的生活——从一出生就在日托中心被照顾长大，一年12个月，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国家标准保证了保育员的价值标准和实际工作标准的统一。儿童自由活动时间和无组织的玩耍被取消，代之以由成年人严格按照时钟规定的少儿活动，这使得20世纪的人们所熟知的童年时代彻底消失了。

因为社会无法制定法律帮助贫困家庭，这类家庭远远地落后于社会的其他部分。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加大了贫富间的差距，缩小了中产阶级的队伍。家庭明显地分为稳定和不稳定两种类型，表明了社会的结构不平等。对穷人而言，他们物质条件的限制，使得虐待配偶和孩子的发生率维持在90年代同样的高水平上。在还未工作的少女中，仍然有很高的未婚生育率。

最后，自由派和保守派仍然在什么是合适的家庭形式这一问题上争执不休。结果是政府和外部机构不但没有巩固家庭，而是继续攫取那些曾经属于家庭生活范围的功能。对许多人来说，家庭只是一个空壳，一个没有太多心理认同的组织。人们对这个主要的社会单位越来越脆弱的依恋以及他们对工作单位的较少的感情联系，是精神疾病和自杀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乐观的前景

在2030年，重新界定的性和家庭角色使得男人更多地参与到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中。女人继续追求事业和工作的成功，但在家务中承担更加平等的工作，其伴侣减轻了以前她们必须承担的大量负担。公司对家庭需要的开明反应进一步缓解家庭的压力：它们在工作地点建立日托中心，为男女员工提供更长的产假，允许更有弹性的作息时间。社会承认个人对家庭生活的贡献，而盛行的社会标准也使得家庭结构变得更加民主，某些家庭成员控制其他成员的情况较少出现，从而也减少了虐待的发生。

电子技术的革命使一些家庭成为一个工作单位，人们可以用家庭电脑来处理资料。青少年对家庭工作做出同样的贡献，因为他们非常熟悉最新的电脑设备。在家庭中恢复这一功能有助于加强它的联系，而同时电子通

讯也允许家庭与直系亲属或（更经常地）与朋友圈子建立方便的联系。大屏幕通过网络把频繁的“交往”带进了家中。在这些网络交往中，一个家庭组织的成员可以同亲属讨论他们的问题，就像是从前负责处理家庭纠纷的大家庭的电子版本。这有助于减轻核心家庭的紧张情绪。

政府认识到共同群体的价值，进行拨款和征税以支持它的形成。同时，食物、照顾婴儿和服务合作把人们联系在更加广阔的网络之中，加强了社会成员对家庭组织的依恋。这些支撑家庭的新组织缓解了家庭的孤立，有助于减轻暴力行为。

出生率仍然很低，结果是受离婚——其本身也由于家庭压力的减轻而有所下降——影响的儿童数量较少。儿童仍然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少，而且很大一部分老人需要照顾，社会承认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和重要性。对那些经历了离婚的人，有许多咨询机构提供帮助。新的共同网络、支持家庭的组织和扩大的日托中心都可以帮助单亲家庭。在学校，有关婚姻和为人父母的必修课程，使青少年对这方面生活的期待更为现实。这种方法除了使年轻人更好地准备承担起以后的家庭责任外，而且还使少女怀孕问题降低到历史上的最低水平。

政府优先考虑贫困家庭的需要，提供收入补贴、职业培训和就业安置计划。新一代的孩子在一个更加充满希望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有现实的机会可以向上发展。

20年前，那些专门受雇对议员进行疏通的人成功地迫使媒体减少了涉及暴力的电视节目的数量以及利用男人、女人和儿童做广告的数量。媒体中仍然有冲突，广告仍在催促人们追求一些产品和服务，但不再以耸人听闻的、利用的方式。人们现在更加关注人性的方面，用更恰当、更温和的方式处理困境，以促进孩子的社会化过程。

自由派和保守派达成了合作的协议，力求在对核心家庭——它处在一个更广泛的共同网络中——的公共支持和宽容不同的家庭形式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最后，电子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剧变在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之后，已趋于平息。家庭不再要去努力地适应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因为变化的最初冲击已转化为在一个稳固的社会中的稳步前进，家庭形式也适应了新的时代。

小 结

1. 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家庭在过去200年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变

得更小、亲属间的联系更微弱、越来越强调个人的权利。许多观察家错误地认为，这些变化有悖于过去理想化的家庭标准。

2. 近来家庭中特定的变化包括：带有18岁以下孩子的已婚夫妇家庭数量减少；单亲家庭增加，特别是由女性带着孩子的单亲家庭数量增加，以及离婚和从未结婚的人的比例增加。近年来，原先迅速变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但是以女性为主的家庭数量仍在继续增加。
3. 在政府对家庭的支持程度上，美国要落后于其他工业国家。家庭生活的许多压力和问题仍然被视为是个人的，而未被作为公共问题加以对待。
4. 离婚对儿童的影响会根据他们的年龄、父母冲突的程度、孩子与非监护人关系的性质和程度以及再婚家庭安排的特点而发生变化。一般而论，离婚在经济和感情上都对儿童带来负面的后果。其中最严重的是，由于许多非监护人的父亲没能支付孩子的抚养费，造成了儿童生活水准的下降。
5. 大多数再婚者减轻了离婚造成的消极后果，但也要求新家庭和亲属关系做出必要的调整，这可能会带来压力。因为继父的角色没有明确界定，继子女受到虐待的风险很大。
6. 在美国单亲家庭剧增，其中多数是母亲加孩子的家庭。除了离婚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非婚生育。它在所有生育中所占的比例也在升高，特别是在美国黑人中尤其明显。由于黑人男性在经济转型中缺少就业机会，他们的结婚率不断降低。在美国，尽管少女怀孕的比例近来有所下降，但在整个工业化世界仍是最高的。它的根源是泛滥的性行为、心理驱动、社会地位低下、不坚持或根本不进行避孕措施等。其后果是使贫困的可能增大，以及对婴儿健康的危害扩大。
7. 配偶之间的暴力行为和对儿童的虐待极为普遍。虐待老年家庭成员的情况只是在近来才被揭露。与虐待高发率相关的社会因素有：核心家庭的结构、男性的支配地位、纵容家庭和社会暴力的文化准则、自身有受虐经历的背景、下层的社会地位、压力和社会孤立。
8. 家庭中的性伤害形式包括婚内强奸和乱伦。两者都对妇女带来长期有害的后果，并与男性优势地位相关。
9. 考虑到家庭暴力高发生率，需要为被殴打的妻子提供更多的咨询和安置机构，对虐待儿童的事件进行更多的干预，及对警察处理家庭暴力情况进行培训。预防措施应该针对缓解家庭压力、训练人们更好地为人父母、提高性别平等以及在整个社会中减少暴力行为。
10. 有的理论仅把家庭问题简单地归结为自私的个人（离婚）行为和病态

的个性（虐待），但这不足以解释与家庭相关的社会问题。功能主义的社会学解释认为，家庭失去了其在社会中的传统功能，并因而解体。另一方面，它试图承担一种专门的社会功能，即给予其成员情感上的满足，并因此而承受着压力。冲突论者把家庭问题视为男女间权力平衡转换的作用，是由外部组织的冲突造成的，与阶级结构的不平等有关。最后，根据相互作用论的观点，对婚姻、家庭角色和童年的新的界定，导致了今天在家庭中的混乱和压力增大。

关键词

虐待
同居
大家庭
乱伦
无过错离婚
核心家庭
父权组织
重组家庭
性伤害
单亲家庭

推荐书目

Coontz, Stephanie. *The Way We Never Were: American Families and the Nostalgia Trap*.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An informative book that punctures myths about families of the past and assesses contrived fears about families of the present.

Finkelor, David, and associates. *A Source Book on Child Sexual Abuse*. Beverly Hill,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6. A decade review of research into child sexual abuse.

Finkelor, David, and Kersti Yllo. *License to Rape: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iv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85. A study of 50 wives who admit to being victims of martial rape, clarifying the types of violence and describing the lingering effects.

Gelles, Richard J., and Donileen Loseke. *Current Controversies on Family Violence*.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3.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presenting various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for family violence and examining current controversies in the liter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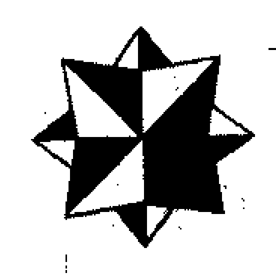
Levinson, David. *Family Violence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9.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urvey on family violence, using the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disputes the claimed inevitability of family violence and highlights its global correlates.

Russell, Diana E. *The Secret Trauma: Incest in the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A detailed picture of the experiences of 152 women abused by relatives before age 18, drawn from a major study of 930 women in San Francisco.

Skolnick, Arlene S., and Jerome H. Skolnick. *Family in Transition*. 8th 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4. A collection of 39 articles, including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at focus attention on major issues confronting the family today.

Tepperman, Lorne, and Susannah J. Wilson. *Next of Kin: An International Reader on Changing Familie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93. A reader on the changes occurring in famil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a focus on problems stemming from the rapid pace of change.

第10章 教育问题



关于教育的几点事实
社会历史背景中的教育
　社会升迁
　分数膨胀
　课程的变化
国际背景中的教育
作为官僚机构的学校
　遵守和服从
　权力等级制度
教育和社会阶层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统治地位
　能力分组或分班
教育问题的领域
　中途辍学
　成年文盲
　学校资金
教育质量问题
　科目问题
　学术水平
　师资能力
提高教育质量的其他途径
　平等的学校区
　学校优惠补助计划
　学习环境
社会学视角
　功能主义观点
　冲突论观点
　相互作用论观点
未来的选择
　悲观的前景
　乐观的前景

小　结
关键词
推荐书目

关于教育的几点事实

- 在一项随机测试中，20%的12岁美国孩子无法在世界地图上找到美国的位置。
- 今天SAT的语文测试平均成绩要比1972年低25分。
- 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和农村地区，中途辍学的孩子要超过最后高中毕业的人数。
- 1995年，16到24岁的拉美裔人中的辍学率为30%，相对而言，黑人为13%，白人为8%。
- 一些郊区公立学校管区用于每个学生的资金是城市贫民区公立学校的9倍多。
- 三分之一的大学新生至少需要参加一门补习课程。
- 全国1.9亿成年人口中近半数实际上是文盲。

美国公众对教育寄予了极大的信心，将之视为一种能够有效地解决酗酒、吸毒、少女怀孕、野蛮行车、犯罪、贫困和歧视等个人和社会问题的社会机制。人们倾向于把学校看作是伟大的平衡器，通向成功的道路，它传递和维持着所有美国的优点——敬业精神、民主和自由竞争的信仰、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这些崇高的理想把教育当成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的本身。当然，教育也传授基本的技能，但对许多人而言，更重要的不是这些技能，也不是知识所增长的价值，更不是为了学习本身的缘故。相反，通过教育使一个人获得一些别的东西，去获得成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对教育日益增加的需求同从事教育工作者的地位极不相称。他们的地位要低于非洲、亚洲和欧洲国家。由于人们对教育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也使它很容易就成为来自各个方向批评攻击的一个目标。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以及女性主义者、少数民族、家长、老师和学生都对它吹毛求疵，另有一些人则严厉批评教育有助于维持不平等而不是要消除不平等。学校纪律、消除种族隔离和经费资金等问题也都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抨击。

要解决教育的问题并不简单，因为它与贫困、种族关系和城乡经济等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社会历史背景中的教育

从托马斯·杰弗逊首先倡导大众教育以培养一个文明的公民群体来维护民主制度开始，美国人就把教育体制作为个人成功和国家强盛的出发点。然而，一直到 19 世纪中叶，向所有人开放的免费公共教育才成为一种规范。在 20 世纪初，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主要依靠公立学校，这使大量来自南欧和东欧的不同民族的人逐渐美国化。

社会升迁

在 60 年代以前，如果孩子不能达到某个层次的最低要求，他就会留级。之后普遍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教师们建议按照年龄使孩子逐级升学，而完全不论他们的实际学习成绩如何。这一新做法的原理是，那些没有升级的孩子会感到羞耻、失去自尊和缺乏动力。**社会晋升** (social promotions) 成了标准的做法，以避免因为自我形象和社会交往不良而造成学习障碍。无论这种做法有什么好处，它使得毕业生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接受了完整的教育。而事实上，许多人甚至缺乏必要的能力。

社会晋升的另一个后果是，由于班级总体能力渐次下降，造成了教学内容的水平降低。在大学阶段，基本技能的补习课程变得非常必要和常见。许多教授不再布置学期论文或是进行作文考试，因为选课的人数过多以及许多学生写作水平低下。对许多学生来说，阅读和写作并不是获得高中毕业文凭或者是大学学位所必需的技能。一个学生所要做的，只是在课堂上听清老师所强调的内容，然后在考试中找到相同的词组，或在选择题中猜出正确的答案。

分数膨胀

在越南战争期间，因学习成绩过低而退学的大学男生就不能延期服兵役。无论是出于对战争的抗议，还是出于对把人送上战场送命或伤残负有责任的愧疚感，教授在给分数时变得越来越慷慨。虽然“中”的成绩曾经是平均成绩和好分数，但后来，高分变得越来越普遍了。优和良常常至少占到了全部成绩的一半。**分数膨胀** (grade inflation) 使得它不能反映学生真正的学习情况。

分数膨胀的现象还蔓延到了小学和中学。教师常常把给高分看成是证明他们教学效果的证据，是为年轻人打通高中乃至大学之路的手段，否则他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前途。成绩就同教育本身一样，被定义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衡量学习成绩的尺度。

课程的变化

在20年代，美国的高中大约有175门文化课程。在30年代到70年代间，选择文化课程的学生的比例稳步下降，而课程数量却增加到了2100多门。许多新增课程是在60年代增加的，当时的教师引导了这种变化。因为他们认为，传统的课程有太多局限，不适合一个变化的社会需要。学生在被从文化和职业课程吸引开后，主要选修一些不很严格、非文化类、“个人服务”的选修课。到70年代末，因为高中毕业生较诸以往更加不适合工作或进一步深造，人们对此十分关切，促使修读文化课程的人数开始增加。[1] 如我们即将要讨论的，在80年代，由于全国优秀教育委员会在1983年提出的一份极具影响的报告，这一趋势获得了发展的契机。

国际背景中的教育

在其他一些国家，教育仍然主要为那些拥有财产的精英所拥有，或者是给那些善于考试者提供进入精英阶层的机会。通常这一选拔过程开始于初中毕业以后，成绩最低的三分之一的人被送到职业学校，其他的人则根据考试成绩，进入到两年或四年的专科学校和大学。在美国，一般的态度正好相反，认为个人有权获得他想要的教育。普及的高等教育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现象。[2]

然而，使每个人都能获得教育机会是有代价的。一个经常的抱怨是公共教育降低了学术水平，从而也降低了教育质量。多数其他工业国家的原则是重视高质量的大学教育，即使这样做会使一些能力不足的人无法进大学。在18到21岁的美国高中毕业生中，36%能上大学；比较而言，英国为18%，法国为27%，德国和瑞典是9%。澳大利亚、比利时和加拿大均约为30%。[3]

多年来，其他国家的学生在学术知识上要超过美国学生。例如，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对15个国家的数千名高中毕业班学生进行的一次代数测试发现，香港名列第一，以微弱优势胜过日本。美国在15个国家中名

列14，仅高于泰国、落后于匈牙利。联合国对9个国家的调查显示，美国学生对于外国文化的知识位于倒数第二。更令人吃惊的是，一项随机测验显示，20%的12岁美国学生不能在世界地图上找到美国的位置。[4]

在美国，教育的普及与低质量的矛盾之处可以说明：

1. 大约82%的美国男生和女生可以高中毕业。[5]
2. 1995年SAT的语文测试的平均成绩比1972年低了25分。[6]
3. SAT的考试成绩持续的低水平，迫使大学委员会在1996年重新调低了录取标准。
4. 由于高中毕业证书甚至不再能保证基本的读写能力，许多州都要求学生在获得高中文凭之前，先通过一项基本技能考试。

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学校教育更为有效？原因可能是后者的学期较长、更强调文化科目，而且要求在高中毕业时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大学。专家同意，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是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中小学实际上在所有课程的教学中都做得更好，包括母语的语法。[7]

另一个指标是家庭作业。欧洲或日本的高中生一般每天晚上都要花3个小时用来做作业，而一个美国高中生每周只用3.8小时做作业。[8]大部分研究显示，学生的成绩随着他们用在作业上的时间而提高，因此就无须奇怪，其他国家的学生能够在各种各样的考试中超过美国学生了。[9]

作为官僚机构的学校

在理想状态，学校激励人们求索知识，鼓励发展创造力和个性，帮助学生形成批判的思考方式，为学生提供一个发挥潜力的机会。但在实际上，学校常常完全没有做到这些，或是反映出制度性的偏见，偏向于某些类型的学生。一部分的原因在于社会的等级差别，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讨论。此外，每个学校体制都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存在着与其他机构相类似的结构问题：强调功效、严格的规则纪律、标准化和一致化、在处理非常状况时的弱点等。

批评者经常把学校比作工厂或监狱。阿尔文·托夫勒提出，在一所位于中心的学校（工厂）里，集中了大量的学生（原料），由教师（工人）按照纪律和标准化进行加工，是装配流水线规模化生产时代的一种可接受的形式。[10]监狱的类比是指，学校像一所监狱，有一个监狱长（校长）、警卫（教师）、被迫在那里服刑的囚犯（学生）、压抑的气氛（门卫和班长，

违反纪律就会立刻受到惩罚）以及要求保持肃静、队列整齐和活动必须得到允许等。[11]

遵守和服从

在传统上，学校调整自身以适合教育大群的学习者，要求他们适应学校的组织结构，而不是调整学校的结构以满足个人的需要。这一集权体制要求完全接受一套精心制定的规章制度，它旨在维持秩序和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在《教室里的危机》这本70年代重新引导了教育目标的影响很大的书中，查尔斯·西尔伯曼警告说，那些比小学更为压制的高中在无意中传播了“驯良、温顺、服从和不信任”的价值观。[12]

在一些学校区，进步的教育工作者已经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教学环境。它鼓励创造力、求知欲和一种个性化的学习进度。改变一视同仁、严格控制的学习方法，是教育工作者所关注的一项积极的转变。但不幸的是，许多学校仍然专注于标准化和纪律。许多学校的规范做法依然是，服从于按照时间划分的课程计划、统一规定的服装和发式、固定的阅读书目、强调安静和队列整齐、遵从教师的要求，而不是个人对学习的钻研和追求。其后果就是一个带有奴隶心态的学生的躯体，牺牲了他们真实的情感和直觉、失去了他们自立和自我激励的发展潜能，成为冷漠、驯顺和服从的应声虫。[13]

权力等级制度

因为学校就是官僚机构，它通过全体人员的不同分层发挥作用，它明确界定各个层次的权力，规定处理各种情况的特定程序。教师尤其会陷入各种文件的泥沼（成绩单、课程计划、撰写报告、写推荐信、汇总评估研究等），他们必须使用特定的教材，讲授特定的内容，保持课堂的安静和秩序。学校管理部门要求教师告发那些“拖拉”的学生，巡查在厕所里抽烟或吸毒的学生，甚至在食堂、走道和自习教室进行监视。教师并不制定规则，但是他们必须执行。对他们工作表现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赢得尊敬和维持秩序的能力。

克里斯托夫·简克颇为挑剔地观察到，学校的权力等级制度是建立在不信任的前提之上的：“校董会不信任管理机构，管理机构不信任校长，校长不信任教师，教师则不信任学生。”[14]显然，学校区之间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是，各个地方的权力结构对服从的强调会使那些在权利等级中的人

们的个性不断僵化，从而窒息创造力和创新性。

教育和社会阶层

我们所坚持的普及的公共教育，为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年轻人打开了学校的大门。人们长期以来一直都相信，正规教育可以缩小社会的不平等，帮助下层青年获得比父母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不过，在过去30年里，研究发现提出了相反的证据。尽管一些低收入的人确实通过教育获得了成功，但大部分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和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有着很大的关联。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统治地位

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学校反映了社会中流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而在后工业化的美国，这就是指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态度。为了给所有的人提供一种标准的教育，学校强调某些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在低年级，老师强调清洁、整齐、安静、有序，在休息和火警训练中保持整齐的队形、守时和服从。而在高年级，老师常常要求学生专注于课程学习，而不是像低年级那样，注重能力的培养，而且用成绩的竞争和日后的成就（有好成绩就可以上大学、找到好工作）作为主要的激励因素。

作为教师培训的一部分，他们学会了在课堂上发现学生中的个人差别。不幸的是，这种倾向通常侧重于假定在智力上的差别，很少或没有关于阶级或文化差异的教育，比如语言、家庭和同伴的影响以及教师的期望等，而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表面上的智力差别。因此，许多教师在评价课堂表现时，主要是看学生是否符合中产阶级的要求。

语言 在所有的国家，“正确的”语法和发音就是统治阶级所使用的语法和发音。想一想萧伯纳的《皮格马利翁》或是根据它所改编的音乐剧《窈窕淑女》的基本前提：只有当一个人纠正了下层方言以后，才会被承认和接受。那些说黑人方言和下层白人方言的学生——两者都不同于标准的美国英语——以及那些英语能力有限的来自移民家庭的学生，在学校里往往处于很不利的境地。他们在理解阅读和听讲的内容中存在困难，因为答题和论文中的语法错误而成绩偏低。许多学生由于一直落后于其他同学，入校以后就没能克服最初的语言障碍，从而变得灰心丧气，为自己定下的教育目标也就更低了。

家庭和同伴的影响 家庭和同伴是在一个人的个性形成时期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因此，他们对高中和大学的看法在一个人的学习积极性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在过去，大部分意大利和波兰移民家庭都倾向于孩子在高中毕业后立即参加工作，而亚美尼亚、希腊、日本和犹太移民家庭则非常重视大学教育。[15]今天，其他一些群体表现出类似的不同倾向。中产阶级和上层家庭的期望呈现为重视学业成功和大学教育，而在下层和工人阶级家庭中，无论是本土出生的还是移民家庭，这种期望都相对较少。

学习的潜力也是在中等或高等收入的家庭中较高，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书籍和教育性玩具；可以带孩子去动物园、剧场、博物馆、天文馆和其他文化中心；并且重视长期的目标（日后的成就）。无论教师怎样激励，学校和邻里的朋友的计划和活动也会影响一个学生的志向。

教师期望 **教师期望**（teacher expectations）常常是使学生服从的一个正面或负面的激励因素。如果一个老师相信某个学生能取得成绩，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态度上、评语里进行鼓励，允许他们用更多的时间回答问题，或是给予第二次机会以促使其有更好的表现。而相反，如果教师对一个人不抱太大的希望，这个老师的态度和行为就能给学生传递一个明确的低期望值的信息，这可能会进一步打击学生的信心。

在一项颇具争议的实验中，罗伯特·罗森塔尔和勒诺尔·雅各布森在旧金山的一所小学进行了一次智力测验，然后随机确定了20%的学生进行实验，要求教师对他们加以注意。[16]8个月以后，所有人又被重新测试，而这20%的学生得分明显升高。而教师们评价称，比起其他同学，他们更加高兴、更懂事、更引人注意、更有兴趣和好奇心了。实际上，惟一真正的变化在于老师对这些学生的期望，说明了教师态度的变化影响到了学生的进步。然而，之后进行的类似实验得出的结果并不一致，表明我们要做更多的研究以便准确判断，对自我实现的预见是如何在课堂中发生作用的。[17]

能力分组或分班

公立学校采取的**能力分组**（ability grouping）的做法的基本前提看似很合理。与其把能力各不相同的学生集中在一个班里，使得成绩好的人得不到充分的挑战，而成绩差的人又会感觉受到压力或打击，为什么不按能力分班、为每个人提供程度相同的教育呢？这种体制确实有好处，但它同时也造成了一些行为模式，伤害到许多学生。这种能力分组体制存在的问题

有两个方面，即用来决定分组的手段和这一体制对学生的影响。

测验 由于大多数人把教育水平与智力联系在一起，因此**智商测验**（IQ tests）被普遍地用作能力分组的基础。然而，在使用智商测验测定智力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困难。对这些测验所实际测定的内容以及所获得的分数在预测成就中的有效性，心理学家们的看法不一。一个主要的争论是围绕着测验中明显的文化偏见。因为它使用的语言、概念和基本资料都要更为中产阶级的白种美国人所熟悉。[18]批评者认为，智商测验不能完全测定个人天生的能力，但却反映了环境的影响。而且，这些测验只能评定某些智力才能，如语言、数学推理以及空间和符号的联系等。一些不能被测量的智能包括艺术才能、创造力、想像力、直觉，以及如说服力、毅力、机敏和魅力等社会技能，这些都有助于人们的实际生活。

虽然遗传和环境或是先天与后天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是现代争论的焦点是1969年《哈佛教育评论》中的一篇文章。心理学家阿瑟·简森在文中认为，在测验中环境起的作用相对较小。[19]为了支持他的论点，简森指出，在要求记忆力或背诵的问题中，下层青少年同中产阶级青少年得分接近，但在解决问题、发现联系和抽象推理中则分数偏低。他认为在概念化表现中的差别应归因于遗传因素而不是测试的偏见。[20]其他学者如威廉·萧克利、理查德·赫伦斯坦和查尔斯·莫雷也同样认为，遗传差异而不是环境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21]

在所有针对这一观点的批评意见中，最令人信服的两种观点来自于李·克隆巴赫和托马斯·索威尔。克隆巴赫的观点是，概念分数上的差别并不是因为固有能力的不足，只是缺乏在概念能力上的训练。[22]的确，相当多的事实证明，最初在概念能力测试中分数低于中产阶级的下层孩子，在经过培养概念能力的简短训练后，成绩就能超过中产阶级的孩子。[23]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观察到，所有下层的新来移民——包括20世纪初期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在智力测验中的抽象部分得分偏低是有传统的。[24]但是在他们经过了向上层的流动后，智商测验的成绩也会上升。这就说明，无论智商测验实际测出的认知能力或趋势可能有多准确，但是在测验中的表现根据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而且，有钱接受测验预备训练课程的人能明显地提高成绩，导致了贫富学生间成绩的进一步差异。

尽管存在众多的争议，如斯坦福成就测验或加利福尼亚成就测验等标准化考试仍然被广泛采用。尽管它也许可以在某一点上准确地测出某种形式的智能，但它也导致了为教学目的而进行的差别分组，而就此导致的教师的期望和学生的自我形象也许会妨碍知识能力的进一步发展。



学生的家庭背景在确定教育的效果中非常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学习环境。同教师对学生的期望一样，能力分组也许有益或者有害。但通常像上图中所示的合作协同的学习技巧，能够提高学习和学生们相互间的合作。

分班教学的影响 能力分组常常从一年级即已开始，以能力为标准将学生分配到不同的阅读小组中。从这以后，学生接受不同的挑战和学习任务，而且教师根据他们感知到的学生的不同的理解力指定不同的课程内容。这种需求“适合”能力的区别教育确有益处，但是它们常常过于固定呆板，而非灵活地追求更加长期的目标，使学生可以面对发挥智力潜能的更大挑战。这种把学生分成高于平均、平均或低于平均的过程，经常使教师带着不同的期望值对待不同的学生，而学生也就只是按照教师的期望值来学习。

学生很快就能明白自己是怎样被分类的，而这影响到他们的自我形象和学习动力。分在好班的人常常因为优势而沾沾自喜，而在差班的学生则会有消极的自我形象或自卑感。分配到最差一级则带来很大的羞耻。这些学生看到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学生如何看待他们，会极大地伤害他们的自尊，并认为自己是愚蠢和不值得教导的（参见专栏 10.1）。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差的班中有大量学生来自于低收入家庭，而来自中上等收入家庭的学生又占了高等的、有望升入大学的班级中的大部分。

因而这种分班教学体制反映和强化了美国的社会等级结构。在学校就开始了一个筛选和分类的过程，安排每个人进入不同的社会位置。社会等级偏见和分班教学的结合，影响到教师的区别对待和学生的态度、动力、自我形象、课程选择、职业目标、辍学或进一步深造的决定以及日后工作赚钱的能力。冲突论者进一步认为，学校因而剥夺了平等的教育机会。在70年代末，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州法庭部分支持了这一立场，裁定用标准化考试的成绩把孩子分成不同等级的做法违反了平等教育机会的原则。[25]

专栏10.1 分班和分类的影响

现在……已经无可挽回了。我生活中惟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校，但在那儿他们认为我愚蠢无知，并且会一直这样下去。我慢慢地觉得他们也许是对的……即使当我环顾周围，知道自己是这个班里最聪明的，但是这也仅仅意味着我是最笨的里面最聪明的一个，所以我将一无所成，对吗？我仍在原地踏步。那些老师对我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是我最喜欢的老师，我都能听出其中真实的含义：好了，你们这些笨孩子。我会尽量把课讲得容易一点，如果你们还是不理解，那么你们永远都不会理解。永远……

过去我常常想，即使我不是那么聪明，如果我认真学习的话，我也可以在学校的任何班级里发言。我的意思是，让班级里的每个人——所有的孩子和老师——都认为我还行。也许不只是还行……

过去我总是在想这点。如果每次老师点到我发言时，我都能回答……有那么一次我是能回答的，但就那么一次……

去年他们测试了我们，跟我们谈话，看我们究竟怎么样。在这之前，我在这个班级里做得很好，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好。我做了他们要求我做的每件事情，完成了他们布置的阅读，也完成了他们布置的写作，上课认真听讲……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那天好像是星期五，今天是我在这个班的最后一天。今天就算了，但是到星期一，我就得转到另外一个班。他们只是给了我一个不同的教室号码，但是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好像他们在让我同聪明同学多呆一天，然后我就得和笨蛋混在一起了。所以我和聪明同学又多呆了一天……但是老师不知道我将要离开，所以她表现出我完全属于那里一样。这不是她的错。整个一天，我都只是坐在那里想，这是我的最后一天。这是我能学点东西的最后时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真正的学习……

就在那时老师叫到了我，这也是我怎么会知道自己多聪明的。她就像以往那样叫到了我，就像她叫到任何人一样，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知道答案，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在我买的一本书里读到过，之后我母亲又读给我听过。于是，我开始回答，但是突然我什么都说不出了。什么都没有，没有一个词儿，就像我的脑袋僵死在那里。每个人都盯着我，好像我疯了或是别的什么。我的心跳得飞快，我明明知道答案。她在那儿等着，而我却什么也回答不出。这就是我怎么知道自己有多聪明的。那时我真正地知道，我自己有多聪明。我的意思是说，我当时想的是我有多聪明。我呆在学校里也没用了。没有学可上了，一边哭着，没人会聪明的。正是那天我才真正明白了。正是那天我才如梦初醒。

资料来源：Thomas Cottle, *Barred from School* (Washington, D.C.: New Republic 1976), pp.138-40.

教育问题的领域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我们的教育体制被许多问题所包围。其中最为严重的3个领域是：大量的辍学人数、成人文盲和学校资金问题。

中途辍学

尽管在全国范围内，辍学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2%下降到1995年的9%，但在城市少数民族和农村贫民当中，这个比例仍然非常高。[26]在波士顿和芝加哥等城市，有时甚至报告说辍学的人数相当于高中毕业的学生人数。与此同时，在底特律的部分地区和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巴马州的农村，



许多不识字的成年人不像这个人那样试图改善自己的命运。如果将文盲严格地限定在语文能力方面，那么13%的成年美国人都是文盲。如果把定义放宽到实际的功能性的读写能力，那么美国大约有一半的成年人无法达到基本的要求。

不到三分之一的青少年读到了高中毕业。[27]

根据州教育委员会全国联合会的一份报告，关于辍学者主要是些惹是生非的男孩和早孕的女孩的陈旧观念并不准确，尽管他们确实占了总数的40%。男女学生都可能因为贫困、城市环境、来自家长缺少教育的家庭、少数民族地位等原因而辍学。[28]

为什么贫困和少数民族的地位会增加一个人辍学的可能性？根据全国援助学生联盟的观点，穷学生、黑人学生或拉美裔儿童更有可能受到体罚、处分、停学、开除或留级。这些做法反过来增加了学生辍学的可能。少数民族学生被分配到职业教育班或是轻度精神障碍的班级的可能性要高于其他学生3倍多。在1995年，16至24岁的拉美裔人中的辍学率为30%，而黑人是13%，白人为8%。[29]

如果教育是进入主流社会的途径，那么缺乏教育便是一条毫无前途的死路。今天的辍学者将会成为明天的失业和遭受贫困的成年人。当学校和学生彼此放弃时，不只是个人受害，整个社会都将受到经济上的损失。

成年文盲

在一个工业化社会，**读写能力**(literacy)对于经济成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今天读写能力不再被简单地定义为初步的阅读能力，而是意味着在家庭、工作和社会的日常活动中，理解和使用书面材料的能力。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及低技能工作的不断减少，对成年人运用书面信息在社会发挥作用的能力的担心日益增加。在1994年，相对于大部分其他工业国家，美国有更多的成年人在散文和公文写作及数据计算等方面处于最低水平。[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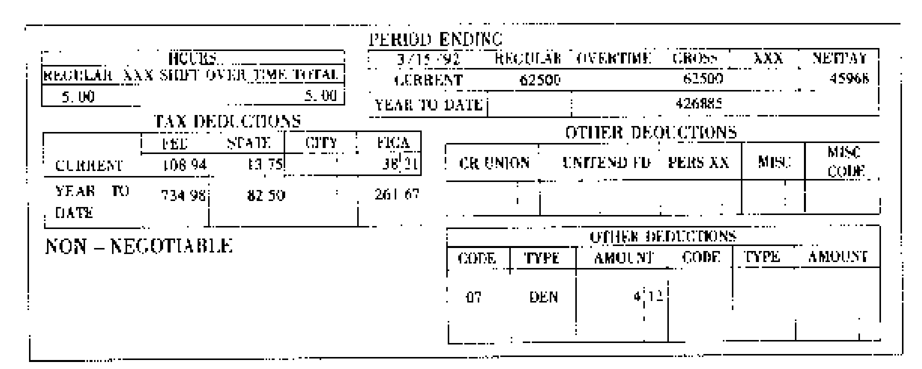
1986年，美国教育部对文盲进行了首次综合性抽样研究，采用了26道选择题来测定人们对一些简单单词和句子的理解。研究确认，13%的人口——即大约2100万人——是文盲。研究发现，大多数成年文盲都不满50岁，并生活在城市里。在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中，文盲率为9%，其中大部分都是高中的辍学者。在那些在家里使用其他语言的成年人中，英语的文盲率为48%。

1993年，教育部揭示了一个甚至更为令人震惊的关于美国人在词汇和数字方面不足的情况。这项新的、甚至更加全面的研究发现，大约9000万人——即美国成年人口的47%——是功能性文盲。这个更大的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节一开始提及的读写能力的新定义。现在，不同于简单地理解单词的阅读技巧，这项研究主要是评定实际的读写能力，如填写银行存款单、计算给一间房间铺地毯所需的费用或是看懂公共汽车时

刻表（参见图表10.1）。在测试中成绩最低的20%的人中有一半是高中毕业。这种情况令人不安地证明，一张高中文凭并不等于掌握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基本能力。[31]

1993年教育部的研究发现，许多成年人无法完成读懂汽车时刻表这样日常基本的任务。以下是其中的一些题目：

Question 1
What is the gross pay for this year to date?


PERIOD ENDING 3/15/92
HOURS: REGULAR | XXX | SHIFT | OVER TIME | TOTAL
5.00 | | | | 5.00
	REGULAR	OVERTIME	GROSS	XXX	NET PAY
CURRENT	62500		62500		45968
YEAR TO DATE			426885		

TAX DEDUCTIONS

	FED	STATE	CITY	FICA
CURRENT	108 94	13 75		38 21
YEAR TO DATE	734 98	82 50		261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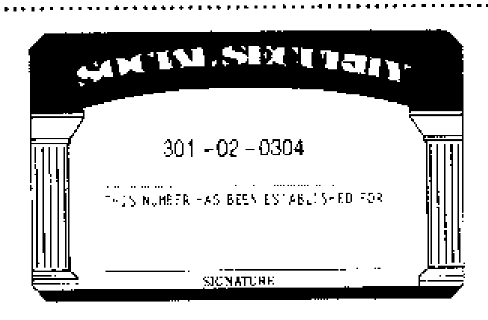
OTHER DEDUCTIONS: CR UNION | UNITED FD | PERS XX | MISC | MISC CODE

NON-NEGOTIABLE

OTHER DEDUCTIONS

CODE	TYPE	AMOUNT	CODE	TYPE	AMOUNT
07	DEN	4 12			

Question 2
Here is a socialsecurity card. Sign your name on the line that reads "signature."



Question 3
On Saturday afternoon, if you miss the 2: 35 bus leaving Hancock and Buena Ventura going to Flintridge and Academy, how long will you have to wait for the next bus?

OUTBOUND
from Terminal

	Leave Downtown Terminal	Leave Hancock and Buena Ventura	Leave Canada	Leave Rusan House	Leave North Carolina and One and Bianco	Arrive Flintbridge and Academy
AM	6:20	6.35	6.45	6:50	7-03	7:15
	6:50	7:05	7:15	7:20	7:33	7:45
	7:20	7:35	7.45	7:50	8:03	8:15
	7:50	8:05	8:15	8:20	8:33	8:45
	8:20	8:35	8:45	8:50	9:03	9:15
	8:50	9-05	9:05	9:20	9:33	9:45
	9:20	9.35	9:45	9:50	10:03	10:15
	10:20	10:35	10:45	10:50	11:03	11:15
	11:20	11:35	11.45	11:50	12:05	12:15
PM	12:20	12:35	12:45	12:50	1:03	1:15
	1:20	1:35	1:45	1:50	2:03	2.15
	2:20	2:35	2:45	2:50	3:03	3:15
	2:50	3.05	3:15	3:20	3:33	3:45
	3:20	3:35	3:45	3:50	4:03	4:15
	3:50	4:05	4:15	4:20	4:33	4:45
	4:20	4:35	4:45	4:50	5:03	5:15
	4:50	5:05	5:15	5:20	5:33	5:45
	5:20	5:35	5:45	5:50	6:03	6:15
	5:50	6:05	6:15	6:20	6:33	6:45
	6:20	6:35	6:45	6:50	7:03	7:15

CASH	$	00
LIST CHECKS BY BANK NO.	ENDORSE WITH NAME & ACCOUNT NUMBER	
	557	19
	75	00
TOTAL		

Question 4
You wish to use the automatic teller machine at your bank to make a deposit. Figure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two checks being deposited. Enter the amount on the form in the space next to total.

Question 5
The price of one ticket and bus for "Sleuth" costs how much less than the price of one ticket and bus for "On the Town"? A charter bus will leave from the bus stop at 4 p. m. giving you plenty of time for dinner in New York. Return trip will start from W. 45th St. directly following the plays. Both theaters are on W. 45th St. Allow 1 1/2 hours for the return.

Time: 4 p. m., Saturday, Nov. 20
Price: "On the Town" Ticket and Bus $ 11.00
"Sleuth" Ticket and Bus $ 8.50

ANSWERS

1. $4,268.85
2. Sign your name
3. 30 minutes
4. $632.19
5. $2.50

图表10.1 测试成年文盲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如果美国商业要能与其他国家相竞争，工人就必需掌握这些解释能力。根据某些估计，雇主现在花费大约500亿美元以消除这种实际的文盲。[32]成年文盲会成为国家经济的一个额外负担，因为他们更有可能要求得到社会福利的救济，而不是从事一份体面的工作为经济做出贡献。

学校资金

今天美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教育问题可能是资金问题，因为这影响到学习环境的质量和效率的各个方面。虽然可以用税收支付公共教育开支，但是联邦政府拨给学校的经费只是其所需的8%。因此，州和地方在预算拨款中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因为各州和各州的社区在收入上差异巨大，所以富有的地方比穷困的地方为每个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金钱。如表10.1所示，在像阿拉巴马和佛罗里达、堪萨斯和密苏里、犹他和怀俄明、爱达荷和俄勒冈这些相邻的州中，用于每个学生身上的平均经费存在差异，说明甚至在相同的地理区域中，州政府的拨款都相差巨大。

表10.1 各州在公共教育中的开支，每个学生的平均受益，1996年（单位：美元）

州	开支	州	开支	州	开支
1．阿拉斯加	10156	18．夏威夷	6335	35．科罗拉多	5447
2．新泽西	9967	19．印第安那	6222	36．内华达	5256
3．纽约	9535	20．明尼苏达	6203	37．北卡罗莱纳	5147
4．康涅狄克	8716	21．怀俄明	6129	38．南卡罗莱纳	5140
5．哥伦比亚特区	7944	22．华盛顿	6114	39．密苏里	5078
6．罗德岛	7733	23．肯塔基	6075	40．南达科他	5070
7．特拉华	7549	24．弗吉尼亚	6072	41．加利福尼亚	4977
8．佛蒙特	7474	25．堪萨斯	6059	42．路易斯安那	4844
9．宾夕法尼亚	7411	26．佛罗里达	5983	43．北达科他	4785
10．马萨诸塞	7385	27．佐治亚	5852	44．田纳西	4717
11．威斯康星	7231	28．蒙大拿	5774	45．俄克拉荷马	4523
12．密歇根	7090	29．俄亥俄	5749	46．爱达荷	4511
13．马里兰	6930	30．依阿华	5742	47．阿拉巴马	4479
14．西弗吉尼亚	6902	31．新墨西哥	5655	48．阿肯色	4353
15．缅因	6476	32．得克萨斯	5593	49．亚里桑那	4332
16．新罕布什尔	6458	33．伊利诺伊斯	5530	50．密西西比	4185
17．俄勒冈	6390	34．内布拉斯加	5513	51．犹他	3909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Table 262, p. 170.

因为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于财产税，所以有强大税收基础的地方社区用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钱要高于那些较穷且需求较大的社区，纳税人相应的负担也较小。在一些富裕的学校区，花费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钱要比贫穷的城市学校区高出9倍。[33]预算日益紧张的影响非常明显。例如，1992年纽约的注册学生人数与1971年相近，但却比以前少了2500名教师、3500间教室和100所学校。同样，预计在未来20年里，洛杉矶的统一学校区——每年要增加1.5万到2万名学生——为了缩减预算差额，它在1992年解雇了2000名教师。[34]1992年以来，纽约已经增添了新的学校、活动房屋和教师，但是仍然面临着学校和教室不足的问题。[35]其他城市，无论大小，都在为学校陈旧失修、学生过多、教师过少、缺少足够的教材和设备等问题而烦恼。

法庭行动 70年代初发生了一些旨在改变这种不平等的运动。在1971年塞拉诺诉普里斯特一案的里程碑性的判决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否决了州政府利用地方财产税支付公共教育资金的制度，认为这是歧视性的做法，因为它使儿童的教育质量依赖于他们父母和邻居的财富。在这之后，其他州的最高法院也做出了类似的判决。但是在1973年，圣安东尼奥市的独立学校区诉罗德里格斯这个关键性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根据美国宪法，得克萨斯州的这项与加利福尼亚塞拉诺一案实际相同的财政制度没有这样的歧视。由此判定这种财政措施非法，完全是一个州授予贫穷公民更多权利的决定。最近，尽管有各种尝试要重新调整财政政策，但大部分受到影响的州仅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他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两个主要原因是，源源不断的移民中大约80%集中在6个州，即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纽约、伊利诺伊斯和新泽西州，造成了城市学校的压力过重。而税收和预算的紧张，限制了这些州采取有效的行动。

财政不平等的后果 由于少数民族过度集中在较为贫困的学校区，资金的缺乏使这些学生无法获得与那些富裕区域的学生相同的机会，后者可以充分地使用显微镜、计算机或是其他现代的科技设备。当高质量的公共教育仅仅属于那些有较高社会经济背景的孩子时，与其说教育制度有助于保证所有美国人在生活中的机会均等，还不如说更助长了社会的不平等。[36]

在目前我们面对着一个差异巨大的局面。虽然有些州已经在努力为每个人提供平等地获得高质量教育的途径，但是其他州却没有这样做。在州与州之间和许多州内部的学校区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异。在找出一种更加公平的教育资金分配方式之前，平等的机会仍将是个美国式的神话。

教育质量问题

尽管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平均年份逐年增加，但无数专家都对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提出了质疑。在 1983 年，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全国优秀教育委员会在完成了一项为期 18 个月的研究后，公布了一份尖刻的研究报告。在《危险中的国家》一书中，委员会指出“庸才的上升态势”破坏了公共教育的各个方面：师资能力、课程和成绩。委员会强调，教育质量如此不高，使得国家在事实上逆转了一代人教育逐渐进步的长期趋势：

> “每一代美国人都在教育、文化和经济成就上超过他们的父辈。在我国历史上，一代人的教育能力第一次没有超过、没有相等、甚至没有接近他们的父辈。”[37]

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美国“实际上在从事一种轻率的、单方面的削减教育的行为”。在此之后，许多州和地方的学校区都进行了改革。虽然有一些进步，然而最近的报告显示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 1997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三分之一的大学新生至少需要修一门补习课程。在 1989 到 1995 年间，参加数学补习的新生人数实际上还有所增加，而阅读或写作补习课程的比例则保持稳定。[38]
- 1997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从 1980 到 1990 年间，9 岁儿童的阅读熟练程度略有下降，而在 1990 到 1994 年间保持稳定。[39]
- 1996 年，SAT 的语文测试的平均成绩比 1972 年低了 25 分。[40]
- 在 1990 年的一次全国数学考试中，一半初中二年级学生的成绩刚刚达到五年级的能力水平。[41]
- 1990 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三分之二的高中三年级学生不能把美国内战确定在 1850 到 1900 年这半个世纪里，而六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班学生无法在地图上找到俄罗斯。[42]
- 1989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95%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写出一封两到三页、没有拼写和语法错误的信。[43]
- 1987 年对 17 岁学生进行的一次测试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哥伦布何时到达美洲，相同数量的人不知道是亚伯拉罕·林肯颁布了《解放奴隶宣言》。[44]

问题在哪里？为什么美国（它在每个学生身上的花费比大多数国家都大，但别国的学生却超过美国）在平均水平上会产生知识和能力上都不足

的毕业生呢？让我们看一看《危险中的国家》一书中强调的3个主要方面——课程设置、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比较一下1983年和今天的情况。

科目问题

委员会报告指出，大杂烩式的选修科目降低了学术水平，破坏了强调具有挑战性课程的努力，而这些是学生以后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进一步深造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准备。从1969年开始，学术科目的课时比例从70%下降到62%，而用在一些非传统科目如驾车教育和消费生活等方面的时间却从8%增至13%。[45]在35个州中，数学和科学课都只要求学习一年，没有一个州规定要学习一门外语。委员会称，其后果就是一种“自助餐式的课程安排，在这里开胃品和甜点轻易地被错认为是主菜”。学校允许学生偏离文化课程，实际上破坏了教育的传统目标，在与其他工业国家的比较中，美国被置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46]

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危险中的国家〉十年后的高中生》中，美国教育部指出了一些积极发展的方面。在1992年，毕业生修完的课程比1982年的高中毕业生要多5门，而且一般都修读了更多的文化课程和较少的职业和个人课程。在1982到1992年间，在英语、数学、社会研究和科学课中完成推荐的最低单元限额的毕业生比例从13%增至47%。[47]当然，仍有超过一半的美国高中毕业生没有达到推荐的最低限度。

学术水平

学术水平的下降，是使每个人都能获得高中文凭或大学学位资格的趋势所造成的一个副产品。教育工作者常常让那些实际上几乎属于文盲的学生（阅读能力低于六年级水平）毕业。1976年的一个例子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华盛顿特区一所高中里最优秀的一名毕业生，他也是这个班致毕业告别辞的学生代表，尽管有着良好的出勤记录和坚强的学习毅力，但他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阅读和数学教育，难以达到进大学的标准。他的SAT语文测试成绩在全国按百分比定出的名次中处于第13等，而数学成绩属于最低的2%。这一反常情况说明了在社会晋升、成绩贬值和学生能力中存在的问题。[48]

这一方面的问题也许正在消失，因为加强学校和学生责任感的要求在全国产生了一个“回归基础”的运动。许多学校现在都强调基础的阅读、写作和数学能力。到1992年，47个州颁布了学生考试标准，要求学生在

这些基本领域达到最低分数，并把它作为获得高中毕业文凭的先决条件。

这种**最低能力考试**（minimum competency test，MCT）用来测定学生在基本技能上达到的熟练程度。但是批评者认为，这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学生的能力，反而鼓励了教师和学生集中准备通过考试，而没有真正学到任何东西。另一些人则强调，它在恢复高中文凭可信度上具有积极作用。许多大学现在也要求在新生第一年的数学和英语课程安排前，或是在第三年分专业之前，通过一次MCT考试或基本技能测试。在一个注重证书的社会，合格的MCT考试成绩现在是另一张必不可少的证书。

在各个年龄层次进行的评估考试显示，小学数学和科学成绩均有所提高。在1978到1994年间，平均的数学能力在各个年龄组都有所提高，进步最大的是9到13岁年龄组。此外，在全国数学教师理事会进行的一项反映近来教学重点和数学水平的评估中，四年级、初中二年级和高中毕业班的得分在1990到1996年间有所上升。在1994年，全部三个年龄组的平均科学成绩都高于1982年。1994年，黑人和拉美裔人的平均科学能力仍然大大低于白人。然而在1977到1994年间，在9岁的白人与黑人孩子及13岁的白人与拉美裔孩子之间的成绩差距都有所缩小。[49]

SAT考试的成绩仍没有反映出任何学习上的进步。就像早已提及的，1995年SAT语文测试的平均成绩比1972年低了25分。一些教育工作者指出，这种下降是因为有比例很大的少数民族学生参加考试，但在整个下降时期，这一比例实际上一直非常稳定（约13%）。[50]

在1995年，大学委员会把SAT考试的平均分提高到500分，取其200到800分的中间值。语文考试的平均分从424升至500分，数学的平均分也从478升至500分。大学委员会否认了全国性分数膨胀的指责，称SAT考试没有降低，只是“重新集中”了，因为根据得分百分比评定名次的做法仍然没有受到影响。批评者争辩称，这些变化通过掩饰较低的分数和遮掩阅读能力从1966年起已明显降低这一严重事实，而在高中阶段“认可了庸才”。[51]

师资能力

虽然十分之九的教师都很胜任，但日益增加的能力不足的事件在80年代初开始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对教师经常的不满包括语法不正确、拼写错误、缺乏讲课技巧、本学科的知识不足和缺少智能等。[52]存在某些不称职的教师的原因有：教师的收入水平较低，使得那些最聪明的大学生不愿意当老师；师资培训计划不能提供足够的理论上的准备；缺少对获得教师

资格的全国性的标准考试。[53]

1986年，卡耐基教育与经济论坛发表了《关于教师职业的报告》，提出了提高这一职业的素质的改革建议。[54]报告由一个教育工作者组成的专门小组起草，其中包括两个主要的教师工会的主席以及一些大企业和政治领导人。之后它在美国教师联合会和全国教育协会的大会上得到了认可。报告指向了问题的核心：需要足够的培训、职业化和较好的工作环境。文件中提出的建议主要如下：

1. 补充更多积极的少数民族教师。
2. 在拥有一个文科或科学学士学位的前提下，接受更进一步的研究生师范学习。
3. 建立一个全国标准委员会，为获得教师资格订立高标准，并给达到标准的申请人授予证书。
4. 对获得委员会证书的教师进行一次严格的全国考试，类似于律师资格考试。
5. 让教师在学校行政决策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教师奖励与全校学生表现挂钩。
6. 设立一个称为“首席教师”的一年制的新职位给予那些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将更高的薪金同工作能力与资格联系起来，首席教师的收入可以达到7.2万美元。

自从这个报告公布以后，取得了一些进展。到90年代初，公立学校的教师在种族分布上更为多样化，少数民族教师从占教师总数的9%增至13%。大学里培养新教师的上课方式，现在也类似于其他所有的学士学位课程。今天公立学校的教师较之一二十年以前更可能拥有一个较高的学位。[55]几乎所有的州现在都要求新教师参加一项能力资格考试，一些州还为有经验的教师制定了资格考试。[56]

许多大学都推迟到二年级才公布教育专业的学生名单，而且还规定了最低的成绩要求。其他学校则提供一个5年的学习计划，在最后一年的研究生课程中进行职业培训。许多州要求初等教育专业的学生有一个学术专业，认为人文学科的背景为教师提供了更扎实的知识基础。一些学校区也制定了导师计划，让有经验的教师指导和帮助新教师。

从1980到1994年间，教师工资也有增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公立学校教师的工资在这期间增加了20%，而一个新教师的平均工资增加了17%。然而，有些增长是因为平均教龄从12年上升至15年，以及教师高级学历的增加，两者一般都会使教师收入增加。由于他们的收入主要是基

于一份9或10个月的合同，可以预料教师的收入要低于大部分其他的白领专业人员。尽管如此，教师的工资要更加低：会计师的收入要比教师高10%～20%；律师要高出将近一倍；药剂师要高50%～60%。[57]

尽管许多人并不是因为金钱的原因（同孩子一起工作、个人满足等）而从事教学工作的，但是其他领域的高收入无疑会吸引走一些能够成为优秀教师的聪明的年轻人。教师对学校政策仍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但作为其他方面进步的一个结果，比起80年代初他们对自己职业的选择要更为满意。在包括数学和科学在内的所有领域中的流失率现在只有5%，而在70年代，有20%的新教师仅过了一年就会离开这个职业。

提高教育质量的其他途径

有些教育问题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如果社会结构本身不发生变化，这些问题就无法克服。其他问题更易于处理，但是仍然需要官僚机构的改变，以及教育体制承担更多的责任，充分发挥其效力。目前受到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平等的学校区、优惠计划和改善学习环境。

平等的学校区

尽管政府官员和教育工作者均有良好的动机，但是国家的公立学校并未能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居住格局经常造成学校人口中种族和社会经济的不平衡。都市、乡村、甚至小城镇的学校区在满足学校所需的财政支持上，缺少富裕郊区所拥有的税收基础。通过校车接送制度消除种族隔离的做法，虽然在一些城市地区取得有限的成绩，却也常常促使白人逃离该地区。现在政府官员、法院和许多少数民族领袖已不再认为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了。[59]一些州通过在各个学校区设定预算上限的做法，试图平均用于每个学生的学校经费，但是全国范围内的巨大的不平衡仍然存在。许多不同的建议为我们提供了希望，其中有些已经在某些地区试行。

重新分区 在社区内重新划定界线以决定每个学生在哪里上学，这既维持了就近上学的原则，还使得入学学生的分布更加平衡。纽约市的怀特普莱恩区是最早采用这种融合方案的地区之一。它宣布，每所学校的黑人入学率不得低于10%，也不能高于30%。今天在怀特普莱恩区，通过重新划分学校区界线和调整住房布局，一些学生可以步行去附近的学校上学，而其他人则通过校车接送上学。

另一个**重新分区**（redistricting）的方法是建立独立于市政疆界的学校区，其目的是创造平等的收入基础和消除种族隔离。例如，这种做法在洛杉矶也许可行。在这里，提供其他服务如消防和医疗救护的是县级当局而不是市政当局。然而，在东北部地区，地方强烈反对这种类型的解决方案，因为在这些地区，传统的地方界限和"地方自治"原则存在的时间较长。

磁性学校 试图消除学校种族隔离的另一项努力是磁性学校，其数量在过去10年里翻了4倍。第6章中已经提到，**磁性学校**（magnet schools）对文化课程要求严格，并设有一些特色课程如数学和科学、文科或计算机科学等。这些高级的特色课程吸引了学校区以外的那些有天分的学生，由此克服了隔离的居住格局，带来了更为多样的学生人口。大约20%生活在城市或城市周围的美国学生，在全国5000多所磁性学校里上学。[60]但是，其中约21%的磁性学校的选址有偏向性——这是80年代以来法庭强制消除种族隔离的结果（密尔沃基市除外）。在这些学校，校舍建筑已取消了隔离，但是教室仍然按照种族界线隔离开。[61]

虽然磁性学校开始时是用来替代强制性校车制度的，但是它们在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上的成功，使其更加受到欢迎。研究显示，磁性学校学生在数学、科学、阅读和社会研究方面的表现，都要好于综合性的公立中学。[62]由于教师在管理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比起普通学校的教师来，他们的积极性更高，教师旷课和流失的比例也更低。不幸的是，开办磁性学校的开支也要比普通学校高得多，因此把它作为实现高质量教学的惟一手段并不实际。

另一方面，批评者指责磁性学校是精英主义的。因为它们将大量的财力物力用在那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学生身上，而把大多数归为"庸才"的学生放到普通的社区学校里面。而且，由于磁性学校学生素质较高，资源更加丰富，而且职业威望也更高，因此最好的老师也被从普通学校吸引到了这里。[63]此外，一些批评者认为，磁性学校加强了分班等级的问题，因为它通过将那些有天赋的学生同其他学生相疏离，制造了一种特权心理，从而扩大了他们之间业已存在的鸿沟。[64]所以，虽然磁性学校也许是一种建立高质量、没有种族隔离的学校的途径，但它也可能会造成与其他公立学校间的不平等。

学校优惠补助计划

让孩子进入高质量、种族融合学校的最为激进的方式是发放**学校优惠补助**（school voucher）的做法。在这一制度下，家长收到一份相当于州政

府为一个孩子所提供的教育支出（参见表10.1）的教育券，这足以支付一所普通私立学校学费的90%。这一想法使父母可以完全绕过政府支持的公立学校体系，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自己选择的私立学校中去。这个方案在目前还很有限，因为还没有足够的私立学校以满足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可以去选择学校。

拥护完全实行教育券计划的人认为，家长的选择使学校相互展开竞争，迫使它们或是提高质量吸引学生，或是就此被淘汰。反对者担心，由于抽掉了急需的公共教育资金，把学生送到那些在教育质量上不向政府负责的私立学校，这一措施会彻底破坏公立学校。[65]他们还认为，如果家长使用这种教育券让孩子上教会学校，这一方案也就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政教分离的原则。

为了避免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建造学校，佛蒙特州实行这一计划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90年，密尔沃基市开始启动了第一个由市政府出资的教育券计划，使家长可以摆脱城市贫民区的公立学校，把孩子送往11所私立学校中的一所。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与一个私人基金会订约，为大约1000名学龄儿童提供教育券，让他们选择想上的学校，无论是私立的还是教会的。[66]1996年9月，克利夫兰开始了全国第一项由州政府资助的教育券方案，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一个真正选择学校的机会，包括教会学校。这项计划看来很成功。一年后，参加计划的学生的考试成绩——抽样非常广泛和有代表性，并不只是些最好的学生——明显升高，学生家长都极为满意。[67]不过，俄亥俄州的一个法庭以宗教原因推翻了克利夫兰市的教育券方案，州政府在1997年中期就这一裁决向俄亥俄州高级法院提出了上诉。同样，在密尔沃基市和佛蒙特州也遇到了来自法律的挑战。[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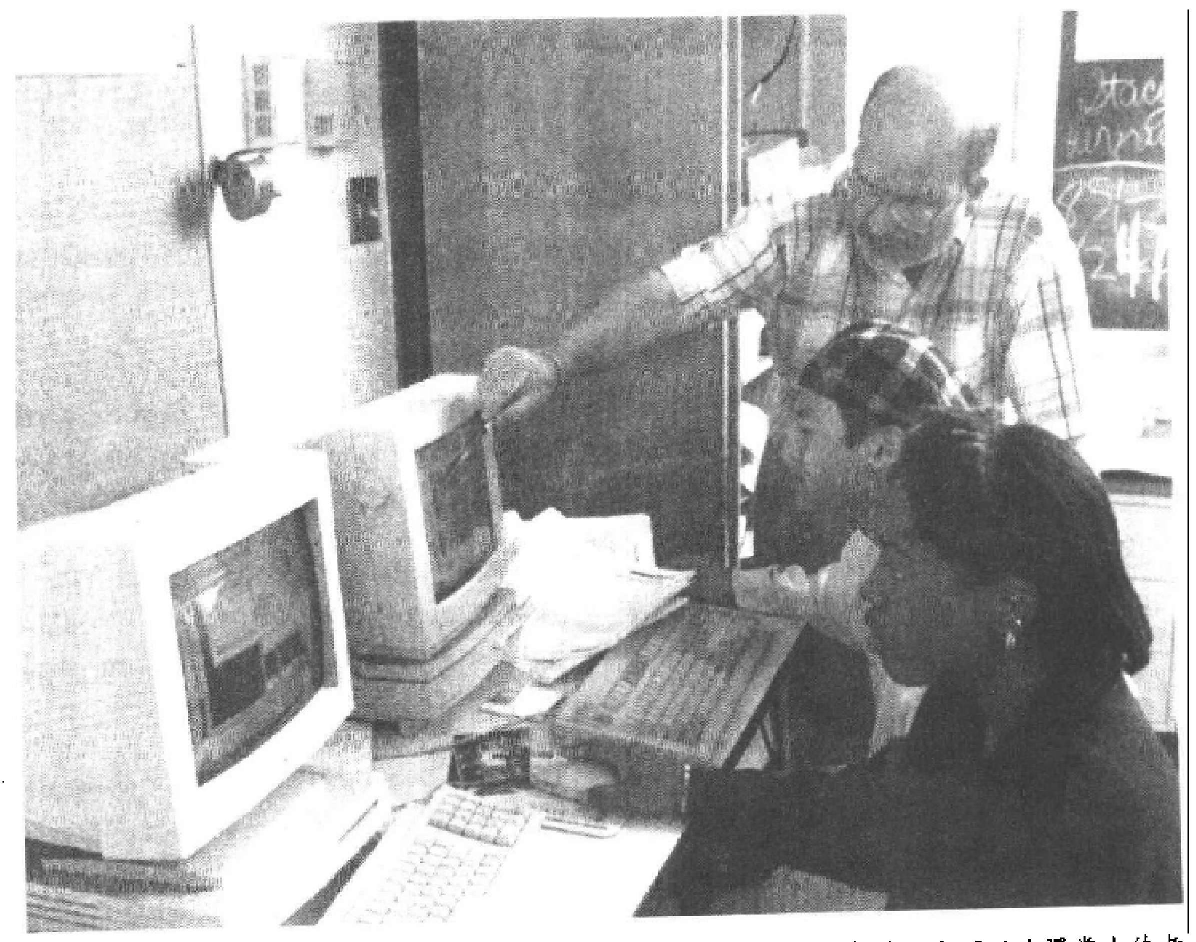
根据最近的民意测验，美国人在学校优惠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尽管有些专家认为，在自由市场商人、贫民区黑人和天主教徒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同盟。虽然结果不尽相同，但所有的民意测验都显示，对教育券的支持率越来越高，或者至少是反对意见在减少。这种支持自我选择学校的意见的增多，是对城市公立学校教育日益不满的结果。1996年教育改革中心委托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70%的被调查者支持用税收收入帮助贫困的家长送孩子上私立、教会或公立学校。然而，1996年由盖洛普联合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却显示，即使有孩子在公立学校的家长对这一问题也意见不一。最后，根据政治与经济联合研究中心发表的1997年的一次民意测验，87%的26到35岁的黑人支持教育券计划。[69]

尽管在法律上受阻，越来越多的州在考虑用税收资助教育券计划，以使贫困或不太贫困的家庭能送孩子到私立学校上学。明尼苏达州增加了税

收的减免额度，使家长可以送孩子上公立和私立学校，并建立了税收信用，可以用于各种教育目的，包括私人辅导、教科书和交通（但不包括私立学校的学费）。亚利桑纳州最近为那些愿意捐助设立私人奖学金的市民批准建立了一项税收信用。[70]长期以来，保守分子一直认为，用纳税人的钱把孩子送到私立和教会学校，可以帮助贫穷的年轻人，并刺激公立学校进行改革。到1997年，如城市协会和安妮·凯西基金会等自由主义组织也开始公开支持教育券计划。这一方法已经成为解决全国城市学校教育质量低下的一个极受欢迎的对策。[71]

学习环境

大量的学校使用开放式的教室，以在一个较少约束又有凝聚作用的环境中，激励个人的能力和创造力。从60年代开始并一直到今天，开放式



新一代美国孩子在学校学习着计算机的许多用途。恰当地使用电脑，它可以比课堂上的老师提供给学生更好的个人指导、帮助、强化和创造性激励。通过使用计算机以加强概念的理解是其中的关键。

的教室受到广泛采用。它剔除或重新安排了传统的教室设备：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学生座椅排成整齐的行列，老师的讲台作为屏障被放在前面。一个开放的教室通过精心设计，产生一个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注重教师的环境。老师通过多种多样的学习方法引导、鼓励和刺激个人成就，这些方法包括不同的课程材料和学生协作学习。虽然开放式的教室用一种更加积极的学习环境取代了教室里压抑的权威性，但它不一定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大体上讲，这个方法在中产阶级的郊区学校里最为有效，因为在那里，这种方法与家庭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主张人人平等的观念更为一致。

补习教育 回到基础的运动和社会阶层与学习成绩间的相互关系，使人们注意到，需要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提供特殊的教育计划和帮助。60年代开始的“开动脑筋计划”是一项规模最大、最为有名的计划，它为贫困的学龄前儿童提供早期基本技能教育以及医疗和营养方面的帮助。然而，参加这一计划的孩子在早期获得的效果，到了二三年级就逐渐被侵蚀，由此提出了长期努力的要求。作为外语的英语（ESL）辅导班、过渡期双语计划（逐渐转化使其主要使用英语）、逐级的年级能力考试以及提高技能的系统计划都属于**补习教育**（compensatory education）的形式。它是为了帮助贫困学生达到同年级的水平。

人们采用一些做法以试图减少学校中的中产阶级的偏见。许多学校为教师强制性地建立在职研讨班，使其更加深刻地体验到文化和社会阶层的差异。现在在大部分城市地区，作为外语的英语辅导班、双语培训班和少数民族学习计划是标准的做法。40多年前，新泽西州佩特森市戴尔大街学校所开创的一项课程革新的方法，受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其他城市和西南部土著印第安人保护区的学校所效仿的榜样。通过使用完全反映了他们自身文化背景的课程材料和教学图例，而不是一些“异族”的读物，例如白人中产阶级的读物，这一体制大大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使其达到或超过年级所要求的阅读水平。

知识与技术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高科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的最前沿——艾尔文·托夫勒把它称之为继农业和工业化之后，具有革命性变化的“第三次浪潮”。[72]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知识的大爆炸。过去30年里的知识总量比以前人类所有知识的总数翻了一倍。历史上曾经涌现出的科学家中，五分之四生活在今天。这一事实最好的证明就是层出不穷的科学突破和技术革新，它们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长久的影响。[73]

为了在知识和技术革命中应对提供卓有成效的教育的挑战，学校必须在课堂上运用更多的科技手段，并对教学重点加以重新界定。[74]随着就业模式、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要求人们作出选择和提高适应能

力，学校必须更多地集中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立能力。需要更加重视的是加强概念理解能力，而不是名字、日期和公式的死记硬背。教室里的计算机必须被用来培养一个人的思考过程，而不只是简单地用于操作和审看材料。

现在在全国的小学和中学共有450多万台微型计算机，全国范围内学生与计算机的比例从1984年的63:1降到1994年的11:1。全国约98%的学校，包括公立和私立学校，现在大量使用计算机进行教学，而1984年为78%。[75]许多学校把计算机作为提高写作和数学技能、获得信息和促进学习的一种工具。然而，在计算机运用方面，富裕的郊区学校区的学生比城市和农村的孩子能力更为全面，这又造成了另一种能力学习上的不平等。[75]

社会学视角

在这一章里，各种社会学的论述一直贯穿在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讨论之中。现在，我们将更加集中地讨论这些社会学方法对我们教育体制的目标、实践和问题的关注。

功能主义观点

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认为，正规教育对社会的繁荣昌盛极为重要。学校具有双重的责任，既要将文化一代代往下传递，又要教授给年轻人在一个科技发达的社会中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在美国，我们还进一步希望学校能够帮助解决诸如酗酒和吸毒、鲁莽驾驶、性混乱、歧视、贫困等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是，课程必须是同实际需要“相关的”，教学方法必须适合学生不同的能力。功能主义认为教育问题是制度负担太重的必然后果，因为学校试图同时满足太多人的太多需要。

大量的要求　即使学校只是教授传统的课程和基本技能，它可能也无法把这些工作都做好。因为教育官僚制度常常是无组织的，并要屈从于来自学校内部和外部的社会的各种自相矛盾的压力。然而，随着其他角色的增加，其制度机能失调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60年代社会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希望使教育同人们的生活相关，在公立学校引入了大量的选修课程。这些课程常常反映了教育工作者个人的爱好或是他们所喜爱的一些大学课程。以前只在大学里才有的课程，如心理学、社会学、种族关系和专

门的人文科学课程等，很快在许多中学普及开来。

其他艺术和音乐方面的课程——以及表演、计算机、急救、驾车教育、个人保健、购物、家政、打字、速记、会计等课程——使得传统的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减小。以体育比赛、鼓动大会、集会、演出彩排、乐队比赛、实地考察和指导会议等为借口的逃课现象，进一步扩大了同教育目标的冲突。这些教育目的的多方向性常常会产生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如对重点的误导、不重视掌握基本技能及缺少统一连贯的方法去实现目标。

社会工程 美国人通过学校寻求纠正社会不公，使得个人适应于各种成人位置。有时这种**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努力与学习过程相冲突，例如，在消除种族隔离的对策中所产生的对抗情况。为了避免打击较差学生的信心而改变教学内容，但这不能给予那些更有能力的学生足够的挑战。通过能力分组将学生安排到不同的学习小组，常常造成潜在的功能障碍，使低级别的学生中产生消极的自我形象和期望值的降低。当学校为了公平和全面考虑而取消了学校的祈祷活动，转向鼓励性和健康教育、进化论或争议性作品的时候，又常常同家庭和宗教等其他社会机制发生抵触。由此造成的价值冲突给家长、教师和学生都带来了困难的学习环境。

冲突论观点

冲突论者否认，公立学校通过为贫困者提供向上攀升的机会，在美国社会发挥过平衡的作用。对他们而言，学校反映了社会的不平等和统治阶级的喜好，并使社会和经济的差异得以保持。学校里的阶级偏见和学校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是他们主要关注的问题。

学校择优作用 在理论上，学校以每个孩子的能力为基础，筛选和选择学生获得更高的教育。但是实际上，个人的教育成功与其社会等级背景联系紧密，因为等级偏见遍布各个学校。许多研究证明，在社会经济背景与学习表现和成就之间有着很强的相互关联。卡耐基儿童理事会报告说，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比较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平均少4年。萨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发现，就相同智商的人而言，如果他们在社会经济背景中分别处于前十个和后十个百分点中，那么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就会相差5年。[77]

许多与能力无关的因素造成了教育程度上的这些差异。贫穷的孩子常常除了辍学帮助家庭外别无选择。分班制度使其他人感到“心凉”（参见专栏10.1），而期望过低和缺乏激励等因素产生了同样的负面影响，因为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受的教育程度。学校趋向于在

下一代中强化在他们父辈中便已存在的社会等级秩序。

学校区的不平等 地方学校的资金困难造成了学校设施、教职员工和教学质量上的较大差别。穷人主要都集中在缺少资金和教师的学校中，它们的纪律和质量在不断下降。在冲突论的观点看来，目前以经济水平分隔学校的制度——使少数民族人数过度集中在城市学校——是为了继续将被压迫人民压制在社会最底层。有钱有势的人确保他们可以从这种教育制度中受益，并抵制可能影响他们有利地位的变化。他们拥有必要的财力，可以举家迁移或送孩子去私立学校，从而避开任何他们所不喜欢的公立学校。他们还有充分的政治力量，可以影响校车制度和重新分区的决策。因此大多数冲突论者相信，只有社会本身发生改变，教育制度中的不平等才会消除。

相互作用论观点

教育是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个人在其中发展他们的个性，



教师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学生的学习，包括讲课、鼓励分析和讨论、指导实验，如图中在生物课上进行的青蛙解剖。但当这种影响变成教师对一些学生的低期望时，就会成为他们学习的障碍。

学习他们的文化。通过正规的学校结构和非正规的同龄人之间的关系，每个学生都要经过多年不断的相互交往，从而形成自我的观念。教育对个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课堂上所讲的内容。例如，如果让你分别列出关于小学和中学首先想到的10个记忆，最后得出的大部分可能与感情有关并影响到自尊的生活中的事件（比如受伤害、尴尬、被嘲笑、遭拒绝、恋爱、荣誉等）。对日常交往的共同理解决定了人们把学校生活视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成绩。

积极的经历 在一所有合理纪律和学习任务的学校机制中，可以帮助许多学生形成目标取向、责任感、积极性、毅力和敬业精神。他们同有竞争力的学生一起处在一个纪律和规则的微观世界中，可以为以后更有效地在外部世界发挥作用做好准备。学生学习如何培养社会关系、合作精神和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挑战。因此，一些社会心理学家相信，最为传统的学校在帮助学生学习、发展和活动上相当有效。尽管没有学校能够绝对完美，这些专家还是认为传统学校能够为个人成长和价值实现提供机会。

消极的经历 另外一些行为科学家则不那么乐观。太多的学校充满专制色彩，要求绝对服从规章、程序和教师要求。他们认为，这种压制性的气氛阻碍了创造性，鼓励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被动服从——这在民主社会是一个危险的趋势。而且，学校的竞争结构及其用害怕失败的心理作为激励，在学生中产生了焦虑、不安全和无能的感觉。成绩不好——或者甚至是预料到的成绩不好以及分班制等等——产生了一系列阻碍个人发展的解释和再解释，逐渐灌输给他们一种消极的自我形象。一旦被自己、被同伴或是被老师贴上了低于平均水平的标签，这个定义就会在以后的相互交往中不断加强。从这一观点出发，发生在学校的日常交往和解释，能够在实质上妨碍孩子学习、形成积极的个性特征并最终作为成人在社会发挥作用的能力。

未来的选择

在以后几十年里，教育对生活中的成功将会更加重要，而我们教育年轻人的方式可能也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也许如艾尔文·托夫勒所设想的，更为正式的教育将会是在课堂之外，而不是教室里，而且将更加分散和融合在工作当中。[78]计算机站点和远程教育也许会取代充满竞争的课堂中的相互交往。在我们等待高科技改变教育的时候，先看一看根据目前教育的趋势会产生的两种可能的结果。

悲观的前景

2030年的美国教育明显地不同于20世纪末的情况。联邦和州政府几十年的预算赤字造成磁性学校的资金削减，并取消了教育券计划。公立学校的资金不足加速了它们的进一步衰退，使得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庭都抛弃了它们。今天，他们的孩子在一些私人包租的学校上学。它们常常坐落在从城镇当局购买或租借的大楼里，由过去公立学校的教师或私人公司经营。公立学校现在仅仅是美国下层阶级的“仓库”。在美国任何地方的公立学校上学或教课都会给人带来社会耻辱。

尽管政府使用了更大的经济刺激，但还是没有能吸引更优秀的教师到公立学校。在一个充满破坏行为、偷车、抢劫、强奸和吸毒的环境中工作自然毫无吸引力。无法无天的学生和混乱的环境是整个公立学校体制的特色。它扰乱了学生的学习，妨碍了在这些学生中培养批判思考和做决定的能力。

今天的学校不仅反映了美国的社会分层，而且使其更加僵化。向上攀升流动不再是教育观念的一部分。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早已预先决定了他或她将上哪种类型的学校，接受何种类型的教育。所有的学生都被设定在一个与其背景相“适合的”位置上。成人以后，年轻人进入到一个在收入和地位上与他们的父母相类似的职业。

乐观的前景

在全部50个州中全面推行教育券计划，全国范围内磁性学校数量增加了3倍，以及将大量城市公立学校改组为私营的运作实体。这些改革使得教育体制在21世纪初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今天，在2030年，由于对整个教育体制的调整，有效的、没有种族隔离的、高质量的学校成为新的现实。这种调整——和共享电子通讯计划、远程教学及拥有各种资料的电子图书馆等所产生的平等效果——使得即使经济贫困的学生也可以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同富有的学生一起学习。

计算机技术在各年级层次教育中的运用，也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但却是积极的结果。它丰富了学生的创造力。坐在他们自己的电脑终端前，比起课堂教学，学生可以得到更多的个人辅导、帮助和强化。学生现在通过计算机程序安排的练习、作业、复习和自测来掌握基本技能。另一个重要的进步是使用了探索型的程序安排，鼓励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进行探索和学习。这种教学方式激励了学生的创造性和自立。

教室使用计算机的一个附带结果是能力分组或分班制的消失。由于计算机系统使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提高，以能力将学生分类的做法已毫无必要。教师可以给一个学生能力各异的班级上任何一门课程，然后计算机程序可以个别地帮助每个学生掌握这门课程。混合能力分班的回复以及电脑的个人辅导和对创造力的刺激，结束了课堂上的羞辱、学生消极的自我形象的发展以及教师的低期望值，代之以促进每个人的知识成长和发展。由此而产生的学生积极性升高最终消除了辍学现象。

掌握计算机知识和学习其他的文化，帮助任何背景的学生在一个先进的、多样化的社会里，为以后的职业准备了基本的技术和社会技能。自尊心的提高和批判思考能力的增强为学生提供了创造的兴趣，并掌握了在一个充满复杂选择的社会作出自己决定的能力。由于科技和不怕挫折、没有偏见的教师相结合，教育最终成为国家的一个大平衡器，为所有的学生准备了一个充满前途的未来。

小 结

1. 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教育是获得经济成功的手段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在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根深蒂固的主张是普遍的教育机会及坚持地方社区对教育的控制。教育问题与贫困、种族关系和城乡经济等问题相互交织。
2. 和美国不同，其他大多数工业国家对教育采取一种知识精英的方法。较长的学期时间、更为严格的课程设置和大量的时间用于家庭作业，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外国学生通常会在各种考试的成绩上超过美国学生。
3. 作为一个官僚机构，学校体制在其权力等级制度中允许很少的灵活性。求知欲、创造力和个性的衰落，是由于在制度上坚持要求统一、服从和顺从。
4. 中产阶级价值观主宰了学校，它常常以损害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为代价。能力分组和教师的期望影响了学生的自尊心、学习动力和成绩。由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主要集中在最低的级别，因此学校趋向于加强社会等级结构，而不是充当一个大的平衡器。
5. 城市少数民族（尤其是拉美裔人）和农村贫民的辍学率要高于平均水平；辍学严重减弱了一个人潜在的收入能力。在199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全国1.91亿成年人口中近一半被认为实际上是文盲。
6. 地方财产所得税辅之以州政府的资金是教育资金的主要来源。各州和

社区在提供税收收入的能力上差别很大。因此，个人所受教育的质量直接依赖于父母及其邻居的财富，尽管70年代一些州法庭的裁决使得它们开始寻求更加公平的资金来源。

7. 由于1983年一个全国性委员会的严厉批评，美国的教育在提高教师素质、学术水准及学生的语言和数学能力上取得了一些进步。政府仍在通过增加收入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方法，继续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减少教师的流失。
8. 教育改革的努力包括，试图通过重新分区建立更为平等的学校区、磁性学校和教育券计划。通过新式的、不那么独断的教学（还包括利用课堂电脑）方式改善学习环境，能够帮助建立更好的学校。
9. 如果教育要实现其充分推动个性发展的目标，就必须给所有的学生平等的教育机会。最有效的学校是那些在纪律和自我表现间实现平衡、在一个合作、有序和民主的气氛中、把学生作为一个成熟的、有责任感的人来对待的学校。

关键词

能力分组
补习教育
分数膨胀
智商测验
读写能力
磁性学校
最低能力考试
重新分区
学校优惠补助
社会工程
社会晋升
教师期望

推荐书目

Altenbaugh, Richard J., ed. *The Teacher's Voice: A Social History of Teaching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Washington, D. C.: Falmer Press, 1992. A direct look at the classroom behavior of teachers and the resulting learning enviroment.

Cookson, Peter W. *Social Choice: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merican Educa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chool choice plans and their potential effects on students, teachers,

school systems, and communities.

Jencks, Christopher, et al. *Who Gets Ahead? Th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Success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amily backgrounds, and economic success.

Kozol, Jonathan. *Savage Inequalities: Children in America's School*. New York: Crown, 1991. A highly respected education analyst delineates the disparities in the quality of schools as determined by the economic strength of the sending district.

Oakes, Jeannie. *Keeping Track: How Schools Structure Inequalit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How the attempt to provide homogeneous learning groups detrimentally affects self-image, achievement, and future succ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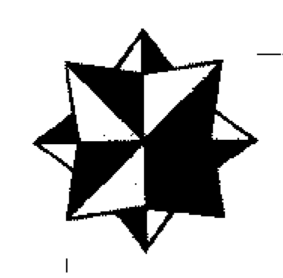
Ravitch, Dianne. *The Troubled Crusade: American Education, 1945 – 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An informative, provocative discussion of four decades of educational reform meas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elock, Anne. *Crossing the Tracks: How Untracking Can Save America's Schools*. New York: New Press, 1992. An analytical commentary on ability-grouped classes and an argument for replacing them with more effective teaching techniques.

Wood, George H. *Schools That Work: America's Most Innovative Public Education Programs*. New York: Dutton, 1993. A hopeful book that describes a variety of innovative programs in U.S. public schools that enjoy a high success rate.

Yarmolinsky, Adam; Lance Liebman; and Corinne S. Schelling, eds. *Race and Schooling in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A series of insightful articles on the immense difficulties urban schools must overcome to provide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第11章 美国的公司与工作



关于美国的公司与工作的几点事实

- 在美国，不到1%的大公司控制着全国75%的资产。
- 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族占有全国财富的近40%。
- 跨国公司构成了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系，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 一个人受到的教育越多，其失业的可能性就越小。
- 五分之四的新工作都是低收入、低声望、无出路的工作。
- 对美国每个工厂做一次全面安全检查要用265年时间。
- 要对所有已知的化学制品进行分析和制定管理规则需要100年，但每20分钟就有一种新化学产品生产出来。

传统的美国价值标准——民主、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成功、人道主义——培养了人们矛盾的信仰。例如，我们相信地方自治和管理，但又希望联邦政府插手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帮助人民，但又不希望它干涉人们的生活。我们相信自由企业制度，但又希望政府规范大企业。我们不信任大公司和大政府，但又将它们视为必要的。

我们该如何调和这些矛盾？我们该如何鼓励企业提高生产力和政府更多的保护而又不影响个人的权利呢？由于集团企业和院外活动集团的不断增加，政府是代表公众利益还是特权者的利益呢？是谁在真正管理着美国？

在不久的未来，你们将会在美国社会中工作一生——最大的可能是成为其他人的雇员，也许是一个大公司的雇员。然而，无论你所追求的职业是什么，工作提供给你的（正如它为所有人提供的）不仅只是维持一种特定生活方式所需的收入，它还给你一个社会身份和生活目的。对一些人来说，工作比起他人而言更是一种个人的实现。但由于劳动的社会组织也会异化、失去人性、剥削和对身体有害，它又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本章考察了一些影响到美国消费者和劳动者的社会力量。首先，我们将讨论大公司权力的日益集中及其对个人的影响；然后，我们将考察在电

子革命中工作场所的改变；最后，我们将研究失业、劳动者的满意度和工作场所的健康危害等问题。

社会历史背景中的工作

工业化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变化。生活变得更加复杂，职业越来越专业化，而我们每个人也越来越依赖于他人以获得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个人的经济自立让位于对大工厂和自然资源开发者的依赖，以满足我们的生计和物质需要。这个过程非常艰难。土地的过度开发、对工人的剥削、滥用权力和劳动纠纷都是不断发展的现实。

在争夺更大市场份额的竞争中，相互竞争的公司通过兼并小公司或是消灭对手实现其扩张。随着其规模和力量的增长，每个行业的少数大公司就成了垄断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实际上控制了市场，并操纵了价格。最初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出现的经济竞争机制，转变为控制了市场供应的大公司的经济支配。到20世纪下半叶，许多大公司成为全球性实体，大量的海外资产和销路使它们的力量更为强大。

随着经济机构日益官僚化和集中，政治机构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在大城市和一些工业化的州，特别是在国家的层面上，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发展起来，以应付日益扩大的责任。在政府错综复杂的运作体系中，为特殊利益集团工作的院外游说者极力活动，以便在新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中获得特惠。大公司利用它们的巨大财富，捐献大量的竞选经费，或是用未来职位的许诺来影响立法者和行政官员。

美国的大公司

当少数制造商控制了一个行业的时候，这种经济格局就被称为**寡头垄断**（oligopoly）——财富和权力在极少数竞争者中瓜分。寡头垄断通常结成**价格同盟**（price leadership），即采取协调价格或同步价格以避免价格竞争。所以，当一个主要的汽车、石油或钢铁公司提高价格时，其他公司就会迅速采取同样的行动。显然，它们通过这种方式增加的收入，要远高于由于其价格升高对某些可能的买主而言过于昂贵而造成的损失。有的时候，这种涨价是合理的，但也会发生许多人为涨价的情况。一个例子是70年代末石油工业的汽油价格增长了3倍，远远超过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的原油价格涨幅。不是所有的石油公司都能侥幸地逃脱惩罚的：1985年一个联邦特别法庭对埃克森石油公司罚款20亿美元，因为它在1975至1981年间“不公平地获得了巨额利润”。

大企业对经济的控制程度可以由一些事实来说明。在美国，不到1%的公司控制着全国75%的资产，在1961年这个数字为61%。在1993年，最大的100家公司还占了全国总销售额的70%。[1]在某些行业权力的集中甚至更大，例如，1%的食品公司控制了80%的行业资产，获取了90%的利润。[2]

谁拥有大公司？

显然，少数大公司在国家的繁荣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是谁拥有这些大公司呢？答案隐藏于3个主要方面：错综复杂的对其他公司股票的合伙拥有；法人团体代表私人投资者进行投资；以及隐秘的信托基金。大量分析揭示，少数富有的精英人物是大多数大公司股票的最终所有者。数百万的私人投资者或许会参与到股票市场中，但大部分股票被相对少数人所控制。

富有的精英人物 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最富有的1%的美国家族拥有全国财富的近40%。[3]他们还拥有全部免税国债的71%，投资用房地产的42%，以及私人手中的所有股票的62%。[4]这一财富的巨大集中，近年来还在缓慢增加，但与1860年以来的情况基本保持相等。[5]

借用两个著名的家族——杜邦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的例子，迈克·帕伦蒂说明了富有的精英分子是如何控制公司所有权的：

> 杜邦家族控制了10家大公司，每个资产都在10亿美元以上，包括宾州中央、通用汽车、可口可乐、波音和联合品牌以及许多小公司。超过100万的人在为杜邦家族控制的公司工作……
>
> 另一个强有力的家族企业是洛克菲勒家族。他们握有超过3000亿的公司财富，几乎扩展到了每个工业领域、美国的每个州和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洛克菲勒家族控制了最大的12家石油公司中的5家和4家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他们拥有的股权遍及化工、钢铁、保险、制糖、煤炭、铜矿、锡矿、计算机、公用事业、电视、广播、出版、电子、农业综合企业、汽车、航空等行业——实际上是几乎遍及每一种已知的自然资源或制成品和服务领域。[6]

连锁董事会 除了公司投资外，另一个实施经济控制的有效手段是连

锁董事会（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这是指一个公司的总裁或董事同时又是另一个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这种连锁可以是直接的（一个人同时成为两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或间接的（两家公司都有人在第三家公司的董事会中）。这种企业执行官的紧密的连锁网络使经济和财政控制集中在少数个人手中。他们能够在某些行业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有效地制定生产计划和投资。[7] 正如赖特·米尔斯所说的："连锁董事会不仅仅是个短语，它指向了商业生活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特征，也指向了在有产阶级中盛行的利益共享、政策一致的一个社会学的支柱。"[8]

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的连锁董事会在企业活动中都极为普遍。对 13 家最大的公司（它们总共占了全国公司资产的八分之一）的研究发现，每家公司与另外 12 家平均有 5 个直接的和 123 个间接的联接。[9] 大量其他研究证明了通过广泛使用连锁董事会控制主要银行和公司的做法。[10]

连锁是由内部和外部的董事共同造成的。公司的内部董事，尤其是其首要领导，常常是其他公司董事会的成员。在对《财富》500 强制造企业中的 456 家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其中超过 70% 至少有一名高级领导在某个金融机构担任董事。这还不包括那些在非金融公司担任董事的情况。一家公司外部董事通常构成了它同外部的主要连锁关系。这包括了上面提到的 456 家公司中与金融机构的联系的四分之三。[11]

当竞争最终不再存在时，当少量大型公司的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时，当这些由少数富有的精英控制的公司不再受到外部责任和法律的约束时，自由企业制度便停止发生作用了。只要直接的竞争对手不担任彼此或供应商和用户董事会的成员，连锁董事会就不是非法的。然而，这种做法确保了大公司的特权地位，而顾客却毫无保护。

大规模吞并

在最近几十年里，通过兼并和收购一些巨大的**企业集团**（conglomerates）开始兴起。这种企业集团——即在不同行业拥有多家企业的大公司——的趋势，增加了企业寡头垄断的可能性，它们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每年的企业兼并案超过 4000 例，许多兼并发生在银行、零售、石油和燃气及经纪和投资行业。[12]

兼并和收购的总值在 1996 年猛升至 6470 多亿美元，几乎是 1993 年的 3 倍。电讯、传播和公用事业占到全部交易的 27%，其中最大的一项交易是贝尔—大西洋公司与尼内克斯公司之间价值 213 亿美元的合并。军工和航空业也趋向合并。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以 87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劳拉

公司之后，洛克维尔国际公司宣布将以8.6亿美元的价格，把它的航空和武器部门转让给波音公司。波音公司随后以140亿美元的合同收购了麦道公司，使得军工行业的合并总值在过去4年里超过了400亿美元。在投资公司中，华尔街最好的投资公司之一摩根·斯坦利集团，与主要将证券和股票出售给小投资者的迪安·维特发现公司，同意合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证券公司，交易价值达到102亿美元。[13]分析家把这种行动——一家数十亿资产的公司收购另一资产价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称为**大型兼并**(megamergers)。

公司的敌意收购 直到70年代中期，还没有一家大公司或其投资银行顾问会考虑对另一家公司进行敌意收购。此后，混乱的收购行为充斥了企业界，促使电视评论家比尔·莫伊尔把这一现象称为"野蛮人的互相吞噬"。收购的数量从1993年的6307起，上升至1996年的1.015万多起。虽然这种情况可能难以长期维持，但分析家预测，经济状况仍有利于更多的公司吞并，特别是在全国和全球范围的商业银行、电力事业、制药和电讯行业中。[15]专家预期，这些公司收购行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继续，尤其是位居第四或第五位的公司将被行业内更大的竞争者所吞并。[16]

公司技术结构

非个人的公司实体确定了今天经济环境的基本情况，不像过去，像福特和洛克菲勒家族这样的权力经纪人还可以确认。偶尔一个公司领导人会成为媒体中的名人，比如珀迪鸡公司的弗兰克·珀迪或温迪公司的戴夫·托马斯。然而，在其个人领导的表面背后存在着一群无名的专家，他们在公司的决策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权力可能集中在一个强有力的、可见的首席执行官手中，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的大公司要依赖于由能干而有经验的专家组成的不知名的管理队伍提供意见和指导。

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布莱斯把大公司中这种背后的领导群体称为"技术结构"。[17]如果倾向于将公司利润最大化，**技术官僚**（technocrats）行使着巨大的权力，其决定影响到国家的政策和生活质量。[18]公众可能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的行为首先是为股票持有者创造利润，公共福利最多是一个次要的考虑。例如，只有在政府规定和执法部门要求他们做出反应时，公司计划者才会考虑有毒废料的处理及空气和水的污染等问题。

操纵市场

在理论上，我们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因而有益于消费者。但实际上，公司很早以前就意识到，避免价格竞争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做法。虽然操纵价格是非法的，但它却极为普遍。一项研究显示，美国500家最大公司的高级生产主管都承认，操纵价格是一种标准的做法，而之后500家公司的执行官中的70%也这样认为。[19]

大公司之间非法勾结，统一制定高价格，每年使不知内情的消费者损失巨大。如果少数生产商控制了一个行业，这些协调价格的行为便成为可能。或许最声名狼藉一个例子是，在通用电气公司、西屋电器公司和麦克劳—爱迪生公司最高决策层的认可下，这几家公司连续多年操纵电器行业的价格，给公众造成了总共超过10亿美元的损失，而这只是因为联邦政府成功地对违法者予以了定罪才为人们所知。[20]许多企业决策层中通行的态度或许可以用通用电气公司一位被定罪的执行官的一段话来做出最好的总结，他说："的确，串通是非法的，但它不是不道德的。"[21]

价格操纵无论是固定价格还是类比价格，都是大公司剥削消费者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操纵市场本身。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对阿厄斯玩具公司的一项法庭裁决。该公司利用自己的市场力量，迫使一些主要的玩具制造商如马特尔公司和哈斯布劳公司将它们最受欢迎的产品（如芭比娃娃、土豆头先生、"特种部队"、根据迪斯尼动画《玩具总动员》设计的玩具形象等）交由它专卖，将其新兴的主要竞争对手普莱斯—科斯特科公司、BJ公司和山姆商社等批发商排除在外。[22]

也许影响最为深远的操纵市场的例子牵涉到20世纪上半叶的通用汽车公司。在有计划地收购了许多火车机车公司和电力运输系统之后，通用汽车开始在45座城市削减火车和有轨电车的供应。它的目标是要转而推销公共汽车、小汽车和卡车。它们产生的利润是火车机车销售的25到30倍。[23]到1955年，美国城市中开行的有轨电车数量，从1936年的4万辆下降到5000辆。[24]

1949年，芝加哥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判决，通用汽车因与火石轮胎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合谋垄断公共汽车、汽油、石油和轮胎的销售并淘汰电力运输，而违犯了法律。对通用汽车的罚款是微不足道的5000美元。对此负有责任的通用汽车的执行官则只交了1美元的罚金，而同时通用汽车的利润却飞速上升。[25]半个世纪以后，这种市场操纵为我们留下的后遗症包括，对汽车和石油供应商的持续依赖、拥挤堵塞的街

道、空气污染和劣于其他工业国家的铁路系统。

操纵消费者

在一个满足了大部分人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的发达的工业社会，公司通过广告人为地制造出对新产品的需求。两代人以前，万斯·派卡德在《隐藏的说服者》（1958年）一书中警告说，广告商故意利用我们的心理需要和愿望，来使我们购买他们的产品。[26]1974年，威尔逊·布莱恩·克伊提醒我们注意，广告商成功地用潜意识诱惑——巧妙地利用形象吸引我们的潜意识——来扩大销售量。[27]今天，广告商同样有效地操纵我们去购买不必要的产品。

广告商迎合了人们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他们贩卖给我们的是赞同、爱好、美丽、青春、性魅力和美好的生活。你也许会认为广播电视和印刷广告并不会影响你，但是销售数字证明消费者是多么容易放弃自己的诺言。大量广告所鼓励的行为哲学，对我们个人愿望和日常行为中的文化价值模式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由于许多产品之间几乎没有真正的区别，公司便制造出想像的或人为的不同。拜尔公司生产的"或许是最可信赖的阿斯匹林"，但所有的阿斯匹林其实都一样，因此是广告把拜尔推上了顶点。同样，阿那辛中也许"含有大多数医生推荐的成分"，但这些成分碰巧就是阿斯匹林。此外，无论我们乘坐一家航空公司的"人类的翅膀"，还是另一家公司的"友好的天空"，事实上乘坐的是同一型号的飞机，得到的是相同的服务。你可以从咖啡、汽水或啤酒中"品尝出差别"，但是你对一种产品的满意程度超过另一种的原因主要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

广告中的欺骗和误导比比皆是（参见专栏11.1）。联邦通讯委员会对虚假的产品宣传进行监管，但在违规者同意撤消违规广告之前，它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朱利斯·亨利一次发现，对广告商而言，"能促进销售就是真实"以及"真实就是法律上不虚假的东西"。[28]尽管许多人都不信广告中所说的事情，但是这些广告仍然经常说服他们去买那些产品，以获得地位、幸福和美好的生活。毕竟，正像一则广告中说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尽量去求你所爱吧"。

专栏 11.1 公司的不分是非

公司不是人，没有感情，它没有道德或利他的目标，因此它会毫不犹豫地做出与社区目标或环境健康相对立的决定。事实上，公司的行政官们赞扬"不带任何感情"是"客观"决策的基础。

不过，公司企图掩饰他们的非道德性，努力表现出自己似乎是无私的。最近，美国企业界似乎一致采取行动，关注一些当代社会问题，如整洁环境、美化社区或消除毒品。公司展示其社会责任感的努力，恰恰是因为它们不对社会承担责任，除非出于它们自己的目的，它们对社区目标毫不关心……

公司似乎大公无私的努力其实是一种公关手段，或是一种出于自身利益的计划，比如向学校提供教育器材，以达到自身的目的。在其他方面，表面上的无私只是"控制危机"以消除公众的批评。

例如，最近出现了大规模的广告宣传，用以表白公司为清洁环境所做的工作。一家安装海上石油钻探平台的公司进行广告宣传说，平台下的鱼群活跃旺盛。伐木公司的行为人人尽知，而公司会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广告宣传它们的植树农场，好像它们感兴趣的是更新资源，而不是破坏。

其他公司会在广告中表现快乐的员工。这通常是一些有严重劳工问题的公司所为。或者公司用广告说明它们是如何赞助社区计划的——日托、艺术、毒品教育、保存古迹——特别是在那些市民对公司的不负责任感到愤怒的社区。事实上，作为一个一般规律，公司倾向于大肆地广而告之那些它们所不具备的品质，目的只是为了减轻公众中的消极看法，当公司自称"我们关心"时，几乎总是为了呼应社会上普遍认为其漠不关心的观点。而它们实际上是不关心。它们又怎么会呢？公司没有感情或道德，全部都是为了利益。所有无私的姿态都是出于公共关系会带来利益的考虑，如果利益没有增加，这种无私的姿态就会被放弃。当埃克森石油公司意识到，其清除阿拉斯加海岸污染的举动并没有减轻公众对它石油泄漏事件的愤怒时，便抛弃所有自私的伪装，中止了这项工作。

资料来源：Jerry Mander，*In the Absence of the Sacred*（San Francisco，Sierra Club Books，1991）.

政府—公司联盟

在较早以前，大公司就乐意同一些政府保持紧密联系，包括麦金利和塔夫特政府，但它与政府真正的合作关系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形成。全球冲突产生的巨大需求促使了战时生产委员会的出现，它协调各个工业部门以满足战时需要。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扩展了自身的经济活动，以促进全面就业、低通货膨胀和持续经济增长。成功的企业领导人提供了大量熟练的管理者，去领导一些政府部门和机构。长期计划和商业动机（研究津贴、税收补助）等使政府和大公司的联系更加紧密，正如企业决策层所认识到的，他们最大的利益来自于保持同政府官员相互合作的有利氛围。

军工联合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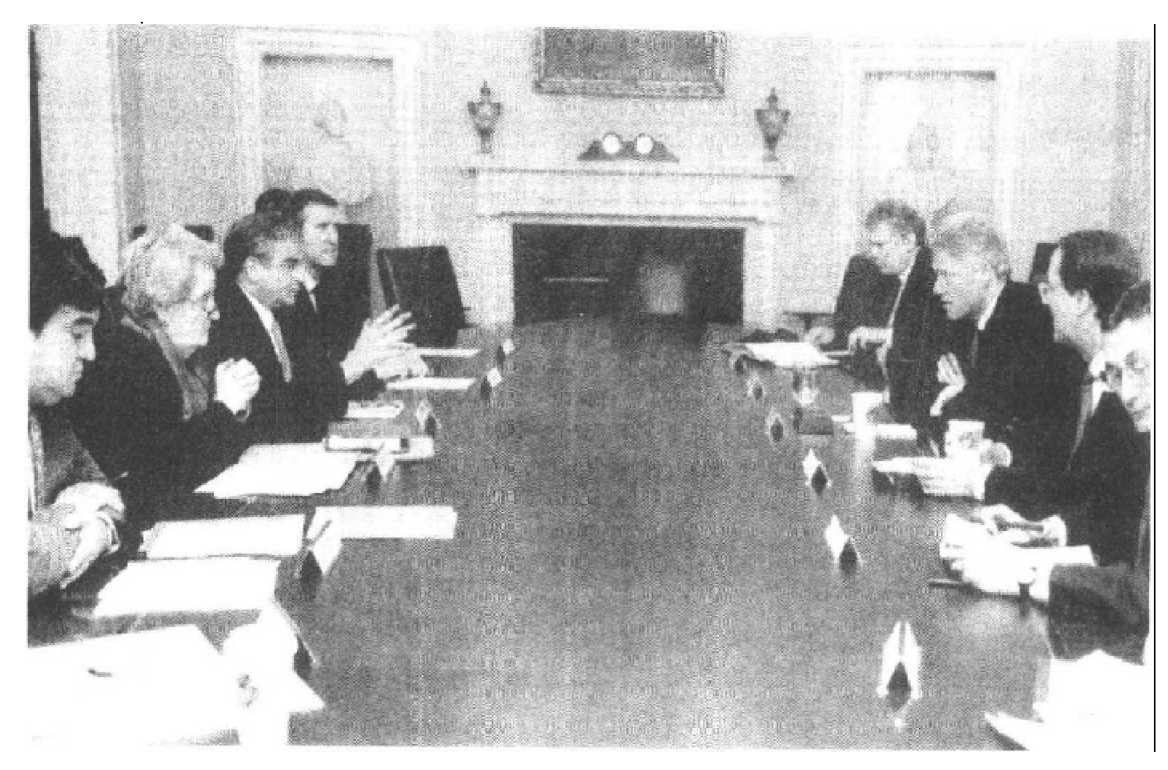
对政府—公司联盟研究最多、最具争议的一个领域是军费开支。到1961年，国防工业和政府的军事部门互相交织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其总统告别演说中警告它对国家的危险性：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还没有任何军备工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美国的犁铧制造者也可以根据需要制造刀剑。但现在我们已不能再冒险把这种紧急情况下的临时措施用于国防当中；我们已被迫建立起一个永久的巨大的军备工业……这种大型军事机构和军工企业的联合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其总的影响——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可以在每幢州议会大厦、联邦政府的每间办公室中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的迫切需要，然而我们不能不认识到它的严重影响。我们的辛勤劳动、资源和生存以及我们的社会结构都牵涉在内。在政府的会议中，我们必须警惕不应有的影响，无论是军工联合体有意还是无意施加的。权力错置潜在的灾难性影响现在存在，并将继续维持。[29]

这一常常被引用又被极大地忽视的警告，来自于一位职业军人、二战中的盟军最高总司令，又是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在他的政府里包括了许多公司总裁。这样一个背景使他的讲话更加具有预见性。但从1961年演说以后，相互交错的合作关系和政府官员支持武器系统的非正式影响变得更加显著。因此，**军工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要更为牢固。

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办公建筑五角大楼的国防部，雇用了近80万平民，占了整个联邦公务员总数的约27%。[30]五角大楼拥有比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或组织都多的财产，约3721亿美元。[31]由于每年国防开支中有2670亿美元要用于国防工业，五角大楼对经济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32]并非巧合的是，1991年以来进行的削减国防开支使得100万工人失业，造成对国防依赖最大的11家私营公司的就业人数下降了19%——从大约370万降至约270万。[33]

关于多少数量的国防开支才真正必要的问题依然争论不休。五角大楼的院外游说者出于国防承包公司或国防部本身的利益，劝说国会议员，使其相信加大预算支出极为关键。来自全球的有关侵略、颠覆、叛乱和镇压的报道也使公众相信，为了国家的生存有必要加大军费开支。然而批评者



比尔·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会见他的内阁成员，其中包括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尽管总统在挑选内阁人选时增加了更大的多样性，但他们大多数人还是如通常一样主要是些大公司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因此，冲突论者强调指出这是一种精英统治。

指责说，军费增加，更多的因素是受到寻求武器合约的公司的压力，而不是出于真正的战略需要，由此产生了由哪一种需求观点决定决策的问题。

浪费开支 纳税人金钱的浪费有几种原因。首先，国防部授予的80%的国防合同没有经过竞争投标——利润率常常要高出一般工业的平均水平。全国最大的100家公司垄断了这些合同，并将其转包给一些较小的公司，由它们更为快速、廉价地生产出产品，再由掌握合同的大公司将成品卖给政府，赚取实际的利润。例如，主要的承造商以153美元的价格从一个供应商那里购进如战斗机高度计等部件，然后以575美元的价格直接转卖给军方。[34]如果新政府直接从真正的制造商手中购买，可以为国家节约巨额资金。

另一个开支浪费的根源是允许**成本超出**（cost overrun）合同价格的做法。五角大楼允许这种成本超出大概是因为，在一项持续多年的计划中出现不可预料的生产成本上涨的情况。然而，账单上所列的额外数量提供支票担保的政策并没有鼓励供应商压低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在国防部研制采用新的武器系统或新型号飞机时，政府并不知道最终要花多少钱。在常常出现的成本超出计划的情况下，五角大楼必须削减定货数量，从而提高每件武器的实际成本。

浪费的另一重要因素在于政府军事部门和企业密切的关系。五角大楼有时未经充分评估就批准一项计划，如果产品没能达到性能标准，也不要求公司赔偿。而因主供应商无能而取消合同时，它却要给予补偿。在许多废弃计划的项目中，有价值15亿美元的B-70飞机，它质量极差，因此只制造了两架从未使用过的样机；价值6.798亿美元的纳瓦霍导弹；价值5.116亿美元的ANP核战机；价值3.304亿美元的“海上霸王”飞机及价值2.15亿美元的F-111飞机。

80年代末，在国会的压力下，五角大楼开始更加认真地识别和拒绝支付欺诈性的过高要价。当时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改革了国防部的进货体制以控制开支浪费。有证据显示，佩里的努力对消除欺诈性的过高要价和浪费的计划卓有成效，尽管成本超出限度的问题仍然存在。[35]

旋转门 公司和政府军事部门间人员如**旋转门**（revolving door）似的相互交换，说明了军工联合体的另一个方面。总统常常招募公司领导人担任政府官员。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防部长是通用汽车（它也生产武器军火）的前总裁查尔斯·威尔逊。他在听到自己的任命时声称：“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就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另一些例子包括，福特汽车公司前总裁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担任国防部长；主要军火承包商惠普公司的创建者和股票的主要持有者戴维·帕卡德，他是尼克松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里根政府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是一家名为贝克特尔的跨国建筑工程公司的前任公司执行官；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是一位投资银行家。

由于依赖于政府合同作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或是关系到立法和执法对行业的影响，大公司经常雇用前任的军方和政府官员来影响政府。他们利用其建立起来的关系，通过非正式的途径接触和影响居于决策地位的政府官员。反过来，无论是立法机构还是军方的决策者，也看到了自己在离开职位以后的有利前程：

> 这在过去常常被叫作“旋转门”，即华盛顿的知名人物在为政府服务和通过影响政府而发财之间进行交替的方式。的确，人们有时认为，允许他们以后赚钱，是使人才进入政府部门服务的惟一办法。今天，在政府部门服务这一部分逐渐被视为多余的……华盛顿一直在出卖关系或它的外表，自从它成为一片沼泽地时就如此。[36]

华盛顿的院外游说行业雇用了6.7万多人，是60年代中期的4倍，相当于平均125名游说者对一名议员，这还不包括那些住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郊区附近的游说者。[37]在他们中有100多位前政府部长、白宫助理和

议会议员。现在在与国防相关的企业工作的前五角大楼官员的总数可能要多3到4倍。大量人员占据着有影响的公司职位，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亲密的私人关系影响到政府追求公共利益和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及整个经济。而且，选举产生官员的任期限制造成了一个无意的后果是，他们由于对立法的程序和方法不够熟悉，而更多地依靠立法机构和那些保护特殊利益集团的老练的游说者。

跨国公司

从本世纪中期开始，一些大公司手中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从而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力量。这些**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跨越国界，在许多国家设立工厂和进行投资。由于不处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惟一的管理权威之下，这些巨型商业企业跨越许多国家的边界从事商业活动、追求利润。不过它们的决策可能是在几千里之外的一个董事会议室里做出的，却影响到了许多国家的内政外交以及它们的经济。

大部分跨国公司在美国注册，并逐渐成为了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



跨国公司的西方化影响了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在不同的文化中改变烹调的口味。如上图中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这家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现在，汉堡大王、肯德基等快餐连锁店几乎遍及世界各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公司也在世界范围里建立起瓶装饮料生产厂。

第三大经济体系，占了全世界经济生产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一些全球性公司如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主要的石油公司的年销售量超过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以及包括南非和瑞士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美国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每年海外的销售额合计超过了7000亿美元。业务遍及近100个国家的埃克森石油公司拥有一支油船队，其规模相当于整个英国海军。

国际影响

在获取最大利润这一目标的驱动下，跨国公司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落后国家设立它们的加工和生产设施。如分析家所注意到的，这在工业化国家造成了失业和外国产品的不断进口，而改善了贫困国家的工人状况。许多社会学家已经发现，东道国在最初的收益之后，由于只有上层和中产阶级在经济扩张中获得了实际的利益，经济的不平等事实上有所增加。工人仍然在为了生计而奔波，而且仅仅只能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40]

许多贫穷国家为了成为更加发达的社会，鼓励吸引外资。这些国家缺少跨国公司所拥有的财政资源，常常依赖于来自这些公司的税收，它占到了其政府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发现几乎不可能制定出会与跨国公司利益相冲突的政策规章，否则这些公司的离开将摧毁国家经济。

著名的体育运动鞋和服装生产商耐克公司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为了利用韩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获得更高的利润，耐克公司在80年代关闭了在美国的最后一家运动鞋工厂。然而，在80年代末，韩国工人获得了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因此耐克再次将工厂搬到了更加贫困的东道国（印度尼西亚、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台湾）。耐克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制鞋女工所获得的低廉工资仍使她们处于贫困之中（她们一般都住在没有电和自来水的棚屋中）。而同时，公司的利润一年比一年突破新的记录。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一双在美国卖80美元的耐克鞋所需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约12美分。[41]

再回到北美，另一项牵涉到跨国公司和美国工人的最新发展是颇具争议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3年，国会不顾工会工人有组织的反对，在跨国公司的极力推动下批准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消费者代表拉尔夫·纳德尔指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以损害整个北美的劳动力、卫生、安全和环境标准为代价，使跨国公司从中渔利。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认为，这一协定将在10年内使美国失去50多万个就业岗位，让位于工资更低的墨西哥工人，以及使其他美国工人的年工资平均损

失1000美元。支持者则主张，通过开放关税自由的市场，这一协定将在整个地区增加就业和促进繁荣。争论持续到1997年，国会听证会决定是否将自由贸易协定推广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制造商和工会都引用了大量统计数字来证明各自截然相反的立场。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议。[42]

尽管要预测美国工人将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上获益还是受损尚为时过早，但我们已经可以通过一些经济指标了解跨国公司的受益情况。包括福特汽车、通用汽车、美国无线电公司和西屋电器公司等在内，超过1000家美国公司在墨西哥北部开设工厂，并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墨西哥工人。人们也许会说，这些工作有助于墨西哥经济、从而减少合法和非法的移民流入美国。然而，工资极低（墨西哥人每小时约为2美元，而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为15和16美元），每年仍有许多墨西哥工人朝北来到美国，用他们在国内获得的技术寻找更高的收入。而且，墨西哥政府一向在卫生、安全和污染法规的执行上极为不力。所以，跨国公司不仅从支付低廉的工资中获益，而且无须像在美国那样为满足环境标准而支付额外的费用。[43]

在美国大公司工作

工作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中心，消耗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我们的社会地位主要依赖于我们的职业，它又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是谁，是什么。在像我们这样一个强调敬业精神的社会，工作提供了一种有用、满足和自尊的感觉。通过工作我们认识其他人并建立友谊。许多人的身份和自我形象完全是在工作中形成的，因此失业或退休不仅导致收入的损失，而且还失去了自我界定和社会位置。

因为工作支配着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并对社会福利极为重要，所以同工作有关的社会问题更加引起我们的关心。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考察问题的3个领域：变化的劳动力队伍、失业和就业不足及职业满足感。

职业趋势

从5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次大的调整。正如工业化在几代人以前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一样，目前的趋势显著地影响着我们如何谋生，谁工作，谁失业。人口模式的变化、高科技和经济全球化对劳动力队伍的结构和收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妇女角色的价值变换把空前数

量的妇女带进了工作场所，占据了原先一度主要为男人所控制的工作。

信息部门的兴起 1956年，美国成为第一个有半数劳动力从事服务或第三产业（tertiary occupation）而不是基础产业（农业、渔业、林业和矿业）或第二产业（加工制造业）的国家。大部分第三产业的工作是白领职位——文员、管理、研究或专业技术人员——但其种类也包括保养和维修业。自此以后，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44]

现在，产品的实际种植、开采和制造行业占了全国劳动力总数的不到四分之一，剩下四分之三的美国工人受雇于服务行业。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的58%集中在信息部门，而且这一比例每年都在增加。[45]

虽然信息一直是人类组织的基础，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知识异常丰富的社会。因为信息易于传播、共享和扩散，所以它在运用中不断推广。新工业通过提供信息服务，充分利用这一事实。例如，计算机软件公司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要数倍于计算机硬件公司。[46]同样，咨询、保健和人事服务、投资、公共关系、研究、系统分析和电讯都是发展迅速的领域。[47]

工业时代以人对物的力量为特征，包括自然和物质的东西。新的信息时代强调人类日益增长的思维和组织能力。科技将继续代替人类从事常规和重复的工作。明天的职业将要求越来越多的脑力劳动和工作技能，特别是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因为这些事情是机器所无法完成的。

高科技的影响 我们生活在快速变化的科技时代，电子技术不断使许多传统工作方式过时淘汰。计算机技术直接影响着我们全部的生活，无论是在银行、超级市场、百货商店，还是在家或在工作中。一些分析家就计算机在我们的交流、生活、游戏和工作方式等方面引起的变化，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主要变化进行了比较。[48]过去20年里的变化早就以许多方式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它们仅仅代表了即将到来的诸多变化中的一小部分。计算机型号和程序更新换代很快，我们也在尽力赶上它的变化速度：

> 我们现在有计算机操作的微型打印机，每分钟能打印1万到2万行，是人们阅读速度的200倍，而这还是计算机系统最缓慢的部分。在近20年内，计算机科学家已由按照毫秒（千分之一秒）显示发展到了毫微秒（十亿分之一秒），时间的压缩几乎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就好像一个人一生的工作时间，按每年2000小时、一共40年计算，总计为8万小时，可以被压缩成仅仅4.8分钟。[49]

尽管在美国，计算机化使生产率从1979年到1992年间增加了35%，但它使从事制造业的美国人的比例从1950年的33%下降到1995年的17%，反映了在这段时期每年有超过200万个工作消失。美国工人寻找工作的领域也在继续变化。一个重要的趋势是趋向家庭办公，或者是一个私人企业，或者是作为一家大公司的外部承包人。[50]

无论是银行、百货商店、保险公司，还是小企业、服务和制造业，它们继续投资购买计算机和电子设备以压缩成本和提高效率。对大部分职业，计算机能力都是最基本的，从教学和社会工作到销售和公司管理。

不过，计算机时代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工作的满足，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今天许多工作都要求不同的技能，但在能力水平上不一定有变化。在1966年，一份重要的商业杂志《财富》的编辑就注意到，计算机仅仅需要“一种不同形式的机械劳动，但它仍然是机械劳动”。[51]许多办公室中计算机工作是低收入的、单调的和没有前途的。

职业妇女的增加 由于经济需要，或是为了找到一份有意义、收入高的工作，妇女以不断增加的比例继续进入到劳动力队伍中。她们常常选择商业和专业领域相对赚钱的工作。在1996年，76%年龄在25到44岁的成年妇女有工作。到2005年，根据劳动统计局的估计，这个数字将增加到79%。[52]

妇女受到的教育越多，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大约82%拥有大学学位的妇女参加工作，而在受到高中教育和未完成中学教育的妇女中，这一比例分别是70%和46%。[53]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出现在劳动力队伍中，正在提高妇女同男子的工资比例和妇女在过去由男人控制的一些职业中的代表性（参见第10章）。

失业与不充分就业

失业无疑是任何社会劳动结构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经济学家研究失业率，并分析它们在收入损失、生产和消费降低、政府救济开支等方面对经济的影响。社会学家通过年龄、种族、性别和职业，考察失业与不同群体的相互关系，以及长期失业对人们行为和自尊的影响。因此，失业不仅反映了经济的低迷和被淘汰职业的比例，而且还反映了社会制度的不平等，人口的某些部分受到巨大冲击，它还会导致许多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虽然美国社会从来没有实现完全就业，但其经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任何时期中的失业率所揭示。上下每0.1%的变化都意味着，10万多户家庭要么改善了其经济和社会地位，要么变得更为贫困，因此它是一个重

要的晴雨表。为什么人们会失业？原因很多且有变化，我们可以提出4个主要原因。

人口分布的受害者 有时候人们失业是由于人口的趋势。例如，阳光地带城市大量的经济和人口增长，迫使许多多雪地带城市的工人搬到这些地方谋生。他们走后留下的不仅是停产的工厂和削减的城镇人口，而且还有存在于其他行业中的普遍的经济萧条——包括商店、酒吧、餐馆、饭店和休闲娱乐场所——它们都依靠于第一和第二产业工人的光顾。

除了有大量移民进入的地区，出生率的下降也负面地影响到教育工作的数量以及儿童玩具、游戏、家具和服装的生产与销售。有时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会结束人们的职业。这些例子也许包括，低收入的人们来到一个街区取代了退出的中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雅皮士在一个城市上流社区取代低收入居民。依赖于原来居民购物习惯和品味的商店不能再继续吸引新来者，就会很快地关门大吉。

经济的受害者 旧的经济体系让位给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网络经济、大型兼并的继续和地球村的出现，这3种经济趋势的出现启动了一个对中产阶级具有破坏性的商业模式：公司**裁员**（downsizing）。

受到快速的技术变革、国内外的激烈竞争、承包工作所带来的轻松以及急功近利的投资者的压力等驱使，公司正在将其劳动力削减到最低限度——可以推断出，在将来，一个更为吝啬的类型将是更加有效的和经济的。公司削减开支的另一个方式是雇用临时工取代长期的员工，从而避免了支付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养老救济金。公司兼并的另一个影响是使那些被吞并公司中的许多中高级管理职位被废弃，迫使那些把毕生事业投入到一家公司的有才能的人被迫离开。这些失业对家庭有着严重的影响，并对城市稳定、自愿捐助和社会不满产生广泛的影响：

> 这有力地说明，全国最大的雇主是每年出租76.7万替代工人的人力公司，而不是通用汽车。大学教育可以给予人们帮助，但无法提供确实的保障。从大萧条以来，受过良好教育、担任中层管理职位、主要为白人的中产阶级，现在第一次遭受到过去主要是没有技术的穷人所遇到的长期职业危机，并带来了许多心理上的后果：受创后的紧张不适、自尊崩溃、容易发怒、由于压力造成的婚姻破裂、不知所措的孩子。虽然他们遭受了同样的不幸，但这并未使他们同情穷人。恰恰相反，还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怨恨之情，认为他们交纳的大量税收被用到了使那些穷人受益的社会计划中。[54]

裁员的社会代价——它夺走个人尊严、破坏家庭、毁坏社区、毒害工

作场所（甚至是那些幸存下来的工人）和促使人们寻找心理上的替罪羊（移民、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政府、大公司）——严重困扰着我们的政策。社会学家指出了另一个潜在后果：严酷的新的劳动力竞争使得幸存的劳动者因为太忙太累而不再投入任何志愿活动，而长期失业的人们也退出了市民生活。裁员使社区四分五裂，童子军没有了组织指挥他们的成年人，扶轮国际和基瓦尼斯俱乐部以及教堂失去了热心的成员。一度被托克维尔视为美国民主基石的市民协会的紧密网络，在人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土崩瓦解了。[55]

另一方面，某些职业对经济中哪怕极微小的变化都显得极为脆弱敏感。当一种产品的需求降低，生产线上的工人立刻被管理者看作是压缩成本措施的一个重点。因为他们的工资在公司账目中被视为是一项"变量"开支，而管理者的薪金则是"固定的"。同样，如果产品遭受损失，所有的供应商、分销商和零售商都是可以牺牲的。在一个有着高利润率的紧缩的经济中，个人和企业都不是很愿意新建住房、办公楼或厂房，因此建筑工人及其供应商就会发现自己工作和收入减少。相应地，那些将生计依赖于人们休闲娱乐活动的职业，比如旅行社、剧院、海滩或滑雪度假地、饭店及电子商店等，也会发现因顾客减少而收入不足。不利的经济形势直接影响到生产工人，也会在服务行业引起连锁反应。

教育的受害者　高中以后的教育或培训对能否得到一份收入尚可的工作至关重要。那些没能在高中毕业后继续受教育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职业自杀。然而有太多的年轻人过早地离开学校——其中贫困的少数民族成员的比例尤其惊人（参见第6章）。除非他们重新开始接受教育，他们的未来可能只会是有限的就业机会和收入。

即使是高中毕业生也面临寻找工作或保持职业稳定的艰难奋斗。随着就业市场要求人们有更高的技术、判断力和分析能力，高中毕业后缺少教育或培训的人常常发现许多职业的大门对他们紧紧关闭着。一个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失业的可能就越小（参见表11.1）。

表11.1　不同性别、种族和教育成就的人中的失业率：1996年

教育	男性	女性	白人	黑人	拉美裔
高中：1～3年	11.0	10.7	10.2	15.3	12.3
4年	6.4	4.4	4.6	10.8	7.3
大学：1～3年	4.5	3.8	3.7	6.9	5.7
4年	2.3	2.1	2.1	3.3	4.0

资料来源：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657, p. 420.

科技的受害者 200年前创造职业的条件——大规模生产和大型组织——正在日渐消失。现代科技使得企业的生产线自动操作生产，原先在此进行重复劳动的工人被迫离开了生产线。过去提供大部分较好就业岗位的大公司将生产活动分割转包给了一些小公司。这些小公司创造或接管了那些有利润的职业。同样的技术也使大公司可以使用更少的中层管理人员进行文案工作。[56]

计算机、激光、光导纤维、机器人技术、生物工程等新的技术极大地改变了工作场所，创造出新的职业并消灭了旧的职业。在农业、工业和办公室等所有领域，科技减少了许多工作机会。这些消失的工作不仅出现在技术不多的蓝领工人之中。科技使许多大公司的工作得到简化并更有效率，从而淘汰了许多中产阶级的职业。例如，劳工部预计在1994年至2005年间，下列职业将出现减少：结账、输入和计算等机器的操作将减少67%；计算机操作者将减少38%；银行出纳员将减少27%。[57]被取代的蓝领和白领工人如果能在经济中重新找到工作，其收入也会减少很多。

由于科技在经济中造成了结构性的变化，产生的新职业可以归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大约20%的新工作有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和声望。不幸的是，近80%的新工作都是低收入、低声望和没有前途的职业，提供的只是单调的劳动和极少的个人满足。中档的职业越来越少，使得升迁和向上流动攀升的机会也更少。我们将看到一个层次极为鲜明的劳动力市场，包括了一小部分精英组成的管理或专业群体和大量劳碌的“工蜂”（占全部劳动者的五分之四以上），后者所得的工资要低于平均水平。[58]

全球经济正处于像工业革命一样的重大变化之中。伴随着商品生产和服务中的不断自动化，我们正处在从“大规模劳动”向高技术的“精英劳动”转化的初级阶段。精密复杂的计算机、机器人、电子通讯和其他信息时代的技术几乎正在各个领域取代人类。仅在美国，整个1.24亿劳动力队伍中有9000万可能会被自动化生产所取代。[59]

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是一些职业消失和新的低收入工作产生以后出现的另一个后果。许多人除了接受一些低挑战性和经济报酬少的工作外，没有更多的选择，但按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经验完全适于从事更好的职业。大学毕业生成了商店营业员或客户服务代表，中层经理成了销售代表，工厂工头做了修理工，等等。这些工作有一定的收入，但常常不能使有良好教育和较高动力的雇员感到满意。

长期失业的影响 失业对劳动者来说，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困难。失业造成的情绪混乱产生了社会和心理的影响，影响到整个家庭。离开了同事的友情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刚刚失业的人必须应付这一中断

和经济的紧张。即使工厂的停工倒闭或失业显然完全超出他们自己的控制之外，人们还是倾向于为失去工作而指责自己，会产生无助、不够格、没有方向和消沉等各种情绪。

随着没有工作的日子越来越长，个人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从最初的冷淡、厌烦、困窘、绝望、脾气暴躁，那些失望的工人或许就会慢慢地陷入酗酒、虐待孩子或配偶，甚至企图自杀。妻子有时会变得歇斯底里。孩子则会从严酷的现实中寻找某种逃避的方式。例如在一个寻求咨询的失业的钢铁工人家庭中，他们的孩子不再说话了。[60]

残存的人们漂浮在一片绝望的海洋中，长期失业者无法寻找到就业的彼岸。他们和社会一样对工作极为重视，但却找不到工作。由于无法每天面对残酷的现实，这种矛盾一点一点地在侵蚀着他们的生命。一个钢铁工人在被解雇后，在床上躺了整整9天。[61]另一个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睡觉的失业工人则说道："当你睡着时，就不会有任何痛苦了。"[62]

一位研究者发现，在经济低迷时期精神病院的人数上升，而在经济增长时人数就会下降。同样，对自杀的研究也显示了这种同经济变化的反比关系。[63]其他研究也发现，在失业工人中精神迷茫非常普遍，包括因为无须再严格遵守时间，他们一般都避免戴手表。[64]失业者中精神病的各种症状在第四个月时非常显著，而此时他们的妻子也表现出抑郁、焦虑和恐惧。[65]

大部分关于长期失业造成的感情和社会影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都相当一致。头痛、高血压、饮食过度和酗酒都很常见。不够格、无能、没有价值和消沉的情绪也很普遍。在一项对失业的白领工人和专业人员的研究中，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大学毕业生，而且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失业。人们发现，在他们重新找到工作以后，其态度还是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66]在失业期间丧失了大部分自尊心的人，会感到被社会所疏远，觉得自己并不重要，仅仅是一些统计数字，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家中也可以被轻易代替。重新工作以后，他们并不能完全地恢复自尊心，对他人和政治制度及其他社会机制继续持有一种深刻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失业给他们造成的精神创伤引起了社会的变化，在问题被解决以后仍要持续很长时间。

职业满足感

早期社会学理论的3个主要开创者——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都对工人中不断的异化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涂尔干认为，劳动的不断分工及其造成的专门化把工人带入一种**失范**（anomie）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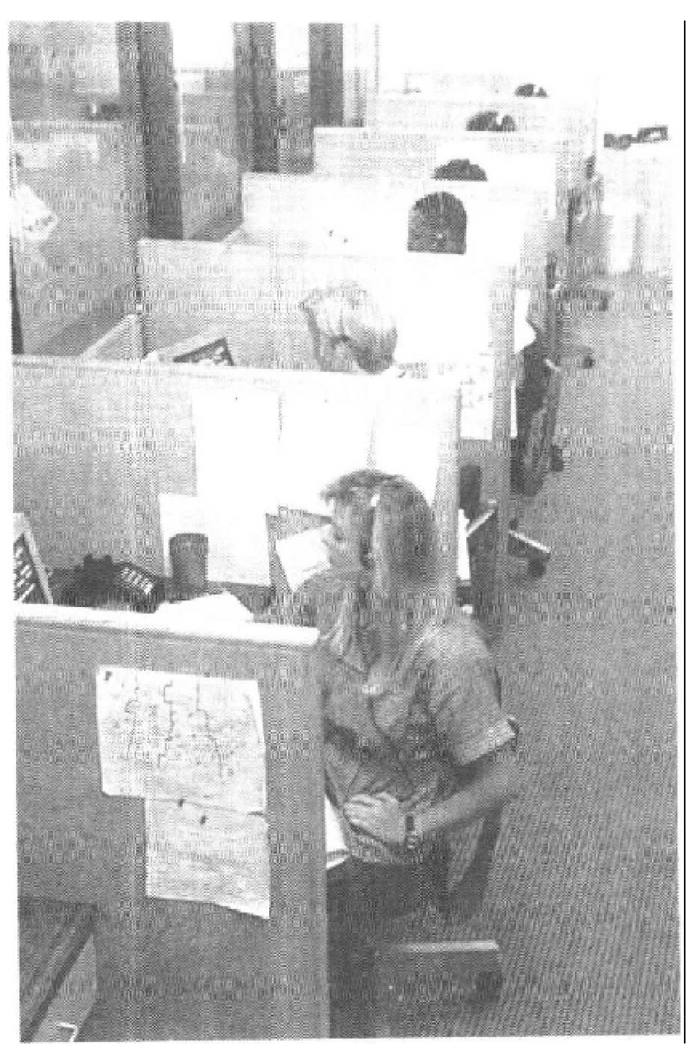
或是丧失了方向，因为他们有限的工作责任不再提供个人实现的机会。韦伯则深入到官僚组织的非人性的固有特性寻找答案。马克思详细地论述了严格的生产要求和劳动的商品化带给工人的**异化**（alienation）——一种无能为力、孤立和无意义的感觉。通过不同的途径，这几位社会学思想的开创者都认为，劳动正在变成一种强制性的活动，而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或使人满足的活动。

职业满足感的特征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注意到，人类的需求存在着先后次序。当最直接的需要满足以后，下一个层面的需求就变得更加迫切，直到它也得到实现，接下来的新的未实现的需求才更为突出。马斯洛认为在这一**需求等级**（hierarchy of needs）中，首先是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其次是安全和保障感；再次是对友谊和爱情的需要；第四是自尊和得到别人尊重的要求；第五是自我实现的需要。[67]我们的富足社会使大多数美国人得以满足前面三种需要，但其大规模的组织结构常常阻碍了第四和第五种需要的实现。除了那些处于声望较高的岗位的人，工作无法满足工人更高的需要，反过来造成了对工作的不满和向别处去寻求实现这些需要（家庭、教会、俱乐部、休闲等）。

弗雷德里克·赫兹伯格采用另一种途径，也得到了同马斯洛相似的结论。他不是罗列一系列需求层次，而是提出，**内在**（intrinsic）和**外在**（extrinsic）因素均影响职业满足感。收入、管理和工作条件都属于外在因素，而个人的成就感、责任感和挑战性都是典型的内在因素。[68]如果我们工作的内在特性阻碍我们潜能的实现，那么，无论外在因素看来是如何有效，都无法根除对工作的不满意。

弹性时间的价值 最近的研究说明，对白领工作的不满反映了新一代受过更良好教育的人们工作态度取向的变化。丹尼尔·扬科洛维奇将其称为“新生代”。他们对个性、独立和休闲活动的重视同对工作福利的传统态度差不多。[69]因此，他们对工作的投入较少，对雇主也并不太忠诚，但如果灵活或有利的工作时间安排允许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他们还是愿意继续从事那些不喜欢的工作。[70]由于更好的教育和更高的期待，专业人员更重视工作中的满足，因而对工作条件的异化也更加敏感。[71]

电子自动化的一个社会后果就是**弹性时间**（flex time），允许工人在先决条件的限制下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由于信息可以储存和随时检索，因此无需所有雇员同时开始和结束工作。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财富》杂志评出的500家大公司中，80家公司的全部240万雇员，有四分之一使用弹性时间。[72]个人化的工作时间安排给了个人更多的自由，而又不干扰他人的工作。因此，许多雇主表示，它提高了生产力并减少了旷工现象。[73]



大量的白领工作都是非常忙碌的，其中许多要求长时间使用计算机。这些毫无兴趣、日常琐碎的职位将雇员限制在一台计算机的工作间里，整天干着单调乏味的工作可能导致工作异化——由于这类活动的限制性要求带来的无能和孤立的感觉。

职业健康和安全

对同工作密切相关的健康问题的关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和罗马时代。那里的矿工、金属工匠和石棉布编织工中间，肺病的发生概率非常高。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代，医生常常要同某些行业中出现的特殊疾病作斗争。工业革命又带来了新的职业危害——通风不畅、手脚易被机器齿轮轧伤、有毒气体和有害微粒等，工会组织为了克服这些问题而进行了大量的斗争。[74]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进步，但在其他领域，即使到今天情况仍然非常严峻。

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到1994年，重大工伤事故下降到约5300起，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数字。但是，在工作中导致残疾的工人数量是360万，连续第六年超过了60、70和80年代的年致残人数，且超出的幅度达100多万。[75]因这些伤害事件共损失了6.42亿个工作日，是1970年以来第二个最高数字。[76]同样，危险较高的工种数量大大减少，意味着产业工人严重受伤的比例有所增加。

另一个严重的职业危害，是同工作有关的疾病问题及长期暴露在可疑毒素和致癌物质所产生的退化和致命影响，这要求采取预防措施而非事故治疗。有些物质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负面影响，而有些则会潜伏多年才会显示出致命影响。于是产生了许多争论，究竟只是这些化学物质有责任，还是遗传、生活方式或生活经历等其他因素也会造成一定的可能。比如，暴露于毒气或原子弹辐射的海湾战争、越南战争和二战的老兵，他们在很长时间里都面临着困难，那就是如何向政府证明，其在战争期间接触有毒物质与日后的癌症高发病率及其他健康问题之间存在联系。

政府的规定

许多职业造成的疾病，如肺部、血液、神经系统或其他器官的损伤，只有经过多年长期暴露于有害物质之中才会发生。为预防暴露在这些有害物质之下，政府必须实施现场检查，分析工作中使用的化学产品。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对新的化学制品管理法规，违反安全措施才会被引用法律加以惩罚。不幸的是，这一工作范围之大，使得管理和控制都很困难。

由于有500多万个工作场所需要检查，而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署只有1200名检查员，它需要用265年时间才能对全国的各家工厂进行一次检查。[77]另一个管理的问题涉及到要对各种化学物质逐一进行分析，现在工厂中使用着5万种已知的化学混合物，全部进行分析需要100年，而每20分钟就会有一种新的化合物出现。[78]预算紧缩、人员裁减以及对健康和安全管理的联邦执法力度薄弱，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作用。许多州现在实施它们自己的安全检查工作，但也因为人员和预算不足无法完全有效地加以落实。

即使当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署成功地对违反健康和安全标准者做出了处罚，但工厂常常宁愿支付相对较少的罚款，也不愿意花费更大代价更新设备或是改建工厂以纠正问题。偶尔，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署会因处以大量罚款而成为头条新闻。例如，1994年4月，它宣布对通用汽车公司罚款194万美元。[79]1996年，又以工作危险造成工人死亡为由，对伯利恒钢

铁公司罚款13.35万美元。[80]更近的例子是1997年，在对卢肯斯钢铁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休斯顿市的工厂造成一人受伤的爆炸事件的调查后，卢肯斯公司同意交纳23.75万美元的罚金。[81]然而更为经常的是，这些罚款实际上微不足道，例如1997年对纽波特市的纽斯造船公司的罚款。由于公司没能提供充分的培训，从而造成一起3名雇员死亡的事故，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署对半岛上的这家大造船厂罚款6300美元。[82]

危害健康的职业

所有的职业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压力、风险和与工作相关的疾病，即便是白领和专业技术工作。例如在长期暴露于电子显示器终端的怀孕妇女中，流产和胎儿体重过轻的发生率要高于普通人。[83]不过，蓝领工人遇到的健康风险更大，因为在矿山、农场、工厂中到处都有危险。许多工作场所较之以往已经干净了许多，但仍然有新的有害物质。

矿工和采石工人　由于有十万分之三十的高死亡率，这一行业成为全国最危险的职业。[84]这一统计数字中不仅反映了矿井塌陷、爆炸、漫灌等事故的直接死亡，还包括受到工作中的环境影响感染呼吸道疾病造成的慢性死亡。煤矿是最致命的职业，死亡率为十万分之三十八，大部分是死于黑肺病。它由长期呼吸煤尘引起，于1813年被发现。这一难以治愈的肺病损伤肺部组织，使其丧失功能。矿工逐渐丧失工作能力，接着出现呼吸困难，最终导致死亡。根据国家科学院的研究，利用通风设备控制煤尘的技术已存在多年。然而，1969年煤矿安全法案所限定的最高煤尘标准的执法管理不力，妨碍了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改善。而且，1981年的黑肺病救济金法实际上使得证明这一疾病的原因更加困难，并将之作为获得医疗救济金的一个先决条件。据医疗专家称，最为令人不安的是，黑肺病是可以预防的，但煤矿公司却忽视或破坏了法律，没有在矿井中减少煤尘的数量。[85]

另一种呼吸器官疾病是硅肺病。它是由于在矿井、采石场和铸造厂中，或是在大楼、桥梁、油箱和其他物体表面去除油漆或铁锈的过程中，或是在建筑过程中过量接触二氧化硅粉尘造成的。虽然有控制粉尘的技术，但并没有被有效地运用到各个场合。许多职业保健医生呼吁，在研磨爆破中禁止使用硅砂，就像英国在1949年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在1966年所采取的措施一样，但在美国却至今未见行动。[86]

硅肺病仍然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感染这一疾病的钢铁工人数量的上升就说明了这一点。硅肺病发病率在钢铁业中迅速上升，引起了医疗官员

的担心。全国职业健康与安全学会估计，至少有10万名工人在建筑、采矿和其他“粉尘行业”都有很高的过量接触二氧化硅粉尘的危险。从1996年8月至1997年3月，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署对硅危害进行了303次检查，在建筑、海运和制造业发现了近750起违规行为。其中30%的情况中，工人过度暴露于二氧化硅的威胁之中。[87]

农业工人 农业工人在劳动力总数中的比例不到3%，但在1995年，其死亡率是十万分之二十四，占了全国职业死亡的15%。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有机粉尘中毒综合症危害的不断加大。这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源于接触了过量集中的被微生物污染的有机粉尘，这在农业工人中极为常见。[88]另一个难逃其咎的原因是大范围播撒除草剂和杀虫剂。农业工人居住的小屋和工作的田野附近就播撒着这些化学品，而他们之中有25%还是儿童。他们在工作中接触到了残留在植物上或是弥漫于周围空气中的化学残余物，并造成发痒、流鼻血、恶心和腹泻。没有人能确定它的长期影响，但农业工人的寿命要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纺织工人 在纺织厂和棉籽油厂，棉纱粉尘会导致一种被称为棉尘肺的无法康复和致命的呼吸系统疾病，更通常的一个叫法是灰肺病。尽管早在18世纪就有对这种病的诊断，而且英国在1941年已开始了对其造成的伤残进行补偿的计划，但美国工业界直到1968年才承认了这种疾病的存在。[89]在这以前，那些工厂城镇里为公司服务的医生只是简单地把它当作肺气肿来治疗。8年以后，工会通过院外游说活动终于使一个最低标准得以确立，但一直到1983年才成为成文法规被强制执行。今天，灰肺病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1994年对纺织工人死亡率模式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在所有种族和性别群体中，他们得肺癌和肺尘症的危险非常之大。[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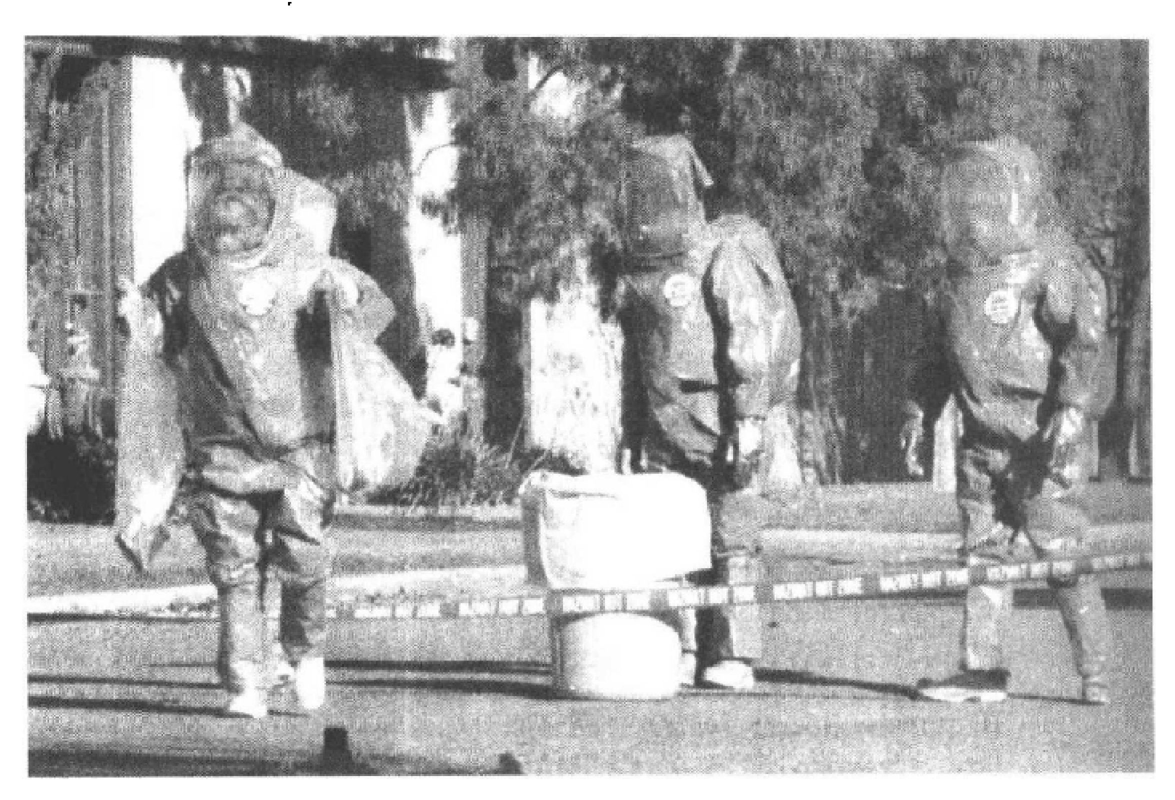
石棉工人 在其被广泛使用的最初几十年里，石棉造成的健康问题并不为人所知。制造商将石棉的防火矿物纤维利用到各种产品中，包括消防员手套、剧场幕布、天花板的瓷砖、瓦片及绝缘管线等。现在我们知道，吸入这些微小颗粒会导致一种非常罕见的肺癌。医生预计，在过去大量接触石棉的100万工人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将在以后30年里死于与石棉相关的癌症。[91]而且不仅只有工人受到影响。由学校屋顶掉落或沾在工人衣物上的石棉微粒，经家庭主妇之手同家中其他衣物混洗，会在整个家庭扩散。在了解了它的危害后，检查者要求由穿着特制的抵抗其致癌作用的防护服的工人，对大量建筑中的石棉天花板和管线予以拆除。

化工工人 化学合成制品事实上在各个消费领域都主宰了人们的生活。用于制造各种各样产品的化学品也制造了两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毒

化学废料场（参见第14章）和对合成工厂工人的健康危害。政府研究发现，在那些生产和处理诸如苯、丙烯腈、铍、氧化乙烯和氯化乙烯等致癌化学品的工人中，有很高的恶性肿瘤发病率。目前生活中大量的合成有机化学制品，由于尚未被全国职业健康与安全学会鉴别出，或是对其长期影响不了解，将会产生一个存在潜在危险的工作环境，影响到千百万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大量研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92]

社会学视角

各种理论都对大公司的权力和劳动问题提出了一种分析体系。它们常常集中于人口和科技变化对劳动的社会组织的影响，以及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有些工作中的危险是明显可见的。上图中这支危险物质处理小组正在从1997年加利福尼亚一家工厂的有毒化学品泄漏事故现场撤出。而在其他一些职业，不论是田野、工厂，还是矿山、谋场，虽然没有明显的危险，但却会对许多工人的健康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超过1000多万工人的工作场所暴露在已知的致癌物质之下。

功能主义观点

在功能主义看来，劳动是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在理想状态下，存在一种社会的平衡，不同技术的工人均衡地补充着劳动队伍，而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也吸纳了日益增长的人口。但在现实中，一个工业社会特别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科技变化，及诸如石油价格迅速上涨或是由于其他国家的人民暴动造成原材料减少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冲击。突如其来的变化常常导致国家经济的功能障碍，给整个社会机制造成连锁反应（失业、银行破产、异化、社会动荡、甚至暴力活动）。根据这种观点，社会机制不能快速适应社会的变化，就导致了这些问题的产生。

功能主义者认为，我们目前的问题是由于急剧的经济和社会变动使整个机制失去了平衡。大公司和强有力的工会的出现以及政府加大对经济的干预，彻底改变了自由企业制度。此外，在旧问题被解决之前，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快速变化又产生了另外的问题。随着公司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强大，对它们的社会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经济的功能障碍 在过去100年里，大公司的发展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为社会提供了大量资金和为维持大规模经济增长提供广泛的专业知识。与此同时，它们的发展也会造成功能障碍，造成了现在这种一小部分公司控制了全国和世界经济、但又不对公众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由于经济体制与其他社会机制之间缺乏协作，经济制度因而无法平稳地发挥作用。而且，社会控制机制已不能做到监控和阻止不当及非法的公司行为。

由于大型组织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我们经常提到的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实际上业已失去。同样，在这些控制着巨大财力的强大团体可以作为一个集团追求任何目标，而大部分个人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人们珍视的平等的价值观也被破坏了。当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与其社会机制之间不相融合时，其规范的完整性——它是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而需要加以调整。

人口的功能障碍 **人口统计**（demography）的研究显示，美国社会年龄结构的变化造成了劳动问题。例如，大量依靠儿童的行业（服装、玩具、家具、游戏和学校）在二战后的生育高峰期间非常兴旺。但随着生育高峰减退和出生率的急剧下降，这些行业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许多城镇关闭学校或是合并学校区，教育方面的工作空缺实际上已经没有了。随着人口的平均年龄趋向老年化，退休工人比例的增加（相对于劳动者），造成社会保障和医疗救济的资金困难。

科技的功能障碍 从长远来看，像计算机和机器人等技术革新最终会产生新的就业机会，诸如制造、保养、维修、编制程序和其他服务。然而，在短期，它们替代了技术过时的工人，使其紧张、焦虑、艰难和贫困。那些消亡了的职业的失业工人如果想要过上体面像样的生活，就必须改行取得新的技能，许多人必须迁移到其他地区以获得工作。依赖于这些顾客的零售商业及依赖于他们的税收收入的各级政府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流逝，能够自行调节的社会机制将重新取得平衡。一个例子就是新汉普郡市的纳什尔镇。50年代，这个有着6.8万人口的小镇由于当地纺织厂的南迁，造成整个地区经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不景气。今天，由于许多高科技公司和国防电子技术承包商集中到这里，其失业率只有3%。然而这一经济复苏用了30年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工人遭受到很大的苦难。

冲突论观点

对经济政治权力和竞争的利益集团的研究，为冲突论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因为对有限资源的争夺正是这一观点的中心。它认为，社会中存在无数团体，它们不断斗争以获得优势。当那些成功地积累了权力的群体开始在损害社会其他部分的情况下扩展自身利益时，社会问题便产生了。在冲突论者看来，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是理解同劳动有关的社会问题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强大的公司利益对国家的政策和经济施加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利润，雇主和管理人员运用他们的权力去达到这一目的，并且通常是以牺牲弱小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

经济的不平等 工商业中的大型公司和企业集团已经获得极大的权力，以至于控制了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大部分领域。当它们为了自身利益而行动时——尤其是，如果它们与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集团结成同盟时——要想限制它们就极为困难。因此，其滥用权力的危险就非常现实。大公司还通过广泛的媒体运作改变公众舆论，并在老百姓中形成一种错误的意识。一个例证是1994年美国健康保险协会的“哈里和路易斯”电视广告攻势，它试图操纵媒体影响医疗改革的结果。通过制造对政府官僚机构的担忧和（相反地）减少对大公司控制医疗保健的担忧，它有效地破坏了立法提案。[93]

根据这一观点，构成或代表了精英阶层的雇主对工人的剥削，是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工会通过有组织的团结在一些领域保护工人，但管理层将工厂搬迁到没有工会组织的阳光地带或到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外，或是通过宣

布破产的策略破坏工会，而后以新的名字重新组建，从而继续剥削工人。

冲突论者认为，权力少的人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害也最重，这一切都不是巧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注定了缺少权力的人只能为了有限的资源如就业和收入而展开竞争。有些人甚至提出，富有者赞成一定程度的失业，因为这样可以控制工资要求、牢骚和旷工，同时提高工人的生产率。[94]

异化 这种观点用雇主和工人的利益冲突来解释异化和工人不满意的问题。工业化使人同他们生产的产品相分离，工厂工人的可互换性代替了劳动的意义和个人手艺内在的满足感。因而劳动分工将工作任务分解为诸多环节，分配给没有个性的、得不到满足的工人。无论是在工厂还是（更有可能）从事白领工作，劳资双方的目标指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在今天的许多工作中，内在的满意被摒弃，工人从事着枯燥、重复、不满意和贬低人格的劳动，因而他们难以在工作中找到满足，他们的个人潜力便无法实现。由于某些工人群体感到无法从工作中获得应有的报酬，因而工作成为了一种社会问题，它成了一种强制活动，一个人劳动所产生的利益到了其他人的手中。由于工人在决策过程中没有发言权，所以在工作中很少有创造性或满意感。

相互作用论观点

对工作的主观解释、它在生活中的意义和其他人的工作状况构成了相互作用论观点的中心。时间的改变带来不同的解释。例如，高科技的到来和空闲时间的增多，使得将工作作为生活中心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变。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我们对生活的期待，重新铸造了我们对生活满足的看法（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所讨论的）。不同境遇的人对工作有着不同的看法，而相互作用论者试图分析在怎样的条件下，一些群体才会把工作视为一种社会问题。

职业身份 对职业不满的问题部分在于，科技变化创造了无数新的工作，但它们并没有为人们提供一个稳固的形象，即**职业身份**（occupational identity）。如彼得·博格所提出的，自称“我是一个铁路工人”能给人带来骄傲，但是说“我是一个电脑制图员”对大部分人而言不代表任何事情。[95]其观点认为，许多人无法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完全的身份感。因为其他人不理解它所包含的东西，也因为工人无法从职业中获得任何自我认同。在一个根据职业分配声誉和尊重的社会，职业的暧昧限制了其作为尊严和满足根源的价值。

许多白领和蓝领工人面临着对工作的重新界定。它不再是一个人生活的中心，自尊和社会承认都从中而来。现在工作常常是一个中性的范畴，人们之所以容忍它，是因为它给生活中更美好的东西带来了机会。[96]这一重大转变不仅意味着敬业精神的减少，也改变了自我在工作场所的表现形式。人们更有可能是在扮演劳动者的角色，而将真实的自我限制在家庭和亲密的朋友中。

雇员的看法 组织的性质，包括其权力等级制度和其中每个人有限的责任，要求个人如果希望在公司取得成功，就必须为它的目标而工作。公司"文化"迫使各个层次的雇员形成推进公司利益所必需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个人在公司中的升迁或继续工作，取决于其对公司财政的贡献。这种过分强调满足公司目标的做法，可能会迫使一些工人采取有悖于其个人价值和道德标准的行动。

理性是个人用来解决个人道德标准与公司要求之间的角色矛盾的一个常见手段。如果人们认为"人人都在这么做"，那么不道德或非法的行为就成为其采取同样举动的借口。毕竟，"买卖就是买卖"。另一个例子是，当政府干预过多时，它就被用来为无视某些法律或规章辩护。或许有人还会觉得，某些行动对维持一个行业的稳定和获利是必需的。但无论是什么理由，重要的影响是雇员社会化，并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这鼓励他们在行动中与公司对现实的解释保持一致。

公众的看法 在大公司和大政府兴起之前，美国人感到自己比今天的许多人更加独立、更加强大，并更大程度地控制着自己的命运。他们是否真的如此有自主性，并没有其自认为的那样重要。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采取行动，常常成功地实现自己预定的目标，实际上制造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今天的大型公司胁迫着许多人，使得人们感受到自己的无能和依赖。如果漠不关心或宿命论的态度使人们无所作为或者只是被动地接受，那就显然会失去对影响其生活的大部分因素的控制。

因为美国人衡量成功的标准是成就。所以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个人竞争能产生相当多的焦虑、不满、不安全和敌意。对他人玩世不恭和不信任的态度也可能从中产生，即使是在那些经济相对有保障的人中间。与这些消极因素作斗争的途径有家庭和宗教的影响、公司和政府通过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以及工作场所之外的各种自我满足活动（俱乐部、业余爱好等）。

未来的选择

大量专业的和业余的未来学家都提出了有关未来工作的前景。[97]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有关产品成本的剧减及似乎永远在发展的大量芯片的应用，潜藏着巨大的影响。精密复杂的软件程序和计算机化的信息存储—索引系统日益影响到办公室工作。同科幻小说作者和电影编剧笔下虚构出的工业机器人极不相同，现实中机器人正在迅速彻底地改变着制造业的世界。尽管人们不断预测“技术时代”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但并没有一致的看法。让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预测一下我们目前这些同工作有关的种种社会问题通过未来技术的折射将把我们引向何处。

悲观的前景

2030年，大公司远比30年前更为庞大，他们在全球经济中进行着竞争。不断发生的兼并和收购，以及制造业的不断精减，意味着生产同样产品的公司越来越少。寡头垄断者设定价格，控制供应，攫取巨额利润。公司对政府官员的广泛影响由于公众的漠不关心而未引起任何争议。它造成了政府规范和限制的减弱，减轻了公司对安全和产品质量所应承担的责任。

政府—公司的联盟包括了一个尤其不祥的创新：政府计算机与企业数据库的结合。通过大型数据库和快速检索系统，政府和大公司几乎控制了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教育、宗教、家庭、职业、信用、病历、购物模式、组织活动和投票记录等。由于各个地方严密的监视技术，人们害怕做任何可能危及其生活状况的事情。所以他们尽力克制以防任何对现状的挑战或批评。

然而无论如何，成功挑战这种公司控制一切的形势几乎不可能。有权和有钱的人的控制不受任何挑战，而总体优越的生活水平也不会导致社会动荡。雇员态度和行为的社会化被媒体所倡导的舆论控制日益强化。劳动者把他们的世界定为“好的”、“舒服的”和“平静的”，根本不知道他们的选择远比20世纪末的先辈要少得多。

科技吞没的工作远多于它所创造出来的。机器人在汽车、电器设备、机械和金属铸造行业全面替代了工人。工厂中的劳动力人数只有50年前的三分之一，就像工业革命以后农民人数减少的情况一样。随着管理者继续投资使用更加合算的计算机设备，消除了高工资和额外福利，办公室工

作也减少了3000万个。由于工厂和办公室能够用最少数量的人员进行工作，高失业人数仍旧是一个持续发生的现实。

天壤之别 在复杂的高科技领域就业岗位很少，完全由一小部分受过高等训练的精英科技官僚所把持，与此同时，大部分人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毫无价值。的确，他们的主要功用就是担当“影子工人”。[98]科技官僚和管理人员每周60小时的工作，增加了他们对私人服务的需要，如司机、飞行员、会计、照顾孩子的人、汽车和机械维修人员及购物代理人（食品、衣物、礼物）。影子工人们努力工作，但他们的工作主要起着一种服务功能，让人联想起19世纪的仆佣。

生活失去了意义 今天最根本的社会问题是敬业精神的消失，而这曾经是整个美国社会结构的传统基础。高失业、没有挑战性的工作常常使工人只是“守在机器旁”，以及充足的空闲时间使得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内在的职业满足或工作中的自我认同大大减少。由于工作时间少于先辈，美国人只是感到工作的枯燥乏味；同时，太多的空闲时间也使人们变得烦躁不安，以及缺少对自己存在的目的感。

面包和马戏 为了对付社会动荡以及失业的“老工人”拉帮结派流浪街头所制造的暴力活动，精英阶层——科技的祭司——选择利用古罗马消遣和免费发放的做法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一种高度纵容的环境鼓励人们追求自恋的自我表现、性自由和追求快乐。但这种分散注意力的狂欢式氛围，并不能完全克服许多人对生活的失落感。

乐观的前景

通过每家每户由光纤通讯线路连接的计算机，2030年的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得各种信息，可以更直接地接触到他们所选举的政治代表。他们通过家庭电脑的调制解调器，在地方、州和全国选举中进行投票，参与程度将是20世纪末的两倍。公众动议和全民公决变得更加普遍，即时的民意测验也是如此。公共政策事务更多地受到个人的影响，而不再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科技把政治权力扩大到人民手中，形成了更加完全的民主。

公司和政府仍然规模很大，但比起几十年前，两者对公众都更负责任了。公民的计算机信息检索系统同其政治代表的计算机直接联系，使公众可以施加更多的影响以对抗公司方面的游说活动。

新技术还使得许多小型信息服务公司出现，与40年前的大型兼并在经济上和有效性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工作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将劳动者从工厂和办公室

大量辛苦乏味的工作中解放了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产生了新的需要，从而又要求付出新的努力来实现这些要求。因此，比任何时候都存在更多的工作，使公众得以满足日益上升的期望和维持更高水平的生活。由于自动操作的机器、计算机和机器人的广泛运用，工作、家庭和娱乐中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每周3天半工作制 有助于在全国实现完全就业的一个措施是，在工厂和办公室中几乎通行每周3天半工作时间的制度。在复杂的电子科技上的巨额投资要求其必须连续运转，以为企业创造最大的成本效益。每周3天8小时和一天4小时的工作轮班制度，意味着在任何公司的各个不同部门中都有6个工作班组在轮流地发挥作用。一般的工人半周工作，半周是自由活动时间。这一制度对工人及管理层都非常有益，因为这使得工作时间更为灵活，有了大段的空余时间，并在任何时间都能够获得各种服务。

电子别墅 在家里进行工作是另一种普遍的劳动形式。无论其工作任务是例行公事、创造性的，还是专业化的，人们在家庭电脑终端前建立和更新数据库、编写程序、回答询问等。电脑网络使人们无须预约、旅行或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就可以获得各种金融、法律和医疗信息。储蓄、购物、借阅图书、甚至某些心理咨询都能通过家庭电脑来完成。随着家庭成为许多人的主要工作场所，社会科学家注意到核心家庭的复兴，短暂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少，社区生活参与增多，关系连接更加紧密。[99]

令人满足的业余活动 由于从早先长时间的工作环境的压力和异化中解脱了出来，人们投入了很高的热情去追求那些具有生产性的业余活动，从追求内在的快乐（园艺、音乐、绘画、修理或建筑设计）到自我提高的活动（求学深造、培训或个人发展），再到共同的活动（如更多的时间与孩子或朋友在一起、旅行和社会活动）。

小　结

1. 出现大型公司的一个后果是寡头垄断——由少数生产者控制了整个市场。由于竞争很少，这些公司就可以人为地提高价格。
2. 美国最大的100家公司控制了全国资产的75%，占了整个销售额的70%。最富有的1%的家族控制了大部分大公司和全国财富的40%。
3. 对自由企业制度的另一个威胁是以连锁董事会形式存在的共同决策网络。友好的和敌意的收购兼并产生了强有力的企业集团，其技术官僚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

4. 在追求公司利润中造成的任务和责任的分割，使得个人将道德（或不道德）理性地融入进自己的职责要求中。因此，价格操纵、操纵消费者、销售不安全产品都成了无可指责的行为。
5. 政府越来越庞大，并在许多方面同大企业结成一种伙伴关系。可以说明这种联盟的两个最重要的例证分别是，军工联合体的密切关系及政府和企业管理职位相互交换的旋转门现象。
6. 跨国公司目前很少受到制约和管理，但却对国民经济产生着重要影响。许多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尽管一些国家鼓励外国资本投资，但研究显示这些国家的经济不平等通常会进一步恶化。
7. 科技正改变着劳动力队伍的结构。蓝领职业正在消失，而新的工作——甚至是高科技行业以外的工作——都要求人们有较高的教育水平、计算机能力和社会技能，妇女更广泛地加入到职业大军中，同时获得的报酬高于从前任何时候。
8. 失业对那些在经济低迷时期易受冲击的个人的打击最沉重，这些人包括产业工人、供应商和分销商、从事休闲服务业的人以及少数民族工人。长期失业带来破坏性的社会后果：消沉、酗酒、暴力、精神压力和长期的玩世不恭。
9. 在蓝领和白领工人中都存在缺乏职业满意感的现象。最近的研究显示，异化常常是由于缺少自我实现引起的；工作不能提供挑战性、一定程度的个人控制和个人实现的感觉。在四分之一的劳动者中采用的弹性时间安排，是一种满足“新生代”工人需求的新趋势。
10. 职业危害是一个影响着许多劳动者健康和安全的危险问题，尤其是在矿业、农业、纺织和化工行业。有限的人员和资金限制了政府管理部门进行安全检查、化学品分析并采取措施。矿业和农业中的职业死亡率最高。
11. 功能主义提出迅速的社会变化和发展使得社会机制在政治和经济上失去平衡。冲突论认为，在一小部分精英阶层控制下的对工人的剥削、公司统治和政治权力是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源。相互作用论强调机制对个人态度的影响，并提出玩世不恭、宿命论和合理化服从等现象作为证据。

关 键 词

异化　　　　失范

企业集团
成本超出
人口统计
裁员
外在满足
弹性时间
需求等级
连锁董事会
内在满足
大型兼并
军工联合体
跨国公司
职业身份
寡头垄断
价格同盟
旋转门
技术官僚
第三产业
就业不足

推荐书目

Dye, Thomas R. *Who's Running America? The Clinton Year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94. A Conflict perspective offering an overview of America's power elite.

Grieder, William. *Who Will Tell the People: The Betrayal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An indictment of powerful corporations that exploi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taxpayer to maximize profits.

Harrison, Bennett, and Barry Bluestone. *The Great U-Turn: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the Polarizing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A thorough and disturbing examin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a two-tier labor force —— a system within which most new jobs are less rewarding than old jobs.

Jones, Barry. *Sleepers Awake!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Wo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Informative insight into how advanced technology affect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work and job choices.

Mattera, Philip. *Prosperity Lost*.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1. An analytical portrait of how many workers find their higher-paying jobs eliminated and only lesser-paying ones available.

Nader, Ralph, Mark Green, and Joel Seligman. *Taming the Giant Corpor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6. A critical, consumer-advocate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ing of modern corporations, their abuse of power, and suggestions for their social control.

Parenti, Michael. *Democracy for the Few*, 6th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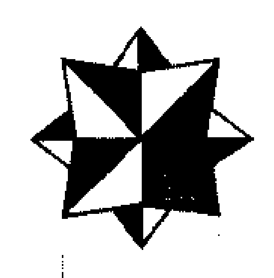
1995. An important book detailing the extent and dangers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corporate and individual power to the detriment of most Americans.

Ritzer, George.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Newbury Park, Calif.: Pine Forge Press, 1992. A fascinating extension of the rationally efficient routinism of the fast-food chain into other fields.

Shaiken, Harley. *Work Transformed*.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1986.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conversion of American manufacturing into electronic control technologies and how these have altered the workplace forever.

Toffler, Alvin.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Morrow, 1980. Projections of current trends into a future world of work and leisure, with evaluations of their social impact on family life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第12章 医疗保健



关于医疗保健的几点事实

- 1997年，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在全世界居于第17位。
- 研究显示，每年进行的大量手术实际上毫无必要。
- 在1985至1994年间，医院的医疗费用增加了一倍多。
- 大约有4000万美国人几乎或完全没有医疗保险。
- 美国每年有150多万起合法堕胎。
- 在1989至1995年间，美国有24.6万人死于艾滋病。
- 调查显示，57%的美国人赞成安乐死合法化。
- 五分之一的美国人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健康的身体是个人最宝贵的财产之一，它同我们对生活的满意度联系紧密。[1] 健康的身体很容易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当你年轻力壮，感到整个世界都展现在眼前的时候。而只有在遭遇到严重的疾病或伤害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它是多么的重要。担忧、害怕、沮丧、痛苦、残疾、丧失自信和沉重的经济负担，此时便会占据和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中心。

然而，健康和疾病不仅仅是由于个人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因素造成的，社会文化因素也会导致许多健康问题。例如，今天在美国，很少有人再死于白喉、伤寒、霍乱、肺结核、流行性感冒、肺炎和其他传染病，而在世界其他一些前工业社会里却依然很多。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方式如饮酒、吸烟、空气和水污染、食品添加剂、高脂肪食品、缺少锻炼、性生活随意等，又会引发诸如心脏病、癌症、疱疹等在前工业社会比较少见的健康问题。身体不好也是一件社会关注的大事，因为这意味着劳动者丧失工作能力、儿童无法长大成人为社会做贡献、国家机构医疗保健支出的增加，以及社会在为每个人提供充分的医疗保健以预防不必要的痛苦和疾病中所承担的巨大义务和压力。

在美国，医疗保健问题表现出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它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投入到医疗保健中的开支都要多——大约是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七分之一，总金额现在已接近1万亿美元。[2]然而，我们是当今世界上惟一一个没有全国性医疗保险计划或普及医疗保健制度的工业化国家。尽管开支巨大，医疗保健服务仍然分配不均。在农村和小城镇以及城市的贫民中医疗服务质量低劣，甚至完全没有。尽管投入了大量资金，1997年美国的婴儿死亡率还是令人沮丧地居于世界第17位，而1950年排名为第15位(参见表12.1)。[3]而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在世界范围内也仅列第17位。[4]

表12.1 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婴儿死亡率（每1000例）的比较，1997年

1. 芬兰	3.8	8. 德国	5.3	15. 意大利	6.5
2. 瑞典	3.9	9. 香港	5.3	16. 西班牙	6.6
3. 日本	4.1	10. 澳大利亚	5.4	17. 美国	6.6
4. 瑞士	5.0	11. 法国	5.6	18. 台湾	6.7
5. 奥地利	5.2	12. 加拿大	5.7	19. 希腊	7.4
6. 丹麦	5.2	13. 英国	6.0	20. 以色列	8.3
7. 荷兰	5.2	14. 比利时	6.4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 Base, 1997.

我们怎么会这样的？为什么我们的医疗开支比其他开支的增长都快？为什么美国人的医疗保健和寿命要低于其他许多的国家？为什么我们付出的更多，却获得较少？为什么我们不能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医疗保健？答案是否在于医疗保健的管理运作之上呢？

国际背景中的医疗保健

尽管美国的医疗保健情况在许多方面属于世界最好，但并不是全部美国人都能平等地获得的，价格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受的。要理解美国医疗体制的缺陷，我们首先要将它同其他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在表12.2所列国家中一个关键的区别是，只有美国没有一项控制开支和服务的全国性医疗计划。

在表12.2中，国民生产总值是指消费者和政府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以及国内投资总额和商品及服务净出口的总收入。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用的医疗保健支出都要大得多（14.2%）——大约占了全国购买力的七分之

表 12.2 政府健康开支比较，1994年

国家	全部医疗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公共医疗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国家	全部医疗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公共医疗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美国	14.2	6.7	瑞典	7.7	6.4
加拿大	9.8	7.0	新西兰	7.7	6.0
法国	9.7	7.6	葡萄牙	7.4	4.1
奥地利	9.7	6.2	爱尔兰	7.3	5.7
瑞士	9.6	6.8	日本	7.3	5.3
荷兰	8.8	6.9	西班牙	7.3	5.7
意大利	8.6	6.3	英国	6.9	5.8
德国	8.6	6.0	丹麦	6.6	5.4
澳大利亚	8.5	5.8	挪威	5.5	5.2
芬兰	8.3	6.2	希腊	3.6	2.8
比利时	8.2	7.2	卢森堡	3.1	3.3
冰岛	8.1	6.8			

资料来源：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Health Data (Paris, 1995).

一，而加拿大和日本分别只有约十分之一和十四分之一。更为惊人的是，美国用于公共医疗的开支比例大体同表中大多数国家相等。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无需比美国花更多的钱，就拥有了全国性医疗计划，而美国则没有。这些数据也说明，美国公民所负担的开支也更大，既指直接的开支，也包括较高的医疗保险费用。

尽管用于医疗的开支如此之巨，但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却超过了其他16个较大的发达国家（参见表12.1）。由于其他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有相似的全国性医疗计划，而公共医疗开支比例也同美国相差无几，因此它们显然有一个更加完善、有效的医疗保健制度。

社会历史背景中的医疗保健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达到了目前的医疗水平。1776年出生的美国人平均寿命只有35岁，而今天的新生儿能达到76岁。我们征服了大部分过去猖獗肆虐的传染病——天花、白喉、百日咳、伤

寒、霍乱、猩红热和小儿麻痹等。然而，这些重大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发现和生活条件的提高（营养、环境卫生、教育和经济情况的改善），而不是医疗保健的作用。[5]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美国的医学可以不断地拯救生命、减少痛苦和延长寿命。不幸的是，我们的进步在重塑了我们的价值观和态度、改变了医疗保健体制的结构和个人保健的质量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随着20世纪医学的进步，个人化的医疗形式逐渐减少。让人怀念的家庭医生上门巡诊、关心全家人健康的现象，是专业化极为有限的时代的产物。[6]由于医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大幅增长，在20世纪初，医学的专业化开始起步，在二战后明显加快，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要掌握有关人类各种疾病的全部发展是绝对不切实际的。综合的开业医生失去了声誉和吸引力。越来越多新的医科毕业生选择了走专业化的道路。

医学专业化的最初出现，促使人们更大地依赖于医院的保健和治疗，而不是家庭保健和医生的上门巡诊。而由于医学专业化必须要经过高级训练和科学的专业技能，因而医学院、注重研究的医疗中心和专业的教学医院规模日益庞大。由于得到大量联邦资金支持，而又无须承担过多社会义务，它们取得了许多医学突破，培养了新的医学精英，并取代了独立的小医院而成为主要的医疗保健单位。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病人现在很少得到医生的上门诊治。相反，他们需要去实验室进行化验，去门诊部接受医生检查，去诊所或医院接受治疗。因为医疗保健由于专业化而变得非常零碎，人们常常要为同一个健康问题去看好几个医生，从而增加了医疗的开支。这种做法也使治疗过程中的人情因素越来越少，医生只是把病人视为一种客观物体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病人也很难对医生形成亲近感。合伙医疗制度和经营性医疗设施的发展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模式。

这种大规模机构化医疗保健制度的发展，衍生了数以百计想从中牟利的医疗公司。大部分这类辅助性公司向医院出售诊断和治疗设备，医生们也对这些新产品非常热心。其结果就是营业间接成本的升高——有时是因为购买了用途有限的设备，从而增加了技术和维修人员的员工费用。

现代医学的优势

人们相信医学的力量，而且对它的要求比以前更多。100年前的人们把死亡视为某种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情；今天恰恰相反，许多人试图推迟死亡时间。我们希望得到不能企及的东西，如果一个病人死了，许多活

着的亲属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医疗事故控告医生。医生们常常用冒险的办法来延长生命，而且费用巨大，即便已经根本没有任何治愈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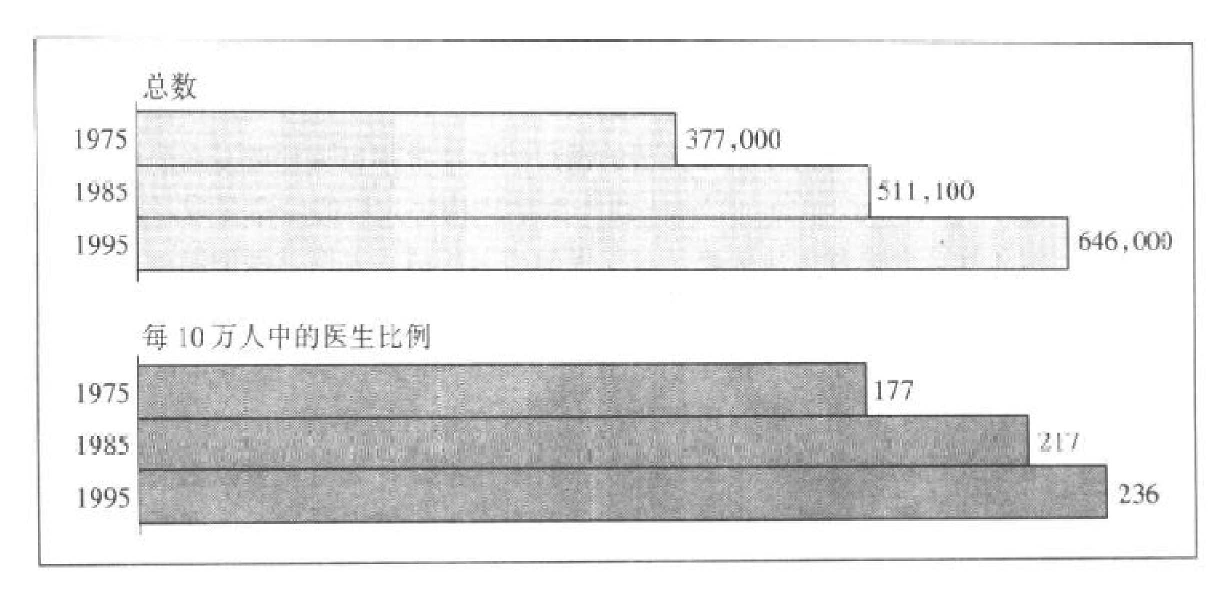
过度治疗 批评者对美国的医疗状况经常提出批评的是对生命的**过度治疗**（overmedicalization）——由于医学机构对人们的生命采取了过多的控制和社会变得过多地依赖于医疗保健而引起的。对医疗保健制度较严厉的批评者之一伊万·伊利奇指出，由于“过度医疗”，我们自己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权利被剥夺了。[7] 医学行业使医学知识和专业技术变得异常“神秘”，远远超出了普通人所能理解的范围。现在惟有医生才能决定什么是病因，用什么药物进行治疗，什么时候让病人住院，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一个后果便是以昂贵的机构化医疗代替了针对个人的家庭保健。大部分人已不再把在家生孩子、重病后在家康复或在家庭环境中安然死去视为“正常的”。

医学对今天主要的致死因素几乎无能为力，这些因素包括实足年龄、生活方式、遗传缺陷、环境污染导致的意外事故、动脉硬化、癌症、肝硬化、糖尿病、心脏病突发和中风等。医院中的精心、昂贵的治疗在这些情况下并不能给病人带来太大的益处。临床医学真正有效的是在如小儿麻痹症、肺炎和性病等这样一些领域。显微外科技术的进步使得断肢可以重新再造复位，心脏外科技术的发展也在矫正手术之后使婴儿过上正常的生活，或使成人活得更长寿、更健康。但还是有一些人相信，我们为这样和那样神奇的成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医学不仅通过对个人的直接侵害而且通过其组织对整个环境的影响，暗中对健康造成了破坏……医学增加了人们的压力，增加了人们无能为力的依赖，产生了新的痛苦的需求，降低了人们对不适或疼痛的忍耐力，甚至使人丧失了自己照顾自己的权利。它通过这一切来制造不健康，并从中获利。当医疗保健成了一种标准化的项目、所有的痛苦都要‘住院’、家里不能生孩子、生病和死亡，当人们用来表达自己身体的语言成为一种冗长复杂的官样文章，或者当作为病人角色之外时的疼痛、悲伤和康复都被认作是一种越轨形式时，医学就有了用武之地。”[8]

医疗保健的社会组织

在19世纪末，美国医学协会开展了一次成功的行动。它游说州议会制定行医开业许可证制度，迫使低质量的医学院停学等措施。然后它努力



图表 12.1 医生从业人数

资料来源：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ealth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减少行医执照的发放和提高医疗培训标准。医生对病人的比例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直至40年代末基本稳定。由于认为医生数量的增加会降低质量，美国医学协会反对培养更多的医务人员，尽管对医生的需求越来越大。

直到60年代，美国医学协会才不得不承认出现了医生不足的问题，从而采取了更加灵活的立场。[9] 即使如此，到70年代，医务人员的供应仍然远远落后于需求。国外医学院的毕业生——无论是移民，还是在国内没有录取而去国外求学的美国人——占了每年获准新开业医生的四分之一。[10]然而，到1980年，美国医学院的数量从1970年的110所增加到141所，每年的毕业生人数将近翻了一倍，从1970年的8300人增至1993年的超过1.53万人。[11]因此，开业医生数量大大增加，进一步提高了医生对病人的比例（参见图表12.1）。

不均衡的医疗分布

虽然医生人数开始有所增加，但他们的分布却随着其所在的地区及其类型而变动。在郊区和富裕的城市住宅区，尤其是在那些有教学和研究性医院的地区，医生供过于求（参见表12.3）。很少有医生在低收入的住宅区或农村社区开业，尽管那里会有一些外国裔的医生。在属于大都市的县，平均每人拥有医生的数量大约是属于乡村县的3倍。[12]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低于其他国家，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这种医疗体制在分布上的不均衡。

表 12.3 每 10 万人拥有医生的比例，1994 年

最高比例		最低比例	
1. 马萨诸塞州	373	1. 密西西比州	132
2. 纽约州	343	2. 爱达荷州	136
3. 马里兰州	341	3. 怀俄明州	141
4. 康涅狄格州	325	4. 阿拉斯加州	143
5. 罗德岛州	278	5. 俄克拉荷马州	155
6. 新泽西州	269	6. 内华达州	159

资料来源：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Physician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U. S.*, 1996.

若干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了医生的这种不均衡分布。同其他受过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专业人员一样，医生们喜爱大都市里的生活方式、文化和娱乐机会。小城镇和乡村也不可能提供今天许多医生要求的昂贵的精密设备和技术维护人员。他们没有足够的病人来负担这些设备。最后，比起贫困的或人口稀少的居住区，在富裕的、人口更为密集地区的医生的收入也更高。

以盈利为目的的医疗保健

尽管自称有拯救生灵的崇高目的，但医疗保健机制实际上是一种追求利润的商业活动。例如在 1968 年，美国医学协会的一位主席就公开宣称，医疗应该只为那些有能力支付费用的人提供服务。

美国医学协会仍然禁止医生做广告，而且有一个高度有效的非正式网络利用同业间的压力在医生中维持同等的治疗收费。这一操纵价格的垄断防止了医生之间的经济竞争。而且，医生相对而言，仍然不关心他们开出的账单会对病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因为有大量的病人得到了第三方保险或政府的资助。虽然如此，公众还是通过相对较高的税收和保险费负担了很高的医疗开支。

医生私人开业是国内最赚钱的小生意：医生的平均收入相当于美国人平均工资收入的 7 倍。1994 年，医生的平均纯收入为 18.24 万美元（而外科医生平均为 25.52 万美元）。为医生高收入的辩护是，医生比其他的专业人员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接受训练，工作时间更长，而且花费也更大，包括医疗事故保险等。医生每周确实要工作平均 53 个小时（产科医生要达到 59 个小时）；而且他们平均每年要支付 1.51 万美元的责任保险金（外科医生为 2.23 万美元）。[13]不过研究还是显示，他们在时间和工作中

的投资所取得的回报大约是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员的两倍。[14]

外科医生通过做手术获得收入。手术做得越多就挣得越多。按照人口比例计算，美国的外科医生是英国的两倍，外科手术的次数也是英国的两倍。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必需的呢？在70年代，美国人口增加了5%，而外科手术数量却增加了23%。[15]此后，医疗管理公司（其中医生不是按手术例数收取费用）的增加和医疗保险公司强制要求对外科手术进行专家复审的做法，有效地降低了外科手术的总数——从1980年每1000人108.6例减少至1994年的87.4例。[16]占到美国全部接生分娩四分之一的剖腹产，给产科医生带来的收入也要比自然分娩多，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剖腹产的比例至今仍然高于1980年时的水平（参见专栏12.1）。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健康维护组织发现，尽管剖腹产手术价格较高，但在总体上还是要低于产房、护理人员、监控设备和孕妇预产期延迟增加住院时间等带来的总的开支。

专栏12.1 过度治疗

高技术手段不一定能使人们变得更健康。但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它可能意味着一切。不幸的是，我们对许多貌似急救技术的东西从未进行过彻底的评估。对于未经安全和效果试验的新药，政府不会颁发生产许可证，但医生常常单凭自己的想法便进行无数的试验和外科手术。旧金山的产科医生戴维·格莱姆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由于错误地把“新的”当作“改进的”，医学界“浪费大量财力、物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伤害或杀死病人”。这个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问题了。从放血术到前脑叶切除术，各种毫无价值的革新一直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医生们，而许多有价值的医疗方法也常常被过度使用。但这种过度从未像现在这样付出如此高的代价。

美国人常常在出生之前便已经历了第一次值得怀疑的医疗过程。在生产过程中，产科医生一般用一种电子监视器测量胎儿的心率。在美国全部的分娩中，估计有50%接受过监控。在理论上，这一装置使医生可以连续观察婴儿的情况，使他们在出现危险迹象时，就可以及时进行手术。但经过8项实验研究发现，电子监控并不比医生用听诊器对孕妇腹部听诊更为有效，即便是在高危妊娠病例中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研究中，受监控婴儿死胎和脑损伤的比例，与一般没有接受监控的婴儿相同。但这种监控治疗依然非常受欢迎，每年的费用要达到10亿美元。在产科这样一个要承担巨大责任的领域，要放弃任何习以为常的做法，即便是一种无用的医疗程序，都可能是危险的，因为这标志着与“标准惯例”的背离。如果有病人对不幸的结果进行控告，起决定作用的是行业中的标准，而不是科学证明。

同样的逻辑加之经济原因的刺激，使得剖腹产手术成为全国最普遍的主要的外科手术，近四分之一的美国婴儿——即每年约100万人——是通过外科手术降临人世的。而早在1980年，全国健康学会就注意到，剖腹产手术的比例在15年里翻了近4倍（从1965年的4.5%上升至16.5%），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它对孕妇或婴儿有什么益处。专家们呼吁对此加以控制，但在以后8年里这个比例一直在稳步上升。从1988年开始，上升态势

开始稳定下来。和传统做法不同，许多过去进行过剖腹产的妇女现在开始选择自然分娩。但美国的剖腹产比例仍然使大部分发达国家相形见绌，也没有人能假装说这一比例在医学上是合理的。一个美国妇女的生产不一定比瑞典或挪威的妇女更安全，但她进行剖腹产的可能性却要达到两倍。

资料来源：Geoffrey Cowley. "What High Tech Can't Accomplish" from *Newsweek* (October 4, 1993),

大量研究揭示，有数以百万计的手术仍然是毫无必要的。[17]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发现的不必要的外科手术有：50%的剖腹产手术，27%的子宫切除手术，20%的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17%的腕骨管状综合症手术，16%的扁桃体切除手术，及14%的椎板切除术（最常见的一种背部手术）。[18]政府的一项研究发现，付费治疗的外科医生所进行的手术，是健康维护组织的医生所做手术的两倍，后者无法从手术中获利，而且甚至可能还会在经济上蒙受损失。[19]

不必要的手术给病人带来危险。杰弗里·莱曼估计，每年可能有2万名病人死于手术刀下，远远高于被割刺类凶器谋杀的人数。[20]另一项研究发现，为切除恶性卵巢囊肿而接受子宫切除的妇女中，引起并发症的人数是得了同样的病而没有切除子宫的妇女的5倍。[21]

医疗事故

医生与病人间关系的疏远最为明显的反映是在**医疗事故**（malpractice）诉讼的上升之中。在80年代，这类诉讼比70年代增加了一倍多，其数量之多，致使一位研究者认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螺旋式上升。[22]医生常常把病人视作潜在的原告，而病人也把医生看成是对其健康的一种威胁。医生通常认为法律制度对其有偏见。但最近一次对15年间新泽西州8200多起案例所做的研究显示，医生在大部分案件中胜诉，对医疗事故不公正的判决并不多见。[23]

高额的法律诉讼费及庭外调解费用增加了医疗事故的保险费，医生将保险费转嫁到了病人身上，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医疗费用。此外，医生们现在往往采取**保护性的医疗**（defensive medicine），安排病人接受范围广泛的各种诊断化验以保护自己。单这一项每年估计要损失150亿美元：[24]

> "对医疗事故诉讼的担心，迫使一般的医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标准的化验程序，而不是个人的判断……由于非医学的因素介入到医生决策的过程中，即考虑到诉讼案件和其他医生的做法，某些行动在法律和

> 经济上或许是合理的，但在医学上却是不合理的……据估计，有30%的X光透视毫无必要，而过量辐射每年导致1000人因此死于癌症。”[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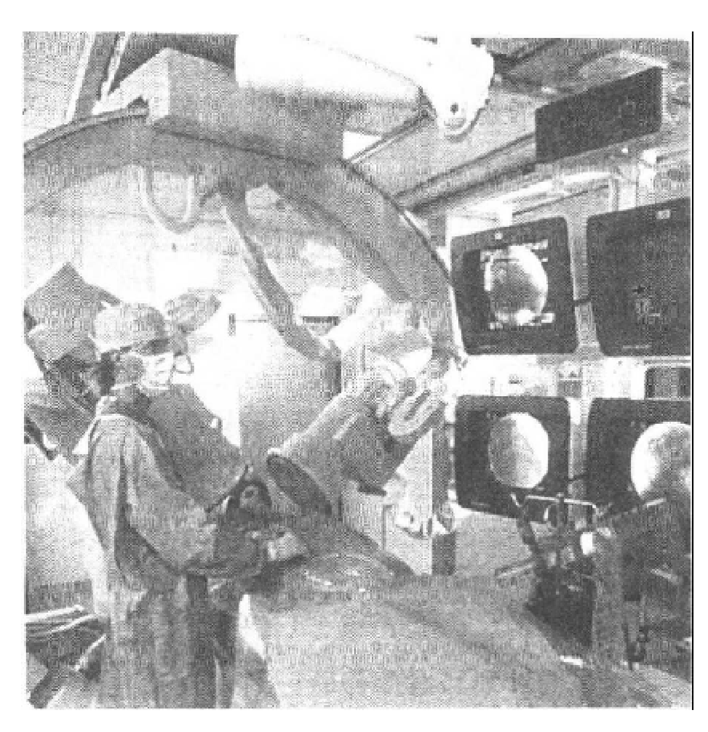
那么因为医生无能而导致医疗事故的情况又如何呢？美国律师协会坚持认为，只有真正的渎职才会引起医疗事故诉讼。而美国医学协会则认为，许多诉讼是由于病人不切实际地期望每次都能完全治愈而造成的，因此是极不合理的。[26]著名的医生及医疗事故律师哈维·瓦赫曼称，每年医疗过失要杀死10多万美国人，50多万人受伤。但每年只有大约2000名医生受到州医学委员会的惩罚。大部分被处罚的案件涉及到保险金诈骗或其他犯罪，而不是医疗事故。[27]如果这些统计数字是正确的，美国显然存在着开业医生能力不足的问题，而美国医学协会的自我监管力度也不是很有效。

医院产业及其开支

大部分医院过去曾经都是由地方管理的、为病人和临终者提供非营利性庇护的场所。但自6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今天大约有30%的医院归私人所有，通常是大型营利性连锁医院的一个组成部分。[28]小医院不断地并入这些连锁医院，以求生存。而另一些则联合起来，使其采购、治疗、管理程序趋于制度化，以降低费用。[29]

医院治疗的费用以一个令人担心的比例在上升，在1985至1995年间翻了3倍多。[30]这一增长远远高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增长幅度，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购买昂贵的设备和医务人员的较高工资。为了弥补政府对住院时间和固定医疗费用补偿计划的限制，医院抬高价格以满足日常管理费用。此外，它们还需要资助贫困病人所需的开销。无论如何，医学技术是医院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占了新增医院开支的约三分之一左右。[31]

医院之间互相竞争，看谁拥有最先进最时新的昂贵设备。购买这类昂贵的（尽管可能很少使用的）设备增加了医院固定的经营开支，其损失在某种程度上分摊到了所有病人的身上。例如，核磁共振造影是一项最新的“权威”技术，它能够发现在大脑、肺部、呼吸道和肝脏中的肿瘤。在这之前，即使是用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CAT）这类复杂的方法也无法发现。虽然核磁共振造影装置对某些病例有巨大的帮助，但其标价（每台200万美元）说明，如果多家医院合伙购买和使用将会比一家医院单独购买更有意义。为了补偿间接成本，使用昂贵的高技术设备成为医院



昂贵的治疗设备增加了一所医院的固定开支，常常要高达三分之一。即使设备的使用率非常低，但医院为了增加竞争力，宁愿拥有所有权而不是与其他医院分担共享。于是，这类支出通过住院费等途径间接地转嫁到了所有病人的身上。

诊治中的一道固定程序，从而进一步抬高了医疗费用。例如，过去12年里，在全国范围内核磁共振扫描翻了一倍，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翻了4倍。[32]

如果要充分理解这些基本开支是如何增加医院成本的，你必须认识到，医院一般很少满员。当医院在不满员的情况下运作时，由于只有少数病人支付固定的手术费用，用于每名病人的成本也就相应增加。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因为医院需要能带来收入的病人，人们有时毫无必要地就被要求住院治疗。在1992年，《消费者报告》指出，病人53%的住院时间都是没有必要的，其中包括24%的病人实际上根本无须住院。[33]

医疗保险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大量美国人陷入贫困以前，病人曾经要负担几乎全部的医疗开支，直接交给医生和医院。此后，在40和50年代，出现了医疗保险计划——尤其是在工会成功地通过谈判使其被包括在一种额外福利之内以后。然而在今天，大约有4000万美国人——其中包括许多农村居民和不属于工会的、季节性的和临时性的工人——很少或完全没有保险，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34]此外，其他数百万工人的医疗保

险的范围也仅限于工作期间。如果他们被解雇或是退休，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就失去了医疗保险。最后，那些享有医疗保险的人仍然必须自己负担医疗费用的三分之一，因为有保险扣除额或是有些治疗项目超出了保险范围（如诊所就诊、例行检查、接种疫苗等）。

“蓝色”计划 在大萧条时期，由于大范围的贫困，许多人无力支付医院的账单。医院为了保护自己在以后不会蒙受这种经济损失，建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的“蓝十字”组织，预先征收保险金用于支付可能的医疗费用（或至少其中的一部分费用）。后来又出现了“蓝盾”计划，用于支付医疗和医生的费用。这两种“蓝色”计划都是由州或地方的管理委员会进行监督。委员会成员主要来自医院的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今天，全国性的蓝十字和蓝盾计划网络同医院直接联系在一起，为全国大约35%的自费病人提供保险。[35]

老年保健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 尽管美国医学协会在60年代做了艰苦的游说活动，国会还是制定了**老年保健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作为向贫困宣战的一个部分。老年保健计划由联邦税收提供资金，用来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支付某些医疗服务的费用。而医疗补助计划是由联邦和州税收共同提供资金，用于帮助穷人、盲人和残疾人。由于医疗补助计划是由各州进行管理的，对它的资格要求和补助金数额在各个州之间变化很大。而在另一方面，老年保健计划则在全国相当统一。然而，两个计划都要求病人支付一部分首期治疗费用，都有一个共同保险条款，要求病人支付一部分额外超出的费用。

这些善意的针对老人和穷人的医疗援助计划制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当美国医学协会意识到，它无法阻止国会通过老年保健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时，它便改变策略，让医生和医院来确定通过这些计划所支付的诊疗费。在两年时间里，这些计划使医生的平均收入增加了7000美元，尽管医疗保健的数量和质量实际上没有任何提高。[36]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赞成这一立法的医生从通过之时的仅38%，增加到70年代的92%。[37]

由于没有太多责任或监管——合理的、没有异议的付费方式——医生和医院对缩减费用毫无热情，因而开支继续暴涨。美国出现了所谓“医疗补助计划磨坊”，在一些低收入住宅区许多沿街的诊所，不加选择地为尽可能多的病人进行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从而使开业者获得了达到6位数的收入。然而，除了这些欺诈性的医生滥用职权之外，合法的医疗机构也利用老年保健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牟取利润。

新体制 在80年代逐渐开始了一场对医院医疗措施的变革，试图遏制医疗费用的上升势头，使某些治疗更加合理，缩短住院时间。关键的改

革是，在医院治疗属于医疗补助计划的病人时，联邦政府不再支付实际的费用。取而代之的是，它以467个“相关诊断群体”所需的开支为基础，确定一笔固定的费用。

在这一至今依然有效的新体制下，超出资金限定的医院必须自己承担额外的费用，而维持较低收费的医院就可以有所节余，从而鼓励医院尽量地节约开支。由于不能将超出限额的费用转嫁到病人身上，也不能按医疗单项向政府收费，医院管理部门现在对医生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他们尽量减少浪费和避免不必要的检查。州政府也制定了向医院支付固定医疗费的计划，以削减医院收入和医务辅助人员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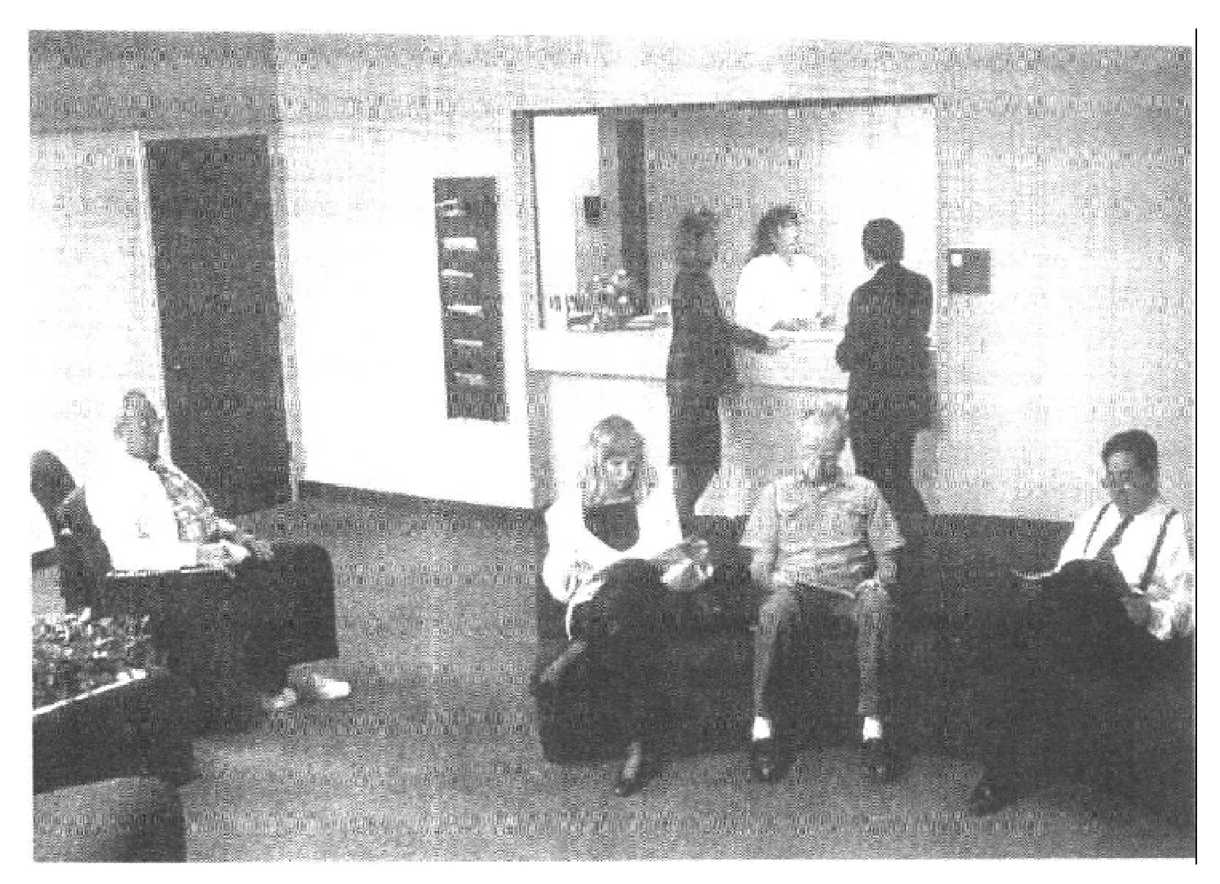
尽管卫生部门的首脑和病人对这一紧缩节约的做法都非常赞成，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收入减少使数以百计的医院陷于财政困难，造成500多家医院关闭。而且，批评者也指出，病人尚未完全康复就被很快要求出院，而又得不到社区的帮助。[38]老人们现在发现自己的身体既未严重得可以住院，又无法很好地照顾自己。在大部分社区，已经出现了家庭健康护理机构的繁荣，但许多病人发现他们的医疗保险并没有包括家庭护理。

保健管理计划的出现

近年来在医疗保健领域中的一个最重要发展是保健管理计划及其设施在全国的迅速出现。其目的是通过把医疗重点从治疗转到预防从而压缩开支。它在加利福尼亚尤其盛行，成为所有医疗保健改革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渴望减轻自己为雇员支付的医疗保险费用，它们发现预付团体医疗保健费用的做法既节约又有成效。

健康维护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在每月或每年预先支付一笔固定的费用后，它提供各种类型的医疗保健。其成员从1976年的300万人增加到今天4600多万人。健康维护组织现在为五分之四的美国人（及其被赡养人）提供医疗保险，他们都是由雇主为其投保的。[39]由于其收入的惟一来源是对会员收费，健康维护组织力求使治疗充分有效，并将部分保险金用于保持会员的身体健康。它们重视定期的体检和预防注射、对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治疗、使用普通的药物、以不卧床的护理代替住院。

最近，健康维护组织开始招收老年人入会。习惯的看法认为，老人们不会离开他们熟悉的医生而贸然加入。但省钱的诱惑（不付老年保健计划要求共同支付的20%）以及不需填写任何申报表格的承诺，每个月吸引了8万名老人转入健康维护组织。[40]到1995年底，有250万老年保健计划的



各类健康维护组织在最近几十年里发展迅速。这些私营的、平价的集体计划，使加入的成员人数在短短25年里从300万增加到4600多万。它对效率和预防治疗的注重，使得其许多机构都显得像一家井然有序的企业。

受惠者（将近占了全部领受老年保健补贴者的7%）加入了健康维护组织，而在1987年仅为3%。[41]

健康维护组织受到欢迎，是因为它们以较低的花费提供了完全的、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服务。例如，它主张减少不必要的治疗，要求直接向一位主治医生求诊，从而决定应该怎样治疗。健康维护组织由此成为医疗服务的"节制机构"，而在治疗等问题上给予医生自由决定的权力。[42]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该组织的医生通常需要金钱上的刺激来节省开支，这也就意味着较少的专家会诊和较少的化验。在一些病例中，作为削减费用的一种手段，医生可能拒绝给病人一些昂贵的药物或治疗（参见专栏12.2）。

生命伦理：生与死的决定

医学进步使我们能够拯救体重不足2磅的早产婴儿及其他有遗传缺

专栏 12.2 健康维护组织的壮大

支持健康维护组织的人们认为它的许多数据说明这是一项节约的计划。虽然他们宣称节约是由于更加健全的管理。但事实是，它不仅不能克服造成医疗费用上升的诸多因素——如使用新技术造成费用增加——而且健康维护组织还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广告等方面。

大量市场开发经营费用现在成了医疗保健开支的一部分。“美国医疗”是全国最大的一家营利性健康维护公司——它每年用于广告宣传上的费用大约是其支付给聘用的医生的五分之一……

这些公司可能还以其他进一步和微妙的方式影响着医疗保健问题。一些医疗维护组织由于占有了大量的市场份额，甚至可以控制谁可以行医，包括从事什么专业，在什么地方开业等。例如，最近一家名为牛津健康计划的著名的医疗维护组织的公司，通知了一位曼哈顿的肿瘤专家，如果他打算为其公司工作，就必须放弃既担任主治医师又当肿瘤专家。这位医生虽然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过长期的训练和工作经验，不得不放弃自己个人的喜好，屈从于公司的安排而只担任肿瘤专家的工作。

许多医生现在都有些提心吊胆——担心如果自己现在还没有签约加入某个健康维护组织，以后会被它们排斥在外。医生们对健康维护组织的害怕甚至有甚于对州医师执照委员会，前者可以更为有效地决定他们开业行医的资格。

病人也许认为只有医术和质量才是最重要的，但显然其中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内。健康维护组织同医院进行谈判决定医疗价格。谁说健康维护组织不会把病人送到那些医生拥有特权的最低廉的医院？如果医院害怕失去病人同意降低价格而低于维持医院的基本所需，谁说我们有一天不会抛弃医院，就像借贷行业抛弃我们的国家一样？

病人应该好好想想他们支持的究竟是什么人。保健管理制度的用心究竟何在？

资料来源：Jeanne Kassler M. D. “Managed Care or Chaos?” *New York* (August 3, 1993), P. 50.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陷的新生儿（包括严重的心脏问题），就在几年以前还做不到这些。相反，恰如我们可以拯救一条原来会失去的新生命一样，如果母亲不想要孩子，我们也可以通过流产阻止新生命的诞生。而且，现在医生也有了药物和机器，可以延长那些患不治之症或受致命伤的病人生命，以一天超过900美元的代价维持无法治愈的生命。这些都牵涉到**生命伦理**(bioethics)的问题。

与所有这些情况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常见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堕胎问题使医学与宗教相对立。堕胎是一种谋杀行为吗？一个妇女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还是社会在某些方面对培养这个未出世的生命更有决定权？如果父母拒绝医治孩子（即使是因为宗教原因），能否作为罪犯对其进行起诉？延长垂死者的生命是一种责任，一种人道主义行为，还是毫无必要地延长人们的痛苦？在结束治疗中最困难的道德难题涉及到那些由于年幼或无力而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病人。

护士有时让她们照顾的病人死去。例如，如果一个患不治之症的病人

病情突然出现恶化，她们会故意延缓救助，或是对一个晚期癌症的孩子轻微地增加吗啡剂量，不仅可以减轻疼痛而且能抑制呼吸和加速死亡。一项研究发现，五分之一重病特殊护理的护士承认，他们曾经加快促成了晚期重病人的死亡，有时甚至连医生、家人或病人自己也不知道。[43]

堕　　胎

从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罗伊诉威德一案中裁决孕妇在怀孕初期进行流产属于合法开始，堕胎便成了美国最常见的外科手术之一。1980年至今，每年有150多万例合法堕胎，[44]其中白人妇女的比例几乎是黑人妇女的两倍。大约有82%的堕胎妇女未婚，约45%没有孩子，其中三分之一的年龄在20至24岁之间。[45]尽管一些堕胎是为了防止生下可能有严重遗传缺陷的孩子，如严重智障、囊肿纤维症或唐氏综合症等，但大部分流产仅仅是因为妇女年龄、社会耻辱或经济困难等原因而不愿意生孩子。

许多医生不愿意做堕胎手术，但诸如美国医学协会和美国妇产科医生学会等医生团体反对政府的限制。抛开医学的因素，其他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我们能否证明强制性怀孕合理？强迫一个妇女生下她自己不想要的孩子是否道德？在另一方面，未出生的孩子有没有生存的权利？一个胎儿什么时候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人？

之所以会左右为难，是因为人们在生命何时开始的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赞成生命论的人们主张生命始于怀孕，因而结束胎儿的生存就是谋杀。一位医学研究者认为，生命和死亡一样应该被界定为从大脑活动开始——通常是在怀孕后8个星期。另一些人则认为胎儿离开母亲的子宫不能独立存活，因此还没有拥有人的生命。[46]

充满感情的各种争论依然继续着。赞成自我选择的人认为，禁止政府的堕胎资助是对贫困者的一种歧视，他们没有金钱支付私人医生或是到其他州进行合法堕胎。如果堕胎被禁止，人们就会回复到危险的自行流产或非法堕胎。这些方法常常导致妇女的死亡、严重受伤或不孕。同时，赞成生命的人主张，胎儿是一个有生命的和成长中的人类的生命形式，有权得到与其他人相同的保护和权利。

最近最高法院的裁决已对妇女的生育自由重新加以限制，承认生命从最初的一瞬间即已存在，而这在罗伊诉威德一案中是被否定的。各州可以拒绝用福利救济金或医疗补助计划基金帮助贫困妇女支付流产费用，或者可以要求未成年人在堕胎前必须先通知自己的父母。各州还可以要求所有想要流产的妇女先看一个胎儿生长的介绍，之后在流产前先等待24个小时。



堕胎仍是一个掺有大量感情因素的问题。近年来，一些反堕胎分子变得越来越崇尚武力。他们在诊所入口设置路障、非法闯入诊所、投掷燃烧瓶，甚至枪击工作人员。在上图中，芝加哥的“赞成自我选择”的示威者在人数上明显地多于惟一的一个“赞成生命”的示威者。

争论仍然非常激烈。在堕胎诊所前不时发生愤怒的示威、反示威和对抗——甚至有“赞成生命”的激进分子炸毁诊所、谋杀堕胎医生和工作人员。对公众舆论所做的民意调查发现，大部分美国人持赞成自我选择的立场，其中还包括许多不顾教会训诫的天主教徒。[47]

维持垂死者的生命

医院病床上一位垂死的86岁老妇心脏停止了跳动。医务人员很快采取了急救措施，包括心脏起搏、心内注射和除颤等，这个妇女重新活了过来。以后两个星期里，在这个妇女去世之前，这种情况又发生了3次。这一系列真实的情况，除了一些细节稍有变化之外，在全国各家医院都极为常见。医生是否应该让那个妇女或是其他像她这样的人安静地死去，而无须作那些“崇高的努力”呢？在其他医院的病床上有许多病人因为癌症而身体日益消瘦，不断地用大剂量的吗啡来缓解其疼痛。如果没有短期内延长生命的药物和手术，其中许多病人本来早已死去。但他们还是躺在病床

上忍受着痛苦，而毫无恢复的可能。其他病人昏睡在病床上，身体上连接着各种昂贵的仪器，维持着病人基本的生命功能，没有这些仪器他们可能会很快死去。

安乐死（Euthanasia）又被称作**减少痛苦的处决**（mercy killing），是指有意地促使或允许患严重疾病的病人死亡，大多数宗教和政府都禁止这种行为。但有意取消维持生命的努力，使垂死者逐渐自然死亡是不是一种错误的行为？由于州法律坚持医生有责任尽量维持生命，大多数医院的医生不会终止维持生命的措施，除非病人有遗嘱反对这种“崇高的措施”，或者除非病人的家人要求无须采取这些措施延长生命。1991年通过的病人自决法令，要求医院使新来的病人了解“生存遗嘱”的问题，并帮助他们完成一份遗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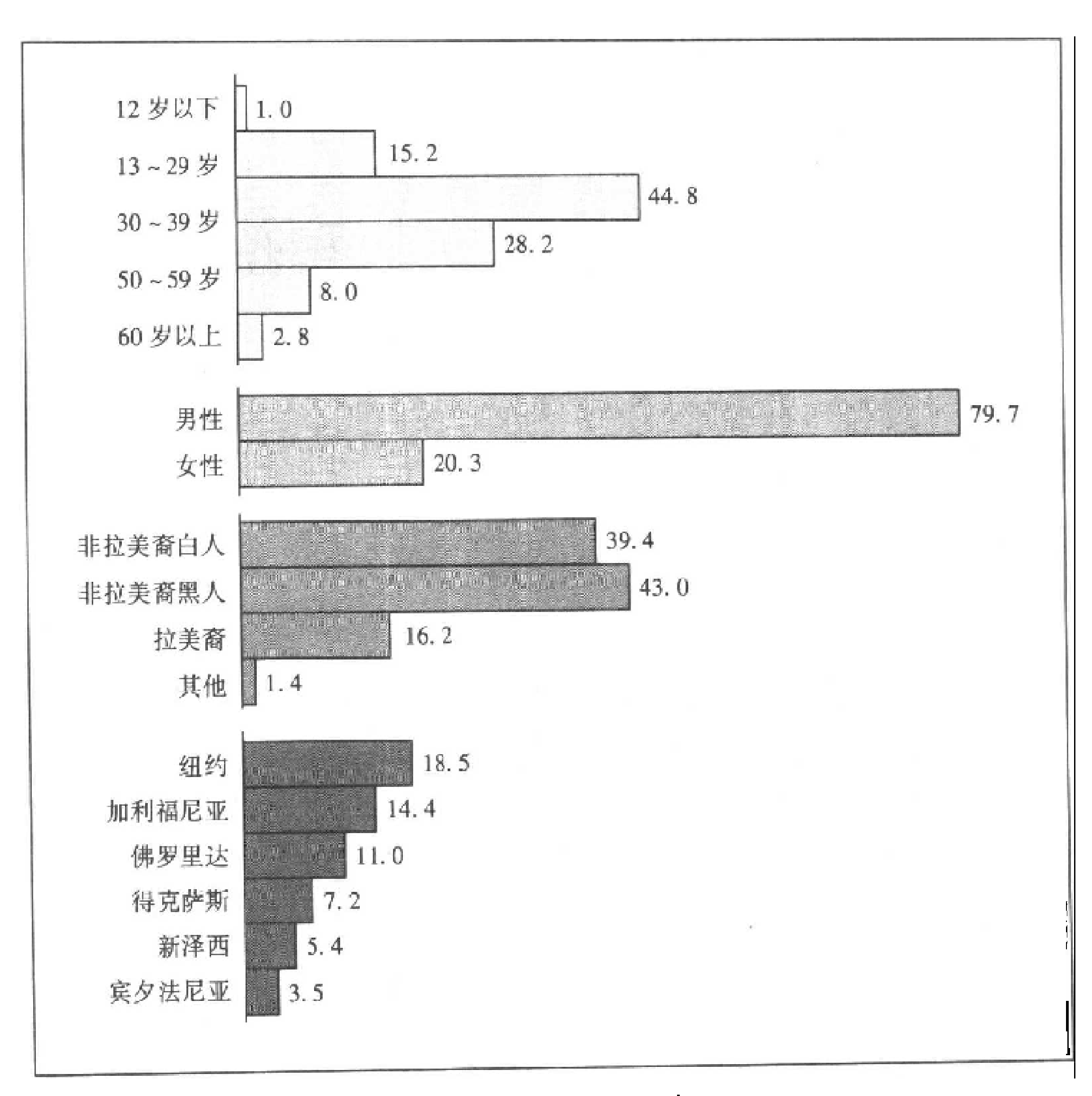
1997年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57%的测试者认为对晚期重病患者实行安乐死应该合法化。[48]在俄勒冈州，选民于1994年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批准了一项安乐死的议案，但国家生存权委员会利用法律手段阻止了它的实施。1997年6月，最高法院一致同意支持在各州法律中禁止安乐死，但为以后帮助晚期重病患者死去保留了一定的宪法争论的余地。[49]随后在1997年10月，最高法院通过驳回上诉去除了俄勒冈州法律中这最后一个障碍。[50]

如同堕胎的问题一样，对于安乐死的正反两方支持者继续各执一词据理力争。有趣的是，在1957年，保守的教皇庇护七世判定，在没有希望的病例中医生的主要职责是减轻疼痛，即使这意味着采取与延长生命相矛盾的行动。今天，许多医院利用一个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其中常常包括一位医学伦理学家）在这类情况中做出适当的决定，而不是由某个医生来承担这个沉重的责任。

艾滋病的猖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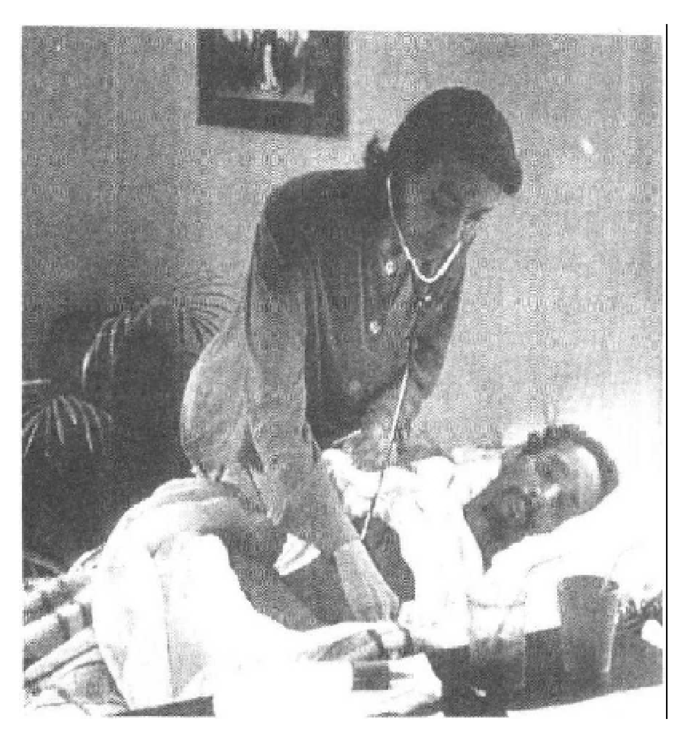
在所有传染病和导致死亡的疾病中，艾滋病（获得性免疫功能丧失综合症）也许是最为恐怖的。一种叫作艾滋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病毒通过破坏身体的免疫系统，并使它无法抵抗其他感染和疾病，从而导致艾滋病（参见图表12.2）。存在许多不同种类的艾滋病病毒，有些伤害性极强。因此有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会在两年内发展成为艾滋病，有些可能有长达10年之久的潜伏期。[51]一旦艾滋病完全形成，在两年之内死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在潜伏期内不会表现出任何生理症状，仍能将病毒继续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病毒的传染可以通过被感染者的血液、精液或阴道分泌物直接进入另一个人的血液。性行为中口腔、阴道或直肠里损伤的细胞膜、共同使用皮下注射针头，或是感染病毒的母亲通过血液传染给胎儿或通过哺乳传染给新生儿，都是已知的病毒传染途径。握手、拥抱、打喷嚏、咳嗽、合用器具、床或便器，及任何偶然接触都不会导致传染。



图表 12.2 谁感染了艾滋病（感染者总数的百分比），1996 年

资料来源：U. 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在找到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以前，医生对艾滋病患者除了提供简单的治疗和记录他们身体的衰弱之外，根本无能为力。艾滋病是美国25至44岁男性的首要死亡原因，在所有死亡原因中居第八位。致命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在医院床位、专业护理和开支等各个方面给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增加了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问题的范围

在美国，1989至1995年间有24.6万多人死于艾滋病。[52]在90年代，艾滋病是25至44岁年龄层男子死亡的首要原因，在全国所有死亡原因中居第八位。[53]在1996年，新发现的艾滋病例共有近5.8万起，比1995年下降了6%。大约79%新被确诊的艾滋病病人是男性。白人所占的比例一度最大，现在总共为37%。在少数民族中这种病正变得日益严重。黑人大约占人口的13%，但在新增的艾滋病例中占了42%，而拉美裔构成总人口的9%，但在新增的艾滋病例中却占到了19%。[54]

全世界有超过1200万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其中绝大部分——近800万——生活在非洲。但有预测认为，现在有200万病毒携带者的亚洲将会迅速上升成为下一个艾滋病中心。[55]在许多亚洲国家，男人很少使用避孕套并拥有相当大的性自由，而妇女则被要求在结婚时仍是处女，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婚外行为。因此大量男子常常同艾滋病病毒感染程度很高的妓女发生性关系。[56]在亚洲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泰国（自1990年以来有80多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显示了亚洲艾滋病的可怕前景。泰国公共卫生部预

计，到2000年累积的艾滋病死亡人数将突破50万，而到2015年，可能会有590万泰国人成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57]

对医疗保健的影响

在每一例艾滋病中，除了痛苦的个人悲剧外，它的传染蔓延也在医院床位、专业护理和开支方面给医疗保健系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每个艾滋病人的治疗一共需要大约10.2万美元，而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药物治疗也非常昂贵。[58]随着病人数量的增加，对于医疗保健系统、医疗保险金和医院开支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医院也将用在贫困艾滋病人身上的开支转嫁给其他病人。

精神健康

国家精神健康学会把深度精神病界定为严重干扰一个人日常生活的一个或多个方面的精神失常。根据最新的研究，国家精神健康学会估计，美国成年人口中有400万到500万人是严重精神病患者，约为总人口的五十分之一。除了有家庭的人口之外，估计有20万深度精神病人是无家可归者，而且大约有120万患者住在疗养院、精神病院或州监狱。[59]

精神失常的性质

精神健康专家对于如何分类或诊断精神失常的意见并不一致，同样也没有任何一致的公众认识。摩西在山顶得到上帝的训诫；圣女贞德听到超自然的神奇“声音”；摩门教领袖约瑟夫·史密斯同一个天使交谈；穆罕默德得到真主安拉的神启。他们都成了政治或宗教的领袖，而不是收容所的病人。在当代，一个人如果试图通过无声或响亮的祈祷同上帝进行直接的交流都是正常的，但如果一个人同自然界的精灵或亡魂谈话，则至少会被认为是“古怪的”。在城市里，行为独特的人比在小城镇更容易“逃避”别人的注意，在富裕地区也要比贫困地区好一点。即使是法庭指定的精神病医生在对同一个被告的检查中，也常常会对其精神是否健全意见不一（参见专栏12.3）。

精神失常可以有许多种形式，从性格失常或**神经官能症**（neuroses）（包括深度焦虑或消沉状态、忧郁症、恐惧症、冲动行为、由心理压力引

起的疾病等）到更加严重的失常或**精神分裂症**（psychoses）（包括偏执狂、性格分裂症以及更年期或身体衰退等生理变化引起的躁郁症和忧郁症等）。从社会学观点来看，我们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对问题的种种界定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反应和治疗上。

专栏 12.3 精神病骗局

加利福尼亚州的精神病学家D. L. 罗森汉在1973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他发表了对于精神失常诊断和治疗问题的一项试验结果。他挑选了东西海岸5个州的12家不同的精神病院，其中包括一些最有名的精神病院。他派了8位没有精神失常史的同事去这些医院寻求帮助。他们每个人在入院时都假称听到有声音在说一个词，如“砰砰”或“空虚”等。在其他方面，除了自己的姓名和职业外，回答的都是自己真实的经历。

在每一个病例中，他们都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并被接受入院。此后，这些假装的病人一切行动正常，也不再声称听到过任何声音。然而，所有医务人员对他们的反应都是基于原先的诊断，而不是他们目前的行为。一个幽默的例子是，当发现其中一个伪装的病人在对发生的事情做记录时，工作人员的病情记录上写道“有记笔记的行为”。他把这一行为看成是一种病态的表现。

有趣的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几乎立刻就能发现假病人是正常的，并且坚持认为他们要么是研究人员，要么就是新闻记者“来这里体验生活的”。但是，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有所察觉。假病人住院的时间从7到52天不等，平均为19天。即使得以出院，也是因为其精神分裂症有所“减轻”的缘故。

在这项研究公布后，另一所精神病院的行政人员对此表示怀疑，声称他们可以发现任何假病人。于是罗森汉宣布他将送假病人去那里。他们警告自己的工作人员保持警惕。在以后的3个月里，一共辨认出41个冒名顶替者是罗森汉派来的。而实际上，罗森汉没有派去一个人，全部的41个病例都是真的。由此，他再一次证明了在诊断精神失常中的主观性和困难。

社会经济因素

大量调查者对精神失常盛行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些概括性结论，但还应该对他们的发现持谨慎态度。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精神病学诊断究竟有多可靠，因为精神疾病比生理疾病更难准确地确诊，即使是精神病学家在诊断中也常常意见不一。此外，并不是每一个需要治疗的人都实际得到了治疗。相对富裕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可能会曲解他们之中的发病率，因为即使是最不起眼的问题也要去寻求心理治疗。第三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要统计在私人开业的诊所中接受治疗的病人的情况远远难于在精神病院等地获得相似的材料。第四，战争、经济萧条、快速的社会变迁等社会条件的变化能够加大

精神失常的发病率。

尽管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注意，但社会科学家们经过50多年的调查还是取得了一些相当一致的结论。在进行过的大量研究中，以3项主要的研究为主，加之以许多其他研究的发现成果。1939年，科学家调查了芝加哥的公立和私人精神病院的病人，发现精神失常遵循一定的模式，而不是在人口中随意分布的。[60]1958年，研究者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考察了在私人医生、诊所和医院中接受治疗的病人情况，发现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61]另一个调查小组1954年在曼哈顿市中心区进行了一次调查，以后又在1974年进行了一次跟踪调查，访问了各个阶层的成年人，以确定他们是否有过精神问题、接受过治疗或表现出神经性的症状。[62]研究结果再一次显示了较早几次研究所发现的模式。所有这些可以概括于以下几节中。

社会阶层 社会阶层和精神失常之间有某种关联。社会阶层较低的人精神失常发病率较高，而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中比例较低。贫困者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患精神失常的可能性更大，尤其是精神分裂症。在另一方面，神经衰弱症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中更为常见。

治疗也根据社会等级而有相当大的变化。下层的人较少接受治疗，但他们的住院率较高，而且在精神病院的住院时间更长。对这种模式可能的解释是，贫困者无法得到家庭的保护或帮助，他们必须求助于公共机构，而且与社会工作者、福利机构和法庭的接触较多。所有这些地方都会安排他们到指定的医院接受住院治疗。相反，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更可能是利用门诊或昂贵的私人机构接受治疗。如果被收容，住院的时间一般也比较短。心理疗法是富裕者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治疗手段，而在下层病人中更普遍的是药物治疗或电击疗法。

种族 无论精神病的盛行还是由此导致的能力（注意力、社会作用、工作能力）丧失者的比例在黑人和白人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区别。然而，重度精神病的流行和由此导致的能力丧失，显然同较低的教育程度和贫困的社会地位有关。在成年贫困者中重度精神病的发病率是非贫困者中的2.5倍。[63]

由于黑人中贫困者的数量很多，所以黑人中因精神失常住院的比例比白人高出33%也就毫不令人吃惊。他们中精神病的发病率与低收入白人相近，也就意味着精神病的高比例是一个社会阶级变量，与种族无关。如前面所提及的，社会等级较低的人更有可能住院而不是接受私人治疗，而且他们一般与社会机构，包括管理精神健康问题的官员有更多的联系。

性别 国家精神健康学会的调查发现，重度精神病患者中女性要多于

男性（分别为20.6‰和15.5‰）。[64]虽然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心理上的差异导致了这种差别，但另一些人则提出了一些可能的社会因素：生活在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给妇女带来的困难；妇女在社会化过程中比男人更需要得到帮助；社会上盛行的性别歧视倾向影响了主要是男性的精神病医生的诊断。关于最后一个因素，一项研究发现，妇女更有可能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而如果男性表现出类似的行为往往是可以被接受的。[65]

在所有婚姻地位群体中，男性因精神失常住院治疗的比例较高。14岁以上男性的住院率大约是女性的两倍。妇女更有可能被诊断为神经官能症（情绪失常）并接受门诊治疗，而男人则更有可能被诊断为心理变态（人格紊乱）并住院治疗。妇女更通常的是因抑郁和酗酒而接受治疗，尤其是当她们传统的母亲角色随着孩子的长大和离家而减轻时。[66]

婚姻地位 婚姻地位在精神失常病例中似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已婚者治疗和住院的比例要低得多，而未婚男女的比例都相当高。但分居、离婚和配偶一方死亡又是精神健康中的另一个重要的变量。[67]

社会学视角

除了生物上的解释之外，生理和心理健康的概念还深深地植根于社会文化的解释。社会学家提出了各种分析，以提高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主要围绕于公众期望、疾病发生率、目前的医疗保健和康复等状况。

功能主义观点

从功能主义的观点出发，医疗保健问题源于快速的社会变迁和公众态度的改变。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医疗开业的重点从家庭医生转移到专家和大医院。尽管病人的经济开销增加，但以医院为基础的医疗体制极其有效地为医生、医院、制药公司和药品供应商提供了大量收入。美国社会的自由企业观念和以诊疗费为基础的医疗制度，造成了医疗产业无序的和无计划的快速增长以及一个不均衡的医疗保健体系。

功能障碍 医疗机构和公司无序发展的一个后果使其日渐失去个性化色彩。病人和家庭医生间的亲密关系不复存在，一个求治病的人现在只是坐在候诊室的“下一个病人”，或是254号病房里的“大肚子”，或是急诊室里的“断腿”而已。另一个功能障碍的方面是第三方付款现象的增长，造成医疗费用由于虚报账目或不必要的开支而大大增加。此外，在国内不

同地区，医生与病人的数量极不平衡。最后，在公众所相信的私人和个人化的专业护理与形形色色大规模的医疗机构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距。功能主义认为，这一制度正在通过增加开设低收入病人的门诊、保健管理计划和控制第三方付款逐渐纠正自身的问题。

病人的角色 40多年前，塔科特·帕森斯提出了一个**相互依赖功能**(interdependent functioning)的过程，患者在其中通常采取一种被动的立场。[68]在病人的角色中，患者对疾病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而被免除了正常角色中的义务。然而，病人在求医和康复过程中必须合作和配合。否则，个人就会被认为是懒惰或装病，而其他人也不会原谅其逃避正常的角色义务。通过社会控制机制，社会调节和管理疾病及伴随而来的行为。这种分析虽然有一定帮助，但它并没有完全解释种族间的行为差异（如在患小病时不去求医），也没有解释将有些疾病归咎于病人的事实。

冲突论观点

冲突论者把有关医疗保健机制的问题视为是有钱有势者的统治所造成的后果。因为医生想要尽量增加收入，他们的诊所及其他高级的私营医疗机构主要设在富有的城市区域和郊区，有权有势的人集中居住在这些地方，而在农村或贫民区分布较少。此外，在低收入人群中婴儿死亡率和疾病发病率较高，而寿命较短，因为贫困者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较少。医疗保健不仅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而且是一项垄断行业。它全面操纵价格，通过限制新医生数量维持对医生较高需求，并有效地抵制来自外界的规范。

美国医学协会的游说活动 在许多为了自身利益进行游说活动的医疗团体中，美国医学协会作为一个无视公众利益而运用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准官方团体，给冲突论者提供了批评和攻击的目标。在过去50年里，美国医学协会力排众议，成功地抵制了建立起一个全国性医疗保险体系的努力。尽管在其他工业化国家都有这样一个类似的制度，而且它也有助于人们应付失去控制的医疗费用，但医疗界担心这会不利于其垄断医疗费用，及削弱其独立性并受到外界的控制。因此在过去，美国医学协会把这类建议都称为“社会主义医疗”或“马克思主义医疗”。除了成功地通过游说抵制这些提议，美国医学协会还向那些反对建立全国性医疗保险体系的议员捐赠了大量金钱，帮助他们在竞选中打败对手。国会对美国医学协会游说的担心和对其竞选捐款的看重，充分说明了一个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是如何损害公众利益的。

制度的不平等 除了指责卫生行业利用疾病获取经济利益，冲突论者还批评了它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有钱人可以负担得起私人护理，而贫困者在真正出现问题之前一直得不到重视。然后它们才会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在那里由于资金不足和专业护理人员素质低劣，根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关心。

冲突论者还强调，我们的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紧张和焦虑是精神疾病的一个来源。为取得成功进行的激烈竞争产生了紧张和巨大的压力，从而导致了某种形式的精神崩溃。受到经济剥削的人由于感到被疏远和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会形成一种常常引发心理问题的挫折感。这一观点认为，在低收入人群中精神变态高发病率是由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剥削。

相互作用论观点

相互作用论观点的某些方面在本章中已经有所涉及：医生的专业化和大型医院使得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缺少人情味，对生理或精神病人进行分类的影响等。在考察医疗保健的问题时，相互作用论者强调人们通过怎样的手段交流、界定和改变疾病的社会现实。一个人健康与否，取决于他人的界定和由此导致的自我概念。可以进一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社会的相互作用模式是如何有助于解释精神疾病的。

生活中的问题 根据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茨的观点，精神失常并不是一种病，而是无意识地逃避令人不快的现实。[69]有些社会因素——如不堪忍受的身体或感情状况，或是生活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会造成个人无法应付这些问题，而采取自卫性的策略逃避角色，将自己伪装成另外一个人。由于精神病学家是根据自己的行为规范做出价值判断，因此被确诊的精神病常常是“虚幻的”。它用强制治疗来惩罚人们，从而使他们失去了面对责任的自由和机会。

专制机构 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社会学家艾尔文·戈夫曼用了一年时间在一家精神病院做护理工作。他可以充分接近病人，并记录下自己的印象，由此得出的重要成果引起了出院率的改变。戈夫曼发现，在一个**专制机构**（total institution）中停留较长时间往往会造成相反的效果。病人们同社会其他部分相隔绝，过着一种封闭的和管制的生活。[70]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抛弃自己过去可以自主的角色，完全接受住院者的角色，完全依赖于机构满足一切生理需要。医务人员一般按照机构的预期对待病人，忽视他们正常的行为，而记录下各种异常举止。任何人要挑战这个机构，就会被认为是肇事者。于是有些病人变得内向和逃避，而其他人则依

然消极地顺从于种种规定。

戈夫曼发现，精神病院的氛围会进一步恶化人们的精神问题。而且由于他们越来越适应自己病人的角色，他们出院的机会随着住院时间的延长而越来越小。今天，大部分专家都承认这种机构化的交流所存在的长期不利影响，从事精神健康的专业人员现在也力图在几个月内就使新病人出院，以免其丧失为其行为承担个人责任的能力。

未来的选择

医学进步和基因研究有望在2030年使医疗保健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到那时，我们将已经拥有人类的遗传基因全图，通过改变基因可以治愈许多疾病。利用人造或天然的代用品替代受损的人体部件将延长我们的生命。通过确认出大脑中数百个神经传递素，医生能够用特殊的药物对抗消沉、精神分裂症和衰老等精神失常。通过放射和药物治疗以及激光等新技术的引进，现在的许多手术将不复存在。

然而，我们未来的前景并不是集中在科技进步之上。在本章开始时，我们曾经讨论过，尽管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医学成就，但医疗质量并没有提高。只要社会中依然存在着不平等，没有任何医疗保健体制能够解决贫穷、偏见和歧视所造成的问题。因此，以下两个截然相反的前景是根据目前的趋势指出的可能的前进方向。

悲观的前景

在2030年，医疗费用随着科技奇迹和神奇的医学成就而飞速上涨。高科技医学的日益复杂化使得全国用于医疗保健的开支达到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且预计在20年内将会升至20%。尽管改革的呼声非常强烈，但医疗体制所反映的变化仅体现在两个方面：医院行业被以盈利为目的的医疗公司所控制，并形成了两级的医疗体制——一是为私人保险的病人，一是为穷人和不太富裕的人。第二个层次的病人很少从昂贵的高科技和资源中受益，包括人造心脏。

尽管医学成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它们对造成许多健康问题的社会和环境原因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虽然环境污染使得人口中因污染物引起的疾病迅速上升，但贫困产生的发病率仍然更高。长期不良的卫生健康习惯和过度放纵，使很大一部分人在中老年时遭受健康问题的折磨。大量老

年人口现在患着无法救治的退化性疾病，给公共医疗机构及其家人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压力。生活变得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张，巨大的压力常常产生生理和心理的健康问题。

由于在药物治疗上取得的进步，很少有人需要长期住在精神病院。但曾经对精神病院病人的康复至关重要的长期门诊护理却出现了恶化，因为社会对这些病人继续药物治疗以防止复发和情绪波动的必要性漠不关心。公众对心理失常者的恐惧依然很强烈，因此抵制在住宅区附近建立社区精神健康中心，使其数量太少。而治疗机构中人员继续短缺，病人通常得不到充分的帮助。只有有钱人才能负担私人门诊治疗的费用。

在医学上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在许多方面，我们却毫无进展。医疗垄断在许多人被病魔折磨的时候日渐繁荣。有些地区仍然缺少医生和高质量的医疗护理。同20世纪末一样，在贫困者中的婴儿死亡率、发病率和寿命等指标更加恶化。普通的家庭每年要将8个星期的收入完全用于正常的医疗费用，而如果有家人长期患重病，家庭就要为支付昂贵的费用而背上沉重的债务。患有精神失常的人依然受到社会的歧视，而对他们的护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等级。

乐观的前景

在到2030年为止所有的医疗变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可能是，医疗保健体制转变为3个主要的部分：预防、矫正和环境。许多医生还是和在20世纪一样，为病人提供急诊救护和治疗。然而，医生人数的过剩（在世纪之交大约为14.4万人）及在住院和外科手术中对费用的严格控制，迫使许多医生重新调整自己的职业方向。

预防医学在未来大有可为，尤其是预付团体医疗保险的做法，为医生提供了稳定的收入和顾客。设立在购物中心、城市街区和医疗园区的疾病预防诊所遍布各个社区，大大方便了顾客。通过疫苗接种和健康教育（关于饮食、营养和锻炼及酒精、烟草和其他毒品的影响等），他们强调防病于未然。定期体检、测量血压和对慢性病的简单检查，有助于在整个人口中减少患病的风险。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投入到环境医学之中，通过改善环境质量，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并因此而找到了自我满足。由于预先固定了个人医疗费用，住院率和手术率现在要比几十年前降低了25%左右。

一个有着严格开支控制的全国范围的医疗保险计划终于成为了现实。这一计划开始于大约25年以前，尽管受到美国医学协会的强烈反对，还

是迫使医生放弃了对诊疗费和某些治疗决定的完全控制，但医生仍然可以获得非常可观的收入。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全国性的健康计划的施行，美国在为全体公民提供医疗保健方面赶上了其他工业化国家，属于下层的社会等级不再意味着得不到充分的医疗保健。婴儿死亡率现在已降低，人均寿命也大大升高。贫困仍是一个大问题，但它对健康的消极影响现在已经得到了控制。

由于神经生物学领域的发现，一个开明的社会对精神失常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从事精神医疗工作的专业人员比以往要接受更多的训练，并且必须接受行为科学课程的学习。因此，他们能提供更多和更加有效的帮助。运用药物直接作用于大脑的神经传递素可以有效地控制精神病。这不仅纠正了存在的各种问题，而且使得医务人员可以做出准确的初步诊断。今天几乎所有的精神病人在一个月内都可以出院，此后便可在其住处附近的门诊所定期进行检查。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美国医疗保健状况的改善，并不是因为任何科学的或无私的突破性成就，只是由于医生们意识到这才是符合他们经济利益的做法，从而重新调整工作重点。

小　结

1. 美国在医学领域取得了许多进步，投入医疗保健的资金高于其他任何国家。但荒谬的是，我们的医疗体系的质量不高，分布也不均衡，而且在健康方面的多种数据也落后于其他国家。
2. 医学的进步造成了生命的医学化，使得人们屈从于医疗行业人员的控制。不断的专业化和医疗机构的发展，使得医疗保健和以医院为基础的治疗失去了人情味。尽管现代医学对主要的死亡原因无能为力，但批评者还是指责它剥夺了病人的权利，而且由于诊断、用药或手术中的差错，甚至可能成为对健康的威胁。
3. 由于医疗行业是以收费为基础的，所以医生和医疗机构的分布很不均衡。在富裕的郊区和城市地区过于集中，而在小城镇和低收入住宅区则极为缺乏。私人开业非常赚钱，但现在有太多的外科医生。因此，出现了许多毫无必要的手术。医生越来越多地采取保护性治疗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起的医疗事故诉讼。
4. 无论是营利的还是非营利性的医院都从延长病人的住院时间中获利。直到最近，诊断、治疗和护理的收费完全是由医院决定，而第三方付款者不加怀疑地予以支付。医院为了获得昂贵的新设备和进行大量的

(常常是毫无关系的)检查,造成了医疗费用飞涨。尽管政府有了新的限制措施,但不必要地延长住院时间的做法仍然时有发生。

5. 医疗保险使许多人得到保险的保护。无论是雇主为雇员提供的、还是政府提供的(医疗补助计划和老年保健计划)的医疗保险,都用预付治疗费用代替了过去的空白支票的付款方式。健康维护组织这类计划的出现,是私营企业对付高额医疗费用的一种办法。各种健康维护组织现在吸收了约五分之四的美国人,他们都是由雇主为其投保的。然而,在保健管理中,这些组织有时会为了降低开支,拒绝给病人进行一些必要的检查和服务。
6. 在美国每年150万例堕胎手术中,82%涉及到未婚妇女。对于这种行为是"对"还是"错",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另外一个需要做出艰难选择的领域涉及到,是否要用崇高的努力尽力挽留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生命。
7. 艾滋病是24至44岁男性死亡的首要原因。每年有5万例新的艾滋病例被发现,黑人和拉美裔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非拉美裔黑人(43%)是最大的一个受感染群体。在全世界,1996年共有1200万已知的艾滋病例,其中亚洲在以后10年里会出现一个迅速的增长。
8. 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影响着大约四百万到五百万美国人。专家一致认为,这些疾病需要接受专业的帮助。社会科学家发现,在精神失常的发病率与治疗和社会等级、种族、性别、婚姻状况及年龄等变量之间,有重要的联系。
9. 功能主义观点考察了医疗保健体制对从业医生和供应商的实际利益,以及缺少人情味、高成本、文化差距和不平衡的医疗质量等功能障碍问题。冲突论者强调医学精英阶层和相关的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其他阶层的剥削,指出制度是如何造成许多健康问题的。相互作用论集中于对疾病不同的社会解释以及影响诊断和治疗的各种行为方式。

关 键 词

生命伦理
保护性的医疗
安乐死(减少痛苦的处决)
健康维护组织
相互依赖功能
医疗事故
医疗补助计划
老年保健计划
神经官能症
过度治疗

精神分裂症　　　　　　　　　　专制机构

推荐书目

Birenbaum, Arnold. *Putting Health Care on the National Agenda*. Westport, Conn.: Frederick Praeger, 1993. Fine overview of the American health-care system and its problems, particularly rising costs, with discussion of various reform proposals.

Braithwaite, Ronald L. and Sandra E. Taylor. *Health Issues in the Black Communit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2. Examines such health concerns as AIDS, heart disease, substance abuse, and violence that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 the black community.

Conrad, Peter, and Joseph W. Schneider. *Deviance in Medicalization: From Badness to Sickness*. St. Louis: Mosby, 1980. An excellent sociohistorical analysis of how society redefined its social problems in medical term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changed values and attitudes on American life.

Colombotos, John, and Corinne Kirchner. *Physicians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A fine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soc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values and attitudes among physicians.

Goffman, Erving.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61. This classic participant-observer study still offers fine insight into how daily interaction patterns in a mental hospital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to patients' well-being.

Illich, Ivan. *Medical Nemesis: The Expropriation of Health*. New York: Pantheon, 1976. A carefully documented attack on modern medicine's inability to cure disease despite expensive procedures. Not only is faith in medicine unjustified, the author argues, but health care is often harmful instead of helpful.

Mechanic, David. *Inescapable Decisions: The Imperatives of Health Reform*.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1993. A leading medical sociologist offers an extensive portrait of the U.S. health-care system and argues for basic changes in our national priorities.

Nuland, Sherwin. *How We Di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4. An unsparing look at death in all its forms by a surgeon who wants doctors to regain their pastoral function of ministering to the dying, not staving off death at any cost.

Sherwin, Susan. *No Longer Patient: Feminist Ethics and Health Ca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An examination of the ethical issues in medicine, which the author insists must be resolved in a Feminist context.

Starr, Paul.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out the nation's history, with an analysis of why we are now confronted with problems of poor-quality health care, corporate medicine, and physician dominance.

Waitzin, Howard. *The Second Sickness: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t Health C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A scathing critique of the U.S. health-care system Conflict perspective.

第5部分 对生活质量的挑战

社会因素——诸如移民模式、技术进步、价值转变和政府决策等——常常会引发整个社会的改变，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其中的某些变化是社会技术发展的间接后果，如汽车的发明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另一些变化则反映了我们与世界生态系统互相之间的日益依赖。不论是原因还是结果，社会学家都使用“宏观社会”的概念来描述人类经历中的这个重要方面。

社会的所有改变，即使是相当有益的改变也会产生一定的负作用——或者是损害了人们的生活，或者是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例如，由于医学进步有效地克服了致命性传染病的发生，从而大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但在一些文化观念中仍然崇尚大家庭的不发达国家，传统的高出生率依然居高不下，引发了全球性的人口问题。科技能够造福全人类，但也带来了大气和水资源污染以及有毒废物处理等各种新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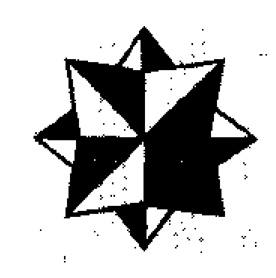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研究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些“宏观社会”因素：我们在哪儿居住，我们如何生活，人口压力，以及各生物体在生态系统中的相互依赖。

第 13 章强调的是老的美国城市和迅速扩展的阳光地带城市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郊区的城市化、住房问题和城市改造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如果你不是生活或工作在城市又会怎样？由于城市和郊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都市的不断扩展，您的生活质量仍然依赖于我们居住的城市里所发生的一切。

第 14 章解释了我们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其他国家发生的变化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随着世界人口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自然资源的迅速消耗日益严重。应该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尝试调整他们的人口政策？食物和水的供应、以及地球上的其他物质资料，是否能无限制地满足这样不断增长的需求？人口的大规模聚居和工业化也限制了我们这个星球自我清洁环境的能力，污染、毒害和有毒废物都超出了生态系统的负荷极限。

贯穿本部分的是这样一种想法：这些严峻的问题不仅需要国家的政策和保障，而且需要全球的合作机制的协调。您将发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人口和生态问题直接影响到美国人的生活质量，我们分享着同一个生态系统。此外，您还应对解决这些问题具有影响的相关社会界定和价值取向加以必要的重视。

第13章 城市的兴衰



关于城市的几点事实

- 边缘城市是最新的美国城市中心。
- 超过3千万的美国人在市郊之间穿梭，引起了郊区的交通堵塞。
- 大约460万的美国人住公共住房。
- "符合人性的住处"组织已经在城市里建造了3.2万户新家。
- 在美国60万个无家可归者中三分之一是举家流浪。
- 美国无家可归的人中有75%是儿童。
- 七分之一的美国人住在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的人口稠密地带。
- 近郊和城市存在着许多同样的社会问题。

城市往往体现了一个社会中最美好和最阴暗的一面。由于其规模庞大、人口集中、种族混杂，城市常常会凸现整个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城市是经济、文化、政治和宗教的中心，是文明的中心。作为机会的象征，城市不断地吸引着来自各地试图解决自身问题的人们。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个城市繁荣的关键都在于它与周围地区的相互依赖。只要相互得益，城市及其外围地区便能够繁荣。但当这种互利关系不复存在，如农业不再继续维持一个城市的人口，或者由于城市失去了工业、人口和税收基础而变得完全依赖于周围的土地时，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将随之产生。

保持地区整合的失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城市会陷入到困境之中。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城市像我们的城市这样恶化和衰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城市的衰退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由于长期以来政府的漠视、错误的决策和私营业主的剥削。

本书所讨论的社会问题在许多城市中非常严重。毒品、犯罪、帮派、暴力、贫困、种族关系、无家可归、教育质量低下、家庭不和，缺乏健康保障、污染，以及路桥、人行道、水、垃圾处理系统等**基础设施**（infras-

tructure）的老化，使得越来越多富裕的美国人远离城市，锐减的税收基础、沉重的预算问题，城市的日益老化暴露出一派没落之势。在这一章我们将尝试解开这些问题。

社会历史背景中的美国城市

在20世纪的前60年里，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居住在一些中心城市，其影响扩散到周边城镇和村庄。城市里有最好的工作、最好的学校和商店，城市提供各种各样的休闲娱乐活动。虽然郊外住宅区在整个20世纪里一直存在，但人们大规模地迁离城市则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解决由退伍军人和生育高峰引起的住房不足，国会于1949年通过了住房法案，鼓励在城外的空地上建造房屋，并对这些廉价的郊外住房大肆宣传。通过政府担保，由联邦住房管理机构或者退伍军人管理局提供抵押贷款的形式，鼓励城市居民向郊外迁移，以此来解决住房不足的问题。

联邦政府其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也促进了人口的这种变化，城市改建使得旧街坊大量拆迁，迫使居民搬往其他地方——通常是郊区，因为城市里几乎没有新建住房。新开通的州际公路和高速公路使得大批开发商将视线转移到郊区的空地，便捷快速的交通使上下班时间大大缩短。[1]

20世纪60年代，城市郊区进入迅速发展的阶段，大型商场增多，并超过了传统的城市商业区，如北美零售中心。到了70年代，郊区达到了足够规模，人口基数的增长足以支持各种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许多地区性或全国性公司总部开始从市区迁到郊区，兴建并开设了银行、电影院、餐馆、法律和医疗机构、医院乃至旅馆。随着郊区经济活动的增多，各种商务楼和轻工业园区也纷纷拔地而起。[2]

许多城市过去都曾是以某种特色工业而繁荣起来的，例如，底特律是汽车制造业中心，艾克伦是橡胶城，匹兹堡是钢城，斯克兰顿和威尔克斯－巴里是煤矿城，格兰德拉比德斯是家具城，布里奇波特是金属贸易城，帕特森是纺织城。然而现在，由于全球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这些城市都落入了低谷，在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转化的过程中，这类城市成为电信革命的牺牲品。通过建立信息和服务的交互网络，商业公司可以开设到任何地方。

美国的城市变迁

80年代，城市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模式，即如乔尔·加罗所称的“边缘城市”。[3] 所谓**边缘城市**(edge city)是指位于老城区边缘、新兴的、外延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依赖于汽车的城镇区，有独立的居住、工作、购物和休闲娱乐场所。在这里，有大量的工作机会；在这里，安全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在这里，不同社会等级间的种族融合成为了现实(参见专栏13.1)。

根据加罗的说法，边缘城市可分为3种类型。最少见的是**绿地城市**(greenfield city)。它是由开发商在大片农田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开发而成的，

专栏13.1 美国城市的新形式

早在《边缘城市》一书中，乔尔·加罗便做了一个惊人的断言：“大多数美国人设想中的城市不再与现实相符。”这就是说，如果认为城市就是一个由大片郊区住宅所环绕的城市中心，里面是“不断增高的钢筋水泥建筑……像积木一样整齐分布，再加上人行道，它有着明确的政治边界，由一个市长所管理”，那么你对城市的认识显然是狭隘而过时了。我们的确建造过这样的城市，比如纽约和旧金山，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即大约1840年到1920年间，其中有些城市至今依然保持繁荣。但另一个事实是，“在最近75年里，我们没有从无到有地建起过一座旧式的城市”，我们所新建的基本上都是边缘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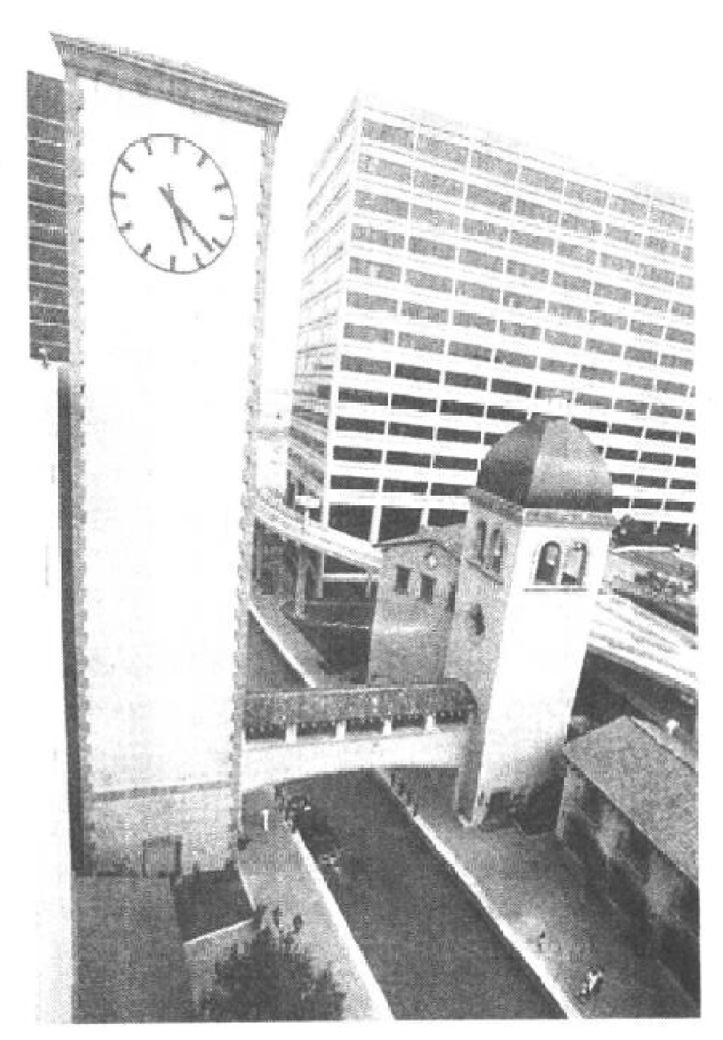
如果想了解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开上车子一直驶上与市中心干道相接的环路上。你会发现大部分美国人都住在那些地方（只有8%的美国人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88%的人生活在人口不到50万的中小城市），在那里就能找到边缘城市。据加罗统计，现已有120座边缘城市，还有大约同等数量的城市正在形成。如果考虑到目前的发展趋势，那将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至少要有500万平方英尺的可出租办公场地和60万平方英尺的零售场所，才能称得上是一个边缘城市。

每一个边缘城市都不可思议地相似。弗吉尼亚州泰森康纳的商场和办公楼停车场能够在一夜之间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两者几乎毫无二致。普通的边缘城市基本上都是无计划发展形成的，效率低下，丑陋不堪，它常常会令城市设计者们——规划师和建筑师感到难堪。但在另一方面，美学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边缘城市的法则主要是算术。如果一个开发商觉得他不能以地价的4倍卖出他的房子，那么一开始他就不会建造这座房子。

几乎每一种影响边缘城市发展和管理的决策迟早都要涉及到钱的问题。这产生了许多难以解释的无形的难题，例如生活质量。不过，生活质量并非总是有害的。加罗发现，在过去20年里，基本上与边缘城市的真正起飞相同步的，是美国人在文化活动如运动等方面的花费增加了一倍，一改70年代两者平衡的局面。美国城市区的衰落也很难一律归咎于边缘城市的兴起，那些拥有成功的边缘城市的自治地区，往往同样拥有繁荣的市区。

资料来源：Malcolm Jones, Jr., “Reinventing Paradise with Plenty of Parking,” from *Newsweek* (November 18, 1991),

如得克萨斯州达拉斯以西的洛斯科利纳斯，或是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东南的艾尔文。另一种是**住宅型城市**（uptown city），它建造在以前的汽车城市之上，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纽约州的怀特普兰。另一种是**新兴城市**（boomer city），这是最为常见的边缘城市。它一般位于两条主要的公路之间，以一座大型购物中心为中心，这样的例子有位于华盛顿外弗吉尼亚州的泰森康奈，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西北的贝尔特维特区和普鲁士国王区。新兴城市最初并非作为城市进行规划设计的，因此建筑物之间缺乏联系，交通堵塞司空见惯。由于经过了一定时期的发展，住宅型城市较之枯燥乏味的新兴城市更具特色。[4] 绿地城市则力图通过开发商对交通模式和土地运用的控制，以防出现新兴城市中常见的混乱格局。



位于达拉斯以西的洛斯科里纳斯是一座典型的边缘城市。它占地数千英亩，是根据一个开发商的总体计划建成的绿色城市。它被指责为单调而缺乏城市的特征。这些中产阶级聚居、依赖汽车轮子的城市，是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工作、购物和娱乐的地方。

都市的扩展

由于大都市地域的扩展甚至相互重迭，因此就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区**（megalopolis），或是形成相毗邻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和郊区地带。一座特大型都市不遗余力的扩展会牵涉到许多人。随着美国人越来越多地搬离城市中心来到郊区，也带来了城市生活的种种标志：商店、办公楼、工厂、医院、犯罪、拥挤和污染。由于人口的增长和扩散，开发商们吞并了更多的空地。一座座城镇看上去都一模一样的，公路两旁的商店竖起各式招牌，向快速驶过的汽车宣传它们的商品，任何外出活动都只能以车代步。

人们为都市的扩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由于居住区的分散，医疗和商业机构以及工厂企业遍布四处，居民对汽车的依赖日益增强。每一个人、每一样东西都是四处分散，以致外出交通根本难以做到精简节约。由于工作地点与公路交通并不配套，因此交通堵塞是不可避免的结果。除此之外，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汽车的。使用汽车的生活方式对于贫困家庭、老年人、残疾人和青少年来说是一种歧视。例如，在一些郊区城镇，青少年由于没有足够的娱乐活动，自己又无法去那些有娱乐活动的地区。这样，他们的父母只能花大量时间开车带着孩子到商店、青少年活动室和其他地方。

当一个公司受税收优惠或其他附加效益吸引而迁移到郊区，城市就会失去相当一部分的就业机会、税收收益。原来以该公司为客户的商店、旅馆和服务机构也会相应地失去大量的商业收入。而在新的地方，又会出现其他各种问题。多项研究表明，迁址之后，员工因上班距离增加而交通费用增多。[5] 没有汽车的低收入工人不得不合用汽车或者更换工作，而这都需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公司也会增加一些新的开支：维护场地和停车场，经营附属的自助食堂，与法律咨询、市场、证券交易及相关专业部门的信息联络。公司最终又将这些开支间接地转嫁到了公众的身上。

根据非营利性地区计划协会的估计，建在郊区地块上的办公用房，人口每增加500万就要占用0.5英里宽、54英里长的耕地。[6] 而大城市的摩天大楼，占地只需200英亩就足够了。在郊区面积为1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场所，一般要用去80英亩的土地（其中25英亩用于停车场），而在大城市只需占地1英亩，其中还有一半是广场。在较小型的城市，同样100万平方英尺面积用地大约为6英亩（可建成为包括绿化和停车场在内的25层大楼）。

交通堵塞

目前在美国，长期使用从郊区到郊区间往返车票的人是郊区到市中心间的2倍。超过3千万美国人在郊区之间穿梭——这些地方的公用设施、道路、桥梁和运输线路都还不完善，因此，交通堵塞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了。

> 例如，曾经非常宁静的芝加哥郊区罗林迈德和阿林顿海特，现在每天都有8万辆次汽车经过……大量汽车缓缓开往辛辛那提，一部分开往圣路易斯……设计者们预计，沿着美国一号公路，从新泽西州的特伦顿市到不伦瑞克市的“普林斯顿走廊”（在过去10年里已从草地变成购物中心和办公场地）的短短20英里，到2005年开车驶过也许会用去5个半小时。[7]

郊区的交通堵塞是全国性的问题，从佐治亚州的格威纳特县（全国发展最快的一个郊区）到洛杉矶盆地（此地每天约有共计8万4千个小时耗在交通堵塞上）。[8] 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运输量继续以1987年至1991年的比例增长，那么旧金山还需要增建528条大小道路。[9] 想像一下：如果一个工人每天在路上用掉20分钟——上下班各10分钟——共工作45年，那么将有近2年的工作时间花在了交通上。[10]

在过去几十年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的人持续下降。调查结果显示，已从1960年的12.6%下降至1990年的5.3%。更为惊人的是，使用长期车票的人数也下降了22%，从1960年的780多万人到1990年的不足610万人，尽管在同时期里人口增长了39%，就业人数增长了78%。在全国范围内，只有5%的职员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虽然在人口稠密的东北部地区，约有12%左右的人依靠公共交通。[11]

仅在8个主要城市里，公交车才有着重要地位。其中7个城市（芝加哥、华盛顿特区、波士顿、旧金山—奥克兰、费城、檀香山和匹兹堡）的公共交通仅为10%～16%，纽约最高，占30%。[12] 在小一些的大城市里，公共交通不足2%，这一比例看来不会很快改变。亚特兰大、波士顿、芝加哥、克利夫兰、纽约、奥克兰—旧金山、费城和华盛顿特区都有地铁系统，在使用公共交通的人中乘坐地铁的人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表面看来，扩大和发展快速交通系统是一个解决城市交通拥挤和堵塞的理想途径。一辆快速列车能在一小时内运送4万名乘客驶过一个站点，而按一辆小汽车乘员1.8人计算，则需要另辟16条公路才能完成此项任务。[13]

在大部分美国城市，公共交通处于一种无法由一方单独经营的状态。政府拥有并经营大多数线路，并视为“公用事业”，但又坚持它们必须自负盈亏。由于政客们人为地降低价格以取悦选民和增加乘客，乘坐的舒适乃至于必要的保养，都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如果可以自主地决定公共交通是采取私营、政府经营还是公用事业的形式，那么才有可能计划周详。在大多数欧洲城市，整条线路都采用快速交通系统并作为公用事业经营，那里的公共运输系统要更为完善。[14]

多年来，公共交通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乘客人数直线下降。这不仅是因为大批居民迁往郊区或是交通条件恶化，部分是由于收入引起的恶性循环：收入减少——恶化——乘客减少——收入减少，政策的忽视更加剧了这种恶性循环。回顾1980年，波士顿的公共交通系统主要由于没有政府机构负担债务而被迫关闭。在纽约，这个类似的问题已争论多年：在城市、州和联邦各级政府的预算里，应该负担多少公共交通系统的赤字。联邦政府缩减公共交通补贴明显地阻碍了提高城市公共交通的努力。然而，公共交通每年要运送七八十亿乘客，对于城市经济的活跃，其地位仍然极为重要。[15]

住房问题和对策

许多中心城市缺乏足够的供中等收入家庭居住的房屋，难以满足人们需求，还有许多低档住宅也需要改建。当前城市的住房问题大部分可归因于60年前的政策和措施。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联邦政府开始资助白人迁往郊区。通过联邦住宅银行系统（1932年）、住房贷款公司（1933年）和全国住房法案（1934年）以及由此成立的联邦住房机构，银行的操作也亦趋灵活，它允许居民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购买住宅。1949年的住房法案，加上联邦住房机构提供的贷款和二战退伍军人救济处资助在空地上兴建住房，推动了50年代到60年代郊区的繁荣。在这段战后建设的繁荣时期，联邦住房机构坚持一条官方政策，即不给取消种族隔离后的地区提供建筑保险，因而导致了这些地区房屋的日渐破败。

画红线和废弃

在联邦住房机构放弃对不急需发展的地区提供财政支持的做法很久以后，银行、借贷机构却依然如故。**画红线**（redlining）——在地图上用红

线圈出所谓“极危险”的街坊——对这些地区借贷机构拒绝提供任何形式的抵押或住宅发展贷款。于是乎，这些地方的老房子日益破旧，难以吸引买主，银行家们因此更坚信其做法的明智。即使到了视这种行为为非法的今天，“画红线”的做法却依然存在，银行家们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称，这样做是由于这些房屋状况在恶化，而不是恶化的原因。[16]

由于受到不断上升的燃料和保养费用、城市住房贷款、税收增长、租房控制法和愈来愈普遍的各种城市问题所困扰，城市的出租业主发现自己处于难以为继的状况下。由于不能够增收房租、获得更多贷款或出售他们自己的产业，许多业主就采取不进行必要的修理和偷税漏税的办法来榨取最后一分利润。之后，他们抛开房产去吸毒、抢劫或成为纵火犯。

一旦城市开始衰落，就很难遏止。任何一个能够搬走的人都会搬走，贫困无助者就只能留下应付恶化的城市服务和不断上升的犯罪率。每年都有15万套房屋和公寓被废弃。[17]纵火已成为一种新兴的犯罪，并逐年增加，现在每年发生的纵火案超过1.5万起。[18]

城市改造

随着以有计划改造城市旧街坊为目标的1949年住房法案的推行，**城市改造**（urban renewal）暴露出显而易见的破坏性。首先，清理贫民窟却又不向被迫迁离的穷人提供搬迁住房。这种举措破坏了整个生活环境，粉碎了房主对旧住宅的满心依恋、邻里亲友间的亲密情谊和生活。其次，城市把清理出来的土地转让给私营开发商，而他们总是选择建造最有利可图的房子——几乎从不会为低收入阶层建造房屋。

一项研究表明，经改造后的建筑36%用于住房（大多数面向中上阶层），27%用于工商业用途，37%成为学校和政府建筑。[19]另一项研究显示，从1949年到1965年，只有16.6288万套新建住房替换了在城市改造中被拆毁的31.1197万套住房。[20]虽然耗资达30亿美元，美国的城市改造实质上是大大减少了廉价房屋的数量。[21]

城市改造中最臭名昭著的破坏当属波士顿最西区的改建行动。这里原是一片旧住宅区，设计者们彻底拆毁了这一整个意大利裔街区。[22]著名的城市社会学家简·雅各布反对指出，这是一个令人自豪的、紧紧相依的、稳固的社区：“如果它是一个贫民窟，那真希望我们能有更多一些这样的贫民窟。”然而，这个有良好风尚的古老街区被迫消失了，居民被分散安置，取而代之的是高层豪华公寓和办公大厦。

公共住房

另一个失败的举措，就是1937年住房法案推行的为穷人修建**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计划。此处的问题在于，政策制定者忽视了人们的需求及相互间影响这一基本的社会心理：贫民窟并不是单纯物质意义上由破旧房屋所组成的。贫民窟是一个环境，在那儿人们缺少个人约束，冷漠、疏远、没有集体意识、挫折感强、沮丧、缺少生活的机会。因此，试图纯粹用物质改善来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其结果只不过是政府又另外建了一个新的贫民窟。

而被称做"高级住房"或"州少数民族区"的建筑设计，事实上反而加剧了群体间的孤立和疏远，以及早已盛行于缺少管理、低收入地区的犯罪活动。生活在那些隔离的、刻板的、专为少数贫困群体设计的地方，是对人的侮辱，而且穷人们认为所建造的只是劣质住房。再者，收入的限制意味着无法拥有汽车，穷困人群因而更加集中，根本难以为孩子们作出成功的榜样。

目前大约共有460万人居住在130万套公共住房里，占全国房屋总数的1%。[23]其中许多房子几乎无法居住，急待修理或改建。然而在1993年，芝加哥住房机构提议拆毁凯布瑞尼－格林地段少数民族居住区的3600套6层楼的破旧住房，将居民迁移到面积较小的为工人建造的福利住房里，但遭到了居民的强烈反对。1995年，芝加哥法院通过了一个2亿美元的计划，该计划打算模仿广受好评的芝加哥湖滨公园工程——一个包括282套公寓、面向各种收入阶层人群的公共住房。从它1991年对外开放起，在此犯罪和乱涂乱写行为实际上已近绝迹。[24]

住房补贴

当政府领导人意识到公共住房计划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时，便采取直接提供住房补贴的形式让穷人购买或租借他们自己选择的房屋。贪婪的投机商相互勾结以剥削政府和穷人，破坏了这个计划（1968年的住房和城市发展法案）。比较典型的做法是，房地产掮客或经纪人以低价买下破败的少数民族居住区房屋或是过渡街区的外籍白人产业，再以高价卖出；采用贿赂政府估价人的办法，投机商就能以很高的价钱把房子卖给有资格得到政府补贴的低收入购买者。由于经济能力有限，一些低收入购房者后来不得不拖欠抵押借款。更多的情况是，他们不得不废弃房屋。这些房屋的

取暖设备、管道和结构早已损坏严重，表面的简单粉饰根本无法掩盖。无论哪一种情况，由银行作担保的联邦住房机构或退伍军人管理局都发现，他们名下拥有大量无主的房屋。尽管通过刑事起诉和中止计划，美国城市和住房发展署还是发现自己无法摆脱这15万座废弃房屋，直到今天它仍是国家最大的破旧房屋的房东。

1974年，在又一项失败的直接住房补贴计划后，政府创建了第八款（Section 8）计划。这个计划让房客直接寻找私人市场中的出租房，然后由美国城市和住房发展署支付给房东三分之二的租金。不幸的是，这笔预算从1974年的25亿美元，很快飚升到了1980年的72亿美元，到1994年达到了146亿美元。[25]尽管如此，“第八款”住房计划在公共住房工程上还是进了一步，它使人们有机会住上合适的房屋。

整修回搬

一些多雪地带的老城市，如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纽约、费城和华盛顿特区，则经历了一场复兴，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纷纷向日趋破败的



巴尔的摩的内港原本是一片废弃的河滨地带，但现在，这里的商店、餐馆和其他活动场所每年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客和当地居民。国内的许多老城都已认识到，重振城中的水滨地带，不仅能够改善当地的景观，还能提高城市的形象。

地区回搬并进行重新整修。在大多数欧洲城市，**整修回搬**（gentrification）是一项长期持续的行动，但只是在近几年才在美国兴起。美国的年轻人反周围的迁移潮流而行之，搬到以前主要是低收入者聚居的地区。在一些地方，如纽约的苏哈区、以前的商业建筑，像仓库和工厂现在都被改建成多层公寓。大多数的回搬行动都发生在以前不太景气的城市街区。

这股潮流的形成有着多种因素：居民中青年人比例的增长，城市中的高度专业技术工作、郊区生活的费用过高。市中心房地产价格相对较低，人们希望免去或减少乘车往返的时间和费用，方便参加城市的各类活动。虽然老房子在购买之初都急需修理，但整修的费用仍要低于购买或新建一座郊区住房。此外，老房子的质量也是今天的工艺所不能达到的：硬木地板、橡木或红木门以及其他的木制品，砖块、大理石或磁砖砌成的壁炉、加铅的玻璃窗、衬极条的塑料窗和宽敞的院子。

整修回搬使城市街区重新焕发活力并使中产阶级回到城市，但也产生了一些负作用。随着富裕家庭的纷纷回迁（大多是白人），造成房租和房地产税的提高，使得穷人和少数民族居民被迫搬离他们原来的居住地，来到更为偏僻的地段或是城外的新少数民族居住区里。在推动经济复兴的同时，它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如何保护穷人和预防到处蔓延的都市病。

都市家宅 都市家宅（urban homesteading）计划1973年出现于德拉维尔的威明顿，并在其他一些城市也取得了一定成功。它提供了整修回搬计划的成功范例。城市以象征性的价格出售被废弃或被没收的旧屋给那些同意在两年内回来居住并至少居住3年的居民。通过城市的努力和联邦政府的支持，购买者可获得银行低息贷款，用于为达到规定的房屋标准而进行的整修翻新。虽然这是一项面向低收入者的“血汗产权”计划，但这些费用还是使这项计划将城市里的贫民排斥在外，不过像南布朗克斯区（纽约行政区）的国民发展协会还是成功地收回了被废弃的经济住房。

都市家宅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计划。自1973年以来共有十多万的家庭回搬，然而同时期有100多万户城市中心的住房被废弃。[26]许多被废弃的房屋状况恶化到了无法修复的程度。而且即使是修复了的房子，其周围环境也往往是些难以修复或被清理的土地。除非整个街区都能被修复，否则单独仅仅是一家一户的改建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然而，这个计划在巴尔的摩、芝加哥、克利夫兰、丹佛、匹兹堡、奥克兰和华盛顿都已取得了成功。

此外，一个非营利性机构“温情居所”采用另一种形式为业主建造都市家宅。他们采用志愿劳动和用地区教堂的捐赠材料为低收入家庭建造新住房。在最初17年里，该机构修建了1万套新家，随着它在全国范围内



"温情居所"是一个为低收入家庭修建新房的非营利性组织，它运作了最为成功的一个长期住房计划。迄今它已修建了3.2万多套住房，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在1992年以后修造的。它主要依靠教会的资金支持、志愿者的义务劳动和捐献的建筑材料。上图即为在马萨诸塞州的亚尔茅斯修造的住房。

发展了1000多家分支机构，在之后的18个月里又建了1万套住房。到1994年10月，仅在一年里就为3万人建造了另外1万套住房。

分套购置公寓　城市的分租公寓转为个人所有的形式在近年兴起，至今已有50多万套被转换。利用管理费用的增长和本来就很少的一点利润也在缩减的机会，业主发现转换他们的房子能够有利可图。中产阶级的房客则能获得产权和随之享有的税收优惠；但他们每月应付的抵押贷款利息、税和维修费用将超过以前的月租金。随着分套购置公寓潮流的继续，最受其害的是普通穷职员。他们无法负担产权费用，又没有资格得到住房补贴，当房产转成个人所有时，通常他们只能被迫搬离租借的公寓。

无家可归者

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城市中无家可归者人数都发生了惊人的增长，他们的身影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公共场所。虽然地方政府和教会提供了许多的床位，避难所里还是人满为患，尤其是在冬季。虽然无家可归者的

准确数量无从统计，但据估计他们的数量在25万（据1984年城市和住房发展部统计）到300万（据为无家可归者呼吁的志愿者估计）之间。[27]25万人的估计大概更可靠些，因为根据1986年研究得出的数目大约是50万人（选任意一个夜晚统计得出）。[28]198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给出的数目为60万人，据儿童和贫民研究所在1993年所作的“有家和无家工程”（一项为无家可归者建家的工程）称，大约有60万无家可归的家庭。[29]

是什么原因导致**无家可归者**（homeless）成为社会一大问题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发动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运动恰恰导致了无家可归者人数的增加。为使城市重具活力而在商业中心区的边缘或商业区内建造大量新建筑，在此过程中拆毁了大量旧的为生活在贫困线的人们建造的简易单间住房。在70年代中期，如芝加哥和纽约等城市约有70%的人失去了他们的简易单间住房。[30]由于城市改造，低价住房减少，整修回搬又迫使另外一些贫民离开自己的家园，因而加剧了对剩余廉价住房的要求，这又导致了房租上升超出了许多人所能负担的限度。另一个原因就是1975年高级



在每个城市里你都能看到这种景象：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面对他们时，最通常的感觉是同情与厌恶。并非所有的无家可归者都是成年人（就像上图中在寒冷的冬夜里栖息在纽约地铁站的人们）：美国无家可归的家庭人口中有75%是儿童。

法院对奥康纳·汤纳森一案的裁决，它裁定无危险的精神病人不能被强制关押。其结果是使得数以万计勉强能够自主的精神病人流浪街头。此外，还有一个可归入其中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妇女单亲家庭和吸毒者流落街头。

哪些人是无家可归者？这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抽象名词，因为我们把它用于有着各种不同经历和问题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人身上。彼得·马里恩把以下一些独特的人群归入到这个单一范畴之中：

- 退伍老兵，主要指从越南战争中回来的。在许多美国城市里，越南老兵在无家可归者中占到近50%。
- 精神病患者，在美国一些地方约占到无家可归人数的四分之一。而在大约10年前，他们都会住进精神病院。
- 慢性疾病或残疾者，他们没有救济金或因救济金不足而难以负担长期避难所的费用。
- 靠固定收入的老年人，他们的收入无法继续满足生活的需要。
- 因失业而贫困的男人、妇女和整个家庭。
- 单亲家庭，多指妇女，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或一技之长而无法开始新的生活。
- 离家出走的孩子，许多曾受到过虐待。
- 酗酒者和吸毒者（他们的问题往往始于以上所列的其他一些问题）。
- 移民，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他们常常未被列入无家可归者之列，因为他们形成了自身的另一种“问题”。
- 传统的流浪者、流动工人、四处漂泊者和过路人，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习惯并喜欢在街头流浪。[31]

一份来自国内无家可归者联合会（一个非营利性的抗议团体）的报告中称：“有儿童的家庭是目前国内无家可归人口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据最新估计，无家可归者中大约三分之一是举家流浪，剩下的三分之二是单身的成年男女。四分之三的单身妇女有精神障碍，三分之二的单身男人是年老的穷人、残疾者、吸毒者或酗酒者。[32]

最令人不安的是在无家可归的家庭人口中，75%由儿童（社会中最脆弱的成员）构成。[33]这些儿童的平均年龄为6岁。他们的留级比例是其他孩子的9倍，退学比例是其他孩子的4倍。[34]一份最近的对纽约地区无家可归儿童的家长的调查揭示，其中35%曾被指控虐待孩子或忽视儿童福利管理条例。此外，较之其他的无家可归者，这些父母亲中有过吸毒或酗酒

史、家庭暴力和精神病史的可能性，分别要高出大约30%、50%和一倍左右。[35]

近来出现了一些好转的迹象。据无党派的城市研究机构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无家可归者的增长幅度将会减小。情况的确如此。根据政府在遍布全国许多城市建造的避难所的官员报告，90年代中避难所的人数已呈下降趋势。公认的最好的结果是把避难所改建成过渡房，并立即着手解决健康和就业问题。[36]“为无家可归者建家”是一家非营利性机构，它提出了一整套计划，如紧急托儿所、共同情感增进、居民教育培训中心，以解决无家可归者聚居区所面对的各种问题：教育缺乏、健康护理不足、家庭暴力、吸毒酗酒和对就业培训的需求。

尽管有各种好转的迹象，可是造成无家可归的根源——教育缺乏、低价房不足和贫穷——似乎暂时不会很快消失。虽然无家可归者人数的增长幅度可能在下降，但这仍然是一个全国性的集中于城市中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政治碎化

我们的政治结构无法适应大城市的种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许多城市问题的产生和持续的原因。传统的政界划分与毗邻的街区的公用事业需求不相统属。预防犯罪、教育、住房、污染、固体垃圾处理、交通和供水系统等，都需要对整个地区而非单独一地进行全局性的规划和控制。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馆、会议厅、文化中心吸引了许多郊区居民，但是，城市也承担了市政机构、警察、环境卫生、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任务。

但在当前，大都市地区却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现有城市中的多重政府机关导致了低效率的机构重叠（政府部门和机构、消防和公共安全、道路、卫生等），每一个市政机构都按自己的一套方法行事，缺乏协作，而且常常因互相扯皮而造成不必要的冲突和浪费。

事实上，城市对自身事务并无多少控制权，由于受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控制，以及受其他各级政府部门的资金和政治决策的限制，城市政府对公共交通、贫困、污染等许多问题总是无能为力。直到70年代，尽管在总人口中占据多数，在以农业为主的州和联邦立法机构里，城市仍然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当高级法院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来重新分配选票以平衡选区代表的时候，半数以上的人口迁往了郊区。加之农村和郊区对城市的矛盾是民主党控制的城市政府与共和党控制的州立法机构之间常见的政治分歧，更加阻碍了解决城市问题的各种努力。

政治碎化（political fragmentation）的另一表现为，在一个城市里有过多的决策意见，使全面协作变得极为困难。60年代消灭政治机器的改革运动的一大结果，是产生了数十个新的机器（尽管小一些）——由专家组成的半自治城市机构和官僚部门。这些机构决定重要政策，其领导层倾向于自我永存而不愿意接受更高当局的约束。作为城市市长，在机构负责人和专家委员会都想得到更多既得利益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决定，此时的他更像一个集团利益冲突的调停者而不是城市管理的最高行政长官。

多雪地带城市能与阳光地带城市竞争吗？

据1990年人口普查及之后人口调查局进行的历年数据修订再次表明，阳光地带城市人口持续增长，相应的是大多数多雪地带城市人口下降。南部和西部现在占有美国半数以上的人口和十分之六的最大型城市（参见表13.1）。1980年到1990年间，10个面积扩展最快的大城市中，有6个在佛罗里达州，两个在得克萨斯州，另一个在新墨西哥州。同一时期，人口以最大百分比下降的城市有：印地安那州的加里、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密执安州的底特律、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和密执安州的弗林特。[37]在80年代，大批工商企业从旧的中心城市迁移，以躲避高额税收、能源开支、交通堵塞、破旧厂房和工会。人口和就业的不断减少使一些观察家提前宣告老城市在走向灭亡。

旧的多雪地带城市在走向灭亡吗？一些专家预言，由于就业机会流向郊区或阳光地带，对这些城市来说无异于一场经济灾难。然而，更为细致的观察得出了一个更为均衡的画面。例如，在亚特兰大、巴吞鲁日、伯明翰、莫比尔、新奥尔良、萨凡纳和什里夫波特等阳光地带城市人口减少的同时，在波士顿和纽约的人口相应增加。[38]此外，1996年，道格拉斯、休斯敦、旧金山和什里夫波特的商务楼空置率要高于巴尔的摩、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特区。[39]

表13.1 美国最大的城市，1996年

城市	人口	城市	人口	城市	人口
1. 纽约	7,381,000	5. 费城	1,478,000	8. 圣安东尼奥	1,068,000
2. 旧金山	3,449,000	6. 圣迭哥	1,171,000	9. 达拉斯	1,053,000
3. 芝加哥	2,722,000	7. 凤凰城	1,159,000	10. 底特律	1,000,000
4. 波士顿	1,74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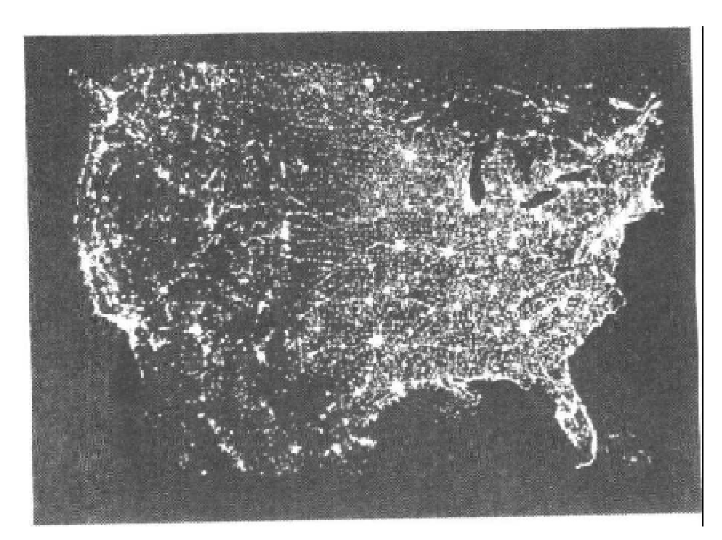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et release, November 1997.

阳光地带城市正面临着许多多雪地带城市已出现的问题：南部人口快速增长和西部都市扩展、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环境恶化、有限的地下水资源枯竭、给排水系统紧张、以及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犯罪。1996年，国内犯罪率排名（参见第5章）最高的城市为拉斯维加斯，其次是亚特兰大。只有3个多雪地带城市排名在10大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列——圣路易斯（第4名）、纽瓦克（第6名）和巴尔的摩（第10名）。其他均为阳光地带城市——檀香山（第3名）、迈阿密（第5名）、劳德代尔堡（第7名）、坦帕（第8名）和巴吞鲁日（第9名）。[40]经济问题严重困扰着多雪地带城市，同样也困扰着阳光地带城市。近年来，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的失业率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南方的贫困率仍然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参见第7章），这种情况持续已达数十年之久。

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的人口稠密地带

从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丘陵地带到北部弗吉尼亚的红黏土山这一人口稠密地带，有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特区等大城市，1961年法国地理学家吉恩·哥特曼将之称为美国第一人口稠密地带。[41]在此，可以通过一些多雪地带城市占优势的数据加以说明。

大约有5400万人口，即五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人口稠密地带。这里全国20%的人口生产的财富远远超出这个比例（占全国经济产值的27%），相比较之下，占全国人口53%的南部和西部的经济产值只有全国的49%。[42]1995年，东北部的银行共有总资产1.7万亿美元，为



这幅太空航拍的夜景照片反映了美国（以及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一部分）的城市集中分布的状况，连绵的灯光表示城市的分布情况。

全国银行总资本的37%。[43]银行拥有的资产越多，意味着有更多风险资本，因而，国内其他地方的许多公司——包括一些电影公司——都必须依靠这一地带的金融实力来运营。

为什么这个地区一直能够吸引创业投资？通过对一些雇主和州商业部长的访谈，拉什沃斯·基德归纳出以下一些因素：[44]

1. 市场集中。这一地区是国内市场最集中的地区（占全国二十分之一的土地上住着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从波士顿到华盛顿走廊地带的制造商能在24小时内驾车到达美国和加拿大半数以上的制造公司和零售公司。借助空运和海运，这里的各个州能很便捷地到达拥有2.71亿人口的欧共体国家。
2. 教育。这里的11个州是美国高等教育最集中的地区。每年招收280万学生到875所大专院校。这些高等学府对高技术公司的选址有很大的影响，马萨诸塞州著名的第128街（如今被称为"美国的技术公司"）即毗邻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新泽西州的人口虽然仅为全国的3.3%，却拥有能完成全国9%的科学研究和开发的实验室（其中许多都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附近）。
3. 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公路、桥梁和供水系统——虽然都有待修缮，但都基本完备。许多新兴城市在这些方面却往往难以跟上，而基础建设费用（包括征集必要的土地）又在迅速提高。
4. 生活质量。许多人都把这一地区看作全国艺术和文化的中心，由于临近湖海和山脉，形成了许多富饶的城市和乡村，带来了许多工作和娱乐的机会。

从波士顿到华盛顿这个人口稠密地区的每一座城市，都受到贫穷、无家可归、吸毒、犯罪、暴力、未婚妈妈、质量低下的公共教育和日益破旧的基础设施等问题的困扰。较大的城市正经历着一场复兴，而小城市则很少有恢复的迹象。从该地区复兴和衰退的混合迹象中，充分反映出美国都市的强盛和危机。

城市与郊区间的相互依赖

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是个城市社会。随着这个世纪的接近尾声，然而我们还是要重新界定以明确对一个城市人而言，城市社会到底意味着

什么。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地理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随着在职业、消费习惯和涉世程度方面的区别日益接近，城市和非城市的人们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模糊。然而，尽管我们突破了狭隘的地域界限，把城乡融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但还是常常无法认识到一个地区（城市）的问题对另一个地区（郊区）的消极影响。

中心城市

为了弥补自身在制造业领域的损失，许多城市逐渐发展起服务性经济，出现了如广告、公司管理、金融和行政管理等较为成熟的服务业中心。这一变化减少了许多缺乏教育的城市贫民原本从事的传统简单劳动，增加了对熟练操作计算机的人员的需求，其结果是形成了人与工作之间**技能不符**（skills mismatch）。[45]因此，公司所需要的熟练工人需从外地引进，而

专栏 13.2 技能不符的问题

关于城市的社会问题以及丧失的经济基础正走向危险的舆论，影响到了决定城市政策的讨论。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北卡罗莱纳州大学凯南私人企业研究所所长吉恩·凯斯达所提出的“技能不符”的问题。凯斯达认为城市逐渐脱离制造业和商品生产的过程，几乎消灭了无数无技术移民的体力劳动，取代制造业的服务业在城市里需要能够写写算算的雇员，而城市贫民阶层所受教育不够。凯斯达说：作为后果之一，美国城市的人口转变正处于同城市就业市场中不断上升的技术要求“撞击过程”中。更糟糕的是，甚至这些信息处理工作也开始移向郊区，在那儿很容易找到合适的雇员。

凯斯达的理论或许太过悲观，但毋庸置疑的是：被淘汰回家的贫民如今游荡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之中。因此，大多数城市政策的专家把城市社会问题是否会再度袭来看作城市是否还有生命力的关键。如果将是60年代那一幕的重演，那么城市的市长们要非常警惕贫困战争已经过去了的说法只是花言巧语而已。直接的物质补助无济于事，也远远不够，除非能找到新的解决办法。目前的福利计划看来已无法打破贫困文化和对许多贫民不利的长期受害的意识。同样重要的是，大部分市长和政府官员现在已经认识到，整个城市的复兴只靠政府的支出是永远不够的，而且政府根本无法安排和控制形成城市未来的经济力量……

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问题就无法解决了。城市管理者需要集中关注一些基本的东西——如公众安全、环境卫生和教育——以重新恢复公众的信心和留住中产阶级居民。为了做到这点，需要联邦政府的帮助以获得日益增多的解决贫困所需的大量费用……目前与解决贫困问题相关的开支要占去城市平均预算的10%～20%。由于其中大部分钱用于为贫民和无家可归者提供健康护理，加快联邦健康护理改革的步骤将会大大减轻城市的财政负担。

资料来源：Tom Morganthau and John McCormick, “Are Cities Obsolete?” from *Newsweek* (September 9, 1991),

许多城市贫民就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当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后，税收相应减少，其独立性降低而给郊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参见专栏13.2）。

外围远郊

为了找到寻求一种普遍的税收基础以减轻私有财产所有人的压力，郊区同城市的服务性企业相互竞争。由于税收的刺激、便捷的电信通讯和充足的劳动力使重新定位切实可行，因而郊区常常占有优势。再者，城市集中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犯罪、吸毒、扒窃、暴力集团、城市中的艾滋病流行及种族问题，使得城市在与相比之下发展迅速的郊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每失去一个公司（搬到边缘城市）对中心城市就是一个打击，进一步来讲就是消蚀了它的活力和税收基础，同时对外围郊区而言，每一次的增加都在推动其城市化进程更进一步。

内环近郊

人口稠密地区周围的边缘城市的发展引出了一个新的术语**内环近郊**(inner-ring suburbs)，指与中心城市接壤的原为郊区的地区。在过去20年中，这些内环近郊地区像城市一样失去了许多工作机会和高收入家庭，同时又吸引了大量逃离混乱的市中心的低收入居民。虽然有四分之一的黑人居住在郊区，但他们大多住在内环郊区，其中绝大部分是黑人。其结果是，内环近郊的经济与种族状况使这里的政治问题与中心城市更为接近。

地区性思考

在本章开头我们注意到，一个城市成功发展的关键在于它与周边地区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如果中心城市衰落了，那么它的郊区也将深受其害。在《没有郊区的城市》（1993）一书中，艾尔布奎克前市长戴维·拉斯克认为，"弹性城市"——能够带动其周边郊区共同发展的城市——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表现出较少的种族隔离问题。[46]另外在《城邦》（1993）一书中，尼尔·皮尔斯和他的同事们指出，只有那些建立起灵活的政府机构的大城市，才能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47]

数十年来，像位于纽约的地区计划联合会等组织，积极鼓励城市和郊区通过协作，共用校区、医疗康复中心、污水处理站、垃圾处理场和急救机构来减少无谓的重复。针对城市学校资金和公众压力问题，联邦法院做

出决定降低税收和政府支出。这一做法迫使许多城市采取以上措施，相似的合作努力是否能扩展到其他地区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国际背景中的城市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聚居城市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但地球上大多数人都喜欢到城市或城市周围地区而非乡村生活的现象则不超过几年的时间，在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和大批农村移民造成了人口的大量集中。到世纪交替之时，世界上将出现21个**特大城市**(megacities)——人口超过1000万以上的大城市。[48]其中18个在发展中国家，有一些还是世界上极为贫困的国家（参见表13.2）。

伴随这一巨大的增长趋势产生了许多问题，如卫生设施缺乏引起的各种疾病和传染病蔓延。一份研究报告估计，在发展中国家有超过15亿的城市贫民因感染一种或数种寄生虫而身体长期处于虚弱状态。工业国家的城市污染使得有50%的人忍受皮疹和其他皮肤疾病的折磨，在50年代大约仅为2%。在波兰的西里西亚北部地区，未分离的有毒废物的倾倒使土地和水质受到严重毒害，以致该地区10%的新生婴儿患有某种先天缺陷，从四肢不全到大脑受损情况不一。[49]

在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墨西哥城，有300万辆没有

表13.2 世界上特大城市人口（百万）

城市	1992年	2000年	城市	1992年	2000年
东京	25.8	28.0	加尔各答	11.1	12.7
圣保罗（巴西）	19.2	28.0	雅加达	10.0	13.4
纽约	16.2	16.6	天津	9.8	12.5
墨西哥城	15.3	16.2	马尼拉	9.6	12.5
上海	14.1	17.4	开罗	9.0	10.8
孟买	13.3	18.1	新德里	8.8	11.7
旧金山	11.9	13.2	拉哥斯（尼日利亚）	8.7	13.5
布宜诺斯艾利斯	11.8	12.8	卡拉奇	8.6	11.9
汉城	11.6	13.0	曼谷	7.6	9.9
北京	11.4	14.4	达卡	7.4	11.5
里约热内卢	11.3	12.2			

资料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U. N. Secretariat.

排气净化装置的汽车在排放废气，有3.5万个没有严格污染控制标准的工业点，使得臭氧含量超过安全标准的4倍之多。日本的东京正在被自身制造的废物淹没，每天约有2.2万吨垃圾，尽管有大规模的循环和焚化措施，但仍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垃圾堆放场。[50]

由于超大型城市的增长，对食物、木材和建筑材料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这转而又导致了土壤的枯竭和森林的砍伐，而且这种影响并不局限在邻近地区，例如婆罗洲森林的被大面积砍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来自日本城市的木材需求。在下一章，我们将仔细探讨人口增长对世界上热带雨林及全球其他地区的影响。

社会学视角

对城市正经历着的剧变和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提供了多种视角。从理论角度看，对潜在问题的解释及解决的办法又是多种多样的。

功能主义观点

功能主义者谴责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破坏了社会的社会化管理。首先，大量的农村居民和移民涌入城市，造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新来者没有作好同化的准备——他们对城市生活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城市社会问题的沉疴烂疾不断加重：疾病、死亡、犯罪和社会混乱。在城市系统重新达到平衡之前，它又经历了另一种失败，大批的人们开始转向郊区。工厂、商店和办公室沿袭以往的做法，离开城市中心并不能够帮助非白种少数民族改变生活。

许多的社会转变是功能性的。现代制造业技术需要在平地上扩建厂房，城市往往无法提供而在郊区却可以做到。郊区的扩展产生了许多相关建筑及汽车制造和运输等行业的就业机会，也减轻了城市人口的压力，降低了人口密度。工商业从低税收中获益，而且产品的运输也更加方便，拥有住宅所有权和能够驾车外出使工人生活满足。然而随着这些社会变迁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功能障碍：城市失去税收收益，贫民大量入住使城市人口比例失调，缺少就业机会和财力物力不足，住房条件和学校教育恶化，维修保养的要求提高，中心城市衰退得几乎生气皆无。

为了恢复体制的稳定和平衡，功能主义者主张必须加以调整。既然除

了政治方面，我们的社会在各方面都已相互融合，或许沿着更实际的路线进行改革能够有望恢复管理和财政平衡。地区整体规划与合作能使土地利用更为合理并加强相互依赖的意识，进一步认识到某些问题并无地理界线，如供水、污染、交通等，问题的解决方能有效。如果我们通过大城市管理机构来协调公共事业、商业位置、住房和交通，就业和住房问题的解决或许会容易一些。

还有另外一种办法也可能恢复社会机制平衡，即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市的经济功能以使企业能够继续留在或迁回城市。必须鼓励已经开始的计划，如整修回搬、新建办公楼和恢复城市商业区活力等。减少闲置空地的密度和数量，提供确实的机会重建城市，在为城市贫民提供新机会的同时也美化了城市。城市的企业区提供税收奖励及就业培训计划以使需要工作的人得到工作。城市不能孤立地存在，其福利事业的相互关联使它们必须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步。

冲突论观点

坚持冲突论的学者把城市里的各种问题看作为各个利益集团竞争有限资源而产生的不稳定结果。这场斗争有许多形式，除了直接牵涉其中的团体外，常常表现为对城市特殊问题漠不关心的强大集团对抗弱势群体。这些竞争往往发生在城市里的各个集团之间。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城市和郊区居民也常常被卷入其中。

城市的不均衡性使不同集团之间都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一个城市有限的资金是用于发展商业购物区、为贫民建造廉价住房、修建娱乐中心、改善学校，还是用于发展公共交通？这些任务不可能同时完成，但都迫切需要。拥有不同顾客群体的商业和代理商为了自身利益相互竞争，而引起竞争进一步加剧的是由城市官僚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追求更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或仅仅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地。由于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发生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如示威、抗议集会、过激对抗、罢交租金、联合怠工等抗议或暴力行动的可能性不断增加。

城市里还存在另一个冲突焦点：经济剥削。当一个城市成为制造业中心后，势力强大的实业家总是想尽办法剥削廉价劳动力以获取更大利润。他们的单方面收益造成了普遍贫穷和城市街区大面积破败。与此相类似的是，出租简陋房屋的房东通过“榨取租金”和减少维修保养来寻求最大利润也加速了城市的衰落。赶走低租金房客，然后更新设备升级为中等租金的房屋，以及设法征用土地建造更赚钱的建筑物是房地产商损人利己的两

种通常做法。政治机器和心术不正的政客常常榨取城市成百上千万的美元，而使公共福利事业受到损害。

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城市社会学说——政治经济学观点——主要研究城市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例如，曼纽埃尔·卡斯特斯坚持认为，城市的财政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为了追求无止境的高额利润，企业左右联邦政府批准政府担保的抵押和资助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这样，他们及其经营者就能搬到房地产价格和税收相对更低的郊区。[51]从全球角度来看，不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更快，并且更依赖于整个世界体系，它处于为剥削农村而设的网络控制中心。[52]

相互作用论观点

相互作用论集中关注人们如何主观地定义现实，考察如何将价值观、共同预期和感性认识应用于城市的社会问题上。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往往强调小城镇思想、个人凝聚力及公众意识。针对城市腐化影响的警报尽管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比比皆是，但在美国历史上这一情况格外明显。在美国，生活在曾经拥有优势的农村地区的人们对城市缺乏信任。后来，成百上千万有自身独特文化传统的欧洲移民涌入美国，接着是原住的印第安人，然后是拉丁美洲裔对歧视和回避做出的反应。同样，对乡村生活的崇尚引起了人们对城市生活的轻视，把城市看作是下等人居住的地方，从而失去社会责任感而使得这种情况更为加剧。赞同排斥城市价值的人对此作出的答复是，城市自身导致了城市问题的产生，而否认是由于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问题的强烈反映。

由于城市大部分地区贫民聚居，非城市居民常常对城市持有偏见，认为它几乎全是冲突地带和贫民窟。尽管部分城市确实如他们的想像，但也有许多安全、团结、美丽的城市。即使在贫困城市里，过于拥挤的劣质住房、犯罪和健康等问题也比前两代好多了。当然，还有令人担忧的一面，但这只是与其他条件更优越的地方相比较而言。生活标准和期望值的提高（汽车、电视、热水和其他曾经被视为奢侈品的必需品）使得贫民在与那些已拥有这些东西的人的比较中，感到自己被剥夺了生活的基本需要。

另一个通常相互影响的难点是少数城市贫民、警察和城市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自从19世纪中叶针对爱尔兰人的举动至今，官员们为维护城市刻板的社会管理机制总是把少数群体视如仇敌，后者在身体和文化上的差异、疾病产生的贫穷以及享有特权的中产阶级的民族优越感都加剧了这一观念。彼此的对抗加深，态度、行为和反应的恶性循环随之而来。当少

数群体在经济和政治上获得优势后，另一群人就代替了他们原有的地位到了底层，又开始了新的循环。随着黑人和拉丁美洲裔在选举和职位方面获得多数，为其选民在社会政策上加以新的解释和作用的提议或许将付诸实施。

未来的选择

我们的城市现在同时显示出令人鼓舞和沮丧的两种现象，好像同时走上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方面中产阶级不断涌入，使城市重新出现了繁荣的街区和新兴的商务楼，以及蓬勃的文化和经济活力；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颓败之势、拥塞和污染、犯罪和贫穷，郊区仍然在回避城市。究竟哪一种趋势能够占上风呢？

悲观的前景

到了2030年，城市将成为时代的败笔。大多数的美国人再也不会在城市中居住、工作，甚至不去参观游览。20世纪里相当数量的人口在21世纪里纷纷离开城市，即使是阳光地带也无法避免人口的这种变迁。早期的快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都市问题：拥塞、污染、犯罪和住房不足。这些困难加上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桥梁和供水系统）不足，以及当地居民抵制高额租金，使得阳光地带城市如同它们以前迅速的崛起一样迅速衰落下来。

联邦和州政府削减公共交通造成了致命的混乱局面：设施陈旧、费用增加、乘客减少，最终迫使政府规划者不得不停止已无人使用的公共交通系统。人们对城市里的交通或城市间的往返奔波极端厌恶，使得公司为留住他们最好的职员不得不迁出城市，否则，职员会被郊区的公司吸引走。住房补贴、公共住房和抵押贷款的削减也使城市住房问题加剧恶化。少数保护和恢复街区的大胆尝试远远敌不过忽视、恶化、废弃、纵火和破坏等使城市逐渐变为废墟的行为。坍塌和空置的房屋成为了使城市街区完全损毁的“城市黑洞”。由于应有的税收减少，城市陷入了财政危机的深渊，留在城市的房地产、公司和服务机构所遭受的情况更为严重。

由于城市的严重危机，当外围远郊成为边缘城市变得日益都市化和拥挤时，内环近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大型商场、办公用房和工业场地（所有这些都需要大片的地块）的扩展，以及各种住房与公寓的合成建筑

物侵吞了大量的空地。大大小小的商业和服务机构遍布各地，小城镇已经不复存在。

郊区之间相互扩展渗透，缺少团队和个体意识，汽车是日常生活的必备品，但严重的道路拥挤造成地区间交通不畅，花在路上的时间为原来的3倍，计算机控制和郊区的相似性使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都相差无几。价值、风尚和行为的一致把我们的文明带入了一个停滞时期。毫无疑问文明的程度提高了，但是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

然而城市所遗留的并非一片荒芜，而是衰落和绝望。这些地区的污秽、贫穷、犯罪和暴力，看来比狄更斯和恩格斯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城市没有任何可以挽救的迹象，它们不再属于美国。一个全国性委员会甚至建议消灭城市，腾出地方来将之改造为郊区。

乐观的前景

有几种因素也许将在2030年激发起城市的复兴并重新取得优势地位。最值得注意的是，郊区居民出于对城镇及周围农村都市化的惊恐，采取行动保护自身利益。郊区和都市的领导者共同加入到这股潮流里，阻止大型办公楼和商店搬离大城市区域，依靠更为可靠方便的公共交通使得城郊相连。城市得以重获活力，郊区保留了自身特色。剩余的未开发土地可供人们怡情养性，又能阻止都市的蔓延。矿物燃料的日益减少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依赖公共交通，因而更喜欢住得靠近作为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的城市。

中产阶级不断涌入城市加大了整修回搬的力度。随着越来越多的街区重新出现住宅、商店和餐馆繁荣的景象，连锁效应随之而来。城市街区又成了培养孩子的好地方，学校、体育场和公园等也得到相应的改善。任何一个发展机会都会带动另一个，重建的势头扩展到其他街区，价值观的改变以及成功范例点燃了城市复兴的希望。

在技术彻底改变劳动性质和周期的年代，城市为居民工作和娱乐方便提供了最有利的场所。为了住在靠近工作地点的地方，中产阶级大多生活在城市，而工人阶层为了靠近工作地而住得更远。城市活动的吸引力使得工人阶层频繁地回到都市，而居住在城市的中产阶级常常到郊外游玩，享受田园乐趣。

政府的全盘规划、农村教育和应急服务机构（警察、消防和救护）使城郊之间联系日益紧密，认识到他们的社会问题和需求是相互关联的，城市和郊区现在都在为提高生活质量而共同努力。只有拥有一个强大的、健

康的都市中心和保留具有真正郊区特色和形式的周边地区，美国人才能在他们选择的居住地享受到良好的生活方式。

小 结

1. 现在的城市不再是美国人主要的居住或生产活动的地方。1960年以来，郊区逐步发展，不再依赖于都市而存在。在许多大城市地区，城郊相互重叠并互为依托，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区。都市的扩展占用了大片土地，居民对汽车的依赖性增大，提高了生活费用。在旧城区周边边上发展起来的边缘城市，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绿地城市、住宅城市和新兴城市。
2. 就业转向郊区导致了州际公路和郊区内部的严重交通堵塞。公共运输能减轻城市的交通拥挤，但有些人觉得它应自负盈亏，而不作为一项公用事业。因而，美国的大规模运输系统不如其他一些工业国家。
3. 虽然“画红线”的做法现在已不像以往那么普遍，但它仍然是导致居住状况恶化的一个制度性因素。它造成了恶性的循环：房东废弃房屋造成费用增加及收入相对减少，加剧了城市的萎靡不振。城市改造是一项灾难性的政府计划，被破坏的街区使得可用的廉价住房减少，多层公共住房方案忽略了大众的需求，却带来了耻辱、冷漠、故意破坏行为和犯罪。住房补贴的效果不一，而且费用增长过高。
4. 确有效果的住房改造计划包括整修回搬、城市家宅、低息抵押贷款和公寓转为私有。从这些措施中获益最少的是普通贫民，而且往往使他们被迫搬离家园。在美国，无家可归者大约共有60万之多，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群混合而成，其中三分之一由家庭构成。在无家可归的家庭人口中大约75%是儿童，他们的退学率是正常儿童的4倍。
5. 虽然城郊之间存在着功能上的相互依赖，但每一个自治城市都是独立管理的，这常常导致了不必要的冲突和浪费。政治权力的分散阻碍了城市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并不得不依赖总是对其持有偏见的州和联邦机构。城市机构之间的竞争也妨碍了互相协作，因为他们各自都只求达到自己的目的。
6. 1980年到1990年间，除了波士顿和纽约，一些阳光地带城市和大部分多雪地带城市的人口都出现了下降。阳光地带城市为犯罪、拥塞、污染、基础设施的需求和对经济状况担忧等问题所困扰。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的人口稠密地带居住着七分之一的美国人，经济产值占全国的

27%，拥有庞大的消费群和受过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文化魅力。

7. 非大型城市和大城市的人们在就业、消费习惯和处世方法等方面正在不断接近。当外围远郊吸引高收入者和各种行业的人才而成为边缘城市后，在内环近郊出现了与中心城市相类似的问题。
8. 在全世界，喜欢住在城市或靠近城市地区而非乡村的情况出现不过几年。城市的发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的特大城市当中，造成了环境恶化等许多严重问题。
9. 根据功能主义者的观点，都市化和市郊化对社会都是有益的。但一些功能的失调需要调整，如新政治界线、新金融结构，城市进一步发展为交易中心。冲突论理论指出，城市选举区的竞争、牟取暴利的剥削者、外部政治力量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都是引起城市问题的原因。相互作用论者强调倾斜的价值观念、剥夺的有关定义和文化差异，对于我们理解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性。

关键词

新兴城市
边缘城市
整修回搬
绿地城市
无家可归者
基础设施
内环近郊
特大城市
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区
政治碎化
公共住房
画红线
"第八款"计划
技能不符
住宅型城市
都市家宅
城市改造

推荐书目

Castells, Manuel (ed.). *High Technology, Space, and Societ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85. An anthology of provocative articles about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and transportation on urban America.

Downs, Anthony. *Opening up the Suburbs: An Urban Strategy for Americ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A specific proposal for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 of cities and suburbs to resolve their similar problems.

Fischer, Claude S. *The Urban Experience*, 2d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4. An excellent overview of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urban life, with clearly presented theory and findings.

Fowler, Edmund P. *Building Cities that Work*.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A thought-provoking critique of costly U. S. urban development programs that have had little positive impact.

Gans, Herbert J. *The Urban Villagers*, expande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A classic case study of life in a tight-knit, working-class White ethnic community that was destroyed by urban renewal.

Jacobs, Jane.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Still pertinent and provocative, an indic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urban renewal, with specific alternatives giv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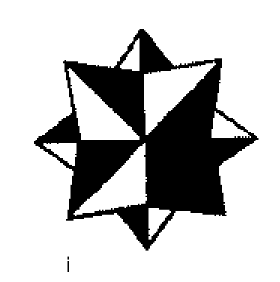
Macionis, John J., and Vincent N. Parrillo. *Cities and Urban Life*. Upper Saddle River, N. J.: Prentice-Hall, 1998.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with a sociological emphasis on urban growth, life, and problems, including cross-cultural discussion And city case studies.

Phillips, E. Barbara. *City Lights: Urban-Suburban Life in a Global Society*, 2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 examination of the issues and problems facing U.S. cities, including the tele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cultural pluralism.

Rusk, David. *Cities Without Suburbs*. Baltimor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3. A former mayor of Albuquerque suggests that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through annexation solves economic problems and reduces racial segregation.

Sawers, Larry, and William K. Tabb (eds). *Sunbelt/Snowbelt: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Restructur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examining the social forces that change the structure and economy of metropolitan areas.

第14章 人口与生态



关于人口与生态的几点事实

- 全世界每天新增人口23.6万，其中97%在发展中国家。[1]
- 1987年世界人口达到50亿，1999年初将达到60亿。
- 每年有16~20亿公顷的热带雨林和森林被毁。
- 1994年，估计有11亿人缺乏清洁的饮用水。
- 当美国家庭每天在进晚餐的时候，全世界有418人正因饥饿而死去。[2]
- 每个美国人，无论年龄大小，每天生产至少6磅固体垃圾，每年超过1吨。
- 美国每75分钟发生一起有毒化学事故，其中的16%引起死亡、伤害或扩散。[3]

文明是不必要的必需品的无限繁殖。

——马克·吐温

人类的历程最终将结束于文明。

——拉尔夫·华多·爱默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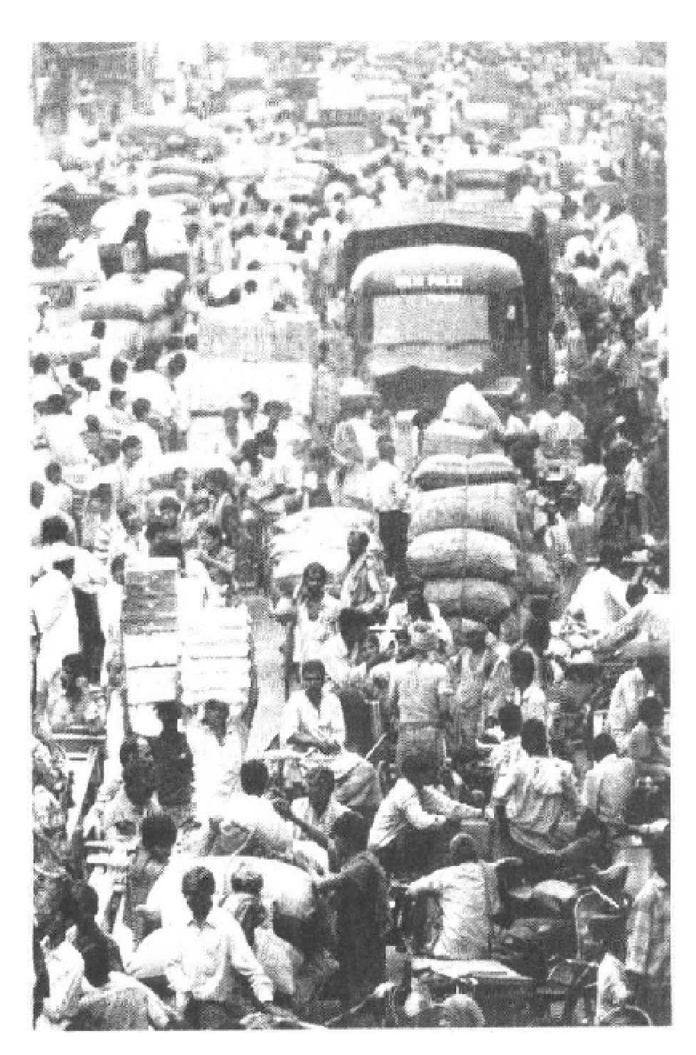
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人口问题

人类存在的200万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人口增长一直相对缓慢，每年大约稳定增长0.002%左右。但是到1900年，世界人口已增至10亿，年增长率为0.5%。1960年，人口年增长率升至2%；1987年世界人口增至50亿。在这之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略微减缓，1997年的增长率为1.47%，每小时大约有1600名新生儿诞生。[4]人口统计专家预计，1999年地球总人口将达到60亿。[5]

两百多年来，科学家一直担心无法控制的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关于这个社会问题，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3种观点较为普遍。

马尔萨斯的人口悲观论

托马斯·马尔萨斯提出了迄今为止对世界未来最为悲观的一种看法。在此之前，刚刚结束的启蒙时代所带来的政治改革精神以及科学的发明发现，使人们充满乐观的希望，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实现。1798年，马尔萨斯出版的《人口论》粉碎了人类的希望，同时使经济学赢得“黑暗科学”的称号。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粮食供应速度，并断言高出生率将一直持续下去，直至疾病、饥饿等自然界的制裁或战争等人为事件，死亡率才会升高，使人口降低到能够承受的水平。马尔萨斯认为，进步不能克服人口的指数级增长，这就为将来的灾难埋下隐患。



印度每年人口增长约为180万，居世界之首。这幅1997年摄于新德里（居住人口超过100万）的照片，生动地描绘了城市的人口密度。每天，人们或步行或驾车，在行人和人力车之间穿行。农村迁移人口和高出生率使新德里的人口高速增长。

通过一则古老的波斯传说，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指数级增长**（exponential growth）形成巨额数量的威力：

> "一位聪明的朝臣献给国王一副漂亮的象棋棋盘，请求国王以大米来作为回报：第一个格子放一粒米，第二格两粒，第三格四粒，以此类推。国王欣然应允，吩咐打开粮仓任他取米。棋盘的第四格放八粒米，第九格为512粒，第十五格是1.6834万粒，第二十一格就要达到100万粒以上。到第四十格，他们不得不搬来数百万粒米。64个棋格还没用完，国王所有的大米就都耗尽了。"[6]

马尔萨斯理论所谓的人口增长必然性使它更令人不安，被称作"总是准备扼杀人类希望的恐怖的黑色魔鬼"。[7]它给人的暗示首先就是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甚至当人们怀着粮食生产可能进一步提高的期望而继续生养更多孩子的时候，直到有一天劫难发生，一部分人的死亡使得人口与资源重新恢复平衡。马尔萨斯提出的惟一解决办法是"道德约束"，即"推迟到一个人能负担其妻子及至少6个孩子的时候才结婚，同时实行婚前禁止性行为"。[8]在马尔萨斯的时代，几乎没有节育的方法，他也不相信节育，因为他认为人们懒得不可救药，若不是家庭的负担，他们什么都不会做。

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评 现代人口学家们不再相信人口增长必将耗尽资源。他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技术进步能走在适度的人口增长之前。此外，就整个社会而言，大家庭已不受欢迎。

我们不应指责马尔萨斯没有预料到日后的工业革命和节育措施的普及。但是，我们必须否定马尔萨斯所断言的人类没有强大的道德约束，性行为会使生育无法控制。各种形式的节育措施在世界各地的普及，通常并不是发生在人口数量达到物质条件限制的峰值时或生态环境压力限制的峰值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关于如何以及何时生育孩子最为适当的社会标准在变化，它有力地影响着夫妇对家庭规模的期望。

就在不久前的美国，许多妇女相信"上帝给多少"，她们就生多少孩子。一般家庭规模为5至7人。但近几十年来，家庭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大多数美国人一般生两个孩子——马尔萨斯不可能对这个数字再做批评。我们将在本章以下几节中讨论引起人们生育观念及行为变化的社会条件。

地球——救生艇理论

关于**救生艇理论**（lifeboat ethic）的争论让世界关注这样两个问题：国际性人口增长和发达国家应对贫困国家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盖瑞·哈丁

提出了一个颇为刺耳的结论："战地医疗站的三分法"。[9]在战争中，军医通常把需要救助的伤员分成三类：可以稍缓治疗的轻伤员；立即抢救可能获救的紧急伤员；无需浪费时间和药物治疗的伤势致命的重伤员。救生艇的寓意就是：把世界想像成载有"已从海上救起的"大约50个国家的暂时不会沉没的救生艇，而在它周围有约100多个国家正在危险中挣扎。哈丁宣称，试图援救其他国家毫无益处，反而会使救生艇不堪重负而沉没。哈丁提倡采取国家主义的概念，认为各国都是一个明确的地域单位，有其自身的"支撑能力"，即其资源和经济前景能支持多少人口的潜力。

哈丁还坚持认为，如果建立世界粮食银行或其他组织救助其他国家，就会打乱贫困国家的自然秩序，使其失去自身的平衡。哈丁的基本观点是政治性的：各个国家并不处于同一种制度之下，没有一位权力至高无上的船长能够决定哪些部分已无可救药，或者决定采取怎样强有力的措施来拯救全体。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世界只是各国之间的无序竞争，我们也许只能采纳这种适应严酷现实的"理论"。

对救生艇理论的批评 这种极端悲观的理论很快受到评论家的批评。例如，由发达国家来理智地确定哪些人该饿死，哪些人可以获救，其伦理道德标准何在？哈丁的有些推断已被证明事实上是错误的。

1. 他认为一些国家为帮助不发达国家解决困难做了大量但无效的努力。但事实上，至今为止，多数努力只是"象征性"或"试验性"的项目，或者因某次灾难而付诸东流。
2. 他认定全世界不能为持续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但事实上，这并非是匮乏的问题，而是现有粮食分配不均引起的。[10]
3. 哈丁设想，如果发达国家告知贫困国家他们将得不到国际援助，这些将不会有任何变化。事实上，这种情况常常会引发政治动荡。

人口过渡理论

将人口变化分作三个阶段的**人口过渡理论**（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则较为乐观。它假定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科学发达了，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希望减小家庭规模。如果真能如此，我们的政治方针就可以明确：应全力以赴促进国家的发展。

不发达国家将降低人口增长率的希望寄托于曾经经历过人口过渡三阶段的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历史经验上。1700年以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相互抵消，增长率很低。以后随着卫生和医疗手段的进步，更多的婴儿得以存活，平均寿命增加。许多非西方国家目前正处于第二阶

段，迅速降低的死亡率使人口快速增长。约从1850年起，欧洲进入了第三阶段，进而是北美，出生率降低并接近已降低了的死亡率。除了二战后美国的“生育高峰”时期，许多国家的出生率趋向平稳下降，到下世纪初人口可能实现平衡。

人口过渡理论认为三阶段的人口变化会影响到现代化和工业化，并影响生活水平的提高。该理论还指出，当人们从农田转向工业时，他们逐渐意识到当自己年老无法劳动时，无须孩子来继续耕作、照料并继承农场。其结果是，人们会自觉地少生孩子。照此推论，这种变迁趋势会在所有国家自然而然地发生，作为工业化的副产品，将最终解决人口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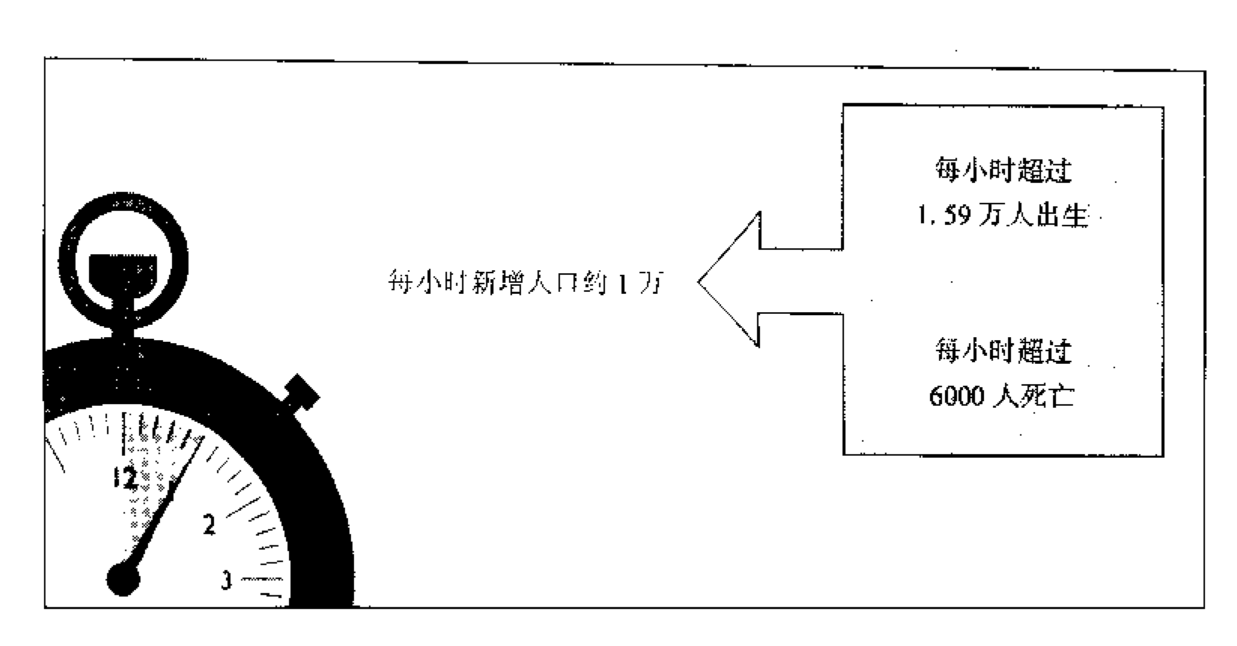
对人口过渡理论的批评 对人口过渡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它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谬误上。该理论认为，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能走上个世纪欧洲所经历的模式。但是许多新兴国家的发展形式多种多样，有时要比过去发展得更快。研究证明，经济快速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家庭的小型化。事实上，许多国家生活水平一提高，人们反而想要生更多的孩子，因为抚养已不再困难。人口过渡理论也无法解释现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出生率下降的最新变化。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先走出贫困才能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确是以欧洲为中心的鬼话，有些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稳定人口数量，推广易行的避孕措施，人口出生率也出现了下降趋势。

世界人口压力

引起世界环境实质性变化有3个方面，都与人口的激增有直接关系。第一，即使是最乐观的预计也认为人口将继续增长；第二，人们正在逐渐耗尽他们所需的生态资源，尤其是雨林和地下水资源；第三，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长期营养不足。

持续增长

最新的联合国预测显示，人口增长速度正在减缓。1990年至1994年间，人口增长率为1.57%，比之前15年的平均值1.73%明显减少。人口增长率还在继续降低（1997年为1.47%）。尽管如此，只要增长率超过0，世界人口就在增加。即使按天计算，人口增加数量也是令人震惊的。1997年，地球上每天增加23.6万人口，出生38.2万名婴儿，死亡14.6万人(其中婴儿2.2万人)。[12]根据联合国人口部门预测，到21世纪中叶，世界



图表 14.1 世界人口时钟

资料来源：Based on data from Population Today,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May 1997), p2.

人口将达到77～112亿之间。[13]虽然我们应当认真对待这些数字，但它仍有可能改变，就像1994年到1997年间发生的变化一样。如果发展中国家目前突降的人口出生率不能持续，会产生更多的人口问题。

人口增长和资源利用与科技的发展和人类不断开发入侵野生栖息地密不可分，有时甚至难以从它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中找到根源。让我们透过表层细加分析，正是由于地球上过于庞大的人口导致了这些问题。例如，汽车引擎并无坏处，但因其数量过多，造成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在"过去的好时光"里，燃烧木材煤炭释放的热量污染空气，马拉的运输工具污染路面，原始的排水系统污染水源河流。现代科学技术虽然制造了新的污染，但同时减少了原来的污染源。不幸的是，目前大多数地方的人口数量过多，以致这些进步并不能控制环境的恶化。

人口数量与资源枯竭

以下这个公式说明了为什么发达国家对环境的污染比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

$$I = P \times CL \times T$$

如用文字表述，即对环境的影响等于人口数量乘以消费水平再乘以技术。

在发达国家，以信用卡为基础的经济提高了购买力，加之高度机械化的工业提供了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社会所需的生产力，因而每个人消耗资源制造废物的速度也成倍增长（参见专栏14.1）。[15]

专栏14.1 人口对环境的影响

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总是与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人们通常用人均消耗和技术引起的环境损害来表示环境资源的消耗。现在，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影响最大。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其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也将增加。越来越多的人理所当然地渴望"生活过得更好"，因而对环境的潜在危害也越来越大。

……最明显的环境损害一般都是局部的，例如森林和相关流域的消失，土壤侵蚀或沙漠化，以及像洛杉矶或成都那样的城市被灰色烟雾所笼罩。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多，海洋鱼类减少，土壤、水源被化学物质和其他有害金属污染之类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每年被侵蚀的耕地面积估计约为500～700万公顷（1250～1750万英亩），外加因洪水和盐碱化被吞噬去150万公顷（375万英亩）。近几十年来，水土管理措施不良导致了12亿公顷（40亿英亩）的土地恶化——相当于中国和印度的面积总和，占全球可耕地面积的11%。此外，每年还有1600～2000万公顷（4000～5000万英亩）的热带雨林和森林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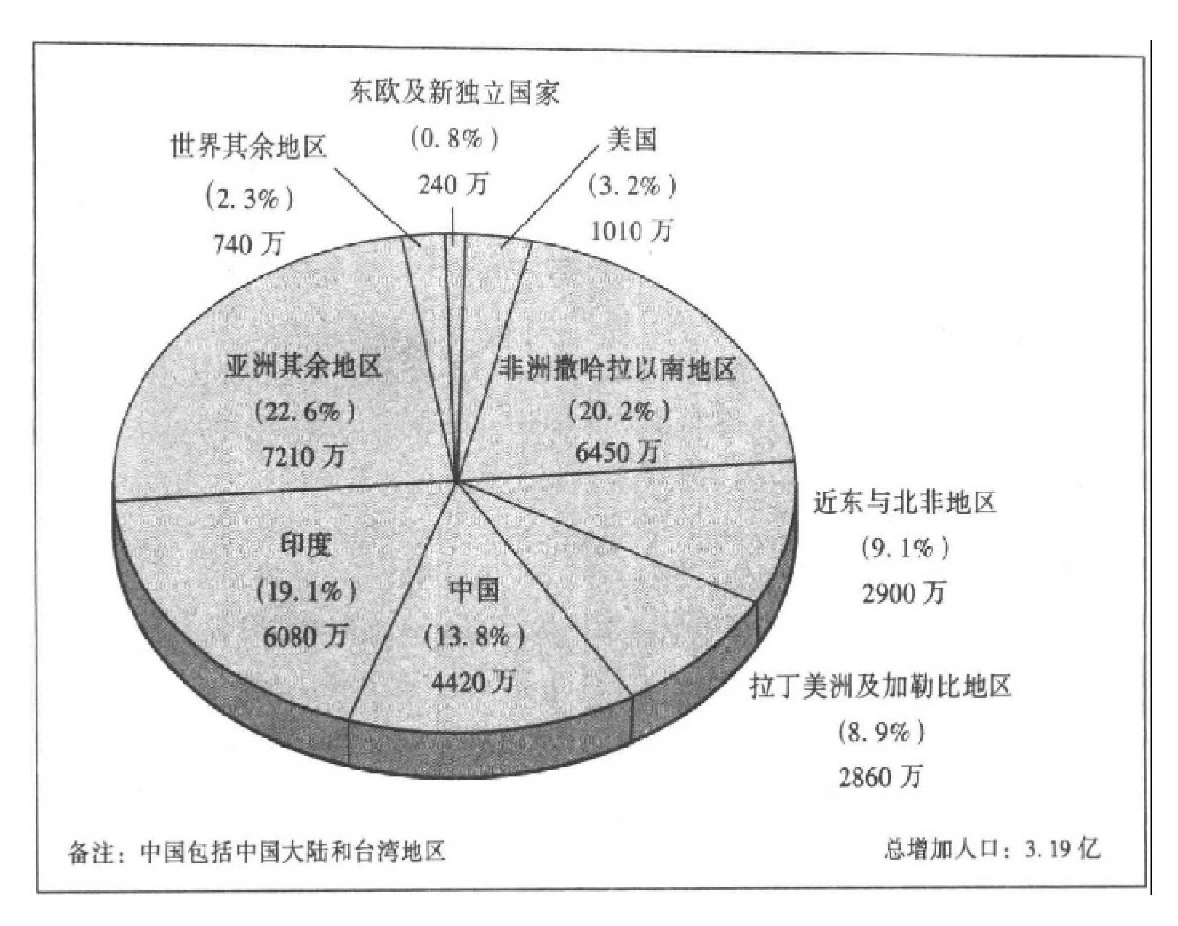
污染和淡水供应匮乏也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幸福。据估计，1994年约有11亿人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28亿人缺少医疗卫生服务。每年有2.5亿人因不洁用水引起的疾病感染，其中大约1千万人死亡。1995年，水资源匮乏……波及到20个国家，涉及的人口超过1.3亿。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Population Issues 1997*.

图表14.2说明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口发展模式。第一类是人口增长缓慢的发达国家。事实上，欧洲一直是世界上非强制性人口自愿减少的主要地区。[16]第二类是发展中国家。它们由于人口发展过快以致于阻碍甚至可能抵消自身的发展。由于政府投资都用于促进现代化建设，而非用于必要的防止饥饿、预防疾病、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因而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减缓。专家估计，每百分之一的人口增长将会"耗费"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至四。[17]

雨林的破坏

在世界范围内，雨林的面积正以递增的速度在消失。在热带地区，伐10株树才补种1株。在非洲，这一比例为29:1。也许在未来20年里，茂密的赤道森林带就会变成一圈光秃秃的贫瘠土地。[18]造成这个日益加剧的灾难的主要原因是采伐和人口增长。纵观全球，在巴西、印度尼西亚、扎伊



图表 14.2　1996 至 2000 年间增加的人口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 Base.

尔和其他一些地方，对木材的需求以及因人口增长而开垦更多农田，造成了热带雨林和森林每年减少 16 至 20 亿英亩。[19]巴西拥有大面积的亚马逊雨林，但仅在 1992 至 1996 年间，被伐毁的雨林就相当于一个丹麦的面积。[20]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跨国公司在国内木材储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又把手伸向世界上仅存的中美洲、刚果河流域及南非的雨林。与早先掠夺雨林的公司不同的是其经营的规模更大。总的来说，亚洲公司已在亚马逊流域购买了大约 3000 万英亩的森林（总数为 13.8 亿英亩）。[21]

虽然热带雨林植被丰富，但其实只有薄薄一层沃土覆盖，其下的大部分土地养分含量很低。雨林是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树木靠其土壤中自身的枯枝落叶的腐烂而获得滋养。森林砍伐造成了土壤养分枯竭和水土流失。形成一英寸土壤需要 100 年，相对而言，土地的贫瘠化则极为迅速。[22]破坏雨林对世界造成许多有害的而且至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严重后果，这将在以下几节详细述及。

药物资源　从热带森林可以获得数不清的药物（止痛药、轻泻剂、镇静剂等），由此产生的工业年产值达 200 亿美元。从热带森林中提取出的药物

大大提高了白血病患儿的存活率，其中至少有1400种植物含有抗癌成分。

雨林被破坏威胁到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它使大约2.5万种只生长在雨林的植物濒临灭亡，其中有许多人们尚未检测出它们的药用价值。迄今为止，科学家发现的120种植物中就有一种有益于人类，有40种雨林植物有助于对付心脏病、高血压、白血病、疼痛或其他病症，折合经济效益价值约合400亿美元，并有助于拯救生命和提高人类健康。如果这个比例也适用于其他尚未经测试的植物，那么我们已失去了大概200种有益的植物，总价值约为每年2000亿美元，其中还不包括可能因从这些资源中提取出新药而获救的数不清的人类生命。[23]

许多珍禽异兽也因其自然栖息地的毁灭而濒临灭绝。另外，春季北飞前在热带过冬的候鸟，包括各种捕蝇鸟和鸣禽也将受到威胁。

水利资源 森林吸收雨季的大量雨水，防止洪水暴发。由于森林砍伐，江河流域地区将不再是稳定的农田，它将被洪水淹没，过于危险而不适于居住。[24]随着树木消失，水会冲蚀地表，饮用水供应困难，溪流冲下的淤泥将会阻塞水坝，造成电力供应不足。



图中所示曾是亚马逊雨林的一部分，现在由于人类定居者为了清理出居住、耕种和放牧的土地而被砍伐焚毁。这种大规模破坏行为影响到全球的气候（包括美国中西部地区），消灭了潜在的药材资源，破坏了微妙的热带生态系统。

全球气候调控 森林的各种影响中范围最广的是防止反照率效应(albedo effects)。[25]湿绿的雨林表面参差不齐，它们吸收太阳射线。但随着不断的砍伐，我们这个星球的表面变得越来越光秃。由此引起的热对流循环和气流运行的混乱，它至最北可能影响到美国中西部粮食产区的气候变化。我们早已知道了厄尔尼诺现象，即远在太平洋上生成的热气团对全球气候的剧烈影响。许多科学家相信砍伐森林是造成厄尔尼诺现象形成条件的主要原因。

发展中国家的饥饿问题

过去5年中被饥饿和饥荒夺走的生命，比过去150年里所有战争、革命和谋杀死去的人还要多。[26]1992年，有1.57亿人，即世界人口的3%，生活在发生饥馑或食物严重匮乏的国家(当然这些国家并不是人人都挨饿)。然而长期营养不良的问题更为严峻。饥饿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每天有3.5万人、每年有1400万人死于营养不良或其他相关的可预防疾病。数据显示将近有10亿人，世界人口的20%，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27]



在世界部分地区，饥饿仍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有些时候，是内战破坏了食物供应，如上图(摄于1997年)中这个严重营养不良的卢旺达儿童。而在苏丹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饥荒常常是民人口数量过多或是因旱灾、洪水、土地枯竭造成的粮食减产而引起的。

贫困造成的长期饥饿比饥荒引起的急性饥饿更为普遍。按年龄—体重测量法，在发展中国家，大约36%的学龄前儿童存在中度或严重营养不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这一问题最为严重，范围广泛而且日益恶化。近20年来，由于经济增长以及大规模的营养、健康和教育投资，亚太地区的饥饿问题有所好转。尽管如此，这里仍是世界上饥饿人口最多的地方，学龄前儿童营养低于标准的比例比非洲还高。[28]

儿童受营养不良的损害最大，在出生前其健康就可能已经受到损害。怀孕妇女如果没有足够的营养，胎儿就可能体重过轻，易受感染和寄生物传染引起早夭。儿童出生后5年内如果营养不良，即使生存下来也容易终生身体发育不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南亚地区有60%的儿童发育不良，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为39%，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是33%。[29]

营养不良人口主要集中在45个不发达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存在经济和粮食危机。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许多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制约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要说明这种复杂性的一个例证就是性别、营养不良和生存之间的相关联系（参见专栏14.2）。在一些女儿

专栏14.2 性别、营养不良和死亡

在印度、韩国、中国等偏爱儿子的亚洲国家，年轻女孩的存活率要低于男孩。由此可见，男女不平等与女性死亡率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些亚洲国家的出生率统计资料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死亡率，也明显地反映出对儿子的强烈偏爱。在所有社会中，男女婴儿的比例一般约为105:100……但在1990年，韩国的男女比例为112.5，中国为113.8。单就中国而言，这个倾斜的比例说明，在80年代每年有55万女婴去向不明……

性别歧视也意味着女孩在孩提时期所受待遇要略差。在美国和大多数国家，1至5岁的女孩存活率与男孩差不多。但在新加坡、埃及、巴基斯坦、危地马拉以及马尔代夫、孟加拉国、格林纳达，女孩死亡率要比男孩高。同样，女孩死亡率高也反映出女性的性别角色，尤其是在价值和地位方面都要低于男性。

在孟加拉国农村，任何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都较男性为高。这可推究到孟加拉人对待男孩和女孩的不同方式。首先，女孩获取的蛋白质和食物要比男孩少，导致她们营养不足。按照传统，男人和男孩先进食，而在贫困的农村家庭，往往没有足够的食物留给女性成员。其次，尽管男孩、女孩都可能生重病，但送到诊所就医的男孩却比女孩多得多。即使是免费医疗，父母亲对儿子健康的关注还是远远超过女儿。

资料来源：Nancy E. Riley, "Gender, Power, and Population Change," *Population Bulletin* (May 1997), p16.

会给父母造成经济损失的社会，即女方必须给夫家一笔嫁妆，及当父母年老体弱时又得不到儿子的经济赡养的社会，女性的存活率就更低。

在发展中国家，烹饪食物是一项颇具危险的工作，这也使得女性人口数量下降。在印度农村，妇女们有一种新说法："令人担心的不是煮在锅里的东西，而是锅子下面。"明火烹饪意味着妇女们每天要花去5个小时搜集木柴或干粪。由于血液中吸入了大量室内灶火排放的一氧化碳，多数妇女患上了一种类似于贫血症的疾病。[30]

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是英国植物生态学家亚瑟·乔治·坦斯利1935年提出的。他认为要了解一种植物，必须同时了解其周围的土壤、气候和动植物环境。所以，生态系统的思想很快成为理解环境问题的主要手段。

生态系统思想

如果我们采用生态系统的观念来考察社会问题，就会联想到人类的生态环境及其精神和社会文化要素。[31]研究生态问题时，必须把环境当作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地看待问题。系统思想听起来可能并不困难，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却不容易，因为他们接受的是分析思维的科学传统，把问题分成一个个可变的部分，一次对付一个单独的变量。于是，农民仅关心某一植物种类，他们的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里提高庄稼的产量。他们把所有与"庄稼"对抗的植物都当作"杂草"清除，所有的动物或昆虫都是必须毒杀或捕捉的恶兽害虫。其结果是，产量获得了提高，但土壤和水质却受到了灾难性的影响。

并非只有农民如此特殊。大多数人几乎都有一样单纯的想法，相信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生产是成功的关键。但我们逐渐开始认识到，我们生活在有限的综合环境中。这个有限环境的3个方面，也就是生态系统思想的3个关键要素：相互关联性、限度和激发作用(后两者是系统超载的表现形式)。

相互关联性　生态系统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至少潜在地与其他部分相关联。有时某一部分的变化可以对其他部分产生与最初变化相距甚远的影响。食物链是相互关联性的一个典型例证。如农药DDT对高级食肉动

物具有出人意料的毒害影响，可以充分说明食物链的重要性，作为美国象征的秃鹰种群的濒临灭绝就是最明显的后果。物种的“链”包括，人们担心害虫吃庄稼，于是向农田大量喷撒 DDT，经过雨水或灌溉使 DDT 流入排水道，污染了**食物链**（food chain）底层的粮食资源；然后渐次被大一点的甲壳类动物和鱼类吃掉（毒素也逐渐集中），直至最后，鹰吃了最大的鱼；高度集中的 DDT 严重损害了鹰的生殖系统，使它们所生的蛋易碎且难以存放。

超载：限度与触发 生态系统可以处理相当数量的污染。河流能将污水变成无害的化学制品，就像土壤里的微生物可以使动物的粪便变成肥料。在某种程度上，当系统不能继续分解废料，生物开始死亡的时候，就称为达到了**限度**（threshold）。这种情况曾于 1980 年发生在纽约附近的大西洋中。海洋生物学家发现，大片海水中完全没有了生物，只有绿色的黏液和历年来城市排水系统排放入海的大量废渣。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对大部分自然系统的限度一无所知。[32]

德国西部的森林尽管受到精心呵护照料，但也会令管理者大吃一惊。1982 年到 1984 年的短短两年间，病害树木的比例从 8%突然升至 54%。[33]90 年代，捷克的林地遭到大规模的破坏。[34]很明显，这些森林和欧洲其他地区森林系统的平衡被打破，造成了大规模的衰退。罪魁祸首是酸雨，即被工厂排放的化学物质污染而含有酸性的自然降雨，其 PH 值甚至与柠檬汁相差无几。当雨水的酸度超过承受限度时，树木和动物就会突然大量死亡。

触发效应（trigger effects）更有意思，人类排放的少量废物就可以彻底破坏自然平衡。当我们向一个生态系统中引入某一新物种时，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如果没有天敌，这一物种就会快速繁殖，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例如，澳大利亚人正为一种进口的兔子而大伤脑筋，不得不在许多地区建起“防兔”围栏以控制其活动范围。修筑水坝也会引发另一种“触发”作用，有时由于水库中储水的重量过大，导致地质断层滑动引起地震。[35]1967 年印度就发生过这种事情，地震造成 200 多人丧生。与此相类似，当工程师在内华达州南部开挖密德湖并注水以后（1935 ~ 1939 年），仪器测出了数百次明显的地震波动。

1970 年，尼罗河上的艾斯旺高坝建成后，埃及 50%的农田遭受盐碱或水涝之害，土壤肥力下降，造成埃及农业减产约 10%。随着每年一次的洪水泛滥被阻止，尼罗河水不再带走过剩的淤泥，尼罗河三角洲由于自身的重量而不断下沉。同时，在巴基斯坦，由于任意开挖设计不当的灌溉沟渠，四分之一的耕地因盐碱化和水涝正逐渐变得贫瘠不堪。[36]

目前的生态系统问题

这一节我们将讨论一些生态危害是如何说明相互关联性、限度和触发作用3个原则的。

杀虫剂 DDT的惊人案例是杀虫剂引起危害的一个例证，因为人类第一次发现自己在自然界的化学实验室里只是些实验用的小白鼠。在短短20年内，DDT从化学上的一项奇迹变成美国禁用的危险品。1948年，P. H. 穆勒因发现DDT而获得诺贝尔奖金。在许多热带国家，DDT控制了大量昆虫传播的疾病，比如疟疾，因而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37]但是，科学家发现DDT“存在于全球各地动物的脂肪组织，从南极洲的企鹅到泰国乡村的儿童，乃至美国人”。[38]最近发现DDT对人类的危害之一，是它增加了男性生殖器官疾病问题的危险因素，包括正常男性的平均精子数明显下降以及睾丸癌发病率增加。[39]

尽管在美国已禁止使用DDT，但仍有一些国家在继续使用并间接影响着地球上的其他人。1996年，根据环境合作委员会制定的协议，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达成协议：在地区内逐步淘汰或减少DDT、汞和氯化物的使用。[40]在俄罗斯，尽管80年代就已停止生产DDT产品，但仍有储存的DDT继续供应。1997年，研究人员发现，西伯利亚海水中的DDT和聚氯联苯的浓度是加拿大海域的10倍。这是因为俄罗斯的佩丘拉河、叶尼塞河和额布河注入北冰洋的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毒化学物质，严重危害了整个北冰洋的野生生物。[41]

像DDT之类的杀虫剂的问题，部分在于它们会在土壤中残留很长时间。这样，即使土地多年不再使用这类化学品，长出的庄稼中还会含有毒素。而且，正如DDT会一直残留在土壤中直到被植物吸收一样，以后它还会残留在生物的器官里，通过食物链向上传递。[42]

毒素通过食物链的集中 食物链不仅传递毒素而且将毒素一级级向上集中。我们食用牛肉，就像鹰吃鱼一样，会将自然界中杀虫剂和除草剂里的毒素集中过滤成相当高的浓度并向上传递。作为杂食动物，人类处于食物链的最顶端，我们既吃植物又吃动物，同时吸收了它们两者所积蓄的毒素。[43]

全球气温变暖 在1997年12月日本东京召开的讨论全球气温变暖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世界16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同意对全球气温变暖的严峻情况采取措施，但仅限于中等规模，以降低温室效应。矿物燃料燃烧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并造成**温室效应**（greenhouse effect），在大气层中形成一层积聚起来的气体将地球的热量反射回地球而非释放到太空。1995年，

在罗马召开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会议上，专家一致认为，尽管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类对全球气候有不可推卸的影响”。[44]

由来自企业界、政府和学术界的20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权威性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认为，如果全球气候变暖以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

> “到2100年海平面将再增高6至37英寸，佛罗里达半岛将被淹没，海滨房屋将会漂浮海上，内陆的大片土地将会变成海滨。”[45]

此类证据随处可见。北冰洋和南极洲的冰层正在融解；北方的冻土带变暖以致在有些年份向大气层释放而非吸收碳；北半球的冰川是本世纪以来最小的，而且春季来临也比以前提前了一周。从1980年至今，相当于西雅图和米兰位置的45度纬线以上的植被增加了10%。北美地区每年特大暴雨（24小时内降水量超过2英寸）发生的次数比1900年时猛增了20%。前一次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海洋变暖的活动持续了5年，而通常应为两年。科学家们尚不确定1997年形成的最近的也是最大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多久。[46]

怎么办？显而易见，各个国家都需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发展替换能源，如使用污染较少的天然气代替煤，以及减少排放的技术改善都将是可行的措施。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改进了过时的燃煤工业，它们的工业排放量得到了明显减少，为阻止全球气温变暖作出了贡献。但是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美国人口占全球的4%，但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25%，1997年的排放量比1990年增加了13%：[47]

> 关于调节气候变化的大部分争论主要基于化学方面：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平均已存在了一个世纪，麦金利总统当年取暖烧煤产生的气体至今还在那里。所以，即使我们今天停止烧煤、燃油和天然气，世界还是会逐渐变暖。但是如果我们等到世界变成大温室时再采取行动，就更要花费几十年的功夫。即使保持排放量稳定不变，气候也不会稳定。只要气体继续排放，即使按目前的速度，水银柱也会不断上升。[48]

酸雨 工厂烟囱所排出的大量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气体可以随酸雨降到几千英里之外，使植物枯萎，森林长势减缓，两栖动物和鱼类死亡。它所到之处只留下死寂的河流、湖泊。酸雨甚至会腐蚀建筑物和汽车。1950年至1980年间，一些地区降雨中的酸度增加了40倍。[49]

与大气层中温室气体分布的范围一样，即使减少酸性空气污染排放，



森林砍伐是在太平洋中形成大量暖流（厄尔尼诺）的主要原因，并最终给美国带来了狂风暴雨。上图是1998年佛罗里达州中部遭飓风袭击后的景象，33人因此丧生，数以千计的房屋被毁。

欧洲和北美仍会继续下酸雨。[50]即使停止了硫污染，欧洲和北美的森林、湖泊、河流也不能如预期那样迅速恢复。科学家发现，其原因是酸雨造成土壤中大量的钙和镁随水流失。这些元素的失去使水土中的化学元素恢复生态平衡的速度明显迟缓。[51]

生态系统相互关联性的例证之一是，荷兰的森林土壤中钙的过量流失威胁到了当地的鸣禽。科学家发现，欧洲60座森林里山雀所下的蛋中30%～50%蛋壳存在缺陷。研究证实，这些鸟类的问题是由于酸雨造成了它们严重缺钙。山雀和森林中其他鸣禽获取钙的主要来源是啄食蜗牛壳，蜗牛从树木中获取钙，而树木则从土壤中吸收钙。由于酸雨的滤钙作用，森林土壤长期钙含量不足，这类土壤中的蜗牛数量远不如含钙丰富的土壤里多。[52]

由于蜗牛数量减少，许多山雀、鸭类和其他森林鸣禽所下蛋的蛋壳薄而多孔，几天就破碎或变干了。孵出的幼鸟往往有缺钙的典型症状——骨骼畸形。当它们从双亲那里接受哺喂时，由于伸长身体而使腿部承受重压而骨折，雏鸟不久就会死亡。它们的存活数量只有正常森林中鸟类的一半。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荷兰，在瑞典、挪威、德国和瑞士的研究发现，那些

国家的森林鸣禽也越来越多地生下有缺陷的蛋。正如雷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1962年)一书中曾提起过的，注意DDT使鸣禽受害，酸雨在威胁欧洲鸣禽生存的同时又成为了新的DDT。[53]

水污染 最早水质管理法规出现在3500多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里。[54]但直到20世纪，人类才开始能够有效地消灭水污染带来的致命疾病。以下是一则成功的例子：

> "19世纪初，费城的净水供应中引入了沉积法，用沙床对水进行过滤。费城人的日均死亡率因此降低了约2%。一年后他们将经过滤的水再进行氯化处理，死亡率又降低约50%——绝对惊人。"[55]

1972年的净水法案是环境立法的一个里程碑，它显著改善了美国水道的质量，但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加强。[56]目前我们面临多种水污染威胁：淡水的营养过剩；海洋光合作用基本功能的破坏；农业化学药品毒化净水供应。

营养过剩(eutrophication)主要是由过度施肥造成的。过量施用磷肥和氮肥导致严重污染的水流入当地河流及附近湖泊，造成水藻大增。水藻数量激增大量消耗掉水中的液化氧，使其他生物窒息。死亡的植物、鱼类和水藻进一步污染湖泊。这是表面利益(有效的化肥)带来意料不到的副作用的又一例子。在食物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增产的丰收令人欢欣鼓舞，但却发现渔业产量却因水中缺氧而出现衰退。动物排泄物是天然的肥料，农村喂养的大量肉用动物可提供与老城区陈旧的供水系统中所产生的同样多的肥料。

1997年，马里兰州著名的切莎比克海湾——直到近年来，通过大规模净化工程改变过去的污染状况后，这里的海洋生命才得以恢复——在最近的一次微生物问题暴发中受害严重，大量鱼类因营养过剩而死亡。[57]同时，专家指出，由于中西部农田中富含氮的水流入密西西比河，严重损害了墨西哥湾的捕虾业和渔业。[58]

光合作用(photosynthesis)——植物生长过程中利用阳光、水和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补充入地球生物圈。每一次大面积的森林砍伐都会改变世界上二氧化碳和氧气的平衡。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滥伐森林的危险性的最低限度，但却知道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正在发生。大部分的氧气来自于海洋的光合作用，但如果污染达到一定限度，会使海洋植物和蓝绿藻类大量减少，整个生物圈都将濒临危险。

1979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估计有50多万吨废料被倾倒进大海。[59]此后，海洋垃圾倾倒法和一些新的技术发挥了一定作用，例如，1992年，

纽约停止将大量经过部分处理的污水排放到离岸6英里外的大海。然而，大量废料，包括放射性废料被倾倒入大海的行为仍然时有发生，这些有毒废料将对海洋产生怎样的影响成为环境保护主义者迫切关注的问题之一。

工业生产中的化学品泄漏 美国每年要发生近3000起化学事故，主要是在一些有大型化工企业的州，由此对当地早已不堪重负的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60]环境保护署估计，在美国最近的15起大型化学泄漏事故中，所释放出的化学品数量和毒性都要超过1984年在印度波帕尔发生的惨剧，当时共有2000多人死于储油罐气体泄漏。只是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如风向改变吹散了气体或是快速的撤离疏散工作，美国的这些事故才没有酿成灾难性的人员伤亡。[61]

从1979年开始，化学泄漏事故有所减少。然而，伤亡数字却变得更不稳定。根据地区分布，在拉斯特地带（Rust Belt），即从东北部走廊向西至大湖区各州及东南部地区事故较为频繁。但对公众潜在威胁最大的是在一些小型的、人口密集的工业州，如新泽西州、德拉华州和马里兰州。[62]



由于许多州的垃圾堆放场都已爆满为患，固体废物的倾倒现在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市政当局不得不向纳税人征收高价将垃圾运往一些人口稀少的州的较为偏僻的堆放场。强制性的垃圾再循环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情况，但垃圾的倾倒仍然存在问题。

有毒倾倒：未被认识的危害 非法倾倒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灾难，有毒和致癌的化学物质就像茶垢一样布满了地球的表面。雨水渗入垃圾掩埋场或非法倾倒地又造成地下水的污染。环境保护署估计，一个仅17英亩的垃圾倾倒场平均每年可以产生460万加仑的滤化地下水。[63]即使当这个垃圾点关闭以后，有毒物质的生成还将持续一百多年，而污染物将会蔓延到很远，污染和毒化地下水资源。而大约80%的市政供水依赖于地下蓄水层，在较为干燥的美国西南部地区尤其重要，有时甚至是当地惟一的水资源。在这些地区对水资源的利用在过去10年里成指数倍迅速增长。一旦它们被污染，就很难再恢复洁净，人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水源或是被迫迁移。

许多临时的或非法的垃圾倾倒地都被垃圾所覆盖。化学倾倒最可怕和破坏性的影响也许是对健康的危害。80年代初，政府迁移了纽约州勒弗凯诺尔和密苏里州时代海滩等社区的全部居民，因为当地的先天性生理障碍和癌症的发病率极高。1997年，出于同样的原因，环境保护署决定迁移佛罗里达州潘萨科拉地区358户家庭，因为科学家发现由于它邻近一个废弃工厂，二氧化物、砒霜、石墨和其他有毒物质的危险性极大。[64]

显而易见，一些美国工业企业完全忘却或无视中学化学课上的基本课程：在创造一种物质之前，必须先考虑如何保存它。

相异物种：自然的均化 1980年以来，科学家在美国发现了59种新的有害动植物侵入者。由于贸易和旅游，大陆与大陆之间互相连接得越来越紧密，很少有地方能够仍然保持孤立或“天然”的状态。有意或无意的物种输入，有时未能遇到自然界的天敌或竞争者。在输入以后，这些侵入者数量迅速增加，并开始消灭或排斥当地的物种。例如，在布朗树蛇引入以前，夏威夷根本就没有蛇，这种蛇有一个不幸的——尽管是自杀性的——习惯是爬上高压电线而造成电力中断。而斑马蚌从俄罗斯附在轮船舱底来到美国，现在它们在整个大湖区堵塞出入水阀门，吃掉大量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浮游生物。蓼属植物种子通过进口花卉的球根进入美国，现在这种植物已经超过野葛在美国南部迅速繁殖，阻塞高速公路、抑制本地植物，迫使许多本地植物物种趋于灭绝。

异国物种的繁殖激增产生了一个新的生物学分支领域——“侵入论”。这种代价巨大的数量激增，并没有给政府太多的时间去确定和控制传播渠道，而且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在许多情况下，认为当地的自然环境能够被保护和维持稳定的平衡状态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65]

生态和人口问题的持续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人口压力是一个问题。即使那些接受了减慢人口增长重要性的观察家，在是否需要采取特别措施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此外，美国文化中的许多因素通过影响我们的意识和价值观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否定有采取行动需要的立场

各种政治、医学、宗教和意识形态团体提出了大量的理由支持或反对限制人口的计划。如此多的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观点，使得那些即使是最专注的决策者也无法完全估计出未来的人口发展状况。以下是4种最普遍的反对控制人口计划的观点。[66]

亲生育论 特别是在一些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能够提供更多（更廉价）的劳动者、消费者和士兵，因而可以增强国家经济或防御外来侵略的能力。即使已不再有人提出这种建国思想，但**亲生育论**（pronatalist）的政策仍会长期持续。例如，政府给每个有新生儿的美国家庭提供的所得税信用贷款，就是一种小而直接的鼓励生育的做法。

目前在美国最新的亲生育政策的形式是基于人口学家本·瓦腾伯格关于西方社会"生育缺乏"的观点产生的。[67]人口学家注意到1972年美国出现了一次"生育高峰"，当时平均每个妇女的生育已降至人口平衡所必需的2.1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生育率在全世界最低：每个妇女1.2胎。[68]如前所述，欧洲是世界上第一个首先出现自动的和非强制性人口下降的地区。瓦腾伯格和其他人口学家担心这种情况会造成一些可怕的后果，如人口老龄化，为社会上带来新思想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造成经济停滞，以及随着人数的减少和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膨胀，西方文明日益衰退。

带有这些担心的亲生育论者提议政府和私营企业努力行动，以加强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并积极地反对将性行为同婚姻相分离的社会观念。他们的立法建议包括调整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对生育孩子的家庭给予特惠对待。

对亲生育论的批评 大部分人口学家不同意西方亲生育论者的观点。首先，生育趋势的变化并不引人注意，如上一次美国由于生育缺乏（30年代）导致了生育高峰。其次，尽管目前美国人口中反映出生育率较低，但由于大量合法和非法移民的涌入，人口依然在迅速增长。乐观主义者认

为，外来人口的贡献和他们带来的新观念，甚至可以比增加生育更广泛地振兴社会。

反压制论 有些理论家认为人口控制计划是试图转移人们对真正的社会问题的注意力。例如，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全面的利用环境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经济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历史进步，从而彻底结束剥削制度，所以生态问题无须放在首要位置加以考虑。在遭受过殖民主义剥削的国家，人们常常怀疑激烈的人口控制计划是由那些老的或新的殖民统治者所倡导的，其目的是使其继续处于弱小和依附状态，或者是垂涎于当地丰富的资源，限制当地人口增长与其争夺。同样的怀疑在发达国家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体中也非常普遍。例如，当美国黑人被要求大力控制生育时，某些人就此指责占人口多数的白人，认为他们是在压制或逆转其作为一个人口组成部分的发展。其中最偏激的担心也许是认为多数群体正在阴谋制造一场隐蔽的种族灭绝。

对反压制论的批评 批评反压制论的人是对亲生育论的一种巧妙支持。事实上，那些革命的理论家试图对压制问题"激化矛盾"（即恶化实际的生活状况），从而使被压迫者对政治问题采取暴力手段。其基本原理是，对一项野蛮的政策（如在遭受贫困的农民中鼓励高生育）承担短期责任，将能降低采取反革命措施（即改善被压迫者生活的改革）的可能性，从而成功地避免政治危机的爆发。当然，如果革命的是统治阶级，在新的条件下，他们原来关于人口增长的主张就成了"反革命的"了。

至于对种族灭绝的担心，批评者指出，降低人口的增长率，不同于进行灭绝性的行动。因此，种族灭绝的观点没有太多的理论依据，无须过于认真，或许它只是社会中分立的种族或宗教群体之间的一种不信任和对抗表现而已。

再分配论 世界上除了一些人口稠密地区外，还有许多地方人口严重不足。甚至在大多数国家里，也有足够的土地吸纳人口稠密地区的剩余人口。例如，美国西南部可以接受来自工业城市的"超额"人口。应该采取的对策不是控制人口，而是通过大量地采用新技术提高那些被认为是不适合居住的地区的生存条件，或是集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为迁移到新地区的人们创造就业机会。

对再分配论的批评 对再分配论存有异议的人们认为，这一观点采取一种令人费解的、违背直觉的方法来分析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不符合正确的论证次序。不妨试想如下的比喻：一个人塞上浴缸的塞子，然后开始放水。过了一会儿，浴缸里的水满了，并从四周溢了出来。另一个人看到这个情况说道："你把这儿弄了太多的水！"第一个人回答道："是的，它

正在溢出并且浪费掉。但是镇上的很多人家如果配合一下，就可以利用这些多余的水了。所以你看，并不是水太多的问题，而是一个分配的问题。如果镇上有人能带着水桶或水管来帮一下忙，'问题'就没了。"

显然，解决问题的合理办法是在浴缸满的时候关上龙头，水并没有过错，而是应该采取一种相对简单的预防措施，比起进行（或是规划进行）一项复杂的再分配计划要更为合理有效。而且，再分配是否能够真正符合造成人口过剩的潜在条件呢？批评再分配论的人们认为它无法做到。

宗教教义论 这一观点主要包含两层意义："上帝给予"和人类不应干预生育神秘性的寂静主义信仰；人为的人口控制手段是违背上帝意愿的观点。例如，虽然天主教会至少承认有限制生育的必要和个人有决定家庭规模的权利，但在其教义上却根本反对任何"非自然的"节育方法。

对宗教教义论的批评 批评以宗教为基础的亲生育观的人们，从许多方面来反对不加控制的人口增长的信仰，如借助推理（针对于信仰），借助人类自由意志的观念（针对于上帝意愿决定一切的观念），或者甚至通过借用上帝的仁慈指出极度贫困、饥饿及相伴随的种种人类的不幸都是与神圣使命相违背的。不过，在最后，这一范畴也说明了以上否定的所有4种论点的严密性。当某种观点被采用或用以维护一个更大的目的（如，支持传统，进行革命，证明穷人无可指责，或是平静地感受上帝无穷的智慧）时，任何批评都很难达到目的。即使批评意见正确无误，也很难让那些反对的人们真正信服。

文化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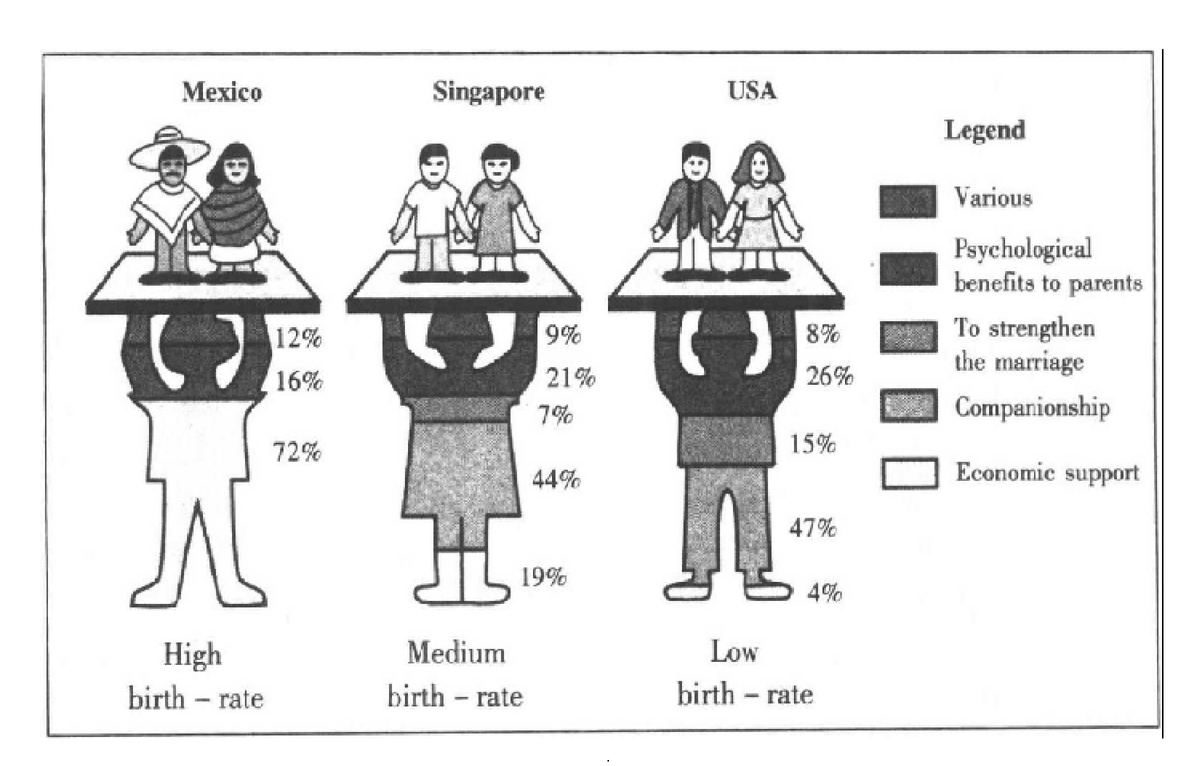
西方文化传统中包含着许多重要因素，强烈地支持着不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利用生态系统。其中最强有力的3个要素是：鼓励我们征服自然的支配性的西方世界观；使价值观倾斜于追求加速增长的商业道德；造成妇女社会地位偏见，迫使其为了获得社会承认而安于母亲角色的母性要求。

支配性的西方世界观 近年来，来自西方文化内外的对这一传统观点的挑战，反映了人们对恶化生活质量的大量生态环境的日益关注。这一支配性的观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形成了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过分乐观的态度。**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是指认为人类根本不同于其他任何生物，而且我们天生就是地球的统治者。作为创造或进化过程中的主要产物，我们有权利、甚至有责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这个星球上的一切事物，因为我们是"生命的最高形式"，而且整个世界都围绕着我们而旋转。更为根深蒂固的是我们的乐观主义，它基于以下3个主要观念：

1. 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目标，并掌握一切必要的手段实现目标。
2. 世界是无限的，因而提供了无限的机会。
3. 人类历史是进步的历史。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因此进步永远不会停止。[69]

目前这一观点的代表是一群被其他未来学家称为“科技乐观主义者”的未来学家。他们相信，一旦问题“变得足够严峻”时，政府的关注和用于解决问题所投入的资金将释放出无尽的科技潜力帮助人们找到对策。许多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在科技的帮助下所形成的工业化，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

商业道德 商业道德（business ethic）观比任何观点都要更重视迅速增长。批评家保罗·艾尔里希指出：“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是为了适应人口增长和大量浪费的需要。”[70]我们是如此热衷于新鲜和变化，因此人们喜欢购买带有内在陈旧性的商品，以便不论是否需要可以尽快地购买更新的产品。正如企业的成功在于必须使每年的利润不断增加，人们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准就是不断的前进。在被迫退休前，必须不断地争取成功。实际上，我们被自己的动力所安排并被限制在其中。[71]



图表 14.3 父母为什么生养下一代？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Forum, 3, no. 22 (December 15, 1995).

母性要求 人们出于许多原因而生育下一代（参见图表14.3）。人口保持增长的一个强大动力是文化标准中强制要求“一个女人至少要生两个孩子（在历史上是越多越好并偏爱男孩），并将他们‘好好’抚养长大”。[72]不同于过去，今天的社会希望妇女离家出外工作，“避孕药”和其他避孕工具使她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生育做出决定和控制。但**母性要求**（motherhood mandate）仍然相当强大，因为社会希望即使是一个“有工作的妻子”也应该用“一些时间来生孩子”，作为她的首要任务。这种身份要求仍然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之中，是一种具有支配性的**不自觉意识**（unconsciousideology）。因此，目前在30岁出头的妇女中有一个小型的生育高峰，因为她们感到要“加紧弥补”自己的“家庭责任”。所以，即使在未来可以创造出一种非常安全和能为道德所接受的节育手段，这种对母性的要求可能还将持续到下个世纪中叶。

根据东西方人口研究所的观点：“（在上表中）父母生养下一代的主要原因根据他们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决定。在贫穷的国家，孩子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功能性的财产，出生率也就越高。”

新环境主义

新环境主义者声称，**生态爱好者**（ecofreak）的时代已经结束，他们相信未来并不黯淡，环境的发展趋势实际上是积极的。斯图尔特·布兰德在《地球目录》一书中，把生态爱好者形容为过激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几乎盼望发生一场大灾难将我们送回到石器时代，这样他们就可以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山谷中，只有适当的技术、一个花园和一种自创的宗教。经济学家朱里安·西蒙也通过引用并未实现的预言，对关于环境的悲观预言提出了质疑。例如，《人口炸弹》（1971年）这本曾经极有影响的书的作者保罗·艾尔里希，曾经预测在70年代美国将发生大规模的饥荒，然后是在1985年，最近的一次是在1999年。然而，迄今为止，这些马尔库塞式的预言都是错误百出。[73]

1994年，艾尔里希及其斯坦福大学的同事科学家史蒂芬·施耐德，以每项打赌1000美元的方式就15项目前发展趋势向西蒙的环境乐观主义提出了挑战。在那些否定的发展趋势中，他们打赌将持续到2004年的是以下这些：

- 全球气温继续上升
- 空气中二氧化碳和一氧化二氮增多
- 人均耕地数量减少

- 人均小麦和大米产量减少
- 热带雨林面积减小
- 人均海洋渔业产量减少
- 动植物物种减少
- 人类精子数量下降

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们保证要尽其所能使自己在打赌中输掉，但他们认为，像西蒙这样“正在传播”的“自得和误导”，将使悲观主义者更有可能赢得赌注，而整个人类则将会最终输掉一切。[74]

生物平衡与混乱理论 关于我们只须不管自然而使其自身实现平衡的观念长期以来在环境主义的观点中非常普遍。正如前面在“生态系统思想”一节中曾经讨论过的，它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近来根据混乱理论搜集形成的分析证明，自然的发展常常导致快速或灾难性的变化，而非宁静的平衡状态。两个物种间最初的细微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增大，常常造成相互排斥，对其中一种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同样，局部条件的微小改变可能在更大的范围里造成剧烈变化，如气候或社会生活。总之，我们传统观念认为可以通过缓慢温和的发展并达到稳定平衡的观念，今天看来只是一个浪漫的幻想而已。历史事实中充满了物种消亡、意外灾祸和气候剧变的先例。[75]

我们不能回到蛮荒 人类控制环境的历史远远长于任何人的想像。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所认为的蛮荒常常是过去人类活动的产物。非洲的平原、美国东部的森林和许多其他被视为理想的自然美的景观，实际上都是当地人们为了便于狩猎而用火烧荒所改变的。

控制是必要的 混乱理论和不能将一个将平衡的蛮荒作为目标的现实情况，并不表示生态活动将变得毫不重要。**新环境主义**（new environmentalism）要求重新认识环境，我们甚至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停止对环境的损害远远不够，控制是必不可少的，但进行干预必须以了解环境与社会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在以后10年里的首要政治问题是：“由谁来进行控制？”

在未来，我们不能再依赖于个人得自其文化遗产中的孤立无助的“良知”，更不能依靠工业企业领导人的“道德观”。而另一个两难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干预多少？”[76]

超出自愿的规划

并非只有人口基金分子才会提出采取彻底的、强制性的措施，有人也

提出对子女少于两人的家庭给予补助，而对超过这一数字的家庭则采取某种处罚。科幻故事和电影里有时会描绘未来社会的生活，在那时生孩子成为非法的或是完全由抽签决定。其中最早的一部阿尔多斯·赫胥利的《勇敢的新世界》（1937 年），讨论亲子关系将完全被废除。新的社会成员一律通过试管繁殖，按照政府的规范进行遗传安排、化学免疫和训练。

这种严酷的措施并非只有科幻小说里才有。1976 年，印度政府施行了一次短暂的强制绝育计划。它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政府一度被迫动用军警在机关枪的威逼下将人们送进诊所进行绝育。在政府停止这一极具争议的计划前的一年之中，一共进行了 800 多万例绝育手术。在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积极地采取只生一个孩子的措施来控制其人口增长。通过提供特殊津贴，以及在入学、医疗及以后的就业和住房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政府成功地减慢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但并没有使之完全停止。根据人口统计预测，到 2025 年，中国人口将达到约 16 亿，印度人口大约为 14 亿，总共将占到世界人口的 37%。[77]

减少人口的政策建议

许多控制人口的计划建议都是以激进的方式干涉人们生活，另一些则鼓励夫妇尽量缩小家庭规模，影响最广泛的是那些改变家庭制度的建议。以下是引自伯纳德·贝雷尔森的“超出家庭规划”的一段文字。[78]判断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的一个好办法，就是看看你认为以下计划中的哪些方面应该是必要的。如果你支持其中的大部分予以实施，你就是一个人口强硬派。

1. 协助自愿家庭规划：在所有国家，为所有愿意的人提供免费的医疗咨询和节育措施。下一步是，使堕胎自由化和免费（这一政策业已在日本施行）。
2. 强化广泛的教育运动：在所有中小学课程中加入节育讲座；成立一个专门的有线电视台，不断发布节育信息和进行节育宣传。
3. 鼓励计划：对接受绝育手术或成功地间隔孩子出生时间的父母给予物质鼓励，或是在每一个未怀孕的年份给予“责任奖励”。
4. 税收和其他处罚：在头胎之后取消产假或产妇保险；取消在许多国家都有的家庭补助；对每一起“超生”征收直接税；限制对一个家庭全部孩子每年接受州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的名额；对未婚给予税收鼓励。
5. 政治变革：调整援外政策，对那些没能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人口的

国家减少食品或财政援助；而在美国国内，联邦政府设立一个人口控制部门，专门负责促进和推行**人口零增长**（zero population growth）。

6. 非自愿控制：在供水系统中加入大规模生育控制物质，或在主要的食品供应中加入暂时绝育的物质；通过出售特许证允许生育，或是要求妇女在生有一胎以后要积累一定的“积分”后才能再次生育；对所有已有3个孩子的男子实行强制绝育措施；给所有妇女植入一种只有政府医疗机构才能改变的“定时子宫帽”的绝育装置。

社会学视角

通过将各种不同观点的建议放入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中，可以更好地理解阻碍专家对有效的人口政策形成一致意见的混乱局面。人口问题的对策主要集中在3个中心问题上：社会制度的结构和价值标准；社会不平等导致的潜在冲突及盈利目的；个人产生的关于生育的社会解释。

功能主义观点

强调社会结构的社会学家认为，人口增长及其造成的生态问题是退化的和非现代的行为模式，它将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而逐渐减弱。大家庭是农业社会的残余，在那时它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同样，妇女角色的急剧变化也是因为旧的、手工劳动功能的自动发展。它鼓励妇女走出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出外就业和争取社会地位。在所有现代社会中，家庭规模日益减小是大势所趋。因此，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希望随着现代社会中对人口的需求越来越少，从而使人口增长实现平衡。

新的价值舆论 另一群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相信，工业化曾是构成我们生活方式的中心，但它现在业已落伍过时了。于是，他们总结指出人类的生存必需要有一种**新的价值舆论**（new value consensus），一种试图逆转盛行的价值标准、对自然的单纯性的要求。[79]通过取代经济复杂性，它用适当的技术使每个局部地区都可以用其所需的手段和方法来实现自足。[80]所有的生产都将缩小规模，消除了对引人注目的消费、物质财富和科技等的过度渴望，从而大大减轻了对资源的压力。在《小就是美》（1973年）一书中，恩斯特·舒马赫雄辩地表达了对新价值标准的渴望，恳求我们放

弃成为“蜂拥向前的人”，而是“回到家庭中去”。[81]他认为，在“进步的”国家，尽管人们认为机器生产节约了大量劳力和时间，但事实上同不发达国家相比，人们工作得更加辛苦，用于家庭的时间也越来越少。[82]

然而，许多社会学家对此做出反应，认为无论生态的需求多么紧迫，但仍然不改变其他许多社会制度就不能改变社会的消费价值观。例如，在对任何主要的经济价值观进行改变之前，必须首先改变当前的公司结构和广告手段。这种观点同样被一些社会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所强调。

冲突论观点

冲突论的观点将人口问题归咎于社会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心观念——利润驱动，以及对生态问题的漠不关心。

人口压力并不是冲突论者首先关注的问题。不必要的生育是机会不平等的表现。只要种族不公和阶级偏见被消除，它也就可以很快消失。随着财富的再分配，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决定怎样的家庭规模才更加有效。

冲突论者和生态强硬派都认为，那些提倡自发的单纯性和依赖改变个人价值来解决生态问题的想法都太过天真。例如，巴里·考门纳就提出证据表明污染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只要利润驱动仍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就很难彻底消灭污染问题。[83]非法倾倒放射性废料，如核能或铀矿的放射性残渣，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省去正常储藏或处理所需的大量费用。现在已知的大型放射性废料倾倒点有50多处，其中包括一处仅距盐湖城15英里、有着43亿磅铀废料的倾倒点。州长斯各特·马特森将之形容为“西部最大的一个微波炉”。[84]

考门纳还提出了一个表面上危险较小的利润驱动：创造新技术的驱动。“在一种新的、创新的化学产品投放市场的四到五年里，利润要远高于平均值（进行创新的公司由于对新产品的暂时垄断，所获得的利润率大约是其他公司的两倍）。”[85]但是由于缺乏监管，这些革新的公司就像二战后那样数量激增，造成了今天如此广泛的化学废料倾倒问题。

尽管消灭本行业的收入来源看来似乎有些不可靠和荒唐，但对捕鲸船主来说，杀死所有的鲸鱼实际上是有利可图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家可以通过减少商品供应获得暂时的高利润率，然后再投资到其他行业。杀死生金蛋的鹅是“有利可图的”，只要这只鹅已经生了足够的金蛋可以再买一只新鹅。[86]考门纳的观点是，只要现行制度是以短期利润为基础的，我们就不能依赖它来控制污染或生态的威胁。

相互作用论观点

象征相互作用论者提醒我们注意，对情况的文化界定影响着人们的每一个决定，然而，突然的转变会取代人们的价值标准和品味。美国人一度非常喜欢拥有他们所能买到的最大的汽车。之后有一段时间，这类汽车堆满了汽车商的停车场，根本卖不出去。现在，它们又重新开始流行了。生育高峰戛然而止，就像今天"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想法说不定明天就会消失。同样，我们为什么会针对一个生态问题采取行动而忽视其他问题的原因，至少在表面上很难得出合理的解释。

要理解这些看似不合理和随意的决定转变，必须研究个人形成其行为方式的特定背景。例如，玛格丽特·米德概括一次关于人口政策的国际讨论会的结论，指出全国性的人口控制计划必定会以失败告终。我们无法为整个国家设定目标和标准，或是为所有人提供同一种服务。个人不会在国家或州的层面上做出选择。他们只是对自己当地的，甚至是村镇的条件和传统做出反应。[87]

相互作用论者不相信经济发展或科技进步，如"避孕药"等能够解决人口问题。为了有一个积极的印象，必须首先适应指导个人决定的社会文化价值。尽管有汽车污染的明显危害，而且使用私人汽车上下班要比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更大的能源浪费，但现在20个美国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使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班的，明显地低于1960年时的八分之一。[88]相互作用论使我们认识到，忽视了对情况的社会界定而制定的政策注定要失败。

未来的选择

对于未来人口发展最恰当的预测在本章之前的部分，结合新马尔萨斯理论、科技乐观主义理论及人口转折理论时已经提及，这里我们的预测将限定在美国人口及环境的未来上。

悲观的前景

在2030年，生活必须由抽签来决定。如果你的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你必须每天仔细翻阅新闻以了解你的号码是否被抽中，从而有资格生

育下一代。如果你被选中，就有一年的时间寻找一位伴侣并生养一个孩子，否则你的"成家"机会就失去了。如果你年满55岁，就会担惊受怕地看着这些数字，如果你的号码出现在黑名单上，那意味着你还有一年的生命，然后是"自动放弃"，也叫做为社会"减压"。大部分人不会逃避"放弃"，因为严重的人口过分拥挤造成的物资短缺和世界经济体系的瓦解，使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凶险。每年允许多少人出生和执行多少死亡的定额对于国民生产总值极为关键。由于移民的涌入业已停止，实现人口增长平衡变得较为简单了。世界分裂成许多相互敌视的国家，每一个都猜疑重重地守护着自己的自然资源和技术。世界变得更加荒凉贫瘠，那些没有机械化种植业的国家由于2010至2015年的干旱而人口锐减，剩下的人联合起来成为了游牧部落，向那些在干旱期间毫无作为的发达国家进行报复。所有的边界都守卫森严。国家当局利用这一外来威胁建立起军事法律，消灭了所有的内部政治反抗。

因为美国远离世界上仍在生产的少数几个大油田，原子能成为主要的能源。放射性废料倾倒和核电厂是一个持续的威胁，人们必须在这种危险中继续生活，否则就没有了能源。汽车靠电池开动，只有城市里才有充电站，长途旅行变得非常昂贵，因而进一步造成了城市的孤立，它们之间被大片大片的沙漠分割。所有的地下蓄水层都在21世纪初被污染，人们被迫放弃所有依赖于地下水的城镇，只有那些拥有水库或海水净化厂的大城市才有人居住。

通讯主要通过计算机图像进行，但为了避免使电厂负荷过重，其使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人们没有资源做太多的事情，所以只能将大部分时间用来观看政府控制计算机节目，或是用药物修补自己的意识。政府推销低廉的合成药物替代传统的休闲方式和家庭生活。

除此之外，呆在家里无所事事要更为安全。像笼舍一样的公寓里的空气过滤装置使你在家比在外面使用便携式氧气面具可以更有效地进行呼吸。而且在外面常常会遇到下雨。如果没有准备防酸的雨伞和靴子，你必须一直呆在屋子里，直到街道经过中和车的清扫。

乐观的前景

2030年，世界已走过后工业时代，进入到高质量生活方式的时代。人类取得了许多幸运的和重要的科技突破。人口乐观主义者预测的4个趋势终于成为了现实。人们拥有了性别平等的家庭，为孩子提供了高质量的生长环境；生活稳定并形成了有益、有效的年龄分布；社会对生活方式简

单性的需要加以了认同；由于各个国家的成功发展和人口转变，世界结合得更加紧密。

母性要求和妇女认为必须生育孩子才能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观念早已荡然无存。人们不再认为必须要有孩子，现在首先考虑的是要为未来的孩子创造一个最良好的环境。生物工程技术的突破和童年早期训练的全面发展，使父母可以选择孩子的性格以及出生时间。

尽管一些夫妇愚蠢地只重视挑选长得漂亮的孩子，但大多数人还是强调新生儿在心理和智力上的特点。一旦可能，家长就把婴儿送到激励学校，以尽可能地发展孩子先天设定的潜能，由专家来决定孩子的养育。预计到2025年，人口开始停止增长，随着人们开始形成稳定的生活习惯，这个时间甚至有可能更早。由于人口趋于稳定，承担养老扶幼责任的在职劳动者的比例也逐渐稳定。由于没有了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和妇女工作所增加的生产率，社会必需品的生产更加丰富。年轻人数量的减少也意味着犯罪越来越少。城市规模缩小，并且变得更有效率。

科学成就促使生活方式趋向简单化，并且更加关注环境质量，从而大大降低了造成温室效应的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积聚。所有人现在都一致同意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科学家集中力量进行清理工作，而不是制造新的化学品。使用危险品的最危险的生产和实验在太空站进行，太阳风将污染的残留物带入宇宙的真空。在地球上，所有的气体和固体物质在释放前都要经过净化处理。高效小型的电池为交通运输提供能量，减少了污染和噪音。电力生产在控制污染的地下岩洞中进行。个人和家庭越来越多地热衷于活动，而不是新奇的事物。随着医学的进步和生活的放松，人的寿命已超过了通常的90岁，人们将兴趣调整到旅游、娱乐和其他积极的追求之中。

小结

1. 马尔萨斯的悲观论是人口压力危险的最早警告。他说，人口的几何级增长将会超出可获取的有限资源。救生艇理论指出，地球资源有限，要求国家进行自我保护，如果想要生存就应无视其他国家的“沉没”。一个较为乐观的观点是人口过渡论，预计发展中国家将遵循西方国家三段的发展模式，随着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生育率将逐步趋于平衡。
2. 到21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将达到77至112亿左右。尽管近年来世界人口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在可以预计的未来人口增长仍将持续，并

且进一步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资源。

3. 人口压力造成的主要问题。发展中国家遭受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贫困，人口增长产生的不断需求消解了其工业化的努力。发达国家中许多人的自鸣得意使他们成为了强大的污染者和资源巨大的浪费者。我们面临着水资源和耕地缺乏，以及由于雨林的破坏，大量动植物物种的迅速灭绝。
4. 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观念意味着理解环境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把人类的目标从中分离开来。相反，我们必须在整体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认识。生态系统是脆弱的，会因为变得过于相似和简单，或是因为其正常的处理废物能力超过负荷而遭到破坏。由于使用除虫剂、改变气候和大气平衡、污染蓄水层、破坏河流湖泊和酸雨污染，而使食物链超过负荷而处于危险境地。
5. 生态和人口问题的持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许多传统观念拒绝采取积极的行动。亲生育论、反压制、宗教和再分配的观点，都否认人口是个首要问题。此外，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中支持人口不断增长和“征服自然”的观念，深深地影响着社会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支配性的西方世界观、商业道德和母性要求，也都是维护人口增长的传统价值观。
6. 新环境主义反对不管自然而让其自己重新发现平衡的观点。混乱理论显示，自然的变化既不缓慢也不平静，它常常造成灾难而不是平衡。人类对荒野的控制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开始，也很难会就此结束。在保护环境中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是必要的，但问题是，由哪个权力集团来进行干预？
7. 功能主义的机制瓦解观点依附于人口转折论，认为高出生率代表了观念上的文化滞后，随着家庭生活与经济生活相协调，就会自动消失。冲突论强调经济的不平等，并没有对人口问题予以首要的考虑。高出生率仅仅只是人口不能控制自身命运的又一种体现，随着经济的平等就会消失。相互作用论观点着重解释潜在的父母在自身环境中是如何看待家庭生活和孩子地位的。忽视了这些文化因素的政策或国际性举措，无论在技术上多么有效，都注定将以失败告终。

关键词

反照率效应
人类中心论
蓄水层
生物多样性

商业道德	母性要求
人口过渡理论	新环境主义
生态爱好者	新的价值舆论
生态系统	光合作用
营养过剩	亲生育论
超负荷增长	限度
食物链	触发效应
温室效应	不自觉意识
救生艇理论	人口零增长

推荐书目

Brown, Lester, and associates. *The State of the World, 199 –*. New York: W. W. Norton. An annual publication describing recent changes in all the major indicator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Carson, Rachel,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2. The classic bestseller about the dangers of chemical pollution that launche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Cylke, F. Kurt, Jr.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A concise discussion of most environmental issues, concern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Diamond, Irene, and Gloria Feman Orenstein. *Reweaving the World: 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90. An anthology of feminist thought that elaborates a pro-environmentalist ideology and attacks patriarchal anti-environmentalism.

Nafis, Sadik, ed. *Population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Lessons learned from Two decades of Experien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1. A review of scientific literature and of UN data on the variety and effects of population policies, most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Population Today*. A valuable newsletter published eleven times a year, summarizing demographic patterns and recent studies.

Ray, Dixie Lee, with Lou Guzzo. *Trashing the Planet*.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0. A best-selling account of how science may help us deal with our eco-problems.

Schumacher, E. F.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New

York: Harper & Row/Perennial Library, 1973. The proponent of Buddhist economics and appropriate technology presents his simple and sensible plan for developing the Third World and remaking our own.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 Published annually. Population data from almost every country. Another basic resource.

注　　释

第 1 章

1. Peter Collier and David Horowitz, *The Rockefellers: An American Dynasty* (New York: Signet, 1976), pp.62 – 63.
2. John P. Hewitt and Peter M. Hall, "Social Problems, Problematic Solutions, and Quasi-Theo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1973): 367 – 74*.
3. John Stimson and Ardyth Stimson, " Quasi-Theories and Research Oringination, Part I: Quasi-Theories as Substitute Cures," *Sociological Practice* 2 (1977): 38 – 48.
4. D. C. Miller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Design and Social Measurement*, 4th ed. (New York: Longman, 1983), pp.23 – 29.
5. Randall Collins, *Four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81.
6.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7), pp.132ff.
7. Randall Collins, *Four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p.198.
8. Ibid., p.264.
9. Travis Hirschi, "Procedural Rules and the Study of Deviant Behavior," *Social Problems* 21(1973): 159 – 73.
10. W. Lawrence Neuman,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2d ed., Boston: Allyn & Bacon, 1994, p.72.
11. Edward T. Cahill, "Sociologists as Planners," in A. B. Shostak (ed.), *Putting Sociologists to Work*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4).
12. Joe Bailey, *Social Theory for Planning*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 p.142.
13. Willard Waller,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Mor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 (1936): 926ff.

第 2 章

1. Emile Durkheim, *Suicide* (1897), translated by John A. Spaulding and George Simps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2. Philip G. Zimbardon, *Shyness* (New York: Jove/HBJ, 1977).
3. Robert Nisbet, *Sociology as an Art Fo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20.
4. Robert MacIver, "The Great Emptines," in Eric and Mary Josephson (eds.), *Man Alone: Alienation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Dell Laurel, 1962), p.49.
5. Robert N. Bellah, Richard Madsen, William M. Sullivan, Ann Swidler, and Steven M. Tipton, *Habit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pp.52, 153.
6. Ibid., pp.72 – 73.
7. Louise Bernikow, "Alone: Yearning for Companionship in America,"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ust 15, 1982), p.25.

8.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Marriage, Divorce, and Remarriage in the 1990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p.23 – 180.*

9. Robert Nisbet, *Sociology as an Art Form*, p.123.

10. Emile Durkheim, "Anomic Suicide," in K. Thompson and J. Tunstall (ed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Baltimore: Penguin, 1971), p.111.

11. William H. Swatos, Jr., "Revolution and Charisma in a Rationalized World: Weber Revisited and Extend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ax Weber Colloquia/Symposi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October 30, 1979, p.6.

12. Anton C. Sijderveld, "Industrial Society Tends to Reduce Man to a De-humanized Functionary," p.70, in George McKenna and Mircla Baroni-Harris eds., *Taking Sides: Clashing Views on Controversial Social Issues* (Guilford, Conn.: The Dushkin Group, 1980).

13. Andrezej Walicki, "Marx and Freedom,"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24, 1983), p.52.

14. Paul Goodman, *Growing Up Absurd* (New York: Vintage, 1960).

15. Robert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 The Factory Worker and His Indust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summarized by I. H. W. Smith,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 Hall, 1987), p.117.

16.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6*,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Table 641, p.410.

17. Richard Sennett and J. Cobb,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72), p.179.

18. "Politics of Distrust," *PBS News Hour*, February 5, 1996.

19. Ibid.

20.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Table 457, p.287.

21. Christopher Lasch,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79), p.137.

22. C. Wright Mills, "The Competitive Personality," in Lewis A. Coser (ed.), *The Pleasur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Mentor, 1980), p.270.

23. Ralph Keyes, "We the Lonely People," in Kurt Finsterbush and George McKenna (eds.), *Taking Sides* (Guilford, Conn.: Dushkin, 1982), p.79.

24. Christopher Lasch,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25. Joseph Bensman and Robert Lielienfield,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Lost "Boundaries of the Self"*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pp.12 – 13.

26. Elaine Walster, "Playing Hard to Get: Understanding as Elusive Phenomenon," in T. Blass(ed.), *Contemporary Social Psychology* (Itasca, Ill.: F. E. Peacock, 1976, pp.94ff.

27. Walter R. Gover, M. Hughes, and M. R. Geerkin, "Playing Dumb: A Form of Impression Management with Undesirable Side Effect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3 (1980), 89 – 102.

28. Stanley Cohen and Laurie Taylor, *Escape Attempt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sistance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Penguin, 1978), p.213.

29. Peter L. Berger, "Secular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Plausibility," in K. Thompson and J. Tunstall

(ed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p.455.

30. Ibid., p.447.
31. A. James Rudin and Marcia R. Rudin, *Prison or Paradise: The New Religious Cult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0), p.14.
32. Irving Louis Horowitz, "The New Fundamentalism," *Society* (November/December 1982), pp.40–47.
33. Ibid.
34. A. James Rudin and Marcia R. Rudin, *Prison or Paradise: The New Religious Cults*, p.299.
35. Edwin Schur, *The Awareness Trap* (New York: McGraw-Hill, 1976).
36. David A. Karp and William C. Yoels, *Symbols, Selves, and Society* (New York: J. B. Lippincott/Harper & Row, 1979), p.199.
37.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cited by 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t www.cdc.gov/ncipc/dvp/suifacts.htm.
38. "National Data Show Drop in Homicide and Increase in Youth Suicid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ctober 23, 1995, at www.cdc.gov/nchswww/releases/95news/95news/nr43-13.htm.
39.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cited by 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t www.cdc.gov/ncipc/dvp/suifacts.htm.
40. Ibid.
41. Alex Crosby, "The Romeo and Juliet Myth: Teenage Suicide isn't Romantic," Nemours Foundation, 1996, at www.kidshealth.org/parent/behavior/suicide.html.
42. Karen R. Sheel, "Heavy Metal Music and Teen Suicid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6.

第 3 章

1. Thomas S. Szasz, *Ceremonial Chemistry: The Ritual Persecution of Drugs, Addicts, and Pushers*, rev. ed. (Holmes Beach, Fla.: Learning Publications, 1985).
2. H. Meyer, *Old English Coffee Houses* (Emmaus, Penn.: Rodale Press, 1954).
3. Daniel Kagan, "How America Lost Its First Drug War," *Insight* (November 20, 1989), pp.8–17.
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rends in Substance Use and Associated Health Problems," August 1996.
5. Ibid.
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obacco: The Twentieth Century's Epidemic," January 1996.
7.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coholism and Alcohol Abuse, *Sixth Special Report to U.S. Congress on Alcohol and Health*,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January 1987, p.3.
8.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Advance Data*, HHS, No.205, September 30, 1991, p.1.
9.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coholism and Alcohol Abuse, *Alcohol Alert*, No.9, July 1990, p.1.
10. J. McGrinnis and W. Foege, "Actual Causes of Death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70 (18) (11/10/93): 2208; U.S.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Table 143, p.103.

11.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1995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on Drug Abuse*,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12. 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HHS, "Youth and Alcohol: A National Survey, Drinking Habits, Access, Attitudes, and Knowledge,"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une 1991.
13. Public Health Service, HHS, "Healthy People 2000: National Health Promotion and Disease Prevention Objectiv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14.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1995 Monitoring the Future Study, Secondary Student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5).
15. 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HHS, "Youth and Alcohol".
16. The Scholastic/CNN Newsroom Survey of Student Attitudes About Drug and Substance Abuse, February 1990.
17. *The Weekly Reader*, *National Survey on Drugs and Alcohol* (Middletown, Conn.: Field Publications, Spring 1995).
18. Cited in "Campus Drinking: Who, Why, and How Much?"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29, 1994), p.21.
19. "Alcohol and Drugs on Virginia College Campuses," State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Virginia, March 1993, p.11.
20. "Campus Drinking: Who, Why, and How Much?"
21. H. Wesley Perkins, "Gender Patterns in Consequences of Collegiate Alcohol Abuse,"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53* (1992): 458 - 62.
22.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224, p.146.
23.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coholism and Alcohol Abuse, *Eighth Special Report to U.S. Congress on Alcohol and Health*, September 1993, p.xxvi.
24.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coholism and Alcohol Abuse, *Epidemiologic Report*, January 1992.
25.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Drug and Alcoholism Treatment Unit Survey*, *Main Findings*, *1991*, p.31.
26. General Services Branch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Inc., 1992 Membership Survey.
27. B. A. Miller et al.,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 and Women's Alcohol Use," *Journal of Studies of Alcohol*, Supp. 11(1993): 107 - 17.
28.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coholism and Alcohol Abuse, *Eighth Special Report*, p.21.
29. "Campus Drinking: Who, Why, and How Much?"
30. D. Krahn et al., "The Relationship of Dieting Severity and Bulimic Behaviors to Alcohol and Other Drug Use in Young Women," *Journal of Substance Abuse* 4 (1992): 341.
31. Penny Booth Page, *Children of Alcoholic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1).
32. J. Collins and P. Messerchmidt, "Epidemiology of Alcohol-Related Violence," *Alcohol Health &*

Research World 17 (1993): 95.

33. "Cocaine Abuse," 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 (http://165.112.78.61/NIDACapsules/NCCocaine.html).
34. Ibid.
35. P. Kerr, "The American Drug Problem Takes on 2 Faces," *New York Times* (July 10, 1988), p.E5.
36. Ibid.
37. H. Abandinsky, *Drug Abuse* (Chicago: Nelson-Hall, 1989).
38. James A. Inciardi, *The War on Drugs: Heroin, Cocaine, Crime, and Public Policy* (Palo Alto, Calif.: Mayfield, 1986), pp.72 - 72.
39. Ted Gest, "New War Over Crack,"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ember 6, 1995), pp.81 - 82.
40. Ibid., p.83.
41. John Leland, " Just Say Maybe," *Newsweek* (November 1, 1993), pp.51 - 54.
42. Ibid., p.52.
43. Ibid., p.54.
44. *Marihuana: A Signal of Misunderstanding, 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Marihuana and Drug Abuse*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109.
45. FBI Uniform Crime Reports,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46. Chuck Thomas, *Marijuana Arrests and Incarc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reliminary Report* (Washington, D.C.: Marijuana Policy Project, 1995).
47. Barbara Kantrowitz, "Heroin Makes an Ominous Comeback," *Newsweek* (November 1, 1993), p.53.
48. www.drugfreeamerica.org:80/heroin-fags.html.
49. 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 *1995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on Drug Abuse*.
50. Marcy Gordon, "Drug Use by Teens Increases Sharply," Associated Press Wire Service (August 21, 1996).
5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obacco: The Twentieth Century's Epidemic."
52. U.S.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on Drug Abuse 199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53. John Slade, "Facts on Nicotine and Tobacco," *Clearinghouse Fact Sheet*, New Jersey Alcohol/Drug Resource Center and Clearinghouse, 1992.
54. National Center on Addiction and Substance Abus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Substance Abuse and the American Woman."
5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rends in substance use and Associated Health Problems."
56. See Erich Goode, Drugs in American Society, 3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p.195 - 96; Joel Fort and Christopher T. Cory, *American Drugstore* (Boston: Educational

Associates, 1975), p.41.

57. Thomas Griffin and Roger Svendsen, "Promising Prevention Strategies for the 90s," *Clearinghouse Fact Sheet*, New Jersey Alcohol/Drug Resource Center and Clearinghouse, 1992.

58. G. Cowley, "I'd Toddle a Mile for a Camel," *Newsweek* (December 23, 1991), p.70; see also www.wesleyan.edu/psyc/psyc260/joechemo.htm.

59. John Leo, "Boyz to (Marlboro) Men,"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2, 1997), p.18.

60. Ibid.

61. Associated Press Wire Service, "Elders Rips Tobacco Ads, Calls Smoking an Addiction of Teens" (February 25, 1994).

62. National Center on Addiction and Substance Abus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Substance Abuse and the American Women," June 1996, summarized at www.health.org/pressrel/casapr.htm.

63. Shannon Brownlee, "The Smoke Next Door,"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20, 1994), pp.66 – 69.

64. J. L. Pirke, K. M. Flegal, J. T. Bernert, D. J. Brody, R. A. Etzel, K. R. Maurer, "Exposure of the U.S. Population to Environmental Tobacco Smoke: The Third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1988 to 199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75 (1996): 1233 – 40.

65. John M. Broder, "Cigarette Makers Reach $368 Billion Accord," *New York Times* (June 21, 1997): p.A1.

66.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Drug and Crime Facts: 1994*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5).

67. P. Kerr, "Crime Study Finds Recent Drug Use in Most Arrested,"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1988), pp.A1, B4.

68. See James A. Inciardi, *The War on Drugs*, pp.58 – 59.

69. National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statistics cited by 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 (MADD), at www.madd.org/stats.

70.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reported in *Statistics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1019, p.633.

71. U.S.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Selected Highway Statistics and Chart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72. Matt Mossman, "The Most Dangerous of Days," Knight-Ridder New Service (July 2, 1997).

73.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42 (1994), Table 16, p.26.

74.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in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130, p.97.

75. U.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Exposure to Alcoholism in the Family: United States, 1988," *Advance Dat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76. U.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cited in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6*, Table 143, p.103.

77. National Council of Alcohol and Drug Abuse, "1995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78. *Working Partners: Confronting Substance Abuse in Small Business, Nation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92.

79. *NCADD Fact Sheet: Alcohol and Other Drugs in the Workplace*, National Council on Alcoholism and Drug Dependence, May 1992.

80. E. Greenburg (ed.), "1991 AMA Survey on Workplace Drug Testing and Drug Abuse Policies,"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1991, p.1.

81. T. R. Burke, "The Economic Impact of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 *Public Health Reports* 103 (6) (Nov/Dec 1988): 567; 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Report* 760: *Survey of Employer Anti-drug Programs* (January 1989), p.2.

82. Mike Freeman, "Painkillers and Addiction Are Prevalent in N.F.L.,"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1997), p.S1.

83. David J. Hanson, "The Effectiveness of Alcohol and Drug Education," *Journal of Alcohol and Drug Education* 27 (Winter 1982): 1 – 13; "Drug Education Gets an F," *U.S. 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13, 1986), pp.63 – 64.

84. J. M. Polich et al., *Strategies for Controlling Adolescent Drug Use*, RAND Publication RJ – 3076 – CHF, 1984.

85. Herbert Kleber, quoted in Joseph B. Treaster, " Survey Finds Marijuana Use Is Up in High School,"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 1994), p.1.

86. W. B. Hansen, L. A. Rose, J. C. Dryfoos, *Casual Factors, Interventions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in School-Based Substance Abuse Prevention* (Washington, D.C.: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May 26, 1993.

87. Linda Dusenbury, Antonia Lake, and Mathea Falco, "A Review of the Evaluation of 47 Drug Abuse Prevention Curricula Available Nationally,"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67 (April 1997): 127 – 32.

88. Keith Humpherys and Rudolf H. Moos, "Saving Money with Alcoholic Anonymous," *Harvard Mental Health Letter* 13 (march 1997): pp.6 – 7.

89. J. C. Ball and A. Rose, *The Effectiveness of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91); R. G. Newman and N. Peyser, "Methadone Treatment: Experiment and Experience." *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s* 23 (1991): 115 – 21.

90. Adam Yarmolinsky and Richard A. Rettig, "Methadone Revisited," National Academy Op-Ed Service, Washington, D.C., 1997.

91. Erich Goode, *Drugs in American Society*, pp.265 – 68; George DeLeon and Mitchell S. Rosenthal,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in Robert L. DuPont, Avram Goldstein, and John O'Connell (eds.), *Handbook on Drug Abuse* (Rockville, Md.: 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 1979): pp.40 – 41.

92.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and Health,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Review of Long Term Residential Treatment for People with Alcohol and Other Drug Use Problems*, 1996.

93. Gordon Witkin, "Why This Country Is Losing the Drug War," *U.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ember 16, 1996), p.60.

94. H. J. van Vliet, "The Uneasy Decriminalization: A Perspective on Dutch Drug Policy," *Hofstra Law Review* (1990): 717 - 50.

95. 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 on Alcohol and Drugs (LADIS), Netherlands, 1996, as reported at http://www.ivv.nl/products/ladis/ladis96/toc.html.

96. S. B. Duke and A. C. Gross, *America's Longest War: Rethinking Our Tragic Crusade Against Drug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93).

97.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207, p.137.

98. Peter H. Odegard, *Pressure Politics*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6).

99. Patricia A. Morgan, " The Legislation of Drug Law: Economic Crisis and Social Control," *Journal of Drug Issues* 8 (1978): 59.

100. Richard Ashley, *Cocaine: Its History, Uses, and Effec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101. Larry Sloman, *Reefer Madness: The History of Marijuana in America* (Indianapolis, Ind.: Bobbs-Merrill, 1978; Donald Dickson, "Bureaucracy and Morality: An Organization Perspective on a Moral Crusades," *Social Problems* 16 (1968): 146 - 56.

102. Barry Glasner and Bruce Berg, "How Jews Avoid Alcohol Problem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1980): 647 - 64.

103. Giorgio Lolli et al., *Alcohol in Italian Culture*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

104. Richard Stivers, *A Hair of the Dog: Irish Drinking and the American Stereotyp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05. See, for example, Bruce D. Johnson, *Marijuana Users and Drug Subcultur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3).

106. This concept of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was formulated by Edwin H. Sutherland in *Principles of Criminology*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34).

第 4 章

1. Joe Chidley, Wilheimina Paras, and Chu Showwei, "Fighting the Child Sex Trade: New Focus on an Ancient Evil," *Maclean's* (September 2, 1996), pp.6 - 7.

2. Alfred C. Kinsely et al.,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1948).

3. Clyde Kluckhon, " As an Anthropologist Views It," in Albert Deutch (ed.). *Sex Habits of American Men*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48).

4. Marston Bates, *Gluttons and Libertin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p.80.

5. James Henslin and Edward Sagarin (eds.), *The Sociology of Sex* (New York: Schocken, 1978), p.14.

6. Marston Bates, *Gluttons and Libertines*.

7. Paul H. Gebhard, "Human Sexual Behavior," in Donald S. Marshall and Robert C. Suggs (eds.), *Human Sexual Behavior: Variations in the Ethnographic Spectru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1), pp.21,210.

8. Ibid.

9. See Michele Ingrassia, "Virgin Cool," *Newsweek* (October 17, 1994), pp.59 - 69.

10. "Sex Survey," *Parade Magazine* (August 7, 1994), p.4.

11. Ibid., p.5.

12. Tom Smith, *General Social Survey* (Chicago: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1993); Yankelovich Clancy and Schulman, " Survey on Attitudes Towards Sex and Reproduction for *Times* and Cable News Network" (New York:: June 1992).

13. Edward G. Laumann, John H. Gagnon, Robert T. Michael, and Stuart Michael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John O. Billy, Korey Tanfer, William R. Grady, and Daniel H. Klepinger, "The Sexual Behavior of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25 (1993): 52 - 60; Kathryn Kost and Jacqueline D. Forrest, "American Women's Sexual Behavior and Exposure to Risk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24 (1992): 244 - 54.

14. George Sponaugle, "Attitudes Toward Extra Martial Relations" in Kathleen McKinney and Susan Sprecher (eds.), *Human Sexuality: The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Context* (Norwood, N.J.: Ablex, 1989), p.205.

15.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2, 1986, p.56.

16. Earl Ubell, "Are You at Risk?" *Parade Magazine* (September 15, 1996), pp.12 - 13.

17. See J. Glascock and R. LaRose, "Dial-a-Porn Recordings: The Role of the Female Participant in Male Sexual Fantasi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30 (1995), 325 - 39; S. Borna, J. Chapman, and D. Menez, "Deceptive Nature of Dial-a-Porn Commercials and Public Policy Alternative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2 (1993): 503 - 9.

18. "Dial-a-Porn Stopped." *The Forerunner* (Media House International, 1988), Web-posted in 1997 at www.forerunner.com.

19. Vanessa Friedman, "Dialing for Dollars," *Vogue* (September 1995), pp.416 - 18.

20. "Clueless in Tokyo," *The Economist* (June 8, 1996), p.66.

21. S. Krieger, "Lesbian Identity and Community: Recent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Signs* 8 (1982): 91 - 108.

22. See, for example, David Gelman, "Born or Bred?" *Newsweek* (February 24, 1992), pp.46 - 53.

23. Arno Karlen, *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71), p.34.

24. Laud Humphries, *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70).

25. Ibid., p.121.

26. Gebhard, "Human Sexual Behavior," p.215.

27. Karlen, *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 p.476.

28. George Chauncey, *Gay in New York: Gender, Urban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Male World: 1890 - 194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29. Ibid., p.9.

30. Eric Marcus, *Making History: The Struggle for Gay and Lesbian Equal Right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2).

31. Martin B. Duberman, *Stonewall* (New York: Dutton, 1993).

32. Gregory M. Herek and Kevin T. Berrill, *Hate Crimes: Confronting Violence Against Lesbians and Gay Men*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1992); John Gagnon, Cathy Greenblat, and Michael Kimmel, *Human Sexualities* 2d ed. (Boston: Allyn & Bacon, 1995); W. R. Greer, "Violence Against Homosexuals Rising, Groups Seeking Wider Protection Sa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1986): p.A36.

33. Valerie Jenness, "Social Movement Growth, Domain Expansion, and Framing Processes," *Social Problems* 42 (1995), 145 – 70.

34. Steven A. Holmes, "Gay Rights Advocates Brace for Ballot Fight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1994), p.A17.

35. Wilbur J. Scott and Sandra Carson Stanley (eds.), *Gays and lesbians in the Military: Issues, Concerns, and Contrast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4).

36. Priscilla Painton, "The Shrinking Ten Percent," *Time* (April 26, 1993), pp.27 – 29.

37. Robert T. Michael, John H. Gagnon, Edward O. Laumann, and Gina Kolata, *Sex in America: A Definitive Survey* (Boston: Little, Brown, 1994).

38. NORC, *General Social Survey, 1972 – 1993: Cumulative Codebook* (Chicago: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1993); Eloise Salholz, "The Future of Gay America," *Newsweek* (March 12, 1990), pp.20 – 25.

39. Ibid., p.34.

40. See F. W. Bozett, "Gay Fatherhood," in P. Bronstein and C. P. Cowan (eds.), *Fatherhood Today: Men's Changing Role in the Famil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8), pp.214 – 35; D. Polman, "A Backlash Against Gays as Parents," *Philadelphia Inquirer* (July 21, 1985), pp.1F, 6F.

41. "Straight Talk About Gays," *U.S. News &World Report* (July 5, 1993), p.46.

42. NORC, *General Social Surveys*, 1972 – 1993.

43. Kate Millet, in *Not a Love Story* (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 1983).

44. Adil Mustafa Ahmad, "The Erotic and Pornographic in Arab Cultur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34 (July 1994): 278 – 84.

45. See, for example, Gloria Steinem, "Erotica and Pornographic: A Clear and Present Difference," Ms. (November 1978), pp.53 – 54, 75 – 78.

46. Susan Brownmiller, *Against Our Will*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6), pp.442 – 43.

47. Judith A. Reisman, *Images of Children, Crime and Violence in Playboy, Penthouse and Hustler*,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Office of Justice Assistance,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9).

48. "Patterns of Exposure to Erotic Materi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Obscenity and Pornography*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49. Attorney-General's Commission on Pornography, *Report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50. Edward L. Donerstein and Daniel G. Linz, "The Question of Pornography," *Psychology Today* (December 1986), p.59.

51. Eric Schlosser, "The Business of Pornography," *U.S. News & World Report* (February 10, 1997), pp.43 – 44.

52. Amy Harmon, "For Parents, a New and Vexing Problem," *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97), p.A21.

53. Gary Chapman, "Not So Naughty," *New Republic* (July 31, 1995), p.11.

54. Linda Greenhouse, "Court, 9 – 0, Protects Speech on Internet," *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97), p.A1.

55. Amy Harmon, "Earthbound Laws vs. Cyberspace Sprawl," *Sunday Record* (March 23, 1997), p.R01.

56. Edward L. Donnerstein and Daniel G. Linz, "Mass Media Sexual Violence and Mass Viewers," *American Behavior Scientist* 29 (1986): 601 – 18.

57. See Margaret Hornblower, "The Skin Trade," *Time* (June 21, 1993), pp.44 – 51; Helen Reynolds, *The Economics of Prostitution*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1986).

58. Karlen, *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 p.140.

59. Alex Thio, *Deviant Behavior*, 4th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8).

60. Eleanor M. Miller, *Street Woma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61. T. M. Williams and William Kornblum, *Growing Up Poor* (Boston: Health/Lexington Books, 1985).

62. Jennifer James and Jane Meyerding, "Early Sexual Experience as a Factor in Prostitution,"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7 (1977): 31 – 42; see also Ronald L. Simons and Les B. Whitbeck, "Sexual Abuse as a Precursor to Prostitution and Victimization Among Adolescent and Adult Homeless Wome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2 (September 1991): 361 – 79.

63. See D. Kelly Weisberg, *Children of the Night: A Study of Adolescent Prostitution*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D. C. Heath, 1985; Nanette Davis, "The Prostitute: Developing a Deviant Subculture," in James H. Henslin (ed.),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Sex*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7); Mary R. Jackman, R. O'Toole, and G. Geis, "The Self-Image of the Prostitut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 (1963): 150 – 61.

64. See David F. Luckenbill, "Deviant Career Mobility: The Case of Male Prostitutes," in Delos H. Kelly (ed.), *Deviant Behavior* 3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pp.485 – 503; D. Kelly Weisberg, *Children of the Night*; K. N. Ginzbug, "The 'Meat Rack': A Study of the Male Homosexual Prostitute," in C. D. Bryant (ed.), *Sexual Deviancy in Social Context*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7).

65. Nanette Davis, "The Prostitute."

66.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 was formulated by Edwin H. Sutherland, *Principles of Criminology*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39).

67. See Daniel S. Campagna and Donald L. Pofferberger, *The Sexual Trafficking in Childre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hild Sex Trade* (Dover, Mass.: Auburn House, 1988); Elaine Landau, *On the Streets: The Lives of Adolescent Prostitute* (New York: J. Messner, 1987); Charles H. McCaghy, Deviant Behavior, 2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85); D. Kelly Weisberg, *Children of the Night*.

68. N. Marshall and J. Hendclass, "Drugs and Prostitution," *Journal of Drug Issues* 2 (spring 1986): 237 – 48.

69. James A. Inciardi et al., "Prostitution, IV Drug Use, and Sex-for-Crack Exchange Among Serious Delinquents: Risks for HIV Infection," *Criminology* 29 (1991): 231 – 35; Carole A. Campbell, "Prostitution, AIDS, and Preventive Health Behavior,"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2 (1991): 1367 – 78.

70. Edward Laumann, Robert Michael, Stuart Michaels, and John Gagn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81.

71. Nanette Davis, "The Prostitute."

72. Marshall B. Clinard and Robert F. Meier, *Sociology of Deviant Behavior*, 7th ed. (Fort Worth: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89).

73. Linda M. Rio,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 Decriminalization or Legalization of Prostitution,"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20 (1991): 205 – 18.

74. Carole A. Campbell, "Prostitution, AIDS, and Preventive Health Behavior."

75. Margaret Hornblower, "The Skin Trade."

76. Much of the material in this section is derived from Margaret Hornblower, "The Skin Trade."

77. John West and Donald J. Templer, "Child Molestation, Rape, and Ethnicity," *Psychological Reports* 75 (December 1994): 1326.

78. See Elisa Romano and Rayleen V. Deluca,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Adult Sexual Perpetration,"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2 (March 1997): 85 – 98.

79.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Center o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National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Data System, *Child Maltreatment*, 1995.

80. "Disturbing New Figures About Child Abuse," *Maclean's* (July 21, 1997), p.15.

81. Jim Hopper, *Child Abuse: Statistics, Research, and Resources*, Web-posted at www.jimhopper.com/abstracts

82. Anna Salter, *Treating Child Sex Offenders and Victim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1988).

83. Katherine Beckett,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The Case of Child Sexual Abuse," *Social Problems* 43 (February 1996): 57 – 76.

84. Hilary Kaiser, "Clergy Sexual Abuse in U.S. Mainline Churches," *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34 (April 1996): 30 – 42.

85. Thomas Zolper, "Megan's Law Upheld," *The Record* (August 21, 1997), pp.A1, A15.

86. Kingsley Davis, "The Sociology of Prostit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 (1932): 744 – 55.

87. Laurie Shrage, *Moral Dilemmas of Feminism: Prostitution, Adultery, and Abor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88. Susan Brownmiller, *Against Our Will*, pp.442, 446.

89. Catharine A. MacKinnon, *Only Wor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90. James H. Bryan, "Apprenticeships in Prostitution," *Social Problems* 12 (1965), 287 – 96; Nanette Davis, "The Prostitute"; Barbara S. Heyl, *The Madam as Entrepreneu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House of Prostitutio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77).

91. Rose Weitz, "From Accommodation to Rebellion: Tertiary Deviance and the Radical Redefinition of Lesbianism,"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 San Francisco, September 1982.

92. Suggested by Robert R. Francoeur and Anna K. Francoeur, "The Pleasure Band: Reversing the Anti-Sex Ethic," *The Futurist* 10 (1976): 176.

93. Ibid.

第 5 章

1. Richard Quinney, *The Problem of Crime* (New York: Dodd, Mead, 1974), p.9.

2. Douglas A. Smith and Jody R. Klein, "Police Control of Interpersonal Disputes," *Social Problems* 31 (April 1984): 468 – 81; L. J. Siegel, *Criminology* (St. Paul: West Publishing, 1989); E. Harrison, "Chicago Police Used Torture, Report Alleges,"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3, 1992), p.A1.

3. William Ryan, *Blaming the Victi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 p.209.

4. S. T. Reid, *Crime and Criminality*, 4th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85).

5.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Criminal Victimization 1994,"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Bulletin* (April 1996), NCJ – 158022, pp.3 – 4.

6. FBI National Press Office, Press Release, October 13, 1996.

7. Data throughout this section comes from the FBI release cited in note 6.

8. Richard M. Brown, "The History of Extra-Legal Violence in Support of Community Values," in Thomas Rose (ed.), *Violence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Press, 1969), p.87.

9. Ibid., p.88.

10. Jason Vest, Warren Cohen, and Mike Tharp, "Road Rage,"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2, 1997), pp.24 – 30.

11. See Militia Watchdog, a Web site maintained by historian Mark Pitcavage at www.militia-watchdog.org.

12. Robert Davis, "Poll: More Fear Being Murdered," *USA Today* (November 27 – 29, 1993), p.1A.

13. Kenneth F. Ferraro, "Women's Fear of Victimization: Shadow of Sexual Assault?" *Social Forces* 75 (December 1996): 667 – 90.

14. *General Social Survey*, Web-posted at www.icpsr.umich.edu/gss/codebook/fear.htm.

15. R. Gary Edwards and Jon Hughes, "One-Third of Canadians Fear Night Time Walk in Their Neighborhoods," *Gallup Poll* 56 (March 4, 1996): 1 – 2.

16. "Safety in Numbers: Fear of Crime," *The Economist* 334 (January 7, 1955): 46 – 47.
17. Linda Heath and Kevin Gilbert, "Mass Media and Fear of Crim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9 (February 1996): 178 – 85.
18. Cheryl Russell, "True Crime," *American Demographics* 17 (August 1995): 22 – 31.
19. Michael R. Rand, James P. Lynch, and David Cantor, "Criminal Victimization, 1973 – 95,"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April 1997).
20. Data in this section comes from the sources cited in notes 18 and 19.
21. John M. Dawson and Patrick A. Langan, "Murder in Families,"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pecial Report* (July 1994), p.1.
22. Eloise Salholz, "Short Lives, Bloody Deaths," *Newsweek* (December 17, 1990), p.33.
23. Tracy L. Snell, *Capital Punishment 1995*,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December 1996).
24. Shannon Brownlee, Dan McGraw, and Jason Vest, "The Place for Vengeance,"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16, 1997), pp.25 – 32.
25. Tom Kuntz, "The Rage to Kill Those Who Kill,"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1994), p.E1; Tom Kuntz, "Killings, Legal and Otherwise, Around the U.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1994), p.E3.
26. Shannon Brownlee, et al., "The Place for Vengeance," p.27.
27. National Victim Center, *Rape in America* (April 1992), Web-posted at www.nvc.org/edir/rapesrvy.htm.
28. Ronet Bachman and Linda E. Saltzma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Estimates from the Redesigned Survey,"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Special Report* (August 1995), Table 4, p.3.
29. M. Koss, C. Gidycz, and N. Wisniewski, "The Scope of Rape: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of Sexual Aggression in a Sample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5 (1987): 162 – 70.
30. Susan Estrich, "Balancing Act," *Newsweek* (October25, 1993), p.64.
31. Mary M. Fonow, Laurel Richardson, and Virginia A. Wemmerus, "Feminist Rape Education: Does it Work?" *Gender & Society* 6 (1992):108 – 21.
32. Linda B. Bourque, *Defining Rap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Shirley A. Scritchfield and Julie A. Maskar, "Gender Traditionality and Perceptions of Date Rap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August 1989.
33. Fox Butterfield, "'95 Data Show Sharp Drop in Reported Rape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 1997), p.A1.
34. "Risk of Rape in U.S. Higher Than in Europe," *The Record* (December 13, 1995), p.A15.
35. Calvin Sims, "Justice in Peru: Victim Gets Rapist for a Husband,"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97), pp.A1, A12.
36.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Organized Crime, *The Impact: Organized Crime Today*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37. Edwin H. Sutherland, "White Collar Crimin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 (1940): 1 – 12.

38. Fred D. Miller, "Rising Employee Theft Wringing Out More Profits," *Nation's Restaurant News* (July 28, 1997), p.36; Denise Zimmerman, "Shrink Shrinks in '96, But Employee 'Lifting' Rises," *Supermarket News* (March 3, 1997), p.29.

39. Based on data from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217.

40. Grant Johnson, Tom Bird, and J. W. Little, *Delinquency Protection: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LEAA, 1979), p.19.

41. Ted H. Rubin, *Juvenile Justice* (Santa Monica, Calif.: Goodyear, 1979), pp.34 – 35.

42. See, for example, G. Roger Jarjoura and Ruth Triplett, "The Effects of Social Area Characteristic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Delinquency,"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25 (March-April 1997): 125 – 139; Nancy Jo Sales, "Teenage Gangland," *New York* (December 16, 1996), pp.32 – 39.

43. See, for example, Margaret Farnworth, Terence P. Thornberry, Marvin D. Krohn, and Alan J. Lizotte, "Measurement in the Study of Class and Delinquency: Integra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1 (February 1994): 32 – 61.

44. G. Roger Jarjoura, "The Conditional Effect of Social Class on the Dropout-Delinquency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3 (May 1996): 232 – 55.

45. Scott Cummings and Daniel J. Monti (eds.), *The Origins and Impact of Youth Ga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30.

46. Ibid., p.34.

47. Elijah Anderson, *Streetwise: Race, Class and Change in an Urb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Scott Cummings and Daniel J. Monti, *The Origins and Impact of Youth Gangs*, p.315.

48. Scott Cummings and Daniel J. Monti, *The Origins and Impact of Youth Gangs*, Table 10 – 4.

49. "What Is a Child?" *The Economist* 342 (April 19, 1997), pp.29 – 30.

50. Ted Gest, "Crime Time Bomb," *U.S. News & World Report* (Match 15, 1996), pp.28 – 32.

51. "What Is a Child?"

52. Gwyn Smit Ingley, "Juvenile Justice News," *Corrections Today* 57 (December 1995), 174 – 75.

53. U.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Sourcebook of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54. "Drop in Random Killing Signals a Shift in Nature and Scope of New York Crim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9, 1996), pp.L25, L28.

55. Christopher J. Mumola and Allen J. Beck, "Prisoners in 1996,"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Bulletin* (June 1997);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Prison and Jail Inmates, 1996,"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Bulletin* (August 1997).

56. Ibid.

57. Christopher J. Mumola and Allen J. Beck, "Prisoners in 1996."

58. Melinda Beck, "Kicking the Prison Habit," *Newsweek* (June 14, 1993), p.32.

59. "Jail Is Forecast for 20% of Those Born in 1997," *The Record* (march 7, 1997), p.A12.

60. U.s. Bureau of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Tables 354 and 356, p.220.

61. John Scalia, "Noncitizens in the Feder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1984 – 1994,"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Special Report* (August 1996).

62. Ted Gest, "Crime and Punishment."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3, 1995), pp.24 – 26.

63. See Susan Turner and Joan Petersilia, "Work Release in Washington: Effects on Recidivism and Corrections Costs," *Prison Journal* 76 (June 1996): 138 – 64.

64. Ted Gest, "Crime and Punishment," p.26.

65.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2* (April 1995), Table 5.12a.

66. Ovid Demaris, *Brothers in Blood: The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Network*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7), p.377.

67. Ibid., p.380.

6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 1997*, Web-posted at www.state.gov/www/global/terrorism/1997Report/intro.html.

69. Web-posted at www.militia-watchdog.org

7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6 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 Publication 10321; "Ready to kill, Ready to Die," *U.S. 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31, 1994), pp.44 – 45.

71. Ted R. C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212.

72.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57).

73. M. C. Wiatrowski, D. B. Grishold, and M. K. Probers, "Social Control Theory and Delinqu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 (1981): 525.

74. Leslie W. Kennedy, *On the Borders of Crime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Criminology* (New York: Longman, 1990); Richard Quinney, *Critique of Legal Order: Crime Control in Capitalist Societ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75. See Susan Caringella-Macdonald, "State Crises and the Crackdown on Crime Under Reagan," *Contemporary Crises* 14 (1990): 91 – 118; F. P. Williams III and M. D.McShane, *Criminological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8).

76. Edwin H. Sutherland, *Principles of Criminology*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39).

77. Howard S. Becker,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78. Edwin M. Lemert, *Human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and Social Control*, 2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2).

79. Raymond Paternoster and Lee Ann Iovanni, "The Labeling Perspective and Delinquency: An Elaboration of the Theory and Assessment of the Evidence," *Justice Quarterly* 6 (December 1989): 359 – 94.

第 6 章

1. Quoted in David Hatchett, "The Future of Civil Righ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Richard C. Monk (ed.), *Taking Sides* (Guilford, Conn.: Dushkin Publishing Group, 1994), p.181.
2. Rita J. Simon, "Old Minorities, New Immigrants: Aspirations, Hopes, and Fears," in Peter I. Rose (ed.),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 (1993), pp.65 – 73.
3. Harald Runblom, "Swedish Multiculturalism in a Comparative European Perspective," *Sociological Forum* 9 (1994): 634.
4. Stephanie J. Ventura et al., "Births and Deaths: United States, 1996,"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46 (September 11, 1997).
5. James Alan Fox, *Sourcebook of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 1995*,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1996, Table 3.132, p.359.
6. See Vincent N. Parrillo, *Strangers to These Shores*, 5th Ed. (Boston: Allyn & Bacon, 1997), pp.307 – 7, 363 – 66.
7. Douglas S. Massey and Nancy A. Denton, "Suburbanization and Segregation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1988): 592 – 626.
8. John Katsillis and J. Michael Armer, "Education and Mobility," in Edgar F. Borgatta and Marie L. Borgatta (eds.),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1992), pp.541 – 44.
9. James S. Coleman, et al.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6).
10. Children's Defense Fund, *The State of America's Children* (Washington, D.C.: Children's Defense Fund, 1991).
11. Harrison Rainie, "Black & White in America,"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2, 1991), pp. 18 – 21.
12. See Sol Stern, "The Catholic School Miracl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5, 1996), p.A15; Kenneth L. Woodward, "Catechism Lessons," *Newsweek* (September 23, 1996), p.62.
13. Betsy Wagner and Stephen J. Hedges, "Education in Decay," *U.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ember 12, 1994), pp.76 – 80.
14. Charles V. Willies, "The Future of School Desegregation," in J. E. Jacob (ed.), *The State of Black America*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7), pp.37 – 47.
15. W. D. Hawley and M. A. Smylie, "The Contribution of School Desegregation to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Racial Integration," in P. A. Katz and D. A. Taylor (eds.), *Eliminating Racism*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8), pp.281 – 97.
16. See, for example, David J. Armor, "After Busing: Education and Choice," *The Public Interest* 95 (Spring 1989): 24 – 37; Douglas Longshore and Jeffrey Prager, "The Impact of School Desegregation: A Situational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1 (1985): 75 – 91.
17. J. E. Lyons and K. O. Walton, "Magnetic Attractions: Desegregating a Minority School District," *Educational Record* 48 (1988): 32 – 34.
18. John McCormick, "Separate But Equal Again?" *Newsweek*, (September 17, 1989), pp.31 – 32.

19. Ibid.

20.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Table 657, p.420.

21. Thomas Sowell, "Debate: Equal Opportunity of the Numbers Game?" *American Educator* (Fall 1978): 9 – 15.

22. John Leo, "Endgam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U.S. News & World Report* (March 13, 1995), p.18.

23. See Gertrude Ezorsky, *Racism and Justice: The Ca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24. Michael Wines, "How Affirmative Action Got So Hard to Sell," *New York Times* (July 23, 1995), p.E3.

25. Paul Glastris, "The Thin White Line," *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ust 15, 1994), pp.53 – 54.

26. Peter Applebome, "Minority Law School Enrollment Plunges in California and Texas," *New York Times* (June 28, 1997), p.A1.

27. Scott Greer, *Urban Renewal and American Citie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5).

28. Children's Defense Fund, *The Nation's Investment in Children: An Analysis of the President's FY 1992 Budget Proposals* (Washington, D.C.: Children's Defense Fund, 1991).

29. Hinds M. deCourcy, "Landlords Manipulate Market," *New York Times* (July 12, 1987), p.E5.

30. W. C. Apgar and H. J. Brown, *State of the Nation's Housing: 1998* (Cambridge, MA: 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88).

31. Claudette E. Bennett and Kymberly A. DeBarros, "The Black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1994 and 1993,"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20 – 480, 1994.

32. Dirk Johnson, "The View from the Poorest U.S. Suburb,"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1987), p.A1.

33. David J. Dent, "The New Black Suburb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14, 1992), p.20.

34. Pamela Irving Jackson, *Minority Group Threat, Crime, and Policing: Social Context and Social Control* (New York: Frederick Praeger, 1989); Christopher E. Smith, *Courts and the Poor* (Chicago: Nelson-Hall, 1991).

35. Ibid.

36. George S. Bridge and Robert D. Crutchfield, "Law, Social Standing and Racial Disparities in Imprisonment," *Social Forces* 66 (March 1988): 699 – 724.

37.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Table 354, p.22.

38. J. Weibel-Orlando, "Elders and Elderly Well-Being in Indian Old Age,"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Journal*, 13 (1989): 149 – 70.

39. Gerald E. Gipp, "Promoting Cultural Relevance in American Indian Education," *Education Digest* (November 1989): 58.

40. R. Lin, "The Promises and Problems of the Native American Stud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on the Reservation and Surrounding Areas," *Journal of American Indian Education* 24 (1985): 6 - 15.

41. S. Cornell and J. P. Kalt, "Pathways from Pover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on American Indian Reservations,"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Journal* 14 (1990): 89 - 125.

42. C. Matthew Snipp, *American Indians: The First of This Land*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9).

43. Thomas M. Becker et al., "Mortality from Infectious Disease Among New Mexico's American Indians, Hispanic Whites, and Other Whites, 1958 - 1987,"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0 (1990): 320 - 23.

44. Claudette E. Bennett and Kymberly A. DeBarros, "The Black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1994 and 1993."

45.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7*, Table 81, p.66.

46. Ibid., Table 282, p.180.

47.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48. U.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Vit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49.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25 - 1092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5).

50.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49, 53, pp.49, 52.

51.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60 - 180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52. Ibid.

53. See Sucheng Chan, *Asian American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Boston: Twayne, 1991).

54. L. Martz, "Slamming the Golden Door," *Newsweek* (May 9, 1988]), pp.18 - 19; M. S. Meier, "North From Mexico," pp. 309 - 31, in Carey McWilliams, *North from Mexico*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0).

55. See, for example, Arthur M. Sch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Knoxville, Tenn.: Whittle Communications, 1991); Leon F. Bouvier, *Peaceful Invasions: Immigration and Changing America* (Land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2).

56. Connie Leslie, "Classrooms of Babel: A Record Number of Immigrant Children Pose New Problems for School," *Newsweek* (February 11, 1991), pp.56 - 57.

57. See Vincent N. Parrillo, *Strangers to These Shores*, pp.535 - 38.

58.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Immigration Debate Centers on Economic Impact," *Population Today*

22 (October 1994): 2

59. Ibid.

60. Ibid.

61. Michael J. Mandel and Christopher Farrell, "The Immigrants," *Business Week* (July 13, 1992), pp.114 – 22.

62. Edna Bonacich, "A Theory of Ethnic Antagonism: The Split Labor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1972): 547 – 59.

63. W. Lloyd Warner and Leo Srole, *The Social System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Yankee City Series, Vol.3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 pp.285 – 86.

64. See, for Example, Rodolfo de la Garza, *Latino Voices: Mexican, Puerto Rican, and Cuban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Politic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2).

第 7 章

1. Matthew 26:4.

2.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 *1964 Economic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4), pp.69 – 70.

3. Paul Hawken, "Social Waste," *Mother Jones* (March-April 1997): 47 – 48.

4. *National Accounts of OECD Countries*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7).

5. Joe R. Feagin, *Subordinating the Poor: Welfare and American Belief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5).

6. Richard Herrnstein, *I.Q. in the Meritocracy* (New York: Allan Lane, 1973).

7. Richard J. Herrnstein and Charles Murray, *The Bell Curve: The Reshaping of American Life by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8. See, for example, Vincent N. Parrillo, *Strangers to These Shores*, 5th ed. (Boston: Allyn & Bacon, 1997), pp.367 – 68.

9. Robert Holman, *Poverty: Explanations of Social Depriv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8); Thomas Sowell, "New Light on Black I.Q.,"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27, 1977), p.57.

10. Oscar Lewis,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cientific American* 215 (October 1966): 19 – 25.

11. Edward Banfield, *The Unheavenly City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12. William Ryan, *Blaming the Victim*,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1976).

13. Charles A. Valentine, *Culture and Poverty: Critique and Counterproposa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14. U.S. Bureau of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60 – 189 and unpublished data.

15. Martin Anderson, *Welfare*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e, 1978).

16. David Caplovitz, *The Poor Pay Mo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17. David Whitman, "The Poor Aren't Poorer,"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5, 1994), pp.33 – 38.

18. Susan Mayer and Christopher Jencks, "Trends i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Children," reported in

David Whitman, "The Poor Aren't poorer."

19. Ibid.

20. Lee Rainwater, "The Problem of Lower-Class Culture and Poverty-War Strategy," in Daniel P. Moynihan (ed.), *On Understanding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21. Michael Harrington, *The Other America*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9).

22.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Poverty 1995*, Web-posted September 1997 at www.census.gov/ftp/pub/hhes/poverty/pov95/povest1.html.

23.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Table 81, p.66.

24. Ibid., Table 75, p.63.

25.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nd Bureau of the Census, *Annual Demographic Survey*, November 1996, Web-posted at ferret.bls.census.gov/macro/031996/hhinc/6-000.htm.

26. Ibid., Table C-1.

27. Ibid.; ferret.bls.census.gov/macro/031996/pov/16-001.htm # pg7.

28.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97, p.79.

29. Annie E. Casey Found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olicy, *1993 KIDS COUNT Data Book*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olicy, 1993), p.13.

30. Ibid.; ferret.bls.census.gov/macro/031996/pov/1-001.htm. # pg8.

31. Bureau of the Census, *Poverty 1995*.

32. Ibid.

33. "Prematurity Associated with Inadequate Diet," *FDA Consumer* 27 (July-August 1993): 5.

34. Janet L. Peacock, J. Martin Bland, and H. Ross Anderson, "Preterm Delivery: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Psychological Stress, Smoking, Alcohol, and Caffein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1 (August 26, 1995): 531-35.

35. U.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Vit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122, p.92.

36. G. K. Singh, K. D. Kochanek, and M. F. MacDorman,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Advance Report of Final Mortality Statistics, 1994,"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45 (1996): 19.

37. Christopher Jencks and Susan E. Mayer, "Do Official Poverty Rates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About Trends in Children's Economic Welfare?" (Unpublished 1996 paper), cited in Susan E. Mayer, "Has America's Antipoverty Effort Failed?"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Web-posted at www.library.nwu.edu/publications/nupr/mayer.html.

38. Robert Pear, "Poverty 1993: Bigger, Deeper, Getting Wors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1993), p.E1.

39. Susan E. Mayer, "Has America's Antipoverty effort Failed?"

40. Ibid.

41. Christopher Jencks, *The Homel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42. David Whitman, "What Keeps the Poor Poor?" *U. S. 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21, 1991), pp.42 - 44.

43. See William J.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44.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7*, Table 745, p.479.

45. David Whitman, "Welfare: The Myth of Reform,"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anuary 16, 1995), p.32.

46. William P. O'Hare, "A New Look at Poverty in America," *Population Bulletin* 51 (September 1996): 10.

47. U. S. Bureau of Census,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ptember 1996), Series P - 60, No.194.

48. William P. O'Hare, "A New Look at Poverty in America," p.12.

49.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506, p.321.

50. U.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iscal Year 1997*, Historical Tables: Table 11.3.

51. Ibid.

52.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605, p.386.

53. Ibid.

54. Ibid., Table 66, p.59.

55. Ibid., Table 97, p.79.

56. Ibid., Table 602, p.385.

57. Mary Jo Bane and David T. Ellwood, *Welfare Realities: From Rhetoric to Refor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Table 2.3.

58. Mary J. Corcoran, Greg J. Duncan, Gerald Gurin, and Patricia Gurin, "Myth and Reality: The Causes and Persistence of Poverty,"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4 (1985): 516 - 36; see the PSID Web site at www.isr.umich.edu/src/psid.

59. Harry Hampton, "America's War on Poverty," PBS Television Series, January 16 - 18, 1995; see also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1990 - 1996.

60. Mary R. Corcoran et al., "Myth and Reality: The Causes and Persistence of Poverty," p.524.

61. Joan R. Rodgers and John L. Rodgers, "Chronic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8 (Winter 1993): 25 - 54; Joel A. Devine, Mark Plunkett, and James D. Wright, "The Chronicity of Poverty: Evidence from the PSID, 1968 - 1987," *Social Forces* 70 (March 1992): 787 - 812.

62. Steven A. Holmes, "Income Disparity Between Poorest and Richest Rises," *New York Times* (June 20, 1996), p.A1.

63. Steven A. Holmes, "U.S. Census Finds First Income Rise in Past Six Year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2, 1996), p.A1.

64. See Sheldon Danziger and Peter Gottschalk, "Do Rising Tides Lift All Boats? The Impact of Secular

and Cyclical Changes on pov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86): 405 - 10.

65. See "America's Underclass: Doomed to Fail in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Economist* (march 15, 1986), pp.29 - 32.

66. Diana B. Henriques, "10 Years After Tax Overhaul, the Loopholes Expan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9, 1996), p.E3.

67. Michael Harrington, "Introduction," in Louis A. Fernan, Joyce L. Kornbluh, and Alan Haber (eds.), *Poverty in America: A Book of Reading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5), pp.vii - xiv.

68. Charles Murray,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 - 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69. David Whitman, "Welfare: The Myth of Reform," pp.30 - 31.

70. Peter Jennings, *ABC News*, January 13, 1995.

71. Kingsley Davis and Wilbet E. Moore,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 (April 1945): 242 - 49; Charles Hurst, *The Anatomy of Social Inequality* (St. Louis: Mosby, 1979).

72. Herbert J. Gans, "The Uses of Poverty: The poor Pay All," *Social Policy* 2 (July/August 1971): 20 - 24; see also Herbert J. Gans, "The Positive Functions of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September 1972): 275 - 88.

73. Ralf Dahrendor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see also Ralf Dahrendorf,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1 (1958): 170 - 85.

74. Michael Harrington, "Why We Need Socialism in America," *Dissent* 76 (May/June 1970): 240 - 303.

75. Michael Harrington, *Decade of Decis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0).

76. Michael Betz, "Riots and Welfare: Are They Related?" *Social Problems* 21 (1974): 345 - 55.

77.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 Cloward, *Regulating the Poor* (New York: Vintage, 1971).

78.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 Cloward, *The Politics of Turmoil* (New York: Pantheon 1974); see also Franci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 Cloward, "Social Movements and Social Conditions: A Response to Roach and Roach," *Social Problems* 26 (1978): 172 - 78.

79. Randall J. Pozdena and Terry R. Johnson, *Income Maintenance and Asset Demand* (Menlo Park, Calif.: SRI International, March 1979); Terry R. Johnson, Randall J. Posdena, and Gary Steiger, *The Impact of Alternative Negative Income Tax Programs on Nondurable Consumption* (Menlo Park, Calif.: SRI International, October 1979).

80. Howard S. Becker,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81. Jonathan Kozol, *Savage Inequalities: Children in America's Schools* (New York: Crown, 1991); Ronald R. Edmonds, "Some Schools Work and More Can," *Social Policy* (March-April 1979): 28 - 32; Jonathan Kozol, *Death at an Early Ag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Robert Rosenthal and Lenore Jacobson, *Pygmalion in the Classroo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8).

82. L. Richard Della Fave, "The Meek Shall Inherit the Ear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December 1980): 955 – 71.

第 8 章

1. Stephen Jay Gould, *The Mismeasure of Man* (New York: W. W. Norton, 1981), pp.104 – 5.
2. Anne Moir, *Brain Sex: The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new York: Carol Publishing Group, 1991).
3. Thomas G. Wynn, Forrest D. Tierson, and Craig T. Palmer, "Evolution of Sex Differences in Spatial Cognition," *Yearbook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39 (1996): 11 – 42.
4. Deborah Blum, *Sex on the Brain: The Bi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new York: Viking, 1997).
5. Tabitha m. Powledge, "Ever Different: Brain Sex Differences, Research Update," *BioScience* 46 (June 1996): 394 – 95.
6. Ibid.
7. Nicholas Wade, "How Men and Women Think: Brain Sex and Intellectual Abilit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12, 1994), p.32.
8. Margaret Mead, *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New York: Dell, 1935); Herbert Barry, "a Cross-Cultural Survey of Some Sex Differences in Socializa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 (1957): 327 – 52; Roy C. D'Andrade, "Sex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in Eleanor E. Maccoby (ed.), *The Development of Sex Differences* (Palo Alto,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Ernestine Friedl, *Women and Men: An Anthropologist's View*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5).
9. Lynne Brydon and Sylvia Chant, *Women in the Third World: Gender Issue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0. Carol Tavris, *The Mismeasure of Wo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11. K. MacDonald and R. D. Parke, "Parent-Child Physical Play: The Effects of Sex and Age on Children and Parents," *Sex Roles* 15 (1986): 367 – 78.
12. P. Bronstein, "Father-Child Interaction," in P. Bronstein and C. P. Cowan (eds.), *Fatherhood Today: Men's Changing Role in the Famil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8), pp.107 – 24; L. J. Weitzman, N. B. Birns, and R. Friend,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Mothers'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Daughters and Sons," *Child Development* 56 (1985): 894 – 96.
13. C. L. Miller,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Among Gender-Stereotyped Toys: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v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Girls and Boys," *Sex Roles* 16 (1987): 473 – 88; J. A. Williams, Jr., J. A. Vernon, M. C. Williams, and K. Malecha, "Sex Role Socialization in Picture Books: An Updat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68 (1987): 148 – 56.
14. Erving Goffman, *Gender Advertisements*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1979).
15. Alice E. Courtney and Thomas W. Whipple, *Sex Stereotyping in Advertising*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83).
16. Susan Douglas, *Where the Girls A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p.279 – 99.

17. Ibid., p.296.

18. Ibid., P.303.

19. Sandra L. Bem and Daryl J. Bem, "Training the Woman to Know Her Place: The Power of a Nonconscious Ideology," in H. Robboy and C. Clark (eds.), *Social Interaction*, 2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1), p.87.

20. Ann Douglas, *The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Avon, 1977).

21. "Women's Contributions Exceed Their Rewards," *Popline* 17 (July-August 1995), p.1.

22. Nancy E. Riley, "Gender, Power, and Population Change," *Population Bulletin* 52 (May 1997), p.30.

23. United Nations, *Women's Indicators and Statistics Database* (1994).

24. Nancy E. Riley, "Gender, Power, and Population Change," p.11.

25. Zeng Yi, Tu Ping, Gu Baochang, Xu Yi, Li Bohua, and Li Yongping,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Increase in the Reported Sex Ratio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 (1993): 283 – 302.

26. Nancy E. Riley, "Gender, Power, and Population Change," p.16.

27. "Men's Traditional Culture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The Economist* 340 (August 10, 1996), p.34.

28. Lynn M. Tynan, "The Status of FGM in the World Today," *off our backs* 27 (June 1997): 8 – 11.

29. Robin M. Maher,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The Struggle to Eradicate This Rite of Passage," *Human Rights* 23 (Fall 1996): 12 – 15.

30. Gerry Mackie, "Ending Footbinding and Infibulation: A Convention Accou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December 1996): 999 – 1117.

31. "Men's Traditional Culture."

32. Celia W. Dugger, "Tug of Taboos: African Genital Rite vs. American Law."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8, 1996), p.B1.

33. Alan Cooperman, "No End in Sight to a Gruesome and Widespread Ritual,"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7, 1997), p.51.

34. Wanda Teays, "The Burning Bride: The Dowry Problem in India," *Journal of Feminist Studies in Religion* 7 (Fall 1991): 29 – 52; see also Linda Stone and Caroline James Dowry, "Bride-Burning, and Female Power in India,"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8 (March-April 1995): 125 – 34.

35. *World Development Forum* 5 (January 31, 1987), p.3.

36. International Society Against Dowry and Bride-Burning in India, Inc., Web-posted at www1.shore.net/~hthakur.

37. Ibid.

38. Lin Farley, quoted in Dale Spender, *Man Made Language* 2d ed.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pp.184 – 85.

39. P. D. Horn and J. C. Horn, *Sex in the Office: Power and Passion in the Workplac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82), pp.62 – 63.

40. Susan p.Philips and Margaret S. Schneider, "Sexual Harassment of Female Doctors by Patient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29 (December 23, 1993): 1936 – 39.

41. Patti A. Giuffre and Christine L. Williams, "Boundary Lines: Labeling Sexist Harassment in Restaurants," *Gender & Society* 8 (1994): 378 – 401.

42. Ibid., p.70.

43. Michele Ingrassia, "Abused and Confused," *Newsweek* (October 25, 1993), p.57.

44. Andrea Sachs, "9 – Zip! I Love It!" *Time* (November 22, 1993), p.44.

45. Andrew Hacker, *U/S: A Statistical Portrai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Viking Press/ Penguin Books, 1983), pp.240 – 41.

46. Katia Hetter, "End of an All-Male Era,"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8, 1996), p.50.

47. Lyn Nell Hancock and Claudia Kalb, "A Room of Their Own," *Newsweek* (June 24, 1996), p.76.

48. Amy Saltzman, "A Look at the Research: Lots on Girls, Little on Boy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8, 1996), pp. 52 – 53; Susan R. Estrich, "For Girls' Schools and Women's Colleges, Separate Is Better,"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22, 1994), p.38.

49. Kristin S. Caplice, "The Case for Public Single-Sex Education,"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18 (Fall 1994): 227 – 92.

50. Lyn Nell Hancock and Claudia Kalb, "A Room of Their Own."

51. Valerie E. Lee, Helen M. Marks, and Tina Byrd, "Sexism in Single-Sex and Coeducational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7 (April 1994): 92 – 120.

52. Quoted in Lyn Nell Hancock and Claudia Kalb, "A Room of Their Own."

53.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Table 235 and 303.

54. Ibid., Table 305, p.192.

55. Ibid., Table 623, p.399.

56. Ibid., Table 629, p.403.

57. Ibid., Table 632, p.404.

58. Ibid., Table 645, pp.410 – 11.

59. Ibid.

60. Leslie A. Zebrowitz, Daniel R. Tenenbaum, and Lori H. Goldstein, "The Impact of Job Applicants' Facial Maturity, Gender,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n Hiring Recommend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1 (1991): 525 – 48.

61. Myra Marx Ferree,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Two-Earner Marriages: Dimensions of Variability and Chang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2 (June 1991): 158 – 80.

62. Felice N. Schwartz, "Management, Women, and the New Facts of Lif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9 (1989): 65 – 76.

63. David J. Maume, Jr., "Child-Care Expenditures and Women's Employment Turnover," *Social Forces* 70 (December 1991): 497 – 508.

64. Arlie Hochschild,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Viking, 1989); Harriet B. Presser, "The Household Gender Gap," *Population Today* 21 (July-August 1995), p.3.

65. Arlie Hochschild, *The Second Shift*, p.238.

66. Patricia A. Ward, Peter F. Arazem, and Stefen W. Schmidt, "Women in Elite Pools and Elite Position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3 (March 1992): 31 – 45; Joan Acker, "Thinking About Wages: The Gendered Wage Gap in Swedish Banks," *Gender & Society* 5 (1991): 390 – 417; Nicole Benokraitis and Joe Feagin, *Modern Sexism: Blatant, Subtle, and Overt Discrimin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6).

67. Peter T. Kilborn, "For Many in Work Force, 'Glass Ceiling' Still Exists,"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1995), p.A22.

68. Elizabeth Larson, "Women Are on Track for Top Spots in Corporate America," Knight-Ridder New Service release, December 29, 1995.

69.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671, p.431.

70. Ibid., Table 462, p.288.

71.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Women in Parliaments: Third Annual Report*, Geneva, Switzerland, 1994.

72. Fred Coleman, "Political Power Is Only Half the Battle,"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13, 1994), p.58.

73.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456, p.285.

74. Gary Alan Fine, "The Dirty Play on Little Boys," *Society* (1986): 63 – 67.

75. Herbert J, Freudenberger, "Today's Troubled Men," *Psychology Today* (December 1987): 46 – 47.

76. Jerold Lee Shapire, "The Expectant Father," *Psychology Today* (January 1987): 36 – 42.

77. Talcott Parsons, "The American Family: Its Relations to Personalit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alcott Parsons and Robert F. Bales (eds.),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4), pp.3 – 21.

78. Joan Acker, "Wome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Case of Intellectual Sexism," in Joan Huber (ed.), *Changing Women in a Changing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p.174 – 83.

79. Randall Collins, *Sociology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Gender, Love, and Property* (Chicago: Nelson Hall, 1985); Janet Saltzman Chafetz, *Sex and Advantage: A Comparative Macro-Structural Theory of sex Stratification* (Totowa, N.J.: Rowmann & Allanheld, 1984).

80. Arlie Hochschild, "A Review of Sex Role Research," in Joan Huber (ed.), *Changing Women in a Changing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258.

81. E. Goldfield, S. Munaker, and Naomi Weisstein, "A Woman Is a Sometime Thing," in E. Lindenfeld (ed.), *Radical Perspectives of Social Problems*, 2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73).

82. Arlie Hochschild, "A Review of Sex Role Research."

83. David A. Karp and William C. Yoels, *Symbols, Selves and Society* (New York: J. B. Lippincott/Harper & Row, 1979), p.56.
84. J. Harrison, "Warning: The Male Sex Role May Be Dangerous to Your Health,"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54 (1978): 65 – 86.
85. Susan Hekman, "Truth and Metho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visited," *Signs* 22 (Winter 1997): 341 – 64.
86. Gail Lewis and Merl Storr, "Contesting Feminist Orthodoxies," *Feminist Review* (Autumn 1996): 1 – 2.
87. Bell hooks, *Ain't I a Woman?: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p.13.
88. 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 p.52.
89. Ibid.; bell hooks, *Talking Back: Thinking Feminist, Thinking Black*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90. Mary E. Swigonski, "The Logic of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for Social Work Research," *Social Work* 39 (July 1994): 387 – 93.
91. Murray Forman, "Movin' Closer to an Independent Funk: Black Feminist Theory, Standpoint, and Women in Rap," *Women's Studies* 23 (January 1994):35 – 55.
92. Mary E. Swigonski, "The Logic of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for Social Work Research," p.390.
93. Nancy Hartsock, *Money, Sex, and Power: Toward a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5).
94. Ibid., p.232.
95.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96. P. B. Walters, "Trend in U.S. Men's and Women's Sex-Role Attitudes: 1972 – 1978,"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 (1981): 453 – 60.

第 9 章

1. Stephanie Coontz, *The Way We Never Were: American Families and the Nostalgia Trap*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2. Tamar Lewin, "Men Whose Wives Work Earn Less, Studies Show,"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1994), p.A1.
3. Arlie Hochschild, *The Second Shift* (New York: Viking, 1989).
4.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Table 61, p.57.
5. Ibid., Table 145, p.105.
6. Arthur J. Norton and Jeanne E. Moorman, "Current Trends in Marriage and Divorce Among American Wom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9 (February 1987): 3 – 14.
7. David Whitman, "The Divorce Dilemma," *U.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ember 30, 1996), p.58; see also Charles I. Jones, Lorne Tepperman, and Susannah Wilson. *The Futures of the Famil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95), p.84.

8. Teresa M. Cooney and Peter Uhlenberg, "Family Building Patterns of Professional Women: A Comparison of Lawyers, Physicians, and Postsecondary Teacher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 (August 1989): 749 – 58.

9. J. Ross Eshleman, *The Family: An Introduction* (Boston: Allyn & Bacon, 1981), p.560.

10. Ann Swidler, "Love and Adulthood in American Culture," pp.286 – 306, in Arlene Skolnick and Jerome Skolnick (eds.), *Family in Transition*, 4th ed. (Boston: Little, Brown, 1983).

11. Saul Hoffman and Greg J. Duncan, "What Are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Divorce?" *Demography* 25 (November 1988): 641 – 45.

12. Leslie Morgan, "Economic Well Being Following Marital Terminatio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0 (March 1989): 86 – 101.

13. Greg Duncan and Saul D. Hoffman,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arital Dissolution," *Demography* 22 (November 1985), 485 – 97.

14. Jane Brody, "Divorce's Stress Exacts Long-Term Health Toll,"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1983), p.III – 1.

15. Ibid.; Gay C. Kitson and Leslie Morgan, "The Multiple Consequences of Divorce: A Decade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 (November 1990): 913 – 24.

16. Paul Bohannan, *Divorce and Afte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Anchor Books, 1971).

17. Robert Weiss, *Marital Sepa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p.48 – 56.

18. Jane Brody, "Divorce's Stress Exacts Long-Term Health Toll."

19. Frank F. Furstenberg, Jr., et al., "The Life Course of Children of Divor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October 1982): 656 – 68.

20. Frank F. Furstenberg, Jr., "Divorce and the American Famil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 (1990): 383.

21. Public Health Service, "Annual Summary of Births, Marriage, Divorces and Deaths: United States, 1991,"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April 1992): 2.

22. Paul R. Amato and Bruce Keith, "Parental Divorce and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1): 24 – 46.

23. Frank F. Furstenberg, Jr., "Divorce and the American Family," p.393.

24. J. Mauldon, "The Effect of Marital Disruption on Children's Health," *Demography* 27 (August 1990): 431 – 46.

25. Frank F. Furstenberg, Jr., "Good Dads-Bad Dads: Two Faces of Fatherhood," in Andrew Cherlin (ed.), *The Changing American Family*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1988), pp.193 – 218.

26. Robert Pear, "Government to Use Vast Database to Track Deadbeat Parent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2, 1997), p.A1.

27. Judith A. Seltzer, Nora Cate Schaeffer, and Hong-Wen Chang, "Family Ties After Divorce: Marital Disruption and Parental Contac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 (November 1989): 1013

-22.

28. Frank F. Furstenberg, Jr., Christine Winquist Nord, James L. Peterson, and Nicholas Zill, "The Life Course of Children of Divorce: Marital Disruption and Parental Contac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983: 656-68.

29. Frank F. Furstenberg, Jr., "Divorce and the American Family," p.388.

30. Frank F. Furstenberg, Jr., and Nancy Ten Kate, "The Future of Marriage," *American Demographics* 18 (June 1996): 34-40.

31.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151, p.107.

32. Helen R. Weingarten, "Marital Status and Well Being: A National Study Comparing First-Married, Currently Divorced, and Remarried Adul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7 (1985): 653-62.

33. Lynn K. White and Alan Booth,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Remarriage: The Role of Step Childr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 (1985): 689-98.

34. Andrew J. Cherlin, *Marriage, Divorce, Remarri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5. M. Daly and M. Wilson, "Child Abuse and Other Risks of Not Living with Both Parents," *Ethology and Sociology* 6 (1985): 197-210.

36.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Marital Statu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March 1993,"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20, no.478 (1994), Table 1, p.1.

37.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60, no.194 (1996).

38. Sara McLanahan and Karen Booth, "Mother-Only Families: Problems, Prospects,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 (1989): 557-80; Robert L. Flewelling and Karl E. Bauman, "Family Structure as a Predictor of Initial Substance Use and Sexual Intercourse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 (1990): 171-81.

39. Carol Stack,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40. 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41.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96 and 97, pp.78-79.

42. Vincent N. Parrillo, *Strangers to these Shores*, 5th ed. (Boston: Allyn & Bacon, 1997): p.417.

43. K. G. Mapanga, "The Perils of Adolescent Pregnancy," *World Health* 50 (March-April 1997): 16-17; D. Hollander, "Studies Suggest Inherent Risk of Poor Pregnancy Outcomes for Teenagers,"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27 (November-December 1995): 262-63.

44. Sandra Arbetter, "Family Violence: When We Hurt the Ones We Love," *Current Health* 22 (November 1995): 6-12.

45. C. H. Kempe, "The Battered Child Syndrom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81

(1962): 17 - 24.

46. Erin Emery, "Domestic Assaults Occur Every 15 Seconds, But There Is Still a Reluctance to Report Such Violenc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olorado Spring Gazette Telegraph*, Knight-Rider/Tribune News Service (October 20, 1993), p.1020.

47. Susan B. Sorenson, Dawn M. Upchurch, and Haikang Shen, "Violence and Injury in Marital Arguments: Risk Pattern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6 (January 1996):35 - 40.

48. Amy Holtzworth-Munroe, "Marital Violence," *Harvard Mental Health Letter* 12 (August 1995): 4 - 6.

49. Ibid.

50. Susan Sorenson et al., "Violence and Injury in Marital Arguments."

51. Judith Ivy Fiene, "Battered Women: Keeping the Secret," *Affilia Journal of Women and Social Work* 10 (Summer 1995), 179 - 93.

52. Betsy McAlister Groves, Barry Zuckerman, Steven Marans, and Donald J. Cohen, "Silent Victims: Children Who Witness Viole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69 (January 13, 1993): 262 - 64.

53. Susan Sorenson et al., "Violence and Injury in Marital Arguments."

54. Carla Rivera, "U.S. Child Abuse at Crisis Levels, Panel Says,"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6, 1995), p.B1.

55. Murray A. Straus and Carrie L. Yodanis, "Corporal Punishment in Adolescence and Physical Assault on Spouses in Later Life: What Accounts for the Lin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 (November 1996): 825 - 41.

56. Jean Renvoize, *Web of Violence: A Study of Family Viol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pp.113 - 27.

57. K. A. Pillemer and D. Findelhor, "The Prevalence of Elder Abuse: A Random Sample Survey," *The Gerontologist* 28 (1988): 51 - 57.

58. Sandra Baron and Adele Welty, "Elder Abuse,"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25 (Spring-Summer 1996): 33 - 57.

59. Sandra Arbetter, "Family Violence."

60. Frank Glendenning, "What Is Elder Abuse and Neglect," in Peter Decalmer and Frank Glendenning (eds.), *The Mistreatment of Elderly Peopl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3), pp.1 - 34.

61. Richard J. Gelles, "Violence in the Family: A Review of Research in the Sevent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2 (November 1980): 873 - 85.

62. Richard J. Gelles and Donileen Loseke (eds.), *Current Controversies on Family Violence*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3).

63. Murray A. Strau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Causes of Family Violence," in Maurice Green (ed.), *Violence and the Famil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0), p.8.

64. Murray A. Straus and Christine Smith, "Family Patterns and Primary Prevention of Family

Violence," in Murray A. Straus and Richard J. Gelles (eds.), *Physical Violence in American Famili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0*), *pp.512 – 21*.

65. Cathy Young, "Complexities Cloud Marital Rape Case," *Insight on the News* 10 (August 1, 1994): 6 – 10.
66. David Finkelhor and Kersti Yllo, *License to Rape: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iv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83).
67. Candice M. Monson, Gary R. Byrd, and Jennifer Langhinrichsen-Rohling, "To Have and To Hold: Perceptions of Marital Rap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1 (September 1996): 410 – 24.
68. Lisa R. Eskow, "The Ultimate Weapon?: Demythologizing Spousal Rape and Reconceptualizing Its Prosecution," *Stanford Law Review* 48 (February 1996): 677 – 709.
69. Diana E. H. Tussell, *The Secret Trauma: Incest in the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p.20.
70. David Finkelhor, *Sexually Victimized Childre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pp.71 – 72.
71. Noreen M. Glover, Timothy P. Janikowski, and John J. Benshoff, "Substance Abuse and Past Incest Contact: A Na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13 (May-June 1996): 185 – 93; and "The Incidence of Incest Histories Among Clients Receiving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3 (March-April 1995): 475 – 80.
72. Judith Lewis Herman with Lisa Hirschman, *Father-Daughter Inc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3.
73. Ibid., pp.47 – 49.
74. Naomi A. Adler and Joseph Schutz, "Sibling Incest Offender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19 (July 1995): 811 – 19; James R. Worling, "Adolescent Sibling-Incest Offenders: Differences in Family and Individual Functioning When Compared to Adolescent Nonsibling Sex Offender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19 (May 1995): 633 – 43; see also David Finkelhor, *Sexually Victimized Children*, p. 130.
75. Murray A. Straus, Richard J. Gelles and Suzanne K. Steinmetz, *Behind Closed Doors: Violence in the American Famil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80), pp.237 – 239.
76. David Levenson, *Family Violence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9).
77. Ibid., pp.81 – 82.
78. David Popenoe, "Beyond the Nuclear Family: A Statistical Portrait of the Changing Family in Swed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29 (February 1987): 173 – 83.
79. Ibid.
80. Ibid.
81. Ibid.
82. Carle C. Zimmerman, *Family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per, 1947).
83. William F. Ogburn, "The Changing Family," in *The Family* (1938): pp. 139 – 43, reported in Robert F. Lynch and Louis Wolf Goodman, *Selected Studies in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Winston, 1968): pp.58 - 63.

84. Robert Nisbet, *The Quest for Communi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apter 3.

85. Friedrich Engels, *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1942), originally published 1884.

86. Rosalyn Feldberg and Janet Kohen, "Family Life in an Anti-Family Setting," *Family Coordinator* (April 1976): 151 - 58.

87. Bernard Farber, *Family Organization and Interaction* (San Francisco: Chandler, 1964), pp.106 - 9.

88. Philippe Arie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89. Marie Winn, *Children Without Childhoo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3).

第 10 章

1. Jeffrey Mirel and David Angus, "High Standards for All? The Struggle for Equality in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Curriculum, 1890 - 1990," *American Educator* 18 (Summer 1994): 4 - 9, 40.

2. Logan Wilson and Olive Mills (eds.), *Universal High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1972).

3.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The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1996*, Table 387, Web-posted at nces01.ed.gov/NCES/pubs/d96/D96T387.html.

4. "The Brain Battle," *U.S. News & World Report* (January 19, 1987), p.59.

5.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Table 244, p.159.

6. Karen W. Arenson, "Students Continue to Improve, College Board Says," *New York Times* (August 23, 1996), p.A16.

7. "The Brain Battle," p.61.

8. Susan Chira, "How to Translate the Talk About Reform into Action,"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1991), p.E1.

9.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What Works: Research About Teaching and Learning*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7).

10. Alvin Toffler, *Future Shock* (New York: Bantam, 1970), p.400.

11. See Janathan Kozol, *Death at an Early Ag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8).

12. Charles E. Silberman, *Crisis in the Classroo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p.324.

13. Ibid.; see also Jerry Farber, *The Student as Nigger*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0), and John Holt, *Why Children Fail* (New York: Pitman, 1967).

14. Christopher Jencks, quoted in Charles E. Silberman, *Crisis in the Classroom*, p.133.

15. Vincent N. Parrillo, *Strangers to These Shores*, 5th ed. (Boston: Allyn & Bacon, 1997), Chapter 6.

16. Robert Rosenthal and Lenore Jacobson, *Pygmalion in the Classroo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8).

17. John W. Ritchie, "The Magic Feather: Education and 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78 (1977): 477 – 86; Janet D. Elashoff and Richard E. Snow, "*Pygmalion*" *Reconsidered* (Worthington, Ohio: Jones, 1971); William J. Gephart, "Will the Real Pygmalion Please Stand Up?" *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7 (1970): 473 – 74; Ray C. Rist, "Student Social Class and Teacher Expectations: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in Ghetto Educatio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0 (1970): 411 – 51.

18. See, for example, Joanna Ryan, "IQ—The Illusion of Objectivity," in Ken Richardson and David Spears (eds.), *Race and Intelligence*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72).

19. Arthur R. Jensen, "How Much Can We Boost I.Q. and Scholastic Achievement?"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39 (1969): 11 – 123.

20. In a later work, Jenson reaffirmed his position by arguing that the mean differences remain despite attempts to raise scores. See Arthur R. Jensen, *Bias in Mental Tes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21. Richard J. Herrnstein, "IQ," *Atlantic Monthly* 228 (September 1971): 43 – 64; Richard J. Herrnstein and Charles Murray, *The Bell Curve: The Reshaping of American Life by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22. Lee J. Cronbach, "Heredity,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al Policy,"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39 (1969): 338 – 47.

23. Philip Scrofani, Anatas Suziedelis, and Milton Shore, "Conceptual Ability in Black and White Children of Different Classes: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Jensen's Hypothese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43 (1973): 541 – 43.

24. Thomas Sowell, "New Light on the Black I.Q. Controvers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27, 1977): p.57.

25. Constance Holden, "California Court Is Forum for Latest Round in IQ Debate," *Science* 201 (1978): 1106 – 9.

26.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20 – 48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27. Miriam Horn, "The Burgeoning Educational Underclass," *U.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18, 1987), pp.66 – 67.

28. Associated Press, "Dropouts: Same Reason for Both Sexes," (March 16, 1987).

29.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The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1996*, Table 101, Web-posted at nces01.ed.gov/NCES/pubs/d96/D96T101.html.

30.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1997*, Indicator 21, Web-posted at nces01.ed.gov/NCES/pubs/ce/c9721a01.html.

31. Ibid.; David A. Kaplan, "Dumber Than We Thought," *Newsweek* (September 20, 1993), pp.44 – 45.

32. Ibid.

33. Jonathan Kozol, *Savage Inequities: Children in America's Schools*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91).

34. Sandra Feldman, "Children in Crisis: The Tragedy of Underfunded Schools and the Students They Serve," *American Educator* 16 (Spring 1992): 8 - 17, 46.

35. Clifford J. Levy, "Schools Emerges as NYC Campaign Background," *New York Times* (August 29, 997): p.A1.

36. Arthur E. Wise and Tamar Gendler, "Rich Schools, Poor Schools: The Persistence of Unequal Education," *College Board Review* 151 (Spring 1989): 12 - 17, 36 - 37.

37.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3).

38.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1997*, Indicator 26, Web-posted at nces01.ed.gov/NCES/pubs/ce/c9726a01.html.

39.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1997*, Indicator 15, Web-posted at nces01.ed.gov/NCES/pubs/ce/c9715a01.html.

40. See note 5.

41. Barbara Kantrowitz and Pat Wingert, "A Dismal Report Card," *Newsweek* (June 17, 1991), p.64.

42. Carolyn Lochhead, "The ABCs of Reform: Give Parents a Choice," *Insight* (September 24, 1990), p.10.

43. Ibid.

44. Diane M. Ravitch and C. E. Finn, Jr., *What Do Our 17-Year-Olds Know?*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7).

45. Clifford Adelman, unpublished report to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1983.

46.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A Nation at Risk*.

47.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High School Students Ten Years After 'A Nation at Risk,'" *Findings from 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1994, no.1 (May 1995).

48. "The Valedictorian," *Newsweek* (September 6, 1976), p.52.

49.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1997*, Indicator 19, Web-posted at nces01.ed.gov/NCES/pubs/ce/c9719a01.html.

50. Karen W. Arenson, "Students Continue to Improve, College Board Says"; and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 *National College-Bound Senior* (New York: CEEB, 1993).

51. Robert J. Samuelson, "Merchants of Mediocrity," *Newsweek* (August 1, 1994), p.44.

52. Lucia Solorzano, "What's Wrong with Our Teachers?" *U.S. News & World Report* (March 14, 1983), p.38.

53. Edward B. Fiske, "Redesigning the American Teacher," *New York Times Education Supplement* (April 12, 1987), pp.18 - 21.

54. Carnegie Corporation, *Report on Teaching as a Profession* (New York: Carnegie Corporation, 1986).

55.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America's Teachers Ten Years After 'A Nation at Risk,'" no.3 (May 1995), p.2.

56.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The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1996*, Table 154, Web-

posted at nces01.ed.gov/NCES/pubs/d96/D96T154.html.

57.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America's Teachers Ten Years After 'A Nation at Risk,'" no.3 (May 1995), p.12.

58. Ibid., p.5.

59. See, for example, John McCormick, "'Separate But Equal' Again?" *Newsweek* (August 1, 1994), p.44.

60. Thomas Toch, "Schools That Work," *U.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27, 1991), pp.58 - 66.

61. Kimberly C. West, "A Desegregation Tool That Backfired: Magnet School and Classroom Segregation," *Yale Law Journal* 103 (June 1994): 2567 - 92.

62. Adam Gamoran, "Do Magnet Schools Boost Achievement?" *Educational Leadership* 54 (October 1996): 42 - 46.

63. Thomas Toch, "Schools That Work."

64. Allen Avery, "Do Magnet Schools Exacerbate Tracking?" *NEA Today* 13 (May 1995): 39.

65. Barbara Kantrowitz, "A Real Test for Vouchers," *Newsweek* (May 27, 1991), pp.60 - 61.

66. John O. Norquist, "A Ticket to Better Schools," *Reader's Digest* (July 1993), pp.65 - 68.

67. Steve Forbes, "Ray of Education Sunshine," *Forbes* 160 (October 13, 1997), pp.27 - 28.

68. Thomas Toch, "Liberal Vouching for City Schools,"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16, 1997), p.40.

69. Carol Innerst, "Politicians Float Reform Options, From School Choice to Tax Credit," *Insight on the News* 13 (August 18, 1997), p.37.

70. David Masci, "School Choice Debate: Are Tuition Vouchers the Answer to Bad Public Schools?" *CQ Researcher* 7 (July 18, 1997): 627 - 42.

71. Ibid., and Carol Innerst, "Politicians Float Reform Options, From School Choice to Tax Credit."

72. 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Morrow, 1980).

73. Daniel Bell first advanced this idea in *The Coming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74. See Christopher J. Hurn,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Schooling* (Boston: Allyn & Bacon, 1978).

75.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263, p.171.

76. See Ibid., Table 265, p.172.

77.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78. 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 p.364.

第 11 章

1.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Table 874, p.558.

2. Michael Parenti, *Democracy for the Few*, 5th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p.12.

3. Keith Bradsher, "Gap in Wealth in U.S. Called Widest in West,"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1995), p.A1.

4. David Moberg, "Decline and Inequality After the Great U-Turn," *In These Times* (may 27-June 9, 1992), p.7; See also "U.S. Wealth-2% Own 28%," *Parade Magazine* (December 9, 1984).

5. Maurice Zeitlin, "Who Owns America? The Same Old Gang," *The Progressive* 42 (June 1978): 15.

6. Michael Parenti, *Democracy for the Few*, p.81.

7. U.S. Senat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Affairs,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Among the Major United States Corporation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p.6.

8.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123.

9. Maureen Jung, Dean Purdy, and D. Stanley Eitzen, "The Corporate Inner Group," *Sociological Spectrum* 1 (1981): 317 – 33.

10. Mark S. Mizruchi, "What Do Interlocks Do? An Analysis, Critique, and Assessment of Research on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6* 22 (1996): 271 – 98.

11. Mark S. Mizruchi, B. B. Potts, and D. W. Allison,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and Business Transactions: New Evidence on an Old Question,"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iami Beach, August 1993.

12.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859, p.550.

13. Charles V. Bagli, "Conditions Are Right for a Takeover Frenz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1997), p.B1.

14. Quoted in John S. DeMott, "White Knights and Black Eyes," *Time* (February 14, 1983), p.56.

15. Charles V. Bagli, "Conditions Are Right for a Takeover Frenzy."

16. Ibid.

17.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2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1), p.71.

18. Leonard Silk and David Vogel, *Ethics and Profi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9), p.207.

19. Mark J. Green, *The Closed Enterprise System: Ralph Nader's Study-Group Report on Anti-Trust Enforcement* (New York: Grossman, 1972), pp.147 – 50.

20. Richard A. Smith, "The Incredible Electrical Conspiracy," *Fortune* 63 (1961): 132ff..

21. Ralph Nader and Mark J. Green, "Crime in the Suites: Coddling the Corporations," *New Republic* (April 29, 1972), pp.17 – 18.

22. John M. Broder, "Toys 'R' Us Led Price Collusion, Judge Rules in Upholding F.T.C.,"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 1997).

23. Bradford Snell, "American Ground Transport," in Jerome H. Skolnick and Elliot Currie (eds.), *Crisis in American Institutions* (Boston: Little, Brown, 1985), pp.319 – 42.

24. Alexander Liazos, *People First: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roblems* (Boston: Allyn & Bacon, 1982).

25. Ibid.

26. Vance Packard, *The Hidden Persuaders*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58).

27. Wilson Bryan Key, *Subliminal Seduction* (New York: Signet, 1974).

28. Jules Henry, *Culture Against Man* (New York: Vintage, 1965).

29.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Farewell Radio and Television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January 17, 1961), quoted in Seymour Melman, *Pentagon Capit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p.235.
30.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536, p.348.
31. U.S. Gener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 *Inventory Report of Real Property Ow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out the World: 1992*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32.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544, p.354.
33. Mark Tapscott, "Quarter of Defense Jobs Lost Since 1987, Study Finds," *Defense Electronics* 26 (February 1994): 16.
34. Robert A. Kittle, "Pentagon Bogs Down in Its War on Waste,"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4, 1984), p.73.
35. James Kitfield, "How Perry Took on the Boondoggles," *National Journal* 29 (February 1, 1997) p.245.
36. Robert M. Kans, "There's No Shame Anymore," *Harper's* (August 1982), 9 – 10.
37. Steve Forbes, "Lobbyists: Their Gain Is Our Loss," Forbes (July 15, 1996), p.23.
38.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833, p.561; Table 1347, p.838.
39. Brian Zajac, "Getting the Welcome Carpet: The 100 Largest U.S. Multinationals," *Forbes* 154 (July 18, 1994), pp.276 – 78.
40. See Richard J. Barnet and John Cavanagh, *Global Dreams: Imperi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41. R. Barff and K. Austen, "'Its Gotta Be da Shoes': Domestic Manufacturing, Internal Subcontracting, and the Production of Athletic Footwear,"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1993): A25.
42. Joyce Barrett, "House Panel on NAFTA Hears Makers' Praise, Labor's Gripes," *WWD* 174 (September 15, 1997), p.8.
43. Bill Day, "The NAFTA Nightmare," *Multinational Monitor* 13 (October 1992): 25 – 26.
44.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45. Derived from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645, p.410 – 12.
46. Harlan Cleveland, "Educating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hange* (July-August 1985), p.15.
47. See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646, p.413.
48. See 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Morrow, 1980).
49. Ibid., p.238.
50. Ted Lewis, "The End of Work as We Know It," *Computer* 28 (July 1995): 10 – 11.
51. Charles Silberman and editors of *Fortune*, *The Myths of Autom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p.21.
52.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620, p.397.

53. Ibid., Table 623, p.399.
54. "Laying Off the American Dream," *America* 74 (March 23, 1996), p.3.
55. For the Human element in downsizing, see the seven-part series, "The Downsizing of America," *New York Times* (March 3 - 9, 1997), p.A1.
56. William Bridges, "The End of the Job," *Fortune* 130 (September 19, 1994), pp.62 - 67.
57.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647, p.414.
58. See Philip Mattera, *Prosperity Lost*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1); Barry Jones, *Sleepers Awake!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Wo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Bennett Harrison and Barry Bluestone, *The Great U-Turn: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the Polarizing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59. Jeremy Rifkin, *The End of Work; The Decline of the Global Labor Force and the Dawn of the Post-Market Era* (New York: Putnam, 1995).
60. John S. Demott, "After the Mill Shuts Down," *Time* (August 15, 1983), p.46.
61. Ibid.
62. Alfred Sloate, "When Factories Shut Down," *TransAction* 81 (January 1971): 14.
63. Harvey Brenner, *Mental Illness and the Econo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64. Eleanor Hoover, "Unemployment Rated Major Mental Health Problem,"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4, 1975), pt. I, pp.1, 22.
65. Ramsay Liem and Paula Rayman, "Health and Social Costs of Unemploy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October 1982): 1116 - 23.
66. D. D. Bragninsky and B. M. Braginsky, "Surplus People: Their Lost Faith in Self and System," *Psychology Today* (August 1975): 70.
67. Abraham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4), pp.35 - 47.
68. Frederick Herzberg, *Work and the Nature of Man* (New York: World, 1966).
69. Daniel Yankelovich, "The New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at Work," *Psychology Today* (May 1978): 46.
70. See Patricia A. Renwick and Edward E. Lawler, "What You Really Want from Your Job," *Psychology Today* (July 1978): 79.
71. Clifford J. Mattaz, "Some Determinants of Work Alienatio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Autumn 1981): 515 - 29.
72. Catherine Romano, "What's Your Flexibility Factor?" *Management Review* 83 (January 1994): 9.
73. See, for example. "Workers Find 'Flextime' Makes for Flexible Living,"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5, 1979); "Flexible Work Hours a Success, Study Say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1977).
74. See Henry E. Sigerst, *Civilization and Disea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75.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681, p.437.
76. Ibid., Table 206, p.138.
77. Russell Mokhiber, *Corporate Crime and Violence: Big Business Power and the Abuse of the Public*

Trust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88).

78. Devra Lee Davis, "Cancer in the Workplace," *Environment* (July-August 1981): 29.

79. "OSHA Fines GM $1.94 Million," *Automotive News* (April 11, 1994), p.8.

80. Nancy E. Kelly, "OSHA Fines Bethlehem in Worker Death," *American Metal Market* 104 (June 24, 1996), p.2.

81. John E. Sacco, "Lukens to Pay $237,500 in OSHA Fines," *American Metal Market* 105 (April 22, 1997), p.2.

82. Christopher Dinsmore, "OSHA Fines Virginia Shipbuilding Company in Employee Deaths," *Knight-Ridder/Tribune Business News* (October 9, 1997), p.1009B1081.

83. Mark A. Pinsky, "VDT Hazard: Is High-Tech Work High Risk?" *In These Times* (November 18 - 24, 1987), pp.12 - 13, 22.

84. Statistics for mining and other occupations discussed in this section are drawn from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681, p.437.

85. Joseph S. Stroud, "Black-lung Cases Are Common, But Victories in Efforts to Get Federal Benefits Are Rare," *Knight-Ridder/Tribune News Service* (October 15, 1993), p.1015K7085.

86. S. L. Smith, "Silicosis: A Dusting of Death," *Occupational Hazards* 56 (April 1994): 38 - 41.

87. Stephen G. Minter, "Dying in a Cloud of Dust," *Occupational Hazards* 59 (May 1997): 6.

88. "NIOSH Issues Alert to Workers on Organic Dust Syndrome," *Feedstuffs* 66 (June 20, 1994), p.21.

89. Jerry DeMuth, "Brown Lung in the Cotton Mill," *America* (March 18, 1978), p.108.

90. David P. Brown, John M. Dement, and Andrea Okun, "Mortality Pattern Among Female and Male Chrysotile Asbestos Textile Worker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36 (August 1994): 882 - 88.

91. Russell Mokhiber, *Corporate Crime and Violence*, p.284.

92. Ming-Tsang Wu, Karl T. Kelsey, I-Fang Mao, David Wypij, Hong-Wen Liu, and David C. Christiani, "Elevated Serum Liver Enzymes in Coke Oven and By-product Worker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39 (June 1997): 527 - 33; Farhang Akbar-Khanzadeh and Ruben D. Rivas, "Exposure to Isocyanates and Organic Solvents, and Pulmonary-function Changes in Workers in a Polyurethane Molding Proces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38 (December 1996): 1205 - 12; Rita Ouellett-Hellstrom and Jerry D. Rench, "Bladder Cancer Incidence in Arylamine Worker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38 (December 1996): 1239 - 47; Gary M. Liss and Murray M. Finkelstein, "Mortality Among Workers Exposed to Carbon Disulfide," *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51 (May - June 1996): 193 - 200; Frank D. Gilliland and Jack S. Mandel, "Mortality Among Employees of a Perfluorooctanoic Acid Production Plant,"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35 (September 1993): 950 - 54.

93. See Gloria Borger, "Stupid Advertising Tricks," *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ust 1, 1994), p.66.

94. See Robert Lekachman, "The Specter of Full Employment," *Harper's* (February 1977): 35 - 40.
95. Peter L. Berger,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 on the Problem of Work," in Peter L. Berger (ed.), *The Human Shape of Work* (New York: Macmillan, 1964), p.215.
96. Ibid.
97. Two particularly helpful writing are David Pearce Snyder, "The Revolution in the Workplace: What's Happening to our Jobs?," *The Futurist* 30 (March - April 1996): 8 - 13; and Robert Barner, "The New Millennium Workplace: Seven Changes That Will Challenge Managers - and Workers," *The Futurist* 30 (march - April 1996): 14 - 18.
98. This term was coined by Ivan Illich.
99. These possibilities are envisioned by Toffler, *The Third Wave*, pp.181 - 93.

第 12 章

1. René Dubos, "Health and Creative Adaptation," *Human Nature* 1 (1978): 74 - 82; Erdman Palmore and Clark Luikart, "Health and Social Factors Related to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3 (1972): 68 - 80.
2.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Table 153, p.112.
3. Myron E. Wegman, "Infant Mortality: Som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ediatrics* 98 (December 1996): 1020 - 27.
4. Derived from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1336, p.832 - 33.
5. Thomas McKeown, *The Role of Medicine: Dream, Mirage, or Nemes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Thomas McKeown, "The Determinants of Health," *Human Nature* 1 (1978): 60 - 67.
6. Eliot Freidson, "The Organization of Medical Practice," in Howard E. Freeman, Sol Levine, and Leo G. Raeder (eds.), *Handbook of Medical Soci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2), p.344.
7. Ivan Illich, *Medical Nemesis: The Expropriation of Health*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pp. 32 - 36.
8. Ibid., pp.40 - 41.
9. Idin W. Anderson, *Health Care: Can There Be Equit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2).
10. Milton I. Roemer, "Nationalized Medicine for America," *Transaction* 8 (1971): 31.
11.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7*, Table 307, p.194.
12. Peter T. Kilborn, "Foreign Doctors Flocking to Rescue Long-Shunned Areas of Dire Povert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 1991), p.8.
13.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182, p.125.
14. "Must Doctors' Fees Be So High?" *Changing Times* (March 1981): 37.
15. "Too Much Surgery?" *Newsweek* (April 10, 1978), pp.65 - 67.
16.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191, p.130.

17. See, for example, Edwin W. Brown, "50,000 Unnecessary Appendectomies a Year-and How to Prevent Them," *Medical Update* 20 (February 1997): 4; "Consumer Group Challenges C-section Rate," *Special Delivery* 17 (Summer 1994): 4.

18. "Wasted Health Care Dollars," *Consumer Reports* (July 1992): 440 - 41, 447.

19. James W. Coleman, *The Criminal Elite: The Sociology of White Collar Crime*, 3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p.113 - 14.

20. Jeffrey H. Reiman, *The Rich Get Richer and the Poor Get Prison: Ideology, Class, and Criminal Justice*, 3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90): p.65.

21. "Most Hysterectomies Not Worth It," *Special Delivery* 16 (Spring 1993): 17.

22. "Sky-High Damage Suit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anuary 27, 1986), p.36.

23. From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October 1992) cited in *HealthFacts* 19 (March 1994): 2 - 3.

24. Robert J. Samuelson, "Health Care: How We Got Into This Mess," *Newsweek* (October 4, 1993), p.34.

25. Ferris J. Ritchey, "Medical Rationalization, Cultural Lag, and the Malpractice Crisis," *Human Organization* (Summer 1981): 97 - 111.

26. Jethro Lieberman, *The Litigious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p.67.

27. "Frivolous Lawsuits and Defensive Medicine," *HealthFacts* 19 (March 1994): 2 - 3.

28. See Julie Johnson, "Columbia Still a Player: Investor-owned Hospital Roll the Dice," *American Medical News* 40 (may 5, 1997), pp.3 - 5.

29. Iver Peterson, "Health Care and Hospital Chains; Small Institutions Choose Survival over Independenc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1994), p.B1.

30.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188, p.129.

31. U.S. Health Care Financing Administration, *Health Care Financing Review*, Winter 1992.

32. See Robert J. Samuelson, "Health Care: How We Got Into This Mess," p.35; A. Pollack, "Medical Technology 'Arms Race' Adds Billions to the Nation's Bills,"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1991), p.A1, B8.

33. "Wasted Health Care Dollars," p.442.

34. Susan Brink and Nancy Shute, "Are HMOs the Right Prescription?" *U. S. 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13, 1997), p.64.

35. Abigail Trafford and Clemens P. Work, "Soaring Health Costs: The Brewing Revolt,"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ugust 22, 1983), p.40.

36. A. E. Ehrbar, "A Radical Prescription," *Fortune* (February 1977): 165 - 72.

37. John Colombotos, Corinne Kirchner, and Michael Millman, "Physicians View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 National Study," *Medical Care* 13 (May 1975): 369 - 96.

38. "The New World of Health Care,"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pril 14, 1986), pp.60 - 63.

39. Susan Bink and Nancy Shute, "Are HMOs the Right Prescription?" p.60.

40. Ibid.

41. Erik Eckholm, "HMOs Are Changing the Face of Medicar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1, 1995),

pp.A1, A16.

42. Robert J. Samuelson, "Health Care: How We Got Into This Mess," p.35.

43. Daniel Q. Haney, "Nurses Hasten Death at Times," Associated Press (May 23, 1996); see also Katherine Bouton, " Painful Decisions: The Role of the Medical Ethicis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ust 5, 1990), pp.22ff.

44.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115, p.86.

45. Ibid.

46. Ted Gest, "Abortions in America: ABC's of a Raging Battle," *U.S. News & World Report* (January 24, 1983), p.48.

47. See Andrew M. Greeley, *The Catholic Myth*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0); George Gallup and J. Castelli, *The People's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89).

48. David J. Garrow, "Letting the Public Decide about Assisted Suicide," *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97), p.E4.

49. Linda Greenhouse, "Court, 9-0, Upholds State Laws Prohibiting Assisted Suicide," *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97), p.A1.

50. Linda Greenhouse, "Assisted Suicide Clears a Hurdle in Highest Cour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5, 1997), p.A1.

51. Geoffrey Cowley, "The Future of AIDS," *Newsweek* (March 22, 1993), pp.47, 52.

52.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133, p.100, and unpublished data from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53. Ibid., Tables 130 and 132, pp.97 – 99.

54. Public Health Service, "Update: Trends in AIDS Incidence-United States, 1996,"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46 (September 19, 1997), No.37.

55. Geoffrey Cowley, "The Future of AIDS," p.49.

56. Web-posted at www.unaids.org/highband/rights/thaifact.html.

57. Tara N. Beckhaus, Peter B. Belden, and Thomas J. Espenshade, "AIDS, Low Birth Rates, & Future Growth in Thailand," *Population Today* (October 1994): 4 – 5.

58. Lawrence K. Altman, "W.H.O. Says 40 Million Will Be Infected with the AIDS Virus by 2000," *New York Times* (June 18, 1991), p.C3.

59. Peggy R. Barker, et al., "Serious Mental Illness and Disability in the Adult Household Population: United States, 1989," *Advance Data*, No.218 (Washington, D.C.: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1992), pp.1, 9.

60. Robert E. L. Faris and H. Warren Dunham, *Mental Disorders in Urban Are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9).

61. August B. Hollingshead and Frederick C. Redlich, *Social Class and Mental Illness: A Community Stud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8).

62. Leo Srole et al., *Mental Health in the Metropolis: The Midtown Manhattan Study*, rev.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63. Peggy R. Barker, et al., "Serious Mental Illness and Disability in the Adult Household Population," p.4.

64. Ibid.

65. See Phyllis Chesler, *Women and Madness* (New York: Avon, 1972).

66. Ibid. See also Pauline B. Bart, "Depression in Middle-Aged Women," in Vivian Gornick and Barbara K. Moran (eds.), *Women in Sexist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p.163 – 86.

67. See, for example, L. W. Cannon, et al., *Depression Among Women: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 (Memphis: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Memphis State University, 1989).

68. Talcott Parson,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pp.428 – 73.

69. Thomas Szasz,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rev.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70. Erving Goffman,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Anchor, 1961), p.XII.

71. See "Medicine Dares to Dream of the Impossible," *U.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9, 1983), pp.116 – 17.

72. See Rick J. Carlson, *The End of Medicin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5).

第 13 章

1. See Kenneth T. Jackson,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 Truman A. Hartshom and Peter O. Muller, *Suburban Business Centers: Employment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7).

3. Joel Garreau, *Edge City: Life on the New Frontier* (New York: Doubleday, 1991).

4. See William K. Stevens, "Beyond the Mall: Suburbs Evolving into 'Outer Citi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8, 1987), p.E5.

5. William A. Caldwell (ed.), *How to Save Urban America* (New York: Signet, 1973), pp.45 – 56.

6. Ibid., pp.216 – 17.

7. "Jam Session," *U.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ember 7, 1987), p.21.

8. Ibid., pp.20 – 22.

9. Bernie Fette, "Urban Traffic Congestion Still Increasing Nationwide," Web-posted at www.dot.state.tx.us/insdtdot/orgchart/rtt/fdoqtrly/tq9 – 3/traffic.htm.

10. "Jam Session," p.21.

11.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Commuting Alternat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cent Trends and a Look to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4), No. DOT-T-95-11.

12. Ibid., Table 21.

13. Francis Bello, "The City and the Car," in A. N. Cowing and H. Nagpaul (eds.), *Urban Man and Societ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7).

14. J. John Palen, "The Urban Nexus: Toward the Year 2000," p.143, in Amos H. Hawley (ed.),

Social Growth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15.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1031, p.639.
16. Patricia Hanrahan and Katharine Rankin, "How Lawyers Can Help Provide Housing for the Neediest," *Human Rights* 17 (Summer 1990): 37 – 39; see also Harriet T. Taggart and Kevin W. Smith, "Redlining: An Assessment of the Evidence of Disinvestment in Metropolitan Boston," *Urban Affair Quarterly* 17 (1981): 9 – 107.
17. J. John Palen, *The Urban World*, 5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97), p.327.
18. Ibid., p.328.
19. Morton J. Schussheim, "Housing in Perspective," *Public Interest* (Spring 1979).
20. Jeanne R. Lowe, *Cities in a Race with Tim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Chapter 6.
21. Scott Greer, *Urban Renewal and American Citie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5), p.3.
22. Herbert Gans, *The Urban Villagers*, expande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23.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583, p.376; and derived from Table 1195, p.722.
24. Kevin Johnson, "In Chicago, at Home in High-Rises," *USA Today* (November 27, 1993): p.3A; "High-Rise Housing Tumbles," *Environmental News Report* 234 (March 20, 1995), p.19.
25.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582, p.375; and 1994 edition, Table 577, p.373.
26. Mittie O. Chandler, *Urban Homesteading: Programs and Policies* (Westport, Conn.: Geenwood Press, 1988).
27. Jay Mathews, "Rethinking Homeless Myths," *Newsweek* (April 6, 1992), p.29.
28. Peter H. Rossi, *Down and Out in America: The Origins of Homelessn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29. "What Does Homelessness Have to Do with Foster Care?" *Institute for Children and Poverty* 2 (August 1993): 1.
30. Charles Hoch and Robert A. Slayton, *New Homeless and Old: Community and the Skid Row Hotel*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31. Peter Marin, "Helping and Hating the Homeless," *Harper's* 274 (January 1987): 40 – 41.
32. Richard Stengel, "Down and Out and Dispossessed," *Time* (November 24, 1986), pp.27 – 28.
33. "What Does Homelessness Have to Do with Foster Care?" p.6.
34. "Education: An Underlying Tenet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Poverty," *Institute for Children and Poverty* 1 (January 1993): 1.
35. "What Does Homelessness Have to Do with Foster Care?" pp.1 – 2.
36. Jay Mathews, "Rethinking Homeless Myths," p.29.
37.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Table 46, p.45 – 47.
38. Ibid.
39. Ibid., Table 1213, p.731.
40. U.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1997).

41. Jean Gottman, *Megalopolis: The Urbanized Northeast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1).

42.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derived from Table 696, p.450 and Table 33, p.33.

43. Ibid., Table 788, P.516.

44. Rushworth M. Kidder, "The Northeast Rebound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1983), pp. 1, 14.

45. John D. Kasarda, "Urban Change and Minority Opportunities," in Paul Peterson (ed.), *The New Urban Realit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pp.33 - 67.

46. David Rusk, *Cities Without Suburbs* (Baltimor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3).

47. Neal Peirce et al., *Citistates* (Washington, D.C.: Seven Locks Press, 1993).

48. Eugene Linden, "Megacities," *Time* (January 11, 1993), p.31.

49. Ibid., p.36.

50. Ibid.

51. 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7).

52. See Michael Timeberlake (ed.),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Econom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5).

第 14 章

1. "World Population Clock, 1997," *Population Today* (May 1997), P.2.

2. *World Development Forum* (June 15, 1986), pp.3 - 4.

3. *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enter Report* (Fall 1994): 1.

4. Carl Haub, "World Population Rises to 5.84 Billion in 1997," *Population Today* 25 (May 1997): 1 - 2.

5. Carl Haub, "World Population Expected to Reach 6 Billion in Early 1999," *Population Today* 24 (June/July 1996): 1.

6. As told by Donnella Meadows in *The Limits to Growth*, quoted in *World Development Forum* (May 31, 1984), p.2.

7. Robert L. Heilbroner,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7), p.76.

8. Dennis H. Wrong, *Population and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p.102.

9. Garret Hardin, "Living on a Lifeboat," in William R. Bursch (ed.), *Readings in Ecology, Energy, and Human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pp.217 - 24.

10. Janet Besecker and Phil Elder, "Lifeboat Ethics: A Reply to Hardin," in William R. Bursch (ed.), *Readings in Ecology, Energy, and Human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pp.225 - 26.

11. Jay A. Weinstei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Social Change*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6), pp.57 - 79.

12.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World Population Clock, 1997." *Population Today* 25 (May 1997):

2.

13. Carl Haub, "New UN Projections Depict a Variety of Demographic Futures," *Population Today* 25 (April 1997): 1.

14. Leon F. Bouvier and Lindsey Grant, *How Many Americans?*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94), p.54.

15. Ibid., p.18.

16. Carl Haub, "World Population Rises to 5.84 Billion in 1997," p.2.

17. Robert H. Weller and Leon F. Bouvier, *Population: Demography and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p.42.

18. The Hunger Project, *World Development Forum* (August 15, 1987), p.2.

19.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Population Issues: 1997," Web-posted at www.unfpa.org/pubs/brkit97.html # 4.

20. Diana Schemo, "Burning of Amazon Picks up Pace, With Vast Areas Los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 1996), p.A13.

21. Timothy M. Ito and Margaret Loftus, "Cutting and Dealing: Asian Loggers Target the World's Remaining Rain Forests," *U.S. News & World Report* (March 10, 1997), pp.39 – 41.

22. Werner Forno, president of Population Institute, "Gaining People, Losing Ground," address given at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Wayne, New Jersey, October 23, 1996.

23. Norman Myers,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Global Security," in Herbert F. Bohrmann and Stephen R. Kellert (eds.), *Ecology, Economics, and Ethics: The Broken Circl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1 – 25.

24. Norman Myers, *The Primary Source: Tropical Forest and Our Fu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1984), p.9.

25. Ibid., p.10.

26. The Hunger Project, *World Development Forum* (May 31, 1983), p.3.

27. "Position of the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World Hung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95 (October 1995): 1160 – 62;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199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8. Peter Uvin, "The State of World Hunger," in Peter Uvin (ed.), *The Hunger Report 1993* (Langhorne, Penn.: Gordon and Breach for the Alan Shawn Feinstein World Hunger Program, Brown University, 1994), pp.1 – 42.

29. William Bender and Margaret Smith, "Population, Food, and Nutrition," *Population Bulletin* 51 (February 1997): 6.

30. Greg Easterbrook, "Forget PCB's, Radon, Alar: The World's Greatest Environmental Dangers Are Dung Smoke and Dirty Water,"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11, 1994), pp.60 – 62.

31. Frank E. Egler, "Pesticides in Our Ecosystem," in P. Shepard and D. McKinley (eds.), *The Subversive Scie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9), p.247.

32. Paul Ehrlich and J. P. Holdren, "Hidden Effects of Overpopulation," *Saturday Review* (August 1,

1970), p.52.

33. Lester R. Brown and Sandra Postel, "Thresholds of Change" in Lester R. Brown et al., *State of the World 1987* (New York: W. W. Norton, 1987), p.5.

34. Linda Blackburne, "From Acid to Ashes," *New York 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nt* (September 16, 1994), p.R6.

35. Paul Ehrlich and J. P. Holdren, "Hidden Effects of Overpopulation."

36. Leslie Alan Horvitz, "More Precious Even Than Oil," *Insight on the News* 13 (March 17, 1997), pp.42 – 42.

37. Frank E. Egler, "Pesticides in Our Ecosystem," p.256.

38. Gail Finsterbusch, *Man and Earth: Their Changing Relationship*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7), p.43.

39. Richard M. Sharpe, "Another DDT Connection," *Nature* 375 (June 15, 1995), pp.538 – 39.

40. Aaron Bielenberg, "NAFTA's Clean-up Act," Americas 48 (July – August 1996): 5.

41. Fred Pearce, "Russia's Foul Flows Threaten Life in the Far North," *New Scientist* 154 (June 7, 1997), p.5.

42. H. Lawrence Boul, et al.,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Practices on the Levels of DDT and its Residues in Soil,"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8 (August 1994): 1397 – 1402.

43. G. M. Woodwell, W. M. Malcolm, and R. H. Whittaker, "A-Bombs, Bugbombs and Us," in P. Shepard and D. McKinley (eds.), *The Subversive Scie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9), p. 23.

44. Jessica Mathews, "Global Warming Is Here: There's No Doubt About It,"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9, 1995), p.1.

45. Sharon Begley, "Too Much Hot Air," *Newsweek* (October 20, 1997), p.49.

46. Bill McKibben, "The Earth Does a Slow Burn," *New York Times* (May 3, 1997), p.A23; Shannon Brownlee and Laura Tangley, "The Wrath of El Niño," *U.S. 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6, 1997), pp.16 – 22.

47. Sharon Begley, "Too Much Hot Air," *Newsweek*, pp.48 – 50.

48. Ibid., p.49.

49. "Acid Rain and Poison Snow," *The Futurist* 13 (April 1979): 153 – 54.

50. Lars O. Hedin and Gene E. Likens, "Atmospheric Dust and Acid Rain," *Scientific American* 275 (December 1996): 88 – 92.

51. G. E. Likens, C. T. Driscoll, and D. C. Buso, "Long-term Effects of Acid Rain: Response and Recovery of a Forest Ecosystem," *Science* 272 (April 12, 1996): pp.244 – 46; Jocelyn Kaiser, "Acid Rain's Dirty Business: Stealing Minerals from Soil," *Science* 272 (April 12, 1996), p.198.

52. Shanti Menon, "The New DDT," *Discover* 16 (January 1995): 58.

53. Ibid.

54. Arnold W. Reitz, "The Law of Pollution Control," in T. R. Armstrong (ed.), *Why Do We Still Have an Ecology Cri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2), p.176.

55. David P. Rall, "What Needs to Be Done to Save the Environment: An Interview," *U.S. News &*

World Report (February 7, 1977), p.51.

56. See Paul Schneider, "Clear Progress: 25 Years of the Clean Water Act," *Audubon* 99 (September–October 1997): 36–49.

57. John H. Cushman, Jr., "Another Waterway Is Closed in Maryland,"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5, 1997), p.A12.

58. Leslie Alan Borvitz, "More Precious Even Than Oil," *Insight on the News* 13 (March 17, 1997), pp.42–43.

59. Paul Ehrlich, *The Population Bomb*, p.35.

60.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Table 684, p.438.

61. *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enter Report* (Winter 1995): 5.

62. Susan L. Cutter and Minhe Ji., "Trends in U.S. Hazardous Materials Transportation Spills,"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9 (August 1997): 318–31.

63. Michael H. Brown, *Laying Waste*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81), p.105.

64. Michael Satchell, "A Black And Green Issue Moves People: EPA Weighs Health Risks and Racial Politics," *U.S News & World Report* (April 21, 1997), pp.41–42.

65. Alan Burdick, "It's Not the Only Alien Invader,"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ember 13, 1994), pp.49–53.

66. Based on Michael S. Teitelbaum,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Consensus Possible?" *Foreign Affair* (July 1974): 742–60.

67. Ben J. Wattenberg, *The Birth Dearth* (New York: Pharos Books, 1987).

68. Carl Haub, "World Population Rise to 5.84 Billion in 1997," p.2.

69. William R. Catton, Jr., and Riley E. Dunlap, "A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for Post-Exuberant Sociolog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4 (1980): 18.

70. Paul R. Ehrlich, *The Population Bomb* (New York: Sierra Club/Ballantine Books, 1971), p.35.

71. Robert Stainbrook, "Mental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Do We Need Nature?" p.189, in R. A. Tybout (e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Society* (Columbus,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72. Nancy Felipe Russo, "The Motherhood Mandat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2 (1976): 144.

73. Julian Simon, "Earth's Doomsayers Are Wrong,"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y 12, 1994), p.18; see also Dixy Lee Ray, *Trashing the Planet*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0), p.168.

74. Paul R. Ehrlich and Stephen H. Schneider, "It's No Time to Heed the Brownlash," Web-posted at wysiwyg://173/http://www.dieoff.org/page27.htm.

75. Wallace Kaufman, *No Turning Back: Dismantling the Fantasies of Environmental Think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pp.99–103.

76. Willis W. Harmon, "The Coming Transformation," *The Futurist* 11 (June 1977): 6.

77.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1997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Washington, D.C., 1997).

78. Bernard Berelson, "Beyond Family Planning," in Gwenn Bell and Jacqueline Tyrwhitt (eds.), *Human Identity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Baltimore, Md.: Penguin, 1972), pp.195–209.

79. Duane S. Elgin and Arnold Mitchell, "Voluntary Simplicity: Life Style of the Future?" *The Futurist* 2 (August 1977): 202.
80. E. F.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New York: Harper & Row, Perennial Library, 1973).
81. Ibid., p.155.
82. "Small Is Beautiful: Recent Thoughts from E. F. Schumacher," *The Futurist* 11 (April 1977): 93.
83. Barry Commoner, "The Economic Meaning of Ecology," in J. H. Skolnick and E. Currie (eds.), *Crisis in American Institutions* (Boston: Little, Brown, 1982), p.292.
84. Michael H. Brown, *Laying Waste*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81), p.292.
85. Barry Commoner, "The Economic Meaning of Ecology," p.292.
86. Ibid., p.296.
87. Margaret Mead, "Preface," in P. Reining and I. Tinker, *Population: Dynamics, Ethics and Polic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975), pp.v – vi.
88.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Commuting Alternat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cent Trends and a Look to the Future* (December 1994), Publication No. DOT-T-95-11.

专用词汇表

能力分组（ability grouping）：将能力相对接近的学生放入同一班级以提高教学效果。

绝对贫困（absolute deprivation）：低于保证生活基本需要最低线的生活标准。

虐待（abuse）：广义上包括精神和肉体伤害，但狭义上主要是指前者，并经警方确实证据记录证实的行为。

上瘾（addiction）：吸食毒品后的一种状态，中断后会引起身体及精神的极度不适。

赞助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通过增加雇用特定少数民族（种族）群体人数以反对种族歧视的政策。

反照率效应（albedo effect）：由于森林的大量砍伐和由此导致的太阳辐射反照的减弱而造成的气温、风和气候形式。

异化（alienation）：由于个人丧失了对自身生活的控制或是被迫从事一些无意义的工作，而同有意义的或真实的社会参与失去了联系。

利他性逃避（altruistic escape）：当社会群体将更多的价值评判置于集团及其信仰而非个人生活之上时，人们在遭遇逆境时往往较易于放弃自己的个性乃至生命。

失范（anomie）：由于社会规范与价值的突变或崩溃而造成的混乱感和失去方向。

对抗性药物（antagonistic drug）：一种反作用的对抗性药物，会使得人们在饮酒时产生恶心感，或者在使用致幻毒品时阻止快感的产生。

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认为人类是我们这个星球的中心和当然的统治者的观念；反对的意见是人只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蓄水层（aquifer）：天然的地下水储藏带，极易被化学品渗透而造成污染。

赋予地位（ascribed status）：与生俱来便赋予人们的一种标签，它决定了他人在我们的一生中如何界定和对待我们。

同化（assimilation）：少数民族或种族成员逐渐能够在社会中正常活动，而无须估计其与多数人群在文化、社会或身体上的差异。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在一个具体环境中建立起来的植物物种和有机生命体的多样性。

生命伦理（bioethics）：延长或中断生命的道德伦理判断。

指责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认定穷人对他们的贫穷及其他社会问题负有责任，而不考虑诸如失业或缺乏教育等外在条件。

生涯（career）：个人所选择的职业，包括卖淫或贩毒等被社会界定为越轨的行业。

猥亵儿童（child molestation）：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法律术语，通常指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发生的性行为。

民兵组织（citizens' militias）：伪装在宪法外衣下的准军事团体，尽管他们自己也承认并没有得到任何联邦法律或权威的认可。

同居（cohabitation）：一男一女没有经过合法婚姻便共同居住在一起。

社区（community）：指相邻地区或其他群体，个人在其中能够感受到情感联系，并愿意相互扶持。

社区警务（community policing）：通过警方与社区间强有力的合作控制犯罪的措施。

补习教育（compensatory education）：向弱势群体的青少年教授基本技能和知识的特殊计划。

冲突论观点（conflict orientation）：关注于紧张、竞争和不平等这些社会进程的一种社会学观点。

企业集团（conglomerates）：在许多不同的领域拥有资本和生意的大型企业。

便利抽样调查（convenience sample）：一种非客观的抽样选择过程，由于其所选取的对象仅能代表社会的某一部分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其结论的总结概括并不具有效性。

冷静态度（coll attitude）：在应对生活中出现的异化问题时保持沉着镇静的态度。

成本超支（cost overruns）：由于无法预料的生产成本而造成的支出的大量增加。

犯罪恐怖主义（criminal terrorism）：利用恐怖主义的手段进行犯罪以达到个人目的。

犯罪指数（crime index）：联邦调查局每月跟踪统计的8项严重犯罪行为：谋杀、强奸、入室盗窃、抢劫、暴力攻击扒窃、盗窃机动车和纵火。

犯罪率（crime rate）：每10万人中的犯罪数量，以便于在城市与地区之间进行犯罪状况的比较。

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认为下层文化的解体和病态是通过文化传播而自我形成的一种颇具争议的观点。

约会强奸（date rape）：也称为熟人强奸，指受害者认识的人对其采取的强制性行为。

演绎性假说（deductive hypothesis）：通过推理得出结论的过程。

人口过渡论（demographic transition）：认为非西方国家将遵循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由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三阶段过渡的人口模式的理论。

人口统计（demography）：对人口进行的科学研究，如出生与死亡率、人口迁移、平均年龄等。

镇静剂（depressant）：用于缓解压力或焦虑的镇静催眠类药物，但常常被过量使用或滥用。

越轨（deviance）：超出可以容忍的范畴而违反社会规范。

类别交往（differential association）：向某一特定类型的人群发展的社会关系。

生态爱好者（ecofreaks）：极端的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对自然界的一切侵入都产生消极的后果。

边缘城市（edge city）：在旧的城市边缘发展起来的城市中心。

经验主义参照系（empirical referent）：能准确地测量出的一种明确的可观察得到的形式。

色情描写（eroticism）：对性冲动与性爱的生动描写。

种族亚文化（ethnic subcultures）：生活在一个大的社会中的不同种族群体各自所特有的独特的价值观、社会准则和生活方式。

指数级增长（exponential growth）：以成倍的速度迅速增加，而不是缓慢地增长。

表情型领袖（expressive leader）：领导进行决策和完成任务的人。

大家庭（extended family）：包括了祖父母一代的扩大了的核心家庭，有时还包括了叔伯姑婶等亲属；共同承担经济和社会责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血亲家庭。

外在满足（extrinsic satisfaction）：能够增加职业满足感的一些外在因素，如收入、管理和工作条件。

超营养作用（eutrophication）：河流湖泊中的养料污染，造成藻类植物的过度生长而耗尽水中的养分。

错误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对某种情况的主观认识。

错误的价值观（false values）：冲突论者认为，统治集团强调的通过竞争获取成功的价值观会使人们发生异化。

女性主义取向（feminist orientation）：体现了女性主义价值取向的观点。

贫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用于形容生活贫困的以女性为首的单亲家庭数量的迅速上升的术语。

胎儿酒精综合症（fetal alcohol syndrome）：由于母亲酗酒造成婴儿先天带有的酒瘾和其他问题。

胎儿毒品综合症（fetal narcotic syndrome）：由于母亲吸毒造成婴儿先天带有的毒瘾和停药症状。

弹性时间（flex time）：允许劳动者在预定的范围内安排自己工作时间的制度。

"入门"毒品（"gateway" drug）：一种没有充足根据的观点，认为使用大麻等不致瘾的毒品会导致进而使用其他危险性更大的毒品。

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男性和女性将一些由文化促成的特点融入到他（她）们的身份个性中。

性别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权力、声望和财产任意专横地以性别基础进行分配，而不是根据个人的才能。

整修回搬（gentrification）：由中高收入家庭购买和整修一些衰落地段的破旧住房，然后重新居住。

玻璃顶（glass ceiling）：阻碍妇女突破中等管理岗位进入高级管理层的无形障碍。

分数膨胀（grade inflation）：由于放宽分数要求使大量的人获得高分成绩，而歪曲了真实的学习情况。

绿地城市（greenfield city）：占地达数千英亩、幅员广阔的规划有序的边缘城市。

温室效应（greenhouse effect）：由于化学燃料燃烧造成二氧化碳气体大量积聚形成气层，将地球的热量反射而不是放射到大气当中。

年收入保障（guaranteed annual income）：通过政府资助的收入维持计划，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最低收入保障。

健康维护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通过团体预付费用的健康计划，提供低价的预防和治疗的组织。

"海洛因时尚"（"heroin chic"）：在时尚摄影、电影和艺术作品中将吸食海洛因当作某

种神秘之物的描绘。

需求等级 (hierarchy of needs)：亚伯拉罕·马斯洛关于人类的需求存在不同的先后层次。

无家可归 (homelessness)：无力为自己和被赡养者提供永久的遮身之所。

同性恐惧症 (homophobia)：对同性恋者毫无理由的恐惧。

敌意环境 (hostile environment)：根据最高法院的说明，指由于工作环境中存在的性侵犯氛围而使人无法继续工作的情况。

假说 (hypothesis)：预测几个变量间关系的特别说明。

印象处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为引出某种回应所作出的有意识的角色行为。

乱伦 (incest)：近亲之间违反社会规范发生的性关系。

概率 (incidence)：通过计算在特定时间段内新情况出现的数量来衡量问题严重性的标准。

归纳性假说 (inductive hypothesis)：由特定事实推理得出的一个总体的结论。

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道路、桥梁、供水、垃圾处理等维持地区人口的设施系统。

内环近郊 (inner-ring suburbs)：直接邻近城市的较旧的市郊地区。

制度 (institution)：一整套行动的准则规范，中心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行为，如教育、家庭、政府等。

制度性歧视 (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遍布于社会习俗与制度中的对某些群体的区别和不平等的对待，常常是微妙和非正式的。

工具型领袖 (instrumental leader)：将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并控制其情绪的人。

连锁董事会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指一个公司的行政主管或董事担任另一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内在满足 (intrinsic satisfaction)：能够增强职业满足感的一些内在因素，如个人成就感、责任和挑战。

铁笼 (iron cage)：马克斯·韦伯将日常生活看作一所监狱的比喻。

智商测验 (IQ test)：对语言、数学推理、空间与符号关系等方面的智力水平的测试。

司法酌处权 (judicial discretion)：法官有权在对相同犯罪的量刑轻重上采取一定的灵活性。

青少年行为不良 (juvenile delinquency)：指未成年的青少年触犯法律。

青少年审判法 (juvenile justice code)：专门处置16岁以下青少年犯罪的法律和法庭组织。

标签论 (labeling)：一种解释在穷人中由于社会标签对个人自我态度形成的消极作用的理论。

劳工诈骗 (labor racketeering)：渗透进工会组织以获得使用养老基金的权利，向管理层敲诈钱财以避免劳工纠纷。

潜在功能 (latent functions)：社会变化带来的潜在的未曾预期到的影响，在变化之初并没有明显的迹象。

边缘系统 (limbic system)：环绕脑干周围的环形组织，是组成前脑的最原始的部分。

磁性学校（magnet schools）：为了实现种族融合，城市地区的学校提供特殊的专门的教学计划以吸引来自其他区的学生。

男性失范（male anomie）：男性由于在一个性别解放的社会中无法界定自己的男性角色，而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可见功能（manifest functions）：一个社会体系中，某些因素所产生的明显和有意的结果。

首要地位（master status）：决定一个人社会身份和影响生活的主要方面的最重要的立场地位。

贫困救助计划（means-tested programs）：政府资助计划，是否有资格根据个人收入决定。

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州政府管理组织的一项健康资助计划，一部分经费由联邦资助，用于帮助穷人、盲人和残疾人等。

老年保健计划（medicare）：联邦政府资金支持的健康资助计划，用于帮助65岁以上的老人。

特大城市（megacities）：人口在1000万或1000万以上的大型城市。

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区（megalopolis）：原本各自独立的大型城市地区，在商业和交通等方面相互渗透。

大型兼并（megamergers）：资产价值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被其他更大的公司兼并获得。

美沙酮治疗（methadone maintenance）：通过每天稳定使用一定剂量的美沙酮（一种合成镇静剂），以替代并治疗海洛因毒瘾的方法。

军工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由艾森豪威尔发明的术语，形容军事组织与私营公司共同从事商业活动。

最低能力考试（minimum-competency test）：一项测试读写、数学等基本能力的标准化考试，通常前提是已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的人。

妈妈轨道（mommy track）：当妇女同时要负担家庭和工作的重任时，常常会中断其在公司中进一步升职的进程。

道德倡导者（Moral entrepreneur）：霍华德·贝克用来形容那些创造和限制越轨行为界限的人们的名词。

习俗（mores）：具有道德教化意义的强大的社会规范，违反者常常会引起公愤。

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跨国经营的大型公司，在许多国家设有工厂和进行投资。

自恋（narcissism）：过分专注于自我、外表、快乐和社会竞争中的成绩。

麻醉性毒品（narcotics）：具有镇静和止痛作用的毒品，包括天然鸦片剂（可待因、吗啡、鸦片）和合成制品（海洛因、美沙酮、杜冷丁等）。

《全国犯罪受害调查》（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在官方的犯罪统计数字之外，对未报警的犯罪案件及其受害人所做的访谈和统计。

神经官能症（neuroses）：个性紊乱，包括严重的不安或消沉、忧郁、恐惧、强迫行为

和身心失调等。

新女性关系网（new woman networks）：新近出现的劳动妇女组织，旨在帮助女性在就业中获得晋升的机会，就像男性中一直存在的“老伙计”关系网一样。

新价值一致性（new value consensus）：要求改变工业化时代价值标准的提议，崇尚质朴，要求减少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奢侈挥霍的消费、物质财富以及今天对人类生存已必不可少的各种工具和电器。

无过错离婚（no-fault divorce）：夫妻双方互相同意、互不指责地解除婚姻关系。

规范融合（normative integration）：相互共享价值观和意见以使人们平等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由丈夫、妻子和子女组成的家庭单位。

职业身份（occupational identity）：一个人从工作中获得的自我认同、自我尊重和声誉。

寡头垄断（oligopoly）：由一小部分生产商控制整个行业，进而操纵市场价格。

可操作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可以通过研究计算而阐明其概念的定义。

过度治疗（overmedicalization）：认为医疗机构对社会和人的生命控制过甚。

父权组织（patriarch unit）：由男性支配女性的一种家庭形式。

光合作用（photosynthesis）：植物通过叶绿素的作用，将阳光作为能量来源以吸收二氧化碳和水。

粉领工作（pink-collar jobs）：传统上与妇女联系在一起并主要由女性从事的职业。

认罪辩诉协议（plea bargain）：为了尽快解决诉讼审判过程，罪犯主动认罪以获得较轻的指控和判罚。

多元化（pluralism）：少数民族能够维持自身独特的亚文化，同时在与更大的群体交往过程中保持相对平等的状态。

警察酌处权（police discretion）：警察在是否实施逮捕行动中的灵活处置，可能反映出某种社会偏见，导致歧视行为或偏袒处理。

政治碎化（political fragmentation）：在一个大城市地区，由于数量众多的地方市政自治体组成的庞大的政府结构，导致无法适应整个地区的各种需要。

色情图片（pornography）：造成女性或男性非人化、堕落和被利用的对性行为的图片描写。

后现代主义取向（postmodern orientation）：一种与过去急剧割裂并强调一个更为凄凉和复杂的世界的社会学研究观点。

价格同盟（price leadership）：一些生产商控制整个行业后，调整或平衡价格以避免价格竞争。

诉讼酌处权（prosecutorial discretion）：当局决定如何分配资源以最好地服务于社会。

卖淫（prostitution）：为了钱或物而不带任何感情地出卖肉体。

精神刺激性药物（psychoactive drug）：任何会影响个人的意识、情绪或知觉的化学物质。

精神分裂症（psychoses）：严重的性格紊乱，包括偏执妄想狂、性格分裂症、狂躁压抑症和精神忧郁症。

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由政府建造、所有和管理并有租金补贴的住宅，对居住者有一定的收入限制。

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不仅根据我们拥有或生产东西的数量，而且根据健康和幸福的状况，来衡量和判断生活的价值。

似是而非论（quasi-theory）：根据对问题的解决办法来定义某一问题，而不是先确定原因再寻找答案的一种非科学的做法。

五分法（quintile）：对人口总数进行五等分。

随机抽样（random sample）：一种使得每个人都有同样机会被选中的客观抽样调查方法。

屡犯（recidivism）：在原先被定罪后再次犯罪。

重组家庭（reconstituted family）：包括丈夫、妻子、原先婚姻所生子女和新的婚姻所生子女的家庭。

财富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wealth）：通过大型企业国有化、没收巨额财产、消除贫富间巨大差距的一种极端做法。

重新分区（redistricting）：为了保存地区学校以实现社区内的种族平衡，重新划分地区的界限范围。

划红线（redlining）：划定某一地区为“高危害”区域进行抵押或获取住宅发展贷款。

相对贫困（relative deprivation）：生活水平低于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但尚未威胁到生活必需。

镇压恐怖主义（repressive terrorism）：执政团体运用恐怖主义手段以稳固统治。

居住格局（residential patterning）：根据特定人群而形成的居住区的划分。

革命的恐怖主义（revolutionary terrorism）：采用恐怖主义手段以夺取政权。

旋转门（revolving door）：公司企业与政府军事部门之间行政管理人员的不断的相互交换。

公路狂暴（road rage）：在发生交通冲撞后，一些急躁愤怒的司机驾车攻击对方，试图威胁、伤害、甚至杀害他人。

角色困境（role entrapment）：在文化中对“女性”角色的限定，阻碍了许多妇女去争取成功和自我实现。

安全性行为（safe sex）：不发生体液交换的肉体性行为。

设想（scenario）：对可能发生的未来所做的假想描绘，根据目前的趋势和展望，说明它们对未来生活的影响。

学校优惠补助（school voucher）：家长得到州政府提供的用于孩子在小学或中学教育开支的经费保证。

被动吸烟（second-hand smoke）：亦称为间接吸烟，会对不抽烟的人带来致癌等健康危害。

“第八款”计划（section 8）：一项由承租人直接在房屋租赁市场寻找住房，政府直接支付三分之二平均租金的公共住房资助计划。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指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减弱，而科学、技术和理性的力

量加强。

性别歧视（sexism）：基于性别基础上的歧视态度和行为。

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在工作环境下发生的带有胁迫、敌视或侵犯的性表示或性要求和性言论或性行为，尤其是一旦拒绝这种性表示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工作和职业。

性伤害（sexual victimization）：由于年幼、天真及与施虐者的关系而发生的性虐待，如父女间的血亲相奸。

单亲家庭（single-parent families）：由于离婚、非婚生育或配偶死亡而形成的只有一个父亲（或母亲）和孩子的家庭单位。

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利用学校纠正社会的不公正，并使个人适应其工作岗位。

社会晋升（social promotions）：按照儿童在同龄人中的等级来评判选拔，而不论实际的学习成绩。

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根据收入、职业和教育综合得出的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技能不符（skills mismatch）：从业人员不能达到对某一特定行业基本的资格要求。

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基于具体经验而非抽象概念基础上的分析结构，以表达对现实的一种独特观点，常常为女性主义观点。

身份犯错（status offenses）：曾经被视作属于16岁以下人群中的犯罪的一系列行为，如离家出走、逃学或不服管教等。

性病（STD）：通过性交渠道传播的各类疾病。

空姐综合症（stewardess syndrome）：指对刚刚认识的陌生人就像有过亲密关系一样例行公事一般地报以热情的微笑。

战略警务（strategic policing）：通过计算机分析得出犯罪多发地段，从而采取增加巡逻、诱捕和突击行动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减少街头犯罪的策略。

有组织的观察（structured observation）：在野外或实验室进行实验比较，以衡量变量间相互作用的效果。

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通过组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

教师期望（teacher expectations）：教师对学生成就产生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

技术官僚（technocrats）：那些具有技术专长并帮助和指导企业决策进而影响国家政策和生活质量的人。

恐怖主义（terrorism）：使用威胁、高压、恐吓和暴力袭击等手段达到个人或团体的目的。

第三产业（tertiary occupation）：服务性行业，如银行业、商业、教育、医疗卫生、法律咨询等。

治疗社区（therapeutic communities）：一项全面渗透性的戒毒计划，吸毒者在一个严格管理的治疗中心自愿共同生活一年以上的时间。

滴入式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鼓励和刺激私营经济以扩大就业人数，从而创造

出一段时期的经济繁荣，就像水滴一样逐渐渗入最底层使得全部都能受益。

触发效应（trigger effect）：某种行为，甚至是相对而言非常微小的人类活动，都可能全面破坏自然界的天然平衡而带来负面的结果。

不自觉意识（unconscious ideology）：深植于文化中的身份要求，如母性等，它被视为当然的占支配地位的不自觉意识。

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指环境迫使人们从事一些与其教育水平、工作经历等不相称的缺乏挑战和收入较低的工作。

《统一犯罪报告》（uniform crime report）：地方、州县等司法机关通用的标准，将犯罪情况统计并制表，然后上报联邦调查局。

住宅型城市（uptown city）：在原有的汽车城周围新建并与之形成整体的一种边缘城市。

都市家宅（urban homesteading）：城市将废弃或被抵押的住宅以象征性的价格低价售出，购买者在整修后在限期内迁入并至少生活若干年时间。

城市改造（urban renewal）：清除并改建贫民区的公共投资计划。

价值观（values）：全社会所共有的关于什么是好的、正确的、令人满意的一种观念。

治安维持（vigilantism）：由于没有其他办法保卫自身的生活方式，而采用武力保护社区安全；有许多针对无辜平民的残忍丑陋的行为常常隐藏在这种名义之下。

暴力亚文化（violence subculture）：亲暴力的价值观念和态度，将暴力视作对潜在的挑战或侮辱的正当反应。

韦伯悖论（Weberian paradox）：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讽刺，认为科学在有效地提高生活方式的同时，也破坏了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情感安全。

福利（welfare）：政府向收入低于最低标准的社会成员提供经济补助以保证生活基本必需。

白领犯罪（white-collar crime）：社会经济上层的成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作为其正常工作活动的一部分，而不是个人的病态行为。

人名、专业术语对照表

Abandoned housing 废弃房屋
Ability grouping 能力分组
  effects of 效果
  testing for 试验
Abortion 堕胎
Absolute deprivation 绝对贫困
Abuse 虐待
  child 儿童
  elderly 老人
  spouse 配偶
Academic standards 学术标准
Acid rain 酸雨
Action-oriented research 行为倾向研究
Addiction 上瘾
  tobacco 烟草
Adult illiteracy 成年文盲
Affirmative action 赞助性行动
African Americans 非洲裔美国人
  family patterns among 家庭模式
  socioeconomic concerns of 社会经济取向
Age, poverty and 年龄，与贫困
AIDS. See *HIV*. 艾滋病，参见“艾滋病病毒”。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 帮助有被抚养儿童的家庭
Air pollution 空气污染
Albedo effects 反照率效应
Alcohol consumption 酗酒
  automobile accidents and 交通意外
  dangers of 危害
  family and 家庭
  gender and 性别
  health effects of 健康影响
  international patterns of 国际的形式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生理作用
  U. S. patterns of 美国模式
  youths and 与青少年
Alcoholics Anonymous 匿名酗酒者
Alienation 异化
  political 政治的
  of workers 工人的
Aliens. See *Illegal aliens*. 移民，参见“非法移民”
Alien species 外来物种
Alternative futures 未来的选择
  for cities 城市
  for crime 犯罪
  for drug abuse 毒品
  for education 教育
  for family structure 家庭结构
  for gender relations 性别关系
  for health care 医疗健康
  for individuals 个人
  for population 人口
  for poverty 贫困
  for race relations 种族关系
  for sexual behavior 性行为
  for work 工作
Altruistic escape 利他性逃避
AMA lobby 美国医学协会的游说
Anomie 失范
  drug abuse and 与吸毒
  male 男性
Antagonistic drugs 对抗性药物
Anthropocentrism 人类中心论
Anti-immigrant sentiment 反移民情绪
Anti-oppression position 反压迫立场
  criticism of 批评
Anti-smoking campaign 禁烟运动
Asbestos work, health hazards of 石棉行业，健康危害
Ascribed status 赋予地位

Asian Americans, socioeconomic concerns of 亚裔美国人，社会经济取向
Assimilation 同化
Atomistic family 核心家庭
Authority, hierarchy of 权力等级
Awareness trap 意识陷阱

Banfield, Edward 爱德华·班菲尔德
Battered wives, services for 被殴打的妻子
Becker, Howard 霍华德·贝克
Berger, Peter 彼得·伯格
Betz, Michael 迈克尔·贝茨
Billingsley, Andrew 安德鲁·比林斯利
Bioethics 生物伦理
issues in 有关问题
Biological argument 生物学争论
"support" for "支持"
weakness of 不足
Biological equilibrium 生物平衡
Blaming the victim 指责受害者
Blauner, Robert 罗伯特·布劳纳
Blendon, Robert 罗伯特·布兰登
Blue-collar powerlessness 蓝领的无力
Blue Cross/Blue Shield 蓝十字/蓝盾计划
Bohannan, Paul 保罗·伯罕南
Bonding theories 结合论
Boomer city 新兴城市
Borjas, George 乔治·伯哈斯
BosWash megalopolis 波士顿—华盛顿都市带
Brand, Stewart 斯图尔特·布兰德
Bride burning 焚烧新娘
Brownmiller, Susan 苏姗·布朗米勒
Bureaucracy 官僚机构
in city politics 城市政治
school as 学校
Business ethic 商业道德
Busing 校车制度

Capital punishment 死刑
Career 生涯
sexual 性
Carson, Rachel 拉歇尔·卡森
Case study 个案研究
Casual sex 随意性行为
Central cities 中心城市
Cesarean births 剖腹产
Chaos theory 混沌理论
Chauncey, George 乔治·乔塞
Chemical spills 化学药片
Chemical work, health hazards of 化工厂，健康危害
Cherlin, Andrew 安德鲁·切林
Child abuse 虐待儿童
intervention in 干涉
Childhood, changes in meaning of 童年
Child molestation 猥亵儿童
Child support 抚养儿童
Cities 城市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未来的选择
boomer 新兴
central 中心
Conflict orientation on 冲突论观点
edge 边缘
Functionalist orientation on 功能主义观点
greenfield 绿地
housing problems in 住房问题
Interactionist orientation on 相互作用论观点
international context for 国际背景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in 政治碎化
regional patterns among 地区模式
regional thinking for 区域思考
snowbelt vs. sunbelt 多雪地带与阳光地带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for 社会历史背景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社会学视角
traffic congestion and 交通拥挤
uptown 闹市
urban change in 都市变迁
Citzens' militias 民兵组织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1964 年民权法案

Class structure, family problems and 阶级结构，与家庭问题
Climate regulation, global 气候调节，全球
Cloward, Richard A. 理查德·克劳德
Cocaine 可卡因
  and public policy 与公共政策
  use of 使用
Codeine 可待因
Cohabitation 同居
Coleman, James S. 詹姆斯·科尔曼
Coleman Report 科尔曼报告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集体意识
College drinking 大学酗酒
Commodity-self 自我商品化
Commoner, Barry 巴里·考门纳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CDA) 严肃通信法案
"Communities of Memory" "回忆社区"
Community 社区
  loss of 损失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 基于社区的修正
Community policing 社区警务
Compensatory education 补习教育
Condominium conversion 共管转化
Conflict orientation 冲突论观点
  on cities 城市
  on crime 犯罪
  on drug abuse 吸毒
  on education 教育
  on family problems 家庭问题
  on gender inequality 性别不平等
  on health care 医疗保健
  on the individual 个人
  on population 人口
  on poverty 贫困
  on race relations 种族关系
  on sexual behavior 性行为
  on work 工作
Conformity 一致性
Congestion, traffic 拥挤，交通
Conglomerates 企业集团
Consciousness, collective 意识，集体
Consumerism 用户至上主义
  family-based 家庭
  sexist 性 ~
Consumer manipulation 操纵消费者
Consumption 消费
Control group 控制集团
Convenience sample 便利抽样
Conversation, guided 交谈，引导
Cool attitude 冷静态度
Coontz, Stephanie 史蒂芬尼·库恩茨
Corporate "culture" 企业"文化"
Corporate takeovers 公司接管
Corporate technostructure 企业技术结构
Corporat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公司
  occupational trends in 就业趋势
  work in 工作
Corporations 公司
  alliances with government 与政府的联盟
  amorality of 超道德
  multinational 跨国公司
  ownership of 所有权
Cost overruns 超支
Cottle, Thomas 托马斯·考特
Crack "噼啪"
Crime (s) 犯罪
  against the person 个人犯罪
  against property 财产犯罪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未来的前景
  Conflict orientation on 冲突论观点
  extent of 程度
  Functionalist orientation on 功能主义观点
  Interactionist orientation on 相互作用论观点
  juvenile 青少年犯罪
  laws prosecuting 法律处罚
  organized 有组织的犯罪
  societal norms and 与社会准则
Crime (s) (*cont.*) 犯罪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社会学视角